修訂版

黨史筆記

何方 著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一個延安時期老共產黨人的**啟示錄**

他燃燒過青春，也崇拜過“神”

他追求過理想，也誤傷過好人

他想過沉默，最終選擇了見證

他要以過來者的身份、歷史學家的態度：

徹底顛覆不實的黨史
全部還原時代的真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修訂版

黨史筆記

何方著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一個延安時期老共產黨人的**啟示錄**

他燃燒過青春，也崇拜過“神”

他追求過理想，也誤傷過好人

他想過沉默，最終選擇了見證

他要以過來者的身份、歷史學家的態度：

徹底顛覆不實的黨史

全部還原時代的真相

党史笔记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何方 著

利文出版社
2005年

目录

作者简介
前言
第一篇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
一、问题的提起
二、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三、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第二篇 再谈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三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吗？
二，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提政治路线问题？
三、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当选总书记还是会后分工“负总责”？*
第三篇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以及两人的差异与比较
一、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差异和比较
第四篇 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
一，整风开始，张闻天首当其冲
二、关于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各种整风检讨
第五篇 张闻天与所谓教条宗派
一、如何理解反党宗派
二，所谓“教条宗派”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三，张闻天与所谓“二十八个半”
四，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及张闻天同它的关系
五，如何看待临时中央和张闻天的作用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党内真有两大宗派吗？
一，从中央苏区存在两大宗派谈起
二，说三十年代存在两大宗派缺乏根据
三，对反对宗派斗争的几点看法
第七篇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再思考
一，对延安整风应该重新研究并进行新的总结
二，必须分清延安整风的不同层次

三，对延安整风也要一分为二
第八篇 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
一，知识分子成为普遍整风主要对象的原因
二，普遍整风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三，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些消极影响
第九篇 延安整风不能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一，马列主义教育运动的提法与实际不符
二，整风前倒是进行了几年马克思主义教育
三，整风中断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和延安的理论繁荣时期
四，延安整风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影响
第十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一
一，关于抢救运动的评价
二，研究和讨论整风抢救所用资料问题
三，对抢救运动中几个具体提法的辨析
第十一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二
一，关于抢救运动的发起
二，关于抢救运动的领导
第十二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三
一，为什么要谈一下康生
二，关于对康生的一点评介
三，关于康生和毛泽东的关系
四，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作用和态度
五，康生和审干九条
第十三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四
一，主流党史学论抢救运动的因果
二，造成抢救运动的原因
三，抢救运动的后果和影响
第十四篇 从“博古路线”到所谓“王明路线”
一，延安整风突出路线问题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二，从提出路线问题到定名“博古路线”
三，整风开始只提博古路线没提王明路线的原因

四，清算第三次“左”倾为什么迟迟未针对王明
五，王明路线的出现和定型
六，博古路线为什么和怎样变成王明路线的
七，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第十五篇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
一，什么是个人崇拜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二，延安整风中个人崇拜的重要表现
三、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
第十六篇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
四，个人崇拜的形成与发展
第十七篇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下）
五，“文革”后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仍长盛不衰
第十八篇 延安整风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
一，什么是一元化领导
二，一元化探源
三，一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实践
四，关于一元化的几点评价
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
一，上层整风就是研究和清算党的历史
二，《历史决议》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奠定了基础
三，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乔木胡绳学派
第二十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下）
四，党史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五，高华、王若水在延安整风研究中的误区
六，漫谈“信史”和“良史”
“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一、如何理解个人崇拜？
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三、个人崇拜是如何营造起来的？
四、“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
五、“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

对党史伪造学派的清算
一、塑造毛泽东神话的两个历史决议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纂学”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作者简介

何方：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1933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做地方工作。1950年任职外交部，先后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主任，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与及有关工作。1959年下放，至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9年调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至1995年。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领取者，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前言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我六年来学习中共党史的一束笔记，也算门外史谈。至于我为什么在进入耄耋之年，还要放弃从事过五十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习党史，其中缘故，倒要稍作交代。

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我由于个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过关的私心杂念，对于直接领导我工作学习十多年的张闻天进行了“揭发批判”。事后一直感到内疚，认为是个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错误。1979年我随张闻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着要设法赎罪补过。此后同张闻天夫人刘英以百次计的接触拜访中，更加深了我对他们夫妇高尚品德的了解，也增加了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就是在离开工作岗位后要投入对张闻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办了离休手续，随即完全改行，一面学习，一面也写点有关张闻天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由于张闻天是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所以研究张闻天不能不学习党史。而学习党史却又加剧了也许是老年人共有的现象：对以往的反思和怀念。特别是回想起初参加革命和延安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

我是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的。那时确实十分单纯，抱着为抗日救国和人类解放的决心，真有点不惜牺牲一切，被国民党扣留关押后仍逃跑出来奔赴延安。进入抗大（抗日军政大学），也确实看见一派新气象，开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当时大家虽然生活清贫，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学为乐，以苦为荣。平日所学和所谈，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国家前途，自由讨论，很少顾忌，还经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上可鄙的。”（现译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可是三四年后，开始了延安整风，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把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风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表现给基本上整掉了。我们当时也确实自觉地进行改造，力争使自己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加之整风中又来了一场历时两三年的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万马齐喑，思想有点麻木，头脑也更加简单。从此就一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了。但是后来的实际，却和我们当年的理念渐行渐远。根据自己六十余年的观察体会和一个长时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们那时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什么奋斗了几辈子，却总还是看不见，反而大批共产党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更不用说工农群众了。究竟是谁在专谁的政？寻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风。因为延安整风不仅如李维汉所说，教育了“老长征”和“三八式”整整两代人，做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更重要的还是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它既有助于革命取得胜利，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也导致了建国后三十年的经济文化落后和不断的政治运动及其带来的各种灾难。例如胡乔木就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延安整风正是学斯大林理论，照搬苏联一切，并有自己的很大发展。现在我们虽然实行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却仍然严格坚持延安整风定下的模式，使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必由之

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上只能一条腿（还不完全）走路。这恐怕绝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而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风。所以，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学习党史中，重点从张闻天转向延安整风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家言，但我仍以热爱革命、热爱党和热爱祖国的初衷，本着“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上可鄙的”精神表而出之，接下来就是敬候批评了。

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包括在本书内的只是一批学习笔记，各自成篇，没求系统，因此不完全连贯，在引语和举例上也就难免重复。第二，本书所用资料均系公开文献和别人研究成果。本人既不能查阅档案，也无力跑图书馆，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藏书和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书刊，几乎完全是一个人闭门造车，错情必定不少。第三，本书每篇成文后曾分别送请一些老同志和老同学阅提意见。例如头两篇（也只是这两篇）就曾送刘英同志审阅并得到她的认可。还有几位老朋友对每篇都经过认真阅读，提出宝贵意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我内心的感谢。

何方

2004年12月30日

第一篇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一、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ii]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着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v]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

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风后才有的提法，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该书既然肯定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对张闻天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它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纸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vii]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地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二、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viii]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

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三、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呢？下面就试举八条论据进行讨论。

（一）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着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很少。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取代博古出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有的说是出于毛泽东的谦辞。这自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何况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实际上成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又处于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就没有推辞。还有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先让张闻天“过渡”一下，是为了好向国际交代。这也是实在说不过去的。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总书记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替代的人就这么多顾虑呢？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考虑。相反地，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例如六届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对于去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说“国际已将毛同志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其实，在这之前国际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硬

是让洛甫做一做看”。[xx]这种说法大约只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码也是延安整风以后，在遵义会议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专门清算历史问题时都没有特别涉及，可见这些说法只是出于一些人事后的认识或某种需要。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却是当时各种具体条件决定的，带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二）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也许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1938年以前，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的会议，还不像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而是认真准备，确定会议议程和报告人，最后往往还要作总结发言，实为会议结论。因为自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发扬民主，推行集体领导，摒弃博古时期那种个人包办和独断专行，所以不但开会多（同外地领导人磋商的电函也多），重要问题会议上定，而且还按所讨论的问题由分工主管的人对某项议题提出报告和在讨论后作结论。这样，作为会议主持人，他的最后讲话就被称为“总结发言”。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

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它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三）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多通过中共代表团），进行请示汇报、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国党组织，如向各路红军和各中央局传达中央重要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就很快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提出建议、交待任务、接受汇报、保持联系等），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见他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管中央和全党的组织工作，仍然像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所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在其位。这和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更不用说1943年中央机构改组后的情况了。

（四）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

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种说法，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是新领导的核心，因为一切重大问题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后定下来的。如果是指某些具体军事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如指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只要对《张闻天文集》和《毛泽东文集》（均包括《选集》）这个时期的文稿以及两人同一时期的《年谱》作一对照，就可明显看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但毛泽东却几为空白。有两件在战略转变上有重大意义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却是张闻天代为起草和发布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包括十大纲领），毛泽东从前方复信给张闻天说，"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即发。"第二件是《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见。如按胡乔木说的办法，"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那么把六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毛泽东文稿一对比，也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了。

下面再从几次重要会议中看这一时期张闻天在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表正确路线一方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现在已得到公认。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为了突出毛泽东和减弱张闻天的作用，提出《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这一说法的缺乏根据和于理不通是很明显的。对此，将另有专文论述。

遵义会议后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与确定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军会合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等，在会上分别作政治报告或结论，并先后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两河口会议通过第一个决议的前几天，张闻天就发表了一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署名文章，成为最早系统阐述北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文献，这就不能说决定和决议的起草是根据别人的发言和意见了（但有些史书上仍说是张闻天支持了"毛泽东的北上方针"，不知有何根据）。此后由于张国焘违背上述决议和对抗中央，张闻天又主持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直到延安后，有关批判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陕北，当然是领导集体决定，但肯定有张闻天的重要贡献。因为从现存文献看，首先透露出这个意思的就是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说明他注意这个问题，早有这个意向。其它各种说法，如毛泽东看到《大公报》才知道有陕北红军等，可能都有，但却于文献无据，仍属于传说。

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又一极为重要的会议，准备工作是完全在张闻天主持下，而毛泽东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其实，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首先提出了战略转变问题）。当时由张闻天主持，同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根据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确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相关的策略，然后写信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方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很快复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对改变富农策略"基本

同意”。当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三天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召开，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会前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延安整风以后，一些党史著作和回忆录，为了突出毛泽东，往往不提会议的政治决议或者一笔带过，而大讲特讲会后毛泽东的传达报告，自然是不确切也不妥当的。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由于事出突然，一时发生意见分歧和某种感情用事也在所难免。毛泽东就在肯定事变的积极意义和强调抗日的同时，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这期间留在后方主持大计的中央常委只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他们密切合作，指导全局，分头或以“洛、毛”联名发出了大量电报。张闻天还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一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其它一些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如1936年3月的晋西会议，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等，也都是张闻天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只按分工作军事和统战问题的报告。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四年间，除以上列举，党中央的其它重要文件包括政治决议和政策指示，也多是张闻天起草的，更没有证据说明哪些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或发言。

这一时期还有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工作转变，也是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实现的。例如白区工作的转变就是在他的领导（出主意，用干部）下进行的，见之于他同刘少奇的通讯和在白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等。改变青年运动的工作方向和组织形式，取消共青团（少共）的决定，也是张闻天做出的。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如张闻天是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创者。据李维汉说，“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是党中央到陕北以后，从组成西北工作委员会开始的。”当时张闻天主管西北工作委员会，任书记。委员会提供

的关于蒙古和回民工作两个报告的实施，“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又如据李华生说，张闻天在抓党内学习、指导编《党员课本》时还在中国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看，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还不能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是张闻天在履行着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的职责，并不是什么“名义的领袖”。

（五）代表党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集体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当时得到公认的，也包括毛泽东本人。下面数例就足以说明。

1，如上所述，代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打交道。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电报，通过中共代表团向国际报告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的全面情况。其中谈到党的领导机构说，“现在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即张浩）、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还要求国际提供经济援助。国际派回国的代表张浩，也是先向张闻天传达和汇报，共同商讨贯彻国际七大精神和筹备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后来张浩又以驻国际代表名义协助代表党中央的张闻天，共同处理中央同四方面军的关系。

2，全国的党组织都承认张闻天的为首地位。例如1936年9月26日，张国焘等给张浩、洛甫等的电报就说，“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任弼时等的电报中也说，“你们提议以洛甫等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是最适当的建议。”至于地方党组织如北方局的刘少奇、上海的潘汉年和冯雪峰，也都是向张闻天请示汇报的。著名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还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各地来到中央的领导干部，多按组织关系向张闻天报到和谈工作问题（一度在张住延安凤凰山麓时，有些人还开玩笑说成是进“皇宫”）。如潘汉年、张浩等初次回来还临时住在张的家里。潘汉年从莫斯科回来就是由张闻天领他去见了一次毛泽东，其余都是张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亲自谈的。[xlii] 但是至今还有些材料和文学作品（如许多电视剧）描写当时某些党的活动家回到中央只见毛泽东不见张闻天，或以见毛为主，见张陪衬。这只能是：或者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有意要突出毛泽东。

3，张闻天在哪里就意味着党中央在哪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兵分两路，两个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去前方指挥打仗，两个常委张闻天和博古到瓦窑堡安家。在此期间，只能说中央在瓦窑堡，而且不论人数多少，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随军行动”，实际上就是指张闻天随军行动（有人戏称为“御驾亲征”）。虽然有半数常委（周恩来和博古）留在后方，但却只能成立中央局。晋西会议决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于是张闻天就回到了瓦窑堡，中央局也随之取消。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东征红军西渡回陕，并建议在延长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复电同意，《毛泽东传1893

—1949》就说成是“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和“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

4，名次排列多为张先毛后。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顺序不很严格，特别是早期，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纪录甚至把非政治局委员排在了第一名，但多数场合还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后，一般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极少以毛打头的。要是以常委联署发电报，大都是“洛、恩、博、泽”，如1936年8月25日致驻国际代表王明电，8月9日致张学良电，多次致朱德、张国焘电等。由于到陕北后毛泽东已成为中央红军的统帅，作为党中央第一把手的张闻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泽东紧密合作，所以这一时期他们两人联名发的电报也最多。据统计，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到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签署或同别人联署的电报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联署的为286份，占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两年发的。另据张培森编辑《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后抄送来的材料，这期间署名“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以后。1938年二人联署电报已大为减少，其中署“洛毛”的只有1／3。六届六中全会后联署电报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领衔。当然，这也要考虑到中国的某些传统作法，如联署的起草人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后面，或者非起草者审阅签署时改了名次。洛毛或毛洛的联署自然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第一，会议记录总不是他们两人出于谦让而有意安排的，看来还是有某种惯例。至于少数脱离常规的作法，则可能是记录者以到会先后为序。第二，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位期间的决议和文件多为他起草，大概不会把绝大多数联署电报的起草推给毛泽东。而毛的性格也不是总喜欢位列人后。张闻天本人签发给驻国际代表报告中央组织情况的电报，就以洛、恩、博、泽为序。1938年后的电报则多以毛打头。这都说明署名先后那时也还是有些规矩的。从这些情况中也可看出领导地位的变动，同时证明1938年前在党中央为首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确是张闻天。从延安整风到现在，许多党史著作，不管什么场合，都把毛泽东放到第一位，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连写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时，明明组长是周恩来，也要写成毛周王，有的干脆说成“以毛泽东为首”（如被定为《遵义会议文献》的伍修权的回忆文章）。这就不能说是历史主义的了。

5，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负总责）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没有让毛泽东发挥全面领导作用，曾是张闻天后来在整风中检讨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上引的《反省笔记》中就说，“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如最近两年来（按：指六中全会后）所做的那样。”还检讨他在行使总书记职权中的一些错误，包括在“用干部”上的信任罗迈让他当中组部长、重用郭洪涛让他先后任中组部副部长、陕北省委和山东分局的书记等。可见张闻天当时还是有实权真管事的，不像后来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

席”。抹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作用，或说他只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的领袖，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不愿听命于人，但那时还是遵守纪律的，并无明显僭越之举。他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从不自行召开中央会议，也从不自行代表中央发布政策性指示或谈话，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干部，对这类问题有意见也只是向张提出。直罗镇战役后的报捷电报开头就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在向朱德、张国焘等的通报中也说，“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有些前方来的电报还标题为：“西北军革委主席毛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例如1935年12月5日的电报就是“西北军革委主席毛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和国际驻中共代表李德”）。毛泽东要求中央开会讨论什么问题，或建议中央办什么事情，一般都向张闻天提出。

这里只谈一下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说明毛泽东还没有越权行事和独断专行。因为这可能又是一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写道：“我们到陕北后，我即看出……肃反是过左的，所以很快就释放了当时被诬陷的许多同志。”但是长期以来，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毛泽东年谱1893——1949》还说成是毛在听汇报前就已“当即下令”。[liii]在未作调查和未同常委商量就断定是冤假错案而贸然“下令”，这既不合乎毛当时的身份，也不像他在肃反问题上的一贯作法。而且这时还在派人寻找陕北红军，和陕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未取得联系，又向谁下令呢？如果不是根据原始记录，而是取自有些人延安整风后的“回忆”，就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了。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同志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liv]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特别是还长期为陕北肃反问题受到冤枉，一直申诉了几十年（他是反对说刘志丹等为反革命的，但却被定为搞乱捕乱杀的领导人，并写进了《毛选》1951年版注释，直到“文革”后中央专为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问题开了座谈会、发了文件，作了平反，新版《毛选》也作了改正[lv]）。后来出的《周恩来传》上也说，“中共中央在听取郭洪涛、聂洪钧汇报时就觉察到有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他们在洛甫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在当月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lvi]但应指出，多数史书至今仍沿袭旧说。事实上刘志丹等人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

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lvii]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lviii]这都说明，毛泽东在下寺湾会议和出任西北军委主席后，还没有以领导自居，越过张闻天从直罗镇前线下令放人。

其实，当时的张闻天和毛泽东，一个作为总书记，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们的关系也是合乎原则的。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lix]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只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的，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lx]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直到最近（2000年3月），刘英还对问及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以说明当时同志中亲密无间和生动愉快的情况。[lxi]

（六）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

这里只举以下几个例证。

一是同王明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中央领导人须由国际决定和批准，因此国际派王明回国就容易被人误以为是要他来当领袖（事实上，许多国家党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后被派回国的）。加之王明以钦差大臣、国际代表自居的表现，也确实迷惑了一些人。当时说，王明是斯大林派专机送回国的，行踪很神秘，停留兰州时不露面，连对路过此地的蔡树藩、钟赤兵、刘英、贺子珍一些高级干部都保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反而成了护送人，出面安排飞延安的安全措施。[lxii]到延安后又受到热烈欢迎，被毛泽东喻为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在随之召开的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数与会者纷纷进行检讨。连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见"，承认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书上说的那样，毛成功地"顶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这时的政治局大多数，也许对王明还有点迷惑不解，虽不一定真心支持他当领袖，但没有支持毛泽东和没有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却是实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说，十二月会议上他是孤立的，会后半年还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lxiii]会议也决定由王明起草决议。在组织上，可能是由于临行前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为了拿下张闻天的总书记，王明才提议毛泽东出任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但与会者仍推举王明为委员会书记。而且政治局委员对通过这一议案还依次签名，以示郑重，成为中共党史

上空前绝后之举。这大概也是王明后来在武汉敢于同中央分庭抗礼的一点诱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但表决结果却是多数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个月即回来”。不但中央内部如此，有时对外也表现出双峰并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就是带的毛泽东和王明两人的亲笔签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在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指示后，才迅速在中共领导人中掀起拥护毛泽东当领袖的热潮。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虽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泽东还是一直说，“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lxiv]

二是党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前或起码在六中全会前，都没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言论和举措。一些“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等说法，基本上都是整风以后才有的。与此有关的是，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证毛泽东，但却经常引证马、恩、列、斯。即以较早宣传毛泽东的刘少奇而论，他在1939年所写被列为“整风文献”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只是在1962年修订时才有了大量引证。他在1941年写的《论党内斗争》，1943年回到延安后又作了校正，也都没有引证毛泽东。陈云在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三处引证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但却不提毛泽东的名字，而说成六中全会的决议。[lxv]其它如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整风前发表的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有引证毛泽东的地方。整风开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根本变化是1943年。从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领导人都在文章中拥护和歌颂毛泽东的领导，开始把引证毛泽东变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反而很少再引证马、恩、列、斯了。

三是各地党的组织和领导并没有注意宣传毛泽东，毛泽东的文章和言论也没有引起特别重视。例如长江局就集体决定不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发生的分歧所持的态度。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先作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也到会作了报告（后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不要“民主的”，显然是个原则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却只引用张闻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接着引证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释。[lxvi]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

四是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毛泽东也并不突出，是被和党的其它领导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战初期流行的一个歌子中就唱道，“城头上站立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朱德、毛泽东。”而且那时对“领袖”的理解也与后来不同，使用很广泛，没有严格限制，凡是群众中带头的人都可称领袖。党的领袖也并不是只指一个人，根据当时通行的称谓，大概书记处成员都可称领袖。给人印象特深的是，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对前来作报告的领导人的介绍，如果是毛泽东，就说，“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讲话。”受到“领袖之一”称呼的，记得还有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这种提

法一直延续到1939年。虽然六中全会上已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发言，但在公开场合和群众中间，还没有见到单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更没有听到喊万岁。连长期在马列学院和政治研究室这两个中央机关工作的邓力群都说，在1942年以前，没有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lxvii]在群众场合人们第一次听到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说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约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到延安来抗大总校作报告。当有人递条子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位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不管这一答复是否妥当，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却是无疑的。但这已是六中全会以后，也不是直接称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可见，在延安整风前，起码在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的四年间，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是没有得到公认的。

（七）“五朝领袖”之说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我们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这可能是个概数，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八年）。总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泽东之间有个第五代，这是得到全党和史学界公认的，还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说的意见。既然如此，怎么能无视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说是紧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后来的许多党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副词，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或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据和事实，似乎是由于说得久说得多，就不成问题了。而上面列举的大量事实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说明加个副词并不解决问题。

有些否认存在“第五朝领袖”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经谈过的，说张闻天只是名义领袖，实际领袖还是毛泽东。这是在个人崇拜影响下的说法，并非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无论从组织领导还是从政治决策看，张闻天都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根本不能同向忠发相提并论，也不同于“文革”后邓小平作为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并在党内外得到明确承认的条件下的总书记。二是说张闻天负总责只是从开始确立到正式确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过渡。这是意在抹杀张闻天主持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战略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实，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在“五朝领袖”换代时都没有什么过渡，为什么到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时要有那么长的一个过渡？而且也不能把张闻天比之于华国锋。因为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谈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lxviii]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完备，都不适用于张闻天。因为从遵义会议到

瓦窑堡会议，以前和以后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摒弃错误路线和制定正确路线的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当然不能说只是张闻天，但他作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总是不能否认的。三是说张闻天负总责的时间比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这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时间更短。就是江泽民总书记，也是一接任就被称为一代领导核心的。

（八）原有论断既违背党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损于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

最后要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还违背党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形象。因为这等于说，党是老早就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两套，会上的选举和作出的决定都是表面文章，内幕则是个人独断或几个人的密谋。也等于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居于党组织之上，不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权术，而张闻天则甘做“阿斗”，其它领导人也成了一群“驯服工具”。如果说，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当总书记，并不是出于多数人的志愿，而只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安排，那不等于说遵义会议时已经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会议的两大历史性决定：改变领导是在他幕后操纵下实现的，“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改变路线的决议又是根据他的发言起草的，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时的作法一样了吗？由此可见，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影响是并不好的，只能加深个人崇拜，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看似照顾大局，实则遗患无穷。

根据以上八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家都承认，历史应该真实（如上引王震的话）。因此，党史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切不实之词，必须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也要看到，倡导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实并不容易。

（2000年3月完稿）

第二篇 再谈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三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吗？

分别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九期，《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均有删节。

《遵义会议决议》[lxix]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被误传为毛泽东，据说还曾收入1948年有的地方上自行编的《毛泽东选集》。[lxx]但在建国后正式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可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决议》系张闻天起草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词》。《悼词》中同时还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lxxi]原由曾彦修、徐达深、何方起草的稿子上没有这些内容。据张闻天夫人刘英提供的材料，有不少重要内容是送审中胡乔木加上的。她说，"胡乔木对悼词作了修改，增加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lxxii]事实上，这些重要的修改，除其中的"被选为总书记"1982年根据陈云意见改为常委分工"负总责"外，起草决议等各点后来就成为党史研究中的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都一律遵守这些口径，同时也都将"总书记"改为"负总责"。

关于《决议》为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被称为《传达提纲》[lxxiii]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八十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我就曾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而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lxxiv]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lxxv]如果说，个人的回忆录不足为凭，可以不论，但后来出版的权威史书也竟然采用此说。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就更加以具体化，分别定为："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lxxvi]"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lxxvii]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

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lxxviii]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规矩，其它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这几乎成了一种公式，而且说法一样，一般都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所以很难令人信服。其实，只要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做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就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lxxix]这一叙述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证之以后的陈云《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它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lxxx]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回忆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lxxxi]（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显然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中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它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lxxxii]但是也有些党史研究者，一方面从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威望、思想和理论水平等的论证得出结论说，会议委托他起草决议并非偶然，他也完全胜任；另一方面却又要勉强加上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的话，自觉不自觉地落进前后自相矛盾的陷阱。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lxxxiii]周恩来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lxxxiv]可见，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多次讨论和交换过，张闻天也早已了解，无须只等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而且根据张闻天的习惯和他们之间的一贯作法，张闻天根据“经过共同讨论”写出的“反报告”提纲，必定给毛王看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也一定会提出，并且作了反复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后才能成为代表三个人的“联合发言”。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张闻天作了“反报

告”（也是他们的“联合发言”）之后的发言，既不会同张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后作些补充，或对某些问题加以强调、发挥和提高。根据这样一个发言是无法起草出会议决议的，而且会议也不会作出根据一个人的发言起草决议的“决定”。如果现在通行的这种说法属实，而毛泽东的发言又确像一些人描写的那样全面系统，甚至说成“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lxxxv]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报告》基本重复；或者毛在事前酝酿中没有把大部分意见和盘托出而要留作自己发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因此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还应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同时，还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证，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会前起草的那个提纲，经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为传达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的内容只是详简之分，而不是另起炉灶。[lxxxvi]何况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会上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而对于起草者张闻天来说，这样做不但是顺理成章和执行会上的决定，而且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因为从遵义会议结束到决议的写成和通过，紧打满算只有二十天左右。这期间，红军一直处于行军作战的流动状态，张闻天除必须随军行动外，还得经常（几乎每天）参加和后来主持中央的会议、为书记处起草和签发一些重要的文件电报，而《决议》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对有关资料和文件（如国际指示和一些人过去的文章或发言等）。环境动乱和时间紧迫，更要求起草决议尽量省事。而以自己的报告提纲为基础和框架进行加工，自然比较得心应手一些。根据会上一个发言起草，就要另起炉灶、有更多磋商，在内容和结构没有根本不同又没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大概是不会有人找这个麻烦的。

另外，张闻天终其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乔木自己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就说，“综观张闻天同志一生，我觉得，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lxxxvii]张闻天几十年的经历表明，他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意见，总要出于自己认为成熟的考虑（被迫的交代和检讨、反省除外），即使贯彻上面指示或吸取别人意见，也要自己融会贯通，决不生吞活剥。例如他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进入外交战线，在向下面传达中央会议时，都是要综合会议精神并结合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实际进行传达，如同布置工作一样，从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几个领导人的讲话记录。这也是我跟随他工作十多年的亲身体会。为此，下面曾提过不少意见，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具体说了些什么，要求很强烈，他这才接受大家意见，大约从1958年起开始宣读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但往往还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种传达方式，也是1959年被批判的一项内容，作为反对毛主席的证明）。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尚且如此，何况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才被大家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地位还在原有常委张闻天自己和周恩来之后。要张闻天不依大家同意的报告提纲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决议，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的条件，即不仅因为他当时在中央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认的思想理论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他作的“反报告”和提出的提纲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得到会议“完全同意”，可以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也表明他已和“左”倾中央及其路线宣告决裂，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张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证，[lxxxviii]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能够站出来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们的思想观点有差别，进入苏区参加实际工作后又逐渐觉悟，越来越多地批评一些极左政策。特别是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直接进行斗争了。进苏区两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整天接触和谈论的都是军队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委员，要经常参加军事问题的讨论。形势也在迫使他对军事问题进行学习、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说张闻天完全不懂军事。长征前写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如《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等，都直接谈到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几种表现，提出了若干正确思想观点。《遵义会议决议》不但反映了这些观点，还采用了很多表达这些观点的用语。这也证明，张闻天起草决议是以他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的。

再说，会议“决定”让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或发言起草决议，也和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太不相称。即使按好久以后才形成的作法，根据领导意图（更不用说一个人的意见或发言了）起草会议决议，那也是秘书（或写作班子）的事，总不致让才推举出来担任第一把手的张闻天起秘书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至今还没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如果决议确系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那么基于决议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国后编《毛选》时大概是会收进去的，毛泽东也不一定会反对。收入《毛选》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别人起草的，例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有其它人参与起草的部分，其中第一章第二节即由张闻天执笔，[lxxxix]而且文章的主要内容早已在延安一些学校讲授，还油印过讲义，至于作为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更不用说了。另外，毛泽东着《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写的。[xc]（这种情况其它人也有。例如张闻天1945年11月起草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陈高洛电报”，当陈云在世时的1983年就已收入《陈云文选》，[xci]而张闻天亲手起草的原稿档案尚在。）张闻天是从不讲他个人的功劳和贡献的，在延安整风期间还竭力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因此决议如果确系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按理他是会在《反省笔记》或其它谈到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作点说明的，但事实上却只字未提。周恩来、陈云，也都没讲过决议的起草问题，如果会议真有根据毛发言起草的“决定”，他们理应是会提到的。胡乔木虽然是党史方面的主要权威，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xcii]在党史问题上往往是“一言九鼎”，但终究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而且一大半为后人整理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在谈到决议的起草问题时也是只下结论，并不提供任何出处和根据。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存疑。

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以后，不是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

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这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不能说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的贡献。那为什么在初步总结第二次国内战争经验的时候，已经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的张闻天就不能有点贡献，起草决议竟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根据毛泽东发言”？在这里，历史和逻辑不是又分家了？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关于《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说法，大概是以讹传讹。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既非事实又悖逻辑的问题呢？看来，最初提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权威；而人们后来的附和，则是党史研究中一种一贯立足于个人崇拜的表现。“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拨乱反正、改变方针，就必须批判“两个凡是”及个人崇拜，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强调毛泽东的作用和贡献，特别是建国前的功绩，而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当然更是一项重要内容。也许是由于这种历史背景，一方面公布了《遵义会议决议》系张闻天起草，另一方面又说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瓦窑堡会议实行战略转变的决定，归功于毛泽东，更是为了突出毛而掠人之美。后来陈云建议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加写一节《关于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显然出于同样考虑。实质上这都是在继续坚持个人崇拜的思想。

关于瓦窑堡会议，上篇也已说过，这里再特别谈一下毛泽东的会后传达报告。[xciii]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xciv]中仍大讲特讲的这个报告，其实存在着不少疑问，例如：第一，当时在全党传达和贯彻执行的是会议通过的决议还是毛泽东的传达报告？大约可以肯定的是前者。第二，这个报告发表在什么地方，是以什么形式传播的。根据建国前的一些《毛选》版本，包括晚在1948年的东北书店版，都没有收这篇报告，可见传布范围不广，因而影响也会很有限。第三，1951年收进《毛选》时采用的是什么版本，手写的还是油印的或铅印的（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重要的著作，直到1941年前还只有少数油印本而无铅印本[xcv]），如果不是刊登在某种书刊上，铅印的可能也不大。第四，收进《毛选》时的修改情况。因为毛著中的几乎所有文章都经过重大修改，有些还经过多次修改。至于这篇传达报告的修改以至重写，是根据会议记录还是临时草拟的简要提纲，都未作说明。总之，用多年后修改甚至重写的东西印证或评价当时所起作用，显然是不会确切的。而且无论如何，一个小范围的报告，作用和影响总是不会超过向全党传达的会议决议的。因此，胡乔木等把报告放在决议之上，而且提得那么高，就只能是为了突出个人，谈不上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了。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载的谈话中批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它人很少提到”。[xcvi]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刻意突出毛泽东和抹杀其它一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恐怕要比《决议》“过分”得多了。例如全文对于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中共中央的所有重要会议，一概不提主持人、报告人和决议起草人，重大决策也一律或明或暗地归之于毛泽东的主张和领导；对这一重要战略转变时期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更是完全不提。后来在1985年写的《回

忆张闻天同志》[xcvii]一文中，胡乔木自己也说，“现在回想起来，整风运动中对他的批评也有些过头的地方……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就更加不公正了。”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一些叙述和评论是否应作点实事求是的改变呢？

《遵义会议决议》是否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以及上述处理西安事变和召开瓦窑堡会议两例，都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情况和风气，就是党史研究中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很不够，并且形成了一个传统和规矩，就是党史上的“人治”，凡事只要权威人士一经提出就成了定论，此后的研究和论述，只要重复结论，可以不谈所以然的理由。这恐怕就很难说是科学研究了。

二，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提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了中央领导，但却没有提出政治路线的错误问题。《遵义会议决议》反而确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而且讲得有根有据，连路线错误的暗示都没有。[xcviii]也至今尚未看到有文献证明，会上和会后很长时间有人提过路线错误（延安整风后特别是"文革"后的某些回忆录不足为凭）。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当时是没有人认识到，还是故意不提出？

对于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提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路线错误问题，延安整风中作的解释是出于党内斗争中的策略考虑。意思是，因为当时多数人尚未认识到是路线错误，如果提出来就无法团结大多数，特别是不会为"左"倾中央分化出来的人所接受，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当时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而且还可能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这一说法起于毛泽东，然后大家也就都跟着讲。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如果当时提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xcix]张闻天后来在《反省笔记》中也说，"在遵义会议上不提路线错误，反而肯定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一个示范来看。"[c]陆定一1944年在《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中讲得更直接，对于当时是否认识到是路线错误，回答说，"当时毛主席是懂得的，是有意识地不提出来，因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自己没有根据地，处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战争是大家明白看到性命交关的问题，路线的错误还不是大家所了解，当时提出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对当时打仗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路线并非马上要命的问题，可以慢慢讲。"[ci]

整风后，这种出于党内斗争策略考虑的解释就正式固定了下来，几乎一切党史著作和领导人的回忆录在提到这个问题时都完全遵守这一口径，而且还越讲越生动具体。例如伍修权在1982年所写《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干，反而让王明的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cii]这里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人"和"有同志"都没有指明是谁，而且既然是在会上提出，为什么其它与会者就没有听到？不是会议主持者的毛泽东又是怎样制止的？至于会后关于王明错误的问答，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为会上批评的是博古、李德，提王明的"左"倾已是1943年九月会议后期的事。而且在这之前，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对第三次"左"倾还只算三年零四个月，伍修权却已在十三年前定为"四年之久"。可见，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后来的认识编写当年故事的例证。但是党史界写史传却最喜欢引证这类《回忆录》，以使许多事后说法成为人们"所需"的证据甚至定论。

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党史研究和史料发掘才有一些突破，其中就有对遵义会议没有提政治问题的传统解释的质疑和否定，认为那种出于策略考虑的提法并不真实，而是主要由于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对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一时难于分清。

谈论遵义会议没提政治问题的文章不少，但比较权威的应当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说，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时，毛主席虽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和排挤，"但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认识到临时中央领导者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长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红军失败的原因，得出了临时中央领导在军事领导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的结论，但对其政治路线还没有明确提出疑议。"[ciii]直到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才提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表明毛主席对这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但"这里的认识，依然是不完整的"。[civ]所以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还认为"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方面"应该肯定，并得出结论说，"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并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cv]毛主席在同一时期写的"九篇文章"，用的标题也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还没提王明路线。[cvi]胡乔木还说，"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路线怎么样。毛主席写的《农村调查》的《跋》（1941年4月19日）讲到，那时执行的许多政策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当时也是错误的。这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cvii]即使单从胡乔木的正面解释看，遵义会议没有提政治问题，也并不是什么策略考虑，要等待多数人的觉悟，而是连毛泽东也没有认识到。那些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而且，这也是遵义会议后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例如直到1936年秋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不但没有提出政治路线问题，而且还把军事上的错误归之于右倾，说，"丧失根据地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cviii]（书中上一节说的"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则是以前各种版本所没有而为1951年出版《毛选》时加上的）。其实，第一个比较含糊并且只限于白区工作提出四中全会以后有路线错误的样子，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这就是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引起的一场争论。刘少奇在报告中批判长期存在的"左"的恶劣传统，认为四中全会以后，党在实际工作中还部分地保存着立三路线（他随后也解释说，"我觉得我们的错误……好像是路线的样子"）。[cix]这就立即遭到多数与会者的不满和批评，政治局不得不开会讨论白区工作路线问题。不但时任总书记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认为，四中全会后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刘少奇的提法"忽视党的历史发展"，"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毛泽东，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也批评刘少奇"扩大化"，是"非辩证法的发展观"，说党"只有几个极短时期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期）"，其它时期只是在若干问题上犯过原则性的错误。这就是说，王明博古时期也不是路线错误了。最后，刘少奇不得不进行检讨，承认自己认识有片面性，把问题扩大化了，"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我是不否认的"。[cx]

如果说，这个时期仍然需要等待多数人的觉悟，还有策略的考虑，那么在党史上被说成是批判王明的六届六中全会总可以少一点顾忌了吧，但事实是提法仍然相反。六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的提法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其“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就是说，这次错误只限于反五次“围剿”中的军事方面。接着还直截了当地表明，“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的严重的原则错误。”[cxi]

其实，也不仅六中全会，而且如上所述，以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好久，认识仍比较模糊，还一再发生变化。这从上引胡乔木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是，直到1945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把路线错误的性质最后确定下来。建国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后来更进一步演变成王明路线，一般不再提博古的名字了。[cxii]

由此可见，对于王明路线的提出，无论对全党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有个过程，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经过不断变化才逐渐明确起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看得清、提得准。这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在学习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并逐渐掌握了路线问题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用路线错误置政敌于“死地”，令其“彻底缴械”。所以延安整风一开始就提路线问题（上层），而且越来越强调。但也不是一开始就拿着帽子乱戴，总还有个了解情况和演变的过程。这也合乎当年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对四中全会后党的历史的调查研究，只是1940年下半年收集和编辑《六大以来》才正式开展起来。在这之前，特别是内战时期，长期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居无定所，又缺乏资料，也没有时间和条件来全面研究党的历史和政治路线。而且从主观上讲，当时整天想的都是打仗，所以毛泽东对军事问题了解得透，思想比较成熟，对政治路线还了解不多，研究不够，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形成独特的系统的看法。另一方面，当时的地位和处境，也使毛泽东不大容易了解中央的整个路线问题。所以胡乔木说，“一编《六大以来》，就发现了过去存在的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研究四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问题。在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时候，毛主席对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触。”[cxiii]这就是说，毛泽东对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是在延安整风中才加以研究和逐步认识的，并不像一些人事后所猜想的那样，把毛泽东说成`“先知先觉”。例如研究党史很有见地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上面也说，在遵义会议上，“依据他（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水平，肯定知道‘左’倾领导人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这种猜测就太不实事求是了。其实，如果再深一层看，就不应忽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整风过程中路线斗争的变化。一开始清算的“左”倾错误被称为“博古路线”，还不是“王明路线”，时间也是从博古临时中央上台的“九一八”前后算起，说王明出头的四中全会，根本方面还是“正确的”。但由于王明不但不检讨，反而倒打一耙，批评抗战时期党的路线了，加上康生、刘少奇、周恩来等对四中全会特别是王明所写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揭发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才在整风后

期冠上了王明的名字（但还只限于上层），时间也从四中全会算起了。

遵义会议上没有提出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还因为那时政治上的分歧不像军事上的分歧那样明显。军事上，李德、博古的单纯防御路线和瞎指挥成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因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特别是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一对比，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所以不但代表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的毛泽东，一开始就处于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原来犯“左”倾错误的张闻天、王稼祥，也早在长征前就已认识到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并起来进行斗争了。当时党内斗争也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对毛泽东的打击和排挤，首先就是剥夺他的军事指挥权。至于在政治领域，两条路线的分界并不十分清晰，不像军事路线那样泾渭分明。例如毛泽东虽然曾被批为执行“富农路线”，但整个说来他在富农问题上还是“左”了。对临时中央提出的“左”的土地政策，没有见到他的抗拒和抵制，反而在1933年6月1日由他和项英署名发布的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中，实际上就包含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内容。[cxiv]特别在肃反问题上，还在四中全会前，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就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严重扩大化（其实多是无中生有，连扩大化都谈不上，因为实际上红军和根据地中并没有什么“AB团”），反而是此后产生的“左”倾中央派人去纠偏（特别是后来进入苏区的周恩来）。据《肖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说，“仅1930年11月到12月的一个月里，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就打了4400个AB团，”“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了AB团”。[cxv]（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也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四万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分子。）还有因错误肃反使矛盾激化的富田事变，也发生在四中全会前，同样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处理的。[cxvi]这些就都不能归罪于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了。至于搞过火的阶级斗争，以斗争推动工作，用强迫命令以至肃反的手段进行扩红等，在中央苏区甚至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前后都是很盛行的，有些甚至是毛泽东指示那样做的。

即使从现存文献看，也很难理出当时一条同第三期“左”倾路线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和比较系统完整的正确路线来。甚至在以清算“左”倾路线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风中，也是着重以后来的认识揭发和批判“左”倾中央的错误，而很少举出当时在政治路线上与之相对抗的文献。所以正确路线和错误只能竖比（前后），无法横比（同时）。这就是胡乔木说的编辑《六大以来》所起的作用：“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样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cxvii]这“前后一对比”，可能是指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后的领导（也就是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检讨的，“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同志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如同近两年来所做的那样”）和遵义会议前“左”倾中央领导的对比。这也说明那时政治上的正确路线并不是很清楚，可能实际上并没形成一条路线，因此只能进行前后对比，而无法排列出双方同一时期在方针路线上针锋相对的文献。

也许是由于有些错误，特别是肃反问题上的极左错误是大家都犯的，不

能只归于第三期“左”倾路线，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就没有得到清算，因而不曾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遂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极左政策成了长期不治的顽症，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正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发动的抢救运动，就几乎完全是打AB团时的认识和做法的翻版。而且事后还是不加清算，反而至今仍然肯定“九条指示”的正确。[cxviii]这不能不说是同后来在肃反问题上继续不断犯类似错误有关。反之，如果对肃反问题上的极左思想和作法也能像对“左”倾教条主义那样批深批透，对历次运动中有过严重过火行为和犯极左错误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搞投机、充打手的，不一律采取保护政策，也许会避免或减少后来历次运动中制造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和伤害那么多的好人。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彻底清算。

既然遵义会议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是由于“认识方面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要说成是出于策略考虑呢？胡乔木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常说遵义会议当时有意讲军事问题，避开政治问题，但是实际上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可能谈政治问题，而且毛主席也不可能想那么多。历史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这里面也可能有某种考虑的因素。毛主席有时也这样说，但不必一定强调这个。”[cxix]这当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提出“不必一定强调”毛泽东从前的说法，可能是担心暴露毛泽东本人的自相矛盾和违背实事求是精神。

其实，像这类在延安整风期间及其以前和以后对历史问题做出的极不确切的结论，又一直被肯定而需要根据事实进行拨乱反正和重新认识的问题，实在不少。这里只举一个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大冤案西路军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既明显又典型，所以打算多讲几句，看看党史上一些事情被颠倒成了什么样子，也有助于理解遵义会议上没提政治问题系策略之说的不可靠。

所谓西路军问题，就是1936年红军会师统一指挥后，由于战略指导错误和统得太死，使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万多部队（按，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在河西走廊遭到几近全军覆没的惨败（全军21800人，战死7000多，被俘9000多，俘后被杀害5600多，回家乡2000多，流落西北各地的2000多，营救回到延安的4000多），还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造就的恶果，使生者和死者长期受到屈辱。而实际上，西路军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主席毛泽东）直接指挥的。1937年3月，当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央和军委在电报中已对这次失败“盖棺论定”，同张国焘以前的南下和另立中央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在严厉指责西路军领导人的同时，延安也正开展对国焘路线的大批判。结果，西路军失败是“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一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连当年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也不得不说些违心话。直到毛泽东去世五年后，作为西路军工作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才敢仗义执言，于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两次同李先念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1982年，李先念根据陈云的建议和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第二年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军事行动自始至终

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1983年8月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至此，长期被扭曲和诬陷的西路军问题总算在中央领导层得到了解决和澄清。徐向前才可以根据这个精神写他的《历史的回顾》了。[cxx]但是此后的官方党史著作，虽然已改而肯定西路军系中央决定组成，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战斗，但却对失败责任和长期蒙冤或只字不提，或继续贯彻“为尊者讳”等延安整风创建的党史编纂学原则。[cxxi]

西路军的冤案在毛泽东本人的文献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还在西路军浴血奋战时，他已把西路军和“国焘路线”联系起来，说：“为敌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cxxii]（按，西路军是1937年3月失败的，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毛泽东在1941年2月23日为军政杂志社第一次铅印出版写的“著者识”中注明为“1936年秋”。1951年出《毛选》一卷时才改为“1936年12月”。但不管是哪个日期，都在西路军失败之前，按理是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后增加或改写的。而据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谈话说，“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修改过”。见该书第58页。）但是正如徐向前所说，实际上，“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事的。”[cxxiii]而且文电俱在，说明与张国焘关系不大。因此《毛选》的有关注释，新旧版本就完全不同了。1951年的版本说是：“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cxxiv] 1991年版的《毛选》注释已改写为：“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cxxv]只是由于这时毛泽东已去世，对《毛选》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文不便再改，就只好让这个“硬伤”继续存在着。

为什么会有诸如此类不切实际的论断呢？过去有一种解释，说是为了革命需要。一些人明知不合乎事实却加以附和甚至还要发挥一下，也说是为了顾全大局。在西路军问题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就一直不服，但长期以来都没有人敢讲。

遵义会议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是出于策略考虑。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话，在党史上实在太多。原因就是为了突出个人、证明一贯正确，为此可以不顾事实、伪造历史。

三、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当选总书记还是会后分工“负总责”？*

*原文发表在《随笔》2001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同年第一期和《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发表时均有删节。

（一）从《遵义会议文献》谈起

遵义会议虽在事过不久的延安整风中就进行过清算，并留有大量文献和档案，但有关这次会议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矛盾说法却实在不少。四十年后把会上当选总书记的张闻天改成会后常委分工负总的责任，就是其中之一。对此，还得从中央有关单位的专门调查谈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而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1984年9月提出“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cxxvi] 这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李卓然等都还健在（只有刘伯承已丧失思维），听过会后传达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还有大量档案和各种资料。按理，这次调查研究应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弄清一些重要情况，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可惜结果并非如此，实在令人感到失望。

由于先就有了不可更动的结论（如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又带着只准证实其是的档案资料（即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而没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按照“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原则，所以不但没能弄清和解决一些重要情况和问题（如会议是怎样把会后才分工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助手的毛泽东确立为全党全军领袖的等等），反而还把一些问题弄得更乱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据《调查报告》和几个人几十年后的个人回忆，在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而且“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如果这属实，那张闻天的“反报告”以及为会议“完全同意”的“提纲”就都没有了。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上说，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就更是自相矛盾，因为他的所谓《传达提纲》上说的遵义会议“最后作出”的四条决定中竟有三条提到常委，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再说，党的最高领导人（无论称负总责、书记还是总书记）的更换，恐怕不会只是个常委分工问题。对于当时有无书记处，在1943年3月16日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方案时已说得很清楚：“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cxxvii]另外，《调查报告》还断言“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名义”，那张闻天多次让出总书记又怎么解释？陈云和康生在遵义会议后三年半的六中全会上提议选毛泽东为总书记又有何根据？类似问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这里又牵出来了两个不小的问题。

一是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内容的诠释，都还值得作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献》的考证所注，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那为什么没有保存在中国？听传达的人自应不少，怎么一直没人忆及？使陈云的“传达”除自己认定外，得不到其它旁证。行军途中写的手稿经过什么途径（陈云在长征途中奉派化装去上海，既无必要，更无可能带在身上）带到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办于1956年接收来，直到1982年才得到确认[cxxviii]）？而且原标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无“传达提纲”字样，为什么又不公布（或没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这是否是陈云去莫斯科在那里向国际写的汇报提纲？（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并作过论证，但陈云坚持他在苏联没写过这个东西，肯定是他长征途中所写。[cxxix]于是，在“只惟上”的潜规下，这方面的研究论证只好作罢。）若果真如此，由于时间已过去大半年（陈云是1935年8月同陈潭秋、杨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无多少旁证资料可供查考，单凭记忆能写得如此详尽已属大不易，在某些问题上出现遗漏、不确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对此问题，个人既无材料，也无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论列。但希望有关机构和专家能够坚持“不惟上，只惟实”的原则继续深入考查，提出实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说明。不回答上面以及有关的许多问题，这个材料恐怕是很难称为《传达提纲》、现在史学界也很难以此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定论的。

二是个人的回忆能否作为历史“文献”看待。对此拟另文论述。这里只以《遵义会议文献》中采用的几篇四五十年以后回忆中的问题为例提点疑问。根据现在的分析估计，一些回忆录的有关提法是当时不大可能发生的。如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伍修权）；“我和王稼祥……坚决主张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周恩来），等等。另外，有些说法已证明不合乎事实，如：关于正副报告后的发言顺序，先是毛泽东，接着是王稼祥，再接着是张闻天和朱德明确表态；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伍修权）；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被增选（注：显然不是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陈云）；等等。

这里并无意讨论这本《文献》的内容或对它作评价，只是想说明，遵义会议的研究并未因此画上句号，甚至可以说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没弄清。这里专就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对《文献》的说法作点辨析。

要了解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的职务，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前后中央有没有书记处。否则，博古和张闻天不但不能称为总书记，而且说他们是书记都不可以。

1982年12月28日陈云写的《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几个问题的答复》[cxxx]中，有不少说法是不确切甚至互相矛盾的。这可能是由于不但事过五十年，而且陈云年事已高，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后党史界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这次《调查报告》和《答复》以及陈云1935年那份现在才定名为《传达提纲》的文件奉为圭臬。这本身就违背

陈云提倡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精神。

例如《答复》中说，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这同历史事实就大有出入。几乎一切有关的党史资料和论着都提到，自五大以后，中央就一直设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我没有去查）。五大后的常委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八七会议选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六大后的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向忠发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说会后不久又补上王明，[cxxxi]并无根据），还决定改常委会主席为总书记，仍由向忠发担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都一直称向忠发至死的职务为主席，大概不是事实，而是为了圆“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之说。但却既未提供证据，也解释不了常委们鉴于卢福坦觊觎总书记，故决定临时中央暂不设总书记的事件。而对此，王明、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有正式说明）。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的联席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并选出书记处，博古继续任总书记（书记处称作常委时，博古只称书记）。这都是报经共产国际批准过的。

对《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以及《文献》其它内容，还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遵义会议后不到八年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专门清算十年内战时期党的领导，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强，又时隔不久，记忆犹新，留下了大量书面材料，怎么可能连有无书记处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如上列举，起码从五大算起就一直设有常委，怎么到六届五中全会竟无缘无故地给取消了？既然没有常委，毛泽东又怎么会“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是会后一个多月写的《传达提纲》（即使写于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还是事隔四十八年后写的《答复》可靠？

第三，既然没有书记处或常委会，怎么能长期以书记处的名义号令全党并和顶头上司的共产国际联系？六届五中全会后不到一年做出的《遵义会议决议》又怎么会多处提到并不存在的书记处？有案可查的常委会及其扩大会的召开和做出的决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1937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和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又从何说起？一个走向成熟的党，连领导核心的名称还“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这可能吗？

第四，“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是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档案（如各种会议记录）重要呢？还是个人多年后的回忆重要？而《遵义会议文献》的编排顺序，是看资料的准确程度和参考价值，还是看后来的官职大小？难道会议主持人秦邦宪会后不到十年提供的材料，还不如被“扩大”进来参加会的聂荣臻四五十年后的回忆重要？无论什么时间和场合，毛泽东都名列第一，这种规矩是怎么立下来的，合乎历史主义吗？

第五，《文献》选材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准确”，还是只为证实陈云的《传达提纲》和《答复》以及1984年9月《调查报告》的结论？在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上，为什么一概不用许多不同于陈云的说法，如中央关于“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邓小平对张闻天的《悼词》、《彭德怀自述》等？对挑选的人又为什么有断章取义，只摘一方面的说法而不用或删去

另方面的说法？如为什么对周恩来多次谈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话不用（包括“文革”期间说的“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cxxxii]），偏要用“听毛主席的话”这类属于“文革”时的语言？为什么伍修权两次提到的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的话被删去，[cxxxiii]却选用大可怀疑的《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和根本不可能提“王明那一套”的谈论？根据这样鲜明的倾向性选材能“准确”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再提许多，要在说明1984年的《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并没有解决遵义会议的一些主要问题，对“历史情况”的叙述也并不“准确”。它们本身和被《文献》采用的某些材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而不能“以此为准”和“到此为止”。

（二）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史实确凿无庸置疑

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还得先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cxxxiv]因而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所以胡绳主编和党史研究室所著党史中关于向忠发被捕前为主席的说法，[cxxxv]显然与史实不符。有的书更是自相矛盾，如2000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书叫做《延安整风实录》第5页上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虽仍由向忠发担任”，但第10页却说，“1931年6月，党的总书记被捕。”很明显，两者只能有一个是对的，而没有根据的说法又只能是第一个。

再看博古。根据上述，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发言中所说，“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注意，没有像现在党史书上没有根据地说王明“指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苏区后，两个中央局合并的会上要推举一位中央领导人，竟然只称为负总责，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特别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却仍然设一个负总责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大家都一直称呼博古为总书记，这是延安整风期间也无人否认过的。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是这样说。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列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刘英，最近就多次谈到。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书写下来的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了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会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此说如非事实，当事人的毛、刘、任、陈云等怎么能不纠正，反而会认为“写得很好”？）“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此外，他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兹不一一列举。张闻天的这份《反省笔记》，整风中曾得到大家称赞。刘英说，“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

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cxxxvi]总之，总书记从来没人加以否认，怎么事过四十年后这总书记就一下和一律变成“负总责”了？难道那时对博古不是称总书记同志，而是称负总责同志？这能叫上口吗？

在大体弄清向忠发死前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及其称谓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这方面文献资料又极多，为节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举数件。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征的。远的不说，只说平反后的就有：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cxxxvii]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让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cxxxviii]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说法有如李锐所述，“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李锐评曰：“这当然是对的。”却值得考虑）[cxxxix]

其它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权两次提到总书记的话：“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一一怀念张闻天同志》）。[cxl]杨尚昆：“大家习惯称他总书记”；[cxli]“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cxlii]。彭德怀：“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cxliii]黄克诚：“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cxliv]其它就不再引证了。

不但党内，就是知情的党外甚至外国人，也都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那位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cxlv]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cxlvi]不过也应承认，无论是在国内外还是在苏区和红军中，朱德、毛泽东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连罗瑞卿在中央苏区任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时还不知道王明。[cxlvii]可见，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线后才出名的；博古、张闻天出任过总书记一事能够被长期埋没和不被承认，也就都是不难理解的了。

至于张闻天本人，平时闭口不谈过去历史，但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在《反省笔记》中除上引谈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后边又讲到，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多次

提出解放总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证，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除在自我批评和颂扬毛泽东的问题上颇多过头之处（但多为空洞的上纲上线的话）外，而对党史事实的叙述，在延安整风中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关于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合法与否就是据它确定的。毛泽东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这是对几个重大历史问题所定的基调）中就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cxlviii]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之类，而是拥有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cxlix]可见，张闻天在这时和在这种基础上写出的《反省笔记》史料，大概总比陈云等人四十多年后的一些“回忆”和论证要更可靠得多。

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情况最了解现在仍健在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虽已96岁，但仍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她说是由于受过收发报密码训练和多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缘故）。她不但在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同中央领导多有接触，而且遵义会议后接替了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和张闻天结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又特别好，至今保持着对毛主席的亲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1937年11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内部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说，在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后则是唯一的一位了。为了了解张闻天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情况，从1999年起我已拜访了她数十次。对于博古特别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讲了许多生动细节以资证明，这里无须复述了。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还是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cl]但1982年以后，由于陈云提出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领导同志竭力劝说下，此后写的回忆录中才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上称为总书记”的

话。但在多次谈话中，她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则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她还几次谈到，1937年11月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和苏方都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领她去见季米特洛夫时就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单独密告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实行集体领导，洛甫还是书记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会议等。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时，中央的会议已不在他们家而改到毛主席处去开了。[cli]

综上所述，张闻天当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1982年证实的所谓《传达提纲》和一篇书面《答复》了。（因为《文献》摘录周恩来“文革”期中的一次讲话，只是提到“撤消博古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没说什么“声明”；还说“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也都没提到“负总责”。）

据个人学习这段党史的心得，张闻天出任总书记的情况可能有如下述。

六届四中全会确有改“主席”为“总书记”的决定。这是否有降低向忠发挂名的含义（中国更重视“主席”。毛泽东就不愿当“总书记”），没有研究，不敢妄断。向忠发叛变后，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王明已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决定分别去江西和苏联，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并同周、王等研究，为避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纠缠，决定先不设总书记，但指定博古负责，“多管一点事”，并举荐博古、洛甫、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经共产国际批准。批准电报是博古在大多数委员参加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再后又成立了包括卢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陈云组成的常委。1933年临时中央根据国际指示迁往中央苏区，如上所述，在双方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八人的联席会上，大家推举博古为总书记。一年后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自然“率由旧章”，博古继续担任总书记。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毛泽东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会上还选出书记处。以上均经共产国际批准。所以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刘少奇等虽对四、五两次中央全会和临时中央极其不满，但还是不能不承认其合法。

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问题，除本人和其它当事人的叙述外，杨尚昆晚年谈得更具体可信。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clii]说是由于毛泽东谦虚，让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据当时情况，这是不大可能的，也与毛的性格不合。他说过：“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cliii]可见，一位党的总书记（就算负总责吧），不是政治局会议推举（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而由常委分工决定（实际上只是两个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张闻天的总书记实际任职只到1937年底，多说也是1938年六中全会。在王明、陈云、康生回国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可能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根据有关资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更重视毛泽东，一直在宣传毛泽东，却从未宣传过博古、洛甫、甚至王明[cliv]），改组书记处，增补上述三人为书记，实行集体领导，仍由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张闻天不争权和不愿多出头的品德，他并不计较，还按王明等人的意见，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决定政治局常委会议改为书记处会议，但张闻天早已决心移交工作，所以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以后干脆连这个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工作也交给了任弼时，自己离开中央去进行农村调查了。

（三）为什么要将总书记改成"负总责"

由此可见，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要使党史跟着政治走，为当前现实服务。因此形势变了，党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张闻天的总书记只是一个例子。

从遵义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而且事实证明他也确实干得不错，因此获得"明君"之称。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作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在这三年中，中央多数领导同志拥护以张闻天为首，人们也都称他为总书记。"十二月会议"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使总书记称号已失去实际意义，且张闻天排名也失去首位，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所以从此大家只称他洛甫同志（这时除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其它中央领导多以同志称之），他在群众场合被介绍时还是使用"我们党的领袖之一"的名义。整风期间，上下界限分得极严，中央情况下面干部很少了解，只知张闻天和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很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但整风中并无人否认过他和博古当过总书记，陈云也没提出他的"负总责"之说，却是事实。

整风后期和七大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被排出中央领导核心，只能做一点调研以及后来的小范围地方工作和"授权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于过去的地位、名义和贡献，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没和封杀。例如被喻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只是通篇歌颂毛泽东，对于所谓"第五朝领袖"、在实现从内战向抗战的战略转变中掌舵的张闻天只字未提，甚至把张闻天的某些重大贡献也轻轻归于毛泽东名下（如上述的瓦窑堡会议和处理西安事变）。延安整风后，知道张闻天的人已经很少，更没几个人知道他当过总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员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对他进行大规模的错误批判时，无论上下，还都说他当过总书记，也没听说过"负总责"这个词）。此后，他就完全在备受无情打击和残酷折磨中销声匿

迹了。

在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后，没想到很快就否极泰来，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而1959年庐山会议之完全错误及其严重恶果，几乎是人人皆知无须多查的。于是张闻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而且在这之前的中央在“六十一人案”的批文中也说，“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总之，在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这一时期，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也得到了恢复，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对此加以论证。连1980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张闻天》条中也说，“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clv]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干得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维护毛泽东，说到底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clvi]在这种号召下，一些老同志写建国前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等的回忆录，以及理论界和史学界有关的研究，就空前繁荣起来（回忆建国后的却很少）。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陈云的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他也写出对有关调查的《答复》。从此就出现：张闻天的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毛泽东会上的发言“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等等。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遵照党史研究中的“人治”、“只惟上”的不成文规定和“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纪律，史学界照例闻风而动，迅速跟了上来。连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一些史书和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后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并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审查和出版机关给改了，否则也许出不来。

现在书报上称张闻天为一代总书记的虽多了起来，但却显得不够理直气壮，还要一再提“负总责“以表白。例如那本书，名叫《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内容却一再说是“负总责”，只是“实际上相当于担任党的总书记”。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历史的真相总会逐渐显露出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以后，大概就会有更多的人称他为一代总书记了。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什么职务，这是客观存在，终究掩盖不了，更抹杀不了。但为什么会时隐时现和变来变去，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从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看一看说的和做的是怎样对不上号。

日前有位朋友来信谈到党史研究说，“虽然都在讲要实事求是，但实践起

来却真难，谈所谓‘过于敏感’的问题，总是心有余悸。”其实，许多违背事实的论断和作法反而都是在实事求是的口号下进行的。张闻天从总书记变为负总责，恐怕就是不“惟实”、只“惟上”的结果。而且为了圆此一说，在正式党史上竟然否认向忠发和博古当过总书记，还制造了其它不少矛盾。甚至在拍一部张闻天文献片上也体现出“权大于史”、和党史中“人治”的例子。张闻天百年诞辰，中央批准拍摄他的文献片。制成后，经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大题材审查小组、刘英本人等有关各方审查通过。不期在放映的头一天，审查小组副组长张振东却强令剪下郭洪涛谈西安事变后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上意见还不一致的几句话，否则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谈话画面，再不然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了问题。摄制组无奈，只好删掉几句话。结果放出来，不但画面上郭洪涛语言不连，而且改变了史学界早已达成共识的事实，变成了政治局在事变后的第一次会上就已认识一致，决定和平解决和派周恩来去西安等等，使好几次会议和会下的磋商在一次会上完成了。这不是又一次说明，有权就可以改写历史，党史比胡适说的“小姑娘”更可以随便打扮了吗？

（2000年8月完稿）

第三篇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以及两人的差异与比较

一、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以及此后的遭遇，有必要先简单谈一下张闻天同毛泽东关系的发展变化。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每段又可细分成两个时期，这就是：张闻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进入中央苏区后，是他犯“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受压的三年多；长征开始到延安整风的六年，是两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较好的时期，只是头三年中央领导以张闻天为首，后三年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整风后是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做点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约各为一半的三十年。

（一）红军长征前的张毛关系

张闻天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但两人的相知却要早得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们就都已参加了中国少年学会。[clvii] 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同时发表了两人的入会消息，此后他们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又时有披露。因此，作为会友，他们不但互相知道，还会读到对方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毛泽东只是“少年中国”的一员，没有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和有什么出色表现，所以毛泽东本人和官方党史编纂学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国”的关系，而喜欢大讲毛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当然，在张毛关系上，真正有点影响还是1931年张闻天回国参加中央工作后（先任宣传部长列席常委会，从临时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间，两人并不相识，也无成见，但却发生了一些相互有关的事情，主要就是张闻天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曾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压制。例如张多次批评中央苏区领导的“右倾”、“狭隘经验论”，这当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不过也有批评得并不错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会上批评过去中央苏区“以AB团的问题，而形成党内恐怖”，“肃反工作是成为最大的罪恶”。[clviii]这也都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同年10月6日的常委会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评毛的“保守、退却”和“分散工作的观点”，还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clix]不过由于没有成见，所以张闻天另一方面的意见又起了有利于毛泽东的作用，如反对向忠发兼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泽东出任此职。[clx]直到进入中央苏区，张闻天才同毛泽东见面并一起工作。而他下车伊始又参与了博古提出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写文章、作报告，一时表现得异常积极。不过后来他在整风中反省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clxi]反“罗明路线”特别是反“邓、毛、谢、古”，他也主要是上纲上线写文章，照他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追查“江西小组织系统”、“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是罗迈。虽然如此，这次积极参加，终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并在毛泽东心中记下一笔帐，几乎讲了一辈子。

不过平心而论，张闻天除参与反“罗明路线”外，总的看来，在苏区近两年，他同毛的关系还算不错，接触也较多，并促成了他们在某些政策思想上

的接近和相互关系的靠拢。张闻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干脆被调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仍为苏维埃主席），不但工作关系密切，还比邻而居，来往频繁，不时见面。张闻天接触实际后，政策思想逐渐摆脱“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趋于激化，其中受毛泽东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对于两人合着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他就对人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呵。”（指开调查会等。）对两人在苏区的关系，包括张对毛生病的关心、支持共产国际不同意让毛到苏联养病等，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有较详细的回忆。如说，他们“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同志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clxii]

可是有些党史著作却喜欢强调张闻天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clxiii]其实这是对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几句话的误解，属于望文生义。因为就全文的精神看，张闻天检讨的对毛不了解也没想了解，是指自己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应当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被误解的原话是：“同他（指毛）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又如另一地方谈到自己“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至于爬在别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等的头上‘配不配’，我当然没有想）。”这里又特意提到毛，可见上面谈的“了解”、“本领”等，都是指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并不是真的相处一年半竟“毫不了解”。当然，正如张闻天检讨长征出发前他能和毛泽东合作的原因之一时说的，“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clxiv]因此可以说，张对毛确无成见，进入苏区后也没有反对过毛（他认为反对“罗明路线”不是反毛），但却并不十分尊重，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说，在张闻天到来前，任弼时、项英等已通过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了他的党权和军权，早已使他处于半靠边站状态。这时直接压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张闻天则无直接的重大冲突，因此关系“还平常”。并且随着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两人相互了解的进一步加深，还使得后来发展到坦诚相见，相互倾诉对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并准备同他们进行斗争。没有这个基础，遵义会议是开不成的，当然也谈不上此后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泽东同张闻天的关系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clxv]只有那些受个人崇拜影响较深和不了解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党史工作者才会说“毛泽东是不记个人恩怨的”。[clxvi]所以他在苏区对张闻天的态度还有影响深远的以下几点。第一，张闻天是批评和压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经参与批评过他，特别是反“邓毛谢古”。这是他长期耿耿于怀，有适当机会总要算帐的。第二，对于张闻天这种初出茅庐，不凭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发号施令，他从心底里就不服，甚

至鄙夷。第三，对张闻天被大家看作理论家，三天两头写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这些因素即使在同张闻天合作中也难免时有显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造成张闻天后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张毛关系

自从长征出发前张闻天把对博古和最高“三人团”不满完全向毛泽东坦白起，他们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相互间不但有了较深的了解（否则不会谈及如此重要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有了党内斗争的共同目标（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团”的军事路线和专断作风）。这就更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并终于形成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所谓“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的话说，就是“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clxvii]

长征后，两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见的相同。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从大的方面或长远讲，两人都是献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泽东在整风时说的，在反对蒋介石等问题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从当时情况或近期目标说，他们需要携手进行共同斗争，以改变李德、博古的指挥和领导，从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革命。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其它一切问题（如毛的个人恩怨和双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暂时抛开或加以搁置，而必须集中力量抓这一当务之急。主客观条件还使他们在这一革命形势和战略大转变时期必须成为主要的一对合作者。

毛泽东无疑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和反对“左”倾中央的灵魂，但却不便和很难直接出面领导这场斗争。这是因为：第一，他虽经共产国际干预在六届五中全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但却不是常委（或称书记），而且实际上还处于无权地位；第二，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被剥夺党权军权后，他同军队的指挥关系和直接联系中断两三年，号召力已大为削弱，何况老苏区的军政干部还调换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黄克诚所说，毛在肃反问题上伤害人太多和组织路线上的偏听偏信等，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clxviii]第四，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几年来批评他“右倾”、“狭隘经验论”等，也有损于他的威信。因此，毛泽东知道，要反“左”就必须首先依靠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并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张闻天。虽然他对张闻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也为了共同事业，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因为“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clxix]师哲的回忆录不确切的地方颇多，但这段描述却比较接近实际，证之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clxx]可见，毛的接近和依靠张，是当时的客观需要，是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个人回忆录，把毛泽东描述成众望所归，说“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大半是多年以后的认识，也是延安整风为党史学定下的统一口径，有些领导同志这样写《回忆录》则是为了突出自己。其实，会后的许多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威信当时并未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而是逐渐树立起来的，其中就有张闻天的帮助。如在会理会议上，作为新上任

的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他支持毛泽东、批评林彪等人，其作用是无人能代替的。

从张闻天这方面来说，在广昌战役后已同博古决裂，再经过反五次“围剿”失败和仓皇长征，他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更完全失去信心。由于性格比较孤僻和不善交际，他同苏区领导人的来往、交谈都不多，对最高“三人团”和罗迈更为不满，所以有意见就比较自然地对向无成见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泽东“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于是一拍即合。加之长征后两人都处于半靠边状态，所以就经常交谈和议论起来。张闻天虽进苏区近两年，还参加军委，经常讨论打仗，但终究是个文人，除战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认识外，对打仗的具体问题并不熟悉。因此这方面就听信毛泽东讲的，对毛也更加佩服。由于长征途中争论越来越尖锐，张闻天更进而萌发改变领导的念头，并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出于思想觉悟，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风时说的，并不是想争当总书记。事实上，遵义会议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他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还是再三推辞，拖了二十来天实在推不掉才接任。[clxxi]

当然，遵义会议能开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张闻天觉醒得还要早，跟人酝酿交谈的也更多，但说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却是言过其实。因为第一，他是在长征前的五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在中央的地位与邓发、凯丰等相当，其态度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第二，他因负伤，所担任的军委副主席和总政主任，在长征出发前就已分别由项英、李富春代替，遵义会议前他既无实职也无实权；第三，他从未进过中央领导核心，在军队中并无太大影响；第四，遵义会议上除博古、凯丰二人外，绝大多数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已形成共识；并不是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关键的一票”。由此可见，许多党史著作一直重复毛泽东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贬低张闻天这一论断，还是受着“两个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传统影响。如果一定要讲“关键的一票”，倒应该指周恩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起的作用最大。因为他作了“反报告”，为会议定下基调，又受委托起草决议，最后还当选为总书记。但实则不然。当时是最高“三人团”专政，他虽排名博古之后，却并无实权。加之一直处于行军打仗状态，军事第一，他在军中又没多大影响。周恩来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团”成员，而且实际上是中央红军的统帅，威信高，影响大，对于改变“左”倾方针和领导，真正起着关键作用。试想，如果周恩来不从“三人团”中分化出来，将会是什么情况。事实证明，他一站出来，博古、李德就没辙了。所以，陈云在所谓《传达提纲》中要特别标出他，说是“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它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还决定他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他“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clxxii]这都可看出他当时举足轻重的作用。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张闻天出任总书记后一开始就着重抓两件事。一是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他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独断专行，所以在他主持下开会较多，特别是开始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的，“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clxxiii]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后会已减少，但重要问题

仍要集体讨论决定，绝不搞一言堂。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开会，但在成为领袖前还是要求适当多开会，[clxxiv]使他的意见有发表机会并被采纳。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clxxv]因为从长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clxxvi]随后他又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长征途中，先后经过沙窝会议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出任红军缩编后的陕甘支队政委。[clxxvii]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就完全调了个个儿，由毛为周的助手变成了周为毛的助手。还应指出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1935年11月3日），又经他提议和会议通过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最后，还是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洛川会议上（1937年8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红军中的最高统帅地位。[clxxviii]

单从上列的军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报》记者钱江和范伟国的下述论断之真实可信：“翔实可靠的资料证明，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一步步将毛泽东推向党的领袖的岗位，并且“扶上马，送一程。’”[clxxix]

不但军事问题，而且在整个党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作到了珠联璧合的。在他们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完成长征，把陕北变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圣地，特别是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他们合作之密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单是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有档案可查的即达286件。[clxxx]对他们来说，一生中两年内与人联署发电可能没有比这再多的了。毛泽东虽然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加上外交，即统战），但有关方针政策和其它重大问题，张闻天也总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征求和尊重他的意见。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证。这是我们前面说过了的。而且会后由毛泽东传达决议精神报告（后来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积极分子会议，也是由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主持的。

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紧密配合，还能做到放弃自己原来的不成熟意见，接受对方的正确建议，体现了领导集体内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风。如处理西安事变，毛泽东就很快改变了他审蒋除蒋的一时想法（后来还作了检讨），同意了张闻天“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和争取“妥协派”的主张，也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案。[clxxxi]因为正像日本学者安藤正士所说，张闻天一开始就解决了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两个难题，为“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定下了基调”。[clxxxii]而在红军东征问题上，则是张闻天放弃了他原先主张“北上宁夏”的方案，转而支持毛泽东东征山西的建议。当时一些人对渡河东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对，彭德怀犹豫，林彪不久前还提出把重点放到陕南。但张闻天坚决支持东征，不计较一些人的闲话（如王稼祥说他没主见，是跟毛泽东跑的“泥菩萨”），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红军中去”，并代表常委宣布：“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后方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局，显

示了总书记亲自出征的决心。[clxxxiii]

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张闻天尊重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领导，但其它重大问题也征求毛的意见。毛泽东除分工所管外，对其它问题如有意见总是向张闻天提出或建议开会讨论解决，而不越俎代庖和随意插手党务、组织、宣传等其它部门的具体事务。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历史事实。但是延安整风创建的党史学，为了突出毛泽东，总要把事情说成是：虽然从组织上讲张闻天是总书记（1982年起还按陈云一个人的意见改成负总责），但出主意的还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有的甚而说，张闻天"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其实这些既无事实根据，道理上也讲不通，只是人云亦云。这主要还是由于这些党史学家严守延安整风定下的框架，只顾重复已有结论，而不顾历史事实。其实，张闻天本人在延安整风时那种强大压力下写的《反省笔记》，也只是说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clxxxiv]其它更多说的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条战线上。即以我们上面列举的处理西安事变和召开瓦窑堡会议这两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而论，张闻天显然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绝对不能视为"配角"。至于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我在第一篇笔记中就已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也必须指出，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主持日常党务工作的书记同正在形成中的全党全军领袖之间的合作。从此，在毛张关系上才可说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的变动就是在名次上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这当然不会是王明、康生辈的意思。从事前（苏联着重宣传毛泽东）和事后（六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传达）的情况看，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图。这大概是与会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张闻天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立即付诸实际，加以贯彻。正像许多后人和同代人的评价，[clxxxv]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多次表示并不热衷于当领导，而是对理论和研究工作有兴趣。三年多名副其实的总书记，在历史赋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尚昆就说，"自从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clxxxvi]现在，这一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并得到上（共产国际）下（党内干部）认同的领袖已被"扶上马"。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他不恋栈、不消沉、激流勇退、甘当配角，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这一变化也反映在联署电报上。1938年毛张联名发报已大为减少，且署名顺序毛在前的为多，不像以前绝大多数为"洛、毛"。六中全会后，他们的联署电报已基本上没有了[clxxxvii]）。除做好按分工担负的份内工作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还在两个问题上对毛泽东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泽东对王明及其它反对意见进行斗争。"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虽已排名首位，但处境却有点孤立。这是因为：一来王明有点闹独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汉，不愿延安使用中央名义；二来领导上对某些问题的

认识还未取得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总是同毛泽东站在一起，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问题，有时用领导人联署形式如毛、洛、胡（刘少奇）等，有时用书记处名义，发出指示或答复问题，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毛泽东方针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提出要把总书记职位让给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来。他在《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clxxxviii]既然张闻天这时还保留着总书记（起码是书记处书记）的头衔，那么毛泽东要和武汉的王明进行斗争，没有张的同意或签署，怎么可以用书记处名义或代表中央意见呢？可见在毛泽东成为实际上党的领袖后，张闻天的支持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二是在理论问题上张闻天也对毛泽东有不少帮助。延安时期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本人理论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方面，他得到张闻天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也就是说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过不小贡献。中央到陕北后，张闻天长期主管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重视理论，组织学习，对毛泽东钻研理论从正反两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包括书籍供应、研究空气、无形压力等。直接贡献那就更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少问题都可找到他的踪迹，一些名词也是他在党内首先使用而为毛泽东所沿用的，如“党八股”、“文化人”等。这里只举两个理论上的例子，以见一斑。一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张闻天留学苏联回国不久即参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所起作用，有如参加论战的一位积极分子薛暮桥所说，“张闻天同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clxxxix]此后，他先后在江西共大和陕北红大，亲自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时已编成讲义，连同他编着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成为一门必修课。后来《毛选》所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容与之大同小异，而且其中有的章节张闻天还分工参与起草。[cxc]又如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实际上是第一次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全面系统总结。而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的持久战问题，他从1935年11月起草《瓦窝堡会议决议》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他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是持久战的论述更引起热烈讨论，会上毛泽东也作了精辟的概括。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逐渐形成全党共识，“由毛泽东充实、发展并构建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于1938年写出了《论持久战》。[cxci]

举这几个例子（实际上要比这多得多）只是要说明，在张闻天和毛泽东合作的过程中是一种互助的关系，而且很难说谁对谁帮助更大些。过去那种毛泽东是教育者和张闻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说法（包括张的检讨和毛的认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是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

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在两人合作得很好的这几年中，相互间也还存在有隔阂，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对日后却有重大影响，所以先要简单一提。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他戏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对师哲说，“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

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cxcii]同张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于言表。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和谈不来。他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历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像康生之类），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出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总之，由于双方存在诸如此类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诚相见。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1941年就结束了。而且随着上层整风的开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三）延安整风后的张毛关系

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检讨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有关这期间的情况，后面将有一章专门谈到，这里暂付阙如。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cxciii]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自己深入实际，就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cxciv]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先是变成一种间接的（即中间隔了几层）领导和被领导关系，1959年后，连这种关系也告中断，完全被毛泽东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张闻天一起到东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话：在我看来，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段时间显得最为辉煌。首先是他担任总书记那几年，主持中央工作，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次就是在东北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期间。这两个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较全面，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发挥他的聪明才智。[cxcv]

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那时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挥解放战争上，而张却是完全从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对毛泽东有报告和建议一般也要经过东北局。但张闻天的大体情况和重要意见，毛泽东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如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问题张同刘少奇的争论，后来他就明确

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cxcvi]应该说，张闻天在东北的四年地方工作还确实显示出了他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顶住了。还有些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意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吸收采纳，如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等。当然也有些好的意见没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如解放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对发展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农业合作化不能操之过急等。对这后一点，薄一波曾叹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视”而造成农村工作的损失。[cxcvii]当然，这些都与张毛关系无直接联系，只是说明延安整风后两人地位的根本变化和张虽仍持积极入世态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当张闻天兴致盎然和得心应手地从事地方工作之际，1950年他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先是刘少奇等提议由章汉夫出任此职，并请示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毛同周恩来商议后复电改派张闻天。[cxcviii]这一调动除表明当时对外交工作还不熟悉和对联合国工作的重视外，从张毛关系的角度看，也从工作性质、国际惯例、实际情况看，更不排除有“贬官”、“外放”之意，而不是过去人们说的表现了毛对张的器重。这样考虑的根据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驻外使节只是执行政府指示、承办些国内委托的事务性工作、参加日常交际活动、反映情况等，且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cxcix]第二，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社会主义国家常对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国工作，含有“外放”、“贬谪”之意，如苏联1933年派反布哈林斗争中被撤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卢那恰尔斯基任驻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莫洛托夫任驻蒙古大使，1953年维辛斯基由外交部长降为副部长、任驻联合国代表；中国党建国后派定为“教条宗派”并因对整风有点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落选的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毛泽东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状，一次还当面指王十年内战时整他[cc]）等；第四，张闻天从未做过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时就从事外交（外国和国民党）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并不少，如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第五，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cci]第七，1952年苏共十九大，中国党派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然而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其政治歧视太过明显，即不论党内地位，也不合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惯例，当时一些外国人就觉得奇怪。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乐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员，因系长期流亡苏联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不久即死于任所）。在大使任内，他同毛泽东既无直接工作关系，也无直接个人联系。与其它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经常积极

通过外交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建议，但很少听到有什么回音。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这又开创了共产党执政国家一个政治局委员当副部长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特例。1956年，时隔十一年（七大党章规定为三年）召开党的八大，张闻天作了充分准备，打算以《论和平共处》为题作个发言。[ccii]按理，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一次言实属正常，但却并未获准，说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有陈毅一篇发言就行了。[cciii]因为在这之前好久就已内定陈毅代周恩来兼外交部长，所以一直不让张闻天在这方面多出头（从1955年起，许多外事活动，如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陪总理出访、接见重要外宾的陪见等，已多由陈毅出面）。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同毛泽东的关系，一般说来也还是正常的。毛泽东绝不会重用张，张自己也明白，并已安心于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做到了尽心尽责，而且建树不少。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议报送毛、周；对外交业务和内部建设更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忧国忧民、一直注视和考虑全局问题，有时也向毛写信报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毛泽东定下的方针路线以及各项政策与作法，他都贯彻执行，照章办事。他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帮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亲笔写，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会上的发言《关于美国经济危机》，在《红旗》创刊号发表时，最后引毛泽东的话作结束，就是陈伯达给加上的。）平时看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由于历史关系，夫人刘英过去同毛较熟，过一段时间总是建议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么忙，又没什么事，打搅人家干什么”为词推托。据我几次目睹，他见到毛除谈正事外（或没正事，如参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刘英在旁可以搭上话。总之，使人感觉到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隔阂。

在毛泽东方面，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他并不以为然。有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而加以采纳，也只是视为“从群众中来”，并不认张的帐，如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张的一些报告，他至多是批给大家看。如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时，对张报上来的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曾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cciv]也就如此而已。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张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

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ccv]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ccvi]转录这么多，不但是为了说明毛喜欢报喜不报忧，也为了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毛的“帝王”气魄，对张闻天这个“臣下”已毫无平等可言，同时还暴露他对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骗（所以康生“值得信赖”）。因为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而且真正脱离群众、“不大懂实际”的也不是张闻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否则中国的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不会遭到那样严重的破怀，不会有三年困难和饿死三四千万人。从发展轨迹看，进城后两人的思想就渐行渐远，距离越来越大，个人关系也日益变得貌合神离。张对毛是敬而远之，毛对张是厌恶、歧视、以至侮辱。特别是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而其结局又说明，延安整风立下的以毛划线已发展成铁的纪律，个人完全凌驾于一切党规国法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再经历二十多年的苦难（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张闻天一直忠于马克思主义。庐山会议后他虽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理论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大量笔记和文稿，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由于当时的处境，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即送请毛泽东审阅指正的文稿，都是较虚的理论问题和反修、颂毛的学习笔记，另外一些确有见解、虽尽量含蓄但仍顾虑有犯忌内容的材料，就没有上报。例如《张闻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庐山会议后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给毛并中央的报告、一篇谈纯理论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外，其余二十八篇都没有报送过毛。其实，就是报送毛的许多读书笔记和报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据说连那篇谈集市贸易的报告都没看，还是从康生咀里听到的。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康生进谗言说，张闻天现在和孙冶方又在搞利别尔曼[ccvii]一套。毛说，好啊，让他们去上街（指闹事）。那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也就成了张闻天的翻案活动和一项新的重大“罪行”。

张闻天虽然对庐山会议以来的批判内心并未服气，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承认的：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使我觉得我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一些观点是没有多大错误的，会上的反右斗争是过火的。[ccviii]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共给毛泽东写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ccix]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送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庐山会议后对他的认罪信，毛有“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ccx]的批示，并曾送给他看过，此

后他再没得到过任何回信。据《张闻天年谱》记载，仅1960到1962年，张给毛就写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和存档。另两封有些内容。一封是参加八届九中全会后致函毛，表示拥护毛的讲话，并恳切申明“里通外国”是“实属莫须有的事情”，但仍决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调研工作，“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尽的责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过批道：“已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态度。”[ccxi]另一封是参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给毛的信，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报告和毛的讲话，并附送《关于苏共危机的感想》一文。毛于2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说，“张闻天同志来信一件，意见一件，请考虑印发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再加陈伯达、康生、定一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ccxii]此信也从侧面说明，毛对“七千人大会”和刘少奇报告不尽如意。1962年后，毛对张的来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对来信中的两封批示传阅存档。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诸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和一些有意为毛泽东开脱的说法（如胡乔木所说，在“文革”中毛对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在什么地方、受什么虐待等情况都不知道[ccxiii]）相反，毛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和游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是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4月12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ccxiv]　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ccxv]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ccxvi]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生前联系也就自然中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毛二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和个人友谊，也没有多少学术交流和学问磋商，连聊天的共同语言都不多，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结合。那么从政治着眼，也就是过去强调的提到路线[ccxvii]的高度看，张毛关系的这三大阶段大概可归纳如下：第一阶段，即长征前，基本上是张闻天错误和毛泽东正确。说基本上，是因为张也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文艺界的关门主义和在苏区同博古的斗争等；毛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肃反中错杀几千干部战士和逼出“富田事变”又错误处理等。这个时期虽然还不能说毛有一条完整的正确路线，但当时是军事第一，而毛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战略战术等根本问题上还是正确的。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这期间，虽然中间夹了个延安整风，双方地位有极大变化，但政治路线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确。第三阶段是建国后的二十多年。在这个长时期里，毛泽东也有一些建树，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线是

错误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张闻天基本上是跟着毛泽东走的，但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历史证明，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因此总的看来，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基本上是错的，张闻天基本上是对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动上还得执行毛泽东的）。这三个阶段，还可用张闻天自己检讨的话说，就是：遵义会议前，“当时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ccxviii]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还有点分庭抗礼的味道”，整风后开始信服，只是对审干有过意见；[ccxix]“对主席过去革命时期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是相信的（革命胜利也已证明），但对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办法，是否行，有怀疑。”[ccxx]

最后就相互态度来说，则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遵义会议前，张对毛是轻视与忽视；毛对张是内心看不起，表面还得应付。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前，张对毛是尊重与崇敬；毛对张是表面尊重，实际上仍看不起。从整风起直到“文革”，张对毛是既有个人崇拜，又有不满和意见，而且天平逐渐后倾；毛对张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压制，人格不尊重，从批评的讽刺挖苦到借口打倒，使张闻天过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张闻天来说，他始终忠于毛泽东，如同在庐山和接着的第三次全国外事会议作检讨时所说，他的动机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尽早认识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绝无意要反对毛主席，更谈不到打倒了。他说，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就是谁想打也打不倒。这确是他至死未变的想法和态度，因而对他后来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确实对毛泽东只有合作、拥戴，而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的地方。

关于张毛关系就写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张毛的关系悠久而曲折，一本书也说不完，所以只能挂一漏万地做点简单回顾；第二，我是有意识地在这些叙述中尽量排除主观的猜测和设想，甚至连我同张闻天十多年的接触与谈话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说主观的估计和判断了。对双方关系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

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差异和比较

谈过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就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差异和比较。但这个题目更大，单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论问题，都是须有专门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无研究，现在又来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个人的了解作点简单叙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正像有的党史专家所说，“把张闻天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要抬谁贬谁”。[ccxxi]在我，只是想从各人思想、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来了解他们关系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这些差异对延安整风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并不同意“因为历史早为他们各自做出最为公正的结论”[ccxxii]之说。实际上，即使比较公正的结论，现在还没有做出，看来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也很难做出。这正是要对他们两人做点比较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比较之所以着重讲差异，并不是由于相同点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为太多太广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础、相当时期的并肩战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有文学天赋（如另走条路，毛可成为多产的大诗人，张可成为著名的作家）等等。这些，人们都较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异的对比，则可以从不同侧面看出各人的素质、特性、优点缺点、发展变化等。只是对此未能找到什么参考材料和立论依据，只好按自己的了解与判断，不分轻重和不讲逻辑地作点举一反三的说明。

（一）领导才能

历史证明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有高超的领导才能。如上所述，张闻天在做总书记时期就已表现出他善于总结经验、坚持集体领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后来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却又失掉机会，无以展才。在工作上，机遇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人数不到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帅。二、四方面军只各出了一个元帅，不能说与此丝毫无关。因为无论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给你机会，不让你“锥处囊中”，再大的本领也是无法和无处现露出来的。而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处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实证明，在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跟上时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问题等方面，张闻天要远胜过毛泽东。这也是建国后两人思想以至关系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但总的说来，论领导能力，毛泽东终究要比他高出许多。当他还埋头于文学和只注重书本的时候，毛泽东就已领导过工农兵学运动，有了广泛的社会经历和深厚的生活基础，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参与了党的缔造，担任过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能够做到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运筹帷幄，干群用命。他还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精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军队、地方、党内外都有广泛影响。张闻天则没有指挥过军队，在干群中影响小得多，更不用说在全国了。就是在做人处事上，毛泽东也早已深沉老练，张闻天却始终带有书生气。例如徐向前说到西路军失败后他回到延安时的情况：“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ccxxiii]这可能写的有些过分，但还是可

以多少说明毛张在待人上的差异。又如刘英说，张闻天任总书记时，一次关向应有事找他。他正在写东西，请关坐下等一会儿。关等了约半小时，看他连头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刘英告诉他后，他抬头一看，关已去远。所以刘英说，他真是个书呆子。此外，张闻天还显得有点只讲原则，不够灵活，批评人不大讲情面，虽然并不整人，但却得罪人不少。党的八大选举，他得的票数竟在刘晓之下，外交部党组会上就曾议论过。最后应说明的是，建国后毛泽东更进一步登上神坛，张闻天则从不断下滑直到长期沦为阶下囚，两人的领导才能已无法可比了。

（二）政策思想

毛泽东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张闻天却没有一套显示于世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体系。在民主革命阶段，张闻天确有不少光辉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的部分贡献，被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何况在1935年以前还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ccxxiv]它的核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想出来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ccxxv]在他提出“上山”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也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例如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在“八七会议”前就已到各地督促执行武装暴动计划，主张上山“当大王”。[ccxxvi]“八七会议”后，各地的起义、暴动更是遍地开花，而大多数根据地也是在瞿秋白领导时期创建的。但是能够坚持实践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还是毛泽东。这也是他成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和一代伟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张闻天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政策上频频失误，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人们说的，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时间很长）错误区别开来。张闻天建国后并无机会提出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泽东却有原则的分歧。这里只举数例以作说明。张闻天主张解放后党的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要搞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并在取得政权后即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张闻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设，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则致力于反帝和搞世界革命，并争着当头。张闻天一贯强调民主，对集体领导身体力行，反对突出个人（自己也不愿意出头露面）和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一贯强调高度集中，实行独断专行，以对自己的态度划线，大搞个人崇拜。张闻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独立思考和兼容并蓄，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围，必须经常敲打，摧残了大批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推行文化专制和“舆论一律”，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张闻天反对经济建设中搞群众运动，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对历次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毛泽东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用斗争和运动推动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和危害，以及其它等等。以上所举只是开个头，有些问题下面还将进一步展开讨论。其中许多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历史做

出结论又是，“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一场阶级斗争”，[ccxxvii]更准确些，应说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至于谁对谁错，大约不会再有什么争论了。

（三）理论与实际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显着特点。一是张闻天始终热衷于钻研理论，“在党内是以理论家闻名的”；[ccxxviii]毛泽东更重视实践，被称为“实干家”，[ccxxix]相对说来对钻研马列兴趣不浓，也没下过功夫。二是两人的发展轨迹有点背道而驰：张闻天从开始的教条主义逐渐变为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较正确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进入建设时期，却变得“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ccxxx]平心而论，单就马列理论的水平而言，张闻天要比毛泽东高得多，读的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据我所知，张闻天就至少精读过四五遍。[ccxxxi]而“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没有下过大功夫”，“喜欢读古书，……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ccxxxii]至于说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张闻天提的不比毛泽东晚。同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的组织工作报告（提纲）中就提到，“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个说来，即使以现在的认识来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并没大错，既非整风中有人说的主观主义的典型，也不是党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纲，所以被讽为“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水平决不在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之下。在任总书记时期，他开拓和执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在解放战争期间做地方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但是历史地看，张闻天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认识的深度确比毛泽东要差些。这是因为照我的理解，所谓“中国实际”，应包括现实中国和传统中国两个方面。这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当然还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毛泽东由于太熟悉传统，因而多少受其束缚，对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和面向现代化就重视不够。这大约是他晚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举个易为人们忽视的例子。号称以农民运动起家和最了解农民的毛泽东，进城后却用斯大林的办法剥夺农民搞工业化，实行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梁漱溟因说“农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ccxxxiii]用户口制妨碍城市化和消灭城乡差别，致使至今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总不能说合乎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要说是理论联系实际，那理论也是斯大林的，并非马克思主义。至于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穷过渡，制造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掀起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没有根据地强调和人为地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都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却能够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当然都与中国的传统有关，即几千年的皇权和专制主义影响，再加上延安整风造成的一套体制、规则和不断加温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也使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毛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学

活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张闻天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张常说主席对中国历史熟，会用权术。1962年9月17日张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被迫检讨交代时就再次承认，“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ccxxxiv]庐山会议曾使许多人感到痛心：中共中央的全会（还有所扩大），聚集了当代中国的伟人和精英，可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坚持实事求是、说句真话！连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等也痛斥自己、拥护《决议》。估计多数人是心口不一，是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领袖威信”而这样做的，但也不能忽略党内长期威慑所起的作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见传统影响之大，还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传统在“实际”中的地位并不限于此。毛泽东思想之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这“实际”中重要一部分就属于传统。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更多的就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主要是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占山为王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经过庐山会议，张闻天也更悟出了学中国历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怀不约而同地读起了《资治通鉴》。总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个一生而言，把张闻天目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实的。把毛泽东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也只适用于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时期，建国后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自己的和照搬苏联的，还有对马列的片面和机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资产阶级法权等），则要比张闻天严重得多。

（四）国际与外交[ccxxxv]

专门提出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这个问题比较重要，过去还没讨论过；由于工作关系[ccxxxvi]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但这方面问题涉及面太广，我还计划写一本有关新中国头十年外交中若干问题的书，所以这里不拟详细讨论，只择以下几点为例做些简单说明。

1，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ccxxxvii] 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ccxxxviii]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ccxxxix] 1955年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

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趋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ccxl]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持（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曾专门写报告建议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商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ccxli]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先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ccxlii]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五十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所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曾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ccxliii]

4，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节俭，并且身体力行。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五一庆典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得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一次在赫刚到北京下榻处，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着泳衣接见。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

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下面特别提出两个党内生活问题讨论，是因为它们比较重要，而两人在这上面的差异也显得突出，表现为各执一端，至死不改。

（五）民主和集中

张闻天强调民主，不但理论上提倡，而且身体力行。这也许与他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文化较多、而中国传统观念较弱有关。毛泽东更强调集中。延安整风为他的集中领导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更逐渐发展到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ccxliv]而且这也是由来者渐，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时，张毛两人在同一会上讲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张先提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后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去掉“民主的”一项，就已显示了原则的区别。从两人对民主的论述中更可看出这种差别。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是手段。[ccxlv]他在谈到民主时，几乎不提选举权和罢免权，多是强调发扬民主以提高下级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总是讲，要让大家说话，领导者要硬着头皮听，顶多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以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著名谈话而言，也是笼统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而没有强调群众当家作主，可以起来罢免和改换政府领导人员。张闻天没见到讲过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话，但从他一再提“为自由民主奋斗”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还是目的。讲到民主时，他从苏区起就一直强调选举权与召回（罢免）权，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时更是付诸实践，有时做得还有些超出党章的规定。如在开辟新区和进行土改时，对发展党一时采取过“自报公议党批准”的作法（因那里没党员，想入党的找不到介绍人，于是就用经群众公议认可后报党组织批准并帮其找介绍人的办法）。对于实行集体领导，张闻天更是终生不渝，稍为重要一点的问题都要在相关的会议上解决，而避免个人拍板。因此他的领导就显得会议特多。他也能做到从谏如流。毛泽东批评他遵义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ccxlvi]他当即接受毛的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但他还是坚持重要问题会议解决，因而还是会多。当总书记，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省委的会多；当大使，馆务会多；主持外交部常务，部领导每天开碰头会；[ccxlvii]直到被打倒后无权再召开任何会议。相反，整风后毛泽东是逐渐取消集体领导，党章有关各种会期的规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随意拖延不按时召开，就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也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时间随便定，出席的人也没定规，致使身为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在七大过了七八年后还有一次问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员？”（因林伯渠给苏联《真理报》写了文章，对方要问身份）。我说，“你们不是常在一起开

会，怎么还不知道？”他说，“政治局不大开会。”既如此，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或驻外大使，他又怎样能发挥政治局委员的作用呢？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延安整风后，特别是建国后，已逐渐演变成大家服从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数从不同意转向跟着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

（六）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

这两者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而且群众运动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运动中还套多少不一的小运动。以前的情况不很清楚，从延安时期起就已经常大搞群众运动。我赶上参加的就有生产运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等等。建国后更是运动不断。张闻天对建国后的群众运动，态度大致分两种。他明确反对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因为他精通经济学，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曾是后来受批判的重点之一。对于政治运动，他未敢明确反对，但多持消极态度。运动来了，他不能不应付，照例作动员和总结报告。但在运动中我看他的重点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为例。他先是在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迟迟不归，直到周恩来一再电催才回来，这时已划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对“积极分子”的热情干劲和对他的压力，但他还是强调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单位提出要划的对象后，他总是说“再研究研究”，甚至找点借口保护著名知识分子。如著名学者老党员陈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过去时，就提个理由说，鉴于陈过去的历史和贡献，就把他看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吧，划成严重右倾也可以了。结果，外交部前后只划了三十多人，不到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一（连驻外使馆约四千人）。而有的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划的却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后处理，他也尽量设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调去研究所或搞翻译，而不是送往边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外事会议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护右派。毛泽东则完全相反。他几乎可称为制造群众运动的专家，延安整风后就更加热衷于群众运动了。其实过去的许多群众运动并非群众自愿或自发地起来参加，而是运动群众，如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这方面情况人们尽知，无须多谈。

再看被列为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之一的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毛泽东的创造，表面上看，张毛两人的说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细考究起来，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根源就在对民主的理解上。张闻天做辽东省委书记时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干部大会上作群众路线的报告，要我记录整理以便发表。[ccxlviii] 他的观点主要为：“人民群众是主人”。他说，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选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服务不好，可以随时撤换。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做到，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领导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一方面群众也把党政领导当成官老爷，顺着来，不敢得罪他们。张闻天不仅坚持这种民主思想和作风，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也照此实践，如在东北做地方工作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只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为人民服务和依靠人民，听取群众意见，一再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特别是强调“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实质上，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真的要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为了使领导不要脱离群众。所以在毛泽东的言论和实践中，不但从不强调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也不重视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也是为什么群众路线讲了几十年，中国不但见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来越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许多事情不让群众知道，甚至不准议论。至于“从群众来，到群众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领导（统治者）和被领导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说，连封建专制时代少数开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会一些时期的“采风”制度等。总之，张闻天的群众路线是“由民作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则是“为民做主”，两者有质的区别。

（七）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提倡的三大作风之一。可就在这个问题上，张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极端。如上所述，张闻天对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干部，对小干部和群众则不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批评显得非常严厉，不大讲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刘英近来还多次谈到这点，说他是书呆子，容易得罪人。但他无整人之心，也决不会抓住干部的辫子不放。对自我批评，他也主动做，但不像周恩来那样经常和郑重。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他才是来者不拒，无限上纲，包括不少违心之论。事后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务似的。延安整风时的口头和书面检讨就是这样。庐山会议和“文革”中也是这样。对此下面还要专门讨论，此处不赘。毛泽东则相反，批评往往因人而异和看机行事。对一些人，有意见平时也不说，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不但算总帐，还常有许多偏激过头之处。对另一些人则不时敲打，大小问题（不一定错）概不放过。对有些人又是不批则已，一批就要打倒。对多数人，平时很少批评，更多安抚。而且批评还有远近亲疏之别。被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对江青及“四人帮”的批评就祥和得多，还显得颇为亲昵。如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ccxlix]而且与此同时还着重表扬了江青等人，说他们反对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ccl]对他的许多老战友，如功勋卓著、誓死保卫他的彭德怀和对他“扶上马、送一程”的张闻天，就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讽刺挖苦、无限上纲，更不会有那么多亲昵的“呢”和表扬什么功。至于对自己，正如本人所说，“我是不作自我批评的。”他还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的”，“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ccli]例如在延安整风中，他规定每个人都要写反省笔记，“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cclii]实际情况是，别人必须写，因为这是“铁的纪律”，他却并没写。至于延安整风以后，被官方党史学家和个人崇拜者交口称道和竭力夸张的自我批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发动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后向被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ccliii]一次是在“人祸”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三四千万人和大量群众罹患浮肿之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原话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ccliv]这

哪里像自我批评！对于造成那样严重后果的问题这样轻描淡写，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的一定要列出具体事实和造成的后果，分析错误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们批评有些人的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因为他讲话中间任何帽子（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实事求是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都没有。像这样的自我批评，任何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换成其它被整的人更是无法通过和过不了关的。所以廖盖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cclv]田家英也说，毛“听不得批评”。[cclvi]这都说明，毛不作自我批评又听不得批评的一贯作风和表现是尽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是要求别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与“山大王”

用这两个称号毫无贬义。一则他们都曾自称过。二则一些崇敬他们的人也这样讲。例如冯雪峰1934年在中央苏区说，“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听后不禁开怀大笑。”[cclvii]关于“文化人”，张闻天自己就说，“我同沈泽民书生气、文化人气较浓厚。”[cclviii]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在党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张闻天。后来，毛泽东采用了张闻天的提法。”[cclix] 1940年10月10日张闻天起草下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cclx]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写作自由、帮助和团结他们等。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优良传统，如热爱祖国、忠于信仰、忧国忧民、独立思考、喜欢探索、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以天下为己任、对敌斗争勇敢顽强，等等，张闻天都是当之无愧的。他入党后不久即断然和他极其喜爱并已有相当成就的文艺决裂。茅盾谈到张写长篇小说之早时曾“自叹不如”。还说，“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cclxi]然而张闻天，不论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还是运筹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无怨无悔，总是心怀党国，仍然尽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见，希望采纳。其责任心之强，真是少见。我看他确实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否则也许不会在庐山栽得那么惨，被打倒后还提开放市场等建议。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没有写有关自己的片言只语，而是偷偷写了大量总结国家建设经验的文稿。胡乔木就对刘英说，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张闻天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鲠直和某种清高，见不得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当然，他也因清高而吃亏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别人“顺着”自己的毛泽东。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个字中就有一个“高”字，不变动他的外交工作也说是由于他骄傲。其实，人们看来他并不骄傲，完全是一个见人还略带腼腆的谦谦君子。这是许多熟人在纪念和回忆他的文章中都写到过的。但是，一般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缺点和短处，有些他也并没有克服掉，最明显的是软弱性。这首先表现为在党内斗争中不够坚强，往往会在压力下作无原则和无限上纲的反省和检讨，给自己戴大帽子、作违心之论。当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决不承认“里通外国”和“推翻毛主席”。对别人的揭发交代则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过头检讨，实有难言之隐。他的软弱

性还表现在说话谨小慎微、与人很少来往。他本来不长于交际，再加上过去运动的教训，就尽量减少同人来往，甚至过去的熟人也逐渐变成了“生人”，如党的许多领导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汉等当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后都很少见面，见了也是多听少说。他同一些领导人如聂荣臻、王震等散步或游览，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别人滔滔不绝，他却很少插话。从相互来往看，我一直觉得他同人只有工作关系，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谈。这种除工作外，多闭户读书，少交际聊天，在他可说已习以为常。所以延安整风以后，他不但不大和同级以上干部交往，更怕见毛泽东、刘少奇，也就是他后来检讨说的是由于怕毛主席批评。毛泽东批评他的五个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辫子搞无限上纲的批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对敌斗争和坚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实了。还有一点，就是建国后，他对毛泽东、党中央一些重要方针和许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见，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这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能够察觉得出来的。后来大概是忧国忧民的情操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于是才有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爆发。

毛泽东却大不一样。他虽然也出身知识分子，学问很深，见识极广，但却很少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习气。这除天赋外，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扎根中国社会，种过地，求过学，当过兵，教过书，参加政治活动，领导工农运动。他不像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书生入党，而是入党前就已经历大量社会活动，所以学马列虽少，却善于联系实际。再加上他们家族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从小就尚武好斗，敢于进击冒险。传统哲学对他影响最大的又是“内圣外王”，即梁漱溟说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轻时就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921年1月28日他给彭璜的信中还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傲气”。头一年的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cclxii]上面这些，特别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识，可说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八七会议”后谢绝瞿秋白劝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当“山大王”，即属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不足千人的队伍退到浏阳文家市，进行了一场涉及中国命运的辩论。师长余洒度等仍主张休整后再进攻长沙。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打长沙必败，主张退到山区去。他说，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何况我们当“山大王”已和过去根本不同，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党的政策，将来必会取得胜利。他说服了大家，队伍沿着罗霄山脉南撤。[cclxiii]这一星星之火，象征着毛泽东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的“红色山大王”路线胜利了，而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游击战和同农民相处中也确实养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风。他在革命的武装斗争中，还进一步发扬了尚武好斗、进击冒险的精神，认定目标就坚韧不拔，奋斗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陕北坚持以寡敌众的战争，有不少人劝他离开，他硬是不听，还为此和任弼时大吵了一顿，最后以撤掉任的支队司令了事。至于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冒的风险那就更多了，都证明了他的大无畏精神。再就是决心大，有气魄，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既坚持革命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来潮与退潮，在战争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真不失为大丈夫。很明显，革命如只守条条框框，不讲灵活，毫无权变，那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条主义者失败，毛泽东最后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

有些不大好的东西被继承了下来。如“无法无天”，不受约束。这方面的例证太多，无须列举。这里只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归之为“造反有理”，[cclxiv]实在是过分简单化，在革命期间也许还有一定意义，但在取得政权后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别是在需要法制的情况下，号召“无法无天”，使党章、宪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废纸，只能引起天下大乱，严重损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泽东说的七八年来一次，那中国就可能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强，罔顾他人，事例也是举不胜举。毛总是以个人为中心。对于反对他的人，不是当场发脾气训斥，就是长期记怨，寻机报复。所以领导干部都有点怕他。即以生活习惯而言，他也很少顾及别人，想起什么就叫人干什么。例如他在战争中养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在延安和全国解放后生活已安定，但他并未想改，还是要许多人跟着他转。如作为中央第二把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是跟着他夜间办公，而且有许多次是吃了安眠药后还得随叫随到。为了不至于因吃安眠药容易从床上掉下来，曾长期打地铺睡觉。[cclxv]

（九）性格、爱好和作风

用这么大个标题，其实只拟着重写三个问题。因为有些内容前面已经讲过了，有些也许不值得多写。

1，谈起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差别实在太大。张闻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时外就一直是和书本打交道，养成一种较为典型的书生气，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极为相似。他说话算数，从不否认。对过去的功过一概不提（甚至包括过去运动中的过火批判和过头检讨，他事后既不再多讲，也不乘机翻案），既不吹嘘“出五关”，也不掩饰“走麦城”，更不像一些人为自己历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动都按原则、守规矩，开会、上班从不迟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那样温文尔雅、温良谦恭，看不出有什么威严。我跟他工作十余年，从没见过他和人吵架或发脾气。例如一次使馆翻译记错了南斯拉夫国庆节，害得他跑进人家使馆就赶快回头，一路没说话，只是回到使馆临下车时说了一句“你要很好检讨！”又如一次我帮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话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说了一句“我自己来改”。他从不骂人，从不说一句脏话。作起报告或讲话来，总是文质彬彬，摆事实讲道理，只宜宣传，不善鼓动。有些党史著作上说他在“左”倾时期，对意见不同者如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果说的是写文章有时用语凶狠，倒有其事；如果说进行实际斗争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于说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错杀了多少好同志，更属于张冠李戴。相反，他不仅反对肃反中的极左，还尽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连璋。

毛泽东则有鲜明的个性，嬉笑怒骂，一般不加掩饰。但出于策略考虑，他也可长期埋在心头，时机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邓小平说，毛在建国后就有去掉刘少奇之意，连一“少小离家老大回”[cclxvi]的比喻都不放过，但还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谈话看对象，同有的人可以谈得很雅致，但在气头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说来，他的性格还是比较粗旷豪放的。但对人也用权术，说话不时出尔反尔，经常改变以前说法（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如以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极为恭敬，还去诉苦

告洋状，后来却说成一直同他们进行斗争（党史学和某些人的回忆还添油加醋）。斯大林逝世时，我正随张闻天回国，得知他那几天情绪极为沉痛，长时独自坐在沙发上，见人也不说话。他还亲自写了篇《最伟大的友谊》，感情之深，溢于言表，但他后来竟说此系“违心之作”。说过的，事后加以否认；没说或没做的，事后又说得有鼻子有眼。这类例子在实际中甚多。此外，或许是由于过去的经历和从小养成的性格，他容易发脾气、喜欢讲粗话。对于后者，我就曾在1939年的群众大会上听到过，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看到过。

2，这里谈两人的爱好，主要指读书。因为张闻天几乎没什么嗜好，不吸烟、不喝酒，连戏曲也没多大兴趣，主要的爱好可能就是看书和研究问题。参加革命前喜欢读文学书和研究文艺问题，写作和翻译的东西也真不少。中国的古典小说也看，但主要看外国的和新文学，其次兼及一些社会问题。参加革命后即集中阅读马列理论，并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猎有关人文社会科学以至科学技术等某些专业书籍。例如在驻苏大使任内，就几乎每个礼拜日约我上书店，购买一批有关苏联情况或国际、外交问题的书。他的工资，除一些捐赠外，恐怕有相当部分是用于买书。他买书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看，作笔记，写心得，更有不少批注。但他似乎不大喜欢读中国古籍。我帮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诗词，他必定删掉。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传达毛主席的讲话，里头引用李清照《声声慢》开头一句，他竟说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戚戚，为大家所笑。

和张闻天一样，毛泽东也酷爱读书，只是两人所好不同。毛对中国古籍百读不厌，但对通行于世界的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一类书却读的不多，对外国文学更没多大兴趣，很少读什么世界名著，据说只读了《毁灭》、《简·爱》两本外国小说，《红与黑》还是只看电影没看原著。但他对中国古籍读得多，记忆力又好，许多古文、诗词，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cclxvii]他在讲话中经常以古喻今，可以长篇引证原文，顺手拈来，毫不费力，但从未见他引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话。有人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中国古籍比马列（又以斯大林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爱好古籍，还经常挑选一些古文叫印发给中央领导或某个会议参加者看，如《后汉书》的《张鲁传》、枚乘的《七发》等。有时还要考问一些领导人，《资治通鉴》看了几遍？直到临死前还要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贾谊的《鹏鸟赋》，以及岳飞、张元干等人的词。[cclxviii]在读书上的这种“厚古薄今”，恐怕对他有不小的影响，多少会妨碍他在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上的现代观念和世界眼光。建国后丧失一次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导致中国的落后，不能说与此无关。

3，关于生活作风特别是节俭问题。张闻天真可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模范地实践了他在《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对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风严谨、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且主张用法制规范干部待遇，坚决反对特权和特殊化。他非常讨厌那些用公款请客送礼（那时还没听到行贿受贿的事），拍马溜须，巴结领导，拉关系，谋私利的人。他的俭朴、廉洁，在党内历来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惯有的领导干部住阔绰宽大的住宅，更反对一些人保有几处“公馆”。他的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从以下例证中即可见一斑。在使馆，夫妇只占两间房子，还兼办公室用。进北京时有几处院子让他挑，他都嫌大，最后住进了一座临街的小楼，连个放书的房间都没有，他又爱买书，只好在走廊上摆了一排书架，人走过要侧身而行。他回国后看到给他换的新沙发、地毯，也坚决退掉。后来外交部几位副部长提出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驻华使馆大院，正楼让他住，其余的楼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坚决不搬，别人也只好作罢。直到1959年他被罢官，大家才搬了进去。我在别处曾说过，他对三个亲生子女要求之严，在高级干部中可能属于空前绝后。大女儿始终是普通农妇。二女儿原在外交部当打字员，他回国不久中央提出精简编制，他就动员女儿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后当了工人。他送独生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时也没回到身边。他从不以权谋私，在他那里更无“后门”可走。他生活朴素，吃穿简单，衣服好像总是那几套。生活上以清贫为乐，连发表文章也不要稿费，不是交了党费，就是分给了起草人和抄写者。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将补发的工资悉数交了党费。但现在看来，他的节俭有些地方也显得过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驻外人员工资，致使最近还有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着文不点名地批评他。另外，他对子女亲属要求也太严，使一些晚辈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cclxix]

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号召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能吃苦耐劳，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表现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节，更随着革命取得胜利和个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风也有很大变化。这里只提以下三点作一简单说明。一是造成越来越严格的等级和特权制。这既是继承中国的封建帝王传统，又是从苏联搬来的社会官僚体制。早在延安时期，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和彭真代中组部长后就已逐渐制度化，经过整风大批绝对平均主义就更属合法，建国后已发展到超过了苏联。有时也听到他的口头批评如对警卫制度，但实际并未制止，执行者总是得到好处而不会吃亏。不但等级制森严，他也常自比秦始皇。无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在毛泽东与其它革命前辈的照片前驻足良久，并深有感慨地说，“当年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cclxx]二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头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对此，辩护者总归之为地方上“抬轿子”。但上面为什么不制止？毛还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刘庄和汪庄、上海的西郊、武汉的东湖等。事实证明，“抬轿子”还真有用。而且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cclxxi]三是关于稿费的处理。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规定除工资外，“党的高级干部严禁有包括稿费在内的其它任何收入”。后来虽有改变，但为数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为主要收入。[cclxxii]可是毛泽东建国后头十多年仅稿费收入就已成“百万富翁”、当年中国的首富，并单独立项，只能由他本人决定和批准支出。临终前江青要去三万元还曾使他落泪，这是当时全党传达过的。这里值得考虑的是，第一，毛著有许多系别人起草

和修改，有许多是党的文件，多为集体创作，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数讲话还是胡乔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归他支配似不尽合理。第二，毛著印数多、稿酬高，且多系党组织买来发给大家。例如我们夫妇二人，前后已领到不同版本《毛选》七八套，还不算各种单行本和《语录》。所以毛泽东的稿费实际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泽东费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卫等）已是他工资的万千倍，稿费只是用于买书、生活补贴和资助亲友（如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等，另为修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补偿五万元，实际上用处有限，因而稿费的积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书文）就特别快。像这样的稿费只能完全由个人支配是否合适、算不算按劳分配，确是个问题。[cclxxiii]提出以上三点，并不是要批评毛泽东的生活作风，主要是想说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唱点反调。因为他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的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cclxxiv]另如毛去世后全国普遍放映了一个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卧室、书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显得甚为豪华，从住房到游泳池长长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红地毯。但是很快这部记录片不放映了。等故居开放让大家参观时，已作了全面的重新布置，一切都显得非常朴素，红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挂了件带补丁的睡衣，书案上放了本不像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影片两相对照，弄虚作假的现象甚为突出。质言之，毛泽东进城后就逐渐违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关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替他作了结论。至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上面提到的几点，也许可以作为讨论的参考。但应该说，这两个“务必”张闻天是完全做到了。

（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特别是国外、港台和当年的国统区，老早就已展开。这里不拟多谈，只是想在同张闻天比较中简单归纳一下毛泽东成为党国领袖的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他的道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离开农民就寸步难行。中国党先期的精英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一开始都对此认识不足或不深。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时也没有准备扎根农村，倒是后来才由朱德、陈毅率领部分起义部队去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只有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并始终坚持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毛泽东也具备了当领袖的主观条件。由于他有马列一些基本原则的指导，就使他的领导同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领袖和当代的草莽英雄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他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超过同时代党内其它领导人。他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中国基本国情，在长期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熟读中国历史，博古通今，从中汲取了大量有关领导的方法和技

术，包括张闻天说的某些“权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成了使中国走上统一强盛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也从未离开过军队和根据地。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cclxxv]，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广泛的干部和群众基础。例如安排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来自原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干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泽东的影响。相形之下，张闻天几乎是光杆司令。

第四，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的领袖主要不取决于中共本身，而是取决于国际。所以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cclxxvi]这里所说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谈话。共产国际作此决定，不只是因为事实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还因为他的影响大，掌握了党和军队的实力。正是由于毛是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所以国际过去虽然对他的政策和作风有所不满，但还是设法保护他，而且在中共领导人中对他的宣传也最多，1938年干脆指定以他“为首”。

第五，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和苏联模式的结合，对中国党的建设和领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主要指个人崇拜和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对领袖呼万岁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体系，起始于延安整风，大概只是中国的特色，在外国是没有的。完全以对领袖的态度划线和根本不按党章办事（如定期的会议制度），也是延安整风立下的先例，并产生了长期影响。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这样做还因为毛泽东代表了正确路线，那么建国后全党跟着毛泽东的错误跑，就只能用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来解释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终身领袖的地位。

张闻天应属个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泽东成为领袖的过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风期间还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工作。这从他参加和修改《历史决议》，特别是从他的《反省笔记》和各次检讨发言中，就可明显地看出来。

第四篇 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

一，整风开始，张闻天首当其冲

毛泽东常说“不破不立”。那么延安整风要立的和要破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这个“道”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整风也就是为了立毛泽东及其政策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为此就得破对他有妨碍的人和事，主要是苏维埃后期的“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由于这条路线被后来党史上定名为“王明路线”，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人们自然会认为批判的第一个目标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整风的酝酿和开始阶段，首当其冲的却是张闻天。[2]这是当时延安人大都心里明白，并在下面有所议论的。

毛泽东的几篇整风报告，声讨教条主义、挖苦“理论家”，人们一看，就知道主要矛头是对着张闻天。特别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更是明显地指张闻天而言。因为张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提纲），[3]就前后引用了四种符号分段，大家议论中一对比，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这篇。（其实，1939年6月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4]所用数字符号比张还多，但因当时多数人看不到，即使听到看到也不会联想到，所以没有相关议论。）

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张闻天，这也是张本人完全察觉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和检查。他说，在“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后来）实际上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而正是宣传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有时“还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觉得当时王明活动的方针是：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宗派势力，……另一方面捧毛泽东同志以抬高自己，对我则暗中加以打击。”“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宣教工作的责备与批评很严，对长江局的严重错误则置之不问，这使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毛泽东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它同志的包围，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对我没有偏心，以便团结其它同志。”由于总是受到批评和责备，所以“我的工作情绪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负责任。”“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找陈云、康生谈谈，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看过，而且均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因此事情不好办。”[5]感到有点动辄得咎，很难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张闻天终于按陈云、康生建议，主动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话。这次“他谈的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他约了康生、陈云、弼时同去谈，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阵，说我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说我在会理会议以前政治动摇等等。我听了虽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时，我觉得会议的主要打击方向是我。王明当时兴高采烈，想乘机向我进攻。”[6]

这里引张闻天的话多一些，是为了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证明延安上层

的整风，从酝酿准备起直到1941年九月会议，批评矛头一直是冲着张闻天的。而且不仅是毛泽东带头责备与批评，更如上引胡乔木的话，批张还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7]文章很多。如李维汉1942年3月1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一文，就直接批评“领导干部教育的负责人”，3月24日陈云《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也批评把“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等等。甚至为了批判还可以不顾事实，像胡乔木指出的，“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张闻天领导）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8]李维汉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说，“1939—1940年第一阶段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共4068人。教条主义也影响轻微。”[9]

就是上述毛泽东的批评，不但偏激过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同他历来对张闻天的评价：开明，讲明主，不争权等，就显得自相矛盾；[10]有些更是无中生有，如说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煽动林彪、彭德怀反对他，以及“政治动摇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批评，特别是毛泽东所谈，张闻天听后甚感委屈。但他没有多加辩解，而是从大处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认了错误。因为从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就一直认为他在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犯过严重错误，为此在六中全会上不仅作了检讨，还郑重提出请求处分。所以对毛泽东这类过火批评，除个别事实表示保留外，他并不进行解释和争论，总是“反求诸己而已矣”。但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的态度不仅表明了他个人已完全服输“缴械”，而且也标志着发动主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是很有把握的了。因而在两个月后就召开了政治局的九月会议，发动了清算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斗争，宣告了上层整风的正式开始。而且正是张闻天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和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决心补课。会后不久，他就为了不干扰毛泽东整风方针的贯彻和使自己接触实际，也为了摆脱难以政党工作的困境（用他的话，就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思想了解还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还做不来，做不好”[11]），遂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经中央批准同意，张闻天即于1942年1月率领由原马列学院一批同学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晋西北作调查。从此，他实际上也就永远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

从遵义会议起，张闻天就对毛泽东实行很好的合作。在洛川会议和“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一度处于孤立时，他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而且六中全会前后还一再主动让权。有如以前“扶上马，送一程”。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对他还成见那么深，以至于把他作为中央整风的第一个批判对象呢（而且挖苦讽刺和打击了大半辈子）？分析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由于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

后来被定为“教条宗派”的主要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实际上，不但在九月会议前，看不出毛泽东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就是整个1942年，斗争矛头也不是对着王明。[12]王明自己1944年3月7日给季米特洛夫的密电，也说是“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就是指1943年才对着他。[13]而且当年在延安的感受，也实在没有觉得王明的影响比张闻天大（最近同一些老同志谈起，大家都有同感，认为王明多半是后来炒出名的）。详细情况下节还要谈到。至于博古，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在党内已没有多大威信，这时也未担任什么重要职务，显然不值得对他大动干戈。而

张闻天则不然，遵义会议后当了名副其实的三四年总书记，任期内实现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在党内是有相当影响的。这点连毛泽东本人都极为重视。[14]而且从形式讲，直到这时他的总书记还未被正式和明确免掉，还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当时出席一些会议可作报告时介绍的称呼。又如1939年11月14日山东省委主办的《大众日报》转载张文的编者按说，“中共领袖之一洛甫同志在《新中华报》上论着……”）。连王明这时还要捧毛泽东、攻击他，并且回国后就“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15]说明他的地位并非完全虚设。直到上层整风开始的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李维汉在发言中还“谈了自己对博古、洛甫两人的‘观感’：对博古是‘敬而畏’，对洛甫是‘敬而爱’。这的确说出了张闻天在党内同志心目中的印象。”[16]因此，无论从历史讲还是从现实讲，反对教条主义就只能以他为主要对象了。而且从开始发动整风时毛泽东的权威也还有限。完全支持他的刘少奇1937年都曾说过，“我们还滑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17]就是专门传达共产国际立毛泽东为领袖的王稼祥，在六中全会的闭幕词中也没再提到毛泽东。在第一篇笔记中已经提到，毛泽东来抗大只被介绍为“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邓力群说他在1942年以前从未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而1943年前，领导人写文章也几乎没有人引证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要立毛泽东的权威，就必须进一步破曾是中央第一把手的张闻天的影响。

第二，张闻天主管宣教工作期间没有重视宣传毛泽东

六中全会发动了一个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中央很快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兼任部长，规定每天两小时学习制，自动与强制结合，要求长期坚持下去。各单位也都纷纷制订计划（总政后来就定为半天学习），成立学习组织。中央和宣传、干教两部还不断督促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单1940年，中央下发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就有七件之多。组织理论学习本是张闻天所长，他兴趣大，情绪高，组织领导，认真负责，还带头写文章，上大课（好多机关的干部在一起上课），很快就在延安掀起了一个学习理论的高潮。这时，机灵的王明已经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但张闻天还是提倡学马列，而且真干，单是策划和组织翻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其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就属空前，先后有《马恩丛书》十二种，《列宁选集》二十卷，《斯大林选集》十几卷，[18]及其它一些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书籍。虽然没有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但实际上毛泽东还是从中获益不小。首先是包括他在内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有可能看到比以前多得多的马列著作（当时延安懂外文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普遍很高，读书和讨论之风甚盛（因缺灯油，我们往往是每天晚上讨论）。平时闲聊，内容也多是学习。人们在那两年着实读了些书，以致有些人至今还念念不忘，认为收获不小，为学习理论和建立革命世界观打下了基础。对这场学习运动，头两年毛泽东不仅积极参加（如参加“延安新哲学会”，请何思敬讲黑格尔哲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还一再倡导和赞扬（如1938年12月13日在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在干部教育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6月10日的反投降报告等等）。但到1940年后，他就逐渐感到这种只学马列不读毛著的学习运动不大对劲，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张闻天上面所说的对他不断地责备和批评。到1941年5月19日高干会上的报告，更是一鸣惊人，提出必须对我们的学习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

育，都“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久，马列学院改组，也基本上停止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大概他认为照以前那样学下去，只能继续立“洋教条”（整风中普遍把马恩列斯的言论称为“教条”），被他称为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不但立不起来，而且还会被冲淡甚至贬低。事实上，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重要著作，毛本人都一再提起的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并没有被党的其它领导人看重。连刘少奇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还说，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19]这年5月邓小平在129师一个会上讲文化方针时竟然不提《新民主主义论》，反而大段地引证张闻天。[20]而张闻天同年8月27日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中国革命的理论，赶不上实际的发展。……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21]连王明在1940年已经称毛泽东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是“伟大的理论家”。[22]而主管宣教的张闻天直到1941年还对此认识不足。很明显，这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张闻天本人的思想还是他主管的全党学习运动，都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要进行全党整风，他又怎能不首当其冲呢？这是连张闻天自己后来也觉悟到了的。例如他在整风后期就曾检讨说，“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我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而没有当做同马恩列斯一样的，甚至对党员更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使之成为每一个中共党员必须好好研究的马列主义读物。”“我对于我们党内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当时是了解的很不深刻的。”[23]

第三，是要“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也改变对理论家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整风前，虽然张闻天自己表现谦虚谨慎，从不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但人们的心目中他在这方面的名声却超过毛泽东。这大概是由于他马列读得熟，文章写得快，水平高，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宣教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敬佩。例如仅据《年谱》和《文集》所载，1939年和1940年，他每年发表的署名文章都在十篇以上。即使在毛泽东确立为全党领袖后，人们在谈到理论问题时也还是毛张并提。例如徐特立在马列学院作报告时就说过，“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润之，一个是洛甫。”[24]对于毛泽东和张闻天1940年1月在边区文代会上的报告，何思敬在6月21日新哲学会年会开幕词中也是相提并论，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华民族再生的旗帜”，张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是给予我们的斗争纲领”。[25]茅盾当时读后也将两者并列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6]总之，在人们的心目中，毛张在理论上似乎不分伯仲。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还认为张的理论水平高于毛泽东，称张为“理论家”，称毛为“实干家”。更为严重的是，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伤回来，传共产国际第二把手曼努伊斯基的话，也说张闻天是中国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发火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27]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因为从马恩列斯起，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党的领袖必须是理论家。列宁逝世后，联共党内群雄并起，首先也是争当理论上的权威。斯

大林一篇《论列宁主义基础》即初战告捷，也为他后来扫除一切反对派在理论上打下了基础。虽然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张闻天一定要保个理论家的头衔，更不用说同毛泽东去争了。事实上，人们都承认张闻天是个不争权、不图名、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既然是党的领袖，却不是理论家，只落个实干家之名，这当然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以前在这方面就吃亏不小，由于马列书读得少，受“左”倾中央及其赌注压制，还长期背了“狭隘经验论”的包袱。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曾多次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28]例如，《毛泽东哲学批注集》[29]收集的批注读本共十一种，抗战初期阅读的就占九种。另一方面，为了在理论上有所表现，那几年毛泽东在讲话和发言中也尽量使用一些理论名词或术语。例如1941年10月13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谈到党的二十年历史时说，“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主义运用得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1927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30]在所写文章中评论刘少奇的用语也说他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31]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光靠多读书是不行的，一则时间有限，紧追慢赶也不会比张闻天等人读得多；二则读理论书也并非个人所好，不如读中国古籍那么有兴趣。所以他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32]因为少了，在党内没有地位，被人瞧不起；多了呢，用处不大，反而会坏事（相当于后来说的“书读的愈多愈蠢”），实际上自己也做不到。因此只能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出发来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马列主义的一些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并彻底改变对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传统看法。于是，被看作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的张闻天，自然就首当其冲了。

第四，张闻天是清算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障碍。

本来，遵义会议不但纠正了“左”的军事路线，实际上也从此改变了错误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张闻天主持的瓦窑堡会议已经制定出了一套彻底转变战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至此，路线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了。而且在这期间，包括毛泽东在内，还都没有认识到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错误问题。不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路线“无疑正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为全党领袖的六中全会上，毛本人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还特别强调，“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说，“完全同意政治局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33]但是另一方面，长期受“左”倾路线压制和打击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也在跟着变化，而且对当年受压一直耿耿于怀，有机会就非出那口气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党”、“改造中央”，即确立新的指导思想和改组中央以至各级领导，就必须推倒《遵义会议决议》关于政治路线正确这一横在前面的主要障碍，因而就要清算历史和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而张闻天正是到这时还维护《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人物。有些党史著作把“突出两条路线”说成是“延安整风树立的党内斗争模式”。[34]这当然与实际相去甚远。因为搞路线斗争本来就是从斯大林和联共那里搬来的，是用于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只要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就意味着一批领导人必须下台，特别是一些所谓为首的，因为毛泽东认为，“为首的，改也难”。斯大林

和联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党以至按反革命论处。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线问题而论，无论陈独秀、瞿秋白，还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谈路线“色变”，张闻天等人不愿承认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所以直到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修改。”[35]张闻天却表示，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36]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又有激烈争论，致使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为路线错误”。[37]张闻天并非是不作自我批评，顽固对抗批评的人，这次第一个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也是形势使然。当时情况可能是，王明自认一贯正确，似乎第三次“左”倾与他无关，别人这时也确实没有提到王明；博古自遵义会议下台后虽然也不同意提到路线高度，但他的意见已没多大份量；周恩来当时并不在延安，没参加会，而且历来在这类问题上表态慎重；这样，不承认路线错误的就首推张闻天了。所以直到1941年九月会议前，他都坚持，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尽管犯了许多“左”的错误，给革命带来管理重大损失，但总还是在干革命的，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在大方向上全党也是一致的，并无两条路线之分。鉴于张闻天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他在路线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要发动整风、清算历史、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矛头就不能不首先对着他了。

第五，张闻天又是犯路线错误者中的“薄弱环节”

在上层整风要“打碎”的“两个宗派”中，虽然“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38]但实际上，所谓的经验宗派的力量和影响要比自以为的教条宗派大得多，打碎“教条宗派”也比较容易得多。所以胡乔木在解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提宗派的原因时说，“其实关于教条宗派问题早就讲了，整风一开始毛主席就讲了。政治局检讨历史时，教条宗派的人头脑比较清楚，经验宗派问题，则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当时担负着很重要的工作，说他是经验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说宗派就把问题说死了，……又牵涉到很多的人。”[39]关于整风中整的两个宗派，在本书的一篇笔记中要作专门讨论，说明它们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似乎可有可无，人数也可多可少，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如果一直追查下去，那么除毛泽东、刘少奇几位领袖人物外，多数高级干部就会“不归杨则归墨”，不属这派就属那派了。当时对两个宗派并未全体排队点名，但人们心目中总有点想法。被认为或被疑为经验宗派的不但人数多，而且涉及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又统率着千军万马，如果追下去，势必影响大局。相形之下，教条宗派则显得势孤力单，人数有限，上层“人头比较清楚”的那几个，基本上都是“光杆司令”，且早已争相向毛泽东靠拢，还互相揭发。所以整风批判从教条宗派着手，并非因为它是“头”，而是从党内斗争策略看，这样做既容易开展又见效快。至于他们中间先从谁批起，则除了考虑到上面讲过的地位和影响等因素外，还要估计到他接受的可能和程度。如果头一个就碰了钉子，那就不利于运动的发展。权衡结果，选定了张闻天。这是因为在教条宗派中，毛泽东与之合作的时间最长也最了解的正是张闻天。经验证明，他在强大的压力下首先接受批判和进行检讨的可能性最大，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也较明显，最适宜作为突破口。例

如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他因感到同毛泽东、王稼祥不好处，觉得在中央工作实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讨论派一个负责同志去白区工作的会上曾要求自己去。结果被抓住，说是“政治上的动摇”。“在北盘江一个什么地方同我斗争了一晚。我当时似乎承认了错误，说要求出动是不对的，是政治上的动摇。”[40]其实，除诸如此类的事例外，发动整风前还作了一次侦察和试探，这就是1941年六七月间的那次谈话。无论从事情的前后情况和批判内容看，这都是一次精心的安排，而且完全是突然袭击。因为，如果是领导同志间进行批评和交换意见，那张闻天第一次主动求见和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谈；第二次谈话为什么要约上陈云（时任组织部长）、康生（已完全顺着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曾支持将其从中央苏区排挤到湘鄂西），而且是那样有准备地算总账和无限上纲（后来还一再提起，包括1958年5月8日给张闻天的回信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多次批判），都说明这次谈话的不同寻常，可看作中央整风的一次前哨接触。结果也不出所料，张闻天不但未加抗拒，还当场作了检讨。这就增加了毛泽东很快（一两个月后）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展中央整风的信心和决心（果然会上又是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报告和带头进行上纲上线的检讨）。[41]如果不是张闻天而是换成别人，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例如王明，长期来把他定为教条主义的头子，实际上那却是整风后期的事，开始时没有也不可能从他批判起。如上所述，1943年前一直没有把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矛头指向王明，毛泽东要求王明的，只是检查1938年武汉时期，还说明是不属于路线的一些右倾的原则错误。[42]假定不是这样，而是按党史上后来说的“王明路线”，那么先批评的就应该是王明了。那结果会怎样呢？必定是开局不利，一开始就陷于僵局。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按毛泽东头一阶段说法，苏维埃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其次是罗迈（李维汉），洛甫算犯第二等错误，那就应当以博古为批判的首先要对象了。但第一，也如前面所说，对他已不值得大动干戈；第二，毛泽东知道博古觉悟迟，以他为突破口没有把握。（例如1943年12月28日《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还说，“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43]至于罗迈，一则，论地位和影响他都站不到前边来；二则，教条宗派他沾不上边；三则，当时普遍认为他的态度不好，而且直到晚年也不承认他是王明宗派的人。在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中，王稼祥是毛泽东印象最好的一个（曾多次强调他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功劳，甚至不合事实地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胡乔木谈到整风时也说，“开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让他住到杨家岭。”还说，“开始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按，中央成立学习组，毛泽东为组长，他为副组长），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44]可见，在批“教条宗派”时不会先把王稼祥拿出来。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稼祥也不会作过头的上纲上线的检讨，何况他还“对整风有些看法，曾一度影响工作的积极性”，[45]自然不能成为整风中检查和认罪的榜样，他也始终没有承认是王明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这也是后来七大选举时，张闻天顺利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留在政治局，而王稼祥不但先是落选，后经专门说服动员才当选为候补委员第二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整风中（后来一切政治运动也都学这点），态度的“好坏”，“揭发交代”和“检讨”的是否“深刻”，是受到极大重视的。从事后看，张闻天确实起了表率作用。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先把矛头指

向他，也确实是选准了对象，可谓“知人”。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张闻天没有国际的支持。

整风开始时共产国际尚未解散，所以只能启动于苏德战争之后，说明毛泽东还是很注意国际态度的。因此在选择第一名教条主义批判对象时，不能不考虑其同国际的关系。王明同国际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没摸透。所以在国际解散前，他虽然对五明拒不检讨还进行反扑（批评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还扬言要上国际打官司）极为恼火，但1943年前却并未将整风的矛头指向王明。而张闻天不受国际的重视和支持却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国际从来没有宣传过张闻天，五中全会还不同意他进书记处。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为了保持对中共的领导关系，只能承认会议推选出来代替的总书记是张闻天这一既成事实，以及中共中央报来的常委排名顺序：“洛甫、恩来、博古、泽东”，[46]却没见到对张闻天有什么肯定和赞赏的表示。相反，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还传达要加强集体领导、实际上取消总书记的意见；排名顺序，张闻天也被排到了毛泽东、王明之后。这些，毛泽东当然完全明白，因此上层整风以张闻天开刀，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也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

当然，除以上各点外，在整风中张闻天首当其冲，还由于毛泽东对他一直看不惯、看不起、不满意，两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爱好等都有很大差异。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的。

二、关于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各种整风检讨

在党史学习笔记中，我曾多次提到和引证过张闻天延安整风时期的并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反省笔记》。现在该是轮到对这部《反省笔记》连带其它检讨说些话了。因为应该如何看待这部笔记和整风中的其它检讨，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这又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下面提到的一些看法当然谈不上研究，只是纯属个人的点滴感想。

（一）张闻天《反省笔记》的来龙去脉和写作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在大力进行拨乱反正，党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称得上空前的高潮。在此期间，成立了中共中央党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一批档案和史料，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和争鸣文章。这不仅有助于澄清一些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且还掀起了一阵学习党史的热潮，使人们得以大开眼界。正是在这时，迎来了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为此，就不能不查找遵义会议一个重要人物张闻天的有关言论。出自张闻天手笔的有关遵义会议的言论，大概只有他长征途中的日记、1944年写的“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47]和1943年的《反省笔记》。由于前两种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时已经烧掉，[48]剩下可用的就只有这部《反省笔记》了。这件事也就交由1979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的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我也名列其中）去处理。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如胡乔木、邓力群，曾提议趁此机会将《反省笔记》全文发表。但编辑组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么做，原因是上层整风中的档案和其它领导人的检讨都未公布，单公布张的手稿显然不妥，于是就只摘用了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小部分。这就是后来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中的《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一节。（现在看来，发表这点摘录也是不妥当和不公平的，只是满足《遵义会议文献》编辑的明显倾向，却弄混了一些重要史实。）书中注明，“这是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的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后还指出，“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此后，这份笔记人们在引用时就一律改称《延安整风笔记》，有些人为明确起见还写成《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其实对笔记名称的这种改变，看来不一定合适。因为第一，既然据手稿，就应保持原貌，按理，后人是无权改变的。而且延安整风时期要写的笔记很多，“四三决定”[49]就明确规定对《整风文献》，“各同志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用改后的标题反而容易混淆。第二，写“反省笔记”系毛泽东的统一规定。他原先的提法和中宣部一致，说“学习整风文件一定要写笔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50]而且这种写笔记是铁的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51]但在1943年6月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具体提出，“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52]当然，这也是铁的纪律。可见，张闻天同年12月所写，是执行毛泽东当年的这一规定，已不是头一年要写的学文件的笔记。而且事后不久的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使用其中的材料时也称“反省笔记”，没说是“整风笔记”。[53]因此，这个标题是不可也不应随便改动的。根据这些，我在提

到和引用《反省笔记》时都一律使用原名。这是需要附带说明的。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以及整风中的其它检讨，包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除了总的精神是虚心检查和认真反省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关检讨和无限上纲。二是大力颂扬毛泽东，有些地方已属明显的个人崇拜。但这在当时已并非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现象。因此在讨论张闻天的反省和检讨前，需要首先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的处境。

1941年六七月，张闻天虽然感到委屈但还是接受了毛泽东不够实事求是也不是与人为善的过火批评。同年政治局九月会议上，他又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对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估计和批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承担了主要领导之一的责任，并在实际行动中注意改正，要求和获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对他的表现曾表示满意。[54]从事后情况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感到轻松，以为放下了包袱，或许可算已经过了检讨的关，所以很愉快地率领农村调查团去了晋西北。一开始也确实进展顺利，但很快就出了麻烦，碰了钉子。虽然他并未因此灰心，但这大概会对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以及后来的检讨，包括写《反省笔记》，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值得作一简要介绍。

张闻天去晋西北，受到晋绥区党委代理书记林枫和当地干部的热烈欢迎。他在《反省笔记》中检讨说，这次去既未担负任何责任，也打算调查几个村子就回来。但区党委同志说，“他们也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到下面去调查”，要张“帮助他们指导”，张“不好推却，就答应了”。等“大批材料收集起来后”，他们要张负责总结。张就和大家“座谈了许多次”，并对“土地问题和村政权工作提了些意见”，还在林枫去延安未回来前的“一次区党委召集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当时晋绥地区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对这次调查都很满意，很兴奋”。“但林枫同志一回来，他没有看过我们一个村的材料、同我们谈过一次话，就表示这一套东西完全要不得，说调查也可以是主观主义的。”张闻天发现“事情不妙”，立即准备结束调查。最后他为满足当地参加调查工作的同志们的要求，提议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一次总结，但也被林枫拒绝，“并把这些同志都遣散了”。张闻天一行只好离开晋西北回到陕北的米脂。对这次事件，他说，“我现在反省我在晋西北工作的缺点，是我在帮助总结调查材料时，很老实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我所看到的各种三风不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很严重的），没有很好的估计到区党委及其领导同志的威信。”[55]其实，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主要还是林枫在延安摸清了张闻天是整风重要对象这一气候。所以当时参加调查团的曾彦修等同志最近还说，他们实际上是被当做不受欢迎的人而被赶走的，临走时当地竟无一人送行。人们可以看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林枫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只是以前的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的秘书），到一个地区去作点农村调查，竟遭到如此对待，可见张闻天当时的处境和在一些领导同志心目中的地位。这是他自己开始时没有完全料到的，无疑对他后来的检讨会有一定的作用。

1943年3月，张闻天奉命回到延安。这时延安的气氛已和他离开时有很大不同。整风已不再是和风细雨，而变成暴风骤雨。特别是各机关已经掀起抢救运动，出现了一种极为紧张和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七大代表集中的和作为肃反重点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薄一波说的重灾区。[56]中央机关自不

例外，不但许多干部，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妻子、秘书和医生也被打成“特务”。而且还有一些高级干部遭到“抢救”和怀疑，如柯庆施遭“抢救”，叶剑英等从白区回来的人受到怀疑。[57]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周恩来的处境也一时变得相当困难。张闻天虽然对“抢救”运动有意见，但不能不受到这种紧张、恐怖气氛的影响，连意见都没处提，也不敢在会上提。而且这时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更加紧锣密鼓。毛泽东早就下定最大决心，说：“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还要搞。”[58]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同时在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后延安也取得了比较平静的环境，上层整风的劲头也随之更大了。毛泽东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敌人的危险。[59]8月8日他在党校二部开学典礼大会的讲话中更公开点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条宗派”。[60]政治局整风的九月会议开始后，康生提出王明和四中全会的问题，毛泽东就大讲两个宗派，并号召对王明、博古、洛甫“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对这次讲话，连《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也认为，“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讲话定下了基调，“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它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61]10月4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威胁说，“我们要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62]他还“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光明。”[63]所有这些，就使批判、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以至多数人认为王明、博古等已属党外问题，周恩来等经验宗派的人更危险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批判还是检查，上纲上线就越来越高。而犯错误的人多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

除了这些客观环境的巨大压力外，张闻天的自身处境也很尴尬。在晋西北碰了钉子后，回到延安已无多少事可做。他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但已不作用，实际地位远在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之下，更不用说并非中央委员的彭真、高岗等人了。这时的总学委（九月会议后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乔木）已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政治局（有点类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大家忙于“抢救”时，张闻天还有时间可以搞点工厂调查，从九月起就停止一切实际工作，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和自我检查了。所以他当时给自己提的要求是，“甘于寂寞”（说这是毛泽东给他的指示），不怕“门前冷落车马稀”，“不怕孤立，不怕丢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彻底反省自己、揭发（坦白）自己过去的错误。”[64]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其它检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的，其上纲上线、过头过火、不够实事求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在所难免。这主要表现在：只有大帽子，没有具体内容，或者帽子和叙述的内容相矛盾，还有些明明是正确的东西也当错误来检讨，弄得是非不分，等等。这类过头之处很多，这里只择其要者按个人现在的认识举例作点说明。

（二）《反省笔记》中过头检讨举例

1，关于去苏联留学。

对此恐怕应该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估计。这不只是张闻天和一些被认为是教条主义者的问题，而且涉及更多的人，是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党是在共产国际（实为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并长期接受其领导的。中国党的许多人都去苏联或长或短地留过学，包括除毛泽东外的多数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任弼时等其它留苏同志。回国后也有不少人成了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可是张闻天在检讨却把留学苏联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成了一种罪恶，什么“去莫斯科，从此开始了我的不幸的新的生活”；几年留学，只是“在思想上学得教条主义”，“养成了宗派主义”，“发展了个人主义”，等等。[65]而且不光张个人这样检讨，延安整风时普遍把留苏当作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我那时遇到的一些人，提到留苏就先检讨，好象见不得人的样子。直到1958年错误地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时，此风犹存。其实无论是张的检讨还是当时的普遍看法，都是不合乎历史事实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起码显得过分。因为除了少数叛徒和坏人外，多数留苏同志都在那里学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确立和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用到了中国的革命实际。即以张闻天而论，他回国后不久就能够为我们党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取得胜利奠定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能够提出一套基本上正确的意见，并以此观察和指导革命行动（如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先后提出苏区和解放后东北的经济构成等），[66]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在苏联的学习。至于“在党内以理论家闻名”和“成为我党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7]原因就更不言自明了。

2，关于宗派。

我在另一篇笔记中将详细认证，整风中的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这里先不详说。而张闻天在《反省笔记》及其它整风检讨中，不断地承认和检讨自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王明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但却没有讲出任何事实足以证明它们的存在，也没有讲他是怎样参加和进行宗派活动的，如同1959年他检讨参加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一样。例如“二十八个半”是怎样产生和活动的，都有些什么人，自己是怎样参加的，根本就说不清，完全是一笔糊涂账。[68]他在《反省笔记》中讲的一些情况，还是延安整风中听杨尚昆说的。现在各方面的材料和许多当事人（包括杨尚昆）都已证明，“二十八个半”是一些人一时的讥讽话，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宗派，所以张闻天也就谈不上是它的重要成员了。至于“教条宗派”，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讲的也是自相矛盾。他只管上纲上线，戴大帽子，但内容却是空的。如他说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不接近，还有矛盾。还一再说，进中山大学学习，“党内生活很严肃紧张，没有什么宗派斗争”；他只“埋头于教条的学习”，“并无任何宗派活动”等。至于怎样成为宗派的，他说，由于“拥护米夫的教育方针，……（就）实际上做了米夫、王明宗派中的人物”，“虽则我们（他和沈泽民）还是不自觉的”。[69]至于回国后不存在宗派和宗派活动，下篇笔记将有详细论述，这里只举两个他称进行宗派活动或表现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一是说“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新的文风，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欢迎，……以致造成了马列学院毕业出去的同学，对马列学院都有一种留恋、一种好感、一种怀念。以不正的学风、党风、文风

培养干部、团结干部——在实际上，这应该说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二是说，他在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中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无条件地为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服务”，“还闹点独立性”，“这也是我在宣传教育部门的宗派主义。”[70]可见，张闻天检讨的宗派主义，也从侧面证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教条宗派”。

3，关于学校教育和干部学习。

过去由于战争环境，没有多少时间学习。干部又多是工农出身，缺少文化，而马列主义书籍更是奇缺。不少中下级干部甚至不知马克思为何等样人，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很多人把共产主义看作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同时抗战后参加革命的大批知识青年，多出于抗日热情和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并无多少了解和认识。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一定的基础教育，占时不多，作用很大。延安整风前就曾以此办法先后训练了几万人。主管这一工作的张闻天应该说是立了大功的，所以邓小平说他“成绩卓著”。缺点自然有，但任何工作也都难免。所以毛泽东要根本改造的六中全会后的干部学习和学校教育而言，其实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协助张闻天主管此事的李维汉，经过四五十年的思考后也认为，“1939—1940年第一阶段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4068人，教条主义也影响轻微。”还说，“延安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为抗日、为解放战争，也为后来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71]就是当时的学校教育，如我所在的抗大（后改为军事学院），学期只有几个月至多不到一年，而且大家的主要情绪并不是热衷于在校学习，而是要求“毕业上前线”。留校人员多不安心，致使毛泽东要亲自动员，甚至对留下工作的人员说过，大家要安心工作，“死了埋在清凉山”。但是到整风时，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在职干部学习都被说成是完全错误了，根本要不得，学的都是教条，在实际中不能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法币”（据我所知，延安大概没有这样的“教授”），“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按，列宁是十五岁就读《资本论》等马恩著作的。所以这句话后来在编入《毛选》时删掉了）。[72]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他也一直检讨了四五年，其实大多是无限上纲、不够实事求是的。例如说，“六中全会决定加强全党理论学习，……然而由于我的教条主义根源没有铲除，所以一开始学习就转到教条主义方面去了。”被毛泽东多次表扬的学习运动，竟被他完全否定了！还说，“有时毛泽东同志对于宣传工作的批评还引起我的反感。这种反感，实是假马列对真马列的抵抗！”[73]这种过头检讨，谁也会一眼看出。

4，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这更是一个值得澄清和检讨的大问题。西安事变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党的对外不抵抗（后为消极抗战）和对内的专制统治，纷纷奔赴延安，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学到了一点革命理论，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然后分配去抗日前线或到后方机关工作，再经过实践中继续学习和锻炼后，多成为抗战特别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以整个一代“三八式”著称。但是正是这些人成了整风中的主要锋芒所指，[74]要他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其带上小资产阶级的“原罪感”，成为革命队伍

中的驯服工具。所以普遍整风一开始，就以原马列学院改组的中央研究院为试点单位。而且一下就整出了个王实味和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后来更“清查”出了大批“特务”。张闻天既主管宣传教育工作，又是马列学院的院长，自然在劫难逃了。

其实，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我们党过去长时期里都是存在偏差的，即对知识分子不够重视甚至怀有偏见。十年内战时期不用说，就是到了抗战后，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还是不大信任，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层的骨干作用，上层领导还是用经过长征的工农老干部。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虽然本人也系知识分子出身，但却不大信任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和影响，因而容易动摇，靠不住。而且越往后越不信任。所经胡乔木说，反右派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心理”。[75]其实这种态度和心理在延安整风时就已显露出来，只是那时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像建国后那样去年“小”字归入资产阶级范畴。相形之下，张闻天倒是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的。所以在他总书记和管宣传教育时，例如1938年前后，知识青年真把延安当作理想的圣地，到处欢声笑语、歌声不断，人们享受着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工作、学习、生活在团结紧张和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到1941年后，这一切即逐渐褪色，批判和检讨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很快又开始整风和抢救，知识分子也更倒霉了。所以张闻天就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所称道和眷恋，他自然也成了整风中主要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也检讨说，他的错误在于“过分估计外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了他们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视了他们的阴暗面如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散漫性、无纪律性等”。这些倒还没有什么，可是后面就越提越高了。说“没有估计到他们在国民党十年统治下所受的反动教育与反动训练，而提出彻底改造他们的思想与对他们提高警惕性的必要”。说他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就发展起来了。1938年我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即为这种态度的思想表现”。对这篇文章，康生之流的批评是错误的，他的检讨当然也不妥。[76]至于分析现代知识分子因受国民党十年反动教育，所以不如“五四”时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恐怕也是站不住的。总之，张闻天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本来还是比较正确的，整风时对这个问题的检讨却显然错误了。

5，关于马列学院的方针问题。

1942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作农村调查的张闻天，内称：“关于过去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的问题，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时讨论，我觉不必等你来，即指出是错了，你的意见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来，或者你来一电提出意见。盼复。”毛泽东的否定意思是清楚的。张即于5月20日复电：“泽东同志：（一）来电悉。关于马列学院过去方针请中央根据实际材料作出结论，不必等我回来。（二）根据我最近一个时期的考虑，我认为应该公开说，他是错误的，其错误即在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即你所说的矢与的的脱离。这种脱离在马列学院中即表现为教条主义”。[77]后来，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还作了长篇大论的检讨，例如说，“我在马列学院内，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想的干部，而结果却是放松了对各种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

风开始后得以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比较长期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大多数均为教条主义者，而不是理论人才。”[78]历史证明，同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说法相反，马列学院在三年的短时间内，招生五期，培养了八九百人，“在后来的各条战线上都起了应有的骨干作用”。1988年5月，马列学院许多学生如李先念、宋平、邓力群、马洪、刘晓、段苏权等几十人写了大量纪念和回忆文章，都用历史事实否定了毛泽东的估计和张闻天的检讨。例如李先念说，它（指马列学院）“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了很大贡献；它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宋平说，“马列学院的教育方针，就是注重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训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能说青年学生学习理论就一定是教条主义”。邓力群说，“院长张闻天对毛泽东著作很重视”，“每有报告都派人去听，每篇文章都组织认真学习”，“学校的政治方向同毛泽东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对立和抵抗”。段苏权说，“我一生当中，真正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楚理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其它文章写得更生动具体，是真正的有口皆碑。[79]这些由亲身经历和通过四五十年实践得出的感想和结论，不是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和张闻天的检讨都是错误的吗？

（三）关于张闻天的七大发言和参与制造个人崇拜问题

1，七大发言的过头检讨

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通篇是对自己的责备和对领袖的颂扬，过头之处甚多，整个精神状态很不健康，现在读起来都因其不真实而使人感到有点压抑。例如他说，“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么‘残酷性、复杂性与长期性’。”这当然是对自己缺点的过分夸张。人们知道，还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张闻天就已站在正确的方面，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进入苏区后写的一些文章中，还一再强调“长期战争的持久性”，如说“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80]“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战争”，“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81]等等。至于张闻天较早论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说一个在白区出生入死、到苏区艰苦奋斗、又参加过长征的人，竟没想到中国革命的“残酷性”，恐怕在平时也是没人肯信的。发言中谈到“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同志发生宗派的结合”，我在另篇笔记中将论证这是无中生有，张闻天本人也说不清楚，只不过是乱戴帽子而已。

张闻天延安整风中的《反省笔记》和其它检讨，无限上纲和不实之处实在太多，无法一一提出分辨。而且这也是各次运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人们尽知，没什么奇怪。如果说奇怪的话，就是有些人却将其中显然不真实的叙述当史实加以引证。张闻天的《反省笔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篇不提自己对革命作过什么贡献，似乎参加革命后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甚至有些标题都是《我在这个时期所做的罪恶》，还把有些党内问题写成党外问题等。所有这些，难道可能是真实的吗？

2，参与制造个人崇拜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不仅个人反省不够实事求是，而且对毛泽东（个

别地方还有刘少奇）的颂扬也有不少太过头之处，实际上参与了个人崇拜的制造。例如在被以《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为题公布的几段《反省笔记》中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82]关于遵义会议上为什么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我们上面已有专门笔记论证，而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也多处提及。一言以蔽之，就是连毛泽东在内当时都没有认识到。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还特意强调，“要指出：当时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83]如果早已认识到了，这时是完全可以不“指出”的。既然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张闻天根据什么这样称颂毛泽东呢？什么“原则上的让步”，什么“党内斗争一个示范”！这当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按照毛泽东一个月前才定下的基调，即：“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84]毛的这一说法，连胡乔木也是不信的，只是他提出不要深究就是了。张闻天是否真的相信，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接受过去经验教训，“顺着来”而已。又如他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85]但却没有列举毛成为领导的事实，也没有叙述到“建立”的过程。其实这正是党史上一桩最大的疑案，是经不起辩论的。我写的党史笔记第一篇，就是论证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86]他明知遵义会议只决定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而接替博古总书记职务的是他自己，也是“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87]但是他在整风运动拥护毛泽东的热潮中还是那样说了。本来他就有一个终其一生的特点，即从来不谈个人过去的功绩、贡献、以至担任过的职务，何况这是在整风运动中。因此把功劳让给毛泽东，自己承担各种过错，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但他在讲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问题时终究还是设了几个限词，如“实际上”、“开始了……建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等。如果按两个《历史决议》的写法和一些党史教科书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实际上”、“开始了……建立”，甚至提以毛为“领导中心的中央”都显得多余。例如六届七中全会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提到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肯定就不能再用这些限制词了。这也说明，对这个问题以前的有关论断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以外，张闻天的各种检讨中对毛泽东的恭维奉承之词也实在不少，为节省篇幅，只简单举几个例子。如说毛主席和刘少奇是服从组织纪律的最好模范。其实，整风期间，违背集体领导、违反党章党规，特别是在“尽早召开七大”的问题上不执行中央自己的十多次决定（包括六中全会）和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其它管理机构事件就特别多。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党内二把手的刘少奇提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就是直接违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而一贯坚持集体领导和强调发扬民主的张闻天，已深受这种不按党章党规办事之累，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呢？又如在七大发言中说，毛泽东是谦虚和戒骄的模范，所以“无愧为人民的领袖。领袖而骄傲就不成其为领袖了。在共产党内一切因一时成功而骄傲的‘领袖’，是已经都被历史淘汰了的。”[88]这恐怕也不是真心话了。因为张闻天从长征以来受毛泽东骄横作风之气不知有多少，

以至于想离开中央去外面工作。而且连毛泽东自己年青时就承认“略有傲气”，后来又很少作自我批评，怎么称得上谦虚的模范？如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那也是事与愿违，事实是全国胜利后毛泽东更骄傲了，也更“成其为领袖”。

张闻天还讲过不少太过分的奉承话，如谈到“群众观点”和“群众关系”时说，“这方面的模范，也是毛泽东同志。……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89]张闻天讲的奉承话中有些是直到七届二中全会时连毛还不好意思赞成，如把马恩列斯毛并列。[90]而在这之前，就已由于以他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水平，特别是对“左”倾错误检讨特别深刻，对毛泽东一再进行全面赞扬和高度推崇，所以被指定参加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想”，他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有份量的话”和“一段重要的结语”。毛泽东的七次修改就是在“张稿”的基础上进行的。[91]而胡乔木事后却批评说，这个《决议》的第一个“缺陷”就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92]一生都反对突出个人的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却参加了“过分突出”毛泽东也就是制造个人崇拜的活动，这是什么原因？

3，张闻天作过头检讨和参与个人崇拜的原因

张闻天在整风中作上纲上线的过头检讨和对毛泽东作不够实事求是的歌颂，看来是出于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思想认识问题。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确实由于认识到毛泽东在总的路线上正确，因而从内心表示崇敬。所以他的检讨和歌颂在相当程度上是真诚的，而不是春意搞两面派。因为从1938年六中全会后，他就真心新尊毛为领袖，常有自发的流露。1941年初写的《自传》时即已承认遵义会议后就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工作。1942年在农村调查组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他“那天晚上讲话的全部内容是歌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他的讲话“完全出自心声”。[93]人们知道，中央领导层群起歌颂毛泽东是1943年“七一”前后，而张闻天早一年就自觉地发自内心地歌颂了。因为正像他后来说的，他对毛泽东整风后已开始信服。[94]另一方面，思想认识上可能是由于受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影响（《联共党史》就是标本），认为维护领袖的威信和党的团结（每次重大的党内斗争，毛泽东都以有分裂危险相警告），给自己的检讨上纲上线，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是“顾全大局”。如同许多人1959年承认“右倾机会主义”，“文革”中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甚至“黑帮”、“三反分子”等，就都有这一因素，而不完全是软弱的表现。其中不少是久经沙场、视死如归的人物。张闻天也应算其中的一个。

第二，是强大的压力。这点，前面已讲过了。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情况，上层是紧张的清算路线和历史，以至有些领导同志很快就变得消瘦憔悴（张闻天、刘英就多次谈到，杨尚昆眼看着几个月就变了个样）；中下层普遍进行肃反和抢救，许多知识分子被抢救成“特务”。这样上下交相影响，就使延安出现一种肃杀和恐怖气氛。试想，人们连一时强加的“特务”都可以承认，还在乎戴其它帽子？因为他们大多相信党最终总是会把问题弄清的。同

时也有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所说，“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95]也许只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当时那种强大压力感觉不到或感受不深。

第三，大概就是个人考虑了，上纲上线是为了过关。每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都有个过关问题，往往是因为所谓检讨不深刻和揭发交代不彻底而过不了关，很少听说有因检查交代过头而受批挨整的。所以为了过关，不使矛盾转化，能保住党籍，不如自己主动上纲上线，还可能落一个好印象。这里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但不管怎么说，张闻天在整风中这样做的结果是，“高级干部对于他的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整风以来对过去的历史错误认识深刻”。[96]后来在七大选举中他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还被留在政治局内。一切正式文件提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教条宗派”时只剩下王明、博古，而没了他的名字。这当然与他的错误较轻有关。但也可以设想，如果他坚持实事求是，不承认有个“教条宗派”，不承认四中全会是“篡党夺权”，不承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反而谈起自己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瓦窑堡会议等“过关斩将”中的作用，甚至再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提点批语意见（如在江西无中生有地打“AB团”、西安事变后通电提出审蒋以及在党内使用权术等），那结果可就会根本不同了。

（四）如何看待过头检讨

过头检讨不能当作真实史料。

照此看来，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及整风中的其它检讨有些乱戴帽子和不够实事求是，应该说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张闻天自己还是上层领导，都认为他的检讨是真诚的和实事求是的。而且不仅是他，当时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应当说是普遍现象。因此，张闻天的《反省笔记》除了一些空帽子和夹叙夹议中的过分自责等以外，对个人履历和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基本真实的。正如胡乔木所说，“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97]虽然他指的不是《反省笔记》，但《反省笔记》同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看出张闻天人惊人的记忆力，连十几年来有关的中外人名都如数家珍，更不用说重大事件了。所以在运动高潮期间，参加高层整风的多数人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不合法，这时张闻天写出了他的《反省笔记》，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毛泽东也据此作出了最后结论，[98]成了六届七中全会的一项正式决定，使党史上这个重大问题得到澄清。[99]

但是，检讨、反省终究是检讨、反省，在延安整风以来的一切政治运动中，任何人能获得通过的检讨，起码也只能讲缺点和错误，而不谈功绩与贡献，所以对一个人来说仍然不够全面。对于被当作批判或斗争重点的人就更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检讨、反省不加分析地用作重要史料和立论根据，那只能使历史面目全非。例如用张闻天、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及其后的检讨来为那段历史定性，那就只能是制造冤假错案。延安整风当然不可同庐山会议相提并论，但用当时的批判重点如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检讨来为党史立论，为某些事件定性和判明是非，这样的历史也一定不会真实。因为每次

政治运动的规律和规矩，就是先对某个问题定个基调，然后被批判者就按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庐山会议出现了一个“向党猖狂进攻”的“军事俱乐部”，于是“文化人”张闻天就检讨他是怎样“陷入军事俱乐部”的，黄克诚也检讨他是怎样成为周小舟、李锐参加“军事俱乐部”的“桥梁”。延安整风时定的基调是有个“篡党夺权”的“教条宗派”（是为“头”）和“经验宗派”（是为“脚”），1938年这个合二而一的宗派又在武汉进行活动，于是周恩来等就依此基调检讨。不同的是，“军事俱乐部”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被彻底否定了，而“教条宗派”则依旧保留在党史中，只是“经验宗派”因涉及面广，特别是牵连到周恩来等一批重要领导人，因而被含糊了起来（党史界无人敢说无，也没人敢说指哪些人）。由于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不断地上纲上线，于是就制造了一堆“史从论出”。前几篇党史笔记中所谈到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遵义会议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是毛泽东的党内斗争策略、《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会上发言起草的、毛泽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是从内战到抗日战略转变的标志、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等等，就是这样在延安整风期间一下从“论”中“出”来的。在这之前，上述这些在一切党史档案以至个人论述（包括回忆录）中，似乎还都滑提到过。由于中共党史学是在延安整风中创建的，此后又一直只准有一个官方学派，这些从“论”中出的“史”也就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真实和如山的铁案，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了。而张闻天的一些乱戴帽子、过头检讨和过分颂扬也就被派上了用场。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冤假错案。

总之，张闻天的《反省笔记》，既有珍贵史料，又受当年历史所定基调的支配，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提法显然有误，因此必须仔细分析。不是用他的这些去印证史实，而是从分析史实印证论断的准确性，起码是互相印证。在不公布重要档案或只公布有利于原定基调的档案的情况下，这点尤其重要。扩大一点讲，一般是不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的人所写的检讨和交代材料定为可靠史料和文献的。正因为如此，胡耀邦曾作出过两项深得人心的有关措施。一是在以前提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之外，再加一条“不装袋子”（不把一些黑材料、假材料，包括本人被迫所作违心的交代和检讨，装进干部的档案袋。因为过去有些干部就常因档案中有这类材料，如把延安抢救运动中定性错误、以至别人乱咬和自己被迫交代的假材料装进档案袋，于是每逢政治运动就被揪出来折腾一番，所以从前干部对自己的档案袋很重视）。二是“文革”中有关干部的揭发和交代的各种材料一律销毁（特殊的例外）。

（五）附带谈一个如何看待《回忆录》的问题

不但是运动中批判或斗争对象所写材料，而且许多人的回忆录也都只可作为研究党史的参考资料，而不能看作正式历史文献。（现在许多党史著作都是把这些当作权威史料引来引去。）因为正如董必武老人所说，“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何况还有“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100]列宁也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事实上，延安整风以后所写的各种回忆录（尤以“文革”后为盛），就都是按延安整风时所定基调写的，再后来就

是一定要和两个《历史决议》完全保持一致。于是有些回忆录所写就远离当时的真实情况，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是《遵义会议文献》选用一篇回忆录，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在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要毛泽东出来领导军队的问题上作者本人起了重要作用，整个会议期间却根本不见作“反报告”、受委托起草决议和被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而是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当时尚无此名称的所谓“王明路线”。这种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回忆”，能作为研究和佐证遵义会议的“文献”吗？

另一个例子是最近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因系后人编辑整理，有些地方就与杨本人生前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们只以《遵义会议回顾》这一节作一前后比较，就可看出差别之大。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在和刘英的谈话（在场的有程中原和张培森）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这篇谈话由程中原整理，送请杨尚昆本人审阅修改后，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在1998年《百年潮》杂志第6期上。但在杨1998年9月逝世后整三年的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却编写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引者按，至今尚未见到这样的“决议”，后面带引号的话只是陈云凭记忆写的可能是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原件标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被改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01]）‘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102]前后两段，哪个为杨尚昆本人所谈，不是很清楚的吗？再加上书中所说，“它（指遵义会议）的最大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书生，……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103]而在杨生前自己写的文章中却说过，“自从他（指张闻天）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104]“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105]据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以杨尚昆之名在他死后三年整理出的“回忆录”，就是要使杨的意见同党史学的正统说法保持一致，否则不会有这样大的差异：生前的说法是，“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后来的说法却是，“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以及“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等等。杨尚昆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组长，对党史界的情况可说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在同刘英的那次谈话中曾感慨地说，“现在还没有一本好的党史。不少历史上的问题没有讲清楚。”对于曲解、轻视和因“受过去宣传的影响”而不了解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起作用的现象，他提出，“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106]不料他辞世后刚过三年，由权威机关编写的他的回忆录，也需要“拨乱反正”了。

注释

[1]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还可参阅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123-124页。
[3]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
[4]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
[5]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6]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页。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1986年版，第439-440页。
[10]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539页。
[11]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2]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137页。
[13]《〈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叙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83页。
[14]《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16]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543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817页。
[18]宋金寿：《纠正反教条主义中不译不读马列的倾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此信原登在1942年华中局一个内部刊物《真理》第2期上，六十年代初刘修改此文时删去了这句话。
[2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4页。
[21]《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57页。
[22]王明：《学习毛泽东》，1940年5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
[23]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24]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1991年版，第103页。
[25]《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34页。
[26]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转引自《张闻天传》，第527页。
[27]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8]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2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32页。
[3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4页。
[32]转引自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页。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4，746页。
[34]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42页。
[3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35页。
[36]高新民张树军着《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3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1页。
[38]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6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5页。
[40]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41]以上均可参阅《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58页；下卷，第1090页等。
[4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2页。
[4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143页。
[4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5，203页。
[45]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66页。
[46]《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2-333页。
[47]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48]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这两件珍贵史料是否真的烧掉值得怀疑。我曾听说过此事的前后情况。在跟张闻天工作的十多年中，以及张闻天逝世后和刘英的二十多年接触中，都多次谈到这批材料。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和刘英是搭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延安的，因此不能带什么

行李。他们就将生平保存下来的照片、多本日记和其它各种珍贵资料，也包括那本《中国革命纪事》，装在一个小箱里，交中央档案室代为保存。他们走后两三年延安才失守，但这个小箱并未经机要交通送给他们。延安撤退前，几乎所有档案，包括一般干部档案（其中还有整风抢救时的假材料，我的档案袋中就有）都已转移，保存了下来。但张闻天的小资料箱却不知去向。解放后，张闻天也曾一再查问。当时被告知，撤退时因携带不便，就将这个小箱以及别的东西分散掩埋，资金积累回来后掘出。但后来忘记具体掩埋地点，一时找不到，还在继续寻找中。“文革”后，刘英本人和我们“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又多次追查这箱资料，主管人员断然告知“已经烧掉”。这就再无寻找之余地了。同样令我感到遗憾和奇怪的，就是遵义会议的档案也丢失得一干二净。

[49]《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整风文献》第一篇。

[50]毛泽东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见《延安整风五十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51]《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16页。

[5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8页。

[53]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2页。

[54]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页。

[55]引语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关于晋西北调查不受欢迎的情况，还可参阅《张闻天年谱》，第687-690大米；《张闻天传》，第549-550页。另听到当年参加调查的曾彦修（也是《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等几位同志的多次谈话。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4页。

[57]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8页。

[58]《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16页。

[5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

[60]《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2页。

[6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288页。

[62]《延安整风五十年》，第271页。管好，毛在每次反对重要的党内对手的斗争中，往往会提出党可能分裂、甚至上山打游击的话，如反对高饶、庐山会议、“文革”中反对刘邓和后来批林彪等。

[63]毛泽东1943年10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5页。

[64]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参阅《张闻天年谱》下卷，第696-704页。

[65]见张闻天的1943年《反省笔记》。

[66]见前面几篇《党史笔记》叙述的事实和引证。

[67]见上引杨尚昆语和邓小平1979年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

[68]见《张闻天与所谓“教条宗派”》。

[69]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0]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449页。

[7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51-52页。《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参阅《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3]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4]参阅《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1页。

[76]参阅《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第384页。

[77]《张闻天年谱》下卷，第678页。

[78]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9]李先念等人的引语，均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80]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张闻天文集》（一），第522页。

[81]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文集》（一），第533，534页。

[82]《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8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4页。

[84]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风会上的发言，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85]《遵义会议文献》，第79-80页。
[86]见本书第一篇。
[87]杨尚昆：《回忆与怀念》，载《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按这是杨尚昆亲笔所写。
[88]《张闻天文集》（三），第254页。
[89]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见《张闻天文集》（三），第259页。
[90]《张闻天文集》（三），第262页。
[91]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312页；《张闻天传》（修订本），第565-568页。
[9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93]马洪等《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
[94]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95]《张闻天文集》（四），第337页。
[9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页。
[97]《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第385页。
[98] 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2页。
[99]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2页。
[100]转引自《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101]《遵义会议文献》收录此件时未作说明。
[102]见该书，第120页。
[103]见该书，第121页。
[104]《纪念张闻天同志》（1990年8月29日），原载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105]杨尚昆为刘英回忆录所写的《序》，见刘英：《我和张闻天同志命运开展工作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06]《百年潮》1998年第6期。

第五篇 张闻天与所谓教条宗派

一、如何理解反党宗派

（一）从张闻天被批判三次参加反党宗派说起

在纪念张闻天百年诞辰的时候，一些同志曾经谈起，过去人们对张闻天的印象似乎只是一个老犯错误的人。这大概是因为，在党史上他曾受批判被定性为参加了三次反党宗派集团，而且被串连在一起，几乎贯穿了他入党五十余年的整个革命历程。一是延安整风时定性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说成“军事俱乐部”的副帅或“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三是庐山会议上追加的“高饶阴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和“漏网残余”。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把三者连在了一起，说他“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是由于“老而又老的疟疾病原虫（指教条宗派）远未去掉”又“旧病复发”；[1]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又“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2]对于这些定性和指责，张闻天本人每次受批判时都是承认了的，并按当时定的调子和要求作了交代和检查。长期以来，舆论一律，就是严格按照这些批判内容和定性结论进行宣传教育的。在张闻天平反以后，有关的拨乱反正又做得不够，不少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所以一些人还残存有他老犯错误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1981年中央关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3]这就意味着一下子给张闻天减去了两次反党宗派活动。一是说明所谓“军事俱乐部”纯属杜撰，实际上并不存在。无论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还是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以及同志之间会下的接触与交谈，都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宗派活动，更不是反党。而且在那场斗争中，错误的反倒是毛泽东和通过决议的中央全会，并不是彭德怀和张闻天“旧病复发”。二是既然那个决议“是完全错误的”，那它所提“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也自然站不住了，无论彭德怀还是张闻天，都不是“高饶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和“漏网残余”，更没有“在党内组织派别”。[4]不管怎样解释，强加给他们的这两顶帽子总算是摘掉了。

但是对张闻天来说，却还留有一顶“教条宗派”的帽子（至于彭德怀是否还有“经验主义”的帽子，在此不论）。而这又是延安整风时定的性，被看成“板上钉钉子”，有些党史著作特别是一些所谓“民间研究成果”，至今还在不断进行炒作、宣染、夸张以至编造，继续着造神和造假运动（单是一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有不少人抄来抄去，“着书立说”。），加深着人们的印象。其实，这一定性和帽子，对张闻天以及其它某些人是否完全准确和合适，现在看来并不确切，还有进一步加以讨论的必要。这不仅关系到对张闻天等人的历史评价，而且有助于弄清党史上不少问题。因为延安整风期间及此后的多次政治运动，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有许多偏激的提法，党史研究又将这些当作第一手资料并据以编写党史。因此，不只张闻天个人，某些时期的党史也还存在着需要拨乱反正和去伪存真的问题。

但要谈张闻天和教条宗派的问题，首先得弄清什么是宗派。对这个概念

的理解完全不同，就无法进行讨论，只能各说各的。所以孔子和荀子都提倡“正名”。

（二）对中共党史中“宗派”概念的理解

关于宗派，看来大约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上所说的宗派，被定义为“学术、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派别”，显然是广义的，可以用得很宽，但却很难套到中共党内斗争中所说的宗派上来。因此对广义的宗派，这里就不多引证和讨论了。只是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在党当权的情况下，党内外也是很难分开的。例如延安整风运动，至今的党史书上还说是全党整风，其实当时根据地的非党干部也都一律参加了。建国后的一些反宗派（集团）斗争，也是大多不分党内外的。

说到反宗派，即使专谈党内斗争，也不能把宗派和宗派主义相混淆。两者固然看似相通，但具体使用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只提宗派主义而有意回避宗派。毛泽东还对不提宗派特别作了说明。[5]可见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的。如对“八七会议”后的盲动主义的提法就是，“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没有说瞿秋白等人组成了什么宗派。后来说到六届三中全会，也说“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错误”，同样没有提到中央有什么宗派，也没提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名字。谈到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对宗派主义的批评更严厉，但却并没有提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只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毛泽东的讲话和许多人的发言或检讨，曾多次提到两大宗派。而且从此这两大宗派就成了历史定论，许多党史著作讲到四中全会后那段历史时都要提到它们。胡乔木直到临终前在关于回忆毛泽东的谈话中还讲“王明小组织”，讲“四中全会是夺权”[6]等。这都说明，《历史决议》有意不提的宗派问题，但却至今竟还一直是定论！

宗派和宗派主义显然是不可完全混同的。根据延安整风中的体会，可以说，宗派主义一般指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和政策，而宗派则着重指组织形态。一个人可以有宗派主义思想和政治倾向，执行宗派主义政策，但却并不一定组织宗派或参加派别活动。宗派不能只是一个人，宗派必须是多数，成为小组织、小团体、集团或联盟。整风初期阶段，对于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政治倾向的宗派主义，曾有过详尽的解释。毛泽东的说法是，“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他举的例子也是个人主义、闹独立性等，较突出的则是山头主义。[7]这样的宗派主义应当说是很普遍的，连同当时批判的主观主义和党八股，一直到建国都是不但存在，而且可说是愈演愈烈，至今不衰。但是谈及党内斗争的宗派，情况就大为不同，对宗派主义的解释已经用不上了，重点不再是思想和政治倾向，而是组织形态和组织活动了。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了解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宗派呢？至今许多党史著作和人物传记上的说法，仍然保持着整风末期提出的解释，就是：“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即反对的关系。”[8]由于思想、纲领，当时不容易判断

谁对谁错，所以有些书稿还改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解释，界定比较宽泛并且灵活，看来主要是为了对批判和追查两大宗派表示拥护并给予“圆说”，也使大家在思想上比较容易接受，还可让受批判和作检讨的同志便于对号入座，既维护了批判宗派的权威，又有助于避开或缓解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矛盾。但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解决问题，当时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后来在党史科研上的照搬就显得论据不足，甚至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一则，这种说法界定含糊，经不起仔细的科学推敲，理论上站不住；二则，它不符合中共党史（以至国际共运）上的实际和正式文献上的说明。例如早已定性的托陈取消派，罗章龙的分裂活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前者“成立了反党小组织”，后者“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以及后来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就都不能说他们没有组织。就是对教条宗派，胡乔木不是至今还叫“王明小组织”吗？周恩来关于六大的报告中谈到各地工资收入者很强的“山头”倾向时，也立即补充一句：“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活动。”[9]这都说明，凡称宗派，必得有组织，有组织活动，否则，谈不上宗派。至于思想和纲领是错误的才能算宗派，就更难把握了。因为在党内斗争的当时甚至事后，各派都会自认为正确，因而无法确定谁搞宗派。即使历史证明错误，也不一定能称为宗派。例如在一些政治运动中错整了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的林默涵、周扬、夏衍一批人是不是一个宗派？建国后公安工作的领导人在潘汉年、胡风两个小集团及其它一些镇反工作中，参与制造过不少冤案又应如何定性？“反冒进”和大跃进中的一批积极分子和急先锋能不能说是反党宗派？历史证明，庐山会议中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么搞反右倾的人们不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宗派了？

而且这种解释和延安整风第二阶段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因为从1943年“九月会议”起，强调和追查的已不再是宗派主义作风和倾向，而是宗派主义的组织形态和派别活动了。毛泽东明确提出，“过去反对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并“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大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还谈到这些宗派“有计划地”进行的派别活动，并指出了一些具体的人。特别强调要“整”教条宗派，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还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它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10]（按：其余三人在当时大概只能是指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了。但刘少奇并不在六大选出的23个中央委员和13个候补委员之内，只是被选为审查委员）。[11]而以王明为首的这个教条宗派，四中全会前，就“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12]四中全会后，“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并且“控制了中央码头”，“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13]这样的“宗派”，哪里像没有组织，只有以思想、纲领为基础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虽然毛泽东也说过，“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引者按，不是无组织），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的纲领。”[14]不过他强调的已经不再是宗派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而是它的组织形态和派别活动了。此后的整风实践，追查、批判以至检查交代，也就更多转向“小组织”、“小集团”、“反党集团”“反党联盟”（如“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的联盟）的组织和活动了。由此可见，上述那种用于整风中

的解释，实际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对于毛泽东反对两个宗派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有个相当包容的评论，说："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它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开展批评。这成了1943年'九月会议'与1941年'九月会议'相比较，不仅在整风内容，而且在整风方式上的又一显着特点。"[15]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不只"当时"，而且此后长期以来直到现在都"不可能表示异议"。第二，犯错误的人并不是"都按照这个思路检讨的"，例如王明就没有；即使"按照这个思路检讨的"，程度上由于"深浅"相差甚远，得到的结果也大不相同。这是后话。

该书还评论会议情况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总结的教训。"[16]可惜的是，这个教训不但一直没有总结和汲取，后来还有了不断的和更大的发展。建国后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不知有多少所谓反党以至反革命集团或联盟，追根溯源，恐怕就与延安整风时对反党宗派和集团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无限上纲和随便套用有关。后来的每个宗派或集团都被说成"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而被批判者也大多作了相应的检查交代，问题也就落实定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这类反党宗派集团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平反，所谓他们有计划、有组织之类的说法也自然被当作不实之词推倒了。过去总把常说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中的派看成宗派，而宗派又被看成阴谋反党集团，结果就使反宗派斗争或者属于无中生有，或者导致严重的扩大化。回想起来，如果延安整风时能把党内斗争中的宗派集团说得清楚点，界定得明确具体些，也许会避免或减少任意划定反党集团和牵连大量无辜。在这个问题上也应接受苏联的教训。他们肃错的也实在不少。直到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还决定对三十年代的四起重大错案平反，即：1932—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认定"四个组织都不存在，对他们的指控毫无根据"。[17]苏联后来的改正和平反也显得比我们要彻底一些。例如我们对事关上千万人的"五一六反革命"案就不了了之，更不用说1930年的"富田事件"和抓"AB团"以及后来的某些至今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了。

其实，党内斗争中的宗派和宗派活动总还是有它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的，不能用"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不负责任的"帽子工厂"。根据习惯用法，派和宗派的性质不尽相同，派一般不含褒贬，而宗派则往往用作贬词。例如毛泽东就多次称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为毛派，对当时的"左"倾中央，则抨击他们搞宗派活动，并一再追查"小组织"及其后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变成了专有名词。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的派，自然会进行宣传自己、批评对方、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只要不违反党章党纪，都应当视为正常，不能算派别活动，更不能算反党。他们的活动也是光明磊落和正派的，不同于那些为谋私利而拉帮结派，搞阴谋诡

计。促成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中央三人团”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都是光明正大，彪炳史册的。因此，必须把持不同意见和宗派活动区别开来。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所谓反党宗派和宗派活动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有某种组织。可以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组织系统，但必须是通过各种形式（无论是公开集会结社还是秘密串连）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

二是党纪不容。宗派组织和宗派活动必定是违反党章党纪的，因而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以至施展权术，搞阴谋诡计。

三是具有反党性质。不管是出于政见不同还是为了谋取私利，宗派活动都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甚至造成党的分裂。

上列三条，或许不完全不准确，而且也不一定三条都要齐备，但起码得有一定的组织形态和违反党规党纪，否则不能算宗派和宗派活动。以前所说的“不谋而合”的联盟或集团，其实是靠不住的。像“文革”初期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相互之间就不大沾得上边，只是欲加之罪而已。邓小平说，过去的“十次路线斗争”“有一大半就算不上”。那么，以前定性的许多反党宗派以及联盟，自然也应根据上述标准重新加以考察。已经平反的当然可以不论，但也还有似乎已经盖棺论定的，如延安整风时批判的教条宗派和经验，恐怕也还值得在新发掘史料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再做探索，把问题弄得更清楚些。否则讲到经验宗派都有谁，也许连教党史的教授都会踌躇一番的。

二，所谓“教条宗派”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谈中共党内的教条宗派问题，绝不可忽视直接有关的共产国际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必须绝对服从。而共产国际又是强调集中，什么都要管的。胡乔木就批评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从这里就可以产生社会帝国主义。”[18]这当然只能是事后总结历史教训的话了，当年是没有人敢说，其实也是并没有认识到的。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把服从国际定为一条铁的纪律。直到六大通过的党章，开宗明义第一条还是“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第二条的“入党资格”也规定，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和党章，……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19]行文上都把国际放在本党的前面，说明国际是中国党的顶头上司，是上下级关系，全党都要首先服从国际。国际也就是它的领导人，不但如胡乔木在上引谈话中所说，要判断“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而且可以对各国党，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具体党员，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有权处分各国党直到将其解散（原波兰和朝鲜两个共产党就被解散，二战后才另组成工人党和劳动党）、撤换党的领导人直到将其开除（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著名共产党员谭平山就是国际代表一句话给开除的。有些党的领导人甚至还被召到苏联加以监禁甚至肉体消灭）。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党员，不但结党中央而且对共产国际都绝不允许闹独立性，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批判宗派主义闹独立性就举例说，“张国焘向中央闹独立性，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李立三也对共产国际闹过独立性，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20]

毛泽东和胡乔木曾多次提到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斗争，[21]其实这都只能是根据事后认识说出来的话，在延安整风和共产国际解散前大概是没有谈到过的。相反，在党内斗争中都还需要表白自己拥护国际路线并引证国际文献。标志着中国党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遵义会议，在决议中就多处引用有利于批判极左军事路线的国际有关文献。后来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也曾一度以张浩的“国际代表”身份把他压了下去。直到延安整风，批判教条宗派时还提出真假国际路线的区别，说王明他们标榜的国际路线其实是假的，遵义会议后中央执行的才是真正的国际路线。[22]即使要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也仍然要利用它的权威。例如第一次在党内正式点名批判王明博古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指示中，用的就是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爱尔科里（即陶里亚蒂）的一些言论，证明王明路线违背国际方针，而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才完全符合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23]到了1944年初，国际已解散，但对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发来的电报，还显得诚惶诚恐，不但一再解释，而且在实际上对有关问题也真的提起注意，作了调整。[24]这些都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是多么地权威，并不像胡乔木后来说的“同共产国际进行了那么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更不是毛泽东多年后直截了当解释的：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25]当年的《整风文献》除中国领导人的文章外，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

材料。而且毛泽东自己就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26]可见，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同事后一些说法是有相当距离甚至完全相反的。

长征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除从莫斯科进行遥控外，还经常派代表来召开会议、发出指示，并且在上海设有常驻机构，保持着直接联系和直接指导。这种领导不仅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策略的变换上，而且也表现在组织路线的执行和重要的人事安排上。即以毛泽东本人而论，他在党内地位多半取决于共产国际而不是中共中央。未参加二大和这时在党中央无任何职务的毛泽东，却能一下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就是由于得到指导召开中共三大的国际代表马林的器重，因而当选为九个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并兼组织部长。后来由于马林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遭到批判，国际代表换成了维经斯基，遂使以前支持马林的毛泽东连党的四大也没参加，在中央的一切职务全被免掉了。再后又由于领导农民运动，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重新受到国际及其代表的信任，才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国际代表直接主持下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成功地建立了红军和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就一直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保护，因而这期间虽有些波折，但他的党内职务却不断上升，六大从中央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三中和四中全会均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国际的干预，“左”倾中央没能达到把他排挤出政治局和派驻苏联学习或“休养”的目的，他反而被推举为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左”倾达到顶点的五中全会上还上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一再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在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下，最后确立了作为党的领袖的地位。[27]

综上所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产生不了党的领袖毛泽东。事实证明，党的事业及其领导人的起伏进退都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

共产国际对中共既是上下级关系，又管得很严格，所以中共路线的正确与否都和国际有直接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际代表马林、罗易和鲍罗廷要比陈独秀右得多，因为陈独秀就认为莫斯科不应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后来在给中央的辞职信（1927年7月15日）中还抱怨国际“不许退出国民党。”但从1927年下半年起，国际路线又开始不断向“左”转，中国党也就陆续犯越来越“左”的错误。所以李维汉认为，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代表。[28]连立三路线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所谓“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1930年6月国际还明确指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近期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许多关键性的省份”。直到立三路线闹得太不像话特别是表现有点不听国际的话，被目为“反国际”了，这才被下令圆心纠正。[29]至于后来的王明，更是毛泽东说的，莫斯科刮东风他是东风派，莫斯科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就连著名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发明权也不属于他，而是季米特洛夫参考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经验通过他向中国党提出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党每次犯错误都和共产国际有关。但国际又往往不承担责任，出了问题只是批评和惩罚中国党的领导人。而且政策有时还变得非常快，使人很难跟上。例如瞿秋白、周恩来完全按照国际指示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

三路线，但会后不久国际的调子就变了，又指责他们为调和主义，致使极有才华和威望的瞿秋白也就从此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最后实际上被抛弃了。由于国际的经常干涉和直接过问，往往弄得一些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只有紧跟，遇到指责就作尽量上纲上线的检讨，却使一些心怀叵测和搞投机的人如王明、康生之流有机可乘。

当然，中国党犯错误首先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负责。而且事实上，对于每次错误，受到批评和指责的有关领导人，除陈独秀等一直不服，认为他是国际错误的“替罪羊”，终被开除党籍外，其它如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开始还顶了一下），以至后来被中国党自己定为教条宗派的博古、张闻天等，无不进行真诚或违心的检讨，但都没有向国际推卸责任。连个性倔强的毛泽东也不曾公开顶撞过国际的指示和决定，遇到国际批评时也不得不作点检讨，如西安事变后承认提出“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30] 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表示“我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甚至还说出“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31]这种超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话。大家之所以持这种态度，一方面出自对列宁创立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崇拜，另一方面服从国际领导也是一条铁的纪律。设想毛泽东当年如果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政策，一直对着干，那他能得到国际长期的支持和保护，最后成为党的领袖吗？

其实，共产国际在对中国党的领导和指挥上也不是千篇一律、始终一贯，而是因人而异和随时变化的。毛泽东说的共产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差”，其实也不尽然。例如两头的前头，就包括整个大革命时期。因为他说过，“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32]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不只1927年下半年，1922年以后国际代表马林就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关于中共三大决议给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而毛泽东则是三大决议的积极执行者，曾被断定“是马林的人”。[33]所以这头几年，正是由于斯大林一直到1927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抱有幻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又不了解中国情况跟着犯右的错误，才成了促使陈独秀走上右倾机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中间差”，倒无庸置疑。随着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胜利，共产国际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更多地干涉中国党内事务。这时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竟然提出，“因中共中央太软弱，能力太低，目前阶段‘保姆是需要的’，现在应当对中国共产党实行‘顾问制度’，让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挥中共活动。”[34]这就使中国党十年连犯三次“左”倾错误，如果把责任完全或主要推给在国内的中国党领导人，都不大合乎历史事实，也有欠公允。

至于后边这“一头”，即1935年以后，共产国际之所以比较好了一些，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第一是，面对法西斯的崛起，苏联和国际的战略策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不再是急于搞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而是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来苏德战争起，更是集中力量对付法西斯，无暇他顾。中国党的任务则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第一。服务于苏联政策的国际这时和中国党目标完全一致，因此也就容易配合与合作。第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前同国际失去联系后的一年，反而证明政治上渐趋成熟，能够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问题，因而不愿接受过分束缚，国际对中共也不能不稍为放

心和放手。第三，双方都更多地了解了情况，积累和汲取了经验，大大提高了处理相互关系的水平。国际的新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比较尊重各国党，处事比较民主。中共也学会了更好地和国际打交道。第四，国际选定并坚决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在双方后期关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毛泽东对后期国际及其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一直保持好印象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前，谈中国党的十年“左”倾，谈党内斗争，谈宗派集团，离开国际都是无从谈起的。而所谓教条宗派，后来也常被称作国际派、莫斯科派、甚至斯大林派，原因就在此。但是以往在谈到教条宗派时又总是忽视国际这个重要因素，似乎弄出两大宗派都是中国人自己搞的，反而是没有紧跟国际路线的结果。这也是自相矛盾和造成教条宗派说不清的一个极大障碍。

现在让我们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一下淬了六十年、一些党史书上至今仍在谈的所谓教条宗派（也势必联系到孪生的经验宗派）。而谈到教条宗派的形成，人们往往又追溯到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些人还热衷于后期一种谑称“二十八个半”。为了正本清源，这里也就从中山大学谈起，特别是谈点对“二十八个半”的看法。

三，张闻天与所谓“二十八个半”

（一）如何看待“二十八个半”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称，大约产生于1929年6月中山大学总结工作的全校党员大会以后。当时中国学生在政治和工作态度上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得到共产国际支持而与中共代表团有不同意见的联共基层组织支部局（按，中共六大后不久，中共旅莫支部被解散，党员一律编入联共基层组织做预备党员，包括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一些人的拥护支部局，除思想认识外，还有一个自以为是遵守组织原则和党章的问题），另一派则支持代表团反对支部局。会开了十天，对立更加尖锐，最后进行表决。据曾任支部局委员并在会上当过翻译的杨尚昆说，表决结果是：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九十余人（还有俄国的三十余人），反对的二十余人，其余二三百人表示怀疑。张闻天说这是“两头小，中间大”。由于支部局派以“国际路线”相标榜，所以拥护的比反对的一派多些，约百余人，其中还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35]持支部局立场和观点的一些人，由于在两派之争中处于“多数”，又有国际支持（自然意味“正确”），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俄文正好是多数并代表正确）自命。但反对派并不服，不承认对方为多数和正确，还加以挖苦和讥讽，估算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不到三十人，就戏谑地取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国际共运中是个光荣称号，不但这两派要争相使用，就是中国党也一直定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6]延安整风期间的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连续两天的长篇报告，也是以《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为题的。何况在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谁不愿当布尔什维克？所以反对者就要给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加上引号。但这“二十八个半”究竟具体指哪些人，也许初叫的人还心中有数，但叫开后就变成一个政治绰号或帽子，可以给自己认定的人去戴了。所发人们把不同的名单加在一起，“二十八个半”竟变成了五十多个人。这说明，“二十八个半”并非一个确定的群体，人数更不符合实际，也不是产生于“十天会议”中的表决。

不管这些人是一百多还是二十八个半，总是在那场斗争中共同立场和共同行动，因而形成了一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支部局派（或国际路线派）。但既然连具体成员都弄不清，可见它并无固定组织和经常联系，这次斗争过后大概也就各奔东西了。除参与斗争的人还能忆及外，历史上也不曾有多少人提及它。“二十八个半”的出名和受到追查，已经是十多年后的延安整风了。

延安整风时定性的教条宗派，主要成员都是在苏联留过的人，根子自然会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于是在那场斗争中一时戏称的“二十八个半”就浮出水面了。根据毛泽东“脱裤子、割尾巴”的号召和写反省笔记的规定，一些当年留过学或了解中山大学那场斗争情况的人也纷纷就此进行检查交代或揭发，一时闹得很热闹，对被称为“二十八个半”中的人形成巨大压力。参加过

整风的人都知道，当时闹得最凶的是康生。他不但多次在会上提，还就此问题作过一次报告。事后想来，他的意图很明显，既为迎合上面穷追教条宗派的需要，又可转移视线以淡化他追随王明多年的事迹。但“二十八个半”终究是青年学生一时打派仗的戏称，而且人员复杂、变化极大，并不就是后来批判的教条宗派，因而无须也无法深追和定案，也就没有提上中央总结党史问题的日程。所以毛泽东在1944年3月5日的讲话中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这是书记处会议上没有提到过的。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37]这就是说，中央没提到这个问题，以前有没有以及情况如何，未作评论，反正现在没有了。如果确有“二十八个半”，并进行过宗派活动，延安整风能这样轻易放过、马虎了之吗？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延安整风后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比较正式的党史著作，都没有提过“二十八个半”的问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是这个康生在1966年提出“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结果凡被列入其中还活在国内的人，都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整死。一些造反派也跟着乱嚷，把这个本来就说不清的问题弄得更加混乱。很明显，“文化大革命”后这也是一个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有鉴于此，1981年8月，胡乔木根据孙冶方的意见建议召开“二十八个半”问题调查会，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召集和主持。与会的有熟悉当年情况的老同志如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徐以新、孙冶方等19人。经过座谈，在分析了王明教条宗派后认为，所谓“二十八个半”，究竟是哪些人很难弄清，而且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批人中除七八个变成叛徒外，多数同志都担负过领导工作，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有十数位同志已成为革命烈士。鉴于“二十八个半”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还被康生组弄成坏人的代名词和打人的棍子，因此“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38]

此后，不仅正式的党史著作仍然不提，就是严肃的党史研究也没有去讨论“二十八个半”的问题。有些传记因涉及传主而要提及时，或稍作澄清如《张闻天传》和《徐以新传》，或一笔带过如《博古传》，也有根本不提的如《王稼祥传》。但是两次大政治运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波澜和康生的遗毒并不是一下就能完全消失的，所以以“二十八个半”为题进行炒作的还是不少。这里仅举《二十九个人的历史》[39]一书为例，为的是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炒作情况，倒不是要专门评论这本书。因为现在党史出版物上似乎有一种风气，就是互相抄来抄去，并添枝加叶，编造故事，缺乏胡乔木说的，“党史应该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态度。”[40]

这本书的内容提要上说，要对这二十九个人的人生归宿“给您一个满足的回答”。作者在书中也说，他要“把那些关于‘二十八个半’的说不清的地方尽量说清楚”。但是等看完书你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是书名就不确，因为书里并未讲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作者确定的名单中大多数人就没有写一点他们的“历史”；着重描写的那些人也多是从别处抄来的（包括朱仲丽的《黎明与晚霞》这种文学书中的材料）若干片断故事，谈不到他们的“人生历程”。其次是用“文革”中的语言和不实之词谈论一些党的领导人。如说四中全会后就是王明“与一帮追随他的小兄弟们在中共党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说“很多人都想借助王明的势力捞取个人资本”；说“这种互相需要导致了他们共同大搞宗派活动”；说他们“结党营私”、“损人利己”等等。书中还具体地谈到，派往中央苏区的三人中“有一个则是王明的‘心腹’——王稼祥”；说去中央苏区的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凯丰和杨尚昆是王明宗派的“骨干分子”和“得力助手”。还有一些编造（或抄来）的不实之词及虚假事件和故事，如“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总书记王明”；说什么五次“围剿”后张闻天“以连续两天的时间赶往雩都”找毛泽东商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分手时毛还让刘英与张闻天同行；说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决定让张闻天以（毛）自己的观点写一个报告”准备到会上去念；[41]说瓦窑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42]类似这些完全违背史实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借“二十八个半”之题炒作的，当然不只是这本书。例如还有一部名为《党史风云实录》的书，在第二章里也大谈“二十八个半”。[43]《中华儿女》2001年第7期也登了一篇从这类书中抄来的文章：《“二十八个半”的人生结局》。既然这样抄来抄去，证明还有市场。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呢？这里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供讨论。

第一，“二十八个半”是反对派挖苦讽刺当时拥护国际路线和支部局一批积极分子的戏谑称呼和政治帽子，并不是一个具有组织形态和秘密联系的宗派团体。他们中一些人在联共支部局任职，完全可以用支部局名义，无须搞秘密的宗派活动。他们的追随者前后有百余人，积极分子也在四五十，叫做“二十八个半”并不符合实际。也不是人们说的1929年原中山大学“十天大会”表决时投支部局票的人，因为被列为主要成员的几个人就并没投票：王明回国了（并不像《炎黄春秋》总第93期所载柳百琪的文章中说的那样，似乎王明在现场指挥。其它有些叙述也很不可靠），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在红色教授学院而未与会，第二，“二十八个半”究竟是哪些人，没有也不可能搞清楚。就连不少书如《二十九个人的历史》和《徐以新传》等认为是无争议的那“半个”——徐以新，就大成问题。徐以新当时还是团员。按杨尚昆所说，“参加十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44]张闻天对那“半个”却提出“有的说是傅维钰”；（他提供的名单中也没有孟庆澍，以为她和朱自纯等“是无所谓的”）。[45]而且这批人拥护支部局也是一时之事，很快就发生分化，有些继续支持所谓的“王明路线”，有些就一直反对。例如被列入“二十八个半”的宋盘铭（潘民）就在湘鄂西苏区被“二十八个半”的夏曦在“肃反”中给错杀了（两人又都先后成了烈士）。

第三，被列为“二十八个半”的，绝大多数都是忠诚的革命者。据张闻天《反省笔记》中的名单，当时还健在且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尚有12人，为革命牺牲的10人，消极脱党和叛变的8人。更不用说其中有许多同志是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脱离革命的只是极少数。活着的和牺牲的也都先后改正了错误，没有一个人跟王明到底（按张闻天的说法，孟庆澍不算）。因此对所谓“二十八个半”就绝不可笼统使用轻蔑和不恭的称谓，如“王明的小兄弟”、“亲信”、“干将”之类。

第四，支部局本来就是联共的基层组织，一切服从联共安排本不成问题。在指挥和控制中国党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其实也是一回事。因此这批人不是什么“打着国际的旗号”，而是始终得到国际和联共的支持。在支部局同

中国党代表团关于富农等问题的急诊中，共产国际是明确支持支部局的，并随着联共的清党，共产国际监委也把中国代表团给解散了。

第五，根据以上所述，一时在中山大学嘲讽叫的“二十八个半”，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和成为组织形态的反党宗派；作为联共一个基层组织的支部局，也不能说进行的是非法的宗派活动。因此在党史研究和著作中就应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的调查会上达成的共识，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有名词，更不应为了别的目的而借题炒作。

第六，不提“二十八个半”，并不是否认王明和在延安整风中受批判的一些人有教条主义，也不能否认联共支部局在清党中有冤案和一些中国学生起过坏作用，这都是不应加以混淆的。上述调查会就强调区别对待。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被列为“二十八个半”中的人却并不就是王明宗派，例如孔原、徐以新、陈原道、甚至王稼祥就都不承认。

（二）张闻天和“二十八个半”的关系

从以上的叙述和分析中，也就容易大体弄清张闻天同“二十八个半”的关系了。概括起来，也可归纳以下几条。

第一，张闻天在苏联学习期间，对共产国际、联共和斯大林养成盲目崇拜，属于当时的洋“凡是”派。由于他坚决拥护国际、联共及其基层组织支部局，被一些人目为“二十八个半”是很自然的。他在《反省笔记》中也完全承认。但由于“二十八个半”并非实体，他又没有在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投票，所以算成“二十八个半”只是被挂上虚名，实际上并没什么关系。因此在写张闻天时把他同被称为反党宗派的“二十八个半”连在一起也是不妥当的。

第二，张闻天参加支部局的某些工作不能算宗派活动。他在离校后即和中大疏远，只是担任教课和一个工人班党的小组指导员。其活动均按支部局方针，主观上认为这就是拥护国际路线，“我当时满以为参加这种斗争是每个布尔什维克的责任，丝毫没有怀疑这中间有什么‘鬼’”，[46]既无私心，也无派性。吴亮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使我亲身体验到闻天同志为人的正直和作风的正派”。[47]

第三，在学校同中共代表团的政治争论中，张闻天是站在国际和联共方面的，曾在富农问题上以联共和国际当时的极左观点（即消灭富农）写文章批评过瞿秋白，反对代表团的“右倾”。这不但说明他当时就是错误的，而且也可以说明他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渊源。

第四，张闻天参加中大的斗争，基本上出于他的教条主义和“左”倾观点，而不是为了“捞取个人资本”、“结党营私”，不是无原则地投靠米夫、王明。他自己说，同米夫很少接触，对王明并不赏识，也很少来往（他说王同何子述、李竹声等人常在一起，“自成一个小集团”）[48]，甚至颇为厌恶，说陈绍禹比周文达（这场斗争中张的对立面）更危险。[49]这哪像一个宗派。他还说，他“同博古根本不接近”，而同沈泽民比较接近，有些“书生气，文化人气较浓厚”。在中山大学的许多人回国后，张闻天同他们也无书信联系。[50]

从以上这些看来，张闻天并不像一个被描述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的反党宗派——“二十八个半”的成员。延安整风时，他自己的承

认和检讨，是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并不妥当（对此已有另文讨论）。现在如果还是老揪住不放，一定要把他定为“二十八个半”反党宗派之一，那就是违反历史真实了。

四，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及张闻天同它的关系

（一）应该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四中全会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后来成立临时中央，都是按上述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中说的“保姆制”或“顾问制”实践的，也是延安整风中批判得最厉害的党史上的两件大事，被认为是教条宗派的篡党，并一直成为历史定论。如上引1990年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谈话中还说，“四中全会是夺权》”[51]

延安整风对临时中央自始就持完全否定态度，但以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前后却有天渊之别。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简称《历史草案》）上，开宗明义就说，“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52]为什么这时认为四中全会“基本上是正确的”呢？虽然胡乔木的书上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有四五条，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一条恐怕还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在抓“AB团”、处理“富田事件”等极左错误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而批评和撤换了持比较正确意见和取代了毛泽东书记职务的项英。被称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飞向中央苏区的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还在一些军事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所以直到十多年后的七大上，长期批“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毛泽东却赞扬起三人团来，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53]被毛泽东当时认为代表“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54]的这四五条作为历史事实当然没有也还会改变，但过了两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以后，四中全会却没有任何“成功方面”了，变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55]并成为至今一切官方党史著作，包括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的标准评价。

为什么在延安整风那两年之间对四中全会的评价会发生如此180度的变化呢？大概主要是由于对王明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博古路线也就变成了王明路线（对此将另文讨论）。胡乔木的解释是，毛泽东《历史草案》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后来的改变则是由于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和深入。[56]这恐怕是说不大过去的。那么现在已是事过六十年，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史研究得到空前发展，照道理，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也可以重新进行一些讨论了。

准上所述，对四中全会可否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并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直接操纵下，制定并在后来贯彻执行了一条极左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评估四中全会的前提。对这一基本看法是不能动摇更不能改变

的。

其次，四中全会的合法性在正式文件和严肃的党史著作中从严没有否定。这是因为，一则它是国际专门派代表来主持召开的，无论是路线的制定还是中央的改组都是依照国际的事先指示，事后又得到国际的批准以至赞扬（1931年8月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不但批准了四中全会的路线，还指出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57]）。二则从参加的人选看，四中全会也基本上合乎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37人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2人，占百分之六十，列席的为15人。政治决议案为米夫起草。候选人名单则为中央政治局和国际远东局商定，由周恩来亲笔写出并在会上宣读，最后以20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58]根据这两条，恐怕就很难说四中全会是“篡党”或“夺权”。否则，1927年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明那兹主持下召开的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八七”会议，从组织原则讲，不更是“篡党”和“夺权”了吗？但是直到最后，毛泽东和一些党的领导人以及党史权威胡乔木等仍坚持“四中全会是夺权”，而至今许多所谓属于研究党史的书籍中也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以至实际上加以否认。例如《党史风云实录》（上册）中就提出问题说，“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出席会议的37人中，竟然有15个不是中央委员，近百分之四十。这也称是‘中央全会’。”[59]《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上也说，“为了确保王明上台，米夫强迫中共中央同意让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这都可能算是少见多怪了。先不论参加的是些什么人（37人中被列入“二十八个半”的人），[60]单以非中央委员的人八论，这实在不算特别。此前的三中全会就是中央委员14人，地方和单位代表22人。人们更知道在延安开的中外党史上都算得最长的六届七中全会（11个月），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列席12人，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这难道就不能叫“中央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可以不算？须知这还是在解放区，又是在全党反对不正之风的延安整风期间；而四中全会则是处于白色恐怖和共产国际派代表直接操纵之下的。在党史研究中持双重标准，仍然是在继续搞个人崇拜。

第三，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机关的组成和实际工作情况看，还不能说教条宗派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或领导权，发生了“篡党”、“夺权”问题，也不能说“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因为全会选进政治局有九个正式委员（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和七个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只有一个王明属于所谓教条宗派。而且在随后的政治局分工和确定常委人选中，据说国际远东局有意让王明当个候补常委，结果也没弄成，而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仍然让他去做江苏省委书记；常委则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属于教条宗派的其它人，不但没有能进政治局，而且在补选和递补的五个正式中央委员中也没有一个，会前极为活跃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有当上。[61]而且四中全会后米夫还在中国呆了半年左右，对中央进行着直接操纵和指挥。有他的撑腰，王明也许发挥的作用大一些，但其它人大约也只能执行米夫制定的方针政策而不敢对着干。所以说一个未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王明，竟有如此本领，单枪匹马一下占领了“中央码头”，这是很难令人想象的。其实，只要稍为翻阅一下《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等

书的有关章节，就可以看出，从四中全会到临时中央成立，主持中央日常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老同志也如是说。

第四，所谓“钦差大臣满天飞”，看来也是夸大其词。首先，毛泽东自己就多次要求中央派干部来加强领导。如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具体提出，“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当赌注同志至少三十人来。”[62]他对四中全会后派来的真正具有“钦差大臣”性质的中央代表团也是一直欢迎和赞赏的。其次，中央向苏区派干部既是实际工作的需要，又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四中全会后的2月22日，周恩来起草的致国际电就说，“现在正依照国际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恐怕谈不上是派“钦差”，也看不出有什么派性。几天后的3月4日，中央常委还“决定凡去苏区的人，统由周恩来、康生（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安排”，却并不是王明或教条宗派别的什么人。[63]而且后来陆续派往各地的也不是刻意要派留苏学生。例如派夏曦出任湘鄂西分局书记，就是因为李维汉不去。[64]而且1931年中央派往洪湖苏区的还有铮铮铁骨的钱瑛。派往中央苏区的任弼时和派往鄂豫皖的张国焘等这些重要领导人当然不能说是属于教条宗派。至于先后派往东北组织抗日联军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人[65]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当时派往各地的人并不算多，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延安向各地派领导人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建国后由中央派去各地的领导干部也不少。难道这都是“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出的干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属于常规。那时的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派出的无论是留苏学生还是土生土长的干部（如后来去中央苏区的李维汉），都会照此办理。至于犯肃反扩大化错误和滥杀无辜，更不能看是否“教条”，如果在湘鄂西曾乱杀人的夏曦算“教条”，但先在鄂豫皖后到四川的张国焘却不能算了。一方面军中大抓“AB团”还发生在四中全会前，反倒是中央先后派来的项英和周恩来作了纠正。因此，把“钦差大臣满天飞”看成都是“教条宗派”，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是和事实有相当距离的。至于胡乔木说的，“把原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统统拿下来”，[66]更是无限的夸大。

第五，谈到“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他最不满意的是在这里。”[67]这既不完全合乎事实，也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如上所述，说王明控制了“中央码头”实际上是夸张。在中央真正管事的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任弼时，都不属于教条宗派和“王明小组织”。而且根据国际指示办事，也不能说是拱手让权。否则，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三代，单从组织上说（暂不论路线正确与否）也都是“拱手让权”了。如同黄克诚所说，毛泽东自己也曾“拱手让权”，因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主要是毛泽东创建的，他在军民中也有很高的威望，怎么能发生“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这样的事。[68]这恐怕除了他说的毛泽东喜欢偏听偏信的组织路线和错误肃反使其失掉部分人心之外，还有个全党服从中央和国际的纪律问题。实际上在这之前的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他已把党权和军权“拱手”让给了并非教条宗派的任弼时、项英

等人，只有一个被算作教条宗派的王稼祥反而是支持他的。

第六，四中全会基本上是错误的，但说它“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和“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69]恐怕也有些太过分。例如在人选上，新进入政治局的除王明外，还有任弼时、刘少奇、陈郁、王克全；还保留了一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在政治局的地位（如果他们像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一样被撤消职务，那以后就有些难办了）。而且毛泽东原先在《历史草案》中肯定的那几条“成功方面”，除“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是混淆了敌我（现在党史界已经在为之平反，但毛泽东在世时还是一直肯定的）外，其它如对待立三路线错误和打击罗章龙右派、取消全国总行委、放弃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在粉碎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中的工作等，还是应当肯定的。特别是在敌人的日夜搜捕、顾顺章等叛徒出卖的险恶环境下，能够保住中央机关和一批重要干部以及党的文件档案等，这种忠于党的事业和英明机智的精神，尤值得永留青史。

仅从以上几点就可看出，过去对四中全会的评价显然有点绝对化，有些说法也不合乎实际情况，而在党史研究中那种抱定历史定论而不顾历史事实的现象也长期得不到克服。因此对四中全会重新作点考察还是需要的，并不是什么“要翻历史的案”。

（二）张闻天与四中全会的关系

至于张闻天和四中全会的关系，也可以谈到以下几点。

第一，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已是四中全会开后一个多月，他既无可能与会，事前对会议也一无所知。因此可以说四中全会和张闻天毫无关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那些“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70]的人，主要指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张闻天不在国内，当然也不会参加这些宗派活动。现在有些党史著作，把张闻天列入参与四中全会夺权的教条宗派之中，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张闻天是四中全会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他本着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进而认定四中全会的路线就是国际路线，因此不用多加考虑和研究，就盲目地投入到捍卫这一路线的斗争中去了。例如他1931年2月17日才辗转回到上海，两三天后同党中央接上关系，但2月21日已写出《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修》的文章，竟点名批评“秋白同志立三同志一直到四中全会以前”如何如何。这时不要说了解国内实际，而且四中全会本身的情况都还没搞清楚，表现了典型的毛泽东所说“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的作风。2月23日作时评《南京政府的财政恐慌与大借款》，24日写《加紧我们日常斗争的领导》。到3月17日，抵沪一个月内就已写出和发表了八篇文章，期间还有参加会议、发表意见、作报告、起草文件及其它具体工作。[71]这固然显示出他的勤奋和才华，但也说明不作调查研究和教条主义作风的严重。

第三，张闻天不但忠实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而且还有所发展。毛泽东把他定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路线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有一定道理。由于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所以特别强调在社会上揭露和打击中间派，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大力宣传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进攻”路线，而

且往往点名批判，不讲策略。例如把中间派别对蒋介石的不满和要求民主说成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欺骗”，甚至公开批评不久即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胡愈之是“国民党宣传员”。又如后来写的长篇社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点名批评了十多二十个省委、一批群众组织和中央机关，以及不少领导同志。[72]无论党内党外，打击面都太宽了，表现了“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老公式。

第四，四中全会后张闻天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宣传方面。他主管宣传，日常工作就是“编报纸、写文章”。在周恩来、王明离开中央前，决策上他的发言权有限，也很少管其它实际工作。临时中央时期，他和博古的分工也是“他主要写决议，我则主要的写文章”，而且还总是怕博古批评右，不敢理直气壮地谈反“左”。[73]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也说，“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74]

第五，四中全会后张闻天在工作中印把子过教条主义错误，但绝不能像延安整风时对他的批评和他据以反省的“只有罪恶无功劳”。[75]这都是些片面的偏激之词。事实上，他不但在革命的大方向上同全党完全一致（毛泽东自己就提出“不要否定一切”，说“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76]）而且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辛勤地为党操劳，在各个战线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在周恩来的日常具体主持下，进行了对敌斗争，粉碎了几次叛徒的破坏，维护了党的领导，在这中间也都有张闻天的一份功绩。所有这些是不应该也不能否定和抹煞的。

五，如何看待临时中央和张闻天的作用

（一）对临时中央也要一分为二

其实上面所谈内容，多已涉及到临时中央时期的工作和一些问题。这里想着重谈的是如何看待临时中央和张闻天在临时中央的地位与作用。先从张闻天回国后工作谈起。

1931年2月17日张闻天回到上海。2月19日向忠发、周恩来和国际远东局谈话中即已提到“张闻天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前任沈泽民（也是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已决定去鄂豫皖苏区，需要有人替补。[77]张闻天当上中宣部长后，为了宣传和阐述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从3月2日起开始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议（这也是正常现象。例如“文革”前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并非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却一直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各种会议，所以才能写出《十年论战》）。这次回国，张闻天已从“五四”后一个颇有名气的青年文学家变成完全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革命家。而且是长期留学苏联，忠于国际路线，马列书念得多，知识面广，文章写得快，工作又极为积极认真，因而得到大家（中央领导人和国际远东局）的器重。加之由于他的主要任务是编报纸、写文章，而且往往三两天就是一篇，虽然用了许多化名，但还是很快出了名，被党内外都看成留在上海党的一位领导人。例如半年后（9月份）国民党悬赏通缉上海的七个共产党人中就有他（和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各为一万元赏金，瞿秋白、周恩来为两万）。[78]可见他后来进入临时中央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1931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之前，党的工作重点就已转向苏区。共产国际也不再坚持城市中心论，指示把从政治局起的大批干部派往苏区。在国民党疯狂镇压和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在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之后，原来几位中央领导干部已经很难在上海存身而不得不撤离。既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实际上不可能再存在，那么为了革命的需要和保持中央工作的连续性，就只能成立临时中央了，何况这还是远东局的决定并得到国际的批准。所以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临时中央打击和排挤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虽然对临时中央极为不满并加以严厉批判，但却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关于临时中央的合法性没有争议了，但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提出一谈。

一是关于临时中央的产生和手续问题。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日常实际工作的周恩来已无法留在上海，只能隐蔽起来，停止同中央其它成员的联系，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中央另一主要领导人王明，则要求并获准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二人一走，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就只剩下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一人了。[79]远东局同周恩来、王明商谈后决定成立“新中央”（这是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的提法。他还特别提到，当时“并未说是‘临时中央’”，只是国际批复的电报上称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名单报国际批准。这说明，临时中央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合乎列宁关于秘密党无法公开性也无法实行民主的原

则，因而不但是合法的，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不存在“选举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我党当政的根据地，以及建国后直到现在，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也没按党章规定选举，而由中央甚至领袖个人任命，何况那时牌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根本不允许搞正常选举。

二是临时中央的人选问题。根据张闻天《反省笔记》，名单是由周恩来、王明提出，商远东局后报共产国际的。确定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张闻天记得国际批复时还增加了黄平、刘少奇、王云程，成为九人），并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至于说“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80]则连张闻天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相互间的分工。他说，“我当时还不知是王明、恩来要博古多负中央工作的责任。”但他记得国际的批复电报是在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由博古宣布的。[81]大约从此博古就召集会议和通知工作，大家也就分头去干了。这足见那时中央机构和章法极不正规，但博古、张闻天等人起草的决议和文件却可以成为中央指示（虽然未用中央名义），并对各地发号施令。许多党史著作，为了肯定教条宗派及其篡党夺权，把当时的交接说成似乎是王明等几个人的密谋，甚至采用文学虚构的手法（如一些正式史论和传记也采用《黎明与晚霞》上的对话），描述王明行前对博古如何具体交代。这种近乎写小说的风气至今犹盛，实际上大多靠不住。有些情况是当事人都在的延安整风中也没完全弄清楚的。例如在交接时对成立临时中央是否有“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讨论”[82]（王明整风时的说法是，“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83]对此，张闻天开会时和在《反省笔记》中曾质问道，“当时上海就有正式中委，如瞿秋白、刘少奇、陈云、卢福坦、黄平等，当时为什么不把中央大权交给他们，而另外交给我们这批非中委？”“而且以后王明到了国际，恩来到了中央苏区，为何根本不提此事？”[84]看来这些问题大约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弄清。

关于指定负总现的人，可否作这样的估计和分析。周王走后卢福坦是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本人也很想当总书记，但米夫和大家都不同意。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此人是在国际强调工人成分的情况下提上来的，水平有限，负不起责任来；二是鉴于向忠发（也是工人出身）的教训，对他不大放心，而且他后来也确实很快成了叛徒。因此大家商定不设总书记，只进行分工，并得到批准。这倒是所有当事人都承认的，延安整风时已弄清了。

卢福坦之外，按理应当轮到刘少奇。他是留下的第二个政治局的人。但他在1930年6月就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又留下（因当选执行局委员）工作了一年多才回国。由于他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一些极左政策，无论是出席大会还是参加执行局工作期间，总是同职工国际甚至共产国际领导（如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等人）发生意见分歧，以致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四中全会能把他从中央候补委员选进政治局就不错了，很难想象能把要执行国际路线的新中央的权交他。即使有人有此意见，远东局和国际也决不会批准。而且不久之后，善于投机的康生就已带头批起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来了，还很快形成围攻之势，博古、张闻天等也都点名批评。在国际代表明确说他“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后，临时中央常委还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之职，于1932年初派往中央苏区。他虽然曾被迫作过检讨，但实际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作法，因此

就长期北上了“老右”之名，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圈外。[85]直到1935年张闻天提议和选派他出任华北局中央代表和书记，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

至于瞿秋白，无论德才资都是堪受重任的。但他由于同共产国际有意见分歧（如上述富农问题和对中山大学两派争斗的态度），被撤掉了驻国际代表的职务。由于他的地位和威信，后来又与周恩来一起被派回国纠正立三错误。但国际很快又把立三错误提高为反马列、反国际的路线错误，他们也被指责为调和主义，尤其对瞿秋白主持会议和继任政治局委员不满，派米夫来华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和把秋白拉下马。周恩来因多数反对，以18:6票否决了要他退出政治局的提案，王明、米夫也认为由于实际工作离不开他而让他戴“罪”立功。[86]但瞿秋白只能跟李立三、李维汉一起退出政治局。另一方面，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像他这样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活动，加之他的病情日重，因此只能像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告了长假休养医病”，等到在上海连养病也不可能了，就又“跑到瑞金”。

当然，这还不能完全回答张闻天的上述提问，为什么要把权交给他们这些非中央委员（主要指博古和他）。至今也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史书能对此说清楚。许多书上说是由于四中全会后，已由并非常委只是取代刘少奇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掌了实权（不少正史上还写成“王明一派人”或“王明等”，却又不能具体指出是哪些人），因此临走时定要将中央权力交给属于他一派并忠于他的人，还描写得具体生动，有鼻子有眼。但都没有提出具体根据，看来都是按教条宗派“篡党”“夺权”的模子套的。也没有提及周恩来（临时中央的名单是他亲笔所写和亲自宣读的）、刘少奇、陈云等中央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反对呢还是只听王明摆布？而且这也无法说明后来为什么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联席会议上大多数人推选博古为总书记，当时并未说这是远东局或国际的意见，博古本人还“在形式上推了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87]可见，至今流行的一些说法，不但是人云亦云，而且还在不断加油添醋，这就只能离史实越来越远。实际情况大概要比这些描述复杂得多。看来可能是由于工作重点和主要干部都已转移到苏区，留守中央一则是临时的，二则重要性和任务也大为减轻（白区形势险恶，苏区鞭长莫及。当时明确说的也是同上海的远东局联络和协调各地组织），因而带有某种维持会性质，既找不到适当的人抓总，就找几个被认为所谓理论水平高（这在当时是个重要条件，实际经验则不受重视）、名气还不太大、尚未引起敌人特别注意、叛徒又不大认识、又得到远东局信任和年轻能干的人了（常委中加上卢福坦大概只是作样子，作用不大）。

还应一提的是，不能用执政党的条件衡量秘密党时的人和事。那时是提着脑袋干革命，隐姓埋名（不大计较名利地位），四处奔波，职务变化和工作调动是常事，人们也多习以为常，没有多少等级观念，也不讲究论资排辈。所以张闻天事后还说，“我当时对这种‘提补’（指被提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毫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秘密党内，这是常有的事。”[88]邓小平就是在24岁时做了中央秘书长，在六大前后半年多和李维汉、任弼时组成“三驾马车”的留守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即使在苏区和抗战后的解放区，也不一定按“台阶论”、“等级制”。例如杨尚昆1932年秋后任上海临时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初到苏区却做了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的宣传干事，不久又出任红三军团政委，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反在他领导下任政治部主任。连延安整风

期间都是“有经有权”，不完全“循规蹈矩”的。例如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1943年中央机构改组时却一下成为三个书记之一，党中央的第二把手。又如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彭真，回延安后就当了多数七大代表参加整风学习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校长为毛泽东。参加党校工作的彭真和林彪当时被传为一政一军两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44年又替代了政治局委员陈云连任过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长（时值审查干部、特别是七大代表资格和准备七大。陈云是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的。[89]他则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这时边区已做到“丰衣足食”，很难说是后一工作更重要）。同样连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的薄一波却可建议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从毛泽东起几乎所有中央领导都是或多或少参加了的），并被推举为主席，使任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挨了四十多天不公正的批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说法是“半了我”）。这类例子还有许多，如高岗的迅速上升和陈伯达、胡乔木等得到重用等，兹不多举。而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连在晋西北作农村调查，后来也因不受代理区党委书记林枫的欢迎而不得不提前离开，1944年只当了个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领导四五个人编写《参考资料》。[90]周恩来此时也几乎无“事”可做，说话也不大管用。如他曾致信晋西北的廖井丹证明穆欣无问题，但主持抢救的林枫不予置理。[91]谈论这些并不是要讨论这些事本身的是非，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成立临时中央及其人选难免有点不周，只强调几个非中央委员是“一步登天”、移交的纯宗派性质和手续不全等，不但过分，且不公正。同六七十年代“四人帮”的上台和单凭伟大领袖一声号令就任免党国领导人，就更不能同日而语。

总之，要全面地评价历史上的（而不是在安全和优越条件下想象的）临时中央，恐怕也还用得着一分为二的方法。即一方面，它执行的是共产国际通过四中全会强加给中国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权的博古、张闻天既忠实执行又缺乏经验，还要发号施令。其余如陈云、康生等人也都是顺着来，跟着走。这是他们在延安整风期间正式作了检讨的。国际的错误（后来都称王明路线）又遇到博古这样的盲目而刚愎的执行者，遂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主要是九一八后没有及时适应民族革命高潮而转变策略。但另一方面，说临时中央“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92]白区党和群众工作损失百分之百，则是不顾事实的故意夸大（毛泽东后来也稍有点更正，“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93]但没有看到刘少奇的更正，特别是至今许多书和文章还在继续重复以前的夸大之词）。因为一则党还在白区发挥着领导作用，特别是以上海为主的文化界反“围剿”的第二条战线和各种爱国组织的建立，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运动和东北兴起义勇军等。这哪能说“精光”？恰巧证明不仅有政策，而且还有组织有人。所以，“一二九”时任北方局书记的高文华以及许多白区工作者如王世英等，在几十年后也一直对完全否定白区工作不服。二则临时中央时期各地党组织的重大破坏及其造成的损失也远没有以前（1927—1930）大，把白区损失的账完全算到临时中央的头上是违背事实和有欠公允的。三则遭受损失也不能只说成是党本身“断送”的，而不提敌人的破坏。这就使人忽略了当时的那种残酷环境，即使路线正确也会遭受损失（隐蔽的好，损失会减轻，但仍不可避免）。这里举个相反的例子。党史上有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即中央到陕北后路线早

已是正确的了，但此后却发生西路军两万多人的全军覆没（只李先念带了四百余人撤到新疆）。党史书上对造成损失七千人的皖南事变总要大书特书还不准确地批判项英为左倾机会主义，但对西路军的失败却轻轻带过（以前还推到张国焘的头上）。这种作法，是有悖于中国史学“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的。

临时中央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完全抹煞。说它“只有罪恶无功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等，[94]不只显得用辞过火，而且也离事实太远。至于讽刺挖苦和近乎谩骂，动辄“老爷们”，“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对于许多聪明勇敢的同志……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和威胁，……这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95]就已经不像党内斗争，更谈不上“与人为善”了。这大概是毛泽东极为珍爱的文章却不能发表的原因所在。其实，临时中央在有些地方也还是功不可没的。首先，它的大方向正确，这是上述毛泽东也承认的。为数不多的这批人，不畏艰险，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高兴革命和救国旗帜，主张和宣扬土地革命，号召和组织抗日反蒋斗争，协调全国党和群众组织，在白区保存了（不少城乡还有所发展，如1932年在敌心脏上海纪念九一八的一个月里，就吸收新党员千余名，新建立支部94个[96]）一些革命种子和组织，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始终保持着党是全国人民希望所在、特别是抗日救亡旗手的形象。这个时期的许多进步人士和进步运动，也多和党有关系。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俱在，无须多讲。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临时中央还根据四中全会后的决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以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时，毛泽东虽然党内地位不高，又在刚才开过的赣南会议上挨了批和被取消了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但却因当选中央苏区主席而从此名扬四海，在国内外成了中国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象征。这为日后毛泽东被确立为领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席”的称号也从此一直保持了一辈子。

（二）张闻天在临时中央的地位和作用

张闻天同临时中央的关系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是经过一再清算，他也交代清楚了的。他是临时中央的第二把手，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极左路线，在宣传方面印把子有许多错误。他也一直承认和检讨是“左”倾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他在临时中央的工作采取一笔抹煞和全盘否定（“只有罪恶无功劳”）的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临危受命，在一些同志根据决定撤离或隐蔽起来的情况下，仍不计个人安危，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在国际批准的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就有贞福坦、李竹声、黄平、王云程四人先后叛变）。临时中央高举革命红旗，战斗在敌人心脏，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此外他还有些特殊的贡献，尤其是在他较为熟悉的文化领域。由于张闻天的为人正如胡乔木后来所说，“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具有“不迷信、不迎合、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在实践中碰了钉子以后，他能够思考而逐步在某些具体政策问题上突破‘左’倾的桎梏”。[97]例如，他被称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取得胜利的奠基人；[98]他首

先站出来批判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党八股，对党领导左翼文艺和成立文艺界统一战线起过重要作用（胡乔木在上述回忆文章中说，发表在《斗争》上的“这篇论文当时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这从当时冯雪峰及其它一些左翼作家的文章中就可看出来）；在《斗争报》上着文反对河北高阳蠡县暴动的“左”倾冒险；在会上批判中央苏区抓“AB团”和“肃反工作成为最大的罪恶”；以及反对王明对工运估计过高等。[99]

组织路线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路线的。张闻天既然在政治上犯“左”的错误，组织路线上也不能不犯错误。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例如他同意任弼时、项英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和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同意周恩来取代毛泽东的职务和让毛回后方专搞政府工作；公开批评刘少奇并同意撤换其在全总的领导；对邓中夏，他也有排斥之意，等等。[100]所有这些，当然他都是不能辞其咎的，但却并不能成为证明他属于有组织的教条宗派和进行有组织的宗派活动的依据。

如果说在政治路线上他和王明、博古、王稼祥都拥护和执行四中全会制定的极左路线，因此应算作一派（从派的广义讲也说得过去。但当时的政治局，包括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等都在内，没有一个是反对国际路线的。他们不也都可算作一派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宗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因拥护同一路线成为一个有组织形态的宗派，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如前所述，搞宗派必得是有组织、违反党纪的阴谋活动。而众所周知，张闻天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作风上，一生为人都是光明磊落、奉公守法，从不结党营私、搞见不得人的事。而他又恰巧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一直不和，归结为谈不上拉帮结派进行宗派活动了。他回国后没有见过米夫。他说，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通知我，说米夫要找我谈谈宣传问题，但届时没有来。顾顺章被捕后，米夫即走了。”[101]至于王明，他的印象一直就不好，在中山大学时就看不起。[102]回国后因王明任江苏省委书记，“无直接工作关系，故来往很少”。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因罢工问题（他反对王明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顶了一阵”。事后又给国际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写了一封信告王明的状。王明走时既未向他作任何交代，走后也从无联系。[103]这哪里谈得上宗派关系和宗派活动！

四中全会后，博古因任团中央书记，张闻天同他的接触就更少。临时中央成立后，接触多了，但却使他对博古增加了不满，经常发生点矛盾。他特别怕博古批他右，所以处处设防，写文章时要讲反“左”，也得先强调一下反右。后来他“稍微感觉到，博古想把他排挤出中央”。由于叛徒告密，他的住地团中央机关被抄，只得离开中央去做实际工作。博古意欲派他去北方工作，他则要求去苏区。经请示国际，复电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迁入中央苏区。[104]于是，作为临时中央“三驾马车”的张闻天先走，博古和陈云随后同行，从此结束了上海临时中央的存在。从这中间也实在看不出张、博之间的宗派活动。至于王稼祥，则早在四中全会后就已和任弼时去了苏区，没有同张闻天在临时中央共过事。

注释

[1]毛泽东：1959年8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第399页，432页。
[2]《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4]毛泽东：1959年8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第399页，432页；《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5页。
[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49页。
[7]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821-827页。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2页。
[9]《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版，第185页。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9页。
[11]《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1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3页。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9页。
[1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9页。
[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9页。
[1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9页。
[17]塔斯社1988年8月14日报道。
[18]《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载《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19]《六大以来》（下），第1页。
[20]《整顿党的学风文风》，载《整风文献》1949年解放社版1953年编入《毛选》时改了标题，也删去了李立三对共产国际闹独立性一句。
[21]例如胡乔木在《毛主席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的谈话中就说，中国党同共产国际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7页。
[22]见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8页所引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23]见1943年12月28日《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142-143页。
[24]见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9-162页。
[25]　1956年同南共代表团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26]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803页。
[27]参见《毛泽东年谱》有关部分和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三章。
[2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29]参阅唐纯良：《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74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6页。
[31]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1页。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32页。
[33]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8，9页。
[34]《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见《百年潮》2000年第十二期李玉贞的评介。
[35]《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46-147页，另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36]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602页。
[3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1页。
[38]见《徐以新传》，李樵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5页。另见柳百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号的由来》，《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39]张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18页。

[41]可参阅《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
[42]事实是，会议12月17日开幕，25日结束，而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已于15日油印散发，后来通过的决议文本与此完全一致。见《张闻天对瓦窑堡会议的贡献》，《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三集。
[43]郝景泉：《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44]《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李樵：《徐以新传》，第89，91页。
[45]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46]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47]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8]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49]肖扬等1996年在莫斯科查档，全总530（原中山大学档案），目录，卷宗5，第29页。
[50]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5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9页。
[52]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页。
[53]《毛泽东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5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5页。
[5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3页。
[5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5页。
[57]《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89年版，第211页。
[58]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91-92页；叶永烈着：《陈云之路》，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59]《党史风云实录》（上），第161页。
[60]见该书第155页。
[6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21-323页；《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01页。
[6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4页。
[6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05，206页。
[6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31页）中说，四中全会后不久，“恩来同我谈话时，首先要我到湘鄂西中央局任负责人。我表示不想去。又提出要我到赣东北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那里任特委书记。我表示也不想去。
[6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4页。
[66]分别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47页。
[6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
[68]《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6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7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3页。
[71]以上均见《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8页。
[72]《六大以来》（上），第211-224页。
[73]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3页。
[7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76]《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8页。
[77]《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13页。
[78]《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38页。
[7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1-212页；《刘少奇传》（上卷），第164页。
[8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2页。
[81]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82]《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2-213页。
[83]转引自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8页。
[84]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85]以上均见《刘少奇传》（上卷），第159-183页。
[86]《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三篇第二章第五节。
[87]博古在七大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第108页。
[88]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89]《陈云之路》，第75页。
[90]《邓力群谈张闻天与刘英》，见《张闻天文集》（第四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91]穆欣：《劫后长忆》，第132页。
[9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41页。
[9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67页。
[9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95]转引自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0页。动辄“老爷们”，参阅《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录）》。
[96]《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86页。
[97]《回忆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第21页；另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7-118页。
[98]薛暮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第25页。
[99]以上均据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和《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12-189页。
[100]以上均据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和《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12-189页。
[101]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02]西门宗华也有此印象，见《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风云》，《中共党史资料》，第68辑。
[103]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04]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05]叶永烈：《陈云之路》，第30页。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党内真有两大宗派吗？

一，从中央苏区存在两大宗派谈起

（一）说在中央苏区有两大宗派，说不清也说不通

在延安整风期间及其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中央苏区存在两大宗派集团，特别是教条宗派。有时他也把两个混到一起，例如说："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1]"六，党内宗派现在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2]"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3]但是直到1943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发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中还说，"但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似乎两个宗派又变成一个宗派，等等。这就是说，起码在遵义会议前，中央苏区和全国都还存在两个宗派（又经常合二为一）并进行着活动。至于两个宗派如何界定，怎样活动，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却不但当量，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说清。原因大概是没有的事说起来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了之。

实际上，还在被看作教条宗派控制下的临时中央进苏区前，毛泽东就已受到排挤，党权和军权也陆续被剥夺了（倒是临时中央开头撤换了项英，把代中央局书记交还给了毛泽东）。"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4]是1931年11月任弼时、项英主持召开的赣南会议。他除受到未指名的严厉批判外，随后还被取消了一方面军总政委和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周恩来正式担任。（周恩来临终都在检讨，认为这是他夺了毛泽东的权，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错误。毛对此也始终不放，认为需要时就拿出来敲打，直到去世。）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更被完全剥夺，并为后来的临时中央直接指挥红军开辟了道路。[5]与会的是后方四名委员任弼时（代书记）、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前方四名委员周恩来（本为书记，因去前方由副书记代）、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前后方委员人数相等，在对毛的处理上却意见对立（前方主张毛留前方指挥，后方要毛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但后方委员的作用大，既有临时中央的后台，周前期会议又未参加，加上得到参谋长刘伯承的支持，[6]遂使毛从此失去军权。可见，剥夺毛泽东党权军权的并不是临时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创立和领导的苏区内部。

从会议组成看，只有一个王稼祥被算作教条宗派，但正是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明确支持毛。后来任弼时等后方四位委员向中央报告，除历数毛的右倾错误和决定让他回后方，还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替毛泽东打掩护。[7]从这两次会议的实际情况看，直接剥夺毛泽东党权和军权的也不是教条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经验宗派的人，即周恩来、任弼时（延安整风时和以后均未作公开指明过，但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把他同教条宗派并列在一起，一再说"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林彪也说，"平型关吃了

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8]）。此外，可算入经验宗派的，大概还有朱德、项英、邓发、彭德怀、李维汉等人。这样看来，夺毛泽东权的主要是经验宗派了。当然，他们如果没有得到控制临时中央的教条宗派的支持也是办不到的。

但这两个风马牛宗派是个什么关系，又怎么会搞到一起的呢？这个问题在延安整风开始时也确实难倒了大家，连毛泽东自己也说不清。还是借助这两个大宗派的主要成员才得到理论上的解释，而且至今仍保持它的权威效用。这就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的，“在（1941年）9月29日会议上，洛甫同志在检讨主观主义错误时对狭隘经验主义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确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后来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吸收了闻天同志的观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关系的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9]其次是周恩来1943年9月写的第四篇学习笔记所说，“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迷惑有关。”[10]他还把宗派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宗派观念的；一类是有宗派行动的；一类是有小组织活动的。[11]这前后的解释，确实解决了整风碰到的一个大难题。因为那时除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两边不沾和那些明显的甚至被点名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外，总沾点边，没有这一理论说明，连自己都不好检讨。

但是现在仔细看来，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空话，并没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党的领导问题并不是几个中国人在那里斗法，关键是上面还有共产国际的严格约束。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和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些铁的纪律，博古就靠那点“马列主义外衣”竟能把中央苏区的朱毛周任项以及广大干部迷惑住，轻易地夺了权？而且在推选博古当总书记的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在，并未见到他们提反对意见的记载。至于周恩来关于宗派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解决经验宗派这个难题，因为既然定了性，承认它的存在，却又很难捏在一起。例如周恩来、彭德怀、项英、陈毅等怎么凑成一个宗派。还不说人些人更不沾边，无法拉到一个宗派中来。这样一分类，就可各就各位，不论主观还是客观、有意或是无意、动机与效果，都可找顶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认可的帽子戴。（实际上也有难处，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宗派的“组织形态”，你只讲观念哪儿行？）至于对教条宗派来说，虽然对后来的解释（不一定有什么组织，主要是观念和路线相同等等）有所启示，但前面已经讲过的，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从1943年到现在一直肯定教条宗派是个小组织（如胡乔木）、小集团。而且按毛泽东的说法，两者也很难分开。你看：“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12]这又是指的哪个宗派？谁能说清楚？

但不管怎样，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博古反而当上了总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单有双方与会的占极少数的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个“教条宗派”的支持是办不到的。中央的绝大多数还是“经验宗派”（即使不算毛泽东、刘少奇）。而且这时博古不但权大了（在上海还只是遥控，现在则是直接指挥），而且更加刚愎，家长制作风大为抬头。下车伊始就掀起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没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出面反对和制止的材

料。这自然也不能只靠张闻天一个人的支持和写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邓毛谢古”、追查其“反党小组织系统”和纲领，就主要是罗迈组织和指挥的，这也是他多年后仍检讨说，“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13]后来博古又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就连周恩来、朱德临阵的军事指挥权大半被剥夺了，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长征。

（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活动同教条宗派挂不上钩

张闻天到苏区后，开头在政治上仍坚决贯彻执行四中全会的极左路线，下车伊始就着文竭力反右，特别是跟着博古大反江西的“罗明路线”，还打击了一批老干部，如反对中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倾观点”和福建省张鼎丞的“错误”等。[14]但正如前面引证胡乔木等人的评价，他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后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苏区接触实际后，果然就发生转变，开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与争论。例如关于对“三条件”（红军“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的了解，博古说只是针对下层的宣传号召，他说是既对下层也对上层，既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对十九路军的态度，他批评博古“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而主张“在军事上积极配合”。此外，他还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反“左”，如反对苏维埃经济政策中的“左”、劳动政策上的“左”、党内斗争和肃反问题中的“左”（毛泽东在打“AB团”、富田事件中错杀的好同志以万计，还没有材料证明张闻天胡乱杀过人，有材料的，反而证明是救了刘晓、傅连璋和到陕北后的刘志丹）等等。当然，总的来说，张闻天在苏区的整个期间执行的仍是“左”倾路线，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实，除军事上有明显分歧外，也没见到其它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站出来反对大方向即总路线）。但在相互关系上两个人就一直不和。张闻天看不起博古，说“他当总书记，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何况他耀武扬威起来，又要在我头上屙尿呢！”[15]矛盾的发展，促使博古开始排挤他。五中全会后，张被派去做政府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博古、罗迈的一箭双雕，把他排挤出党中央，又把毛泽东排挤出中央政府，只当苏维埃主席。到广昌战斗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更和博古直接吵了起来。此后即派他去闽赣巡视（实没必要，因项英才巡视回来），政府领导交给罗迈，直到长征出发前他才回来。这时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决定，关于长征时政府系统干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罗迈（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也参加三人团一些工作）关于三人团的通知行事。[16]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也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博古负主要责任，其次是罗迈。张闻天算犯第二等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17]罗迈的回忆却不尽相同。[18]这里只举不许瞿秋白跟随长征为例。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说，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给三人团，博古不同意。刘英后来在访问中讲得更具体些。她说，洛甫提出后，博古反对，罗迈说是累赘——因秋白有病，周恩来没说话，于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罗迈的说法则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执行三人团的决定。张闻天由于深感处于无权境地，因而极为不满，并在同毛泽东闲谈中倾诉了这些不满。[19]虽然这里用的主要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但却说明了一点，就是到苏区后他和博古既无宗派关系，更无宗派活动。至于同王稼祥，由于没有工作关系，王又长期养伤，平

时几无来往，只是长征后才接近起来，同毛泽东一起形成“中央队的三人团”，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除非把长征中这种结合说成宗派活动，否则张闻天和王稼祥之间根本谈不上宗派关系，即使用一些党史研究者发明的上述解释，在这里也无法自圆其说。

从以上情况看来，并没有中央苏区存在一个教条宗派的真凭实据，更谈不上“王明小组织”的活动了。被称为教条宗派主要成员的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还有哪些人能组成这一宗派集团？何况博古这时任总书记，名正言顺代表中央。他得到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张闻天、王稼祥，而是罗迈（罗本人又一再声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面的人”[20]）、项英、周恩来等被算作经验宗派的人。我们党一条最重要的纪律是“全党服从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个“反党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码头）所把持，全党（包括每个党员）该怎么办？服从，就是跟着“反党”；不服从，则是严重违纪，可能被清除出党。这恐怕是研究中共党史以至党建学说的人，碰到的很难也许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样看来，在苏区比较活跃的反而是经验宗派了。但这并非从延安整风到现在的经典说法，因而没人敢这样说；而且也实在说不清。最著名的当算周恩来和项英，但他俩能算一个宗派吗？又怎么个宗派法？作为第一批“钦差大臣”的任弼时和顾作霖在两个大宗派中算在哪边都不合适。至于彭德怀以及其它被别人定为或自己在整风中戴上经验主义帽子的，算不算经验宗派？又是何时参加的？有些什么宗派活动？看来也是一堆糊涂账，那些至今仍在写两大宗派的党史专家大约也是肯定说不清的。

二，说三十年代存在两大宗派缺乏根据

根据以上的叙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并附带作点说明。这就是：第一，中共党史上一直存在教条主义，但并不存在一个从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到抗战初长江局时期的教条宗派，“篡党夺权”之说更站不住。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党章党规。同样，经验主义也很普遍，但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也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经验宗派。第二，被定为两大宗派的重要成员，也是延安整风中被认为检讨最好的周恩来和张闻天，我因在他们领导下长期工作过，所以根据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可以断定他们不是拉帮结派搞派性和进行宗派活动的人。他们的检讨和反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不可看作定论的。第三，党内斗争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团”、“联盟”）和“路线”，多是用来对付不同意见或反对派的两顶帽子和整人的两根棍子，源自苏联（也是教条主义），并有发展，如上纲越来越高，从不同的派别和主张、到反党再到反革命，而且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第四，有必要探讨这一现象的产生和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下面就稍加展开作点说明。

（一）从上层关系看，两大宗派之说不能成立

没有一个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这是很明显的。不但张闻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没有什么宗派关系，进行的不是什么宗派活动，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间也并无充分证据说明他们是宗派关系和进行了宗派活动。一些党史书上的说法，包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最终解释，看来仍然是根据延安整风时的基调和后来中央关于王明问题的决定进行的推测，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据的原始资料。《历史决议》中提到的四中全会前王明等的宗派活动也显得勉强。这些人中除博古外还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联合何孟雄等十几人，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十多天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牺牲。但无论如何这算宗派活动。陈郁因作了检讨才免于开除，送苏联学习。但《历史决议》却赞扬何孟雄，没点名地批何子述等。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来信，他们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显反证就是四中全会上博古连个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捞到，只当上一个团中央宣传部长。按理，会议由米夫操纵，候选名单米夫又以国际的名义加以肯定（据李维汉说是“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21]由于会上有人反对，米夫才说这是国际的意见），选博古以及王稼祥做个中央候补委员应该说是很容易的，何况连刘少奇都从中央候补委员进入政治局。至于毛泽东在《历史草案》中批评的“仅以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22]不少党史著作又进一步说是王明一个人（那一个人呢？）提出博古负总责，却也未提供哪怕一点证据，大约纯属主观臆测或顺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联系，已经是驻国际代表团和临时中央的关系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团长后，就多以王康联合署名。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32年以后，由于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开始进行调整，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于

消息闭塞、感觉迟钝，还是个性刚愎或自恃有远东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来越“左”，因而在一些具体政策和作法上还受到王明的批评。王明1945年4月20日写给六届七中全会的信中列举的有些事例，如通过国际致电中央提议修改在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某些过左之处；不同意乱用“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和乱打党团的许多地方组织与干部；批评反罗明路线扩大化和反对斗争毛泽东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23]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给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评了临时中央的某些过左行为，提到：“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的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举了反罗明路线扩大化为例）”[24]。在博古进入苏区后排挤和打击毛泽东的时候，王明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力宣传毛泽东，并一再制止对毛泽东的排挤。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后，王明当即来信提出批评，说莫斯科对此“很不满意”。[25]直到1937年“十二月会议”，王明还严厉批评博古极左顶峰的六届五中全会。[26]至于他们有无私下秘密联系，并没提出什么有关材料。单从上面这些情况看来，这哪里像宗派关系和宗派活动？当然，他们在总的路线上还是一致的，或说成博古是王明路线的继承者，但这终究不能说是宗派。而且在总的路线上提出不同意见的又有什么人？有何文献证明（事后诸葛亮的某些《回忆录》不足为凭）？

说三十年代党内不存在一个篡党夺权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并不是说王明不搞宗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对后一个问题，由于毫无研究，因此无法来谈。这里只能提一点个人看法和推论：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员首先应推康生。他们两人从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紧密，这方面的情况《王明评传》和《康生评传》以及其它一些党史资料已讲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来信还专门提到康生不可靠。但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并使他扮演了反对王明宗派的英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所以以往在谈两大宗派时从来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泽东先后去世。

至于上引中央通知上说的，1938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活动”，或如毛泽东所说，“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27]这当然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就是李维汉所说的，1938年约有半年时间只是毛泽东个人又处于少数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28]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武汉时期是否有教条宗派的活动，看来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除了王明闹独立性的言行外，当时长江局同中央在一些问题上确有不同看法（那时还没有六届六中全会那些关于统一纪律的规定），而长江局的不同意见，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员周恩来及其它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电书记处批评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未经备案，就是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电报，也是他们联署。[29]其它情况，大多如此。实际上，当时在长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还有周恩来。他在延安整风后也一直在为此作检讨。这不但不能算到教条宗派的账上，而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动。因为有不同意见，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争论，在党内生活中应当看作正常，否则只服从一个人才算无“党内危机”，那就根本无党内民主可言。第二，命令不出窑洞并非史实，只是一种愤激和夸

张的说法（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类诙谐、夸张以至极端的说法甚多，可惜有些党史研究者只从表面了解还真用作凭证，例如说不敢到党校作报告；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投了决定性的一票等，都并非事实）。单从《毛泽东年谱》中就可看出，在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张闻天等人联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不断向各地发出命令或指示，数量并不比以前少。至于处于少数和感到孤立，只是领导层意见一时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现。这在党内生活中特别是战略转折时期和尚未树立起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并不奇怪，而且应该看作是正常的，那种以人划线和个人说了算反倒是不正常。其实，一些意见分歧也不完全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始，在这之前的洛川会议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对国民党态度和军事战略方针上一时没能达成共识。以后一问题为例，毛泽东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一般称为“山地游击战”）。现在看来，他们也不一定就完全错误，不但由于后来有了广泛的平原游击战，而且平型关战役一直受到赞扬，百团大战也恢复了名誉。

列举这些都在于说明，谈了多年的武汉时期的教条宗派活动，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不能说只要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动。何况被列为教条宗派的成员在长江局只占少数，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凯丰反而因反对王明闹独立性而立了功，后来得以成为代张闻天的中宣部长。

由此看来，教条宗派的提法实在站不住。经验宗派也是子虚乌有。特别是像周恩来、张闻天这样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人，哪里会去拉帮结派、搞宗派活动？

（二）周恩来、张闻天不是搞宗派活动的人

三十年代并不存在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还可从这样一个侧面加以证明，就是被分别列为两个宗派的重要成员的周恩来和张闻天在当时中央领导中，包括批评他们的人在内，比较起来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的情况，人们解。这里主要谈一下张闻天，而且只能列举几条，以窥全豹。

1，张闻天被列为教条宗派成员是同人们平时的说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风中批判两大宗派是在很小范围进行的，从未向下传达或公开过。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人们的印象和说法都恰巧相反，认为张闻天为人正直、不拉帮结派。五十年代我就亲自听到过一些领导车场类似的评价。加周恩来、陈毅在外交部党组会上介绍到张闻天或谈到内部工作时也都提到过。在中下层干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张闻天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原驻苏使馆几个干部陆续轮换回部，于是有人反映，张闻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派。记得当时的新闻司司长就在一次会上说，哪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只拉上几个秘书搞宗派的，真是笑话。事有凑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和声势都大于1957年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也正是他以前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只有三个，牵连不大。只是这时的张闻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了。

2，从张闻天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关系上看，他并无派性

前面我们从张闻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关系上认证了他不曾参

加实际上也并不存在的教条宗派，现在再从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关系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也可说是提点反证。这方面也只能顺便举几个例子，要全面论述，恐怕就不是几篇文章所能解决得了的，何况这里只能写一小段。

从临时中央时期，张闻天不但有点看不起毛泽东，而且对之持批评态度，参与了对毛的压制和排挤。这是人所尽知无须多讲的。但这主要是出于当时的教条主义思想认识，而不是由于对毛有成见、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泽东成为苏维埃主席这一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时，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发），被张闻天反对掉了。大家认为，苏维埃主席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经过商议，最后向忠发（可能他正好不想去苏区，怕吃苦）说，“我同意闻天同志意见，……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后经报远东局转莫斯科得到批准。[30]又如毛泽东对张闻天最恼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随博古反“罗明路线”，说他批“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其实并非如此。张闻天在得到毛称许的《反省笔记》中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罗迈反江西小组的斗争则是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31]李维汉的回忆也许可得到点佐证：“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32]

五中全会后，张闻天同博古矛盾不断上升，但却逐渐同毛泽东接近与靠拢。至今还有不少党史著作用《遵义会议文献》上公布的片断材料，说明张闻天到苏区后一年多竟不了解也没想去了解毛泽东。其实这是只看表面文章，并没弄清张闻天写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这在分析张闻天的反省笔记时已涉及）。正是由于在苏区，特别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这段接触和了解，才奠定了他们联合反“左”的基础。以后长时期，它们也有些冲突和误会：毛对张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责与怀疑，如认为长征中张曾支持彭德怀、林彪反过他，批评张政治动摇（指对他的态度），以及常发脾气等，对这些，张都尽量忍让，不予计较。

张对毛有时也有点“教条式”地按原则办事，显得照顾不周，如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在鸭溪会议上撤了毛的职，1938年3月否决了毛不让王明去武汉的意见等。但他们关系的主流还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张国焘的斗争也是如此，后来同武汉长江局的争论中更为明显。在毛泽东自认处于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大约只有张闻天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经过长期合作和延安整风，张闻天对毛泽东已基本折服，虽然此后一直遭到不合理的对待和多次的批评，以至挖苦讽刺，最后彻底打倒，还不准住在北京。但张闻天对这些都能尽量加以容忍，他始终认为维护毛的领袖地位和威信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所以他虽然在路线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对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一直不满，但总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不仅不随便讲，而且仍真诚拥护毛泽东，忠诚执行他的决定。例如他调入外交战线后仍一直做经济工作，曾先后托高岗、陈云向毛泽东反映。后来陈云来信，说主席对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拉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33]对此，他不但坚决服从，而且看不出有什么情绪波动，使人明显感到他已下定决心在“授权

有限”的外交领域干下去，把研究重点转到了国际问题，买的书也以这方面为主。但他仍关心国内建设，还经常向毛泽东反映点情况和意见。即使在庐山会议上栽了跟头，无限期地受到批斗。但他始终好像无怨无悔，仍然向毛泽东反映意见（如关于开放市场问题），连读书笔记和研究心得都呈毛审阅，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总之，从他同毛泽东的关系看，张闻天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会搞宗派活动。

再如对刘少奇的关系。张闻天在临时中央时期是积极参与批评和排斥刘的，他后来对此也一再检讨。但到苏区接触实际后，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逐渐有所接近，如劳动政策等，他也开始改变对刘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陕北，张闻天已认识到刘特长白区工作和临时中央的某些错误（但不承认路线错误），并对刘表示了极大信任，主动提出刘代表中央去领导北方局。此后，张刘之间的信件来往频繁，刘在重大问题上都及时向张请示汇报。有的党史著作谈到刘少奇1937年3月4日给洛甫的信，就过去十年白区工作的错误进行讨论，认为这是刘少奇向张闻天的挑战，甚至说是毛泽东要刘放出的准备清算十年“左”倾路线的气球，后因在白区工作会议上遭到多数反对而暂退却。这也多半是猜测。刘少奇的意见，过去曾多次提过。他在信中也这样说。此时给张闻天写信，可能有三个因素：一是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领导人高文华、柯庆施的干扰；二是张任总书记后作风民主，对过去的白区工作已承认有错；三是张派他去北方局说明了对他的信任，他以为能够发泄郁积在胸中之怨（例如他过去四年就没给博古写过类似的信）。可见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是表明了张刘关系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后来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路线之事又拉开了两个人认识上的距离。据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在延安整风中，张闻天对刘少奇以及几个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枫是有些不满，特别是不同意他们的抢救运动作法（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以刘为首，彭系成员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党校被搞成了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但对他们并无成见。抗战后他就很同意刘少奇代主席时提出的一些战略部署，特别是全国战略方针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在东北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张闻天是个有意见就提、认为正确就一定坚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同刘少奇也还有些争论，如土改问题（他认为刘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左”了）、城市工商业问题、供销社分红问题等。他也受过刘的严厉批评和误解（如邹大鹏1949年5月向刘少奇告状，说他主张“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刘即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加以批评[34]）。张闻天虽然对于刘少奇的严厉态度和误解批评有所不满，但他对刘少奇还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个说来两人关系也始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门户之见。即使庐山会议也没揭发出他有什么反刘言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甘愿自家受迫害，也绝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于刘少奇等人的证词。从张刘近五十年的关系中，实在看不到张对刘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简单讲了一些张闻天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单从这些即已看出张闻天完全不是个搞宗派的人。至于同其它领导人的关系就可以不讲了。当然不是说张闻天同各领导人的关系都一样，那倒不一定。据我所知，他在延安时同任弼时的关系不错，例如对以抢救运动搞肃反和特务如麻的估计，很有意见，但没处说话，就只能向任弼时反映。在领导同志中，他和陈云的关系较好，经过风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后。

3，张闻天的人品、作风和性格决定他不会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触，从后来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张闻天身边工作也有十多年。根据当年的观察体会和长期的研究思考，我总觉得他有点书生气，始终保持着中国一些知识分子那种正道直行、重经轻权、淡泊名位、"君子不党"的一面，也有些经不起正面压力和软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刘英谈起，我说闻天同志有点"教条"，照章办事，过分认真。最近重读他的《论待人接物问题》，[35]感到他真是在尽力照办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于那种"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客气过。而对于那种因过去"有过争论"、"有过恶感"、"常常表示怀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确能做到不予计较，"实行恕道"。像他这样的人，能去追随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吗？即使由于志同道合（何况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会搞，而且学不会。这可以从以下举例中看出来。

张闻天性好读书和钻研问题，不但不善于交际，而且也不愿意多和人来往，嫌浪费时间。即使同中央领导同志那也是公事公办，没事不见。进北京十年，几乎没见过他不因工作去主动看人。有时刘英说，好久没见到某某同志了，咱们去看看吧！他的回答总是，人家很忙，没事去打扰人家干什么。如果说他对毛有点敬而畏，可对刘少奇、总理、陈云、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须晋见外，一般只是打电话请示汇报。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谈完正事就走人，决不多留一会儿。我陪他多次见总理，都是谈完事就告辞了。例如他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准备了一篇八大发言稿《论和平共处》，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来总理审阅定夺。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见到总理，当即说明来意。总理也没接稿子就说，国际形势有陈老总一篇发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讲了。他只是和颜悦色地说了句"那也好"，就拿着稿子回来了，一路上以及此后再未提及此事，也从未表现过任何不满。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万隆会议时国民党特务炸我包机事）发表政府声明，我陪他去见刘少奇，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别人来看他，他也是很少说话，不善应对，要不是刘英张罗，定会显得尴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饶漱石来看他，寒暄后似乎两个人都没话了，大部分时间处于沉默状态。还有就是，同领导同志散步，他也是少说多听。由于和聂荣臻毗邻而居，经常两对夫妇晚饭后相约去北海散步，也经常拉我作陪。[36]几乎每次都是聂荣臻滔滔不绝，谈论时局，议论领导，他却很少吭气，倒是刘英还里面插上几句，我当然不会置喙。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别人谈话，提到国内外形势还发表点意见，但绝不议论领导同志，即使别人谈起，他也是只听不说。给人的印象是，实际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苏联前毛泽东的临别赠言，"少讲话，多请示。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37]总之，经过长期的磨炼和延安整风的洗礼，张闻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风采，变得说话谨慎，没什么幽默感，似乎已不会和人聊天了。无怪乎他在"少年中国"时的旧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为参政员代表团访问延安后，写到对他的印象时说，"张闻天少年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

不仅同中央领导和外来客人，就是和同级与下级干部，他也是公事公办，相交淡如水。和人谈话，最有兴趣听的一是工作，二是学习，没有听到

过他和人扯乱谈。给人印象深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没见过他请人下馆子吃饭，他也没有吃过别人的请。有时留人在家吃饭，但和他们平常的饭菜并无两样。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长比，显得颇为特殊。分工管我们办公厅等几个单位的副部长，逢年过节总要把他分管的单位负责人请到听鹂馆、萃华楼之类的地方吃顿饭，联欢一番。张闻天却是经常在节假日约几个人上公园散步，谈的还是工作或学习，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张闻天家吃便饭。从未见他给人送过礼，也没见到别人给他送礼。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后来驻加纳、菲律宾那样小国的大使，都要经常带点洋货555烟之类给某些部领导（用的当然是公款，甚至有时冒充文件交信使带），但绝无人敢给他带东西。因为人们知道这样做是会碰钉子的。他最看不惯那种曲意奉承、拍马溜须、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风。刚到驻苏使馆，主管总务的参赞用公款给他买东西，遭到他一顿批评。后来还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泽东名义准备给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礼品中未用完的东西如水獭大衣之类送人等事，于是坚决要求将其调走。

张闻天还有个特点，就是不但严以律己，而且对别人也很严，对同级和下级的批评往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职，对过去工作除成绩外缺点讲得更深，更细，因此得罪不少人，有些同志觉得他不近人情。刘英多次说，他真是个书呆子，好像就他讲批评和自我批评。她还举例说，在驻苏使馆他批评前任的“孤岛论”（意为使馆如同地处海外的孤岛，要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当然不高兴，还在主席那里讲了他的许多坏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和李克农谈得很好，李竭诚欢迎他回来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对过去工作讲了不少缺点，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选举时，他的票低于刘晓，一次党组会上有人谈起，他说，“这是民意测验。”后来在下面听别人说，这是由于他在东北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人家一串连就使他少了许多票。但他不以为然，也不在乎。这都说明，从张闻天为人处事、作风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个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实在不会搞，而且也学不会。把周恩来打成经验宗派的头子，甚至认为更加危险，[38]（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数人的偏激之词）同样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张闻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怀疑搞宗派。这是因为他在苏联留学五年，正是列宁死后苏共中央群雄争夺和搞宗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一会儿托洛茨基，一会儿布哈林，一会儿季诺维也夫，而且言词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所以他本来就不善辞令，从那时起就更加谨言慎行，但还是糊里糊涂受了个警告处分。瑞加上后来延安整风挨了整，就越发怕和宗派沾边，万一被上面定为宗派，他也依调检讨，这几乎成了他后半生的一项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领导人不大来往、绝口不谈过去的和中央的事等习惯，看来可能也都与此有关。他怕和宗派沾边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他出使苏联四年，几乎每个礼拜都要拉我上一趟书店，但却从未去参观他过去居住和学习的地方。他不但绝不单独会见过去的苏联熟人，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也尽量避免出面，而让别人去见（包括他原来的俄国妻子）。苏联有个至今仍讲清朝时汉语的少数民族东斡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晋见新任“钦差大臣”，他也是让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它长期在苏养病的人，除刘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带一两个参赞或秘书随行。1953年回国述职（我随行），适逢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毛泽东要他参加。他本想改行搞经济工作，所以欣然从命，并积极翻

阅材料，还应约为高岗起草了一个大纲草案。参加了一段会后，发现会议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泽东早已提到“右倾机会主义”高度，而高岗又显得很活跃，因此他就想躲开。加之他又患感冒，且会期拖得很长，所以会开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参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馆。[39]然而后来还是出了高饶联盟问题。他因在东北工作初期，出于政见不同，曾和林彪、陈云、高岗等一起反对过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后来毛泽东认为彭真犯了方针性错误，遂将其调离，由林彪接任书记）。1955年开党代表会议时，陈云来电话，说中央要他准备发言并作检讨。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风的教训，怕又要加倍算老账，还不如主动检讨的好，于是在发言稿上干脆承认同高岗在东北就有宗派关系。发言稿写好后征求陈云意见。陈云不同意他对东北问题的提法，说在东北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二中全会上主席已作了结论，而且那时的高岗是那时的高岗，不能和现在的高岗相混。后来他在发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检讨警惕性不高，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高岗对他讲的一些话。可是到庐山会议又遇到旧事重提，说“高饶联盟”实际上是“彭高联盟”，他也是“漏网分子”。他一看在劫难逃，又承认是高饶联盟的重要成员了。也就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一方面已下定决心批逆鳞，犯颜直谏；但另一方面仍然视宗派如蛇蝎，生怕被误以为宗派活动。所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事先请他看，他坚决不看；念给他听，也是听了几句就走，不敢听下去。他后来交代说，就是怕被人怀疑为宗派活动。所以他自己的发言提纲，事先既没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没给任何人看过。虽然谈“派”色变，避之惟恐不及，结果还是“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命也夫！

上述这一切说明，张闻天是个没有、不会、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欢顺着自己而不原听不同意见，培植亲信和重用个人信赖的人，以至经营山头和拢络干部等方面，可以说张闻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单纯得多。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一再被打成反党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辈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还遭到党史界一些人的非议？简单说来，这是中共党内历来缺乏民主和长期过火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心胸狭隘（甚至两位最忠于他和至死都在拥护他的人也有近似说法。胡乔木含蓄地称他为“缺少宽容的美德”。[40]黄克诚认为他对人“不能一视同仁，不信朱老总宽厚坦诚”[41]）和大搞个人崇拜造成的牺牲品，是中国社会传统带来的必然产物，也是某种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禀赋、遭遇以至命运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讨论张闻天的教条宗派问题，就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党内外斗争长期存在和说不清的宗派（集团）问题；关系到党史研究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破除个人崇拜传统与学术垄断倾向的学风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特点，等等。个人对这些方面虽然以往都没研究（我一再声明，过去是一直研究国际问题的），但又愿意在暮年以外行的身份参加讨论，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方家。

4，周恩来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关于周恩来，由于我也跟他工作过一个时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从我五十年代跟他工作的个人体会，我认为他也是没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极多，我这里只举几个小例子，以见一斑。他和张闻天有个共同

特点，就是跟他们工作或他们熟悉的人，就越是使用多照顾少，占不到什么便宜和得不到较快提拔。所以当年外交部一些老干部常开玩笑说，在总理领导的部门工作，就得准备“吃亏”，不要说提拔，少挨克就不错了。事实也确乎如此。总理对外交部干部就是要求特别严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干部会上不只一次地讲过，说这是因为他兼部长，对干部自然要比别的部严些，加之工作特殊，安排上可能降级使用，要求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不去和别的单位比。在这种精神下，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调来只当了个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当副司长）；抗战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潘自力，被调作驻朝鲜大使，如此等等。当然，时间一长，也不免会有人发点牢骚。例如乔冠华就是如此。他和龚澎久随周恩来工作，周对他们夫妇二人也颇为欣赏，但却长期没得到提升。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我也算得他们家一个常客，关系甚为友好，所以也能听到一点心声。有的事不但对我说过，我还遇到他对别人谈起。例如他说，当年他和胡乔木并称南北二乔，可现在（指八大后）人家不但当了中央委员还是候补书记，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没出息。意思是连个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捞到。龚澎还曾在会上公开提过，说外交部重视解放区来的干部，不重视国统区的干部。1955年7月，她干脆写了个报告，要求辞去新闻司司长，去国外当记者。时任部长助理兼干部司司长的刘英，转呈周总理时批注：建议派龚彭去当大使，做中国的柯伦泰（前苏联驻瑞典的女大使）。但总理却不同意，对刘英解释说，在现在的形势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西方记者的包围和炒作。最后还半开玩笑地说，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个也是你，还轮不到她。[42]

周恩来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还可从这样一个对比中明显看出。远的不说，单是建国后二十多年，一些给中央领导同志当过秘书或在身边工作过的人，不论时间长短，大多都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级干部（当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来却不然。我认识的一些给他当过多年秘书的或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水平并不低，否则他不要），没有一个被他安排为副部级干部的。其中有几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干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硬是规定：只要他担任总理，就不让自己的妻子邓颖超出来工作，特别是不得在党政系统任职（至于他去世后邓颖超的工作和表现，也并非他事前安排，更与他无关）。将周恩来的做法同江青、叶群之流依靠权势，一步登天，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相比看，人们会有何感想？然而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许多书中为另一种做法辩解和开脱，如说，“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按：从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对江青非常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但还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责任的”。[43]单从这几个具体例子就容易看出，如此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哪儿像个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动的人？

至于说周恩来和项英、彭德怀、邓发，甚至朱德、任弼时等结成了一个可大（可能包括向忠发、张国焘等在内，因为在“两大宗派”中他们只能归属一个，并没说过有更多宗派）可小（朱德、任弼时等除外）的经验宗派，那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怕连它的提出者毛泽东和阐发者胡乔木及其党史界的继承者都没有也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三，对反对宗派斗争的几点看法

这里虽只标明反“教条宗派”，但也包括中国党其它一些反宗派斗争。下面就根据近来学习党史的心得并结合个人所闻所见，提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和建议，作为本文不是结论的结束。

（一）反宗派斗争的必然性和

由于中共党史上并不存在“两大宗派”，延安整风中进行的反宗派斗争，最后实在拿不出多少充分根据，可算得一桩冤案，当然也就不能写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但是那场斗争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一切政治斗争无不党同伐异，也就是毛泽东常引用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一盘散沙的政党是成不了气候的，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设法做到统一意志，统一力量。延安整风运动就获得了两项明显效果，这就是：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后来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通过反两大宗派的斗争，正式确立和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民中的领袖地位和绝对权威。这就有利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取得胜利。那时完全做到了在全国解放军和所有解放区的令行禁止，各地只要一听是陕北指示（包括新闻广播），就会坚定无疑，坚决执行。可见，错误的事情也是能够一分为二的。即如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事后看来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党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风分开，把责任完全推给康生，把有关痕迹尽量去掉（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有关内容全部删去等）。但是它对严格纪律、加强统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有利于培养驯服工具和克服个人主义和山头主义等。

（二）反宗派斗争的由来

在延安整风中掀起那场规模浩大的反宗派斗争，来源大概有两个：一是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一是照搬苏联的作法。中国历史上党争几乎从未间断。一个政治运动或一支政治力量之失败，内争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于一”，就必须削弱异己力量、取缔朋党（宗派）。没有，也要制造几个，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来源恐怕还是学苏联。整风被称为“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但实际上学习内容，例如《整风文献》，就根本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泽东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林在反宗派（集团）问题上可算已盖棺论定，绝大多数都是制造的冤案。跟他学的结果可想而知，冤假错案只能更多。可见，反教条也用的是教条，而且有些本来就不正确或被我们误解。例如对经常引用的列宁关于领袖、政党和阶级的关系，连胡乔木都认为，“这段话确实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44]可是事实上，以前的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从苏联搬来对我有用的一些理论和作法，如“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等等。经过我们的发展，于是：思想认识的不同可

以上升为阶级斗争，不承认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转化，为了维护领导就必须不断挖出上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党宗派（集团）。所以说，“八亿人，不斗行吗？”其后果就是，加强了领袖专政，扼杀了民主，抑制了科学，阻碍了社会发展。

（三）路线斗争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实，“宗派”和“路线”，也是斯大林常用的两顶帽子和两根，经过“中国化”后更发展到极端。因此在讨论宗派问题时也应谈一下路线问题。据说这是当年“左”倾中央经常用来整人的，但实际上后来用得更厉害，简直是谈路线色变。延安整风就是起于路线之争。毛泽东常说，《党书》一出，他们就缴械了，那是因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的警告。[45]但是路线斗争也不能矫枉过正和一笔勾销。事实上，建国后就长期受极左路线的控制，也一直存在着时隐时现的两条路线斗争。庐山会议只是一次大的爆发，恐怕不是邓小平说的，“彭德怀同志那次不能算了”。[46]胡乔木就说过，“毛泽东同志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革命战争得到胜利以后，还想要继续过去所进行斗争的方法。这样就同认为中国现在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头脑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同志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47]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改革开放以后也仍然存在赞成和反对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海耽误了十年，到90年代才起步就是证明。应当说，建国后的“左”倾路线错误是中共党史上时间最长久（二十多年。第三次“左”倾也才四年）、损失最惨重（下面再谈）、影响最深远（改起来不易，过了二三十年影响仍在，而第三次“左”倾在遵义会议后就彻底翻了过来）的一次。为了辨明是非和汲取教训，不妨将这两次“左”倾造成的损失稍作对比。第三次“左”倾的最大损失是失掉几块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被迫长征。（失掉苏区和被迫转移也不能完全归之于主观因素而忽视客观情况的变化。）但转战西北后，也有助于促成西安事变，实现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所以总的看来，第三次“左”倾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除了造成损失以外，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建国后这次“左”倾的损失就严重得多了。例如造成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就很明显。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为4.7%，1980年降为2.5%；从日本的近两倍变成它的1/4；人均产值约从日本的1/2变为不到它的1/20。19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1985年超过36800美元。[48]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占世界经济份额只回升到4%左右，还没有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这就是说，单从发展生产力这点讲，由于路线错误，就使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落后了二三十年，要弥补起来，恐怕还得更长的时间。其它如政治体制和民主改革的滞后、文化和知识分子遭受摧残、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不说各种冤假错案，单是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以三四千万人计的非正常死亡，[49]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等等。有些如经济、生态等用加倍的时间恐怕也还不了账，有些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至于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两个时期一比，轻重也十分明显。例如第三次“左”倾时，毛泽东虽受打击排挤，但仍有工作，仍可参加有权参加的各种会议，并发表意见；而建国后“左”的作法，则是可以随便停止任何党员以至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和过

组织生活，直到剥夺行动自由，迫害致死；党章、宪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国史和党史的人，仍不大注意汲取有关教训，还是沿着老的路子，继续夸大第三次“左”的路线和损失；对这后一次“左”倾，不但不承认是路线错误，还继续弄虚作假、隐恶扬善，人为地拔高成绩、缩小或不提损失。这当然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态度。

（四）反宗派斗争过去长盛不衰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宗派，后来多称集团；反宗派斗争实际上就是各种大小政治运动。邓小平说绝大多数是搞错了。但为什么还久盛不衰呢？有些人当时就知道搞错了、是假的，但还是冲锋陷阵充当积极分子（例如具体办潘汉年一案的领导人当时就不大相信潘是内奸；抢救运动中不少抢救者也说他本来就不信抢救对象是特务），原因大概是：形势逼迫，上命难违，邀功自保，损人利己等。可见这不单是一些人的个人问题，更深层的还涉及到体制问题。过去这种反宗派政治斗争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说的对阶级斗争认识错误和过高估计敌情外，还初步想到有以下几点。

1，在个人崇拜占统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实的政治体制下，往往要压制不同意见，以反宗派（集团）斗争开展工作。胡乔木谈到延安整风时就说，“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当然，七中全会时要换一个写法了不可能。”[50]为什么不可能？他没说。其实就是个人崇拜控制着一切，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说。至于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体一致反右倾、反“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恐怕都是不能不紧跟。胡乔木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还传达陈云的话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许不可能”，并举了“反冒进”的例子。[51]而且只唯上，不唯实，斗争开路，不仅中央如此，下面各级就更甚，往往对持不同意见和不顺着自己的人，就以什么集团为名给搞掉，如陶铸在广东制造的“以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胡耀邦到陕西任省委书记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刘澜涛等批斗得身体都垮了，后被叶剑英带着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对支部书记有意见就可能是反党，一株连也可凑成一个反党小集团。庐山那场斗争可说是反“宗派”斗争的一个典型，从反“左”到反右只在一瞬间。然而总结起经验教训来，却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一种说法是由于个人崇拜和专横独断；另一种说法则是怪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否则，毛泽东“对这些错误是能够承认，能够改正的”，“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52]

2，为了维护领袖专政和各级领导的一元化，做到“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经常扫荡一下有不同意见和不大听话的人，搞反“宗派”斗争。这里说的马克思（其实读的很少）换成斯大林才比较合适。而毛泽东思想和有关政策又是一贯正确的，有所怀疑和反对，那就是反党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显的错误则尽量设法推了出去，如《历史草案》上说，临时中央“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中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53]实则相反，在四中全会前一方面军和赣西南就早已大反AB团。在这方面，后人和党史界也是“青出于蓝”，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抢救说成是康生一手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推给林彪、四人帮等。一些领导人和

党史工作者还硬要强调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功劳和作用，并为他解脱。这说明，到现在为止，党史界仍然是只根据领导意图编写历史和为了维护领袖的威信可以不顾史实。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以往的反宗派斗争，讳言其错误和缺点，更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于是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次比一次声势大，范围广，牵连多，后果严重。例如1959年所谓属于党内斗争的反右倾，就比1957年定为敌我矛盾的反右派厉害得多，这是过来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之多恐怕已无人能统计出来。

3，反宗派斗争和政治运动能够长盛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贯实行的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即无论他们在运动中犯多大错误（整错人、搞逼供信、违法乱纪等），都要受到保护，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因此认错和忏悔者至今都极少见，即使有也是完全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还可得到重用。因为他们响应了领导（或曰党）的号召，容易领会意图，做到紧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级领导就自然使用积极分子及与其思想相同者。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领导权以至人员构成，更要正统下。存在决定意识。许多积极分子由于顾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关，所以他们看问题就容易肯定过去、强调成绩、更多看到运动的积极面，有时也难免夸大和不顾事实；对以往的错误和缺点，则进行回避、缩小以至抹煞。对于运动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点尾巴写进档案，影响到信任和使用（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较容易看到运动的缺点，自己体会到的也多是消极面。因此，多年来的规矩是，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对过去某次运动有不满情绪，所以对他们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尽量多使用积极分子。因而在党史一些问题上他们虽有异议也就很难反映出来。连彭德怀在整风期间受到过火批斗尚且长期耿耿于怀，何况被定为特务而遭到严酷逼供的人。难道彭大将军的觉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风和抢救描写得如沐春风的积极分子和秀才？但是编写这段历史的正是这些积极分子秀才及其继承者，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历史是一种客观过程，何况现代史，人证虽在减少，但物证（除少数销毁者）却俱在，重要情况总是会迟早弄清楚的。

注释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5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3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59页。
[5] 1972年6月11日《周总理关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报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89-390页。
[6]刘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发言。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89-390页；《周恩来传》（一）第315-316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31页。
[8]有关庐山会议的先后引证，均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3，227，232页。
[9]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7页。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2页。
[1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6页。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37页。

[14]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5]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6]《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90-334页；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7]毛泽东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44，346，341页。
[19]《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90-334页；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2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41页。
[2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21页。
[2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23]见《王明评传》，第220-227页。
[24]转引自《王明评传》，第226-227页。
[25]参阅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见《王明评传》，第303页。
[2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2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43页。
[2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2，403页。
[30]参阅《任弼时传》第201页；凌步机：《六十九年前的一次开国大典》，《中华儿女》（国内版）2000年第4期。
[31]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32]李维汉：《在中央苏区》，《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
[33]《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04页。
[34]见《张闻天年谱》下卷，第880-881页；《张闻天传》（修订本），第629-635页。
[35]《张闻天选集》，第202-222页。
[36]由于毛刘周都是晚上办公，他却是晚十点睡觉雷打不动。总理又特别关照，除非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经过外交部这一关，于是他就拉我去顶替，虽不是秘书，平时也得住在他家。
[37]《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14页。
[3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7页。
[39]见《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39-940页；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4-246页。
[4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3页。
[41]《黄克诚自述》，第101页。
[42]《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89页；多次访问刘英的谈话。
[4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7-218页。
[44]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45]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
[47]《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2页。
[48]见《人民日报》，1988年4月6日；另见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第173页；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49]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
[5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8页。
[5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8页。
[52]《中国问题（共党史）》，第213-214页。
[5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再思考

一，对延安整风应该重新研究并进行新的总结

（一）从我学习党史和回顾延安整风说起

从1942年发动全党整风，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也从开始参加整风时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变成此书完稿时的八十三岁老翁。往事如烟，当年许多情况在记忆中已有些模糊，只是后来看到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会经常联想到延安整风，越来越感到那场运动对党和国家影响之长久和巨大。胡乔木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1]因为延安整风没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反而全盘照搬苏联，毛泽东又要做“中国的斯大林”。其实，建国后所发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头些年保持严明的风纪等；也有负面的，从各种运动的折腾到意识形态的严格管理，从政治不民主到丧失经济科技发展的大好时机，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风。所以延安整风很值得进行重新研究，以便寻根究底，找到几十年来导致我们落后和发生一系列严重错误的根源。但我个人过去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对党史一窍不通，虽然不时有点联想，却一直无意问津。只是在1999年初办了离休手续后，想法才发生变化，开始学习党史并写点笔记。原因倒不是想研究党史和延安整风，起初动机只是为了向张闻天和刘英赎罪补过。

“文革”以后，我在回顾以往时，总想到自己过去犯过的不少错误。其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由于中个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图蒙混过关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认反“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还参加了揭发批判张闻天反“三面红旗”，从而造成了终身遗憾，每次去探望刘英时总有羞愧之感。加之后来看到对张闻天的平反也很不彻底，所以决定，作为赎罪之一法，想响应杨尚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2]的号召，写一些有关张闻天的材料，而谈论延安整风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为，这是张闻天政治生涯和人生历程中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就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开始走着下坡路，直到最后被彻底打倒。而且现在看来，整风中对他的批判就已显然不公。这是连胡乔木也承认的。[3]整风中对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党规党法，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发言权）还不如许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领导人的秘书。处境之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他是整风中首当其冲受批判的“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识分子气质以及他们的长处与短处、高尚品格和软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风中以及此后的遭遇和表现，也许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很值得作点调查研究。但是由于上层整风情况一直保密，在我们相处的十多年中，他又守口如瓶，所以这里所谈整风中的张闻天，主要还是根据近年来能够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的过程中，也使我越来越感到对整个延安整风进行重新研究的必要。因为几十年来，对整风运动都是全盘肯定，不仅官方党史论着，就是领导人的回忆，大体上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格，重复着固有的结论，而且纪律严格，舆论一律。这就使延安整风只有伟大、光荣、正

确的一面，而缺点错误却被淡化和掩盖。经常讲的对事物要一分为二，在这里似乎不适用了。比方毛泽东就说，“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一万年都有两点。”[4]那么为什么延安整风的缺点错误就不大讲了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到底应该臬评价还是个问题。何况它的一些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由于没有及时进行科学总结，还被当作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甚至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它方面，包括党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以百年计，涉及中国好几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运。这大约是至今一切权威论述和党史研究都有些估计不足的。例如胡乔木就把延安整风和1947-48年的整党相提并论。[5]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的说法也和胡乔木一样：“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6]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和和新中国建设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运动，怎能和后来的那几次整党同日而语？直到现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7]从历史角度看，这些估计都显得太低，也并不恰当。这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谈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风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对延安整风如果能及早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本可收到发扬积极因素和克服消极影响的效果，但可惜却一直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对上只可隐恶扬善和为尊者讳的封建皇权主义传统，更由于延安整风产生的政治格局和历史结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此后又只能由整风中崛起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及其门生们掌管包括党史在内的意识形态。因此，自然会坚持整风时定下的基调。至于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成了党史研究中的禁区。“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延安整风的研究曾一度出现某种“松绑”，有关文献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紧了，强调党史研究必须遵循两个《历史决议》，即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也就意味着不许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了。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的建党学说，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既要提倡发扬优点和成绩，也应鼓励揭发缺点和错误，这才是一个政党或国家郑重的表现和兴旺发达的标志。因为设禁区、护短，总显得有点顾忌多端，也是软弱的表现。因此对于延安整风，应当和可以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公布有关整风的文件和资料。胡乔木也说，“党史上的秘密，经过一定时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减少，这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8]但我们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规律”，或表面承认，实际反对。如果对延安整风，既不允许自由讨论，许多文件在六十年后仍要保密下去，这就不是一个郑重的党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这自然会使人觉得其中必有问题，总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第二，真正实行百家争鸣，对整风进行重新认识，以便记取经验，坚持成绩，修正错误，而不致发扬不该发扬的传统如个人崇拜、抢救运动等，反对不该反对的东西如自由讨论、独立思考等。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发展，致使建国后

接二连三发生严重错误，最后酿成十年“文革”惨祸，教训不能不说是极其沉痛的。

正是出于上面这些考虑，我认为对延安整风现在也还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和重新认识。“文革”甫告结束，就可以并经得起拨乱反正，何况延安整风已经过去六十年了，总不致严重影响当前政治和社会稳定。但从现在形势看，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还历史本来面目是肯定的，问题只在时间的迟早，也许还得再过三几十年。那么从现在起，适当放宽禁区、允许讨论和发表点不同意见总是可以的吧？中外历史都一再证明，这对党和国家的兴旺只有好处。这就是我想到要对延安整风中一些问题作点探讨，包括对那次运动中的张闻天作点分析的原因。

不过必须声明：第一，我虽然入党六十多年，但没有专门研究过党史，开始学习也是近两年的事，所以不但观点和史实，连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都难免。第二，多数档案仍未解密，我不但无权查档，而且由于年老体衰、路途遥远，连跑图书馆查阅公开材料都不可能了。第三，我虽然参加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个单位，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关全局和上层情况，那时并不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对延安整风作些反思，提出个人重新认识后的看法。如果能够公之于世，引起讨论，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当然是求之不得。否则，作为个人的党史学习笔记，就教于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尝不可。

二，必须分清延安整风的不同层次

（一）现行对延安整风的定性并不准确

过去和现行的各种正式党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风称为“全党整风”、“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等等。[9]如果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流传多年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第一，那次整风并不是“全党性的”，即使就普遍整风而言，基本上也限于干部层，广大的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工农兵党员并没有参加运动。胡乔木就说，那次整风，“其重点是在高中级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主要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10]实际上更确切一点地说，重点还在中央领导层进行的清算历史和路线斗争。第二，整风并不限于“党内”，而是所有党政军民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都参加了的。当时延安的许多机关学校中非党员约占半数左右，还没听说过有什么单位的非党员可以不参加和没有参加整风。作为整风文献之一的中宣部关于开展整风学习讨论的《四三决定》就明确规定：“与非党人员一道进行讨论与检查”，“学校中包括学生在内”，可见并不限于“我党内部”。这倒不是抠字眼，而是要说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种制度化的传统，即凡我们党控制的地区和领导的单位，只要发动什么思想政治运动，一般是不分党内外，大家都要参加的。建国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倾，一再说是党内斗争，但还是有许多非党干部被戴上右倾、严重右倾、右倾机会主义等不同名称的帽子。可见，在党成为单独的执政党后，政治运动和思想战线上是不分党内党外、全党还是全民的。延安整风的作法，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此后适用于全国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风称为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否确切，也值得斟酌。（对这个问题还将专门写篇笔记，这里只提个头。）在必读的从18篇到22篇到最后定为27篇的《整风文献》中，没有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列宁也只是摘了几段语录而无单独一篇。《整风文献》中直接选自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还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冈诺维奇的一些论述或语录。这些，例如《联共党史》，能否算得上马克思主义著作，恐怕得要打问号了。而且有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1]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把延安整风叫做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呢？

（二）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进行

更应强调的是，延安整风不可笼统称为全党范围内的一次运动，主要地还因为它是分成不同层次进行的。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所说，“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12]（引者按，这里的“全党”改为包括非党干部在内的“全体”更合乎实际。）其实，如行细分，还可再分几个层次。例如政治局进行清算历史的斗争，参加中央学习组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就没参与，更不用说外地的高干了。后来对他们的传

达，也是再分层次、有所区别对待的。至于“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也是分为几个不同层次的，编组学习又因人而异。有些政治问题的传达，哪些内容传达到哪一级，都有严格规定，并成为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整风分层次绝不是个形式问题，而是有着目标和内容的区别。长期以来的说法都是，整风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实际上还是上引毛泽东自己说的，是要使领导机关和干部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这是从来都没有什么争论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排除上下两方面的障碍。在上层，就是整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所以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13]对下层一般干部（胡乔木说主要矛头是针对知识分子），是打掉他们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党的驯服工具或“螺丝钉”。因此在上层特别是中央一级，主要是学习《两条路线》，清算历史和进行路线斗争。下层主要是学习《整风文献》，检查思想和交代历史。形式上都是“脱裤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尽相同。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层的整风，而这是经过一个长期酝酿过程的。

（三）上层整风的一些来龙去脉和抗战初期毛泽东同长江局的分歧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也使毛泽东长期受压。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意见得到尊重和采纳，但领导体制确立的却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毛泽东既没有成为核心，有时还处于孤立境地。这最明显地表现在1937年的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和“十二月会议”上。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并未直接出面，只是倾向于支持刘少奇。而刘少奇批评十年白区工作的“左”倾路线造成百分之百的损失之说，竟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后来张闻天肯定总路线正确、只承认犯了许多策略性错误的报告，却得到会议的一致拥护，当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不过事后证明，这个“一致”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并未解决问题，毛、刘的同意也是暂的妥协。八月洛川会议上的分歧直接关系抗战后的政策，影响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红军作战原则。得到张闻天支持的毛泽东主张，抗日军事战略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即分散作战，只打游击，不同日军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主要任务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依托山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所以像后来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没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怀、博古、任弼时等多数人支持的周恩来则提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应当运用当年同国民党打仗时的战略战术，平时打游击战，必要时也打运动战，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发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战时期还应以抗日为主。[14]此外还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估计和对策问题。毛泽东估计，“片面抗战必败”，蒋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须以壮大人民力量为主，将来打败日本主要得靠我们。周恩来等人不同意这一估计，认为蒋不会降日，并主张应当配合下面作战。由于军队急于出发，会议对上述两个问题没能展开讨论和取得共识。只是由于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居间调和，暂时掩盖了双方分歧，特别是改组了军委，使毛泽东正式成为全军统帅（军委书记，也称主席）。但后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几次请示报告都未得到毛泽东答复的情况下还是策划了平型关战役，造成了运动战的既成事实。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战方针为“运动游击战”。[15]接着又是王明、康生、陈云奉派回国后举行的“十二月会议”，连毛泽东也自称他处于孤立地位。这是因为，第一，王明传达的确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其中就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回国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见并面授机宜的，除王明外还有康生、王稼祥、邓发，因此王明不可能随意瞎编。事实上康生、陈云也并未在会上做出更正和反驳。而根据党章，国际意见是必须服从的。因此不能把传达共产国际的方针说成是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也只能说成，“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6]所以，王明的报告不但为会议所一致通过，会上还决定委托王明起草决议。事后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径传达的。如1938年4月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报告时就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连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提的也是，“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17]在“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和毛泽东虽为维护洛川会议精神进行了辩护，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见并作点检讨。例如毛泽东就说，“我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还进一步提出“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对此，他后来在七大会上也说，“我们似曾犯过错误”。[18]第二，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没指名地以山西为例批评没有坚持“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19]与会者的绝大多数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是出于当时的认识（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热情）和对国际意见的尊重，所以较容易接受王明传达的精神。如果说王明的本钱只是“打着国际的旗号”，那么周恩来的影响可就大不相同了。1938年中央和长江局一个时期发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归之为武汉时期的王明路线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对此，这里只谈以下两点。

其实，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长期来虽然对毛泽东的政策思想和作风有所不满，但基本上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派王明回国也确实是为了在工作上帮助原有的领导集体，并无让其“当头”之意。这在“十二月会议”上也是表现得明确的。王明在会上宣布的据说是经过斯大林和国际批准的名单，毛泽东就名列第一。照张国焘说，当时毛泽东“似感不安”，“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王明则“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20]即使张国焘的回忆不足为凭，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不但名列第一，还是准备委员会主席。[21]王明也许有个人野心，至于他被推举为该委员会书记并由政治局委员在决议上一一签名，也可能是出于多数人当时的认识和对国际的尊重。不管怎么说，洛川会议和“十二月会议”的档案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缘故。不过从前后情况大概可以提出两点看法，一是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和作战方针的意见并未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二是毛泽东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否则早已经过修改后编入《毛选》了。

至于武汉长江局与中央的分庭抗礼问题，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王明而言，确有飘飘然不可一世、闹独立性和右倾问题，但对周恩来等长江局多数成员来说，主要还是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延续下来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对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的态度都极为谨慎，而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在原则上同中央意见一致，但对个别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则持灵活态度。1938年初，蒋介石坚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力辞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叶剑英两次联名致电书记处报告情况，并建议接受邀请。但毛泽东和书记处却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办法，不予答复（毛泽东对他不大同意又无把握不便拒绝的请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都是在一再请示而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实施的）。最后长江局决定，周恩来2月6日出任此职，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会议上才加以批准。[22]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时局中发生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在迟迟接不到中央复电的情况下，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员遂于15日再电书记处并任弼时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员，重申此建议。[23]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但还是不得不同意开会。这次会议不但以5:3多数否决了毛泽东关于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汉的提议，还一致同意王明起草会议总结和代表中央起草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建议书电告延安，因未得到答复，遂于3月24日径自送交国民党。一天后中央来电，批评建议书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贺电。4月1日长江局全体成员联名电告中央，说由于来电太迟，国民党临全会已于4月1日结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布这份贺电，以免引起不良影响。[24]

武汉不发表《论持久战》，原因是由于文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等主张“运动游击战”是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所以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25]但长江局领导人的文章，张闻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安《解放》杂志予以发表或转载。对此，毛泽东在1943年九月会议上还批评说，“武汉《新华日报》是王明的派报，而我们延安的《解放》周刊则是党内各派的统一战线报。”[26]

其实平心而论，除王明外，周恩来和长江局其它领导同志同毛泽东等有些不同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而且双方各有长短，并不是毛泽东一切都正确。周恩来等虽有受王明影响的成份，但整个说来武汉时期工作基本上还是正确的。[27]延安整风中以及党史学上一直认定周恩来等在学时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进行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活动，是一种无限上纲和过火斗争的表现。周恩来后半生一直就此作检讨（我就亲自听过他多次谈到犯了三次路线错误的问题），则可能是出于所谓顾全大局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风创立的党史学坚持以毛泽东划线的结果，不能说是完全实事求是的。

延安整风并不像一些党史学家说的那样，好像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事实上，整风的发动和后来的发展，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条件都有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要开展整风，有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个是共产国际的允许或起码不反对。一个是领导层多数的同意。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对国际是必须服从的。因此，如果国际不支持毛泽东为中央领袖，那么旨在

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中的绝对权威和他的政策思想（当时称作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在全党的统治地位的整风运动，自然无从谈起。至于领导层同意的必要，就更不用说了。标志着这两个条件发生根本变化的是扩大的六中全会。一方面是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明确指示；另一方面，与此有关的是包括王明在内的多数领导人提出拥护毛泽东为领袖。后来毛泽东说的"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说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28]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他成为中国党的领袖问题，不然谈不上"虽然有些著作"之类的话。可是延安整风中创立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党史学，提法却相反，认为问题早已解决，因为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这自然是违背史实的。

不过，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并不等于支持整风运动。情况恰巧相反。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为首解决问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长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过去经验"要特别慎重"。[29]后来还曾一再进行干预和提出不同意见。同样，领导层中多数拥护毛泽东为领袖，也并不表明都同意清算历史。因此，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虽然已确立了比较稳定的领袖地位，但也只能掀起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学习运动，为后来的整风作些酝酿和准备，还不能把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改造中央"的条件还不成熟，领导层的认识还有分歧。[30]例如1940年12月几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提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因张闻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后来为中央起草的《论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协"，没提路线二字。[31]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虽然被说成是"整风学习的动员"，但实际上整风并未从此开始，而且报告本身也是过了将近一年才公布。《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这是由于"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领导同志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它没有予以重视，因此，也没有在延安报上宣传报道"。这可能和胡乔木本人谈到1943年4月22日一份党务广播稿时所说的一样，"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一种潮流。"[32]上引《初拟稿》的说法证明，这一"潮流"至今仍在继续。而实际上这多是出于想当然。因为那时帮助张闻天具体主管编辑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就明确说，"当时中央有个规定，重要文章都送请毛泽东同志审阅。"[33]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报刊的头篇，还不分来稿先后总是先发毛的。例如1940年1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在边区文代会上的报告，张作于5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毛作于9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名《新民主主义论》），但在张主编的《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时间，却是毛为2月20日，张为4月10日。说张闻天"没有予以重视"是想当然，还有两事为证，即《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张闻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实，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张在《反省笔记》中所说，他为中宣部起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对马列学院进行改组，先改成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泽东还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

来毛泽东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恐怕也属偏激不实之词。毛泽东这种事后讲事前没有看出或不曾发生的问题，在他一生中是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们的学习》过了近一年才发表，是出于毛自己的精心安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时，开头就有一段说，“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干部会上的一个讲演，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以供同志们讨论”。（注意这里有个“现”字）后来收入《毛选》时这段被删掉了。不立即发表，恐怕主要是作为试探气球，先看一下反应，同时也要有点时间进行整理和修改（《论十大关系》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后才发表的）。看反应，主要还是上述两个条件，即共产国际的态度和领导层多数的倾向。在对这两点毫无把握的情况下，是不会贸然向所谓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涉及国际）开火的。而这两个条件的成熟，则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这之前，只能是紧锣密鼓进行准备，如大抓在职干部学习，特别是延安120名高级干部的学习等。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和共产国际只能集中力量对付法西斯，几乎无暇他顾，既不能过多干预中国党内部事务，还一再恳求中国党在军事上支援（如派军队攻进满洲以牵制日军等）。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和我党力量的迅速发展，都说明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展自己力量、不跟着国民党跑等政策的正确和主张以运动战积极配合国民党作战之类意见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学习，也逐渐使所谓“两个宗派”特别是“教条宗派”的主要人物陷于孤立。这都表明，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客观条件趋于成熟，于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才揭开了中央领导层以清算历史为重点的整风。但全体干部的普遍整风还是半年后1942年春的事。一些党史著作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就开始了整风，那是不够确切的。

可见，延安整风中的两个层次，不但内容和方式不同，而且进行的时间也是并不同步的。虽然普遍整风涉及的面广人多，显得轰轰烈烈，而上层整风则鲜为人知，所以许多党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风，多指普遍整风，什么“全党范围的整风”、“各地整风高潮迭起”等。但实则在历史上意义深远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央领导层小范围的整风。毛泽东也认为整风运动的重点是高级干部。[34]这是必须弄清楚的，谈延安整风也应着重谈这方面的情况。

三，对延安整风也要一分为二

（一）一分为二是对延安整风的客观评价

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一分为二，怎任何问题都应采取两点论。一分为二和两点论，这是他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对这两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应分清“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次流”。[35]根据《矛盾论》，无论是主要矛盾，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转化的。因而此时此地是正确的，彼时彼地不一定正确，甚或可能是错误的了。[36]对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哲学界曾有过争论。不过，我们这里并不是要讨论哲学问题，只是要说明，既然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那么对延安整风运动自然也必须是一分为二，而且还既要看到短期的作用，又要估计到长远的影响。例如有些方针和作法在当时主要起了正面作用，但后来却主要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些方针和作法在当时就不妥当，只是没有认识到，或者出于一时的偏激而矫枉过正，特别是有些问题表面上说的和实际做的或要达到的目的完全两样，表明党内斗争中也讲“权术”。

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延安整风，按理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却没有，看来也很难做到，其中的原因和奥妙是很值得深思的。有些党史书上把整风分作几个阶段，最后有个总结阶段，但在高层整风，那是指为清算第三次“左”倾和路线斗争作总结，并不是指对整风运动本身的成绩和错误如“抢救”等作总结。而且对这样一桩重大历史事件，除非中央领导提倡、允许和亲自抓，是没有哪个机关和哪些人能够和敢于进行系统研究和认真总结的。因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党史研究还是的宣传教育，对延安整风都只能重复已有结论，只讲成绩和收获，不提缺点和错误，自然也难有什么发现和创新。由于整风以来形成的传统和严格的纪律约束，使得许多党史著作、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涉及延安整风的描述，观点多少有些千篇一律、互相照抄的味道。直到拨乱反正以后，研究才一度有所松动，公开了一些档案材料，有的领导人还揭示了部分内幕和提出过某些缺点，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谈到整风的“紧张”和过火的批判，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介绍华北工作座谈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斗和中央党校肃反运动的残酷[37]等。但是整个说来，除对抢救运动还可说一些有限的话以外，对整个延安整风的错误和缺点还是很少有人论及，全面的历史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经验教训就更谈不到了。特别是很少见到有人注意研究这次运动对后来历史的消极影响。

由于始终没有允许并组织深入研究和探讨，至今有关延安整风的著述与教学，总显得有些模糊以至混乱，在不少问题上还存在自相矛盾、真假不分的现象。作为对过去一段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弄不大清楚或者分歧很多，也许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可以“宜粗不宜细”。但如果对当前工作和今后发展有重大影响，那就是需要及早研究解决的问题了。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总结和虚心汲取延安整风的经验教训，才使后来发生许多类似的失误和弊端，

有些甚至变成久治不愈的顽疾。这方面的情况，上文已略为提到，下面还要就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个问题展开加以讨论。

（二）在看待延安整风问题上的偏向

对延安整风既然应该一分为二，那么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就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把当时整风的经验教条化更是有害的。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偏向都还依然存在。下面先举例作点简单说明。

1，全盘肯定论

在看待延安整风上，历来都是全盘肯定或实际上全盘肯定的意见占主导地位。至今所看到的党史论着，除归罪于康生的抢救运动外，几乎都不谈整风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更不谈对以后历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类意见的不够客观不够全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们对整风并不作毛泽东自己提倡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把他的两点论变成了一点论。例如谈得最多的是，“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38]但却总是不提另一方面的事实，就是整风中主要学习的是斯大林及其思想影响下的东西，特别看重《联共（布）党史》。整风在号召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却在强化对另一些问题的教条态度，实际上是以对我有用的教条反对于我不利的教条。如过分强调阶级出身和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掌握政权和实行专政；把政党和领袖的地位推向极端；只注重统一思想、集中领导和铁的纪律，实际上取消自由讨论和民主决策；抑制了活跃思想和独创精神，还使察言观色、言不由衷、摸意图、讲假话等歪风流行。因此许多人，包括周扬、胡绳等，把整风和“五四”、“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并列为三次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运动，显然是不确的。其次，关于延安整风的言论中还存在许多带有夸张和不真实的提法，或者对一些问题只谈抽象命题，不讲具体事实。如许多党史书上几乎千篇一律说的，“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坞打击’相反的。”[39]其实都是重复现成词句，却并未提多少具体例证。至于把整风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描写得如何和风细雨、心情舒畅，以及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原则，更是完全脱离实际。还有不少移花接木、歪曲事实的提法和叙述，如上述毛泽东等三人找王明商谈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事，被说成“为了帮助王明”。由于所说与实际不符，一个人往往也前后自相矛盾。例如在中办机关参加整风运动领导的曹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先说，“这次整风运动很民主，没有抓辫子、打棍子的现象，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坚持了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后面讲到具体情况时却说，“在某些单位出现了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大会。中央党校也召开了斗争大会。”提到抢救运动，更是：“当时气氛很紧张，搞得特务如麻，草木皆兵，所以乱捕乱杀的现象也产生了。”[40]胡乔木更是经常自相矛盾。在称赞整风方针及其在《历史决议》中的体现时，就说要“多引用一些历史文献，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41]谈到“那个决议也有缺点”时，又说“毛主席对决议没有做很多的修改”。[42]还应指出的是，对延安整风运动，许多党史著作不但充满溢美之词，而且有的还对它的作用作了过分夸大，如

说延安整风“保证党在短短几年内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43]“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44]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特别是抗日战争，离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单靠经过整风的我们，漫说“短短几年”，恐怕再多几倍的时间也是胜利不了的。毛泽东就承认，假如没有一要有利的国际条件的综合，“我们能胜利么？显然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45]总之，全面肯定，把延安整风看得神圣至极，把整风中的一些提法和作法当成金科玉律的教条，实际上虚构的成分多。因此，对延安整风的收获与成就，早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做出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判断了。

2，持攻击态度

对延安整风看法上的另一极端是全盘否定和进行攻击。在这些意见中，不仅有程度的不同，而且还有本质的差别，其中有的就是基于个人原因或完全站在敌对立场上对整风进行攻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的有关叙述。他不但把整风说成守全是毛泽东为了整人，特别是整他，还编造了一系列谣言。例如说，毛泽东1941年9月曾向他说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在建立毛泽东主义时，我保留马克思主义，我抛弃的只是列宁主义”。[46]凡是参加过延安整风或稍有党史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绝不可能真实。毛泽东不但不会跟王明谈“建立毛泽东主义”、“抛弃列宁主义”的问题，而且与王明的说法相反，整风中毛泽东倒是很少引证马克思，更多强调列宁关于集中、纪律、政党、领袖等的论述。王明还捏造中央领导通过金茂岳医生对他进行毒害，更是荒诞不经。但是由于王明的历史身份和《中共50年》内容的真真假假，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界。另外，在中苏公开论战年代苏联有关方面编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孙平）着《延安日记》，基本上也属这一类。而且由于署名作者的身份（苏联和共产国际常驻延安的联络员）和整理时可以动用苏方的大量档案，所以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其真实性。其它类似的“研究著作”也还不少。不过完全否定特别是攻击延安整风的材料，多为海外出版。由于对舆论和出版的管理，还没见到大陆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只是一些文章中从不同侧面流露否定的意见和情绪的事例倒是时有所见。

3，其它倾向

还有一些研究延安整风的著作，叙述有根有据，显得比较客观，但倾向有点过分渲染个人间的争权夺利和恩怨相报。例如前面提到过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就多少表现有这种倾向。书中还引用了大量材料、作了仔细分析，也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但多少有点纸上谈兵，在许多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上不够客观，而出于不真实的主观想象。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书中说，张闻天之所以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提法，是因为这与他的政治前途有关，因为这一提法直接打击他和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政治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47]这就不但把问题过分简单化，而且也完全看偏了。

张闻天坚持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一则，这是共产国际的多次结论，而张闻天当时对国际还是极为尊重和崇拜的。二则由于历来

把路线错误看得十分严重，几乎等同于反革命，因此张闻天认为，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虽有许多错误，但总的方面还是正确的，中央和广大干部在艰苦的条件下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说路线错误岂不是将这一切都一笔勾销。出生入死工作了几年还落得个犯路线错误的下场，思想上很难转过来。所以当时党内干部普遍不能接受路线错误之说。即以该书作者在后面详述的白区工作会议为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时，支持刘少奇认为白区工作路线错误的也只有一个华北代表团团长彭真。而参加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反对的，特别是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单是华北代表团就有高文华（原北方局书记，生前一直坚持不同意见）、柯庆施、王世英、黎玉、李雪峰、乌兰夫等。张闻天的观点（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报告）反而得到全体拥护。可见，这显然不是出于个人权力和地位的考虑。

该书所提张闻天同刘少奇的关系，推论张说的造谣他“煽动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的×××同志指刘少奇，[48]就纯属臆测。张在《反省笔记》中几次提到，明白无误地写着王稼祥。事实上，张对刘并无个人恩怨，瓦窑堡会议后，正是张提出和决定派刘出任北方局书记，使他受到重用。刘当时也是很感激的。[49]至于对毛泽东，张闻天在整风中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拥戴和崇敬，丝毫谈不上个人恩怨。就是毛泽东，也不能说他完全是搞“权谋政治”，一切都是为了抓权。须知，在那个时候，从党的领导人到一般党员，参加革命都是基于一定的信仰，决心不惜牺牲为理想而奋斗。投机分子和为个人争权谋私利的是极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延安整风中伤害了那么多人，许多被打成特务的人还没有完全平反（没有做出结论或因结论不适合本人拒绝签字）就奔赴前线和分配各地工作而不讲价钱，更没有叛变投敌的。因此不能把延安整风完全看成上层一些人的争权夺利，加以庸俗化。

2000年12月，王若水写了一篇《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一篇讨论延安整风颇具新意的文章，得到一些人的称许。但我觉得他所设的前提就值得考虑，有些事实和叙述也不够确切。文中首先提到，“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人为赌注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是一种颇为普遍的议论，但却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但“以王明为代表”的提法不准确，而且更重要的是，整风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而是以苏共为模式实现中共的完全布尔什维克化。连胡乔木都说，“延安反教条主义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50]这些都将有另文说明。

这里要说的是，整风一开始，目的就是要“整掉两个宗派”（囊括了以前的多数领导人），确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斯大林”[51]毛泽东领导的绝对权威，恐怕谈不上解放思想和什么启蒙，因而也就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而且用西方的启蒙运动往这时期的中国身上套也不一定合适。依王若水所说，“启蒙运动是要把一切现成的事物带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审查。”那么这时的最高的理性法庭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批判和审查的最高标准就是抗日救亡。实际上在抗战前后的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一个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五四”的启蒙运动，左翼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传布起了巨大作用。许多知识青年就是由于读了一些鲁迅等人的文章和《大众哲学》之类的书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年，进步书刊广泛流行，知识青年争相阅读，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以及憎恨旧社会、向往新社会那

种慷慨激昂的情绪，现在回想起来仍令人感奋不已。正像最近有人着文所说，“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比任何其它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凝聚民心，利用各种社会资源。”[52]当时的中国正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图存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其它阶层都高于一切，民族主义成为启蒙的最重要内容，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所以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大运动已合二为一，甚至可以说救亡就是启蒙。任何先进人物都只能把抗日救亡放在首位，不会置抗战事业于不顾而关门钻研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等等。这次规模宏大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共的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党史研究不能只重视红军长征，而不重视这一过去被称为救亡运动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正是那次启蒙运动，促成了在中国历史上起转折作用的西安事变。而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红军的生存都将遇到极大困难，更谈不上国共合作抗日。也正是那次启蒙运动，把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工农以至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人推到抗战和代表进步的共产党一边。

王若水说的，“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国民党暂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在1939年12月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样，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国民党不但从未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而且1938年下半年就已加强了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和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我们一行人就是这时在从西安去延安的途中被国民党扣押囚禁的。1939年冬国民党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做出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很难起到多大作用。事实上此后已很少有知识青年能通过封锁线去延安（而且不说进步青年，中国整个知青也有限。这是抢救运动后期任弼时按周恩来提供的材料推算过的，这一事实并成为停止抢救运动的一个根据），致使我们抗大只能主要从延安和敌后调干部培训（我当时已留校任助教，对此有亲身体会）。还应指出的是，这次启蒙运动把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推向共产党，他们主要不是来张扬个性解放、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而主要是胸怀抗日救国和人类解放的献身精神，甘心接受民主集中制和严明纪律、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等的教育和锻炼。这是革命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基于自觉自愿参与的，所以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某个人能用整风把一场启蒙运动给“压倒”。至于发动整风的目的和做法有根本性的缺陷，中间又走了很大的弯路，特别是留下了许多影响极为深远的后遗症，那也是由于当时的诸多因素，如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传统、世界共运形势和党实际上奉行的指导思想、建党原则、当时和后来的领导集体尤其是领袖个人的素质等，而不能说成是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被整风给“压倒”了。相反，正是那场启蒙运动，终于掀起全民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洗雪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屈辱。

（三）延安整风的主要收获和成就

延安整风一直被说成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创举，也是国际共运有史以来的创举，对党的建设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这些说法虽然带有一定夸张，但基本上是正确的。确实，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以及整个

中国，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影响的重大、深刻和久远，是近现代史上至今的任何一次思想政治运动都不能相比的。而且这种影响今后还会持续若干年。所以对延安整风的作用、意义和影响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就中自然也包括它的收获。不过应特别指出的是，对收获不仅同样适用一分为二，而且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就是说，第一，许多收获一开始就有它的负作用。例如整风统一了全党思想，但同时也限制了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第二，原来主要起正面作用的收获，后来负面作用逐渐占了上风。如“一元化”领导不但成为一党专政，而且变为党的一把手专政。因此，在谈延安整风的收获时，必须注意到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的“两点论”。由于对延安整风所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后面还将分别进行讨论，所以这里先谈收获的一面。但是延安整风留下的传统，本来就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而且多是互相重复，所以为了不再过多重复，下面只简要谈几点个人体会。

1，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

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才被归纳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和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实际上成为当时拥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范围还得到不断扩大。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自从外国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后，中国就面临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也为此奋斗了近百年，都因为缺少一个既适应时代潮流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思想和在这一思想引导下的革命运动，因而统统失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奋斗和集体努力，才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之际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加上遇到极为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新民主主义秩序尚未得到全面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终究民族独立了，国家统一了，也为有可能实行现代民主和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因此应该说，毛泽东思想胜利地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曾根据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后党的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的权威论述和历史的检验，对毛泽东思想作过如下的表述：“毛泽东思想就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53]这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五十年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后就基本过时了。第二，这里的时代背景也表明，它是在强烈浓厚的中国传统上吸收融合的列宁斯大林理论，而不是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吸收、继承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4]第三，它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不一定适用于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第四，说它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意在强调中国传统与中国特色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和份量，但也包含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一些原理的指导作用，因而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并决定了这一理论和政策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延安整风正处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时期。适应这一形势的毛泽东思想得到全党的认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方法的正确和行之有效。高级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是真诚的，多数人以此为准绳的检讨主要出于自觉自愿。这也是使党的七大成为“检讨的大会”（“多数同志发言是作自我批评”[55]）的原因，不能说完全出于毛泽东的“精心安排”。[56]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干部，因为毛泽东说，“‘犯思想病最严重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57]只要高级干部认同和信服毛泽东思想，全党的思想也就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之下了。即如我们这些去延安的知识青年，那时就是为了要抗日（求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要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实质上也是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并进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因而信仰毛泽东思想如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出于至诚，即使遭遇挫折或受到委屈，对毛泽东思想仍然坚信不疑。所以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次整风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58]

2，牢固确立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体制

无论是当时党的有关决议还是领导人的讲话，都把这点视为整风的最大成果。例如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谈到当时（整风后）的党“同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时，提到的最后一点说，“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59]张闻天在改写党的《历史决议》时也加上了一段话，说“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60]确实，当时的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党找到了自己的伟大领袖，这是为中国革命解决的一个最大问题，从此就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规定的整风的两大目标，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党八股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从深层次看，反对主观主义就是为了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宗派主义则是为了确立毛泽东为全党和全军的领袖。因此正是在整风中，1943年3月进行了中央机构的调整。对此，有的党史著作评论就直截了当地说，“它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是整风运动的最大成果”。“党的组织调整的轨迹是毛泽东、党中央铺设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整风从解决思想方法入手，达到组织上出现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事先难以预料的。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出现这样的结局却是经过多年准备、意料之中的事。”[61]

这个问题的明确解决，就使整个党政军民的最高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人之手，而且各级也都实行了严格的一元化领导，保证了上面意图一竿子插到底。此后不但不会出现像未得到答复就自行发动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以及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就某些问题自行作主那样的事；而且原先各地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也得到根本削弱。这是连外国人也承认的。例如费正清就说，“国民党吃了很厉害的宗派主义的亏。共产党的组织小些，他们能排除宗派主义而取得成功。”“毛应用他的理论框架，在延安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为后来的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树立了范例。这是毛已当政后，不仅为了

巩固他的地位并且为了统一全党和整顿纪律所做的努力。”[62]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已壮大到必须全国一盘棋（抗战期间各根据地还多是各自为战，中央军委一般不直接进行军事指挥），无论政治、军事，都更需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令行禁止。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和绝对权威也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以其中国旷古少有的军事天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放了除台湾外的全中国。凡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工作的人都会体会到，当时确实做到了全党一心、全军一心、全民一心。无论是在哪个解放区，只要听到延安（陕北）电台的评论和号召，都会坚信不疑和坚决执行，更不用说内部发出的指示电报和文件了。如果没有延安整风确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统一指挥，解放战争也可能还要多花一些时间，不会那样干脆利索。但一些人说的中国人民将因此要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则是受个人崇拜影响的过分夸大。还应该看到，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不但对外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内部的地方势力也日益成为严重问题。不但清朝，就是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能做到实质性的统一全国。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才完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任务，实现了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政治统一。而毛泽东正是这个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

3，创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

这里所指，包括“三大作风”，特别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这些都对建设革命队伍和取得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这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重大区别。有关三大作风，应该承认从整风起就执行得并不令人满意。例如说得最多的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就做得比较差。而且越到后来，说的和做的，宣传的和实际的，距离更越拉越大。批评与自我批评存在的问题也不小，似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有着一定的“分工”：一些人只批评别人，自己既不接受批评也不作自我批评（不算一般的应付如“我也有缺点，有责任”之类）；一些人则是在不断地接受批评和作自我批评。至于对整个党和党的中枢领导，除对遵义会议前的历史，此后就都只强调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也缺乏郑重的自我批评。谈到群众路线，即使照正式的说法，后来长期犯错误，也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结果。虽然三大作风在整风中就在理论上不够彻底，后来在实践中执行得越来越差，但是整个说来，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然，这都是从红军时代起就逐渐积累起来的，通过延安整风，得到进一步系统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所提高，并为全党和全军所接受。在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共产党的政权和解放军（包括以前的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为政清廉、纪律严明、宣扬正气、军民一家等，都是中国老百姓过去从未见过的，同黑暗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成为国民党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历来受压迫受欺侮，一旦见到不但不扰民，而且还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军队，自然会心悦诚服。所以在新解放区，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例如日本投降后我们初到东北，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群众不了解共产党，抱着正统观念，欢迎中央军去接收但是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和群众自身的体会，情况就完全变了过来。又如解放军开进一些城市，宁可露宿街头

也不扰民，群众见到或听到后的感想至今都是美谈。那时干部作风一般都做到了艰苦朴素、克已奉公，下乡下厂普遍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吃多占和违法乱纪的很少，贪污行贿几乎没听到过。不但在解放区，连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小工商业者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也都对国民党完全绝望，热烈欢迎共产党和解放军。柳亚子的诗句：“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确实反映了国统区各地人民希望早日得到解放的情绪。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了瓜熟蒂落的事。很明显，对于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延安整风总结出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并使广大干部能够自觉遵守和履行，确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一定成效

正如胡乔木所说，那次整风的“主要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63]“对着教条主义”，也就是“整风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虽然他们大多被划归经验主义，但按整风中的说法，经验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俘虏）。至于“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是广大的一群，已经是或即将成为党政军各方面的骨干。锋芒对着他们，就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用当时和后来党史上的正式说法，知识分子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加以改造，也就是把他们改造成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和党的“驯服工具”。不过应当稍作说明的是，第一，谈到知识分子不光指“新参加革命的”，实际上从严都是连早就参加革命的一起算，被胡乔木称为“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丁玲，[64]就是一位老革命；第二，建国后不久已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一律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里只是依照老的传统说法。由于整风以来的历次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伤害太大，“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人们不再多提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已经变成了贬义词。但以前并非如此，参加革命后，人们还是自觉自愿接受改造的，希望用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代替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因而对毛泽东贬低知识和挖苦知识分子的话（如说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等），也听得进去，并无反感。

其实，毛泽东所讲知识分子的缺点，总的来说，都确实存在，如骄傲自大，个人英雄主义，对工农兵有所轻视，，不大了解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情况，极端民主化倾向，组织性纪律性较差，表现软弱和容易动摇等。陈云在抗大讲《党的建设》时说过一句一时广为流传的话，大意是：工农群众一般小处小气（指处理生活和待人接物特别节俭），大处大方（指舍生忘死）；知识分子多是大处小气，小处大方。这也有一定道理，后来我在打游击和对敌斗争中就深有体会。无论是整风中还是整风后，知识分子对这些不但真心承认，而且实际上也在切实改正。日本投降后，延安的机关干部和学校学员，普遍做到了“听党的话”，“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服从分配，不讲价钱”。由于时间紧迫和人员众多，许多单位分配工作，就是集合起来宣布名单，哪些人去东北，哪些人去华北，如何编队，何时出发，既不征求意见，也不进行个别谈话，散会后即分头做准备工作，没见到还有什么人提不同意见。1940年一位在抗大和我一起做教育工作的同志，和其它几个人被分配去平津做地下工作，他们表示希望继续留延安学习。时任中组部长的陈云找他们谈话，说：“共产党员在艰苦工作的面前，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提意见就

是错误。”于是撤消了对他们的分配，并给予了很重的党内处分。应该说，经过整风，在这次大分配中就再没有听到这类事了。即使在整风抢救中受到很大委屈的许多人，也能以“驯服工具”和“螺丝钉”要求自己，表示要接受考验。

思想改造的成效更加明显地表现在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上，文艺界的变化就特别引人注意。1942年下半年先后展开的肃反（抢救）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蒙冤受屈，搞得气氛极为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决心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掀起下乡运动，争取和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如帮助农民劳动，当扫盲教员、做乡村文书等。毛泽东还竟然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65]这虽然在实际上没执行（像“文化大革命”中停办大学一样，真要执行也办得到），但也足见决心之大和精神、风气。文艺界显得尤为突出，各种文艺形式都在搞大众化、表现工农兵，而且很快做出了成绩，产生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1943年春节前后，《兄妹开荒》（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大化是戴着“特务”帽子参加演出的）、《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秧歌剧曾引起很大轰动。许多老百姓跟着鲁艺的演出队从这村到那村地跟着跑，机关学校的干部学员也是多看不厌。延安整风和其间的文艺座谈会，影响到全国和长远，把中国的文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丁玲在四十年后还回忆说，“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她说的“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66]也并非夸大之词。对《讲话》本身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发挥的广泛深远影响和划时代作用。郭沫若当时看了《讲话》后提出“凡事有经有权”，即文艺既有基本规律和普遍原则，也有适应当前需要的权宜之计。胡乔木认为，这也适用于《讲话》本身。即以基本观点而论，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就批评“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67]但有些概括又确实是普遍规律，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大段引证的文艺来源于生活以及源和流、继承与创造的关系，他就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68]。可见，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需要“一分为二”。

延安整风的收获和成就当然不只这么四条。只是前面已说过，六十年来，有关这方面已经讲得很多，这只要看各种正式的和虽非正式但能够通过审查得以出版的党史著作、无数的传记和回忆录等就可知道。因此这里就不再锦上添花了。同时要说明，写出这一段，也只是要表示对整风应该一分为二；虽无意对收获和成就作全面概括，但却有意反驳那些完全否定整风和把整风只看作几个人争权夺利的言论。

（四）延安整风的缺点、错误及影响

既然对延安整风要一分为二，因此在谈过成绩和收获之后，自然就办到谈它的缺点和错误了。而且我以为，现在需要着重探讨的，不仅是延安整风的缺点和错误，更重要的是一些对日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问题。根据个人的体会和学习，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很好反思。但是由于每个问题都将分篇

展开讨论，所以这里只列出题目，点到为止。

在我看来，延安整风的缺点、错误和长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问题上。

一，延安整风开创了用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并进而造成对一切知识的轻视。在普遍整风中，知识分子作为改造的主要对象，受到坞批判和冲击，使他们减弱以至丧失了敢想敢说、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基本上被改造成领导的驯服工具。整风造成的不信任知识分子和轻视知识的传统与机制，长期影响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二，延安整风贬低了理论学习的重要，妨碍了理论上的发展创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后来影响到全国）的理论水平得不到提高。胡乔木就说，“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新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69]无论从当时情况还是事后影响看，延安整风都不能称为“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是贬低理论学习以至理性思维；也没有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像后来人们说的，而是照搬苏共和斯大林一套。曾经在民主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毛泽东思想，定为一尊后就逐渐趱停滞和僵化，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

三，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还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这就是在对形势（敌情）的过左估计下任意发动一场大规模运动，从动员群众、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引蛇出洞，全面反击、大轰大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然后仓促收尾、甄别定案。事实证明，抢救运动伤害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干部，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延安气氛也从生动活泼变为万马齐喑。但却坚持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遂使类似错误不断重演。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可能还有其它缘故，是否有如《礼记》上所说“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的就服了。钱钟书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的考虑，就值得研究。

四，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得到加强。当时的主要表现可举出以下几点：（一）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着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此后即开始打破，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除王明的《学习毛泽东》经毛阅后见报外，毛的秘书张如心、和培元、陈伯达等已陆续有文章发表。还有选择地编纂《六大以来》，以树毛的一贯正确。（二）以活人正式命名“主义”或“思想”，在国际共运史上可谓只此一家。（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封建迷信称呼和比喻流行全党全国，如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四）党内的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70]开始了个人独断专行和领袖终身制。（五）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使七大成了“歌颂的大会，检讨的大会”。仅以上几点已足证明，延安整风开始并实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党史学界对个人崇拜尽量淡化特别是尽量后推（如否认建国前有个人崇拜现象），本身就是个人崇拜流毒继续存在的表现。

五，延安整风确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一党专政和书记独裁（个人说

了算）法制化。从“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演变为党领导一切。胡乔木说，“简单地说党领导一切这个话，是非常不妥当的。这个话在外延上就没有划清楚。”[71]其实是清楚的，那就是：凡是人世间事，党都要管。事实上，中国的事没有党不管的。一党专政和一元化体制使党和国家不可能有民主，使宪法和党章不过是一纸空文，选举制和代表会制只能流于形式。实际推行的倒是终身制和变相终身制、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以及交接班制。权力的集中和垄断、缺乏透明和监督，既谈不上人民当家作主，还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成为顽疾。

六，整风创立了垄断与管理意识形态的体制及其表现形式延安文风。前者如限制言论与出版自由，严格的审核检查和“舆论一律”，新闻管理和限制人民的知情权等。后者其实就是一种新八股，如预设前提，不留商量余地，只下结论，不讲根据，以及空话套话等。

七，既然谈党史，下面还将专门谈一下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榜样作出的《历史决议》，和以此为基础创建的中共党史编纂学。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贯穿着突出个人，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拜精神。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和修改上十次的《历史决议》，[72]为党史学以至整个现代史设定了框架和体系。党史的研究和写作，虽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动，而且“只此一家”，不许争鸣，遍设禁区，不得逾越，使党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为一门不讲科学的学科。

八，整风造成工作和时间的重大损失。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对中国革命极为有利。这时苏美英忙于打仗，对我均有所求。日本虽为巩固占领区不时发动扫荡，但主要对付的已是美国。原估计的“片面抗战必败”和“蒋必降”证明不确，国民党全面反共打内战也无可能，且日益失去民心。正是此时我们却集中力量搞整风，全党主要领导干部调回延安算历史账，不但没能更好抓住发展机遇，还耽误了正常工作和学习。其实，整风前全党以毛泽东为首的团结统一已得到不断加强；说新党员多必须整风也属奇谈。花三四年时间搞整风，理由并不充分。蒋南翔也说，单是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就“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

以上列举，只是个人认为特别值得讨论的几个问题。而且如同上面谈整风收获时所说，这些缺点错误和负面影响同样应该一分为二，特别要重视其转化，因此必须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这正是延安整风所没有做到的，需要接班人补课，而不是只在原有的框架内打转转，继续重复前人的叙述和结论。

下面就分别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

[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2]《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1997年3月22日，见《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3]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60，288，297页；《回忆张闻天同志》，《胡乔木文集》第三卷1993年版，第384页。

[4]《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第740页。
[5]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简史》，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9]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2001年版，第68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611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第197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卷，1993年版，第4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994年版，第188页，等等。
[10]《整风问题》，《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12]见该书第188页。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61页。
[14]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8页；《周恩来传》，第45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页；《彭德怀自述》第223页，等。
[15]《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彭德怀自述》，第222-223页。
[1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755页。
[18]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70-72页。
[1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3页。
[2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5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406页。
[22]《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401，406页。
[2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3，404页。
[24]王玉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5]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92页。
[26]见张闻天：《反省笔记》。
[27]《周恩来传》（二），第520-521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231页。
[29]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文献和研究》1986年版汇编本，第70-71页。
[3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3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35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2-763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1页。
[3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3，53页。
[33]吴亮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见《怀念刘少奇同志》1980年版，第290页。
[3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3页。
[35]毛泽东：《反对折衷主义》（1965年12月），转引自《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3年版，第669页。
[36]参阅《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2-323页。
[37]《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73页。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2001年版，第70页。另见该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5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3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48页，等。
[39]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1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4-615页。
[40]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中共党史资料》，1996年6月，第58辑。
[4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
[4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5-86页。
[43]《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57页。
[44]马文瑞：《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延安整风五十》，第2-3页。
[4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4页。
[46]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
[47]见该书第92页。

[48]见该书第87，116页。
[49]张闻天夫人刘英1999年以来同本人多次谈话（多有录音），如该年6月10日的谈话等。
[50]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5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52]仲崇东：《全球化与三大意识形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他认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又是三种不同的政治运动，还是建立在不同意识形态之上的不同政治制度。”其中“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运动”。
[53]何方：《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见《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后收入《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54]毛泽东：《认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7页。
[5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6页。
[56]如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9页。
[5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8页。
[5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8页。
[59]《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页。
[60]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566页。
[61]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287-288页。
[6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303页。
[63]《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页。
[6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4页。
[6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0页。
[66]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作于1982年3月），《丁玲文集》第五卷，第283页。
[6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0，58页。
[68]钱钟书：《宋诗选注》1982年版，第16页。
[6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70] 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时，毛泽东被选为三人书记处主席。这是关于书记处工作章程的规定。
[7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9页。
[7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6，72，312，328页，文献全称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3]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000年5月23日完稿2003年11月作了修改）

第八篇 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

一，知识分子成为普遍整风主要对象的原因

前面的笔记中谈过，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上层整风的对象即毛泽东说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cclxxvii]，实际上主要还是中央一级对“左”倾路线的清算。普遍整风的主要锋芒，就是胡乔木说的针对着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cclxxviii]（如前所述，实际上早参加革命的也不例外）。但什么是知识分子，都包括哪些人，却一直是个不大明确的概念。延安整风时对知识分子含义和范围的理解显然宽泛得多，既不是限于列宁、考茨基论述的那种同无产阶级存在一定对抗的靠个人奋斗立足于社会的“知识分子阶级”[cclxxix]，也大大超出广义定义的知识分子范围（即有知识有文化和有某种技术专长的人）。那时投奔延安等地参加革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除少数作家、学者和一小部分大学生外，绝大多数是高初中学生，甚至还包括一些小学生。因此，就其主体而言，也许称为知识青年（如同“文革”中下放的“知青”）更合适些。正是那时的这些大小知识分子（由于绝大多数系1938年参加革命，所以通称“三八式”干部，其实也包括1938年之前和以后参加的，例如毛泽东就常把“一二·九”运动的几位学生领袖也称做“三八式”），先后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建国后头三二十年，各条战线上的中下层主要骨干。

那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成为普遍整风的主要对象而总是挨整呢？

现在要讨论的是，不仅延安整风，就是历次的政治思想运动，知识分子都首当其冲。而且在平时工作中，对知识分子也总有点不够重视和信任，“文化大革命”中更被称为“臭老九”。所以对延安整风中“主要锋芒针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有必要多说几句。现在想来，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原因是否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国际共运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

这大概是基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般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的缘故。上面提到的考茨基的论述就是证明（考茨基后期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也说，“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意志萎靡、动摇不定……。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cclxxx]事实上，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对知识分子就很不重视甚至加以排挤和打击，因而造成流亡国外的高潮，其间约有200万到250万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的人自愿或被迫离开苏俄。[cclxxxi]这曾是高尔基和列宁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列宁临终前的口授“遗嘱”中还特别提到要扩大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增加工人的名额。共产国际对各国党也是一再强调在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上要特别重视工人。对中国党不但经常提醒，还直接干预。例如党的六大，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和米夫的坐镇指挥下，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政治局和常委的主席（四中全会改为总书记），五个常委中有三个系工人出身（即向忠发、项英、苏兆征，另两位为周恩来、蔡和森）。中国党不但接受

共产国际这一“左”的理论，还有所发展，而且越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越强调“出身论”。这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他有一句名言，“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cclxxxii]他对知识分子也确实从轻视发展到了“敌视”（胡乔木语）。包括中国党在内的国际共运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和态度，似乎有点近于悖论。因为在理论上，不但列宁讲过，历史也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只能由有渊博知识的知识分子创立，并且还只能经由知识分子传播才能和工人运动结合。这就是有名的“灌输论”。在实际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者和历代领导人，绝大多数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中国更不例外。对这一现象历来的解释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是背叛了原来所属的阶级而自觉地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只是有的人转变彻底，因而立场坚定；有的人转变不彻底甚至发生倒退，因而犯严重错误直到“叛变”，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陈独秀等。这种把政治思想问题直接和人的出身联系起来，如同刘少奇在作为“整风文献”之一的《论党内斗争》中说的“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cclxxxiii]一样，排除了经历变化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显然都是过分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不过这里不拟多谈理论问题，只是顺便提出来，希望引起讨论。

（二）中国党背负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传统

在封建时代，作为“士”的知识分子，虽为“士农工商”之首，社会地位在劳动人民之上，但却依附于统治阶级，缺乏独立身份，而下层读书人如落第秀才、教书先生，更被人看不起，成了所谓“九儒十丐”。统治者也常对知识分子视之为隐患，用之如玩物。“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还算不错的，更有“焚书坑儒”、兴“文字狱”、“株连九族”等。而知识分子也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即使爬上去，仍然自视为统治者的附庸，什么“文死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韩愈替文王写的检讨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到了林则徐，还说“谪居正是君恩厚”。就是这样的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而且直到近代，中国也没有经过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争取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更没有实现现代化，因而封建流毒依然既深且广。

既受国际共运影响，又有中国传统的沉重包袱，这就使中国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表现得比苏联还“左”，而且越来越“左”。事实上，中国党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就一直对知识分子表现出轻视和不信任。早在1928年，毛泽东主持的湘赣边“洗党”，就把重点定为地富出身的知识分子，“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cclxxxiv]开始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在毛泽东领导的一方面军和所辖的地方打“AB团”中，杀掉的中小知识分子就不知凡几。其中有些人只是由于政见不同如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或因对领导有意见如黄克诚师的宣传科长何笃才。也有些人只因偶然机会而得救，如傅连璋遇张闻天，黄克诚遇彭德怀，胡耀邦遇冯文彬和顾作霖等。陈丕显的哥哥因当小学教员被打成AB团遭处决，陈丕显因没文化就未受牵连，活了下来。至于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四川、邓发在闽西、夏曦在湘鄂西，残害的知识分子更是无法统计。著名的大知识分子瞿秋白，从四中全会起就一直挨批斗，后派往中央苏区，高层仍无

人接近，连自称崇拜鲁迅的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并不多和他来往交谈，长征时又被“三人团”强行留下。在他就义近三十年后，还因那份自我解剖的《多余的话》被定为叛徒，直到“文革”后才平反。[cclxxxv]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连毛泽东也曾承认过。例如他说，“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cclxxxvi]“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cclxxxvii]可惜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接受这些教训，不久后的普遍整风以及肃反抢救，就又把主要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cclxxxviii]即使入了党，也还是有点不大可靠。毛泽东说的：“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cclxxxix]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化人说的。知识分子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变成无产阶级思想，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改造（胡乔木在毛泽东审改过的《解放日报》社论中曾比之为脱裤子和割尾巴[ccxc]），要一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语）。不仅如此，矛盾还会转化，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改造就可能走向反党和反革命。整风中的肃反，对那么多的人怀疑，也是源于这种认识。中央书记处1943年12月22日会议承认反特问题的偏向之一，就是“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ccxci]建国后更把知识分子提升到资产阶级范畴，他们也就越来越倒霉了。

（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

一方面，知识分子确实存在许多弱点，且不说以前强调的阶级立场的转变，即以思想和生活作风而论，如上文所说的自由散漫、骄傲自满、脱离实际、崇尚空谈、个人计较、容易动摇等，在革命队伍中就很不适应。对这些，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也都承认，并深感思想改造的必要，而且真心接受，毫无抵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知识分子感觉锐敏、意见较多，不容易变成完全的“驯服工具”，因而不受多数领导者的欢迎。知识分子感觉锐敏，这是由于他们知识较多而带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列宁在论及大学生时就说过，“大学生是一部分最敏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了和表现了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派别利益的发展。”[ccxcii]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人们关心中国向何处去时也说，“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ccxciii]知识分子不但看问题锐敏，而且还总要表现出来。毛泽东说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ccxciv]就主要指知识分子，容易看出问题，并且有意见就提。这本来应视为优点，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应该说，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就是建国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一般的特点都是满怀爱国激情，向往民主自由，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独立思考，还往往正道直行，仗义执言，看不惯等级和特权，显得意见多，不安分。乍一看，这些都是不坏的品格和素质，但实际上却经常碰钉子，不容易行得通。因为一则，这些人多是初出茅庐，对革命队伍的道理和规矩知之甚少，又缺乏革命实践，所以看问题有时

也容易失之偏激。而革命队伍却需要统一思想、严格纪律，因此他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二则不但言多必有失，而且许多领导人还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根据前面所引资料，毛泽东本人就“不愿听不同意见”（田家英语），“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黄克诚自述》）。而知识分子却大多不黯世故，不够含蓄，直来直去，有话就说。有些水平高的知识分子还强调和坚持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有些人不但爱提意见，还讲话尖锐甚至刻薄。这自然容易引起领导的不满，有时就被上纲为反领导。要理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使知识分子学会“循规蹈矩”，做党的“驯服工具”，就必须加深他们的“原罪感”，磨掉他们的棱角，彻底改造他们的思想和作风。否则就是毛泽东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所以“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ccxcv]这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然性。

（四）出于对党内主要不良倾向的估计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就曾一再指出，“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的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ccxcvi] 1937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虽然，毛泽东后来对自由和自由主义也作过解释，说：“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ccxcvii]而实际上，岂但党内，在革命队伍中以至党领导的地区，自由主义也是不合法的。而且思想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区别也从来都模糊不清。延安整风后党内有无思想自由，以及如何界定，也值得考虑，恐怕至今都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普遍整风主要整自由主义，则是越来越明确的。党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第一是因为我党接收了约七十万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不论来自哪一阶层，都未受过马列主义的锻炼，他们带来了浓厚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其中尤以许多知识分子党员表现得最为严重。”[ccxcviii]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自由主义的主要载体，普遍整风以他们为主要对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里需要稍为一提的还有，整风在知识分子中并未多提反宗派主义。因为所谓反宗派主义是有特定含义和目标的，就是整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宗派。对于知识分子，虽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延安的作家也确实分派，但反宗派的重点并不是他们。何况普遍整风的主要对象还是广大中小知识分子，当时称得上“文人”的也不多。而这些中小知识分子，当然也是喜欢和志同道合、谈得来的人接近，但却并不搞宗派。而且那时同志间的关系真是不分地区、不论年龄、不计学历，都能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亲密无间。有的同志调走，欢送会上哭鼻子是常有的事。但是有些党史书，为了说明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延安普遍整风的必要和正确伟大，就尽量夸大那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毛病，不但把他们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写得如何严重，而且还要给他们戴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如说，“有些人还搞小宗派，从上海亭子间来的是一伙，从桂林、重庆等‘大后方’来的是一伙，从香港、南洋作

秘密工作的也是一伙，从不同学校出来的如北大的、清华的、北师大的也结成小圈子，不愿和其它学校出来的人在一起，文人相轻的习气很严重。”[ccxcix] 这种现象不但闻所未闻，也不可想象。事实正好相反，分成两派的少数作家恰巧都是来自上海亭子间。在这里特别提出这点，是因为近来看到不少写延安整风的书或文章太不真实。事实上，普遍整风批判的主要是自由主义，并没有提什么搞宗派，只是后来制造了几个反党小集团冤案就是了。

二，普遍整风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有关延安整风的研究、回忆和“实录”，几十年来出的书籍、文章已实在不少。而且由于对中央一级整风一直实行严格保密，能写的基本上又都是普遍整风。所以一般情况，人们都大体了解，无须重复。但是也要看到，有许多对延安整风的论述和描写，只是根据一些有关文件、领导人讲话（有的还经过事后修改）和很多领导干部或积极分子的回忆录，以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只要加以综合甚至照抄即可，却忽略了在运动中的口号和实际、做的和说的，往往并不一致。只看官方的文件和说法，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例如每次政治运动，都说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同意，可以申辩；对事不对人，等等。但是，只要是过来人，对这些都是心明如镜的。即以中央级的党内斗争而言，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能申辩吗？更不用说反批评了。正是由于看到一些研究延安整风的书有点纸上谈兵，所以也想对普遍整风的实际情况作些补充和辨析。虽然在此无意写个人的回忆，但由于要谈延安整风，特别是普遍整风和抢救运动等，却不能不联系到个人的某些经历和所见所闻。不过我参加普遍整风，只限一隅，整个情况仍了解极少，这里谈的一些情况，也可能失之片面，因此写出后已先送请一些老同学和老延安审阅指正。

（一）关于学习文件

整风开始后，大家（这里和以下都主要指：先是抗大三分校和军事学院俄文队，后为俄文学校和外国语学校俄文系的许多同学）对于所发学习文件还是认真阅读和积极讨论的，但对文件本身一般缺乏新鲜感，没太大兴趣，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这是因为：一则大部文件都曾读过，而且翻来复去老是那些材料；二则有些文件既不大懂又觉得与己无关，如一再强调要高干学的“十八条”（《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就不容易弄明白；三则觉得自己不写文章，谈不上什么“党八股”。许多同学在业务学习与整风学习各占一半的头两三个月里（1942年4月到6月），实际上主要精力和兴趣是放在学俄文上，甚至开整风讨论会时有些人也在偷背单词。但到同年7月，根据中宣部和中央军委指示，学校停止业务学习专门进行整风。[ccc]此后两年多大体上是一半时间整风审干，一半时间劳动生产，安排学俄文的时间很少。整风和劳动虽然安排得很紧张，总还是有一定的休息和空隙。在大反教条主义之后，基本上已没人再读马列了。于是一些人就利用业余时间争相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名著，以至古文诗词。比起来延安后那一段时间学马列和转业后学俄文，整风学习在我校（以至一般机关学校）并未形成高潮。实际情况恐怕不像有些书上说的“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在整风期间，窑洞的灯火比平时亮得早，比平时熄得晚”。[ccci]前面的抽象形容也许还可见仁见智，但后面的具体描述却不会真实。因为当时延安除首长和特别部门供应洋蜡外，一般机关学校都是限量发土炼煤油，只能晚上点一会儿（连“抢救运动”中的“车轮战”也是在外面分摊摸黑进行），不允许“亮得早”、“熄得

晚”。而且那时挖的窑洞，土炕占一大半，一个班开会也多是坐在炕上（没桌子可以围坐），大冒黑烟的煤油灯，点着了就放在洞壁的土龛里，哪能看成书。我们单位有一阵倒是批评过读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导致情绪消沉，但没听说过哪个单位把“读书太晚影响了身体健康作为缺点提出来”。[cccii]普遍整风开展后的两个月，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已经说，“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成效。”[ccciii]但基本上仍然是这些文件，此后又学了两三年，自然不容易引起“如饥似渴”的热情来。当然，整风期间，总学委和中宣部也曾随时通知学习新的材料，除作为补发的几份整风文献外，多为与时局有关的材料，但往往也是用的时间太多。如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就学了一两个月，[ccciv]以至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1943年在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为揭发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和认清三民主义，曾印发过一批材料，记得其中还有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致大隈重信书》等，也学了个把月。1944年学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均当作整风必读文件），也用了几个星期。翻来复去总是讨论和阅读那几个文件，实在很难掀起一些人形容的那种学文件的热潮。

但这并不是说大家不同意文件的精神，更不是说学了没用。相反，学习文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是很重要的。对照文件，大家对自身存在的弱点认识得更深刻了。经过这场锻炼后，在实践中也确实改正不少。其实，在投奔延安和学习一些马列后，这批“三八式”知青就已下定决心革命到底并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也有了基本的组织性纪律性。每次抗大和陕公等校毕业分配，都是要求上前线，听从组织安排，就是证明。抗日和反顽斗争中，许多知识青年的英勇悲壮表现也不是偶然的。因此不应贬低整风前革命知青的觉悟，而无限夸大整风对改造知识分子的作用。至于胡乔木说的，“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cccv]不但有点神秘化，不着边际，而且还是对广大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对“大量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的大不敬。怎么能说他们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伪装的”？何况胡本人后来也不承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cccvi]

（二）关于联系实际

延安整风的重要特点是强调联系实际。上层主要联系的是清算十年前的第三次“左”倾和抗战初期的右倾，并以人划线，检查各人的站队。针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整风，则主要是联系自己，用整风文件的精神反省个人的思想和历史。《四三决定》的第一条就提出，“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cccvii]毛泽东也说，“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cccviii]联系的目的，除为了审查干部外，主要还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强调整风的重点在自己。他说，“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cccix]这些精神，均为一般干部所了解和接受。所以整风开始后，大家都能响应号召，联系实际。一方面是个人检查思

想与交代历史以及相互批评。另一方面就是对当前现实和领导提意见。例如我就曾给贺龙写过一份书面意见，认为从一二〇师调来培训的干部，除军事学院给他们和大家一样发一套衬衣外，一二〇师系统还另发一套，这种做法不符合反对山头主义的精神。贺龙还派人来向我作过解释。总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个人检查思想或交代历史，还是对上级提意见，一般都是严肃认真和心平气和的。自我批评也大有进步。以前我们在抗大曾实行过五分钟检讨制，即在睡觉前每人反省一下当日的思想和言行，内容多是日常小事。由于为省油不点灯，基本上是躺在炕上讲。说五分钟，只是言其简短，实际上无法计时。那时连队没有钟表，晚上轮流站岗都是以烧香计（烧完一根香换岗），何况开会。整风后经过学习文件，检讨和交代就深刻多了。特别是交代历史，不但更为详细，而且还坦白了一些过去对组织不够老实的地方，如填表时多报学历或提高家庭成分（说穷了怕人笑话），夸大曾参加过的救亡和进步活动，以及隐瞒某些事实等。[cccx]总的说来，整风前期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后来也出现过另一些偏向，如对历史问题越抠越细，弄得自己前后矛盾，说不清楚。或者走极端，有的人为表现积极和交代彻底，就对个人过去的思想和历史尽量上纲上线，甚至瞎编乱造。这些都给尔后的肃反带来很大麻烦。

至于对工作和领导提意见，当时同学们意见最多的是官僚主义和1940年后较明显的特权和等级制，普遍感到上下和同志间关系不如1938年前后那样平等和融洽。对一些特殊待遇，如一样进校学习，某级以上干部可以带警卫员和勤务员等规定，特别反感。这倒不是一些人说的，知识分子同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和相互看不起。其实，知识青年初来延安，对长征老干部普遍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即使相处几年后，这种感情也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对越来越明显的等级制和某些领导的官僚作风颇为不满。因此，我们学校，同其它知识分子成堆的院校一样，开始时多数人同情王实味《野百合花》的观点。后来《野百合花》作为反面教材印发下来讨论时，仍有不少人一时转不过弯来，直到领导上一再指出和延安对其形成声讨之势，大家才转为参加批判和进行检讨（前后也不过二十天）。但也就是从这时起，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发生了明显转折。

（三）告别和风细雨

一些人谈到延安整风，总要描绘出一种和风细雨的气氛。如果指整风前期的几个月，也确实如此。当时领导上对普遍整风采取的是“放”的方针，提倡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四三决定》规定：“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在规定检查时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cccxi]两个多月后中央总学委还提倡：“各单位的墙报，要注意开展思想上、工作上的争论，对于投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应刊载，不得抑制。”[cccxii]实际上，普遍整风的开始阶段，在讨论中大家虽然也联系自己，但兴趣和争论多在对现实和领导提意见上。只是《野百合花》事件和整风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的斗争，才改变了（不是急刹车，其它机关学校还是继续“放”了一阵后）普遍整风的方向。因为毛泽东读了《野百合花》就极为愤怒，“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

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做出深刻检查。"[cccxiii]后来听王震看过中央研究院墙报的汇报后，他也连夜去看，还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断言："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cccxiv]不久后，各机关学校就普遍发动了对《野百合花》的批判，整风运动的形势也随即变得日益严峻起来。运动的风向能够迅速改变，说明党员和干部还是听党的话的。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纪律约束，还有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即以中央研究院为例，整风开始后的两个多月，经填表统计，全院研究人员中同意或部分同意王实味言论的占89%。但在院领导李维汉的总结报告后，不出一周，多数人的态度就一下转变过来，原来的座谈会也很快成为对王实味的揭发批判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就有七十多个单位的一千多人前来旁听。[cccxv]

王实味事件后，普遍整风联系实际的重点已从提意见转为各人的检查交代，讨论会也就变成了思想斗争会和历史清查会。而且这种检查和交代是可以没有尽头的，如果领导上不扭转方向，大概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如思想检查，一旦被定为重点，就总是过不了关。而追查某些重点对象的历史，更是越搞越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大约除组织上确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有所恃外，广大干部各自考虑的已主要是自己的问题，准备会议检查和写反省笔记。写反省笔记，被毛泽东宣布为"铁的纪律"，"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cccxvi]就是领导上看了认可才算。许多人对一再填表，写笔记和自传，实在感到有点头疼。1942年底，总学委又发出肃清"小广播"的通知，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调查表"，内容包括自己散布的和听到别人的"小广播"。本来在思想检查中的揭发批判和历史交代中的质问追查，就已使同志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现在一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互相间也不敢再随便聊天谈话了。所以从1942年夏秋起，已谈不上什么和风细雨、畅所欲言，整风的重点也随之转移，普遍整风实际上进入了以审查干部为主的阶段。而作为群众运动，审干、肃反和抢救实际上又是很难分清的，后来人们也就统称之为抢救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普遍整风不过三年，胡乔木却说，"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cccxvii]我个人的感受也确实如此。而且一些人因特务嫌疑被抓起来坐班房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甚至直到抗战胜利。还不算一些人长期没能得到甄别的问题。

一些谈延安整风的书，都要把整风分为几个阶段，如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以及检查总结等阶段，每进行完一个阶段，还要考试。其实这多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是联系到深挖思想和追查历史后，已分不清什么阶段了。例如我们单位，在学习文件阶段，大体上还能依据计划，按部就班，比较平稳地进行。整顿党风，似乎也宣布过计划，但因为重点已转为联系各人的思想和历史，学习计划就自然成为具文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一变而为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追查历史。学校已再也组织不起各种集体活动如时事报告、教唱歌、出墙报、同别的单位联欢等。这就分成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些党史著作或领导人的回忆录，大多畅言延安整风如何开展民主，如何生动活泼、心情舒畅、言者无罪、治病救人等等，如果是指前面一个短时期，倒还可以；如果包括后来两三年，那就只能是不顾事实的向壁虚构了。实际上对后一阶段，过来人一直是心有余悸的。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一次提到整党时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两个问题总

犹疑不决。一是整党，一听说整党就害怕，因为几十年搞整党没有哪一次不留下后遗症。这一次恢复了延安整风前期的好作风。”[cccxviii]这也证明，延安整风分前后期，而且后期的作风不好。

大约是出于领导上有计划的部署，普遍整风很快转为肃反。有所谓“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cccxix]之说。因此，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应包括肃反抢救所起的威慑作用。有关抢救运动，下面还要专门进行讨论。这里只是要说明，谈整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必须把抢救考虑在内的。

三，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些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对现代的中国革命、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正是那次整风和通过思想改造培养出大批干部，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后来搞了三十年上下的社会主义探索。这方面的论述已是汗牛充栋，我们前面也略有提及，因此不必再多重复。但无庸讳言的是，延安整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少深远的消极影响。当然，如前所述，中国党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并不自延安整风始，但由于延安整风确实继承、实践和系统化了这一整套“左”的政策和做法，才使它能够长期传下来。现在看来，主要的消极影响可否归纳为以下相互关联的几个问题。

（一）开创了轻视知识的风气与传统

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来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轻视书本知识，我没有研究，不能乱讲。这里用“开创”二字，只是从个人经历和所见所闻得出的一个看法，就是延安整风前和整风后对于学习（主要指学书本知识）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初到延安得到的最深印象，一个是“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另一个就是人人都在抓紧读书，于是就很自然地卷进了这个洪流，也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即马列主义，但也重视学文化。那时书很少，有些书往往要排队相约，按时交换。而且中央和一些领导同志也在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习，如哲学研究会、《资本论》学习小组等。部队战士和机关勤杂人员学政治学文化的劲头也不小。记得作家黄钢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其中就讲到战士们的学习，还提到有一个“小鬼”（通讯员？）在日记中写道，昨夜梦见了马克思，给他提了意见，认为他的胡子太长，不大卫生。至于机关和学校的学习，就更热烈了。特别是学校，要求在很短时期学很多东西，准备毕业上前线。以我所在的抗大总校而论（1938年底已有八个大队一万人），一期半年到一年，但却要学一二十门课程。当然主要是政治课，记得的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问题（近代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建设、时事政治等。军事课程虽不算主要的，但也有七八门之多，除游击战术、政治工作、各种条令、日常的制式教练和沙盘作业等以外，至今能记得的还有（其实大多只上三五次课，但由于教学方法结合实际观察和演练，所以印象很深）：地形学（识别和利用地形地物，如开阔地、独立树、集团家屋等）、筑城学（修筑各种掩体、挖战壕，有所谓蛇形壕沟、电光形壕沟之类）、军械学（轻重机枪和各式步枪、木柄手榴弹和马尾手榴弹等）、弹道学（只记得步枪的来复线）。写这些只是想举例说明，1938年前后延安学校学习的紧张和内容的丰富。[cccxx] 1939年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国民党的加紧封锁，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人数已急剧减少，中共中央虽然专门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但已是马后炮，并没能扭转局势。这时延安各学校已只得主要从机关和部队调来学员培训。学生来源的变化和流动

性的减小，就使学习时间有所延长，学习内容更加专业化。根据个人体会（这时我已调抗大三分校当政治助教），此后的教育仍然是遵照原有精神，注重实际运用，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学的都是脱离实际的教条。

整风开始后，局面就全变了。不但以前的教育受到批判，而且对知识的看法也提出了新的解释，实际上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口号下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整风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cccxxi]证明了他一贯只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观点，也不合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的发展史实。他不但把所谓“教条”说得“比粪还没有用”，而且就是“学生们的书本知识”，“假定都是真理”，对他们也“是倒转的，是逆行的，是片面的”，“学这种知识……可以说是最容易的”，“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因为，“如果只是死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cccxxii]诸如此类的话，不只是提倡读书无用论，也违背起码的常识。不信，请让“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的人，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看是否“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人们会说，这是有意曲解，因为原来的意思只是为了挖苦读死书的教条主义者。但是，第一，这里讲明是指假定都是真理的书本知识。那么，学生们（也应包括不是学生的人）要不要学书本知识？不要书本知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怎样来提高？第二，既然只是挖苦教条主义者，那为什么要在十年后修改发表时全部删掉？[cccxxiii]可见拿不出来。但即使删去这些话，也并未改变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原意。第三，更重要的不只是对这段文字的解释，而应结合实际来了解这篇报告的精神和实质。如果考察一下整风以来的历史事实，那么就可看出，延安整风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开了轻视知识的先河。在整风期间，各机关学校就以少则一两年多则两三年的时间，主要学那二十多篇《整风文献》，其它知识基本上一律停学，包括马列主义（只是高干选学一点思想方法论）。专科学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外语学校，就是“1944年秋收以后，俄文、英文两系师生，（才）开始集中精力，投入外语教学活动”。[cccxxiv]抗大总校也是“直到1944年底，全校整风学习方全部结束，并转入正常学习”。[cccxxv]严重的是，延安整风开创的轻视知识和轻视科学文化学习的传统，建国后还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cccxxvi]连作为指导党和国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如前所引，胡乔木也承认，经过延安整风，“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cccxxvii]其它就更可想而知了。这都势必导致全民族的思想贫乏和文化落后，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蔑视

这里之所以用“加深”，是因为以前从国际共运到中国党内就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传统。不过遵义会议后，这方面已逐渐有所改进，抗战初期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奔赴延安，以及抗大、陕公、鲁艺、女大、马列学院的辉煌成就，都是证明。可惜延安整风没有很好继承和发扬这一新的传统，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和加深了老传统，并且长期坚持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接连挨整受折磨，中国文化发展也受到严重障碍和摧残，到反“右派”特别是到“文

化大革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过程有稍加回顾的必要。

延安整风的结束，实际上直到日本投降。此后我们在无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必须着重同国民党争取群众，当然也只能对知识分子执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而反独裁、争民主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确实也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党同知识分子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建国后。许多留学国外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突破重重障碍回国效力。这期间，虽然仍在提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但还注意方式；知识分子对党的某些提法和做法开始也不大理解，但并非主流，有些还很快纠正了。例如吴晗在大约写于1956年的《自传》中就说，“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cccxxviii]等到抗美援朝结束、三大改造完成，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已过了民主革命的关，现在要过社会主义的关了，因此需要大约也能够腾出手来大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了。这也就是陆定一所谈中宣部的工作，“无非是抓阶级斗争，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cccxxix]

改造知识分子的办法还是延安整风时用过的两手，即说服（思想教育）和压服（批斗和肃反）。建国后，一方面是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等各项运动，另一方面也接连发动了对《武训传》、梁漱溟、俞平伯、胡适等的批判，不久后更挖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知识分子的评估也从小资产阶级升为资产阶级，说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cccxxx]并且提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认为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因此就要听这些主人的话，否则“就要辞退你”。[cccxxxi]知识分子也真的听主人的话，起来帮助党整风，结果却引起一场“反右派”斗争。在这次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55万余人，加上其它挨整的（挨批和划为“中右”以上，以及在工作上受到影响的）当超过百万，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不少人还是社会精英。

反“右派”被说成“扩大化”，是否妥当恐怕也值得考虑。因为过去说的许多扩大化都并不准确。如苏区无中生有的“打AB团”、延安一个特务也没抓到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纯属乱来的“抓五一六反革命”，都被说成什么“扩大化”。其实这些说法不但谈不上实事求是，冤屈了不知多少人，而且还妨碍汲取教训，致使类似错误一再重演。按毛泽东估计，中国当时有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五百万左右。[cccxxxii]挨整的一百万纷纷缴械检讨，剩下的四百万还是继续听党的话，参加对“右派”的批判和对自己的检查，这就使不久前才提出的“百家争鸣”完全变成了空话。毛泽东自己就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其实，两家争鸣之说仍然不实。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环境是不会允许“资产阶级一家”出来争鸣的，只能实行“无产阶级”的，也就是党的“舆论一律”。而且反“右派”斗争既暴露了知识分子并不都听话，也证明知识分子没几个人敢起来争鸣，所以对他们反而更不客气了。胡乔木就说，“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的头脑里，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cccxxxiii]反映此后对知识分子看法的，还有因大搞个人崇拜和奉行极左路线而得到赏识和不断升迁的柯庆施的妙论。“据老报人徐铸成回忆，柯庆施在反右运动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做过

如此独到的概括：知识分子的习惯，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懒于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cccxxxiv]主管文教工作的钱俊瑞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中也说，“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cccxxxv]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看法和态度，根源都在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抑制了知识分子的长处而助长了他们的短处。对这个问题可以说的有很多，但为节约篇幅，只举一个例子或现象。无论是思想检查还是坦白交代（肃反和抢救），一些坚持实事求是不说违心话的人，往往被视为态度不好，即使最后作平反结论也要给留点尾巴。那种在思想批判和肃反抢救中能够冲锋陷阵、按领导意图办事的人，就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即使搞得过火甚至违法乱纪，也不予追究，还会得到重用。还有些人不但在压力下乱供乱咬，还摇身一变成为“积极分子”，去批斗和抢救别人，并且被认为“态度好”而受到欢迎。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做法，自然造成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占便宜的效果，客观上压制了知识分子正道直行、仗义执言、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等优秀传统，助长了投领导所好、顺着来、随风摆、互相拆台、打小报告等不良作风。而这种现象不但累见于历次政治运动，即在平时也是大行其道。

（三）使整个一代“三八式”没能到应有的历史作用

轻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观点反映到干部路线上，就是主要依靠和重用工农老干部，而不大信任知识分子新干部。延安时期人们说的老干部，是指参加过内战特别是长征的工农干部，即使原来是知识分子，既已做了党政军领导工作，当然也属老干部。所谓新干部，就是一代“三八式”。新老干部的这种界定，一直保持到建国后好久。在领导和老干部眼里，也如同父母看子女总是孩子一样，始终把“三八式”视为知识分子新干部。而“三八式”们，在老干部面前也自认低一辈，经过延安整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畏。后来的形势变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点加深新老干部的这种界定和相互看法。正是在延安时期形成并由整风固定下来的这种看法与传统，实际上决定了整个一代“三八式”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当说，这对我们党是一大不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这并不是为“三八式”鸣不平，而只是要说明“三八式”一代的断层，给中国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从“一二·九”到“三八式”，这是中国人民空前觉醒的时代，是需要人才也涌现出大批人才的时代。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投奔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空前壮举，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正像《抗大校歌》中唱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担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按道理，在他们中间一定会产生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大师级的专家学者（连没有奔赴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中都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科学和文史方面的著名人才），可惜结果并不理想。这除了那个时代的客观环境外，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与政策也是重要原因。思想改造和思想管制限制了知识分子干部在科学、文艺和学术诸方面的创作和成就，而不让他们进入省部以上领导，

特别是中央决策层，就使他们对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无从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使党和社会发展规律“长江后浪催前浪”出现长达三四十年的断流。

延安整风结束时举行的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是清一色的老干部，绝大多数还是职业军人，政治局十三人中的十人和书记处全部又来自中央苏区（任弼时是从中央苏区派往湘赣的），在中央委员会里竟然没有知识界的代表（也许靠鼓吹个人崇拜发迹的候补委员陈伯达可算一个例外）。这种人员构成虽然不尽合理，但在战争时期多少还可理解。违背党章规定，缺乏充分理由地拖延十一年才召开的八大，已处在全面建设时期，可选出的领导机构却和七大基本相同，全面排斥“三八式”干部，不要知识分子和懂经济建设的人才。毛泽东的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是因为人数多。他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出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cccxxxvi]但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cccxxxvii]这显然与党提出的“向科学进军”、“向自然开战”的任务完全背道而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的知识与经验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再承认的。可毛泽东不仅没有讲一定要保持这个缺点的原因，反而说，“我们这个名单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纪。”[cccxxxviii]就是说，基本上由工农老干部组成、排斥知识分子和“三八式”的中央还要管中国四五十年。而它也确实在一人的操纵下又拖了近十三年才召开立林彪为接班人的九大。八大产生的中央领导不适应中国建设的需要是如此明显，所以有人认为，八大领导结构必然导致八大路线的中断。因为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从其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数是职业军人出身，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建设会变成群众运动了。”[cccxxxix]七大和八大产生的中央实际上是个军事司令部（刘少奇1947年7月4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报告，就承认联共（布）为世界共运的统帅部，“而中共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cccxl]），总司令一声号令，整个中央以至全党就立即照办。例如没有经过任何应有的党内外会议，只是一个人的批示和政治局成员的紧跟就废除了《共同纲领》，全国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好”等就更不用说了。谁不服从，就“军法”从事，还可得到整个中央和全党的支持，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

当然，轻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同“牺牲”（指排斥在决策层领导之外）一代“三八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关键在于指导思想和体制。即使“三八式”按常规逐渐参与领导和决策，甚至成为多数，但只要保持由延安整风固定下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各方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恐怕局势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三八式”既然指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因此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当权，中国社会的发展总会好一些。例如对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反右倾、大跃进等就可能减轻（例如由有科学知识的人而不是大老粗管农业，也许就不会发出“人有多大但，地有多大产”等怪论），“文革”也许可以避免，中国社会的发展会少走些大弯路。而且，“三八式”能够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决策层，这本身就意味着党内还有一定民主，发展下去，必将直接影响以至动摇

终身制和老人政治，起码也会抑制和弱化专制独裁的作用。试想，在废弃《共同纲领》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如果中央委员的大多数不随风倒，政治局和书记处有几个人能顶住压力，结果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可以肯定，毛泽东不会去，也没人跟着“上山打游击”。可惜这都只能是假设，因为“三八式”一代的中断是延安整风注定了的历史必然。

其实不大信任知识分子，更信任老干部，也并非从整风开始（只是经过整风，理论上更有系统，如出身的“原罪论”和改造的强制性等，体制上更加固定化了）。在延安时期，早就是这么做的。从一开始，各单位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就一律都是老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小单位，例如抗大头几期的连队长和指导员就都是长征老干部，更不用说大队一级和校领导了。著名的知识分子如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还是老党员）等，至多也是做到大队的主任教员。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传统，连选派驻外大使都非老干部莫属。原因就是毛泽东接见他们时所说，“你们都是老战士，虽不会外交，还要你们去干外交，我看都跑不了。”[cccxli]将军当大使，有些人还是胜任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既不懂外文，又不了解国际关系以及外交一套，多少有点像原四方面军参谋长（1955年评为中将）的倪志亮所说，“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着黄牛当马骑，难啊！”[cccxlii]选派他们，只是因为“跑不了”。难道抗战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当大使就会跑了？这也是太不信任“三八式”干部了！当然，老干部为革命立过汗马功劳，在他们身上有很多长处，确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应当受到后辈的敬仰和学习。他们中间也有些人，能够勤奋自学，掌握渊博知识，保持思想常新，做到了与时俱进，如胡耀邦等，但终究是极少数，更不占主流地位。就绝大多数或整体而言，对经济建设，老干部们的知识准备却实在不足，视野不够广阔，思想认识很难跟上时代的发展。这是业经历史证明的事实，绝不是对老干部的蔑视。如果不是由于本身不懂业务，又受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传统的影响，那就不一定会出现“大跃进”中许多违反常识、严重破坏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事来。邓小平就承认，大家头脑都发热。[cccxliii]其实这个“大家”，只能指中央和省级领导，总不会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以及广大工农群众。而对于那些领导者，也并不只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应有的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例如直到准备党的十二大，胡耀邦首先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思想，于光远鉴于从苏联学来的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法极不准确，水分太大，建议改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并打电话给在武汉的陈丕显。陈却说，“可是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呀。”[cccxliv]这就是轻视知识带来的恶果。所以长期主管宣传教育的陆定一曾对到医院探视他的于光远说，他的一个重大失误和遗憾是解放后没有提出组织老干部上大学。这确是一个真诚而深刻的反思。因为延安整风立下的主要信任工农老干部而不大信任知识分子的规矩和传统，使从中央到省部一级的所有重要领导职务都只能由老干部担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全部）并不懂新的业务，又轻视学习新的知识，还看不起专家学者，所以就只能跟着上面的风走，造成“大跃进”时期上下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例如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说“钢产量完全可以五年超英，十五年超美。”过了一个多月后又向中央报告，把1962年的指标从三千万吨提高到六千万，[cccxlv]说超英用不了五年，有两年就行。至于九千万人上山砍树炼钢，造成多严重

的后果，恐怕绝不只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不懂业务，迎合领导。因为生物学家头脑再热也不会提倡在除“四害”中消灭麻雀，农学家头脑再热也不信亩产数十万斤粮。然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却在大力贯彻深耕密植等“八字宪法”、赞扬各地放“卫星”，把粮棉产量高估了又高估（因大跃进中表现突出，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与柯庆施、李井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直到1960年许多地方已在大批饿死人，他还在4月6日二届二次人大会上作农业问题报告时讲粮食增产，说“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cccxlvi]这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和轻视专家学者的结果吗？

由于不遵“人事有代谢”之规，坚持偏信和重用老干部的传统做法，因而自然就形成老人政治。老人确实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但除少数例外，却都容易情感上怀旧和思想上保守。例如毛泽东和某些老同志就常怀念并主张恢复供给制、游击习气和农村作风。[cccxlvii]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些老同志还对特区有保留，对开放想不通，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出“鸟笼经济”。其权威和影响所及，曾使某些地区落后了好多年。还有个例子可以看出老人思想的守旧，就是当年在延安首先起来大骂丁玲《三八节有感》的人，在新时期又要大批巴金的《随想录》。更有甚者，有的领导人公然提倡老干部子弟接班，说他们起码不会挖祖坟。总而言之，历史证明，工农老干部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建国后由于执行极左路线的一贯制领导，却也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四）给日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二战后，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得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快的发展，知识分子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由于延安整风开创的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建国后反而愈演愈烈，因而使我们丧失了二三十年的大好时机，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比人家落后了一大截。这本来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就曾多次指出过。[cccxlviii]但是有关方面和有些人却硬是不承认历史事实，总要把过去的成绩尽量拔高，对错误遮遮掩掩不露真相。例如直到前几年，还有这样的权威说法：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7%，明显高于世界年均增长3%左右的水平。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也许是由于继续照搬苏联那种水分极大的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法的缘故。因此，为了汲取轻视知识酿成恶果的教训，并还历史以真相，这里只举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例子对解放后的损失作点说明，虽然有些问题在前面的笔记中也曾提到过。

1，以《联共党史》为学习中心造成实行“一边倒”的恶果

“一边倒”的灵魂是照搬苏联模式，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而在“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方面，[cccxlix]我国可能还要大大超过苏联，因为我们强调“主观能动性”（实为唯意志论）比他们更厉害。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是上述“明显高于世界年均增长”，而是恰恰相反，大大低于世界水平。如前所述，1955年中国

经济总量（按汇率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是4.7%，日本大约占2.5%。到1980年，中国的份额降为2.5%，日本则升到10%。[cccl]同一些东亚“四小龙”的差距拉大得更快。如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情况可能稍有不同，但基本趋势并未改变。至于人均产值，那差距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近二十多年来，速度虽然我们快，但他们的基数大。例如美国年增1%就是八九百亿美元，我们增1%只一百亿美元。可见，错过一次机会，落后二三十年，追赶起来用的时间就要多得多了。因此，我们对改革开放前所走弯路和所犯错误应有充分估计，更不可再用那些靠不住的统计数字自欺欺人了。苏联国力统计的虚假就是前车之鉴。

2，延安整风创立的对意识形态垄断制妨碍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文化的发展要求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百家争鸣，而我们在整风中却从苏联学来一套思想专政和舆论一律，这就与时代发展有点背道而驰。当时也提倡解放思想，但那主要指从马列的书本知识中解放出来，从“左”倾中央时代的所谓“两个宗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此后一直都在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统治也就随之越来越严，思想越来越贫乏、越单调。例如“大跃进”就是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发动起来的，但是农学家能对“八字宪法”提出怀疑、生物学家敢着文反对打麻雀、政治学家可被允许讨论政党制度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怎么能够得到顺利发展、怎么能够实现创新和突破？这种环境也自然难以培养出各学科的大科学家来。这就是我国经济建设至今在技术上主要还得依靠外国、依靠引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国人就一直以“两弹一星”自豪。这确实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从战略上看，却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因为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一个大国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办成几件事，相对而言是并不太难的。苏联就曾集全国的力量发展军事技术和国防工业，结果也能在同美国经济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取得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某些领域如核能和航天方面还一度领先美国（苏联首先发射人造卫星曾是毛泽东得出“东风压倒西风”的重要依据之一[cccli]）。但它却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据苏联崩溃前统计的经济总量，也只相当美国的八九分之一。俄罗斯人早已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苏联/俄罗斯的军事技术还比较全面，而我们只有“两弹一星”，飞机、舰艇等还有求于国外。在这点上，也应以苏联为鉴，更不宜老是高谈“两弹一星”了。

不用说，思想统治和舆论一律，对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更大和更直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例外。前面已经引证过，连胡乔木也承认，“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因而得出结论：“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ccclii]那些研究延安整风的人，那些自认为是胡乔木学派的党史工作者，请牢记和很好体会胡乔木这段话，因为几十年的历史也确实是如此。这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纪律，更重要的还由于新闻和舆论的垄断（不同意见出不来）、现实利害得失的考虑（顺着来写作肯定占便宜，发表不同意见可能挨整）、以及专政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就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

万六千个儒。”[cccliii]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刚过去不久的反“右派”斗争中不知就有多少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后来更厉害，据胡耀邦说，单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分子，……遭到杀害的，有三十万人”。[cccliv]人身都不保，还遑论其它。所以延安整风形成的这种思想管理体制，很难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各领域培养出公认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来，即使原有的大师级人物也很难拿出大师级的作品。这曾使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抱憾终生。他们想研究的问题不能研究，想写的东西不能写，想出版的书不能出，想演的戏不能演，哪里有过什么“双百方针”，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看来要做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百家争鸣和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求得学术的兴旺和文艺的繁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多年来常说的要造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局面，更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

在这一节原来还计划写两个问题，一个是延安整风的结果宣布了党史上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的结束；一个是延安整风中滋长起来的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但是现在已经写得太长了，而那两个问题又不能过分简化，所以就只好另辟章节了。这样，关于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的反思就暂且到此为止。

（2002年8月1日完稿）

第九篇 延安整风不能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一，马列主义教育运动的提法与实际不符

六十年来，对延安整风一直有个正式提法，即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先后用词虽有某些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贯的和一致的。[ccclv]只是近些年来，根据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原有提法作了点修订，改为："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ccclvi]所有这些，无论是以当时实际还是事后发展来衡量，都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对此，前面几篇笔记中曾提到过，但鉴于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延安整风的根本评估，所以还需要再稍为系统地作点说明。

（一）先谈几个用词问题

1，说整风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就不是事实

除中央一级完全采取暗箱作业的方法清算所谓两大宗派的斗争外，即以普遍整风而言，还是胡乔木说的主要针对机关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全党这时（1942年初）已有八十万党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兵党员并没有参加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也只是一万多名干部，并不包括非干部的党员群众。毛泽东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关于整顿作风的发言中，就明确要求："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一两年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还说，"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都是全国性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从客观条件看，毛主席认为，无论在延安还是全国各根据地，让干部集中一段时期学习、整风，也是可能的。"[ccclvii]可见，说来说去还是干部（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干部）的整风，所谓"全党范围"是把广大的普通党员排除在外的。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这并不单纯是咬文嚼字和抠字眼的问题，而是说明一种精神，就是我们在党内历来依靠的是党员干部（全党就是指他们），而不是党员群众。推而广之，我们的政权所依靠的也是各级干部，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名义上说是群众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党的领导和各级干部当家作主。

另外，还要在此附带一提的是，"全党整风"的"全党"也是不顾事实的说法。因为无论延安还是各根据地，凡搞整风的单位，非党干部都是参加了的。当时还没有1957年那种要非党干部"帮助党整风"的说法，而是党内外干部"一视同仁"，不曾听说有什么机关的非党干部可以"逍遥"于整风之外。现在有些谈到延安整风的书籍和文章，还把当时的审干和抢救运动说成是"开展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ccclviii]更是脱离实际的天方夜谭，因为不少机关学校非党干部和群众被抢救的反倒更多些。

2，称为"普遍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也不恰当，起码属于无限夸大

"普遍"，已如上面所说，实际上整风学习不但限于干部，而且发展很不

平衡，不少地方的干部并没来得及开展学习就被卷进了抢救运动；有些对敌斗争紧张和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也没机会组织学习。至于说“深刻”，只是个空洞的形容词，怎么个深刻法，始终没有讲出几个具体标志。是否像《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为了说明全党普遍整风的必要而编写的一些理由：“在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内战，没有参加过长征，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熟悉，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不懂得，虽然有的读了两年书，但只记得一些教条，不懂得马列主义是什么。”所引毛泽东的话要求更高，要全党干部在一两年内“把马列主义搞通”。[cclix]是否经过整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要求的目的都达到了，因此才叫“深刻”？其实，这些话不但前后矛盾（整风到底是全党党员还是全党干部，或只是新党员、新干部），而且完全脱离实际，要求之高也只能是主观主义幻想。例如说新党员、新干部，由于没有经过内战、长征，所以许多共产主义道理不熟悉，阶级斗争、马列主义都不懂得。那么参加过内战、长征的老党员、老干部对这些就都熟悉了、懂得了？我曾多次同长征老战士共事，亲自体会到，多数老长征由于出身于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参军后又是紧张的战斗生活，很少学习机会，所以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道理几乎是空白，反倒不如那些被讥为“只记得一些教条”的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就算上引说法可以成立，那为什么整风反而要以参加过内战和长征的高级干部为主要对象呢？何况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注，当然也包括毛泽东）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才解决。”[cclx]连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谈得上以此进行“深刻的”教育？总不能像毛泽东常批评别人的那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吧？

3，提“马列主义”这个名词不准确不科学

因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当同义词用，这是我们一再讲过的。[cclxi]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新着的两本党史教科书（即本篇第1页“注2”提到的简史和长编）中已将以前惯用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改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显然是一点进步。但是两本书又都增加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却是极不准确和违背历史真实的。这大约是由于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周扬、胡绳、温济泽等人着文把“五四”、整风和这次拨乱反正并列为近现代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延安整风只是以反对存在于遵义会议以前的旧教条为名另立一套完整的新教条，而且束缚更严。整风前还有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领导上，如作为总书记并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更“特别提倡发扬民主，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想的干部”。[cclxii]报刊上确实也经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对工作的批评。还创立了针砭时弊的《轻骑队》之类的街头小报。整风后，这些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和个人检讨的内容，抢救运动一来更是万马齐喑。这哪里谈得上思想解放，倒是真正实现了统一思想，舆论一律。整风学习给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所留下的最深印象，主要是列宁的“铁的纪律”、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反对的教条主义是什么，实际上是并不清楚的，无非是讲话时少引证马列，多引证毛主席等等。至于反对把国际指示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那已是过了十多二十年中苏关系出现问题后的提法，属于惯用的事后诸葛亮的话，在延安整

风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此提法，连暗示的含义都没有。而且正好相反，整风中正是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指示、斯大林言论与苏共经验来反对那些被称为教条宗派的人，说他们是假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拥护者，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派才是真的。所以经过整风，实际上倒是增强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信念。

（二）延安整风学的是斯大林理论

延安整风不能称为也确实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除了前面一再说过的，因为普遍整风的学习材料中，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著作，还特别是由于把斯大林的理论误认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对整风学习，毛泽东明确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因为照他说，“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ccclxiii]这种提法现在已经可以明确断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官方舆论也早已不再提斯大林和联共党史了。因为多年来揭发暴露的事实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充分证明，并得到举世公认，斯大林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联共（布）党史》则是伪造历史和搞个人崇拜的典型。以这样的理论为中心的学习，怎么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也许人们会说，《整风文献》中除了斯大林的论着外，不是还有我们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吗？确实如此，而且中国党和领导人的材料还要更多些。但是应该承认，整风学习既然以斯大林的理论为中心，那么其它材料一定是同这个中心保持一致，绝不会与其矛盾，更不能唱反调。这在逻辑上和常识上都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读《整风文献》收录的他们的文章，不但可以看出立论是以斯大林的理论为基础，而且也都只引证斯大林，有些还是大段的引证，却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少引语。这能说是偶然的吗？就内容而言，像毛泽东在几篇报告中那样对书本知识、外来文化、理论研究和知识分子的轻慢和蔑视，就很难说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批评“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ccclxiv]还是在同列宁唱反调。因为如前所述，列宁15岁就开始阅读《资本论》，17岁被捕，18岁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并讲解《资本论》。[ccclxv]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则是更明显地立足于斯大林理论，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头一篇就是要把党员培养成党的（实际上就是领导的）驯服工具。第二篇虽表明是要反对党内斗争中“左”的倾向，但因为是以斯大林的论断：“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和“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ccclxvi]为依据，因此基本精神还是强调斗争，事实上也立竿见影地为整风和抢救中的残酷斗争所证实。至于第三篇，所起作用主要是用斯大林党同伐异的理论制造中国的个人崇拜。当然，这里无意从理论上分析和讨论《整风文献》中选用的每篇文章，只是要举例说明延安整风不可简单说成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是用斯大林理论（当时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这一理论的中国化，所以被刘少奇称为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统一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思想的教育运动。

不但学习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理论，而且整风中特别是整风后实际上执行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的原则。这里只以整风期间违背党章规定，一再推迟七大的召开为例做点说明。对于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党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张年会制，并要公开进行，以防止造成个人专权和脱离群众的暗箱作业。列宁也坚持了这一原则，因此即使在国内战争的紧张时期，俄共的年会制也从未间断，而且对社会特别是对全体党员完全开放，不但公开进行，还在报上开辟争论专栏。只是斯大林专权后才逐渐加以改变，致使联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更没有不同意见发表。中国党在被毛泽东称为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即陈独秀任总书记的年代，也是实行每次都有争论的年会制（在国内无法举行时还到国外去开了六大）。六大党章仍写明年会制，只是实际情况变得很难执行。1931年四中全会虽有决定，但未实现。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才认为有可能决定“在最近时期”召开七大，并选出了准备委员会。此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又多次作过讨论和决定，尤其是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特别专门做出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确定了议事日程和代表选举办法，要求加紧准备工作，以便“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ccclxvii]但是后来已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却置书记处与政治局的历次决定以至中央全会的决议于不顾，要先统一思想再开会（从此，就都一直开成了无争论的“团结的大会”），各地选派的代表被安排参加整风学习和抢救运动，于是又经过五六年到1945年才开成七大，距六大已有十七年。此后在大半为和平时期又是拖了十年才开八大。这只是一个较显着的例子。其实，七大以后的党内生活以及国家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基本上也都走的是斯大林的路子。例如建国后，由于毛泽东个人想法的变化，决定立即放弃《共同纲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却既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也不打算经过制定《共同纲领》的新政协会议，但决不忽略向斯大林请教。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随后即委托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向斯大林请示和征求意见。10月20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10月24日，斯大林在接见中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对中国从现在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第二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正式提出来了。[ccclxviii]又如在这之前，毛泽东原也想按照苏联、南斯拉夫的经验，在革命胜利后取缔各民主党派，但由于在征求意见时斯大林不同意才保留了下来。[ccclxix]至于建设中的照搬斯大林模式，就无须多说了。可见，不但整风时的学习，而且整风后的实践，都是贯穿着斯大林的理论。至于多年后说的，延安整风是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那也像经常用的以事后的形势变化和新的认识修改几十年前的文章一样，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所写《共产党宣言》再版时，就一再说有些论断已经过时或当时的提法本来就不完备，但总是声明，“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ccclxx]甚至连斯大林也都表示，对过去写的文章，现在看来有些错误（所谓“显得陈旧了的论点”），但也不去修改原文了。[ccclxxi]有关这些，特别是整风后的学苏联、“一边倒”和维护斯大林等问题，下面还将谈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二，整风前倒是进行了几年马克思主义教育

（一）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党的理论水平不高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一直不高。从以陈独秀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起，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重视不够，加以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没能下大功夫进行学习和研究，还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他们很注意用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原则指导现实斗争，不断探索着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即后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ccclxxii]也一直参加和领导着各个领域的革命斗争。党从成立之日起，虽然理论准备很不充分，却立即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但由于党的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缺乏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所以使党在路线和政策上总是容易出现随意性和片面性，不断犯右的和更多犯“左”的错误。

以中央到达陕北时的情况而论，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部分人在苏联学了些马列书本知识，但不了解中国实际，一回国就担负起领导工作，因而只能跟着共产国际犯“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经过几年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吸取犯错误的教训，他们中的多数人已较快地走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道路，还增强了免疫力，避免了此后再犯重大错误。不过他们在领导层中属于少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没什么基础。再一种，是更多的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的领导人和骨干。他们一参加革命就卷入紧张的实际斗争，没有时间和条件多学理论，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例如毛泽东就说，“有三本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着的《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ccclxxiii]此后在战争环境中也只能再读点列宁、斯大林的小册子如《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这本身就增加了中国人理解的难度，还往往容易搞偏，发生误解。加之文字的隔阂（翻译成中文的数量很少），更使党的多数领导人和各级骨干无法阅读许多马列原著，更不用说广大党员群众了。所以在很长时期，可以说党和红军（党的主要力量所在）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处于小册子阶段，当然谈不上做到完整、全面和准确。至于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多属文盲和识字不多的工农。他们的参加革命和入党，纯粹出于反压迫、求解放的纯朴阶级觉悟，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战时期则是抗日救亡。中央进驻延安后，曾抽调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进党校学习，其情况竟如李维汉所说，一些党员干部连“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ccclxxiv] 1938年前后大批涌入延安的知识青年，像我们这类人，虽然读过一些马列和其它进步书籍，但确实极其肤浅，多数人并没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真正的学习还是参加革命以后才开始的。还有一批理论工作者，过去在白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社会科学战线的斗争，但却远离党中央的领导，对革命实际也不大了解，仍

然需要重新学习和补课，使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了解、掌握和宣传党的政策，以至对领导起点智囊参谋作用。

（二）延安前期的理论学习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普通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上下一致的要求。但是怎样学习呢？根据考茨基、列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既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工人群众也不可能通过实践就自然学到手，而必须读书和听讲。[ccclxxv]正是根据学习马列必须从读书开始的原则，加之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可以大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原有的军政干部和来自敌战区或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较正规地组织在职干部的文化和理论学习。于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组织领导下，就掀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为了尽可能适应学习的需要，张闻天还亲自主持和组织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其规模也属空前，但因纸张和印刷条件的限制，仍满足不了各地的需要。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更提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ccclxxvi]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些，更好一些”。[ccclxxvii]这就把这次学习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学习范围也从延安扩展到各根据地和全党。

几年的学理论热潮，几乎把革命队伍中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人们都以极大热情、争分夺秒地挤时间读书、讨论、记笔记。因此，不但个人争书读（因为终究书少，一些书留在谁手里的时间是有限的，例如《资本论》第一卷普通干部一人只能借阅两个月，后面还有好几个人排队等着），就是机关、部队也扣书籍、“抢”教员，特别是敌后根据地。我就亲自听过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不久讲到的一些情况。他说：“前方学习中的困难首先是缺乏教师。去年邓小平同志带了两个马列学院的同志去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总部才派人换了回来。第二个困难是缺书本子。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了一两百本《联共党史》，但他们只收到七本”。[ccclxxviii]当时那种学习情景，六十多年后想起或同熟人谈起，还有些心潮澎湃。许多人一生好读书的习惯就是那阵子养成的。

这段理论学习，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在抗战特别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各条战线上起到骨干作用的整个“三八式”一代，就是在这次学习热潮中培养出来的。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许多同代人的深切回忆，都证明那是不可忘却的历史事实。例如单是我们抗大，截至1942年整风前，总校和各分校培养出的干部就近十万，百分之九十上了前线，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在后方搞学院式研究或读书。[ccclxxix]即以被毛泽东视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并迫使张闻天承认过去方针错了的马列学院[ccclxxx]而论，三年培养了八九百人，据朱凤熙1982年编同学录时的统计，除一二个败类外，都在各条战线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少人后来还成了高级干部）。所以他的结论与毛泽东相反：“可见当年教育方针与实施的正确”。曾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许多学员，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老红军，也都在五十年后提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建立和确定自己世界观的那个重要时刻，是在马列学院度过的，这是幸

运”（王惠德）。“我一生当中，真正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段苏权）。“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于理论修养底子很薄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要的”（雪苇）。[ccclxxxi]五十年后的回忆和总结，大家一致认为，那段理论学习，无论内容和方法还是事后的实践证明，都是学用一致、密切联系实际的，并不是什么被批评的教条主义。

与这次学习热潮互相呼应、相互促进同时兴起的，还有建党以来唯一的一次社会科学大繁荣。[ccclxxxii]这首先表现在党的领袖们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时间，系统地学习理论，并结合实际，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最后升华为新的理论。所以延安时期，是一个理论上出现飞跃和成果最显着的时期。这不但出自领导层的集体努力，也得力于上下左右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在这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的就是一大批理论工作者来到了延安，发挥了教师和智囊的作用。例如毛泽东亲自组织有肖劲光、罗瑞卿等参加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就是请何思敬来翻译和讲授的。当时的学习热潮和理论繁荣，还表现为延安的学术组织和机构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我所记得的就有：张闻天主持的《资本论》学习组，艾思奇任会长的“延安新哲学会”，王学文、王思华等人组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其它还有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会、中国历史研究会、政治工作研究会等几十个。参加的人多是相互交叉的，其中不少人只是为了学习听讲而去。我个人就是毛泽东批评的那种啃起了《资本论》的十七八岁娃娃，17岁开始在抗大当助教，还参加过《资本论》学习组的旁听。那时延安经常举办上大课（比较固定）、讲演会和讨论会（看到海报即可自由去听），有些人礼拜天竟可参加两场。所以，当时的理论繁荣并不只是一批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们的事，而是带有相当广泛的群众性。因为在那全民抗战的大时代里，共产党员和一切先进的人们，特别是聚集在延安的热血青年，都有一种追求真理的激情和浓厚的理论兴趣。

当时延安能够出现这一学习热潮和理论繁荣时期，除了处于民族觉醒（这是中国一次空前广泛和深入的启蒙）、全民抗战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外，还因为当时党本身也处在一个生动活泼的时期。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实行着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都要开会决定，经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在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还会进行表决，没有个人说了算的事。毛泽东虽然从1938年六中全会后已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但在一个时期，党还是保持了不突出个人的优良传统，更未形成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党内生活正常，强调发扬民主，保护少数，尊重不同意见。不但有“轻骑队”之类的墙报，而且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可经常看到争论的文章。在这种民主气氛和宽松环境下，人们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都感到心情舒畅、精神饱满，为追求真理而学习和进行理论探索蔚然成风。加之当时的延安已多少摆脱了内战时期根据地受到严密封锁、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有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外面的报刊书籍可以辗转得到了，还和国统区以至美国等外国开展了一定的人员来往与学术交流。这不但有助于我们党和解放区影响的扩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自己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提高。

延安时期的学习热潮和理论繁荣是紧密相连的。正是在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基础上才有了广泛的理论探索和创新。所以这段学习，不只对新参加革命

的知识分子和已处于各级领导岗位的工农干部极为重要，就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也都从中获益匪浅，使他们能够在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中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毛泽东，他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和较多的读书时间，又可得到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书籍，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创造性的理论著作。正像《毛泽东传》所说，“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ccclxxxiii]可以说，正是这段学习和研究，才使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他的一批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和《实践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而《新民主主义论》，应该视为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毛泽东思想固然包含中央领导的集体智慧，但主要还是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政策。

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毛的领袖地位得到巩固后，毛泽东认为原来那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和理论繁荣的局面需要加以改变，改为以他的理论和政策统一全党的思想。这在1940年就表现得日益明显，使得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不断挨批，并设法紧跟。不只张闻天如是说，[ccclxxxiv]我的一段经历也可证明，这在过去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ccclxxxv]

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张闻天很快就对延安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学习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1941年春，他要找一个在抗大作教育工作时间较长的人了解情况，刚由抗大三分校改组成的军事学院就推荐了我。从谈话中可以体会到，中央改革教育的决心以至具体方案均已酝酿成熟。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今后学校教育可以不再学基本理论，主要学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党的政策，马列主义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因此在学校的培训时间应该缩短，免得钻到书本里出不来变成教条主义。这只是大概意思，不一定准确。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就听说毛泽东作了一个《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而印证了他谈话的来由。

不过，事后的发展却并非张闻天所谈，改造学习只是个引子。随着1941年“九月会议”中央政治局内部整风的“初战告捷”，第二年春就开始了普遍整风，在民主气氛、宽松与开放的条件下的学习高潮和理论繁荣时期也宣告中断了。

三，整风中断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和延安的理论繁荣时期

根据正统的提法和一些只是传抄和附会的党史著作，所谓延安时期，不但包括1942年到1945年的整风运动，甚至认为整风是延安时期的主要内容。在这种传统教育下，人们看到这里的提法自然会视作大逆不道了。但是，我们应当看事实，而不是背结论，否则还真成了教条主义。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抽象的"概括"），这里只列举以下几点，做点简单说明。

（一）整风停止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延安整风规定学习的文件中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是前面一再讲过的，问题还在于全面停止了马列理论的学习。被称为理论学习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即一再改组，最后合并到了中央党校。而党校则根据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了过去规定的课程（马列主义理论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规定1942年内，学习党的路线。[ccclxxxvi]至于1943年和1944年，那更是进行紧张的整风和审干（抢救），然后是繁重的甄别、总结，直到日本投降分配工作。总之，整风开始后再也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和经济学。其它学校和在职干部也都一样。以我们学校来说，1944年是领导和骨干忙于进行甄别（抢救运动到了甄别阶段已变成少数人的暗箱作业，而不是什么"群众运动"了），广大群众就是学外文和劳动（时间大约各占一半），这样直到日本投降后奔赴前线。总之，在整风期间，除高级干部为配合路线学习的需要，选择马列著作的片断或少数几本小册子（如为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学《共产党宣言》，为强调铁的纪律学《"左"派幼稚病》的有关章节等）外，无论是学校还是在职干部，都完全停止了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至于普遍整风中的一般中下级干部，则连那几本小册子也没安排学习。

（二）整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

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学过的，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倒还干净些，起码不用检讨。例如著名经济学家王思华就带头检讨说，"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说他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联系中国只是为"装饰门面"，其实还"只想在《资本论》本身来翻筋头"，"只知背诵教条"。[ccclxxxvii]甚至连有些老干部，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竟将一些马列著作扔到了窑洞门外，曾被张闻天当作笑话。[ccclxxxviii]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几乎和教条主义划上了等号，连一些人作报告或讲演都不敢再引证马列，也尽量避免分一二三

四。例如我就听过《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总政宣传部长萧向荣来给我们作报告时，在特别适合引证经典作家话的情况下，总要笑笑说：我又要引证两句“教条”了。原来人们感到很缺的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无用而多余，于是就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废纸论斤卖了。1945年春谢觉哉老人就说，“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ccclxxxix]近年有的研究论文也说，“反教条主义的空气，使学习理论的风气大大下降，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几乎都不学马列了，学马列‘无用’论普遍存在。”[cccxc]

（三）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基本停止

在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亲自主持下，延安翻译出版了大量马、恩、列、斯原著，成为全国翻译出版发行马列著作的中心。1938年马列学院成立后，还专门组建了一个编译部，主任由张闻天兼任。另外，中央军委也有个编译局，和我们外语学校合在一起。毛泽东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马列学院改组，撤消了编译局，基本上停止了马列著作的翻译编辑工作。虽然毛泽东有时也提一下翻译马列著作，中央书记处还于1943年5月27日做出《关于1943年翻译工作的决定》。[cccxci]但由于只限于口头说说，即使形成决定，也缺乏具体措施，而且在学习马列上历来口头说的和实际做的往往是两回事，何况本年领导上主要抓的是抢救运动，这都注定了该决定只能最后落空。因为反对教条主义不仅反到理论工作者的头上，也反对到理论书籍翻译者的头上。例如先前在国统区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柯柏年就受到批判（可见当时是普遍把书本知识当作教条的），气得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了，虽经毛泽东亲自劝解，柯柏年还是坚决不干，后来就一直搞起了外交工作，所以跟我很熟。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七大讲话中说的，做翻译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作别的工作”，[cccxcii]其中所指可能就有柯柏年。实则根本原因还在于批判所谓教条主义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后来的抢救运动更把知识分子，特别是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整苦了；除极少数得到重用的之外，他们大多被打入了“另册”。所以毛泽东在七大讲话中对翻译工作口头上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延安理论翻译的繁荣时期经过整风已彻底结束了，延安也从此失去了翻译编辑马列著作在全国的中心地位。

（四）有利于学习热潮和理论繁荣的对外开放一时中断

1941年到1944年，延安的对外交流与来往几乎陷于中断。这期间，延安同国统区还有点秘密渠道，但大量的来往已基本停顿；同外国人来往就更困难得多了，例如过去每年都有好几起来访的美国人，这些年就已完全中断。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封锁，但我们自己忙于整风抢救，停止对外联系和不愿在全面戒严的情况下让外边人来视察访问，也是重要原因。而且为了粉饰自己和应付参观，还搞一套形式主义以至弄虚作假的招数。例如直到三年后的1944年7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21人访问延安，我们就费了很大的劲，除打扫卫生等作表面文章外，各机关学校还要进行一点临时训练，由上面发下估计记者可能提出的二三十个问题，写出标准答案，让大家记住

甚至背诵，以免答错。那次没来我们学校，我们算是白准备了。但其它被访问者的答复看来不见得效果就好。有的记者在报道中提到，大家的回答有点千篇一律且不自然。特别是对王实味的访问，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作法，似乎被当作“优良传统”保持了下来，以此应付上级的检查和外来参观。

（五）整风停止了一切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

整风开始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在职干部，都已完全停止了原来的政治学习（即正常理解的马列主义教育），只学整风文件，其实主要时间还是开会（对照文件）进行检查交代、批评质疑和没完没了地写反省笔记、交代材料。因为毛泽东规定，各人都得写反省笔记和思想自传，而且这是铁的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过了不久，各单位就又先后开始了肃反。特别是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的讲话中批评了对敌特麻木不仁和提出要抓“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之后，被称作审干运动的抢救运动就在延安普遍展开了。在这样的气氛下，谁还能顾得上学习理论？因为要学理论，起码就得读书。这是刘少奇当时还在强调的。他说，“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cccxciii]可是在延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舆论一律和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也是根本谈不上理论繁荣的。以第一个《四三决定》为标志的普遍整风开始不到两个月，就发动了对王实味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所有原来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连参加批判尤其是进行检讨都有点来不及，哪儿还有心思和时间进行研究？无论是报刊还是会议，很快就实现了舆论一律，已无从看到和听到理论上的争鸣。及至抢救运动发起后，延安更是一片萧索，人人自危，不但失去欢声笑语，而且已没有什么人再对理论感兴趣，理论研究实际上完全停止了，哪儿还谈得上繁荣!

按照多年来的正式说法，情况似乎恰巧相反，延安整风本身就不只标志着理论繁荣，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理论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已被定为全党以至全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这里是预设了两个很不准确的前提条件的。一个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似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书本知识）已经学到手，只是不用或不会用的问题。二是把斯大林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代表）当作了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的典范，而整风的目的正是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用斯大林的理论武装全党。这两点合在一起，就得出一条结论：不要多读马恩著作了，只要着重读一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东西就行了，关键在于实用。毛泽东就说，“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箭与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cccxciv]虽然毛泽东声明这是故意挖苦教条主义者的，但实际情况证明这倒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思想，不仅整风时，而且此后一直轻视以至鄙视读书和书本知识就是证明。这又是后来坚持知识分子和一切干部都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思想根源。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枝箭是否已拿到手，老早就有人提出了质疑。[cccxcv]实际上，这时党的主要领导及其主要理论助手（或称智囊）

都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很难说已把马克思主义这枝箭拿到了手。因此射出去的箭就搀有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更多地是中国封建社会（包括农民起义）、斯大林专制主义、以至民粹主义的东西。例如在整风中大搞无法无天的抢救运动，就决不能说符合马克思主义。后来许多做法更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所有这些，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讨论。不过这里还得附带说明一点，就是整风中采用的学习方法也不是解放思想而是束缚思想，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倒是带有中国封建社会私塾那种填鸭式的死读书的味道。例如往往一个文件要反复阅读和讨论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几乎可以背诵。那二十多篇《整风文献》，就拖拖拉拉学了两三年。这种号称"少而精"的学习办法，很容易使人思想受到束缚、禁锢和简单化，妨碍个性的发挥、思路的活跃和境界的开阔。这也许正是领导上的要求，所以这一学习方法被视为好的经验，一直传了下来。至今这一反复学一个文件或"重要讲话"的传统，仍是政治学习的主要方法。

由此可见，延安整风不仅打断和改变了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进行理论研究的秩序和环境，而且还产生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后遗症。

四，延安整风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影响

延安整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习和运用，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但是历史地看，积极作用是短暂的，消极影响却是长远的、处在主要地位。长期以来对延安整风的那种全盘肯定，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下面作为举例，只着重谈三个问题。

（一）延安整风使学习马克思主义之风日下，反而增加不少扭曲和误解

上面说过，这是连胡乔木也承认的。[cccxcvi]古今历史都一再证明，理论上的垄断，是对理论繁荣的扼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则不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而且还会使它被修正和篡改，成为解释者不正确的理解甚至只是他个人思想认识的宣传。整风反教条主义的结果，使理论学习进入低潮，读马列不再是风尚了。虽然毛泽东有时也指定几本马列著作为“干部必读”，但由于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具体措施，所以从地方到中央机关，几次都落空了。后来更逐渐形成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更没有什么人去读马列了（大约只是一些高等院校，由于照搬苏联，倒还有学马列的课程安排）。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领导人，不学马列，缺乏马克思主义常识，对工作曾带来极大危害。例如邓小平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然而他（指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法。”[cccxcvii]胡乔木也承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cccxcviii]既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经济是基础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怎么能不犯错误，怎么能搞好经济建设？这恐怕也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落后了三十年，被周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远远抛到了后面的一个原因。哪儿能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学马克思主义，但有些政策和做法却又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就势必出现一些歪曲和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提供一种方法，而不是现实的答案。事实上，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设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列宁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不可苛求于前人的。问题在于，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已更不重视学习马列，而只学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和各时期的中央文件，这才出现了上引胡乔木所说的现象。但老祖宗的旗帜（毛泽东连列宁、斯大林也都称为不能丢的两把刀子）又必须高举，于是就把一些民粹主义的东西、中国古人的设想（如张鲁推行的“义仓”、康有为着的《大同书》之类）和我们自己过时的作法（如供给制、游击习气等），也硬要和马克思联起来。这，作为思想，是更多的乌托邦；付之实践，最后必然失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就是铁证。这里再根据个人的认识，举几个曲解和误解的例子。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未来的社会作了许多设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十分科学和准确的。如果再加误解，那就更属“失之千里”了。例如马克思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cccxcix]于是，我们就抓住“过渡”二字大作起文章来了。人家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却要急着从资本主义很少发展的所谓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还批评那种“说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cd]实际上，我们说的过渡是名副其实的“穷过渡”，和马克思说的过渡是两回事。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cdi]他谈的过渡是不顾生产力发展，主要指所有制的转变。他以人民公社为例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并预言，“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我们就比苏联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就会同赫鲁晓夫的意见分歧大起来，发生所谓“对表”问题。[cdii]要知道，当毛泽东带领几个秀才在杭州这样想入非非、坐而论道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每日饿死数万（单是四川一省，按官方统计，到1960年底已死了整一千万）的人为“三年困难时期”。后来，他竟发现经济发展的危险，即“富则修”。“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由穷变富就要变成反革命。同样，……知识越多越反动。”[cdiii]所有这些，不是对马克思的曲解又是什么？

我们还可再以《哥达纲领批判》为例。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后译权利），是指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的原则，完全是在抽象意义上说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已经讲的有点偏。到了毛泽东，理解与马克思就离得更远了。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成按劳分配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的权利，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cdiv]而且早在1958年，他就曾一度主张恢复供给制，赞成吃饭不要钱，所以对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颇为欣赏。[cdv]

类似案例还可举出许多。这都说明，延安整风造成了一个错觉，不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由于认为已经掌握了，问题只在运用和发展。但是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许多问题，包括它的一般知识，特别是基本原则，都并没有搞清楚，所以理解和实行的就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二）只学斯大林也为建国后一切照搬苏联奠定理论基础

关于延安整风，多年以后毛泽东曾一再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cdvi]其实，这只是党史上常见的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但却没有看到任何能拿得出来的证据。同这些事后的说法正好相反，当时的延安整风主要是学苏联的，不但公开提出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而且在当时完全保密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连续两天的报告还是讲解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2条。而对整风宣布的宗旨也是要把党建成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高层整风还是普遍整风，学的都是斯大林理论，这是我

们在前面一再说过的，而且有《整风文献》为证。那么，是不是在内部极小范围的整风中指名或不指名地“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连一点点暗示也不会有。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和胆量。实际情况相反，当时中央主流和非主流各方都要尽量把自己说成是忠于斯大林和拥护共产国际的，把批判对象的拥护说成是假的，甚至把“国际”也分成“真假”两种，[cdvii]并用斯大林的教导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批判所谓教条主义宗派。例如1943年12月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文件中就完全是摘录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论述和语录。[cdviii] 28日书记处和政治局又分别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的指示》和《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都在于说明，王、博们的活动“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示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cdix]这只是顺便举个例子。实际上，延安整风中不但上面没有讲过，下面也根本没有感到有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意思。几十年后翻过来的说法，自然举不出任何根据，只能证明个人迷信影响之深和舆论控制之严。按我们这些普通干部的真实思想情况，和这些事后说法相反，经过延安整风，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斯大林的崇敬（他死时，全国包括毛泽东本人的沉痛悼念就是证明）和对苏联经验的向往，更加坚定了把中国变成苏联的决心。

说“整风是整苏联的风”，是“破除”“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倾向的伟大思想运动”，不但完全不符合延安整风的学习内容和从上到下的思想状态，而且和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一直照搬苏联经验是相矛盾的。既然那时就已“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神圣化倾向”，为什么后来还一切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实在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不只建国后一切学苏联，在整风中就已尽可能地在以苏联为榜样。这是我们当时在延安亲身体会和亲眼看到的。例如1938年前后延安那种生动活泼的局面，“首长”现象并不明显，人们星期天常在街上遇到中央领导同志，晚会上可以“拉”包括朱德、毛泽东等领袖们唱歌、出节目，等等，整风以后这些现象就完全消失了。这除了整风抢救造成的紧张空气外，还由于任弼时出任中央秘书长以后就从苏联搬来了一套包括政治和生活待遇上的等级制度、领导干部的警卫制度等规矩。从此，除开会外，在街上已再碰不到中央领导人，更不用说随便谈话和请签名、题字和拉唱歌之类以前常见的事了。这大概是没有哪个老延安能够否认的。至于大的方面，特别是党的建设和组织生活，也是尽量向苏共看齐，连书记处的改组也以苏共为榜样。1934年苏共十七大后，为了便于斯大林的控制，书记只剩下四个人，即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基洛夫、日丹诺夫。由于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而且不久后遇刺身亡，所以实际上书记处只有三个人。1943年我党中央领导机构调整后，书记处也只剩下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而且干脆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其余两人只是主席的助手。[cdx]从此，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六届七中全会后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在党内外就行使他的“决定之权”了。所以建国后曾两次批评刘少奇和杨尚昆说，“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cdxi]

在这里，党的纪律已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一人了。不仅在中央权力向书记处集中、书记处又赋予第一把手决定权上，中共完全按苏联的模式办事，而且也正是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开始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况。对延安整风、对毛泽东思想真正称得上权威的胡乔木就曾说，“而苏联的那种模式，确实对中国党影响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cdxii]胡乔木还直截了当地说，“延安反教条主义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对斯大林建设党、领导国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理、方法没有批判。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cdxiii]由此可见，那种关于延安整风是批斯大林、是破除崇拜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而有些自认为乔木胡绳学派的党史研究者又只是师承了他们不够实事求是的一面。

正是延安整风掀起的全党学习斯大林理论，把《联共（布）党史》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认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我们建党、建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使我们走了极大的弯路，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至今影响仍严重存在。

（三）中共自身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优良传统也遭到损害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在俄共的帮助下成立起来并接受其直接领导的，因此受俄共及其指挥下的国际共运的影响很自然，而且非常之大，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决定性。这是无须多讲的。但中共总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不能不带有很多中国的印记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值得强调的是，建党初期的一批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对此都有比较清醒的一定认识，所以从一开始就注意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培育出了一些好的作风和传统，为中国党开创了毛泽东所称的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这些好的作风和传统，可以简要举出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后，即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它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指出，委员制，遇事公决，不但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绝个人独裁和官僚式的流弊。他虽然自视极高，脾气很倔，但也经常警惕大家因对他的尊敬和畏惧而不愿或不敢提不同意见，所以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还特别提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发生偏差，要求会议予以纠正。李大钊的民主作风更受到党员们的一致好评。[cdxiv]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虽然党处在白色恐怖中，但他仍再三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中指出，“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是领导人犯错误的“组织上的根基”。在另一《通告》中还提出“反对封建社会的遗习，因为中国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cdxv]这也确实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

二是与民主有关的自由讨论作风。陈独秀已认识到，党内不同意见的争

论，“不但不可能避免，且不应避免，有时还是万分需要”。[cdxvi]在这方面，瞿秋白的态度更开明，早在1927年2月就批评那种不准讨论政治问题的诸多“不准”，“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的党内消极纪律。[cdxvii]他在1928年7月起草的六大《决议案》中还正式规定：“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也专门增加了如下内容：“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cdxviii]而且事实上，那个时期不仅党的会议上经常有争论（六大就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在党的报刊上也总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讨论各种重大问题。大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就说过，“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cdxix]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批评舆论一律的。他写道，“你们并不要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cdxx]

三是与民主和自由都有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早期党的生活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公开进行的，党员可以在党报上公开批评领导包括总书记。当时就有不少人（如瞿秋白等）着文批评陈独秀。而党的领导既可作辩解和反批评，也常进行自我批评。陈独秀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公开讲过，“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同时他也指名批评了张国焘、邓中夏。[cdxxi]当了第一把手，就“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现象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四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延安整风后的党史编纂学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向后推了十多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受个人崇拜的影响。其实，建党后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很早就已提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cdxxii]党的一大，陈、李因故未能出席，大会通过的党纲只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cdxxiii]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国现存阶级和政党以及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民主革命基本纲领，为二大的召开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使二大《宣言》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cdxxiv]参与二大《宣言》和《决议案》起草工作的蔡和森也曾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形成自己的理论”。[cdxxv]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联系实际，并非六届六中全会或延安整风中的建树。至于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创始人在建党前就已注意和实践起来。例如陈独秀1920年就来了个创举，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请了16个人题字，既有孙中山等7位名人，还找了9个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李大钊亲身参加群众斗争，多次在反对军阀的游行中冲锋在前，更是早已出了名的。中国党创建后的迅速发展壮大，是同这些领导人确立和奉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分不开的。

五是严格保持清廉自律作风。1926年8月4日，陈独秀亲自签发了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

内称："一个革命的党若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cdxxvi]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陈独秀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同时，他和李大钊等人还以身作则，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一心扑到革命工作上，生活十分清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还是一个硬汉，从不开口向人要钱。李大钊作为教授，收入不菲，但他多用之于革命事业和接济他人，自己却常有断炊之虞。他牺牲后得到的社会评论是："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裳，皆为友助。"[cdxxvii]

最后再提一点，就是我们党有一个延续了二十年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

上述这些优良作风和传统，经过延安整风，都被严重削弱以至破坏了。第一，关于发扬民主，以我个人感受而言，整风前还真有点民主生活的体会，整风后就再感觉不到什么民主了，有时也参加选举，但基本流于形式。至于个人独裁，这是人所皆知，不用再讲的。第二，关于自由讨论，整风后即为舆论一律所代替，连党代表大会的发言都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瞿秋白批评的"不准"倒是"与时俱进"，越来越多也越严。第三，整风后已没有人敢于批评毛泽东（开头还可提点不同意见，后来也不行了），他自己又宣布是不下"罪己诏"、不作自我批评的（那种空洞的承担责任当然算不上），而对有些人的批评则实在是残酷斗争、彻底打倒。流风所至，只有上级对下级的批评，很少下对上的批评，特别是第一把手不能碰。第四，说的和做的越来越分家，毛泽东本人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更是写到党的历史决议中了。第五，关于清廉作风，延安整风时就已从苏联搬来等级制，严格的保密制和警卫制等，背离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倡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巴黎公社原则——"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及为此而采取的有关措施。[cdxxviii]这个变化虽然有个过程，但最后还是变了，而且首先从党的领导变起。例如在"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三年困难时期，各地为领袖所修豪华别墅之多，恐怕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最后，关于不突出个人的传统，大约从1940年起就开始被打破。这一年不但出现不少歌颂和学习毛泽东的文章，还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泽东日"。及至整风运动开始，"红太阳"、"大救星"、"万岁"等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称呼和活动就日益普遍和升温了。

提出上面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延安整风不仅没有学马克思主义，而且整风的结果还导致实践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些研究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的人，过分注重书本材料和言论，而不去了解当时的实际，更不愿把有关言论和当时实际相对照，只是纸上谈兵。例如写毛泽东如何讲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根据无非是毛什么时候说过关于民主的话。有的还举例说，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和任弼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但未影响关系，反而更增加了同志之间的感情"。[cdxxix]这显然是属于有倾向性的想象，提不出任何"增加"感情的根据。但人们却知道，争吵后，任弼时的"支队司令换成恩来同志"。[cdxxx]其它还有什么毛泽东和文化人包括萧军、丁玲等交朋友；毛泽东如何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几被消灭殆尽）的友好相处，等等，实在都是莫大的讽刺。如果光看言论，那斯大林也许是最反对个人崇拜和阿谀奉承的。你看他在联共十七大的报告中对那些只会讲空话和向上讨好的人挖苦得有多厉害。另外，从言论中还可看出斯大林

非常重视自我批评，是个很谦虚的人。然而实际情况却都恰恰相反。何况我们和斯大林还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对过去的讲话和文章采取“与时俱进”的做法，按后来的思想不断加以修改。至于那些用现在的认识去编写多年前的《回忆录》，就更不用说了。甚至搞文字狱的专家乾隆皇帝也冠冕堂皇地声明，“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大清律例》也无“以文字杀人”的规定，但却有“诗文书札”“显有逆迹”和有“确实悖逆形迹者”，治罪。光看表面文章——公开言论和书面规定就下判断，行吗？

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延安整风不能说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时要谈一些实际效果的原因。这也是试图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看延安整风是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倒不是“离题万里”的发泄。

（2003年12月完稿）cdxxxi

第十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一

——关于抢救运动的评估、资料和一些提法问题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比中央苏区抓“AB”团还要严格。因为抓“AB”团后来一般都把责任推给尚未成立的“左”倾中央和并不存在的王明路线（即使按许多党史书上的说法，也是大抓“AB团”后的四中全会上才出现所谓“王明路线”），[cdxxxii]但抢救运动却无法可推，只能干脆不提，因为不但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人，连康生在生前也是没人敢公开提的。例如被称为中共党史奠基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就根本没有提这个作者胡乔木自己也说是搞了两三年的抢救运动。[cdxxxiii]有些文件和文章如果提到，也说成审干运动（至今还有审干工作扩大化这种不通的提法[cdxxxiv]），或只把中间一小段说成“抢救运动”，而且都要强调审干运动方针的正确和取得的伟大成绩。其中最权威的，当数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所作的如下评价：“延安的审干运动，中央定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的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是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同时指出，“这个运动第一阶段发动群众，第三阶段甄别工作，都是做得对的，只是中间一段即第二阶段的‘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当时所以犯这个错误，除了有些干部主观上有‘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以外，也有客观原因。”如：“当时我们没有全国政权”，“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用发动群众的方法”来肃反“还缺乏经验”等。[cdxxxv]现在看来，这个评价并不妥当。第一，关于“九条方针”是否“完全正确”，下面还要专门讨论。而且蒋南翔早在1945年3月的书面意见中就提出了批评。中央组织部1985年已为他彻底平反，指出他的书面意见和在七大小组会的发言，“不但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cdxxxvi]第二，对审干运动成绩的估计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清查出几个反革命分子，连1947年在晋西北被处决的王实味和蔺克义都是冤案。至于说没有抢救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就胜利不了，事实证明也许正好相反，只能说它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第三，把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客观，责任完全推给下级干部，完全不合乎事实。然而这个评价却保持了几十年，至今仍在起着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抢救运动的禁区也打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也可以在一定范围进行讨论了。研究和讨论比较活跃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只是后来才逐渐趋于沉寂。而且总的看来，即使较活跃的那阵，也不能说对延安整风特别是抢救运动设的禁区已经解除，例如重要档案就继续严格保密。但是无论如何，经过那段拨乱反正，抢救运动已不再是秘密，正式的党史著作都不能不提到，人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研究讨论了。虽然仍旧把关很严，却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和引起一些争论。为了便于后面的讨论，先根据接触到的有关抢救运动的论述，谈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抢救运动的评价

一般说来，主流党史论着和民间研究成果（其实，有些关于抢救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只是互相传抄，谈不上研究），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抢救运动的基本说法都是一致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舆论一律”，只是使用材料和叙述详略有些不同。这些共同特点主要是：承认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中主要为康生造成的一个错误；但只是一个支流，且时间很短，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同时为维护延安整风的正确和领袖及其它领导人的威信，对抢救运动尽量淡化，重要内幕和详情实行严格保密。既有这些（或许还有别的）无形规定，自然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不过在这几条规定的框架内，有些问题似乎还可讨论，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后来的正史叙述和评论，一般都采取轻描淡写和简化的办法，并且要说明审干（肃反）运动的必要以及方针和结果的正确；跟某些所谓民间著作不同的是，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康生，也承认对敌情估计有些过分严重。除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完全回避了抢救运动外，拨乱反正后出的党史书一般都会提及。比较标准的提法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全书574页，讲延安整风不到7页，对涉及全党和党所领导的几乎所有地区的抢救运动用了还不到半页。说是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了抢救运动，“在十余天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央及时作了纠正，“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cdxxxvii]中央党史研究室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共836页，谈延安整风只有8页，涉及抢救运动的半页，精神与内容和胡绳说法大致相同。其它一些领袖的文集和传记如《毛泽东传》、《刘少奇传》等和他们的《年谱》，也都详略不同地稍有涉及，但都不出上述的原则和精神，而且特别明显的是尽量简化和多有掩饰。这点下面还会谈到。

民间论述，包括许多人的回忆录，虽然各有千秋，但出圈（违背上述框架和原则）的也不多。只是更多地把责任推给康生，描写和叙述更生动具体，还揭示了一些历史上回避的问题，但编造的成分也更多些，特别是一些所谓回忆录和“演义”式的党史著作。当然，对抢救运动持独立看法的党史著作也有，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有代表性的两本。一本是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cdxxxviii]对抢救运动只是附带谈到，所占篇幅很少，叙述还比较客观和真实，没有夹杂多少主观成分，虽然也多少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但不那么明显。另一本是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本书的特点（这里只谈有关抢救运动部分，其它不论）是，查阅的材料多，用了很大功夫；未受上述框框的限制，有更多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和被忽略的问题。应该说，本书对了解和研究延安整风颇有参考价值。但也有些片面性，例如过分强调毛泽东个人的肃反情结，而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和有关的国际因素重视不够；特别是由于作者只是从书本到书本，所以不免有主观臆测成分，一些事实也自然不够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前一本书还能在内地出版，后一本书就只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了。

对于遍及延安和边区及其它许多抗日根据地前后历时两三年的抢救运动，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过去讨论还不多。但也有一些著作提到，认为在我们党有了地方政权后就一直存在一条肃反上的极左路线，直到“文化大革

命”，抢救运动只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表现。这当然是毛泽东和正式党史所不承认，并极为忌讳的。所以陈毅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批评整风和抢救运动，就曾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受到痛斥。其实，陈毅当时只是轻微地提了几句说，“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cdxxxix]何况党史界现在已从过去滥用路线的极端走向主张一概不用路线的另一极端，这就更不能说抢救运动是路线错误了。但邓小平在讲“十次路线斗争”中有好些次算不上，却也没有否认以往的肃反曾经存在过一条错误路线。而且毛泽东在抢救运动中就已提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是：逼，供，信。”[cdxl]对此，至今也没有人否认过，官方党史著作为了说明“九条方针”的正确和毛泽东反对“逼、供、信”，也还在经常引证。但是，事过境迁，毛泽东却改变了说法。在1944年10月25日的报告中的提法是：“‘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cdxli]这就同以前说的“错误路线是：逼、供、信”相互矛盾了。其实不管毛泽东怎么说还是党史书上怎么写，了解情况者还是心中有数的。1944年北方局党校抢救运动中整人的与被整的几位老同志，1983年12月24日在一起的议论就是证明。当杨献珍向刘建章道歉后（杨在抢救中曾动手打过刘），刘就说，“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在场的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cdxlii]连师哲都说，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是“一条错误路线”，只是认为是由康生“推行”的。[cdxliii]总之，抢救运动是“左”的路线错误，不论是否承认这一定性，都不能改变那个党史阶段发生过的事实。犹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不管你承认与否，都是一场路线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只是斗争结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

最近听到一位党史工作者说，她访问过的历次政治运动参加者，往往听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总要强调运动的必要性和成绩，而把错误和缺点看得轻一些。被整者则相反，总是强调错误而看轻以至否认成绩。这被人们视为一般“规律”，奠定尔后一切政治运动模式的延安整风抢救自不例外。由于延安整风中创立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对整风抢救的评价就只能以它为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着书立说回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就多是一些领导干部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且党史界也多将其作为第一手的正面材料加以引用。至于在运动中挨整的、被抢救的、蹲过保安处、西北公学班房的，一些人在解放后还成了领导干部，但是很少看到他们对整风特别是审干抢救所写的回忆，大多保持缄默。原因是不难想象的。

其实，这个“规律”能否成立，倒也不一定。例如对抢救运动始终持否定态度的中央领导同志中就有周恩来、张闻天等多数人，只是他们当时说话的作用不大，事后也不便提起。就是积极分子和骨干，对抢救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例如1933年入党，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的蒋南翔，当时主持中央青委的整风和抢救，本人并未被抢救，但却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公心和知识分子的正直，还在运动尚未完全结束的1945年3月就忘身进谏，向刘少奇并中央写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很难得的是，他那时就能点名批评

康生并对抢救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如说青委的抢救是“石子里榨油”，“根本失败”；说抢救中的“群众路线”是“瞎子摸鱼”、“乱作斗争”；说抢救是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说抢救暴露了党的领导上“存在很严重的弱点”，缺乏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说抢救产生了许多消极因素，包括造成同志间的隔阂等，事后领导上的解释并没有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说抢救期间几乎停顿一切正常业务，“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等等。[cdxliv]又如批斗王实味的积极分子温济泽，在被改正错划“右派”后，不但竭力促成王实味的平反，还发表了一些跟中央不同的意见，批评关于“九条方针”的中央决定对敌情估计过火，认为抢救运动不是什么“支流”，“而是一次爆发的山洪”，是在提倡“实事求是”的整风中干出的“不‘实事求是’的坏事、蠢事”。[cdxlv]

当然，现在已没有人敢再否认抢救运动的错误了，但对错误的性质、程度、因果、责任等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当时的积极分子至今对抢救运动的论述和评价，就同蒋南翔、温济泽、韦君宜[cdxlvi]等人有根本的区别。例如现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在事过半个世纪的1991年底发表的一篇《回忆延安整风》的文章，谈到抢救运动就很不实事求是。如说，“毛主席的‘九条方针’”“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说“甄别工作一直到七大前后才结束，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审查者向被审查者‘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cdxlvii]

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句话符合实际。关于“九条方针”及其是否解脱了被审查者等问题，以及文中所提坏事变好事，“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的说法，下面还要做些讨论。这里先指出一点，即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不太久才做了两件重要的平反工作。一件是1982年2月中组部作的《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cdxlviii]一件是全国上下特别是学界、文艺界几乎无人不晓的王实味一案。先是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在注释中修改了以前对王实味的无据罪名，说“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据查，不能成立。”[cdxlix]后来就是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cdl]仅据此两例，人们就可以看到，上引《回忆延安整风》中所说的不实。因为既然“没有一个同志受冤屈”，“全都作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那还搞什么平反和昭雪？而且还应特别说明的是，恰巧王实味和“五人反党集团”两案，正是《回忆延安整风》作者亲自参加批斗的（所谓“大会一起开，小会分别开，连续开了七十二天”），文中对王实味等有关问题也有详细描述。既然如此，怎么能得出上述那样绝对化的结论呢？是否仍然认为整风中对王实味、陈传纲（未等及平反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处理是“符合实际、”并不“冤屈”的？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组织和整理这篇回忆的单位《党的文献》编辑部，都不致忽略三中全会后对延安整风抢救中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其中也包括中组部1985年给蒋南翔上述《意见书》的平反。问题还不在于这些具体案例，更重要的是这篇《回忆》反映了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因而受到重视。例如作为正史的《毛泽东传》在《整风运动》一章中就有三处引证，[cdli]成了除毛泽东本人外，被引证频率最高的一个文件。而被中组部在平反决定中肯定为“实事

求是”的蒋南翔当时的《意见书》，却无一处引证，别的党史著作和主要领导人传记也没见到引证过，可见其不受欢迎。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威的党史界对延安整风中抢救运动的评价。

对于已经过去六十年的抢救运动，是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无论从当时情况还是六十年来的实践检验看，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场自己人把自己人当敌特整的大混战，收获极小，损失极大，没有抓到什么敌人，自己却有一定伤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杀或被逼疯、致残，包括抢救中自杀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凤平等），特别是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精神的巨大浪费，还为以后许多运动开了不良的先例（有些完全是依样画葫芦，如某些地区解放后的肃反和“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如果认为这种估价错误，那就请有关单位和权威机构公布一些早应解密（其实并无密可保，主要还是为了掩盖错误）的文件和材料，以及抓到几个真特务、姓甚名谁；假坦白者及其档案的处理；抢救中的伤亡和致残情况；抢救运动耽误了多少战斗、工作和时间，等等。有关抢救运动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下面还要加以讨论。总之，抢救运动已经事过六十年，现在不应再由于“为尊者讳”，而对实际情况和史料加以遮掩，也不必只作没根据的断语结论，而应趁着参加过抢救运动的还有许多人健在，由有关单位组织和进行真正实事求是的总结，以便汲取教训，也对那段重要的历史作一个交代。这当然就要开放禁区，放松在档案资料、发表权利和观点看法上的垄断，允许不同意见在平等条件下的争鸣。其实，这点希望恐怕在相当时期还办不到，因为要维护延安整风创建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原则，对意识形态的管制是不会放松的。这从对史料的使用和处理上也可看出来。

二，研究和讨论整风抢救所用资料问题

（一）对所用资料必须去伪存真

在研究工作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那么整风抢救的第一手材料是什么呢？按理，主要应为：有关整风抢救的档案，包括正式文电，会议记录等；当事人的见证；人们当时所写材料，如表格、自传、日记、建议，以及证明、交代、申辩、控诉等。其实这些所谓第一手材料中，假的就不少，特别是个人填写的表格、写的自传，以及检举证明和坦白交代等。我们上面论及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其它检讨时，尚且提到许多不够实事求是之处。我也多次听到过一些领导人如周恩来、陈云等的过头检讨。那时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小干部就更不用说了，在整风抢救中许多人的坦白交代和检举证明，完全是瞎编的假话。我自己就曾犯过严重错误，一度为了过关写了承认是特务的假材料，虽然清醒过来后又很快推翻，但仍是“铁案如山”，被放进档案袋。除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外，就是中央文件和重要会议记录，同实际情况也有很多不一致。所以即使对这样理解的第一手材料，在引用时也有个去伪存真的反复对比和调查研究过程，千万不能以为当时文件或记录上怎样写，实际情况就是怎样。例如，文件上写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说了四十多年，结果证明完全错误。因为说“托派”，还多少有点影子（本人早已交代清楚），说成“国民党探子”就只能是毛泽东的主观推断了。

一些人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和对当时运动的领导干部或骨干的访问记，能不能算第一手材料，恐怕很难算，即使算，可靠性也是大成问题的。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列宁就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因为写回忆录的人总要把自己说得好些。董必武老人对回忆录所说，除了前篇引的“回忆因为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时间距离又长，特别是“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等以外，他还接着说，“两个人回忆同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cdlii]可见回忆录上说的东西不一定可靠。但是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却掀起了一个领导人和名人写回忆录的热潮，而且至今不衰。据我所知，除极个别领导同志如李一氓以外，多数领导人都是组织一个少则两三人多则几十人的班子，帮他查找材料、执笔整理，在既无详细日记又无纪录更无录音的情况下，竟然可以对三五十年前的事写得生动活泼、有鼻子有眼、以至大量用带引号的对话。这只能是按照当年历史的大致情况和现在的思想认识，共同编造出来的，其真实性，可想而知。然而由于是应运而生，还真派上了用场，许多正式党史出版物，特别是领导人传记，也按其“所需”在大量引用。例如《聂荣臻回忆录》谈遵义会议的一段，会前酝酿和会议期间竟然没有张闻天的名字，有的倒是“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能是历史真实吗？可就是这样的“回忆”，竟被作为正式文件列入《遵义会议文献》[cdliii]。这只是顺便提到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带有明显编造和炫耀性质的所谓“回忆录”，真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这本来是古今通例，原不足怪，问题就在于对这类历史资料

如何看待和如何使用。中共党史研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真有它的特色。

延安整风创立的中共党史编纂学，对党史设置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框架和原则（如上面列举的几条），不但史实的研究论述，而且史料的取舍使用，都得合乎这些框架和原则。不但头几十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曾一度有所放松，但这一框架和原则仍然不许突破，后来反而更严格了，并设立了专门机关负责编写和把关，以保证党史的资料管理和研究著述不出这个圈。关于整风抢救的档案是一贯严格保密的，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前段时期，倒还一时稍为开放了一部分。一是公布了少数档案中的中央文件，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文集》中有几篇，还在1984年专门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三年三月）[cdliv]；二是一些领导人在个人的《回忆录》中使用和涉及的有关档案，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薄一波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等；三是一些研究论着中透露的档案材料，如《延安整风五十周年》一书，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cdlv]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cdlvi]以及其它一些书籍和论文；四是许多人靠自己记忆写的回忆录和一些人的日记。现在人们的研究恐怕主要就靠这些一二三手资料。但是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得注意两点。一是公布的档案和领导人回忆中所透露的点滴，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不但没有越出固定框子的圈，而且毋宁说是为证实和加强有关原则服务的。二是领导人的论述和回忆也要打折扣。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cdlvii]的胡乔木的不少论述就不符合实际，我曾一再指出过，下面还会多次谈到。

就是写回忆录别开生面、"也写了自己错误"、因而受到邓小平赞扬的李维汉，[cdlviii]也有不少为自己开脱之处。例如他说的陕公创办之初制造了一件冤假错案，把一批好学的进步青年组织的名曰"卡尔学会"的读书会，毫无根据地（只是因为名字叫的怪，为什么叫卡尔不叫马克思）打成反革命组织，开除了七八名，几十个人不分配工作。其实，抗日战争前，上海左翼人士多称马克思的名字卡尔，目的在减少国民党检查官的注意。对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是这样。李维汉在四五十年后还就此进行检讨，"深以为咎"，这种精神确实少有，令人感动。但中间却加了一句"那时王明、康生刚回国，他们把苏联斗争搬到延安，也影响了陕公。"[cdlix]就显得有点牵强。因为陕公创办于1937年8月，王明等11月才回来，他们影响不会传播得那么快。又如他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的会上的发言，把中央研究院在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cdlx]事实证明并不正确。涉及个人责任问题的更多，如把王实味打成托派和在边区政府搞抢救的责任推给康生，把长征前夕提出政府系统人员去留（包括瞿秋白等）名单的责任完全推给三人团，以及许多叙述的跟风表现，都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至于一些权威著作如毛泽东的文章，经过筛选发表出来的是否就是原文呢？大多不是。不合上述框子和原则的，把关的单位仍然要加以删节改动，而且往往不作说明，不留痕迹。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其中有一篇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注明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纪录稿刊印"，按理应当是真的原文了。但杨奎松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中引证的，毛泽东在同一天同一篇讲话中却有：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个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

数，“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cdlxi]看来杨奎松大概没有这样大的胆量，敢编造这么一大段“最高指示”。实际上只能是有关单位对原文作了删节改动，说根据纪录稿刊印，自然不是真话。又如《毛泽东文集》同卷载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也注明是根据纪录稿刊印，但却删掉谈王实味等的有关问题。如说，“整风审干改造了人，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西安给他开了追悼会，还说延安杀了好多人。现在我们把王实味的照片一登，送给他外面的朋友。”[cdlxii]这是从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陈晋着《文人毛泽东》一书中所引，大约决不会是捏造领袖的言论，差错更不会出在纪录稿的身上。这里只是为了说明有关问题顺便举两个例子，类似情况还可举出不少。

对毛泽东的文章、言论尚且如此，对其它的人和事，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也无须多所列举。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不在此一提，就是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亲启电报，和毛泽东1944年1月2日和1月7日的两封复电，对中苏关系、党的政策、党内斗争和整风审干都有巨大作用，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促成抢救运动在延安的刹车和上层路线斗争的显着缓和。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奇怪的是，正式党史著作一律不予理睬，《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只字不提，似乎这样一件大事从未发生过一样。[cdlxiii]同样，毛在这个时期同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评论员弗拉基米洛夫的频繁接触和长时间重要谈话，这些正式著述和资料中也都不见痕迹。对于这类有意“忽略”，我们下面还会回过头来谈到。

人们也许会问，延安整风时不是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而且一直强调到现在吗？为什么正好会在整风期间干出这样的“坏事、蠢事”来呢？既然明知是犯了错误，却又为何既不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还要长期删削文件、修改历史？其实道理很简单，都是为了维护上述的框架和原则。而且对于“实事求是”或“尊重事实”，我们也有独特的解释，就是要符合毛泽东所提“革命的功利主义”，一切都看是否对革命“有利”。按以前的说法，“实事求是”也是讲“阶级性”的。例如那时陆定一就谈到“两种真实性”，一种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哪怕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还没发生的“本质真实性”，一种是只反映事物“表象”和“假象”的“虚假真实性”。[cdlxiv]所以要遵守“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的原则。[cdlxv]现在更有人提出，讲实事求是也要顾全大局、有利于稳定。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党史研究完全不讲实事求是、一点也不尊重事实，而只是说实事求是和尊重事实必须遵守延安整风及此后确立的各项重要原则。设立有关的权威机构，一个重要原因和它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严格把关。

（二）《回忆录》不可靠的举例

为了表明在党史资料上也是定论第一，事实第二，同时也要着重说明一下被党史界广泛引用的回忆录的不可靠，这里再特意举两个例子，并要多说几句。

1，《杨尚昆回忆录》谈抢救柯庆施是后来编的

对于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我在本书前面篇章中谈到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时，曾指出这本《回忆录》有关遵义会议的一段论述和杨本人生前的说法截然不同，并指出只能断定他生前的说法是真，死后由别人整理的“回忆”是假。这是明显地要把杨的“回忆”纳入党史的固定框架内（诸如要求毛主席领导全党是众望所归，张闻天不是总书记，只是分工“负总责”之类），因而要编造一些话来代替本人生前一再发表过的观点和说法。现在我们讨论到抢救运动，还可再以该《回忆录》的有关部分（其它无关的不谈）为例，来看一下是如何在为维护固定框架（为毛泽东开脱，把罪责推给康生）服务的。关于抢救，《回忆录》写得最有声有色的是关于抢救柯庆施的大会[cdlxvi]，而正是这一段可以看出完全是编造的，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关于开柯庆施的会，近年来曾同一些老同志多次谈到，[cdlxvii]不但印象和看法与《回忆录》所写大为不同，而且觉得《回忆录》的许多提法不近情理。如说杨自己（才从华北局书记任上回延）和李富春（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办主任）、邓发（当时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去找康生，康生竟“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这可能吗？据过去许多接触过和同康生一起工作过的人如曾彦修等说，康生的待人接物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他对人，包括青年，还是挺客气的。“说常委决定了”中的“常委”又何所指？那时政治局常委早已不存在，没听说过总学委设有常委。而且既然系“常委决定”，毛泽东怎么会不知道，还问“你们开什么会呀？”岂非自相矛盾。何况毛泽东已于1943年初搬住枣园，远隔延河和十里山沟，怎么能听到他们“又叫又闹”呢？杨尚昆怎么会“回家经过毛主席的窑洞”？据在杨家岭大礼堂正对过（中有山沟）、与大礼堂直线距离在百米以下的窑洞中住了几年的曾彦修说，“两三年间，大礼堂内除演京戏时偶能隐约听到一点儿锣鼓声外，其它什么声音也听不着”。毛住的一排窑洞，起码在上述距离的三倍以上。因此，毛就是没搬家，也不可能听到大礼堂的开会声音。另外，会上根本没有人提过书上引号中那些幼稚的问题，即使真提了，也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会议是相当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的。[cdlxviii]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先谈的是别的问题，已到下午四时后，李富春突然提出有人在礼堂内墙上写了“柯庆施是特务”等字样，要柯说明。在柯严正否认后就开始揭发和提问。首先发言的是李克农，鉴于他社会部副部长的身份，人们在吃惊之余也难于理解，大多抱将信将疑态度。第二个重点发言的是陈伯达，问题提得极尖锐，讲话虽有口音，但意思还听得懂。第三个发言的是个姓张的东北军中的老地下党员，马列学院已毕业的学员。提问题最积极的是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如问为什么北平党组织遭破坏时柯庆施恰巧去外地，一次就去了绥远。据曾彦修谈，那天各个揭发发言重点几乎全是这同一性质的问题，只是时间、地点不同而已，可见均是事先布置好了的。徐以新坐在前排呼口号。由于柯庆施态度坚决，会议无结果而散。此后柯实际上即被软禁。他的妻子曾宪兰在妇委抢救中被逼跳井自杀后，领导上还故意找柯追问，说是他放跑的。曾彦修说，当时听到的传达是，曾宪兰是延安特务和境外特务里应外合逃出边区的，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不可大意云。直到1944年4月，才发下中央文件为柯平反，说当时所提问题均已查清。在延安

抢救中，这大概也是中央在短时间内对第一个人的正式平反，以后就没听说对第二个人再这样做了。从这些情况可以做出这样几点判断：第一，抢救柯庆施是有计划的一个重要行为，决非康生一时心血来潮。第二，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事先不会不知道，康生胆子再大也不敢擅自作此决定，李富春等也不会那样顺从康生。因为外号“柯大鼻子”在当时是延安的名人，又是领导干部。他是1920年的团员，1922年转党，谁都知道他是延安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王明生病住院，实际上是他负责），非一般干部可比。毛、刘当时主要抓整风审干，而且抓得很紧，决不会让这样的大事漏掉。第三，杨尚昆等三人如果真的会前去见康生，那也是商讨做法，而不是去劝阻。而且估计三人不会结伴去见康生，既然来回要“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那为什么不先见一下毛泽东？难道那时不是毛领导康，反而是康领导毛？总之，在仅一页书中就存在这么多问题，是极不合理的。何况参加那次会和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还有不少人健在，如果整理时能访问几位，也不致搞得很多情节都像小说似的。

2，师哲着《在历史巨人身边》关于抢救运动的叙述多有不实

师哲着《在历史巨人身边》是一本较有影响和被引证较多的回忆录，因此这里要多说几句。影响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书名响亮，又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鼎力协助”和派党史专家整理出版，还有王震给写《序》，因而受到普遍重视，印数那时就近七万册，为一般回忆录所少见。但是只要看有关整风和抢救的部分，就会发现编造和炫耀的成分实在太多。此后出版的一本《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cdlxix]硬伤还要更多。例如开篇《整风运动之初》第一段，只有两三句话，却有几处硬伤。刘少奇1942年底才回到延安，怎么可能同毛泽东、康生三人组成第一次成立的总学委。说毛在总学委“只挂了个名”，更是毫无根据。说“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管”，也完全违背历史（刘当时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类差错，而两次编辑又都轻易放过（先发表于1989年第4期《中华英烈》，1997年出书）？原因就是党史工作中的把关，主要看是否合乎所需要的原则，至于合不合乎事实似乎倒在其次。而师哲这样说，正可以为毛、刘开脱，把责任推给康生。所以《刘少奇传》上谈到肃反扩大化时，也乐于引证他的回忆：“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多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cdlxx]其实，延安的抢救高潮出现在1943年下半年，这时刘少奇已回延安大半年，并出任“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成立于4月28日）主任，在肃反上直接领导康生、彭真、高岗等也有好几个月，何况上面还有总学委主任毛泽东在直接抓整风审干，怎么可能是师哲“回忆”的那样让康生成了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就在引证这句话的一段里也有好几处硬伤，如说“1943年3月，刘少奇回到延安”（实为1942年底），说“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cdlxxi]（这时毛泽东、康生住枣园）等。既然在一小段话里就有这些明显的硬伤，定然说明这段“回忆”的不可靠，怎么还能引证其中“有利”的那一句呢？综观师哲两部《回忆录》，可以说都是尽量按现在的思想认识和舆论导向，编写几十年前的故事。这里只就两个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第一，回忆录似应有别于传记文学，应该完全写实，不可任意虚构，特

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和领袖人物的谈话。而这两本《回忆录》却很不严谨，除了明显的硬伤外，有许多描述也是经不起推敲和不够真实的。例如作者个人同领导人的对话，不但不说明时间、地点、场合和旁证，还要加上引号。那么这些领导人的话能否当真呢？恐怕不能。否则单是这两本《回忆录》就可编一本《毛主席语录》。而且有些话，一看就不真、不像、不可能。例如总学委成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cdlxxii]又不谈此话的来源与根据，人们能信吗？又如，“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cdlxxiii]这可能吗？康生和毛康关系会是这样的吗？

有些话显然是越编越离谱，如叙述毛泽东对他讲中央苏区反“AB”团的问题，在《峰与谷》中一文（按：文在前，出书在后）先写为：“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cdlxxiv]到《在历史巨人身边》就变成了毛泽东引号内的原话：“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cdlxxv]固然越编越有趣，但编造的痕迹也越明显。应当指出的是，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抢救运动期间，作者既未“在历史巨人身边”，实际上也不再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了。1943年4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取消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另行分配工作”。[cdlxxvi]何况在这之前的1943年1月他就被调去当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一年半后又调社会部任室主任。就是在巨人身边时，也是主要只做一部分俄文翻译工作，不能和他列举的某些政治秘书如胡乔木、陶铸等相提并论。既如此，他对中央的事和上层整风就不可能了解太多，所以写得也比较肤浅，而且可以看出许多明显的不真实。

不信，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如说中央总学委“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康生“是整风运动的实际领导人”。这些话完全是海外奇谈。实际上，刘从未当过主任，两人也决非挂名，康生更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领导人。说向忠发叛变后，王明就“直接接替了总书记”，“但任总书记才一月，便辞去该职，……”还“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其实，王明既没当过总书记，他的报告也不是那本小册子。王明在国际七大上的专题发言题为《论反帝统一战线》，相当于一个有关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副报告（同样性质的还有德共皮克与意共爱尔科里即陶里亚蒂的两个长篇发言）。这三个重要发言，延安均有苏联运来的不少小册子。而《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则是王明在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前夜写的一本小册子。

又如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毛是“中共中央主席”。（1938年还根本未设中央主席，毛当时只是军委主席。）[cdlxxvii]说“在张闻天出使苏联期间”，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间“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常在一块交谈，就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cdlxxviii]（对此，我倒可负责地证明：绝无此事。否则，1959年庐山会议定的“里通外国”罪名还真可成立了），等等。

其次，这两部《回忆录》写到一些领导人的事或其它人的政治问题时很不严肃，也是信手编来。如谈刘少奇和王前的离婚是康生挑拨，[cdlxxix]说明作者根本不了解这件事。《峰与谷》中“绥德的故事”一节，写得更离谱，还竭力炫耀自己。[cdlxxx]如说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搞的肃

反“骑虎难下”，于是（大约五月底）他带了七八个人，突击了一个月，三个县的局面就“安定下来”，并受到林伯渠和西北局的表扬。还说徐向前是“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实际上当时驻绥德的是抗大总校，徐为总校校长），“重大问题都是徐向前、习仲勋、袁任远和我一起研究”。情况恰巧相反，正是1943年6月后，绥德专区的抢救才闹得更厉害了。9月，绥德师范还连开了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9月22日的《解放日报》以《绥德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为题作了详细报道。“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后才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cdlxxxi]抗大总校的抢救运动起步更晚，1943年8月开始，10月才大干，搞出特务和特嫌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57.2%。[cdlxxxii]可见当地情况和师哲所写，差别有多大！还有一个谈七大代表的审查问题，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个叫“小米”的人。在《峰与谷》中，说他是湖南代表，学文件时发现他说话不对头，总提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后来找他一谈，他承认变节，当了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cdlxxxiii]《在历史巨人身边》已描绘得更具体了，说“大约1942年5月间，冒出了一股蛊惑人心的阴风，说对党内历次错误的发生要找根寻底，追查责任。”“后来在肃反中查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叛徒。”并由此引起了他同毛泽东一段加引号的对话。[cdlxxxiv]情况到底如何，再看当时中办秘书处一位负责人曹瑛的说法。“秘书处的密家凡同志，是湖北地下党送来的七大代表，由于七大一时开不成会，就调他来中央秘书处暂时工作。这个同志思想活跃。在大搞逼供信的情况下，有人咬他”，于是“大家‘抢救’他”，提一连串很离奇的问题要他回答。“小密很年轻，他就反驳。我觉得他驳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会上几天没发言。后来，在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了，关在‘西北公学’……我对那样搞有些想法，认为不对头，但不敢说。”[cdlxxxv]经访问刘英等当年在中办工作过的老同志，大家叫的小密（师哲误为小米）就是密家凡，但没人说他有问题。了解他的曹瑛既然在五十年后仍以同志相称，且认为那种作法不对头，却没指出最后处理，不知是否有不便说之处。因为抢救运动中自杀的、逼疯的不少。该同志如果还活着，恐怕是会跟师哲打官司的。还有提到其它七大代表的审查及其与抢救的关系，[cdlxxxvi]也值得怀疑。例如所指河南省委书记，系七大后自己交代并要求取消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向全党发过通报，内容我至今还记得。至于回忆录上提的另外两个候补委员，却没听说过，有点不信。但这类问题一查就清楚，只是我没有这个条件。

对师哲《回忆录》的讹误之处所以谈这么多，并非苛求于这位老前辈，其实这是普遍情形，只是想借此说明《回忆录》并不可靠，而党史研究又似乎有点滥用《回忆录》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名人传记，往往“各取所需”，大量摘用许多《回忆录》，很容易把一些历史事实弄得更乱。常看到一些引证是当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使用的语言。但研究历史又不能不使用《回忆录》的资料，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恐怕只有多读、多问、多疑、多考证才可能好一些。关键在多读、多比、多思。

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看了一些人的《回忆录》，觉得类似的问题不少。原打算专门写一篇读书笔记进行讨论，但后来一想，这与改行学党史写笔记的主旨关系不大，所以决定作罢，只是在此以这两种《回忆录》为例，多说了几句。

三，对抢救运动中几个具体提法的辨析

由于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至今没做过什么总结，在党史研究和论述中，除了注意维护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则外，涉及具体问题就只能各说各的了。而且原则第一、事实在次，这一条还越来越盛行，因此有关抢救的一些说法也就和当年的实际距离越来越远。为了使讨论时所用概念的含义明确一些，这里只提出几个较常见也较重要的问题，作点辨析。

（一）是“抢救运动”还是“审干运动”

从前，抢救运动一直属禁区，史书很少提到，所以名称也无定规。“文革”后党史研究谈及整风抢救的多了，于是就发生了“正名”问题。事实上，从1942年到1947年延安撤退，除常说的抢救运动外，也还有坦白运动、反特运动、锄奸运动，惟独没听说过有“审干运动”这个词，这可能是许多年后人们为遵守中央1955年8月指示中的提法，才普及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既不科学，也无根据。审干是组织上对所有干部定期或经常进行的（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从1939年起，对党员和干部的审查就没有停止过），内容包括政治、历史、能力、表现等，一般是和群众运动挂不上钩的。大约除1955年8月指示[cdlxxxvii]中这一不确切的提法外，历史上似乎再没提过还有其它什么审干运动，但审干却一直在进行。说这一提法没根据，是因为整风期间以及此后，从来没见到和听到这种说法。整风期间的指示、文章，提审干很多，但未和运动连在一起。而且整风中的审干也不是通常的审查干部，一开始就明确为反特或肃反，所以实质上就是抢救，而不是审干。因为审干是中央一贯重视并作过多次指示的。例如1940年8月1日就做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认为审干是巩固党的一个重要方法，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成立干部科，担负有关工作。[cdlxxxviii]但这次审干并未变成抢救。

还应指出的是，审查干部一贯是组织部门的事，这次则由社会部直接抓，怎么能还是审干呢？可见，把肃反等同于和叫做审干都并不合适，抢救运动更不是什么审干运动。之所以事后改称审干运动，可能只是为了淡化甚至掩饰延安整风中这一严重错误而特意想出来的一个名词，并不是当时实际上存在过这么一个运动。1955年8月的文件还把这个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甄别工作，只能是也完全是极少数领导骨干的“暗箱作业”，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群众运动。而且这三段论也从侧面说明应称抢救运动。因为，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干什么，还不是为了第二阶段的抢救。第三阶段的甄别，则是由于抢救出了乱子。可见中心还是抢救，人们一直称为抢救运动也是确有道理的。例如整风运动（或称整风学习运动、整顿三风运动），就是一开始就有的提法。[cdlxxxix]

抢救运动也是随着运动的开展，各机关先后叫起来的。最早可能源于毛泽东1942年6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发现坏人，拯救好人”。[cdxc]后来在坦白运动（1943年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直军直单位和边区各机关开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分子自首[cdxci]）中，逐渐演变成挽救失足者或争取失足者，作为运动，就叫抢救运动。[cdxcii]而实际上延安各机关单位叫得最普

遍的还是抢救失足者。抢救运动与坦白运动是无法分开的。大体上讲，自上而下发动的是抢救运动，对被抢救者来说是坦白运动，被指定施行抢救的小组则叫“劝说运动”或“劝说小组”。三位一体，但根本上还是个抢救运动。大概1943年四五月后，由于估计国民党将趁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断定它已准备好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此中央总学委于7月11日发出《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运动的通知》。其主要内容就是“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要求开各种形式的会，包括群众大全、大小座谈会、坦白大会等。[cdxciii]于是延安各机关学校便在紧急备战声中相继提出了“抢救”的口号。我所在的学校领导在全体大会上的说法是，如在平时，还有时间说服教育，而现在已是非常时期，可能马上就打仗，所以必须紧急抢救，否则一旦开战，对这些特务就只能就地处决了。就这样，抢救失足者和抢救运动的提法，在1943年夏已很快在延安普及。后来中央文件也加以确认，又一下传遍各根据地。如1943年8月5日中央总学委通知的第一句话中就有：“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cdxciv]；1944年11月26日中央给晋察冀并发其它根据地的指示中。提到的也是“鉴于去年延安抢救运动时”；[cdxcv] 1943年12月22日，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也一再称“抢救运动”，而没有叫“审干运动”。[cdxcvi]毛泽东的一再称呼同样是“抢救运动”，而不是“审干运动”。例如1944年1月10、11日书记处会议上聂荣臻报告中，他的插话就有：“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cdxcvii]他在延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的也是，“‘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cdxcviii]总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把那次运动叫做抢救运动。多年后才编出来的这个“审干运动”，既不科学，又没根据，名不正，言不顺，自然以不用为好。

（二）抢救运动的时间到底多长

对此说法很多，但基本上是两种，即十多天和两三年。前者以各种正式党史为代表，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把时间定为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后的十余天。根据大概是毛泽东1944年10月25日讲话中所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cdxcix]（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话。）虽然这里没有说这“十多天”的起讫时间，也没说是怎样“使它停止”的，以及是否合乎实际情况，但因为是领袖所说，所以就定下来了，成为党史上的正式说法。此后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自然沿用此说，并明确为半个月，即1943年7月15日康生报告后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按，这可能是为了把发起抢救的责任推给康生和运动开始时间从康生报告后算起，特意将当时及此后叫了多年的“抢救运动”改称“抢救失足者运动”），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d]其它较正式的有关抢救运动的论着和一些领导同志的回忆录，也大多持此说法。如前面引证过的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中就说，“到1943年7月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di]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只有断语，不提根据；只讲虚，不讲实，例如什么地方、什么单位、是怎么个抢救法、又是怎样“马上”停止的等等，这当然就无法，其实也不容许讨论了。

后者以蒋南翔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为代表，其中明确指出“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一些讨论抢救运动的文章，如《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在详述具体经过后，也说是从1942年底的坦白运动起到1945年甄别工作结束，“历时两年多”。[dii]（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时和事后这两文的标题都称“抢救运动”，可见“审干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后来特意制定也极少使用的名词。）连亲自参加抢救和恢复总学委后任秘书的胡乔木也说，“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diii]这是1981年9月14日回答问题时本人亲自所谈。至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的，“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主席就指示让它停下来，”[div]则是由别人整理（显然是按上述“正史”的统一口径），且本人生前未及审阅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何时和怎样指示让它停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写的虽然更具体，说是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但也没有交代这个“指示”是用什么形式下达的。当然，两本书都是由权威机构和权威党史学者所整理和编着，是不应有什么怀疑的。但奇怪的是，这样重要的史实和文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竟都没有提。7月3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只提了审干的九条方针，也并未提停止抢救运动。[dv]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事实。而事实是，抢救运动7月后在许多机关和地区，特别是一些敌后根据地，反而进行得更猛烈了，有些还是1943年底或1944年才大干的，如晋冀鲁豫边区等。我所在的单位和亲身经历，以及一般机关学校均可姑置不论，就是毛泽东亲任校长并抓得很紧的中央党校，作为延安整风审干（抢救）的重点，直到1944年初也还没有停止。据被抢救的党校一部（高干）学员曾志说，“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引者注，1944年），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骂、踢，刑罚各种各样。”[dvi]驻绥德的抗大总校，抢救运动1943年8月份才正式开始，还是“从十月下旬起，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dvii]延安和绥德等地区，九月份抢救也还热火朝天，《解放日报》还作了详细报道。直到12月，中央才提出“坦白大会要更慎重更有准备的召开”（以后又提出停止开），指示“不能到处采用抢救运动的简单方式”。[dviii] 12月22日书记处讨论反特斗争，决定向高级干部传达的内容中也才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进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阶段。”[dix]而且这些都只适用于延安，一些敌后根据地并未停止，还要他们继续进行或补课。中央书记处1943年11月15日才致电华中局，要他们“即在军部与二师一部附近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并介绍了抢救的具体做法。[dx]

另如前所述，直到1944年，北方局党校也才大搞抢救，刘建章、李尔重、任仲夷等正受折磨。1984年7月4日中顾委第三支部开会时杨献珍就检讨说，“1944年我在北方局领导整风，犯有错误。当时从延安刮来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歪风……”[dxi] 1944年2月26日毛泽东和康生还联名复电邓小平、滕代远说，“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dxii]也正是1944年，中央才派舒同去山东任分局总学委副主任，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推广延安（特别是中央党校）抢救运动的经验，只是由于罗荣桓的抵制才没全面展

开。所有这些都说明，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无论在延安还是其它地区不但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泽东7月30日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停止抢救运动的指示，否则各地怎敢拒不执行。事实上，各地停止的时间也不同，有的也许是1943年底，有的则是1944年，总之都决不是“十余天”或“二十天”的事。

再说，抢救运动更不能说是从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后才开始。实际上，1942年底许多机关学校即已开始，只是全面展开则是上面说过的任弼时4月9日和12日的报告之后。但这时叫法仍然不一，有坦白运动、肃反运动、抢救运动等，后来才逐渐统称抢救运动。所以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讨论任弼时的报告，还说是“继续进行坦白与检举内奸运动”。[dxiii]中央总学委7月11日通知中的提法，又是“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请注意前后都有“继续”二字），要求把对干部群众的教育“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dxiv]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根有据的研究论文也都指出是开始于1942年，只是要按正史说法称为“审干运动”，再在下面注明为反特斗争。[dxv]

至于亲身经历过的人，说得就更具体了。例如住在毛泽东隔壁、天天同毛泽东见面的叶子龙夫人蒋家英（江英）在回忆文章中就明确说，“1942年延安搞了‘抢救运动’。”在被抢救了大半天后，她跑回去找毛泽东说，“主席，他们抢救我了。”但最后还是被送去党校一部继续审查。[dxvi]曾志也说，1942年她调党校一部学习，有天晚上全体去听“失足青年”的报告，“以后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有一天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讲到党内成分不纯时，特别提到：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会后，河南省委组织部长、著名的长征女战士危拱之就回窑洞自杀了（虽经救活，最后还是得了精神病）。[dxvii]再看作家刘白羽所说：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以后，就“使得延安生活的气氛慢慢紧张起来”。他由“文抗”到中研院才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就在这时，一阵暴风骤雨，骤然平地而起了”，“审干之中所谓的‘抢救运动’开始了”。[dxviii]不用再多引证（其实我自己就是那一阵开始受到车轮战抢救的），就可看出，一些党史论着和专家所说抢救运动开始于康生1943年7月15日《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距离实际情况有多远。因为在中研院揭开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后，审干的重点单位中央党校就“查出”吴奚如的“特务案”，随之反特斗争就在全校展开，一些单位也闻风而动，抢救运动就实际上在延安开始了。特别是1942年10月开幕的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康生和彭真又先后作了肃反问题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单位还敢怠慢？因此，只能说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又掀起了中央机关和学校一轮抢救运动的高潮，但决不能说是抢救运动的开始。至于刹车，则是1944年的事。对于这些，在后面谈“九条方针”等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要说明，抢救运动决不应从1943年7月康生报告算起，更不能说只搞了“十余天”，这些说法完全与史实不符，这样说的党史著作当然不能算信史。

（三）整风和抢救的关系

本来，抢救运动就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献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分开。但是有些人为了维护延安整风的崇高圣洁，不愿让纯属错误的抢救运动（多按正史提法称为审干运动）玷污，于是就把它们说成是两个运动。例如有一篇《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的文章，就认为“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dxix]还有些谈及延安整风的党史论着，也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包含着这个意思，说明这也是个较普遍的问题，值得一谈。其实，从抢救运动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提法。相反，无论领导人讲话还是正式文件，都始终把审干（肃反或反特、反奸，意思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抢救）当作整风的一部分、整风的两大任务之一。早在1942年4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已提出在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中要审查干部，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dxx] 6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明确指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dxxi]即将肃反和纠正路线错误并提。1943年3月《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这就是整风的第二个目的。”[dxxii]第二个《四三决定》[dxxiii]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它的宗旨就是肃反，但题目却是《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其中还一再强调肃反是整风的一部分，是整风期间要办的大事。如说：“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最常用的说法还是，整风要同时解决半条心（纠正错误思想）和两条心（肃清内奸分子）的问题。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一个运动，还被明确定为“是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的两件事。只是在抢救运动进行了几个月后，中央才做出专门的审干决定，提出“九条方针”，但仍然不是要把审干（反特）和整风分开，还是说“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为了审干“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刘少奇也明确指出，“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dxxiv]

当然，有时为了便于操作或订计划，也把整风中的这两件事分别称为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或简称整风和审干，但并无人说这时延安进行了两个运动。其它根据地也并未把整风和抢救当作两个运动来抓。晋绥分局的林枫就说，“整风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学风……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个时期又开始整风，成为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结合。”[dxxv]事实上，差不多1943年全年和1944年大半年，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都是以大部以至全部时间搞抢救运动的。在此期间，几乎再未讨论和批判什么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943年九月会议后，上层在批王明右倾路线和“左”倾路线，中下层干部根本不知道）。在这两年左右，普遍整风就是抢救运动，并不是许多书本上和后来某些党史学者想象的那样在“整顿三风”。对于抢救运动，既然党史著作都要尽量加以淡化和遮掩，那么一些人进而设法把它和延安整风分开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四）向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问题

刹住抢救，进而向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是由于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

以“个人”名义致书毛泽东对整风抢救干预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广大干部包括许多高干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越来越对抢救运动发生怀疑和不满。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但又在不能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的前提下，才想出和采取了这一似为检讨而又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的奇特作法。但这却被整风抢救中的积极分子和后世党史研究者大书特书，当作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批评”。

关于毛泽东对抢救运动主动承担责任和向抢救错的人赔礼道歉，一些书写的最早的一次是：“1944年元旦，王诤带着中央通讯部门被错误地打成‘特务’的同志来给毛泽东拜年”，毛讲话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之所以安排这次活动，是因当时通讯部门绝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已“使延安同各根据地和各省党组织的联系一时中断”，所以要急于解决他们的问题。）[dxxvi]后来在大会上的正式赔礼道歉，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载，前后共有三次，[dxxvii]而且还描述得甚为生动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dxxviii]这段描写虽然不是胡乔木自己所写，但看来是合乎他的意思的。以他为代表的党史学派（称得上学派的，中国恐怕也就这一个）和其它整风抢救的积极分子，所写的党史著作和回忆录，基调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有繁有简，还有些更属于夸张和编造。

奇怪的是，写被抢救者如何感动、如何感到不安的，好像都是抢救别人的积极分子和一些领导人。而被抢救者（建国后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政府部长和司局长等各级干部的都有），不知什么原因，却很少见他们写抢救，更没见到说如何感动和自己为此如何不安之类的话。我至今只读过被抢救和关押过的李锐、任仲夷等少数人的片断回忆，但他们的重点都在反“左”。也许是其中多数人不愿或不能（有禁区）谈那段历史，而不是如此健忘或没感觉。于是积极分子就替他们“感觉”了，也因此才使“感动”、“不安”、“消除芥蒂”、“增强团结”、“心情舒畅”等写进一些党史读物。为什么有些积极分子不去“回忆”自己如何整人、如何抢救、如何传授和学会“车轮战”、“假枪毙”等方法，以及如何骂人、打人、污辱人，当时灵魂深处的活思想是什么，事后有无忏悔之意，等等，却要越俎代庖地去琢磨被抢救者的感情和反应，以致使我们至今看不到一本抢救者写本人真实思想的《回忆录》，更不用说《忏悔录》了。

其实，这倒是可能起源于延安整风抢救，从而成为历次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例如钱钟书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就说，干校两年的重要任务是搞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最后“水落石出”，一个也没有。“按道理”，那些“充当旗手、鼓手、打手”的积极分子，最应当写出“记愧”的文章。“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dxxix]所以这种文章至今未看到。钱先生着重讲了人性上的原因，“记愧”吃亏。但我看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我们一贯实行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即积极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极左和过火行为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不用检讨（甚至不让检讨，否则会泄密），经过运动的考验还会得到重用。在这种政策下，会有“记愧”文章吗（个别例外也许有）？

根据我的所闻所见和亲身体会，情况则是有些和上述积极分子的描述大不相同，甚至有点相反。而且这决非个别现象，不但在延安，后来遇到其它根据地的被抢救者所谈也大体一样。实际情况是，当时被抢救者的气主要是向着本单位各级领导（因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和积极分子的，多数人不但对毛泽东，连对康生也没有什么气。所以毛泽东的赔礼道歉，不仅没能消气，反而使那种对本单位抢救者的气发作出来了。因为以前无论自己承认与否，总是被戴上特务帽子，不断挨斗，许多人心中有气也不敢发作，处于“被动应战”态势。现在连毛主席都承认弄错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说，被抢救者腰杆硬了起来，不怕再挨斗了。而整人者，正如上面所说，自以为是响应号召、执行任务，服从组织，自然“心无愧怍”，仍然“理直气壮”，给被整者作甄别时还要留尾巴，写成“事出有因”（给抢救找个借口，如说因为你有些自由主义、党性不强或社会关系复杂等），双方进行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些积极分子说的消除了芥蒂、增进了团结，而是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是蒋南翔当时就在《意见书》中提到的），有的当时爆发，有的长期积怨（上引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发言就提到）。

我所在的军委编译局，就在听了毛主席赔礼道歉的传达后，发生了一个被抢救者拿起凳子去打一个假积极分子（自己假坦白，又去抢救别人）的事。至于发脾气、同领导顶牛和不理睬积极分子的情况，当然更多些。而且许多被抢救者的甄别结论这时还没下来，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剑还在悬着，心情怎么可能“舒畅”。即使拿出了结论，本人满意的也不一定是多数。这种闷闷不乐的日子，在我们单位，大概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至于我和周围的一些同学，对毛泽东的赔礼道歉只听过一次传达。听后也感到高兴，那是因为眼看这场冤枉人的抢救运动有了结束之日，弄清个人的问题更有希望了，但谈不上感动和不安。其实在这之前就已开始了甄别工作，但因弄得很神秘（少数人的“暗箱作业”），大家还是不太清楚，这一传达就等于公开化了。对于毛主席主动承担责任，当时并无感觉，既然发号施令的是你，当然应当负责。“文革”后由于把抢救说成是康生搞的，毛泽东似为代人受过，所以党史学才又出现了一个强调所谓“主动承担责任”的伟大精神问题。总之，我没有见到听传达后如何感动和过意不去的人。现在看来，这几次讲话和赔礼道歉，实在算不得列宁所说的自我批评。列宁的要求是，“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dxxx可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抢救运动是错误（更谈不上路线错误），自然也不会满足后面那些要求了。至于他在整风中一再强调的，对错误必须采取主动态度，要深挖思想根源，详细说明犯错误的经过和后果，提出改正的措施和努力方向，还要反复写反省笔记，“以写好为度”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适用于抢救运动，当然更不适用于他本人。所以对抢救这样的严重错误，由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向整错的人敬个礼再讲几句诙谐的话也就行了。这哪里像郑重的自我批评，简直有点像儿戏。例如，把自己的同志当“特务”整，刑讯逼供，还整死了一些人，怎么能和洗澡多放了点灰锰氧相提并论！这不但对受害者交代不过去，而且注定类似错误以后必然会不断重犯。事实也确实如此。抢救运动过后不久的解放战争期间，就有使许多干部挨整和受委屈的所谓“三查”和“搬石头”等运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每次整错的不是全部也是多数。而“文

革”中纯系无中生有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就冤枉了几千万人，迫害致死者自然不少，但也是不了了之。抢救运动，如果没有最后找出来个康生负责，大概也会像抓“五一六”一样，逐渐从历史书上消失掉。因此，以后的党史著作，恐怕不宜再强调和渲染什么“主动承担责任”和“赔礼道歉”，更不要提倡这种不承认错误的“自我批评”如何伟大，而应适当揭示抢救运动的内幕和着重应汲取的教训。

（2002年10月1日完稿）

第十一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二

——关于抢救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问题

一，关于抢救运动的发起

（一）问题的提起

在整风中进行审干（即历时两三年的抢救运动），是由毛主席、党中央发动领导进行的。这本来不成问题，历史也确实如此。在整风抢救期间，无论是大会号召还是小会劝说，都是用的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你们这些失足者坦白，诚心挽救你们等等。例如最近看到一篇纪念杨献珍的文章，[dxxxi]其中就提到任仲夷回忆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被抢救的情况。任说，“我相信党。”杨就说，“党认为你有问题。”任说，“我相信毛主席。”杨就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其实在整风抢救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人能够提供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当时某个人（无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文革”后写这方面《回忆录》的人）曾公开或私下把毛泽东和抢救运动分开过。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设法分开的呢？是在“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把康生揭发出来以后。因为这时需要也可能对延安整风中抢救运动的历史做点修改了。

说需要，是由于在拨乱反正中，抢救运动的真像被暴露出了一部分。即使在这一部分中，也有两大问题对维护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历史地位和最终使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的延安整风极为不利。一是那场大规模的持久的抢救运动竟然没有抓到几个特务，这连参加抢救别人或被抢救的人也多少有点出乎意外。因为抢救运动是公开进行的，谁被抢救过，大家一般都知道，何况有些人在坦白大会上还亮了像。但后来的甄别却是秘密进行的，即使作了平反也是个别通知，并未在原来抢救的范围宣布。所以人们互相并不知道谁抢救对了和谁抢救错了，即使知道，也是自己猜出来或因关系好对方私下告诉的。直到离开延安，慢说外单位，就是本单位，到底在运动中抓到多少特务，是哪些人，除了“亲自动手”的首长，恐怕谁也没有底。例如我们外语学校，直到1986年看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编的一本1941-1985年《校史》，大家才知道在只有180名学生的学校里被抢救的师生竟有75人，最后甄别结果，一个“失足者”也没有。[dxxxii]而且有些人的甄别结论是很晚，包括离开延安后、建国后和“文革”后才做出的。加之甄别结论不像打成“特务”时那样张扬，当年听到传达或现身说法的人一般不会了解到当事人已摘掉帽子。例如我知道张克勤、吴奚如（著名的老党员作家）等不是特务，就是在“文革”后。由于平反的晚，大约多数人也是四十年后才知道王实味不是国民党探子的。二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伟大的整风运动中竟会发生这样草菅人命和践踏人权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使人看到，抢救运动（就算叫审干吧）中的残酷无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党校和任仲夷等回忆的北方局党校的情况[dxxxiii]（比这更严重的还有），较一直批判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而这些，当时恐怕也是很少人才知道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基本上还是相信毛泽东的估计：抢救运动“成绩是伟大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dxxxiv]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已经露出来一部分真

像，人们看到抢救运动不仅谈不上什么成绩（既未抓到特务，又没很好总结和汲取教训），只能说是对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一场灾难。而且还在抢救运动期间就估计和断定，陕甘宁边区党政军中的国民党特务有一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十万大军”，[dxxxv]“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dxxxvi]被抢救的人大部分是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但也有一批当时就担任领导工作，特别是建国后升任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的，如柯庆施、陶铸、刘澜波、刘建章、武竞天、任仲夷、周建南、李尔重、张维桢、雷任民、宋维铮、梁膺庸等，还有许多十几岁天真无邪的中小学生和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场运动都是实在荒唐，事后很难想象的。这样的运动还能说成“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怎么能同伟大领袖和光荣正确的党相联系？因此，对这段党史必须作些修改。于是，名称从抢救运动变成了审干运动，时间从两三年变成了十来天，特别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从毛泽东变成了康生，以及其它一系列的配套说法，等等。

说可能，是因为“文革”后提出了康生的问题，并作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处理。而他正是整风期间总学委副主任和社会部长，又是“文革”中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专家和“国人皆曰可杀”的小人。于是康生这个确也作恶多端的家伙一下变成了个大箩筐，整风抢救中的什么错误和罪恶都可往里装。正式的党史论着、许多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都把抢救运动的罪责推到了康生头上，有些还强调，多亏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及时察觉和纠正等。康生被描写得极其神通广大，不但在延安和边区到处点名抓特务，指示和派人到敌后根据地搞抢救，而且其它坏事或错误（如薄一波笔下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对彭德怀的过火斗争）也总是有他的插手。想当年康生得宠时，哪一个敢把整风抢救中的错误和罪行同他挂钩。但当康生被打倒后，说也怪，抢救运动就一下被说成完全是他搞的了（胡乔木说的“康生这些人”，不知还有谁）。而且“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宣传多了也似乎真的变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连被抢救和关押了一年多的李锐都说，“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云。[dxxxvii]可见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之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党史的研究和论述一直受到重视和一些问题得到及时定调或修正的原因。例如“文革”才过去不久，就确定一切罪责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于是，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一般干部群众，凡在“文革”中被整的，都说成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且连胡乔木也硬说，许多重大事情如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人在什么地方和受什么虐待等，毛泽东并不知道。[dxxxviii]但他们的家属却说，不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疏散”和安置是毛泽东亲自定的，连他们的子女能否升学、能否探亲，也必须经过毛泽东的批示。[dxxxix]更具体的证据是，1967年1月1日彭德怀就给毛泽东写信，说他“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周恩来第二天就批道，“碰头会上已宣读，即送主席、林彪同志、江青同志传阅，拟退彭德怀专案组存。”[dxl]诸如此类的证据，真是不胜枚举。为毛泽东开脱的专家学者，不可能不知道，更不用说胡乔木了。如果真不知道，那也不应假装知道而说些不符合事实却又以权威自居的话。

看来这大概是我们的党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既从苏联学来，更继承中国封建传统），即一方面，竭力维护党和领袖以及其它领导人的威信，实行“为尊者讳”，把他们说成一贯正确，对一些无法推卸的错误则尽量采取

淡化、含糊或《红楼梦》上“真事隐”的办法不提名道姓（至今传媒仍如此，凡正面报道均提名道姓；凡负面报道，除被打倒者外，不但一般不提人名，连地方、机关也以“某”代）。另一方面，被打倒者往往成了错误和罪行的大箩筐，尽可能地把坏事往他头上推。有的人以前被捧上了天，后来又一下变得一无是处。这当然不能叫做实事求是，但却是延安整风以来存在的普遍现象，且有日益发展的趋势，所以有必要以抢救运动为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有的党史专家在谈到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问题时提出，“谁应负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好的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dxli]其实正是由于对抢救运动不追究责任，大搞逼供信以至有人命案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普遍得到保护和重用，被抢救错者得不到扬眉吐气，许多人长期背黑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总结，当然无法汲取教训，更严重的是使类似错误不断重犯。也许是由于认识上的这种“差之毫厘”，才得出了“怎样对待‘反对者’？毛泽东为后世做出了表率”（还特别提到蒋南翔对抢救提了意见反而得到重用这一与事实正好相反的例子）[dxlii]的结论。通过对延安整风的研究，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几被消灭殆尽之后，还会得出这种结论，就使人在吃惊之余顿生“失之千里”之感。如果我们还要认定，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和执行，为毛泽东察觉并纠正，现在大概会和几十年来一样，仍然不能“更好地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所以研究抢救运动，弄清运动的发起和领导，还是十分必要的。

（二）抢救运动是由谁和怎样发起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抢救运动允许稍作讨论后，就由领导定调，多数人紧跟，很快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即上面提到的：运动为康生发起和执行，幸亏毛主席及早发现并制止，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所以只是延安整风中一个小的曲折。不但各种记述和讨论延安整风抢救的正式党史及有关的文章书籍，而且许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回忆录，大都是按此路子写作和整理的。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对抢救运动非常了解、且亲自参加过抢救别人，又是中共党史学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胡乔木，就在一次谈话中说，“比方像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非出于毛主席的发动。”毛主席只是“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后才纠正了这些错误。”[dxliii]这不但不合乎事实，而且有悖于逻辑。按照胡乔木所说，康生成了毛泽东的领导者了。因为称得起运动的发起者，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首先倡导，二是得到响应。对抢救运动，最先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发现坏人”、“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等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康生。康生即使有这些想法，他也只能向毛汇报，由毛出面号召。而且涉及全党和普及到所有根据地的抢救运动，康生本无资格号召；即便想号召，大约也不会有多少单位和地区响应。我就没有听到一个抢救者或被抢救者说过他是响应康生的号召。连“文革”都还没有人说是林彪、“四人帮”等人所发动，难道抢救运动由于事隔久远，知之者少，就可以任意修改了？

其实，正因为不顾事实，所以胡乔木这篇谈话本身就破绽不少，自相矛盾。例如前面才说过，“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dxliv]紧接着，为了减轻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分量，又很快

改口说，“不过，这些确实是很短暂的。”[dxlv]后来大概有些人觉得这种说法太不合情理，所以就作了一点调整，指出抢救运动是党中央决定和部署的，但又要设法让康生负主要责任，如说他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到处插手制造混乱，是抢救运动（肃反）的“主要领导人”等。[dxlvi]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有关讨论日趋沉寂，但是正式党史著作和少数人的论述，已多以这种说法为基调了。这当然比以前那种众口一词却不近情理的说法强一些，但由于只是在上述规定的框架（即淡化和简化抢救运动、为尊者讳、加重坏人的罪责等）内进行微调，所以还是不能自圆其说。例如：在大讲实事求是、大搞调查研究的整风运动中，中央其它领导人怎么都会受康生一个人的欺骗；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康生竟然可以随意斗这个整那个，包括柯庆施等不少高干、各地选出的大批七大代表、毛泽东和其它一些领导人身边的人、以及不少领导人的妻子；康生有那么大的权把几乎整个国统区的党打成“红旗党”，把审干权从中组部拿到社会部，把陈云挤出中组部；列为康生制造的一些重大假案，多是只有结论，不讲根据，又怎么能证明是康生制造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列举很多，都是从来没见过有人能解释清楚的。原因就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

如果真正讲实事求是，那么在大量的史实面前就只能得出结论：抢救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并在他亲自关注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央的决定和部署。康生既不是抢救运动的发起者，也不是它的主要领导者，而只是善于揣摩领袖意图，并据此上窜下跳，推波助澜，把错误引到极致的一个小人。所以康生虽然早在1939年2月已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下半年中央就接连作出了两个有关审干和锄奸的决定，即8月25日《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10月10日《关于反奸细斗争决议》，[dxlvii]却也并没有见到他曾借此兴风作浪，发起什么运动。至于这时期的“肃托”和康生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仍是糊涂账，各种党史也从不提起。就是在1940年8月全面审查干部工作开展后，如前所述，社会部1941年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两份文件也还比较稳妥与温和。直到1941年9月政治局宣布成立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后，也没看到揭露出他有什么重大劣迹。看来，康生真正放开手脚做坏事，主要还是在1942年开始的普遍整风后。因为他已完全揣摩到整风中要大搞肃反，在这方面对他会有更多依赖，他也正可大显身手。如果将整风中毛泽东和康生关于肃反的言论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看出康生基本上是紧跟和充当打手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开始整风就要发动抢救运动。但正如人们所传康生的话：“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dxlviii]（延安整风中说的审干，从头到尾都是指的肃反，第二句话实为同义反复），事情也真是这样发展的。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就是他一再说的“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并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整风中的反对主观主义，实质上就是要把全党首先是高中级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实行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反对党八股，则是要打击那些身份高或知名度大的知识分子（即被称为教条主义者）的“威风”，全面推行可称为“延安文风”的一种文风。

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层整风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央领导对整风认识

基本达成一致（对没参加“九月会议”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彭德怀，由毛泽东亲自不断通报情况和做工作）的条件下，1942年开始了普遍整风。其主要目的是把知识分子干部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但同时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发动群众批判领导上的三风不正，使“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的人们受到上下夹攻，处于孤立，同时也烧一烧各级领导中的官僚和军阀作风。所以一开始就提出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相结合，意在使矛头向上。二是通过运动暴露错误思想和阶级敌人，以便批判和清查，就是后来所谓的“钓鱼”或“引蛇出洞”。为此，头几个月都是强调“放”，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准歧视和压制。[dxlix]这在中央决定、内部通知和一些电函中说得更清楚。[dl]其实不用到1943年，1942年普遍整风一开始，知识分子们的“错误思想”已以《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为标志纷纷暴露了。在整风肃反的最高领导分清两文作者的错误性质后，就开始了全延安对王实味及其所代表思想的批判和声讨，普遍整风也就逐步转入肃反。

而在这之前的4月上旬，政治局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国民党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提到《轻骑队》时，与会者就已反应强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行。听了汇报和发言后，4月17日毛泽东说，“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dli]这是最早布置审干肃反，也是紧接着毛泽东看了《野百合花》拍案而起之后。可见五至七月的王实味事件，只是从整风转入肃反的导火线和使审干肃反走向半公开化而已。所以王实味被揪出后，延安的普遍整风已不大再提反对三风不正，重点随即迅速转移到思想上批判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组织上追查内奸分子（办法除内查外调、会上会下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外，还反复填“小广播调查表”，以发现破坏分子），而且越往后越向肃反倾斜，终于进入全面的抢救运动。

由此可见，发起抢救运动既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那样的暴露，不发生王实味事件呢）；既是原有的计划（出于领导人的肃反情结而非一些人所说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发动群众造成的结果（每次群众被运动起来后总是越来越“左”）。这些，在建国后都是屡试不爽，得到再三证明了的。例如所谓的“胡风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立即认定暗藏的反革命还很多，于是1955年7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定陆定一“挂帅”，在全国发动了一个有四百多万人参加的肃反运动。“运动开展以后，斗争对象超过了5%的比例。陆定一觉得不对头，于是向毛泽东请示，不能再发展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称赞他说：‘你有大将风度，能进能止。’”[dlii]至于稍后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其它大的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对照这些，对普遍整风转入抢救运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转折点的王实味事件，近二十多年已有大批文章书籍介绍和讨论，而且几近一致地认为这是康生制造的。[dliii]但仔细考究起来，似乎康生还没有这个资格。他可极尽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之能事，但整个指挥权还轮不到他。先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权威论述。毛主席“在整顿学风阶段（大约指1942年5月到10月）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多次主持文艺座谈会；二是从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同志错误思想的揭发转变为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对后来整

风运动发展为审干（引按，即抢救）运动有直接影响。毛主席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dliv

其次，从批判的阵容和安排看，只有毛泽东有权作此部署，如派曾长期任中央重要领导、对锄奸既有经验又不手软的李维汉前去主持（挂帅）；派李富春、杨尚昆等领导人和毛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张如心等参加批判；审改并送《解放日报》发表李维汉给王实味定性的总结报告和范文澜、周扬、艾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等。这些难道是康生能办得到的？

第三，毛泽东的直接过问还表现在不但随时有单独批示，而且几乎每次都有会前研究和会后总结。例如4月6日在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学习组会议上，李维汉汇报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情况；第二天（4月7日）中宣部就专门约集中研院领导和积极分子开会，部长凯丰在总结发言中已直接批评到《野百合花》及其代表的偏向；6月3日晚，更在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对策，有人提出王实味发表长篇谬论怎么办，毛指示：“准许插言。”这些又难道是康生所能左右的？

第四，宋金寿两次专访中组部，了解到中组部保存有1942年10月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是由凯丰签署，毛泽东亲批的，文字很少，只说王实味因托派反革命，开除党籍”。

第五，说“王实味案”系康生制造，都是只有结论，不提根据。李维汉是最早提出复查的。他对帮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宋金寿说，“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其实，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到底是谁先说的，至今还是糊涂账。看来还是李维汉先说的可能性大，在1942年6月11日他对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作总结时，就已给王实味定了性。他说，“根据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王实味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他的言论不仅有政治的目的，也有组织的企图。”直到1981年6月，宋金寿将整理好的李维汉回忆录《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风运动》的稿子送给李看，此时李已病重，在病榻上给宋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条是：“⑤王实味是托派，在报纸上发表过没有？我觉得在写批判王实味时，只提康生说他是托派就可以，不必扯开。”这种说法显然有隐情，更没说出王实味的托派和反革命是康生所定的根据。至于宋金寿所引证的康生谈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原始记录，其中虽然也提到王实味，但主要是讲“五人集团”，而且讲的时间已是1943年8月，带有内部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不能证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为康生先提。

第六，据我所看到的材料，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温济泽在他的回忆文章和书籍中把康生说成“王实味案”的直接制造者，所提具体根据就是他所记得的斗争王实味时李言对他的几次谈话。例如在《温济泽自述》中提到，李言告诉他，康生说王实味是托派，还是蓝衣社特务。但与温写这类文章的同时，李言却对访问他的宋金寿说，当时是他到组织部去看了王实味的档案才知道王交代的与托派来往情况。而且还特别声明：“关于揭发王实味的托派言论，集中地反映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有没有别的材料，我们不知道。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也没有告诉过我们。”众多回忆材料中提到王实味与托派的关系，也都说是潘芳、雪苇等人在座谈会

上的揭发，并非李言或他找人给捅出来，温济泽的回忆录和李言所谈也完全不同。从现有材料看，第一个指明王实味加入了托派组织的倒是陈伯达，也还不是康生或李言。[dlv]由此可见，实际上，"王实味案"为康生制造之说，在党史上只是一桩人云亦云（最初说的人可能是依照党史传统笔法）的事情，没人能说清来龙去脉。而且温济泽的说法就矛盾百出。例如照他说来，"五人反党集团"中的王里被康生说成是她的堂兄"王昆仑派到延安的蓝衣社特务"。而且他的说法表明，不仅延安的所有领导人和党中央有关机构都不知道王昆仑的政治面目，就连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也只说王"思想进步，是我们的朋友"。一直"到建国以后，人们才进一步知道王昆仑从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dlvi]全党没有一个人知道本党有这么一个党员，这可能吗？又如说，李维汉1942年9月，"下放（原文如此）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四十多年之后，李维汉有一次和我谈话，才告诉我，这是当时康生向中央提出的打击他的建议。"[dlvii]但是胡乔木却说，"李维汉去当秘书长，这是毛主席下的很重要的决心，""是很重要的一着棋，这在陕甘宁边区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协调林老、谢老和高岗之间的关系上。"[dlviii]稍微了解那段历史情况的人恐怕只能相信胡乔木而不会去相信温济泽。

最后，也并非不重要的是，从现有文献看（我能看到的），在中央领导层把王实味说成是托派加特务的，首先还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而且用"国民党探子"、"蹲班房"这类词汇的也只能是毛，而不像康生或其它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月23日）中说，"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dlix]其中指的大概就有王实味。事实上在内部很快就挑明了。他在6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整风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dlx]而且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还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dlxi]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在王实味事件后，毛泽东已从思想认识到具体部署上准备进行全面肃反了，只是还没公开号召，先在内部进行。紧接着就是中央党校查出"吴奚如特务案"和中研院与中央政研室的"五人反党集团案"。但其它机关学校却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更没抓到多少暗藏的坏人。于是在10月开幕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讲到整风问题时就批评了对敌特破坏缺乏警惕的自由主义。在后来的报告中，他更明确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半条心），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提出要重视反特斗争，要各单位抓第二、第三个吴奚如、王实味这一类人，也点了"五人反党集团"的名。[dlxii]半个月后的12月6日，一方面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dlxiii]一方面是康生在高干会上作关于审干肃反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并严厉批评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1943年1月4日，彭真也在会上作了反奸肃反报告，结合中央党校破获"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高岗也赶快紧跟，使会议做出决定，要清洗党员10%。[dlxiv]也就在这个期间，康生和社会部领导在自家

门内制造了“张克勤特务案”，做出了“示范”。所以西北局高干会后，接着就是1943年的“四·三”决定和几天后的动员大会，于是肃反运动（即后来所称的抢救运动）就在延安遍地开花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研究延安整风的著作和一些真实回忆，都把抢救运动的上限定为1942年底甚至更前一些的原因。

谈及“张克勤特务案”的论述实在不少，而且更众口一词认为是康生制造。其实，对此也需要稍作辨析。当然，这事出在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简称西公）里，康生出任总后台是不成问题的。但把制造此案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康生却有失公允，所以我在前面加上了社会部领导。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难道只有康生要对上迎合、表现自己，而专事锄奸工作的社会部其它领导同志就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与部署置若罔闻而不积极响应？因此，“张案”应看作社会部集体创作，不能只往康生的“箩筐”里装。当时西北公学的正副校长李克农和李逸民都是我比较熟悉的老首长。正是这位李逸民，1941年还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时，硬是把我这个马列主义小教员调去学了俄文。我了解李逸民是位忠厚长者，因此也完全相信他在《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中有关抢救张克勤具体情节的叙述。这就是：1942年11月间，在李克农亲自布置和直接领导下，西公审干领导小组几位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在汪东兴办公室提审张克勤。在张拒不“交代”的情况下，他们根据汪东兴提供的在中央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分为两组连续突击审问，即使用车轮战（可见车轮战也非传说中的康生发明）。经三天三夜连续作战，张克勤终于招认，并根据康生和李克农的指示让他在第二天的全校大会上作现身说法。[dlxv]另据说，后来张克勤曾翻案，气的李克农用手抽他耳光，从此他再也不敢翻案了，而且还被安排在各地坦白大会上作典型报告。“张克勤案”对康生来说确有重大作用，既可向上交差并邀功，又可作为重要经验向各地推广，把本来就是不该发动的抢救运动搞得更乱。[dlxvi]

经过上述这一系列的发展演变，毛泽东遂决定以1943年为审干年（有些敌后根据地则规定推后一年或半年）。这年春天，延安整风即“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dlxvii]根据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央发布了主要内容为布置肃反的第二个“四三决定”（《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4月9日和12日，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两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不愿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dlxviii]会上还由张克勤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于是抢救运动就在整个延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且完全公开化了。到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已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在干部中抓到十分之一的“特务”还不满足，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dlxix]可见，从4月份起，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不再是风雨满楼，而是山洪暴发了。那些坚持把抢救运动写成开始于康生7月15日《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而且只进行了十多天就被毛主席发觉和制止了的党史研究者，（他们许多人看到的资料比我多得多，更不用说那些可以翻阅机密历史档案的人了），请设身处地和真正实事求是地想一下，这些说法能站得住吗？

从以上的简略叙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完全是毛泽东既有计划又随着形势发展而发展地发动起来的，并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是全部）的支持，以及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响应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康生无疑在抢救运动中做了许多坏事，但说是他“发起的”、“制造的”，甚至说成是违背毛主席的部署、是对毛主席指示的“阳奉阴违”等等，dlxx却都没有大约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能站得住的根据，而且逻辑上也说不通。以康生的地位和权力，怎么可能在延安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和毛泽东及其它中央领导人的眼皮底下，制造那么一场卷进全体干部和许多群众、时间又长达两三年的惊天动地的运动？但是这种说法的流行和占主导地位，也说明封建传统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之深广和党史编纂学上“为尊者讳”等原则执行的严格。

二，关于抢救运动的领导

（一）抢救运动始终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同样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毛泽东历来对他发动的运动都一抓到底，毫不放松，从开始部署（如规定指标、安排步骤和宣传口径等），不断督促检查，到最后结束，都管得非常具体、细致。凡对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稍有了解的人，对此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怀疑。先不说抓潘汉年、反胡风及其它政治运动，就是对1951年开始的“三反”，他也管得具体、细致。高岗在东北抓到个把“大老虎”（大贪污分子），赶快上报表功。但毛泽东回电却泼了冷水，还下达了5%的指标。由于毛泽东提出“上海可能有上千只老虎”，大约为了完成任务，地方上就想出了个“思想老虎”的名目，于是两袖清风的顾准和黎玉、恽逸群等一批高干随即中箭落马，其中就有毛泽东亲批的黄逸峰（这些“思想老虎”，“文革”后均已平反）。[dlxxi]这还是在“边抗（抗美援朝）、边建（恢复和建设经济）”、日理万机的紧张时期。而整风期间的延安（1941年秋到1945年夏），则处境相对安静、工作较为轻松，也不用直接指挥打仗（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所以毛泽东主要就是抓整风审干。他也不断强调整风审干的重要，并要求各级领导务必抓紧。不过根据他的总体安排（他也多次说过），1942年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才是审干肃反年。因此，1942年多强调整风，他在4月20日的讲话中就“要求全体干部把整风学习当成一项中心工作”。[dlxxii]《解放日报》6月5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中也明确提到，“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来更细密的及时的领导整个延安的学习运动。”[dlxxiii]毛泽东也确实抓得很紧很细，不断督促检查。1943年2月10日还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各地领导人，要求他们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dlxxiv]及至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全面展开肃反后，毛泽东就已密切关注和指导着肃反运动的进展，不但整风审干并提，且对两者的评价提得同样高。如1943年6月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说，“如能在今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前面曾注明“主要是清查内奸”），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dlxxv]只是从这一简单叙述中，人们即可看到，对这样大的“关键”问题，怎么可能像许多人后来说的那样让康生去领导，甚至说毛泽东在总学委也只是“挂个名”，刘少奇更不大了解情况，所以“很多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都实在把康生抬得太高了，当然不可能是事实。其实，康生不但无权领导全局，许多系统、地区和单位也是他管不了的，如任弼时、高岗领导的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彭真（上面直接管的还是毛泽东）主管的被称为延安整风审干重点的中央党校，更不用说一些敌后根据地了（以党中央名义派舒同赴山东推广延安抢救经验的作法都没行得通）。

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一直承认抢救运动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多次说，“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他也从来没有把罪责向康生

身上推，而且相反，在重要关头还为其辩护和开脱。例如针对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电函中的如下指责："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dlxxvi]毛泽东在1944年1月2日的回电中答复说，"康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随后即和苏共驻延安代表符拉基米洛夫进行了谈话，当伏提到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康生有看法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人的说法。[dlxxvii]后来在七大会议上，康生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等问题，对抢救运动不作检讨。一些代表对此写条子质问，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dlxxviii]

写到这里，实在有点想不通，那些把抢救运动的罪责完全加给康生的党史专家，为什么在这方面一定要和毛泽东唱反调？有什么根据不相信毛泽东说的对抢救运动中的错误他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他，而偏要制造一些既违背历史真实又自相矛盾的说法？这里仅以比较权威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例，细加揣摩，也许能看出一些问题。先是说，"延安审干（按，即毛泽东注明的'主要是清查内奸'，很快发展为坦白运动或曰抢救运动）从1942年冬季开展后，毛主席密切的注视着运动的发展，"（可见不是"挂名"）还很快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也不是"没怎么管"）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加强领导"。[dlxxix]可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如何重视之后，笔头一转却来了个"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却没有像毛主席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又不说明原来的设想是什么，只是把没"顺利发展"的责任推给了下面"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和"专门负责审干"的康生。[dlxxx]那毛主席和那个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干什么去了？须知延安并不大，人口只四万，其中干部和学生约占一半，一切都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当时全党这一中心任务又是情况明、决心大，怎么能让康生和其它"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规定，应为所有领导干部）长时间搞"特务如麻"，还在"不少单位""采用'逼、供、信'"？[dlxxxi]又是什么原因才使"毛主席逐渐（引注，为什么不是很快）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不断地（引注，为什么不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dlxxxii]而且如上所述，在"正式发布毛主席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后，为什么反倒使抢救运动更加猛烈？这样的叙述和论断，能讲得通吗？能使当年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过抢救运动的人相信吗？在此还应顺便一提的是，最近看到新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着经过修订的正式《1921-194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一段题为"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其中写道，"（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dlxxxiii]

这一论断大约仍然是为淡化抢救的错误而想出来的。因为第一，文中未提哪怕一句当时纪录上的根据；第二，事实是这次会议后许多地方抢救运动搞得更厉害了，包括毛泽东直接领导、彭真经常汇报的中央党校（如薄一波、曾志等的揭发）；特别是一些敌后根据地；第三，这一说法同其它正式党史著作如《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等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介绍也大不相同。胡书上说，"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分析"，而且首先指出五条成绩，可见并没有"认为'抢救

运动’应予否定”；[dlxxxiv]第四，如果1943年底抢救运动即已否定，那在党史上也不会长期成为禁区，中央对抢救运动惟一的一次评价（1955年8月《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也不致说，“延安的审干运动，中央定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中间一段即第二阶段的‘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只有“偏向”，当然不等于“否定”，两者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仅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官方的党史编纂学仍然继续坚持因政治需要而定的框框第一，历史真实倒在其次。

实际上，由于1942年底以后，整风中的审干已是中央所抓的头等大事，所以毛泽东、刘少奇和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其它成员，对抢救运动的进展以至许多具体的人和事，都是一清二楚的，并不是“逐渐发现”“偏差”和“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即以毛泽东而言，延安抢救运动的发起、领导、进度、作法、存在问题、抓到“特务”人数、以及一些具体案件，他每天听汇报、看材料，基本上可说了如指掌。例如，任何人不可能提供任何证据，说明毛泽东对以下列举的人和事及有关情况竟然不了解，或者是后来才“逐渐发现”的。以人头论，从王实味、吴奚如、“五人反党集团”、张克勤到那些被抢救的著名人士，包括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张曙时（原国民党左派，南昌起义时任革委会委员，1933年入党，1943年5月李维汉亲自主持抢救[dlxxxv]），吴伯箫（著名作家）、黄亚东（边区银行行长）；中直的柯庆施（统战部副部长、参加整风高级组学习）、武竞天（中组部秘书长）；地方党的四川工委书记邹凤平，甘肃省委书记孙作宾，河南省委两任书记王志杰和张维桢、组织部长危拱之、宣传部长郭晓棠；毛泽东自己身边的叶子龙妻子蒋家英（送党校抢救）、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抓到西北公学抢救）、秘书处工作的七大代表密家凡（被社会部抓走），以及积极抢救别人的胡乔木（他曾晚上提着马灯向行政处学委负责人刘英建议对凯丰妻子和邓洁妻子使用车轮战，说这样可使其在疲倦头晕时讲出实话）[dlxxxvi]；投奔延安的二战区少将参议钱来苏（其子彭尔宁、还有女儿、女婿均被抢救。钱被软禁在交际处，常发脾气以至绝食，处长金城多次报告均无下文，直到1944年2月8日才得到毛泽东模棱两可的批示：“金城同志：钱拯（按，即钱来苏）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dlxxxvii]）；在抢救中被迫自杀的邹凤平、柯庆施妻曾宪兰、原凯丰妻（逼疯后死的）等等。

至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如延安从1943年4月起开各种坦白大会、声讨大会、抢救大会，任弼时、康生等代表中央讲话或作报告；1944年初，主要由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的学生组成的“坦白运动先进典型代表团”到延安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我就参加了一次在中央大礼堂的报告，小孩们上台后先向台上坐的一排中央首长鞠个躬）；1943年延安和边区机关学校以主要力量搞抢救；几乎整个大后方的党（十多个省，如四川、河南、甘肃等）被打成“红旗党”，等等。所有这些，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当时肯定都是知道的，而且这一时期《解放日报》有大量报道和文章，总不能说他们不看报吧。因此，在抢救运动问题上，后来经过多方制造并终于形成的这种“由康生发起和执行，幸亏毛泽东发现和纠正”的说法，竟然可以长期流传，得到人们相信，甚至包括某些过来人。这一似怪不怪的事，既说明思想改造和控制意识形态的作用之大，也说明个人崇拜流毒之深和广。

毛泽东指挥和领导整风抢救，交替使用的机构主要是三个：政治局、书

记处、总学委。整风开始，主要还是利用原有的书记处和政治局。因为自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已基本上可以控制这两个机构，他的意图也基本上能够得到贯彻。但由于没有经过改造，还由原有人员组成，并依原有机制运行，因此就不会十分得心应手。例如1940年底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就因在政治局讨论时遇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书记处的组成则更不理想，被划归“教条宗派”的人就占了一半，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如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却仍被排除在外，这当然不妥当。于是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前不改组书记处（但后来还是改组了），只是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组成书记处工作会议，由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参加。实际上，不住在杨家岭，也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中央委员的重要部门负责人，如主持中央党校的彭真，就一直列席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工作会议。但这还不能适应整风时期的领导体制。为使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更加灵活自如，1942年5月21日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委员：陈云、高岗、彭真、李富春，并自成系统，直接管下属各级的分学委。[dlxxxviii]由于整风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毛泽东1942年3月16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dlxxxix]实际上1943年的整风抢救还更紧张），学委会又由各级领导挂帅（“首长负责”），所以整风中总学委所起作用，在一个时期就相当于“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几乎可以号令一切。但在当时，人们还保留有某些传统观念，总觉得学委只是管学习的，涉及其它工作（而整风又必然冲击其它工作）就有点名不正了。所以6月2日成立了总学委，6月22日书记处会议就决定今后书记处和总学委会议合并进行。这样就可根据问题的性质以不同的名义作决定发通知，也可使彭真、高岗、李富春等正式参加进来。

后来，随着整风的深入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已经可以和需要改组中央机构和正式在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了。于是，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遂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dxc]。这就使党内从此也实行起了一把手拍板的领导体制。虽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对此解释说（其它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如《毛泽东传》等都如此说），“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这一辩解是与实际不符的。事实上后来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还是由书记处决定，有时向政治局报告求其批准通过，但也是形式，因为从未听说过有政治局否决书记处建议的事。成立不久，书记处即提出对几个党内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看法，包括王明、博古属党内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六大方针正确等，这些恐怕就不能算“日常工作问题”。至于以书记处名义对地区或全党所发指示、通报等，如中央局的组成、关于战争和工作的安排等，有些也不属日常工作范围。特别重要的是，“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运用到整风抢救上就更得心应手了。这从毛泽东发给各地领导的电文中即可看得很清楚，指示有些地方如延安，开始甄别；有些地方如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开始进入坦白运动等。这说明，书记处改组后，毛泽东对上层整风（主要是1943年的“九月会议”）和整个抢救运动的领导指挥可以更具体更灵活。但一切都以书记处名义号令又太过正式、不好变通，所以不久后的4

月24日又恢复了一度停止运作的总学委（10月5日改组后仍由毛任主任，加刘少奇为副主任，排在康生前面，胡乔木为秘书）。此外，就是4月28日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协助毛泽东，具体抓肃反即抢救运动。作为整风审干（肃反）重点的中央党校，毛泽东早已于1942年2月亲任校长，主持常务的副校长彭真既列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又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使他对党校情况知之甚详。至于全面抢救，毛泽东和刘少奇、康生也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康生，由于同住枣园，所以接触更多。据说，毛泽东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抢救运动的汇报。[dxci]

所有这些都说明，主管抢救运动的一切机构和负责人，都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之下，听从他的指挥。而毛泽东又是一个自称“从来不让权的”、对主持各种政治运动极其认真和非常仔细的人。何况，那时他又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怎会把关乎百年大计的整风审干的领导权交给别人，自己只“挂个名”？

（二）刘少奇参与抢救运动的领导

刘少奇1942年底回到延安前，既未出席1941年中央整风的“九月会议”，也没参与1942年普遍整风的领导，而且看来他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和部署还不一定十分了解。例如他领导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对整风就没有像毛泽东抓得那么紧。毛曾说，“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可刘在回延安途中奉命指导各地工作却很少强调甚至没怎么提整风问题。对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提法两人也不尽相同。毛在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贬低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刘在稍后的7月13日《答宋亮同志》中却提倡埋头读书，说“党员在党校中学习，……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dxcii]但是两人在整风的基本目标上还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需要互相支持。他们在政治路线上一直比较接近，都曾受过“左”倾中央的压制，都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宗派”，主张彻底改造中央。毛泽东虽在六中全会后已实际上成为党的领袖，但基础还不十分巩固，还需要像刘少奇这样的帮手并借重他在华北和华中以及原来白区的力量。刘少奇虽在瓦窑堡会议后因张闻天的推荐而得到重用，在华北和华中工作中很有建树，又团结和培育了一大批干部，但无论是为了推进革命还是党内斗争，都还需要依靠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即请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并对其一路安全关怀备至。刘少奇也适应形势需要，回延安后很快就提出从组织上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则在改组书记处中使刘少奇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而升为党内第二把手，成为他领导全党全军（当时主要则是整风审干和召开七大）的第一得力助手。从此也就建立起了延续二十年的毛刘领导体制。

刘少奇回到延安，普遍整风开始进入审干（肃反）阶段。他经过两三个月的观察和了解后，就积极参加了对审干和抢救运动的领导。1943年3月16日和20日的政治局会议，除讨论和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外，还听取和讨论了康生关于反特工作的汇报，并决定向全党发出开展反特斗争的指示（也许就是那份没有载明时间和发文机关的《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dxciii]）。不久，中央又发布了以开展肃反为主的第二个“四·

三决定”，全面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抢救运动。在这次机构调整中，刘少奇除参加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和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外，还和毛泽东两人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领导中组部、统战部、民委、中央研究局、海外工委等部门。为了加强对肃反运动的领导，4月28日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dxciv]这就使刘少奇成了延安及各地肃反、抢救运动的最高负责人（实际上为第二把手，因为上边还有抓得很紧的毛泽东），康生还在他的领导之下。而在1943年“九月会议”前，中央层整风也无大动作，延安和边区各地在集中力量搞反奸抢救（学校停课，机关大部工作暂停，地方政府连农忙时也只留很少几个人值班），刘少奇当然也主要抓这方面的工作。但他作风稳健，不大出头露面，很少参加坦白大会，更不作鼓动性的报告，所以对他的领导作用，了解的人实在不多。例如他在七月所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当时和事后长时期都不知道。

看来，刘少奇当时领导审干反奸工作大概着重在两方面。一是研究和制定政策。他确也一贯重视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在进入书记处后的3月20日，他即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要求仿效延安作法，立即开展审干，其中提到，“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dxcv] 6月29日给陈、饶的电报中除此以外，还说，“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并提出一些具体方法，如注意审查“韩（德勤）武装经过和驻扎过之处”的干部，“尤其被韩捕后释放之党员”；对被俘之国民党军官要“用说服利诱与威逼等办法令其自首”，但要选好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做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等。[dxcvi]七月所作报告还从理论上说明，“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并从方针政策上提出，“审干运动的全部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dxcvii]二是抓有关干部的调动和组织安排。从1943年3月，连任六年多中组部长的陈云被批准离职养病，从此组织部的重要向题即请示刘少奇决定。一年后彭真正式接陈云任中组部代部长，就是在刘少奇住处并当着刘的面进行移交的。[dxcviii]新书记处成立后，已正式进入审干抢救阶段，所以日常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也是这个问题，而有关组织方面的事按分工自然由刘少奇负责处理。如4月5日的书记处会议就正式决定：“由刘少奇准备对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三个区域各派一个整风学习组，负责帮助该区域内整风学习。”[dxcix] 8月9日书记处会议又决定：“派干部去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帮助整风。”[dc]这自然又属刘少奇的分工范围。此外，有关审干反特，刘少奇还为中央（对华中多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些指示电。总之，刘少奇出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和组织委员会书记，决不是虚位。所以《刘少奇传》上特别指出，“这一时期，他还协助毛泽东参与领导了审干运动”，因此对审干肃反（抢救运动）中的错误，“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dci]作用自然远非康生之流可比。

他对抢救运动的全面情况和许多具体问题应当说也是比较了解的。第一，作为肃反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倒是喜居幕后），他要经常在书记处和其它有关会议上听取汇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讨论对策。（例如从3月20日

书记处改组到6月24日，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加上政治局，两者共开会研究肃反问题十一次，还不算总学委等组织讨论肃反抢救的。[dcii]）第二，他必须阅读各地和各机关报来的有关反奸抢救的大量材料，包括康生等送来的许多假材料。第三，他的住地杨家岭的中直机关，正常工作早已停顿或打乱，抢救运动闹得热火朝天，昼夜连续作战。特别是他分工主管的统战部、民委（工、青、妇）等单位，更是搞到全延安出名，如抢救柯庆施，妇委绝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其中不少是高干妻子。青委的蒋南翔（还有王世英等一些人）直接找他反映过不同意抢救的意见，还受到他的批评。第四，有他身边工作和他比较了解的人被抢救。如他的政治秘书因坐过国民党的牢被抓走，他曾要康生动员张闻天夫人刘英来继任，但被刘英坚决推掉。他在白区工作时曾在一医生家住，受其掩护。后来该医生到延安在杨家岭医务室工作并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特务"。[dciii]由此可见，刘少奇是了解情况并尽职尽责的，在认识上也和毛泽东基本一致。据刘英说，直到1943年底，刘少奇才对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从怀疑到不大相信了。主要有两件事对他的触动较大。一是那位掩护他的医生被抢救；二是听了绥德"坦白运动先进典型代表团"一批小孩的报告（那次会我也参加了并坐在前面，看到刘少奇与会），认为那些十几岁的小孩竟然当了特务，不可信。正是他和任弼时的觉醒，促成了1943年12月22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在延安停止抢救运动，"进到甄别是非轻重阶段"。[dciv]不过，在这之后，延安一些单位如中央党校，抢救运动并未完全停止，有些敌后根据地不但没受到书记处决定的影响，还进一步加紧了抢救运动。

刘少奇作为抢救运动的仅次于毛泽东的主要领导人，无论当时还是事后，一般人都不大清楚。这是因为：抢救运动一直属于禁区，有关档案资料至今严格保密；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为尊者讳"的方针，有关他领导抢救的言行尽量加以掩饰；"文革"后可以谈抢救，但这时刘已成为受人们同情的最大受害者，而且从正史到野史，又把抢救的责任几乎全推给了康生，连毛泽东都从发起者和发号施令者变成发现偏差并加以纠正的人，更何况刘少奇。但是，延安整风后，中央层和高干中对刘在抢救中的领导作用还是有所了解和议论的，刘本人当然更清楚，而且一些受过委屈和不服气的人适当时候也会提起。所以在事过八九年之后的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还不能不在最后一天作自我批评时包括对"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的一些问题"做出"检讨和说明"。[dcv]如果对抢救运动的错误没有什么责任，何用"检讨和说明"？在这次会上就抢救运动作检讨的，据知还有原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但众所周知，这次揭发"高饶联盟"的中央全会，毛泽东以在杭州休养为由，没有出席，委托刘少奇主持。康生则因病假缺席。

（三）抢救运动中的中央党校

1，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中的地位

讨论抢救运动必须专门谈一下中央党校。这是因为，党校在延安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中处于特殊地位和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像中共中央党校党校教育历史经验编写组在《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

中所说，“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央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实际上是全党整风学习的一个缩影。中共中央经过中央党校这个点的实验，取得经验，运用这些经验指导全党干部的整风学习。”又说，“党领导的整风学习，以中央党校为重点，逐步推向全党。”[dcvi]而且整风也正是从党校发轫，开始于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所作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原题为《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编入《毛选》时改为现题）。中央党校既是整风和审干（抢救）的源流和样板，就不能不多说几句了。

中央党校地位之特殊和所起作用之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不仅是毛泽东整风的试验田，而且是他对党的高干和精英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审查的基地，甚至还担负着其它某些份外的重要任务，如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当然，中央党校所负担的任务和它的重要性也是逐渐增加的。一开始的重视是由于把它当作训练高中级干部的基地（原来马列学院起此作用，但后来认为它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整风一开始即被取消，最后合并到党校），不久才被用为整风的试点和重点，并大力加强了对它的领导。首先是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任命彭真为党校教育长，由他负责制定新的党校计划。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原有课程，学习党的路线（也就是集中搞整风）；延安高干三到四百人参加党校学习；党校直属书记处，政治指导毛泽东，组织指导任弼时；取消原党校管委，整风由彭真负责。[dcvii] 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党校划归毛泽东任主任的宣传委员会管理，并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由延安当时传为两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为政治，一为军事。传为毛泽东所说）彭真、林彪分别任副校长。但因林彪受委派代表毛泽东去会见蒋介石并滞留重庆一年多（毛泽东为培养林彪，说光懂军事不行，还必须懂政治。这次适值蒋介石邀请毛去西安会谈，所以虽有周恩来在渝，还是派了林彪），实际并未到任，主持党校常务的一直就是彭真。

毛泽东放手让彭真管理党校（他自己也极为关怀，如上大课、作报告、听汇报、找人谈话等，事无巨细经常过问），并非偶然。除赏识彭真的政治素质（和他思想一致并拥护他）和工作能力外，也还有些历史渊源。作为全党领袖，毛泽东不只要团结中央苏区干部和红军官兵，而且需要团结原在白区工作的干部（虽然他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这首先就是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北方局班子。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后，撤换了原来执行“左”倾中央政策的高文华（书记）、柯庆施（组织部长）等人，当年夏末即任命同他意见一致的彭真任组织部长。1937年4—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彭真完全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正像他后来所说，“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完全失败，苏区工作大部分失败。”[dcviii]可见，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上，他是完全拥护毛泽东、刘少奇的观点的。抗战开始后，彭真协同聂荣臻创建晋察冀边区，被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41年初奉命回到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陆续作了七次汇报，汇总写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一书，毛泽东称其“讲得很好，是马列主义的”。[dcix]主持改组中央党校也很合毛泽东的意。他又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人。[dcx]因此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和超常重用，如：以一个非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延安后就经常列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所起作用超过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

书记；在组织工作的关键时刻（审干的甄别结案和七大的筹备），接替由政治局委员和曾是书记的陈云担任中组部代理部长（1940年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有一条是成立干部局——相当于中国党的组织部，领导人应是书记处成员。对此，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dcxi]；七大开幕前出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七大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来还和陈云一起成为候补书记；抗战胜利后即派赴东北任东北局书记（成员包括陈云、高岗、张闻天、林彪、李富春等）。由此可见，毛泽东放手让彭真长时担负管理中央党校这样的重任，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中央党校集中了全党大批高干和精英。自从六中全会后，各地即先后选出参加七大的代表，其中许多代表来到延安，由于七大一再推迟，大部分就被送到党校参加整风审干。另一方面，中央为了贯彻保存实力的方针，还于1943年1月1日做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dcxii] 1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又决定，为准备培训从华北、华中征调来延学习的干部，在中央党校设中级班，由任弼时、陈云、邓发、王稼祥、彭真、叶剑英六人组成委员会筹划一切，[dcxiii]表现出中央的高度重视。此外，除上述在延高干三到四百人参加党校学习外，还陆续将军事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联、[dcxiv]西北文工团、西北局党校等单位合并到中央党校。这就使中央党校在1944年全盛时期拥有的教职员工和学员（各占一半）达到六千人（那些时而旁听和走读的几百延安高干未计算在内），占当时延安脱产人员的五分之一，[dcxv]而且教职学员多是前后方的党政军骨干和知识界精华。全校编制分为六个部：一部为地委、旅级以上高干和七大代表；二部为县团级以上干部；三部为原马列学院和文联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包括非党人士如萧军、塞克等）；四部为文化低的县团级工农干部；五部为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六部为敌后调来的县区级干部和国统区来的知青。集中这么多重要干部和精华的中央党校，无疑对全党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经过两次改组，党校也发生了一些带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教学内容和课程不再学哲学、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知识（有时也指定阅读两三本马列的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左”派幼稚病》中有关集中和纪律的章节），而是主要学整风文献、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路线和历史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其次是将一切人员按工作地位、级别和资历从学习内容、政治待遇和物质享受（吃、穿、住、行、警卫服务人员等）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区分，形成固定的等级制。三是集中全力从事整风（进行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和审干（主要是肃反，并有权对在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资格进行审查[dcxvi]），有关经验和做法还通过中央机关发文件电报或抽派人员去外地向各根据地推广。仅举这三点，就可看出中央党校在全党整风审干中所起作用及其以后的长远影响。

2，中央党校是延安抢救运动的重灾区

中央党校改组后的三年（1942—1945），也就是整风审干的三年。鉴于教职学员的构成，政治审查（即政治面目、出身、历史等，主要还是肃反）自然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审干中大搞“逼、供、信”，很快就发展成了抢救运动。其在抢救运动中的无法无天、残酷无情、吊人打人，在当时的延安就是出了名的。大约由于党校各级领导和学员们的前后身份，很少有人写党校

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一些领导人写的回忆录也多是从正面写整风学习和思想转变，只显得春风化雨、正确伟大。这当然是不会全面和真实的，因为即使都是事实，也只写了事物的一面，终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例如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现在情况和性质都已基本弄清。当时毛泽东先后派李韶九、古柏等去富田在红二十军中抓“AB团”，又以曾山取代李文林任江西行委书记。可在事隔三十年后，曾山作为参与者回忆对“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的公审时竟还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dcxvii]这只好信不信由你了。关于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也是过了五十年才开始有了一些权威性的片断透露。我和周围的熟人系一般干部，当年在延安得之于道听途说的情况可以不算，但以下三人所谈却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地位、名望和思想倾向等，他们谈的只会少不会多、只有保留决不会夸大，因而是完全可信的，可以从中了解到党校整风审干的阴暗面，虽然很不全，却可以此类他，了解个大概。

一是薄一波的叙述。

他于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一部学习。跟他一起去的母亲住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一天对他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员才无可奈何的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后，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竞天、宋维静等。”因此，他评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说，“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结论是“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dcxviii]这里照录这么多，是为了说明两件事。第一，才进党校学习的薄一波就对党校的抢救运动有如此了解，那么长期主持党校工作并直接领导抢救运动的副校长彭真、秘书长黄火青以及各部主任古大存、张鼎丞、郭述申、张启龙、白栋材、马国瑞等人，难道竟然一无所知？可能吗？根据当时情况，连“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dcxix]对党校给予特别关怀的校长毛泽东，从听汇报和看材料（除各级的报告外，被抢救者的书面申诉就极多。例如曾志在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就给毛写了一封长信。1944年12月给毛祝寿，跳舞时她“乘机问：收到我的信没有？’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dcxx]）中也是基本上了解的。这也许是他向党校一再赔礼道歉的原因之一。第二，长期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薄一波（排名在另两名副组长之前），关于抢救运动结束的时间及残酷程度等的叙述和正式党史（更不用说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和民间的演绎之作了）的写法竟然大不相同。后者多是说，1943年7月15日康生报告后发起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30日毛泽东就让它停下来了。[dcxxi]而薄一波却在抢救运动“停下来”四五个月后，发现几百人被关押以及“鬼哭狼嚎”、“逼供信”等现象。至于薄一波把党校抢救运动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康生，却显得极为牵强，后面有关康生的一节还会一并谈到。

二是曾志的回忆。

曾志是作为被抢救者写回忆的，同样可信。她说，在党校一部学习

时，“‘抢救运动’阴风陡起，河南省委成了‘红旗党’，我也成了小组审查重点，……有人骂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坦白大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有一次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校长（原文如此）彭真、教务主任（？）黄火青都参加了……主要是动员失足的人自首坦白。”审查方法是，以小组为单位，各人报告历史，经过背靠背地分析、找疑点，再到会上当面质疑和作答，如此反复多次，“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1944年“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新搬来的党校一部党员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着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染红了一大块。”曾志还说，她自己“在高压下没有讲过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但支部给她审查的最后结论却是：“有特务嫌疑”，“问题挂起来”。[dcxxii]这里要作点解释，又从这本公开发售的书上摘这么多，还是想说明，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这种无法无天的逼供信，包括彭真甚至毛泽东在内的学校领导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下面谁有那么大的胆量擅自成立一个党校临时支部，任命耿飚为支部书记，关押二十多个七大代表和一批老干部（曾志本人就是中央妇委秘书长）？同时也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编写党史教科书的作家，尽量能以学者的良知和求实精神论述抢救运动，而不应再轻描淡写甚至有意地以讹传讹了。

三是刘白羽的描写。

坚决拥护延安整风的作家刘白羽，虽然对抢救运动大为颂扬，说“是一堂必须上的课，必须经过的磨炼”。它“打掉了我那小资产阶级无谓的自尊心，而不打掉它，是不可能严格地进行自我解剖的”，所以“从审干（按即反特）到整风，是思想改造不可分隔的整体步骤”。但他也还是以文艺手法描绘了审干和抢救的一些真实情况。如说，从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后，“这时，整个延安处于一种非常状态之中”，他和在不同单位的妻子都不能见面。谈到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4日）合并到党校后的一次坦白大会，说“一位广东哲学家在台前不断声嘶力竭地奋臂高呼口号，这里的气氛突然炽热得变为一场骚乱。我站在人群的后面，眼看一个一个走上台去，还不断有人向台上递纸条。愈是亲近的人，愈要表明态度，于是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喊得愈加声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诚。‘抢救运动’是由康生的极左路线造成的（按，连他也提到了路线高度，虽然归在康生名下），但是这么多人这么盲从，经过十年浩劫，我有了较深的理解。我认为这是民族陈腐淤积的涌动。在这种关头，只要被递上纸条，念出来，就得表示坦白，这样一次又一次轮回旋转，人们脑子糊涂了，思想混乱了。”经过坦白大会，“平时活跃的三部，整个落入沉闷之中。人们走着路，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

了封条。”此后，“斗争转入各个支部，一个一个审查，有的大哭大闹，有的吵嚷不息”。这些还只是“形容审干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抢救’高潮，却像延安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挟持无穷的威力，一下冲击而来。当时我们常常到中央党校去参加坦白交代大会，……”不久，刘自己也被卷了进去。有人交代：“说他来延安时，《大公报》的一个特务，就告诉他刘白羽是我们的人。”[dcxxiii]他的这些描绘不是也足以说明：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时间长短、严酷程度，同一些官方党史著作所写，相差有多远！

谈了以上情况，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中央领导特别是党校领导都是清楚的，要求达到的目的和许多措施也只能是领导上做出和决定的。因为1943年延安主要做的就是审干和抢救，直到年底才进入甄别阶段，而且许多领导人的妻子、战友和某些身边的人都在党校接受审查，哪有不透风的墙！例如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妻子蒋家英，被送去党校一部审查，中秋节仍不准回家（可见那种说7月30日抢救已被“指示停止”的党史教科书是多么地不可信），她一怒之下就领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说，“走，妈带你们游行示威去！”在校园转悠时终于碰见彭真，问明了情况，还是没解决问题。[dcxxiv]

对中央党校那么长时间、那么残酷的抢救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重灾区之一”，彭真应负直接的重要责任是很自然的。他在1944年6月8日的党校支部书记联席会上也做了点检讨，说：“那次斗争（原注，指1943年的抢救运动），有的同志受到一些打击，我要负责，接受那次错误，把方法搞对，立场搞对，自己先解决。”[dcxxv]不论这是否算得上检讨，但他在已经提出要搞甄别时还说过一些很不实事求是的话却是事实。如在1943年12月3日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是“一个革命”，“没有杀一个人，也没有毁灭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dcxxvi]其实，这时已有邹凤平、危拱之、曾淡如（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等一些老同志和知识分子干部被“毁灭”了（自杀和疯癫等），还有一批七大代表如河南省委负责人张维桢、郭晓棠、王志杰等，则因“特嫌”或其它罪名未通过资格审查没能与会，至于甄别结论中留或大或小的尾巴而受到长期影响的人就更多了。作为抢救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的领导人，特别是中央党校运动的主持者，彭真是从未承认过这一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的。只是由于上面有毛泽东顶着，他又掌握着中组部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所以这个问题并未影响他七大后的地位上升（连康生都没受影响），而且也从无人提起。只是“文革”开始时，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彭真时，说他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但由于他和刘少奇一样因受到严重迫害而获得大家的同情，抢救运动又找到康生作为罪魁祸首，所以就没人提到他了。又如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在抢救运动中搞得也很厉害，但因他1962年后长期挨整，韦君宜还是笔下留情，点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名却没点他的名，只说“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dcxxvii]但最近还有人着文，介绍习仲勋说自己“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dcxxviii]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在一个“左”倾路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作为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领导过中宣部的人，说从没犯过“左”的错误，恐怕难以讲得通。

中央党校抢救运动错误的严重，也在于它是整个运动的试点单位，创造的经验要向全国推广，还由它那里抽调人去别地或别单位指导整风审干（抢

救）。所以党校抢救的错误影响到全党全国。各地抢救运动中的作法、用语等几乎一模一样，与此不无关系。例如前面提到1944年北方局党校抢救那套打人，车轮战等作法和“党认为你有问题”等说法，大约都是从中央党校传过去的。因为主持北方局党校抢救运动、并动手打冀南行署副主任刘建章的杨献珍，1943年中央党校改组时就和刘芝明同任教务处副主任（主任为张秀山）。[dcxxix] 1944年派往山东专门去协助罗荣桓搞整风审干、任分局总学委副书记的舒同，也是由党校一部学员中抽调去的。但由于路途遥远，1944年9月到任后，全国各地抢救的高潮已过，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多，特别是由于罗荣桓的抵制，所以“延安经验”没能行通。中央书记处几次决定派人去敌后根据地指导整风审干，多是从党校抽调，因为那里储存着大批高中级干部，而别的机关干部却都有现职工作。至于中央所发有关整风审干的文件中，有哪些是出之于党校的经验，自然无法说清。但彭真1944年1月14日直接复信抗大总校李井泉政委和何长工副校长，介绍党校整风经验[dcxxx]（按，这时抗大早不是整风学习，而是抢救运动的甄别阶段），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因为当时向党校“取经”是常事。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对历史人物的点名和评论，我认为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就是继承中国史传的优良传统：“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录”；反对个人迷信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的那一套，如：一切功劳归领袖，“为尊者讳”，对认为好的人“隐恶扬善”，认为坏的人给追加罪责。这些将在下面《延安整风与中共党史编纂学》一章中专门讨论，这里只是先提一下，也许有助于人们不忘过去。在中央党校的负责人中，就有些人过去也曾被自己的人几乎整死，现在却对以同样方法整人的抢救运动，或熟视无睹，或参与其中。时任教务处主任的张秀山（还有上面提过的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就曾在1935年同刘志丹等一起被关起来，刑讯逼供，打个半死。据郭洪涛说，他就是从审讯张秀山中引起对陕北肃反的怀疑。他说，张秀山被吊起来打，就承认“反革命”，一放下来又翻供。如此一再反复，郭洪涛才认定刘志丹等不会是反革命，因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就已同朱理治、程子华等研究决定，停止了抓人。[dcxxxi]正是这些不久前才挨过整的同志，在抢救运动中却把自己过去蒙冤受屈的事给忘掉了，又来参与制造新的冤假错案。我还亲眼看到有些在延安被抢救过的人，在建国后的肃反等运动中，搞起逼供信来并不手软，甚至连方法都和抢救运动时一样。其中也可能有人在下一次什么运动中又栽了跟头。为了避免这种“天道轮回，周而复始”的毛病继续变相重演，指名道姓讲得具体点可能有好处。反正这多是涉及到一些有地位的人，大概不会被误会为有什么个人恩怨。

（四）地方和单位领导所起作用更重要

由于抢救运动已经打乱了以前党内有关的规矩和系统（如审干一般由组织部门负责，锄奸一般由安全情报部门负责等），又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并明确规定“首长负责，自己动手”，[dcxxxii]这就使各地区和各单位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的认识和态度，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央虽有统一部署和不断发文电或派人检查督促，但各地和各单位做的却并不一样，有些甚至完全不一样。这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第一把手的思想认识和人品个性。对于多数人来说，恐怕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认识上的"左"，真的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的提法和抢救中的"延安经验"，[dcxxxiii]其结果必然导致认识上的"特务如麻"和做法上的"逼供信"。二是组织纪律的约束和整风造成的威慑力量。许多人经过一阵抢救后已感到有点不对头，但由于怕挨批，不敢表示怀疑和提不同意见，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蛮干或做点表面文章，应付上面。当然也不能否认，不少人抱有个人打算的成分，要在运动中争当积极分子和培养对象。因为从来都是响应号召、紧跟领导、冲锋陷阵的人会得到重视和重用，何况这次还明确地提出通过运动"培养干部"是肃反（抢救）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和抓到"特务"越多成绩越大的动机，驱使着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搞起逼供信。而且历史和眼前实际都一再证明，由于搞逼供信和制造冤假错案而受批评和处分的极少，甚至没有；谨慎行事、搞不出"特务"或者被认为搞得太少的，就不断挨批，很难过关。不管是出于思想认识、组织观念还是私心杂念，地方或单位首长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本地区或本部门抢救运动的命运。遇到开明的首长，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错误。遇到"左"的首长，大家可就倒霉了，会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毁灭不少人（如中央党校的邹凤平、危拱之，中直妇委的曾宪兰，1947年被晋西北处决的著名"爱国五青年"之一蔺克义等），使更多的人不但一时受屈，还背了一辈子黑锅，结论留尾巴或受控使用，每遇运动都挨整，等等。由此可见，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对参加革命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机遇，这也体现了某种封建因素。

由于抢救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因此一般说来，愈接近上面，"灾情"就可能愈重。边远地区和非直属单位，由于领导人的"左"，也有搞得很厉害的，但总是少数。在延安，除作为试点和重点的中央党校成了"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外，在我看来，中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比军直（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就要严重一些。例如中办秘书处（处长王首道）是专为毛主席和书记处服务的机要单位，五六十人中也有十几个被打成"特务"。据刘英说，民委下的妇委一大半女干部被打成"特务"，而且使用刑讯逼供。她们就打了曾宪兰，把她逼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跳进枯井自杀，妇委还造谣说她是柯庆施放跑的。抢救凯丰原来的妻子时，胡乔木也积极参加了晚上的车轮战，还动员刘英去劝。刘英一劝，她就哭，说"我是爱凯丰的呀！我什么目的都没有。我很单纯的。"[dcxxxiv]相比之下，我所在的军直，除三局的电讯学校（驻安塞）的200人就有170人被斗外，总政、总参等直属单位还是比较稍为稳一些。而总政各单位中，胡耀邦领导下的"组织部系统就没有一个人受到冲击"。[dcxxxv]就是总参大本营，相对而言，也还平和点。譬如说开坦白大会吧，也顶多是大喊大叫，推推搡搡，并没看到打人现象。我参加过几次军委所在地王家坪桃林里的坦白大会。当时的情况是：军委首长坐在台上，旁设"特务"当场坦白后的"光荣席"，放有茶水香烟等。叶剑英（大家称"参座"）主持并作动员讲话，编译局长兼外语学校校长曾涌泉甩着他的白头发领呼口号。下面就是拉人上台"坦白"。有一次是专为编译局和外语学校而开，我也被几个男女同学连劝带拉，但却因"太顽固"而没拉上去。（最近还和同班同学蓝曼回忆往事，谈到抢救时他笑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抱住小桃树死不放手。可惜这次谈话后一个月蓝曼就与世长辞了。）我们学校这时已

按中央第二个“四三决定”，实行了全面戒严，外出劳动规定“三人同行”，个人日记、笔记、小刀等用具一律上交，显出一派“赤色恐怖”气象。不过抢救时也只是劝说、围攻、车轮战、假枪毙，以及各种威胁；但还没有中央党校那种脚踢吊打，刑讯逼供。我感到最受辱的就是一位女同志（当时三五九旅副旅长刘转连妻子邸桂芳）向我脸上吐痰和谩骂，而最难挨的也只是车轮战不让睡觉。可见，我们学校比起一些中直单位还是比较文明些。

地方上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就搞得凶一些。西北局系统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成员高岗负责，自然不会手软。不但民运部全部打成“特务”，直属单位如西北党校、行政学院等，也搞得相当厉害。毛泽东8月8日《在中央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举例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很多是特务，恐怕过半数。”[dcxxxvi]边区政府由李维汉负责（林伯渠、谢觉哉二老实际管不了），搞得要比他在中央研究院厉害得多。不但林老的秘书区棠亮被打成“特务”，而且总务处的勤杂人员还在老处长的带领下“集体坦白”成“特务”。[dcxxxvii]至于李维汉亲自抢救参加过南昌起义年届六十的张曙时，更是有声有色。李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张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后为林伯渠所挽救。[dcxxxviii]陕甘宁边区各地情况也大多如此，据了解，搞得厉害的有延属地区、绥德专区，陇东专区。延安县由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蹲点任宣传部长，进行调查研究，要证实：特务已渗透到农村；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学教员基本上都是特务；可以分化瓦解为我所“用”等。延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一个县长就打过17次人。[dcxxxix]陇东专区搞的也不轻，外来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特务”，这是蒋南翔在他的“意见书”中已提到过的。大约最出风头的还是绥德专区，除派示范团去延安中央礼堂、边区政府及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外，在地委所在地更闹得热火朝天。单一个绥德师范就开了九天控诉大会，在教职员和学生中挖出“特务”230人。占全校人数73%。[dcxl]后来又扩大到小学生，最小的据说只有六岁。[dcxli]这都是公开的。地委的《抗战报》整天发表抢救运动的消息和一些学生写的“坦白”和“控诉”。运动从绥师发展到社会再到机关。于是国民党统治时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被斗，机关里面外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难免，《抗战报》的杨述（解放后当过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被迫承认为“战略特务”了。[dcxlii]有些外县，地委首长顾不上，也可能稍为缓和些。

抢救运动搞得“热闹”的，陕甘宁边区之外大概就算晋西北了。一则是因为“近水楼台”，和陕北隔河相望，所以陕北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影响到晋西北。虽然敌情严重，但还是早在1943年3月18日就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经验，各地军政干部集中起来搞整风审干。同年9月，驻军和边区一级机关分头召开“反特务”大会。参加抢救运动的干群约三万三千人，有的单位抓出特务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dcxliii]二则是任晋绥分区代书记的林枫，对整风审干既知之甚详又执行坚决。1942年夏他从延安汇报回来后，就毫不客气地立即送走了在晋西北作农村调查的张闻天；抢救期间又不理睬周恩来给穆欣的证明。[dcxliv]因此晋西北照搬延安经验就是自然的事了。曾任新军副总指挥的张文昂和一些领导干部如雷任民、张隽轩、梁膺庸等都被抢救过。分局党校也是重灾区，70—80%被抢救。师范学

校几乎是全部。但发展也不平衡。例如据罗贵波说，八分区整风审干就比较稳一些，没发生过逃跑自杀等现象。[dcxlv]

其它根据地抢救运动情况，轻重情况不一，主要也是看领导。例如上面提到的晋冀鲁豫北方局党校就曾经是重灾区，太行等地还发生杀人现象。所以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他要求"必须立即检查这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dcxlvi]这才制止了太行太岳地区的胡来。

抢救运动中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从华中各地情况的不同可以看得更明显。据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和苏北区党委书记的黄克诚说，"1943年4、5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会议期间，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之事，要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但这是中央指示，华中局不能不执行。只是由于各地不同的领导，所以执行情况产生极大甚至根本差别。搞得最凶的就是谭震林任政委和区党委书记的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每个团都搞出了"数以百计"的"特务"。该师政治部一个女同志被迫承认是"特务"，还供出了第七师政委曾希圣的妻子，弄得曾希圣极为苦闷。可黄克诚的三师和苏北地区就没搞"抢救运动"。黄克诚还替曾希圣查清他妻子的冤案。[dcxlvii]据林颖（原彭雪枫夫人）说，彭雪枫、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和淮北地区，以及郑位三、李先念领导的五师和鄂豫边区也没搞抢救。

就大区而言，大概惟独山东没有搞抢救运动。这是因为，1943年山东战事频繁，形势严峻，刘少奇又才解决了分局的争论，调整了领导班子，书记朱瑞换成了罗荣桓，需要些时间进行整顿，因此一直到1944年才开始整风。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罗荣桓的领导。他不但反对利用"民主检查大会"搞"钓鱼"，而且还明确不让开展抢救运动，认为山东情况特殊，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按延安的抢救办法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所以延安发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发"。一开始民主检查，在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就跳出来大反黎玉，被称为"山东的王实味"。舒同等人已将其定为"特务"并报告延安，延安也回电同意。但罗荣桓不以为然，说王是思想问题，不是特务，单独找王谈话，加以批评。罗荣桓1944年12月21日在发给全区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混淆起来，要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的严重的逼供信"，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以检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dcxlviii]此时适逢延安的抢救高潮已过，正忙于甄别平反。这样，罗荣桓就使山东避免了一场抢救运动的大灾难，事后还得到了人们赞扬。在罗荣桓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江泽民就特别提到，"1943年，他正确领导山东军区和115师的整风运动，制止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使这次运动真正起到了团结教育干部的作用。"[dcxlix]

* * * *

关于延安和各地的抢救运动，已有不少书籍文章介绍，这里无须作详细叙述。之所以谈上面这些片断情况，只是为了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抢救运动（正史称为审干运动或"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央向各地发文和派人推广的延安整风审干经验，对高级领导主要是分清路线

统一思想，对广大干部主要就是从“引蛇出洞”到抢救运动。第二，抢救运动虽为中央统一部署，但如何执行和所犯错误大小，则决定于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实际上进行抵制（不敢公然抗拒）的领导也有，如山东、苏北等。第三，由于抢救运动是中央的部署，所以在运动中犯错误甚至草菅人命的错误，如一些“抢救运动的重灾区”，其领导者都没什么责任，不会受到处分，相反还往往因表现积极而受到重用和提升。这只要看一下一些人在七大后的安排，就会得出或证实“左”比“右”（并非真右，故用引号）好的结论。第四，实际情况证明，抢救运动并非康生发起，而且灾情重的单位和地区大多是他不能随便插手的。轻灾和无灾区，他也不一定没有插手，如山东就曾派要员去推广延安经验。许多史书对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作用的评估和描绘，实属有意夸张和以讹传讹。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2003年1月15日完稿）

第十二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三

——康生其人和抢救运动

一，为什么要谈一下康生

谈抢救运动不能不谈及康生。这是因为，康生确实在抢救运动中做了许多坏事，而“文革”后的党史界又已经把他定为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甚至成为一切错误与罪恶的渊薮。我在前面的叙述中，曾一再提到这是对康生地位的过分拔高和对他在抢救运动以至整风中所起作用的无限夸大。而且这不是党史界个别现象，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区别和繁简的差异。所以康生的问题仍然有必要比较集中地谈一下。但这决不是要为康生翻案。康生并不是好人，对他开除党籍的处理也没错，因此不存在平反问题，而只是存在着对他的作用做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同邓小平说林彪、江青不算路线斗争，[dcl]丝毫无意减轻他们的罪责一样，否定康生是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也不是要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而只是说出历史的真像，并在这个问题上附带做一点破除党史界普遍存在的绝对化倾向和“箩筐主义”的工作。但对此，在后面一篇笔记《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还会专门谈到，这里只是为了说明康生的作用，先提个头，作点名词解释。

所谓绝对化，是指被定性为坏人的人，就只能说坏不能说好，而且是“生来坏”、一贯坏，还要尽量夸大和增添他的过错与罪行，减少和埋没他的功绩与贡献。被定性为好人的人，特别是要保护的领袖和高级领导人，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也要尽量掩盖其过错和夸大以至凭空增加其贡献。所谓“箩筐主义”，则是绝对化的延伸或形象化。无论是被定性为好人还是坏人，都有各自的箩筐。好人的箩筐里只准装好的东西，除本人的外，也有些本来是别人的；关于缺点错误，则要尽量去掉，实在去不掉的就设法减轻和淡化，或者干脆装到坏人的箩筐里去。坏人的箩筐则相反，还装了许多并不属于自己的坏东西。党史研究中除绝对化和箩筐主义外，还有禁区和禁人的问题。禁区，这是人们都了解的。例如“文革”就越来越不能提了，连一些人物的电视文献片，演到“文革”时也一跃而过，使历史缩短了十多年。“文革”也和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一样，已逐渐变成实际上的禁区。所谓“禁人”，这是实在无法表述而自行杜撰出来的一个名词。例如胡耀邦，大概没有人敢说他是坏人，倒是公认的大好人。但是他的著作和纪念他的书籍在内地不能出版，他的形象不得见诸报端和电视。至于赵紫阳，更不能提了，直弄到看签订英国归还香港的议定书的镜头或照片时，只看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看不到中方的签字人。和禁区不同，禁人们办的事可以公开，只是人不能出来，故名之“禁人”。

以上这种极端化、箩筐主义、禁区和禁人等，自然不会实事求是，只能做假，但要“打假”却又很难。一是“假货”和被隐瞒的真货都太多，打不胜打；二则“打假”显然不会被允许（指重要的，小事也许还可以）。因此，直到现在，党史界的造神和造假运动还呈上升趋势。只举近日所看到的两事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六期有一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学术座谈会发言选登》，一位著名的党史教授在发言中说，“‘四人帮’企图把丰富多彩的中共党史缩小为‘十次路线斗争史’，是抱着毁党、篡党的阴谋的。”[dcli]这就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十次路线斗争”明明是毛泽东1971年八—九月在外地巡视期间的谈话，每次“斗争”都讲得颇为详细，[dclii]什么时候又怎

样变成了“四人帮”“毁党、篡党的阴谋”？这是不学党史的“文革”过来人都知道的史实，何况党史专家。他这样讲恐怕多半是由于已习惯于箩筐主义，把领袖所提站不大住的东西顺手装到“四人帮”的箩筐里，而且还上纲成为“阴谋”。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第2期《炎黄春秋》载文说，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北部“一座挺立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浮雕中，居然没有陈独秀”。“熟知五四历史的人们敢于断言：它的寿命绝对长不了。”“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近乎对历史的嘲弄。”这种作法恐怕也不是领导人和设计者的疏忽，而属有意的造假，所以引起这位作者的愤懑。

这些看似都同康生和抢救运动无关，但由于它已成为普遍风气和不成文的戒律，所以讨论康生或抢救运动的问题一般也不得违犯。而且是禁区，有关资料又看不到，一些公开揭批康生的东西，不是只戴帽子不讲事实和根据，就是事实有误和以讹传讹。例如《康生评传》上有一节谈康生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书记，说“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就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饶从未做过政治局委员），可是后来还有些文章在抄袭。这就是为什么在谈康生的时候要先交代一下这种绝对化偏向和箩筐主义现象的原因。

二，关于对康生的一点评介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的决定中，提出的理由是：“鉴于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的党籍，撤消对他们两人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们的反革命罪行。”[dcliii]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主要算的还是他们在“文革”中的罪行，至于其它历史问题，如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的错误与罪行，就只是在《附件》中提到“在延安一再制造冤案，陷害大批干部”，没有提到抢救运动。这也从侧面说明，抢救运动是否错误尚无定论，即使错，罪责也不能完全推给康生。但我们算的正是康生在延安整风抢救中的帐，自然不能为中央这次决议所限。而且既然说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可他为什么会入党后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进入政治局四十年，还作到“善始善终”，位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死后落得个“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美名？[dcliv]可见，康生的一生还不能简单地只用一个“坏”字概括。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一分为二”同样适用于康生，特别是康生也确有能爬上去的客观条件和自身本领。因此讨论康生和毛泽东的关系及其在抢救运动中的作用之前，对康生作点简单评介并不是多余的。这里只谈与我们所讨论问题有关的几点。

（一）康生一生中的重大罪行

康生并不是一些书籍和文章中说的生来尽做坏事。这种绝对化倾向当然是违背史实的。我们无须为康生评功摆好，但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除犯错误的一面外，也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贡献。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八年，那可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而且大部时间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如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特科的除奸保卫工作，为苏区输送干部，维持中央的联络机构。（至于康生是否在上海被捕叛变，说法不少，但中央决定附件只说存疑，未作正式结论，且附件竟还提到已证明完全错误的所谓“潘汉年内奸案”，因此这里也不作定论。）在驻共产国际时期，他也不光是同王明一起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还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精神，多次联名写信批评博古中央的某些过左政策（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他们一次来信后停下来的），维护和宣传毛泽东（指令博古中央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将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为正式委员，大力宣传毛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全苏二次大会上的报告等），特别是提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落实。回到延安后，康生很快就顺风转舵，和王明拉开距离，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站在一起，使中央在同长江局的争论中可以合法使用书记处名义。他不但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就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去武汉的意见，而且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已酝酿推举毛出任总书记，并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拥护者。这也是他能够一直站稳脚跟并步步高升的基础。如果说，在延安整风前，康生还为革命做过一些好事，有一定贡献，那么以后他起的好作用就不多了。因此，综观康生一生，实在是贡献不多，罪

恶极大。他的主要罪行大致可归纳为三项。

一是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推波助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这是本文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下面还会专门谈到。

二是制造和鼓吹个人崇拜。

他虽谈不上发明者和带头人，但也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个人迷信问题，是中国党在延安整风以来（自然包括抢救运动），特别是建国后，累犯重大错误的根本原因，也是康生之流赖以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因此不能以“法不责众”和“人人有份”等为由，淡化和减轻个人崇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制造者们的责任。实际上，搞个人崇拜才是康生最大的一项罪行，其它犯罪多是由此产生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但这个问题在下面讨论康生和毛泽东的关系时还将涉及，这里就先不多谈了。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

这正是犯事——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所在，自然不能不说。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又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其它有关材料也是一谈及“文革”中的坏事，大多要挂上康生的名字。所以对他做的坏事，既无须多所重复，也不必作什么分析论证。这里只从中央决定中处分他的主要根据（即主要罪行）“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说起。不过关于“篡党夺权”，也如同“路线斗争”一样，在过去的党史中使用得一直有点乱。如果说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明目张胆的篡党夺权，那是不会有争论的。但从延安整风以来，批判的许多“篡党夺权”却不大容易站得住。例如一直批判六届四中全会以及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都是篡党夺权，（中共党史学的开拓者胡乔木直到临终还坚持“四中全会是夺权”[dclv]。）就已值得商榷。既肯定它是夺权，又不敢否认其合法性，这就不但说不清，而且显得自相矛盾。[dclvi]还有些已彻底否定的“篡党夺权”，如1959年庐山会议中的“军事俱乐部”、“文革”初期的“刘邓司令部”等，就更不用说了。至于林彪、江青等人的篡党夺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因为林彪成为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江青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和前台总指挥以及后来进入政治局，都是毛泽东的安排和得到中央全体的拥护，并不是他们自己设法篡夺得来。而且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一开始是被说成混在一起的，后来才被分成了两摊，康生则明确是江青集团的“顾问”。谈到他们的篡党夺权问题，如果是指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夺到只听毛泽东一人指挥的（1966年毛泽东就明确说现在不要一线二线，他自己就是一线）中央文革之手，那很快就完成了，因为这只有毛泽东一句话就行。1967年11月27日《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联署发出的。[dclvii]实际上“九大”从筹备到召开，也都是在中央文革把持下进行的。1967年2月，毛泽东就已说过，“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dclviii]全国各省市和地方机关的夺权，1968年冬也已全部完成，先后成立了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dclix]在这种情况下再提篡党夺权，就只能被理解为夺毛泽东的权了。关于后来林彪的设国家主席之争是否算得上篡党夺权，在此不论。但说江青要从毛泽东手中夺权，康生也直接参与，恐怕就值得考虑了。实际上，“文革”中康生对毛泽东表现得更加忠诚，而且正是由于揣摩到领袖意图，才对江青变得完全驯服，甘做她的一把杀手锏。

康生同江青本来就有一种特殊关系。他了解江青的底细，特别是被捕叛变问题，又对江青同毛泽东结婚有撮合之功。所以江青一直对他有点敬畏和

感激，在延安时就一再说：这“老”那“老”，我只认一个“康老”。而康生对江青也不大在乎，人家都称“江青同志”，他却直呼其名。只是“文革”开始后连续发生的几件事，才使他这个感觉锐敏、老奸巨猾的阴谋家开始认识到了江青的“来头”和“厉害”。一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建议改选政治局常委，并由他提出名单，让周恩来写出去征求林彪和江青的意见。江青提出邓小平不应排名第四（原排毛、林、周后，因系全票），应把“文革”组长陈伯达提到前面，但又说陈太软，压不住邓，还是陶铸厉害，把陶调上去。周恩来回复毛泽东，毛表示同意，于是就把陶铸由最后一名勾到了第四位。从这件事上已可看出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这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了。第二件事是，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dclx]这等于明确宣示，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以江青为首，组长陈伯达已成傀儡。所以在几次会上，陈伯达讲话都说他这个“小小的老百姓”只不过是刘盆子（西汉亡后被赤眉起义军抬出来当皇帝的一个放牛的刘氏宗室），意思是“文革”小组由江青当家，他只是挂个名。但他又不能不跟着江青干坏事并承担责任。例如由于他们对陶铸不满，江青就封陶一个“最大的保皇派”，并在没有事先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于1967年1月4日组织大会，让陈伯达讲话（陈陶也有旧怨），突然把陶铸打倒了。其实陈伯达的日子也不好过，曾一度想自杀，还对周恩来等人说过，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已查了书，认识到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指法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杀后列宁参加了悼念）。[dclxi]这也许是陈伯达被认为后来转而投靠林彪的一个原因。对康生震动最大的还是第三件事，即毛泽东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火。他曾对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主要是针对陈毅批评延安整风抢救和谭震林说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康生从此对江青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不但言听计从，而且还为扫清江青“前进”道路的障碍献计献策。变化的明显也表现在连称呼都一下由直呼其名改为“江青同志”了。只要江青提到或暗示要整什么人，康生就会立即着人搞出材料，并上纲定罪。[dclxii]

上面只是谈点康生揣摩领导意图、紧紧追随江青的情况。至于他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那确是罄竹难书。单是被他罗织罪名、直接点名和批准迫害的干部即达839名，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243人。[dclxiii]而且事实证明，康生的罪行并非思想认识问题，所以在临终前还要作点洗刷。一是让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转报毛，说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dclxiv]二是死前在输液和吸氧中由担架抬进周恩来病房密谈近一小时，除交代江青、张春桥的变节问题外，[dclxv]据说还请周转一封信给毛泽东，对“文革”提了意见。不管这两件事是否出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了留点好的“名声”，都说明他的许多罪行多是明知故犯。

（二）康生的两副面孔

康生有两副面孔。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参加运动和整起人来，他心狠手毒、阴阳怪气，是个搞逼供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专家。一个时期，党史研究和舆论导向也搞极端，一会儿把他吹上天，出事后又一下描绘成一尊凶煞

恶神。其实康生还有另一副面孔，平时总要摆出一种文人学士的派头，显得颇有才学，曾得到不少人的赏识，也成为同毛泽东有亲和性的一个因素。其实这种有两副面孔的奸佞小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被《明史》评为"机敏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是突出的典型。康生的不同面孔的显露也决定于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从我到延安后的印象中，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在整风前延安生活还处于生动活泼的那三四年，康生也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人们是可以在街上和一些集会上常见到的。虽然他的装束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如穿一件延安少见的皮夹克之类，但大家对他还是作为中央首长加以尊重，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坏话，反而传说他如何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以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来得。不管传说如何，许多人亲眼看到延安开始演平剧（即京剧，那次是江青和阿甲演《打渔杀家》）时他当司鼓确是事实。说他出口成颂也不全虚。记得一次谢老（觉哉）在报上发表一篇谈写字要规范的《炉边闲话》，就曾提到康生。说延安当时成立了一个名叫"飞鱼队"的游泳组织，把举行比赛的通知错送给了康生。康生即以打油一首相复。道是："邀我游泳吃一惊，字如飞鱼认不清。半天识得一个字，原把康云误康生。"[dclxvi]总之，在延安的头几年中，一般干部对康生大多还是敬佩的。

延安整风开始，康生由于跟得紧、受重用，一时名声大噪。不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报告由他向广大干部传达，而且他的传达报告还被中宣部列为最初规定的十八个学习文件之一，即"（3）康生两次报告"。[dclxvii]《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毛康并提，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dclxviii]整风开始一个月后，又宣布"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dclxix]从此，康生的地位日益显要，除听他的报告外已经很难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了。他的报告也是声色俱厉，一副"格柏乌"（苏联秘密警察、镇反机构）派头，使人望而生畏。一次讲民主集中制，就把集中和纪律强调到了可怕的程度，还高声念了几个外文字，说民主是形容词，集中才是作为主词中的名词。抢救运动开始后就更少知道他的行踪。现在许多党史读物说，抢救运动中康生到处插手、经常到各机关煽风点火、宣布整人的名单，多半是后人的臆想和某些人的编造（为好人解脱，为坏人加罪）。实际上，一般干部对康生在抢救中的活动和所起作用并不清楚。只是许多被抢救者由于对他的一些抢救报告不满，因而对他的印象变坏了。但可以看出，那时和以后，他和一批积极分子和秀才们的关系还是一直不错的。

解放后头十年，康生因长期养病和做了几年内部编辑之类的工作，没有怎样露出凶相，反而在文化方面捞到了一定名声，不少人赞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与鉴赏水平，如书画、诗词、戏曲、金石、文物收藏等。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尊康生为当代中国四大书法家之首，不但真草隶篆皆通（尤擅章草），还可左右开弓，他家就有康生书写的真草隶篆四幅屏。郭沫若游晋祠后也吹他，"康公左手出奇字，照眼红墙绕晋祠。"康生也能画两笔国画，署名"鲁赤水"，意欲与齐白石试比高。邓拓（马南邨）在《燕山夜话》中曾写过一篇《谈鲁赤水同志的墨梅》，极为赞赏。康生的诗词无缘多见，只记得大约1959年前后，名人中兴起一阵吟庐山仙人洞之风，并传出康生的一首小令："仙人洞，天开石窦。一滴泉，地辟清湫。绿荫深（处）隐红楼。踏白云，天外走。望长江，天际流。这神仙是到处

有。”而且据说毛泽东、郭沫若有些作品还征求康生的意见。康生收藏文物更为出名，主要是砚台、印章和善本书。据王力说，康生看合适的字画也买，但一般自己不藏，大多送给了邓拓、王力、田家英等人。一次有人告知，康生从收藏的砚台中选出了九十方交王冶秋在原北大红楼作内部展览，我也去看了一下，因纯系外行，现在只对一方汉代瓦当砚和一方明代脂砚有点印象。[dclxx]这类事情还可举出一些。例如我就不只一次听到陈毅说过，北京的厨师怕他，唱戏的怕康生，意思是各为有关方面的内行。但是熟悉中国封建传统的康生很鬼。他的特长一般不露，以免“木秀于林”和遭人主忌。他号称“理论家”，却坚持述而不作。（有人说他理论上根本不行，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但过去那种常写理论文章，还引经据典的人，对领导造成无形压力因而遭忌也是事实。）谈以上这些，无非是为了说明，康生当年还迷惑过一些文化人和秀才们，并不是后来人们描写的那样完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不像一些事后诸葛亮为领导人编写的传记和回忆录所说，似乎这些领导人老早已看出康生是坏人。也许正因为有“文武”两手，才使康生能够长期得宠和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行凶作恶。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和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感到搞政治斗争还是得心应手，搞经济建设却把握不大，于是就自然将“左”的路线更向“左”推，大抓起了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这就为康生提供了发挥特长的用武之地。从1959年起，康生又顺着领导意图，沿着极左路线，大肆活跃起来，到处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起着越来越坏的作用。例如“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原来就是康生写的一张条子。就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给中央的报告，向毛泽东告状，说张“比利别尔曼还要利别尔曼”的，也是他。在“反修防修”、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康生出尽了风头，在把中国推向十年浩劫中起了重要的准备作用。至于在“文革”中，更是作恶多端，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害死了多少人。也正是这个第四阶段，使康生的原形毕露，落得了个遗臭万年。

三，关于康生和毛泽东的关系

像康生这样一个奸佞小人，为什么会长期大显神通，成为少有的不倒翁？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延安整风起他就同毛泽东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系。他以毛为靠山，忠心耿耿。毛对他既用其所长，也始终信赖。康毛关系悠久而且面广，这里只简单谈几个有关的问题。

（一）政治上的结合

虽然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对毛泽东也有照顾（如上所述），但确立长期相互信赖基础的还是延安整风。善于观风和投机的康生，回到延安后就开始向毛泽东靠拢。这时毛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正需要像康生这样从莫斯科回来的大员的支持，所以对康也是投桃报李。如康生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支持了他，四月就取代邓发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随着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康生的拥戴和支持也越来越明显，他的地位和职务也得到迅速提高和增加。整风开始后他一时几乎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他身兼职务到1942年就已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学委副主任、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的《学习报》主编、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局长，1943年还增加了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不可谓不多。康生在整风中一个重大功劳，我看就是实际上对王明“左”倾路线（并从四中全会算起）的定性和强调教条宗派篡党等问题起了明显的启迪作用，而这些又正是整风中清算历史中的关键。因为在1943年政治局“九月会议”之前（甚至包括“九月会议”康生发言前的头几天），对王明的批判还是限于武汉时期（先称右倾错误，后升为投降路线），批评第三次“左倾”也是从“九·一八”临时中央上台算起（故称“博古路线”），还明确指出，政治局“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是“主要的根本的”。[dclxxi]但在康生大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发言后，会议的内容和气氛即随之一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康生发言的一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dclxxii]不知是否有此含义）。此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发言中，四中全会就一下变成了篡党夺权，只有罪恶，博古路线也加上了王明的名字（后来干脆变成了“王明路线”），还更加强调清算两大宗派，即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延安整风的根本问题和中共党史学的基调从此奠定。当然，康生并没有提出这一整套，但连毛泽东都说发现四中全会的错误是康生的功劳。[dclxxiii]延安整风后，康生更是竭力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当然不少人也在揣摩，但比较起来，他显得见事早、摸得准、跟得紧、变得快。例如毛泽东提出编《刘少奇选集》，他就一马当先，表现甚为积极。当看出毛要打倒刘少奇而亟需重要材料时，他又首先提出自己完全知情的“六十一人出狱案”。还可举个小的例子。关于称呼毛泽东的“四个伟大”，本是陈伯达（提了三个）和林彪（补了一个“伟大的统帅”）先后提出。康生不甘落后，一天搬来几部外文辞典到“文革”小组，论证“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必须摆在第一位。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谈“四个伟大”“讨嫌”，以发泄对林彪的不满时，惟独表示“导师”还可接受，因为他当过

小学教员。此事虽小，也可看出康生揣摩领袖心思的功夫之深和用心之苦。

（二）康毛的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

两个人有相同爱好，谈资甚多，在延安时曾同住枣园，经常一起聊天。康生为了逢迎讨好，还不时向毛泽东周围的人打听毛最近读些什么书。自称同康生曾长时朝夕相处并颇有交情的王力也说，“毛主席对康生个人关系很好”，“毛主席说康生历史上有功劳。”两人在诗词、书法等方面有共同爱好和交往，以致毛主席一些“诗词定稿由康生负责。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经过康生。”“他们来往书信都是用毛笔字，写得很漂亮。”还说，毛岸英、毛岸青就是康生布置一个姓张的把他们找回来的。1936年康生又到巴黎把他们接到莫斯科，并一直加以照料。“毛岸英回到延安后，毛主席还叫毛岸英跟康生学点东西。”[dclxxiv]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中也曾提到：“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在跟随康生参加土改时，“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他伯父对人说，“跟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农村的土改工作。”[dclxxv]除毛泽东几次把毛岸英托付康生培养锻炼外，在康毛关系中还有个江青的因素，也许更重要。对江青的历史问题，康生原本就知之甚详，加上从1938年起党内又有不少人揭发检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康生帮了大忙。他把江青的关系放在社会部，算做社会部人员，使江青轻而易举躲过整风抢救这一大关，她的一切丑恶历史也都被包了下来。[dclxxvi]

不仅对毛泽东家庭成员，就是对毛泽东身边的人如田家英，康生也竭力接近和搞好“关系”。解放战争时参加康生土改工作团，以保证其安全。当了解田家英在收藏方面有共同爱好时，他也降尊纡贵，走曲线道路，将一些书画和清人墨迹赠给一个三八式的田。建国后他养病期间，曾对一部《醒世恒言》仿照宋体木刻字补写了七十余处3600余字，割爱送给了田家英。（据王力说，写字是他治脑病的一种方法，单是《西厢记》他就用蝇头小楷抄写了十几本并装订成册。）而田家英对他的印象也一直很好，来往较多，1959年庐山会议前还作诗称康为“东海圣人”。王力也说，田家英只骂江青、陈伯达，从来没骂过康生，对康生始终尊重。但康生之接近田家英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旦发现毛泽东已不再满意田家英，他也就与之疏远，不再给田送书画了，最后送的一副对联“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却具有如此明显的讽刺意味。[dclxxvii]这就是康生的为人。

（三）毛泽东对康生始终信赖

对康毛关系，有许多人（特别是党史界）认为抢救运动后毛泽东不再信任康生，[dclxxviii]因此康生装了六年病。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毛对康的信任并未因抢救运动而改变。这里只举几个我在别处曾列举过的证明。第一，为康生进行辩解。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致信毛，其中专门提到：“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国民党）奸细助长声势。”[dclxxix]对于季这条真诚尖锐和一针见血的意见，毛泽东1944年1月2日的答复是：“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

人。他的部门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dclxxx]事过多年后再回头看两封信对康生及其工作的说法，谁对谁错、谁真谁假，已经昭然若揭。第二，康生的地位并未下降。在“七大”上他并没有检讨抢救运动的错误，反而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名列17，票数在周恩来、彭真等27位正式委员之前），在一中全会选出的13人政治局委员中又名列第七，位居高岗、彭真之上。可见当时上层领导对康生和抢救运动的看法，并不同于后来一些写书人的观点。第三，离延安后仍委以重任。1947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常委中即有康生，名次排在彭真之前。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还担任主席团常委，不久又被派往山东，指导土改和解决渤海、胶东两个区党委的问题，整掉了黎玉等一批领导同志。第四，比较起来，毛泽东对康生很少批评（对陈伯达则多次狠批），而且有时还公然加以包庇。如康生在晋西北土改试点中搞极左，在干部会上对原有划分阶级标准的文件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作废的意思）”，造成晋绥地区土改混乱了约半年。1948年毛泽东路过兴县时批评晋绥分局，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却只字未提康生。所以时任分局宣传部长的张稼夫1982年还在成都对曾彦修说，“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烧的，批评的是我们，我们没做声。”第五，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47年3月前就把毛岸英托付康生培养锻炼，并配备了几名秀才，去了山西、山东、河北。第六，康生建国后长期没有工作，确因有病。据说是由于在延安时骑马摔了一跤，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单在北京医院就住了五年。1956年他的脑病居然好了，[dclxxxi]在“八大”会上仍当选中央委员。一中全会上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可能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生病没工作，对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谈不上什么贡献。二是七届四中全会上曾提到延安抢救，刘少奇都作了说明和检讨，他却拒不检讨（因病缺席），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当他病好后积极贯彻“左”倾路线时，就又重新红了起来，抓文教、抓理论、组织写国际反“修”文章和参加国际反“修”斗争，经常出席毛泽东召开的小型会议，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还补选成书记处书记。由于在“文革”中担任“顾问”立了“功”、扶保了江青，1973年十届一中全会上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寿终正寝”。

四，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作用和态度

由于抢救运动在党史上仍属禁区，所以康生在抢救中的所作所为，至今也没有档案和文件公布。现在流行的各种说法，大多只有帽子而不提根据。我虽然经历过抢救运动，但因系一般干部，对康生的情况了解很少。现在看到的一些材料，也多是泛指康生到处插手，却无具体事例，或所举不实（如斗争王实味），而且不论官史民史说法基本一致。因此这里对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全面讨论，只能挑出几个问题提点看法。

（一）康生算不得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说康生一次报告掀起抢救运动，既不符合事实，又违背常理。实际情况是，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作于1943年7月15日，但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后，延安一些机关就已开始了肃反斗争的坦白检举运动。彭真一次报告中就说，“关于清算反革命的斗争，中央党校是从1942年10月开始的”。[dclxxxii] 1943年《四三决定》发出后，4月9日和12日即分别召开了两万多人的大会，由任弼时作审干反特斗争的动员报告[dclxxxiii]，还安排了几个人当场“坦白”。从此，延安和边区各地的坦白运动（即抢救运动）就普遍开展起来了。那些坚持康生报告后才开始抢救运动的说法，除了武断和抠字眼外，并没有举出多少事实根据。例如谁能说清，后来提的那个“审干运动”究竟和当年的抢救运动有什么区别？抢救运动搞逼供信，审干运动就不搞？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所说，“过去一年内清出的‘特务’曾高达一万五千多人”；康生报告后，“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主席就指示让它停下来。”[dclxxxiv]那么其余一万三千多人又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清出”来的？这不是太自相矛盾又太不真实了吗？但是由于“舆论一律”，既然权威方面确定“抢救运动是康生搞的”，于是一切党史著作就都得照此写去，顶多在用字上稍有不同而已。[dclxxxv]

说这一提法不合情理，是因为它把康生的地位和作用夸大得过了头，似乎整风和抢救都是他说了算，连中央党校竟也归他领导。例如薄一波说，“在康生等人的领导下，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dclxxxvi]这又把校长毛泽东、特别是常务副校长彭真置于何地？须知，就在康生作那个报告的7月份，彭真已在党校作了四五次谈到肃反抢救的报告，列席中央有关的会也有五六次。[dclxxxvii]党校的抢救运动按理康生是插不上手的，更何谈“领导”。实际上康生并没有一些党史书上说的那么神通广大。在当时的反内奸斗争中他还归刘少奇领导。而且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1940年即被取消，代之以各单位党组织领导的保卫委员会。这就使社会部不能直接插手各单位的肃反，更不用说审干了（要插手就得通过有关单位领导）。整风特别是抢救中，毛泽东又明确规定：“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因此，各单位抢救运动进行的如何，首先取决于本单位领导，这是前面已经举例说明了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事过四十年后，各种党史书又忽然间把康生抬出来，把抢救运动的发明权和领导权让给他，把运动中一切偏差和罪过都往他头上推？这就是因为党史学须遵守“为尊者讳”的原则和上述的箩筐主义。而且，光“讳”不

行，还得增添更多东西。例如一些官方党史书上说，在康生报告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并“试图予以纠正”，[dclxxxviii]就不是事实。否则，为什么不纠正，反而让康生作那样一个报告并由中央批发全党？《彭真年谱》1943年7月有一条说得更具体：彭真和李克农一起“向毛泽东报告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普遍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dclxxxix]这又是以讹传讹。第一，它没有注明具体日期。资料来源可能出自《毛泽东传》，而后者则采用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的回忆录。[dcxc]如无正式档案资料，恐怕不足为凭。第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系10月9日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示，[dcxci]改为七月同彭真等的谈话恐系主观臆测。第三，以实际情况推论，他们三人不可能有这一内容的谈话。如果毛泽东认识到“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那就绝不会有他8月8日在党校二部开学典礼讲话中谈肃反的那些内容，[dcxcii]也不会有我们经历过的延安和边区八九月的抢救高潮（只要翻阅一下那一阵的《解放日报》就会知道）。如果彭真有此认识和听到毛的反“左”谈话，那更不会使中央党校这个“‘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一直保存到1944年。再如《毛泽东年谱》1943年7月（也无具体日期）一条同绥德专员袁任远的谈话，也是反复讲不能搞逼供信，要汲取过去肃反的沉痛教训，又谈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看来这条同样缺乏充分根据。因为如果真有这一内容的谈话，袁任远大概不会回去在八九月大搞抢救，致使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的一大半师生变成“特务”，也不会有上述的材料和“一个不杀”的批示了。由此可见，党史对尊者岂只一个“讳”字。

（二）关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

对于康生的这个报告，了解和研究延安整风抢救的可以说无人不晓，我们上面也多次提到，因此这里不必要多作评论，只是有几个看法还值得加以讨论。

首先，不可把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以下简称康生报告）单纯看成康生的个人行为，也不能像党史学界评介得那么高。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他都是代表中央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对抢救运动统一部署的一部分，只是同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其它成员彭真、高岗等一样，向他分工负责的系统所作的报告。当时中央估计国民党正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于是一方面准备对国民党的斗争，一方面加紧内部肃反。6月24日，中央在《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中即指出，延安一万名干部中已发现国特和日特近千人，华北和华中各根据地估计也一定是很多的。7月9日延安三万多人集会纪念抗战六周年，紧急动员，保卫边区。11日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动员群众保卫边区的同时“继续加紧清除内奸”。[dcxciii] 13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按：实际上，11日蒋介石、胡宗南均已复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边区。12日胡又下令撤走部分部队）的同时，还讨论了利用机会进一步提高上层整风水平和加大抢救运动的力度问题（如毛泽东在讲话中已把王明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并警告说，机会主义者不改正错误就有走向敌

人的危险；康生发言说，肃反工作已摸到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二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六名特务。）[dcxciv] 会后除准备上层整风的第二次“九月会议”外，就是立即发动一轮抢救运动的新高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成员随之向分工负责的系统作动员报告。例如14日，彭真即“根据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精神，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就审查干部问题作动员报告。”[dcxcv] 15日，康生向中直机关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会上除康外，还有别的领导人讲话）。19日，彭真再次向党校全体人员作报告，“进一步谈审干问题。这时正是坦白高潮时期”。23日和31日两次作报告，其中提到：“抢救运动高潮是在军事紧急时期进行的。”[dcxcvi] 8月8日，毛泽东在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作了上面引过的，谈到行政学院教职员除两个人外都是“特务”等内容的讲话。9月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锄奸动员大会，高岗作反特动员讲话，接着就有23人上台坦白。9月21和22日，《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和“绥德失足青年纷纷悔过”的报道。10月8日，康生签发推广绥德经验的材料。9日，毛泽东在批转这一材料上作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dcxcvii]这都说明康生的报告是在他分工主管系统（中直）执行统一部署，决非个人的发明创造，更不是胆敢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擅自发动一场“抢救运动”。

其次，康生的报告，不仅是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且报告文本必然经过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和书记处成员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审阅批准，否则绝不可能由解放社大量印成小册子，按组织系统发给全党（延安和各根据地）。这是起码的党史常识，任何人也不可能提出反证。无论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还是事后从党规党法观点看，康生的报告都是代表中央的，其地位同任弼时四月的动员报告大体一样，印发下来都是被当作中央文件看待，指定大家学习讨论的。只是康生的报告，无论印发的数量和范围，都要大大超过任弼时的。但这是形势使然，绝无重要性的差别。

第三，康生报告的内容，除强调坦白的紧迫性（即彭真所说“抢救运动高潮是在军事紧急时期进行的”）外，基本精神和三个月前任弼时的报告完全一致。任在4月9日的报告“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15日书记处决定铅印一千册印发各机关学习讨论），主要是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严重性，号召“误入歧途”者只要向党忠诚坦白，党会原谅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康生的报告也是两面都讲，只是强调战争危险（开场白就是：“今天的会议，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和更多地批判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两次动员的衔接，他在报告中也提到：“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中央大礼堂）曾告诉过大家（按，那次康生也讲了话）……从四月十日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dcxcviii]根据我们学校和军直一些单位的情况，实际上抢救运动在《四三决定》和第一次动员会后就已全面铺开了，康生报告只是火上浇油罢了。但由于党史学上的“为尊者讳”和箩筐主义等原则，全延安四月那次大动员和任弼时等人的报告，大多不被提起，惟独突出康生在中直机关的这次报告，以便把发动抢救运动的责任完全推给康生。

第四，康生的报告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起了很坏的作用。它利用形势的紧张（现在看来，当时估计国民党必然进犯边区也有点过分，证明对内的“左”和对外的“左”历来是密切相连和互相促进的）掀起了抢救运动的一次

高潮，加深了极左错误。特别是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转各地，更使其流毒全党和所有根据地（山东、苏北等地虽然抵制了，但也不得不进行试点和应付[dcxcix]）。再加上8月15日中央审干决定[dcc]的发布（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介绍延安经验），抢救运动就在延安和各地更加猛烈地展开了。而且康生在报告中随意点名，说："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经甄别，上述四人都是好同志）[dcci]。当然，在此前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也轻率地点了老革命吴奚如和成纲等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名，但那还是内部的口头传达，而康生的点名却上了书并广肆印发。这就使一些机关和领导人随便点名、诬陷好人以至挟嫌报复的恶劣作风更加盛行起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康生的报告固然起了极坏的作用，但在党史教科书和领导人传记、回忆录中，把它作为个人行为，却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三）康生为什么不作检讨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作为，当时就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满。例如张闻天从外地搞农村调查后回到延安，对康生送阅的捕风捉影和靠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就不信，而且当面指出。但康生根本置诸不理。张闻天除向任弼时私下反映外，也只能采取超脱态度去工厂搞调查。[dccii]其它不少领导干部也对康生的作为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康生得到毛泽东的信赖和重用，大家都不愿多讲。当然也还是有些人提过意见并向中央作了反映，如前面提到的蒋南翔就先找刘少奇面谈，后来又写了书面意见；[dcciii]老干部王世英也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dcciv]至于被抢救的干部，即使不大了解康生的具体活动，但对他的报告自然会感到愤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都说明，对康生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不但当时人们多已了解，而且事后也一直有所议论，并不是康生被开除党籍后才突然发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延安整风期间，却没有上层领导对康生的批评，更没有他的检讨？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1，整风总的精神及其对处理党史问题的态度

上层整风以毛泽东称之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为主要学习材料，因此对党史问题的处理自然也以它为榜样，即贯穿个人崇拜（即个人迷信）精神和神秘色彩。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点上。第一，上层整风完全是暗箱作业（不是列宁说的民主只能建立在公开性的基础上），而且规定严格保密。第二，对党史要设禁区、作修改，既不解密档案资料，也不准异说争鸣。那么，对于在大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延安整风中，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主观主义（还夹杂一定宗派情绪）和残酷斗争的抢救运动（整风三年中两年为抢救），怎么向历史作交代，又如何维护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巩固它的成果？可见作不作检讨不完全是康生个人的问题。因为在抢救运动中他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统一部署，因此，这是个涉及全局的大问题。对此，毛泽东和书记处不能不作通盘考虑。

何况康生每次大报告，并不是由他自己随便乱讲，而是要事先经过书记处和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审批。无论是他自己的表白还是人们的理解，他的报告都是代表党中央和总学委的。对于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抢救运动，既要贯彻到底，又要对缺点错误稍作交代，于是就决定康生1944年3月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作一《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肯定成绩后也讲些缺点和不足。但这个报告不但没解决问题，还进一步引起大家的不满和义愤。例如蒋南翔的《意见书》中，批评的就是这个报告。正是由于很多人有意见，对抢救运动是否要作正式和完整的检讨与说明，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进行了三四年、一直被中央和全党当作主要任务抓的整风运动，总得有个总结。所以毛泽东和书记处先是决定要向即将召开的七大作一专门报告，于是就责成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和社会部长的康生准备。康生于三月底写出初稿，名为《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这一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dccv]道理很简单，那么一场在党史上起转折作用并有长期影响的延安整风，理应有一个报告，但要报告又势必要谈缺点错误，那抢救运动这一被薄一波说成“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dccvi]怎么讲才能服人？看来只能以取消整个报告为好。

2，直接得到毛泽东的保护

根据前面的一再说明，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康生只不过是看着他的眼色行事和做他的得力助手。他如果不保护康生过关，那无异于引火烧身，因为那时的形势还不像“高饶事件”时的高岗那样，抢救运动的内情领导层完全清楚，大家之所以不出面批康，也只是由于投鼠忌器。因此，毛泽东不仅向季米特洛夫表明康生与抢救运动无关，而且在内部也采取了自己承担责任的办法，以其最高权力和崇高的威信来缓和大家的不满。所以他先后讲了四五次意思相同的话，都未涉及康生和社会部。如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那些至今坚持抢救运动只搞了十多天毛泽东就让它停下来的党史专家，请注意，毛自己说的可是两年。）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dccvii]就这样，用一种虽非真正的自我批评却又大包大揽的办法把历时两年左右、伤害上万（算上各根据地恐有数十万之众）干部的一场抢救运动算是含混过去了，以后也不许再提起，于是康生就自然被包庇和保护下来了。

3，康生本人的政治品质

他不是以是非为准，而是看形势说话，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如果毛泽东、刘少奇接受蒋南翔等人的意见，同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否定抢救运动，那康生也许会争先检讨，以表明他的认识快、跟得紧。例如1941年“九月会议”上，他一看刘少奇成了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于是就在10月29日的会上发言，检讨他当年批评少奇为“右机”不对，并挖出三条犯错误的根源，如自己主观、听信共产国际等。[dccviii]这次对待抢救运动却完全不同，上面不仅

没有算账的意思，而且连“左”的错误都不提，毛泽东又包揽到自己身上，还为他作了开脱。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主动出来检讨，既不是毛泽东的意思，还会在客观上起带头作用，使其它如刘少奇、彭真、高岗以及林枫、习仲勋等“负责”抢救的“首长”也得作检讨，这不就把整个部署给打乱了？聪明狡猾的康生当然不会做出这种对己不利又碍大局的事来。何况他认为他在抢救运动中的一切活动都是遵命和看颜色行事的。所以在七大会上对代表的质询，他的回答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dccix]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如果说在七大前没有当众作检讨可能出于某种客观原因，但恶劣的是此公始终以一贯正确自居，后来也从未听说他就抢救运动作过什么自我批评和检讨。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上，连刘少奇都对“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dccx]但康生却滑了过去。若果说他因病请假，那为什么能写字画画刻印章，就不能作一个书面检讨呢？加之后来在“文革”中又翻出他抢救时制造的冤假错案、更厉害地整许多被他抢救过的干部，他这个恶棍的面目至此也就暴露无遗了。

五，康生和审干九条

（一）审干九条的形成过程

这里须先作点说明，即原打算对所谓审干九条方针单独写一篇笔记，进行专门讨论，可是现在看来，觉得还是和康生联在一起谈可能更容易说明问题些。因为现在无论是党史教科书还是给领导人写的传记或回忆录，都把康生同审干九条对立起来，大意都是说，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而审干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就“解放了被审查者”，停止了抢救运动（更多的说法是，毛泽东在康生报告后半个月的七月底就让它停了下来）。[dccxi]其次，从康生被开除出事后，就上下一律认定他的《抢救失足者》报告是完全错误的，是导致审干（又是完全必要的）中出偏差或逆流的祸根。与之相反，毛泽东的九条方针则是完全正确的。这后一结论，从1955年8月中央正式肯定[dccxii]后，不但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肃反中被一直当做指针，而且在“文革”后的党史研究中也仍然被奉为圭臬，不得有所怀疑。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被实践了多年的实际问题，很值得在谈康生问题时提出来作点回顾和讨论，把康生的报告和最终确定九条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作一对比研究。而且既然已肯定前者完全错误后者完全正确，我们也就着重讨论后者。

其实，所谓九条方针，并不是像一些整风中的积极分子和某些党史专家描述得那样神秘：正在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关系很紧张、处于僵持状态时，突然中央下达了九条方针，于是双方随之立即得到“解放”和“唤醒”。[dccxiii]其实，九条方针单是提出也是经过一个并不太短的过程，更不用说落实和实施了。从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以反特为重点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9日和12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向两万多干部作《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动员报告（也称宽大政策报告）、延安全面展开“坦白与检举内奸运动”（实即抢救运动）以后，中央即密切注视和具体领导这一工作。单是4月份，书记处和政治局就接连开了五六次会研究反特问题，并不断充实工作方针的内容。例如4月28日书记处会议在决定设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时，就提出“审讯不动刑，重证据不重口供”等要求。随后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报告并通过书记处决定。其中“关于反特斗争，决定继续进行坦白与检举内奸运动”，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达到肃清内奸、培养干部两大目的”。[dccxiv] 5月6日，书记处会议又提出反对反特斗争中的官僚主义和粗暴工作方式。5月21日政治局会议还对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方针做出决定：（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调查研究；（四）分清是非轻重；（五）争取失足者；（六）教育干部。[dccxv] 7月1日，毛泽东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刊登毛有关防奸工作两条路线的一段话。正确路线，除上述六条外，增加了“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两条；另将（六）分解为“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两条。“错误路线”是‘逼，供，信’。”[dccxvi]此后即利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加紧进行反特斗争，并分别由康生等人向各系统作动员报告。直到8月15日，中央发出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下简称《审干决定》），才正式定为审干的九条方针。但由于此前半月已以毛的名义在《防奸经验》上公布，所以从当时起直到现在，人们多称之为“毛主席的九条方针”。而《审干决定》无论是什么人起草（当时有阵传说为毛泽东亲自起草），根据毛的指示精神，经过毛的审阅修改则是无疑的，因此人们那样称呼也并无不妥。

（二）康生报告和《审干决定》并不矛盾

党史学界把康生报告和九条方针（即《审干决定》）完全对立起来，无论从两者内容还是当年实际看，都是没有根据的。说康生报告完全错误和《审干决定》完全正确；说前者在审干中掀起了一场犯“左”倾路线错误的抢救运动，后者则及时予以纠正，其实这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党史著作对两者的根本对立和原则区别作出条分缕析的比较，都只是照抄几句空洞结论。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难找出有什么矛盾。因此一些党史研究者以为是在批康生报告，结果却批到了《审干决定》的头上。例如《延安整风实录》批康生报告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康生炮制的特务的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表现。”[dccxvii]这就可真敲错了门。事实上，康生报告中除强调“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和“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dccxviii]略带有这方面的含义外，并未炮制出“特务的世界性、群众性论点”，倒是《审干决定》贯穿着这一论点的精神。对此，当时蒋南翔就指出并批评过，[dccxix]因而落得了一个反对中央九条的罪名。《决定》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下面还说，这次审干“不称为肃反”，而采取九条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dccxx]这一论点确属错误，应当批判，但它不是康生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炮制的，而是出自一直被认为“完全正确的”中央关于审干九条的《决定》。

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康生的地位，九条方针的形成（变成《审干决定》）必定有康生的不少“贡献”。而且从一些条文的阐释中，就可感到康生意见的存在。例如在“首长负责”条中，提到对“有问题的人”的三种处理方式（各单位自行处理，送西北公学、行政学院等反省机关，送社会部、保安处等保卫机关），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的阴森规定。[dccxxi]又如规定对“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dccxxii]还提到延安已审查出特务、叛徒等二千多人等。[dccxxiii]这些例子可从侧面证明，九条的制订，康生是参与其事的。因此，康生决不会反对审干九条，而是它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执行者。

但是审干九条规定反对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康生却搞逼供信，这岂非阳奉阴违？也可以这样说，只是不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事情常常是矛盾的。在大喊反对逼供信的口号下大搞逼供信，可能是我们党从苏维埃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在肃反问题上一直没能解决的“左”倾路线问题。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反对逼供信，康生又何尝不是。例如他1944年3月29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对抢救运动的估计就两面都说到了。他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

争……我们获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有的地方因经验不足，对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及时注意；有的地方对九条方针宣传不够，对宽大政策与争取方针没有贯彻到底；有的地方不注意调查研究，轻视证据，重口供；有的地方忽视分清是非轻重，对清查特务与保护好人没有完全统一……"。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dccxxiv]康生到底是搞逼供信还是反对逼供信，这不能从片面的讲话来判断，而必须看他不同场合的不同讲话，特别是要看实际行动。过去一些党的领导人讲话，多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既讲到正面，又讲到负面，或者不同时间讲不同的话。例如一时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时又讲就是要"钓鱼"、"引蛇出洞"；一时讲"对事不对人"，一时又讲"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而我们从联共（布）学来的党史编纂学，采取的作法却是：对要保护的人只讲其正面的言行，负面的尽量隐去，对不予保护的人则正好相反，因而研究和编写党史很难做到求真和避免片面性。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党史书和领导人的文集、传记和年谱，都在说从审干（抢救）一开始就反对逼供信，而逼供信却贯彻着运动始终的原因。例如被称为纠正逼供信、阐释九条方针的《审干决定》，实际上就是在提倡和推广逼供信。下面就对此稍微作点分析。

（三）简评《审干决定》（即"九条方针"）

在党史研究中对抢救运动的评估和叙述，最大的问题（或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体现在《审干决定》中的"九条方针"。中共党史编纂学历来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dccxxv]说它纠正了逼供信的错误，停止了抢救运动，把"审干运动"引上正确轨道，使原来出现的差错得到妥善处理，还为后来的历次肃反提供了指针。一些领导干部和抢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把九条方针说成灵丹妙药，颂扬备至。但是，如果真的坚持实事求是，以求真精神对待党史，重新研究《审干决定》，人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九条方针基本上不正确，无论对当时的运动还是以后多次肃反都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应当对其进行认真批判和扬弃，而不是全盘继承和推崇。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打算对文件详细分析和列举大量例证，只是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几点加以讨论。

1，关于特务的群众性、世界性的估计，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完全错误的，而这却正是发动抢救运动和制定九条方针的基础。也正是根据这一认识和估计，才提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dccxxvi]造成的结果已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并未抓到特务的一场自相残杀的运动。因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一些机关、学校把大多数人打成特务的现象就毫不足怪了，而且离党中央越近的地方还越严重。以致"有的地方和军队将所有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有的学校将整个班的学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都戴上特务帽子……有的农村将大多数居民都坦白成特务"等[dccxxvii]。而且由于此后还一直坚持九条方针正确和特务群众性、世界性的认识，因而在肃反上一贯推行极左路线，每每造成严重扩大化以至无中生有的后果。连许多高级干部，不知是真怀疑还是假怀疑，一旦被整，也都要给戴上"内奸"、"叛徒"、"里通外国"的帽子，如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杨尚

昆、陆定一、谭震林等。

2，用群众运动搞肃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都是完全错误的。正像中共中央在抢救运动后期所承认的那样，“任何地方只要群众反奸运动坦白运动开展起来，逼供信的‘左’的毛病，就会随之而来”，何况“坦白运动中的群众压力，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的。在群众威力下，即使不打不骂不逼不斗，都可能使青年人在沉重的神经刺激下，自己戴上帽子。”[dccxxviii]新出版的正式党史也认为，抢救运动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审干肃反工作……绝不能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dccxxix]但由于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所以此后的肃反还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直闹到“文化大革命”。

3，《审干决定》肯定和推广延安经验，使抢救运动的灾难殃及华北和华中许多根据地。《决定》最后说，“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这“经验”指明就是延安经验，包括：对“有问题的人”“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和根本不讲法制、任意“实行戒严”，剥夺广大党与非党干部的人身自由，实行类似“文革”期间的“群众专政”；（中央书记处直到《审干决定》发布三个月后，还指示华中局，要他们在抢救运动期间，各机关学校“必须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dccxxx]）规定各地和机关最高首长“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等。另一方面也还介绍了争取失足者，对特务采取宽大政策，“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等经验。此外又具体提到延安头一期四个月参加审查工作和被审查的人数，等于暗示特务大体应占比例。从这些内容特别是从运动在各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推广延安经验就是推广抢救运动。所以《决定》颁布后，抢救运动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在更多的地区开展得更猛烈了。

4，《决定》虽然指明逼供信是错误方针，九条才是正确方针，但实际上正是在九条中隐含着逼供信，《决定》的颁布起了推广逼供信的作用。首先，正如中央事后所承认的，群众性的反奸运动一开展，逼供信就会随之而来，[dccxxxi]而九条又是提倡和依靠群众运动的。其次，《决定》肯定和介绍的延安经验实际上主要就是逼供信的经验，如文内所提首长参加“大会、小会、劝说、询问”，“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等，加上特务群众性的观点和延安的数字，使各地领导为完成任务（一般的都是愿意越多越好），不能不搞逼供信。再次，所谓“培养干部”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保护积极分子政策。积极分子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搞逼供信可以不负责任，不予追究，还会得到赏识和重用，运动中的骨干事实上也多成为提拔对象。这就鼓励一些人有意行“左”。

5，最后必须指出，《决定》上虽然提到反对逼供信，但既未明确逼供信的界限，更未提对犯逼供信错误作何处置，而有意无意地给留下一大漏洞。假如规定在抢救运动中打人骂人、使用刑讯逼供等，要给予处分，逼供信肯定就不会那么普遍和严重了。

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审干决定》阐述的九条的发布，不但使抢救运动搞得更加猛烈（其实，除延安及其附近少数地方外，陕甘宁和晋绥一些地区以及许多敌后根据地，还都是在这个《决定》发布后才开展抢救运动的。《决定》也明确要求：“各地整风须延长至1944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

掺杂着进行”。中央书记处也是在1943年11月15日才给华东局发出《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的），而且逼供信也搞得更厉害了。除我们上面举过的中央党校、抗大、绥德等地区和北方局党校的例证外，还可从中央1944年5月13日《指示》批评的许多过左现象中看出个大概。它说，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都犯有严重的逼供信错误（还说明这是三月间，即《决定》发布半年多以后，西北局高干会检讨结果），“最主要的是捉多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损伤了人，”并举例说，“有的在一个整风班内使用24种肉刑及变相肉刑”。实际上《指示》着重讲的还是华北，说：“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一个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冀南‘左’的毛病更加厉害。冀察晋平山县……在坦白大会上使用斗争镇压方法”。“所有这些现象，证明逼供信‘左’的错误，在各地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特别是太行军区，存在着严重的逼供信错误。”[dccxxxii]这是党中央的正式文件所讲，它的权威性是不应当被党史研究机关和专家忽视的。

当然，也不能说《审干决定》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事实上它确曾使延安一些机关学校的抢救运动缓和了下来。那种大轰大嗡的坦白大会、设“光荣席”之类纯粹形式主义的做法不大搞了（地方上如绥德、陇东、延属专区还在搞），逼供信也稍为收敛。同时，领导和积极分子可松口气，考虑点问题。这就促成了延安的抢救于1943年底进入甄别阶段。但整个运动并未结束，华北和华中有些地方还正在按延安的经验开始发动。所以总的说来，《决定》实际上起了推广抢救运动和以逼供信为主的延安经验的作用。这点，当年蒋南翔的《意见书》中就已指出来了。山东等地也曾明确表示（特别是1944年后）抵制延安抢救运动的作法。

以上情况尤其所引中央指示，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抢救运动决非由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所发起，更没有因九条方针的发布而结束。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即使不重视“求真”的史学原则，但也应当相信中央当时发的指示吧，总不能说中央指示列举的不是真实情况。第二，说各地抢救运动中搞逼供信都是康生叫干的，是康生到处插手的结果，显然属于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是党史编纂学遵循“箩筐主义”的表现。若果真是康生有此本领，那只要责令他限期改正就是，何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指示。其实，这正是延安整风为日后一切政治运动创立的规律：开始提倡放手大干，有意不及时纠“左”（“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dccxxxiii]），随之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在大伤元气后再进行甄别纠偏，而且最后大多是草率收场，不了了之。

（2003年6月完稿）

第十三篇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之四

——发起抢救运动的前因后果

一，主流党史学论抢救运动的因果

这一问题前面已多次谈到，但有的提法还须再作些辨析。

“文革”后党史界对抢救运动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说法，大意为：在普遍整风期间，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干工作；在党员迅速增加和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只是当时对敌情估计过高，不少单位还采用了逼供信，特别是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把审干运动弄成了抢救运动，造成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直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发现后提出“九条”，才及时作了纠正。[dccxxxiv]这个公式看似照顾周到，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单是头一个小分句就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把抢救运动和一般审干混为一谈；[dccxxxv]第二，含糊地把这次运动说成似乎是各机关学校自发地开展起来的；第三，把涉及全党和各根据地千百万人并错斗了成十万干部的大规模运动，说成好像只限于延安的机关学校，不仅不提边区和各根据地，还回避了不少地方曾对工农兵的抢救；再加上把两三年缩短成十多天，就使这次自上而下制造的一场严重灾难，变成了小事一桩。

虽然历史已经证明，这场运动不但不是必要的，而且是灾难性的，但是各种党史书上却坚持说成必要，又都按公式提两点理由：“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这两条理由，逻辑上讲不通，事实上也站不住。因为不能说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就意味着特务大量增加。说国民党加紧了特务活动也无根据，实际上，国民党此时正哀叹在延安无内线。[dccxxxvi]戴笠确曾在陕西汉中办过特务训练班，并分批向陕甘宁边区派去四十多人，但在1942年即被全部破获。[dccxxxvii]有的史书为了证明特务活动猖獗，还编了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如说抢救运动前曾发生过一件中央大礼堂演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刚进场，就从外边小山坡向后门投了几个手榴弹，投弹者当场被抓的重大案件。[dccxxxviii]对此，不但我在以前从未听说过，最近问到许多老延安，包括抢救前就住在杨家岭的老同志，也都说不知道，并且认为不可能，肯定为有意编造或以讹传讹。[dccxxxix]

为了显得真实，新出的党史书也还讲点主观方面的原因，如：说“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做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视为锄奸、反特斗争”。[dccxl]这已不像十多年前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那样，把抢救运动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康生了事。[dccxli]但由于仍须严格遵守上述编纂学原则和表述公式，所以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例如这部新编党史教科书，既没有指出是谁对敌情估计过分和把审干视为反特，更不敢透露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和行政学院特务数目的估计和国民党特务有“十万大兵”的说法。而且，由于要掩盖真相，还引出更多矛盾。如：“在这（指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前，中共中央曾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试图予以纠正。”[dccxlii]这就产生了个问题，即为什么不进行纠正，反而让康生、彭真、高岗等在各自系统一再作进一步的动员报告？而毛泽东本人还能在康生报告二十多天后向党校二部做出那种特务如麻的讲话，特别是到10月竟说出国民党特务有十万大兵这些话来？[dccxliii]这哪儿能看出半点“试图纠正”的意思？该书还轻易断言，说在中央发布《审干决定》和毛泽东10月9日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之后，“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只要看了上面笔记中提到的一些过来人如薄一波、曾志、任仲夷等的回忆，翻一下《审干决定》发出后延安、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的报纸和内部通讯刊物，查阅一下这个时期特别是中央和各中央局有关抢救运动的来往文电和各种决定，就会发现这些关于抢救运动的论述，与当时实际情况有多么大的差距。而1944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恰恰证明，“审干中的错误”并没有在1943年10月前后“得到制止”。何况《审干决定》也明确要求整风和审干“延长至1944年”，所以华北和华中正是在党史书上说的“得到制止”后才猛烈展开抢救运动的。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看来今天仍然适用。

研究和学习党史，应当和主要是为了鉴古知今、接受经验教训，而不是要继续制造迷信和蒙昧群众，因此必须本着“求真”的史学原则，来探讨抢救运动的前因后果。

二，造成抢救运动的原因

（一）肃反上一贯的极左路线

造成抢救运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党在肃反问题上历来执行的就是一条极左的肃反路线，只要是肃反或其它政治运动（实际上许多政治运动也与肃反无二，如1957年的“右派”就和反革命并列为地富反坏右，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就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没有一次不是敌情估计过高和斗争处理过头的。这从党有政权起，在肃反和整人上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中就可得到充分证明。只是为了维护党的一贯正确和个人崇拜，才讳疾忌医、不作自我批评、不吸取经验教训，使这条极左路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由于有关档案的严格保密，加之许多事本来就无档案，所以人们也无法确切知道历次肃反和其它政治运动究竟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特别是错杀了多少人。但是从以下登过报和上了书的数字，已可看出这条“左”的肃反路线前后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有人估算，我们党从建立根据地政权起，主要是1930年到1935年，一、四方面军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地，在反“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名义下（全系无中生有，根本不是党史教科书上说的“肃反扩大化”），被自己人杀掉的干部、党员、红军官兵，总数近十万人。[dccxliv]（其中许多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军将领军官）。李锐在列席十五大的书面发言中也说，根据他接触的材料，在这一时期，“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dccxlv]经过这些自相残杀，延安抢救运动总算占了点便宜，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就使被认定为“特务”的人，除极少数被杀、自杀、致残和很多人留有“尾巴”外，基本上都保住了性命和获得甄别平反。这也算得上是进步，可惜建国后的肃反又有些不适用了。抢救运动不但制造了以十万计的冤假错案，[dccxlvi]还留下诸多后遗症，特别是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建了整人的范式，如胡风案，经过和作法都很相似。[dccxlvii]其实，建国后已有点随心所欲地不断发动政治运动，肃反和整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动辄都是千百万人参加，因而冤假错案的比重就更大了。初期的肃反运动，肃错的当以百万计，还大部被镇压。另据统计，1955年的肃反中，肃对的8万1千多人，肃错的竟达130多万人。[dccxlviii]反右派，全国单是戴帽的就有55万余。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全国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受重点批判的共计365万人。[dccxlix]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是大抓阶级斗争，挨整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就越来越多，直闹到十年浩劫。单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运动——抓“五一六反革命”，全国就抓了两三千万人。

从以上的很不完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半个世纪中，我们党在肃反以至一切对待人的问题上，始终执行的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当然同在总路线以及其它方面一直犯“左”的错误有关。邓小平临终前也承认，中国“主要是防‘左’”，因为“左”的影响“根深蒂固”。[dccl]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也就容易理解了，它只是“左”倾肃反路线链条中承上启下、更具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一环。造成肃反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原因，这

里只着重讲以下两点。

1，全盘接受苏联的建党理论和肃反经验

正如刘少奇所说，“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学说，基本上是列宁创立的”。[dccli]因此，中国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后来更是斯大林主义。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有很大差别，所以列宁虽然忠实笃信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中已作了重大修正（或曰发展）。即以对人的态度而言，两者就有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是多数对少数而且是民主的专政），但更重视以人为本，主张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把个人的解放定为全人类解放的标尺，把奋斗目标定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在建党学说上也更强调民主。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时就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dcclii]列宁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却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是经济相对落后，政治绝对专制，因而只能从事秘密活动的俄国。所以列宁主义就特别强调暴力和专政，主张实行恐怖与镇压，不讲民主与法治，轻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列宁就说过，“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dccliii]在建党学说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重点也是集中和纪律。列宁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的也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dccliv]有趣的是开始时连斯大林也有过异议。例如，1917年11月28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关于逮捕人民之敌的政党（指立宪民主党）内一些最著名的中央委员并将他们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法令草案”，斯大林就是唯一的反对者。[dcclv]但当斯大林完全掌权后，就加紧实行个人独裁，消灭异己、滥杀无辜，形成一套完整的个人独裁理论和高度集中的专制模式。中国党接受的就是这种被称作马列主义的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延安整风以后，在全面学苏联和照搬斯大林模式中，苏联肃反的一套也就自然搬来了。中国人学苏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领导和指挥。在肃反上的“左”，有些就是直接受国际（实为苏共）的影响和支持。如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就提出，“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dcclvi]而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还对这种杀戮叫好。布哈林在联共十五大上即曾宣布，中国苏维埃“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从肉体上消灭”。[dcclvii]

2，继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

造成中国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执行极左路线的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受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近现代，中国也没有经过成功的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或改良），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中，人民群众从来不被当作人看待，既不讲人身自由与个人尊严，更谈不上人权、人道、人格、人性等观念。当被统治者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会揭竿而起，爆发农民起义。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起义者，都视百姓如草芥牛羊，可以任意践踏杀戮。而刑讯逼供和屈打成招，更是自古以来的

常事。在统治较稳定时，朝廷还会讲点封建法制，“杀人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判处死刑也要经过一套审批手续。而新起义者就不管这一套了，反而更加无法无天，杀人如麻，大肆破坏。长期以来，民间传说中就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等。其实，中国劳动农民并非野蛮成性，相反，他们大都老实巴交，胆小怕事，只是在无法生活下去时才会跟着带头人（多为游民中的活动分子，即我们在土改中所谓的勇敢分子）走险。而中国社会又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可称之为游民的阶层，在农民起义和各种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如刘邦、朱元璋等，也包括洪秀全和那些充当军师、智囊之类的游民知识分子）。生长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专制主义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自觉接受历史上农民运动的传统。因为在它看来，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称得上革命和起到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只有历次农民起义，因此继承它们的传统是理所应当的。又照毛泽东所说，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dcclviii]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dcclix]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因此，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就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相似之处极多。党的领导也以他们的继承者为荣，还借鉴他们一些具体做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他们合共占贫农中的百分之二十。农运起来，农村政权就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老实农民不但怕出头，也不会当差，所以“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痞子’之类”。[dcclx]直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还从历史中的农民运动中寻找启发。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特意批印《张鲁传》发给大家，并提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dcclxi]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dcclxii]看法相反，毛泽东把贫农也许看作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所以要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哪怕是工人出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封建专制主义特别是农民运动的传统影响就是很自然的。表现在肃反以及其它整人的运动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是继承了“无法无天”的传统。以党代政，可以随时宣布戒严与镇压，对人任意实行拘押、审讯、逼供以至处决。延安抢救运动虽规定不乱杀了，但仍实行有罪推定，说抓就抓，说押就押，既有群众抢救，也有严刑逼供，谈不上任何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建国后制造了更多的冤案，错杀了上百万人，既谈不上法治，也不讲法制，党章和宪法实为具文。第二是继承了发现与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我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也和农民起义一样，注意发现那些积极响应号召、敢于冲锋陷阵、紧跟领导的分子，并加以培养和重用。历次肃反运动中，甚至一些假坦白、会听话、跟得紧、诬陷好人多又不随便翻案的，也可变成积极分子，最后得到甄别平反，既不受批判，更不受处分。而那些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假坦白和不说假话的人，不但当不了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被咬的定会大吃苦头，事后还落个态度不好之名，更没听说有因不说假话受到表扬的。这样，每次运动都是违法乱纪的受到庇护，坚持实事求是的反而倒霉，说假话的

奖，说真话的罚。一茬一茬下来，积极分子自然越来越多，运动也一次比一次红火。试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运动前和运动中不光提禁止逼供信，还对违反政策的及时处理（直至撤职查办）；特别是总结时批判和处分那些违法乱纪搞逼供信的，表扬和重用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决不随风摆的。这样一来，情况就会大不一样，靠整人和弄虚作假起家的积极分子会大为减少，正派人自然会更多地得到重用，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变得好一些。可见，执行保护积极分子和使用顺着来的干部政策，不但是历次运动制造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助长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强调国际影响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决不是要忽视人的作用。而且作为领袖和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意志和性格，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决定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就说过，领袖"个人由其性格带来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不过"个人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毛泽东的肃反情结能够长盛不衰，正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社会条件，包括国际影响和中国传统。这就使毛泽东对肃反的极左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使极左路线得到长期执行。设若他生长在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不论他有什么性格和情结，恐怕要搞抢救、反右之类整人的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甚至根本搞不起来。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像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他虽然也认识到这点，但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等原因，还是导致了"文革"十年浩劫。[dcclxiii]如果这些社会条件不改变，缺少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即使没有毛泽东，而是别人当领袖，也许程度不同，但肃反上的"左"仍然难免。例如刘少奇，他在历次运动如解放战争时的土改、建国后的肃反、反右、"四清"中，特别是在土改和"四清"中就比毛还要"左"。因为不这样，就在信奉皇权主义的农民中压不住台，就降不住起重要作用的游民阶层，就拿不到专制独裁的权力，就当不成中国党的终身领袖。毛泽东不但适逢其时，而且本身也具有压倒群雄的高超能力和手段，其中就包括对待人的问题上能够成功地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而没人敢于反对或反对不了。这里说的"情结"，也包括一切不顾惜人命的思想和态度，而不完全限于"肃反"。

造成毛泽东肃反情结的因素很多，这里只根据个人的看法列举几项。

1，斗争哲学

毛泽东从小就好斗成性，青年时期即提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斗争就好的口号。总观他的一生，也确实是斗争不息。只是除个人的经风雨之类以外，大规模的与天与地的斗争没斗出什么名堂（与天地斗争的"大跃进"是遗患无穷地彻底失败了），后来也有点知难而退，不再敢与天地斗了。但与人的斗争，无论是党内、国内还是对外，都是接连不断、其乐无穷。直到晚年，还提出被他的秘书胡乔木批评的毫无逻辑、纯属武断的"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么一个口号"。[dcclxiv]党内、国内的斗争太多，人皆尽知，无须列

举。这里只谈点国际斗争的例子。如支持金日成南下（斯大林要金听取毛的意见[dcclxv]）和决定抗美援朝（重要原因之一是为证明他并非铁托）以及丧失有利条件下的停战议和；解决朝越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批评没有立即突出台湾，放松了反帝斗争（后发展到为支援阿拉伯国家而炮击金门）；此后“斗志”更强，要带头反帝搞世界革命，大力支持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武装斗争，一般不再提“和平”与“和平共处”，对外开展了全方位的斗争。[dcclxvi]

2，不顾惜人命

毛泽东对肃反中的冤假错案从来都不大在乎，对屈死的干群以至某些领导人和著名英才也少有怜惜之意。例如一方面军在他主持下打“AB团”，错杀了九分之一的人，他却轻松地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dcclxvii]对于他派亲信李韶九、古柏等去红二十军大搞逼供信，酿成政变，最后还将副排以上干部全部屠杀、一个军被处理这样的大冤案，直到1965年9月23日同彭德怀谈话时还称之为“反革命的富田事变”。[dcclxviii]对于延安抢救运动中逼死的许多人如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以及柯庆施、凯丰等人的妻子，毛泽东自然知道，但并未听说过他有任何哀怜之意。至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功臣战友和大批民族精华，多是出自他的安排，至少也是置若罔闻。这就不免令人联想到他为什么会赏识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滥杀功臣而出身于游民或游民知识分子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对不管死多少人都不当一回事，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动辄说无非死多少人，有什么了不起。例如为炮打金门辩解就对赫鲁晓夫说，“为了最后胜利，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灭掉帝国主义，无非是死一堆人。”[dcclxix]最令世界震惊的是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说的不怕帝国主义打核战：“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一半”。“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dcclxx]有些辩护者说，这是毛主席的豪言壮语，显示了他的英雄气概，并非真的对死多少人也不在乎。其实不对，这正是毛泽东的真情表露。如1937年对相当中央红军三倍的西路军的全军覆没，毛不但不在乎，而且在这之前好久就已称之为“国焘路线的破产”。[dcclxxi]建国后在肃反中错杀了百余万人，也从无悔意，还总说肃反不彻底。毛甚至不惜以牺牲大量人命作社会实验。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和后来的反右倾，就是著名例证，结果酿成4040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超过八年抗战中军民伤亡总数2100万人，其中牺牲近千万人。——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73页。或相当于10个挪威、12个新西兰、两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dcclxxii]说是实验，是因为毛泽东自己把大跃进说成“做了个大实验”。还曾表示，如果实验的结果是中国人死十分之一，5000万人，自己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dcclxxiii]结果大概由于没死那么多人，所以职务和头颅都完好无损，而且实验（为世界革命创立新模式）仍继续进行，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件颇能说明问题的事，就是发生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毛泽东称赞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即诞生于该地区遂平县）。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核实死人70多万，认定是领导上“左”倾蛮干的结果。报送中央后，毛泽东批的定性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于是又来了一次大整干部（信阳地区16个县的书记和

县长全部被抓，还准备杀一批）。[dcclxxiv]像这样不顾惜人命、死多少人都不在乎（每次都既不认真检讨、严肃处理，也不引为鉴戒、避免重犯）的事，可说是举不胜举。但史学界为了维护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威信，为了保护这种不顾惜人命的专制体制，不但隐匿真相，还要加以肯定，说成："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dcclxxv]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得更妙，出问题是由于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dcclxxvi]对干部群众的死活，毛泽东既然一辈子都持这种态度，在抢救运动和各次肃反中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3，疑心太重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始终为他信任和能一直合作到底的人似乎没有几个。他也和中国过去的一些皇帝一样，对于开国功臣和对他了解较多的人（也许康生例外）包括曾受重用的秘书，总是不大放心，都要设法弄走甚至除掉，其中许多老战友还被打成内奸、叛徒、里通外国等。他不但性格多疑，而且心胸狭隘。有些已经一再证明的误会，他还是要继续怀疑和肯定。例如他认为在长征路上的会理会议上是张闻天、彭德怀煽动林彪起来反对他，就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且经过一再对证，证明纯属误会。但他仍然揪住不放。他的这种多疑性格，一方面表现在不大信任自己同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对他有过不同意见的人）；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过高估计敌人的坏（如蒋抗战必降）和间谍活动。只要看一下毛泽东在抢救期间有关反特的许多话，就会知道"特务如麻"的估计主要来自他。

4，一定的政治权术

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才智过人、经验丰富的终身领袖，怎么会对革命队伍中的敌情估计总是弄得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动不动说有百分之多少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一再提到党面临分裂的危险，他准备上山打游击等。不能说他的这些估计是故意放空炮，因为实际上几乎每次都是按此布置工作的，如规定挖出百分之几，下面还往往超额完成任务（上述胡风案后的肃反对象就超过了5%的比例[dcclxxvii]）。说他真是那样想的吧，可实在是匪夷所思。例如抢救运动时，毛讲话中说的国民党派到我根据地的特务有"十万大兵"，高干集中的党校竟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特务，还相信延安机关学校有一半人是特务，大后方各省的党几乎全是"红旗党"，等等。要真是这样，那共产党不老早就垮了？建国后几次把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恐怕也不一定是真的这样认为。他虽然多疑，脑筋也不致这么简单。

看来这里面还另有文章在。以延安整风为例，就是采用的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通过学习文件、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和进行原罪感教育。武的一手就是用划成党内还是党外问题和不同方式的抢救相威慑。上层整风，开始主要用文的一手；对下层则多用威慑，也有制造紧张，以影响上层之意。例如1941年九月会议的上层整风，就显得有点和风细雨，下面的抢救运动也没开始，对上面当然不会形成什么压力。1943年上层整风的九月会议，情况就已大变，延安处于全面戒严状态。到处搞逼供信的抢救。这种紧张气氛立即影响到上面。上层对所谓两个宗派的攻击，就有点超出党内斗争的界限。连胡乔木也认为，"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

向。”[dcclxxviii]掀起抢救运动，造成恐怖，就是为既影响上层也威慑中下层而使用的武的一手。显然，为达到从组织到思想都“定于一”的目的，只用文的一手是不够的，因为情况大家都清楚，特别是上层。承认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打仗等问题上高明，大概没有问题。但要说从建党起毛泽东就一贯正确，存在一条与历次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毛泽东路线，特别是还得把许多错误掩盖起来甚至栽给别人（如打“AB团”是“王明路线”搞的，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等），恐怕就很难使人信服。因此还需要威慑，不但要使你自觉“顾全大局”，也要使你只能以人划线，认清反对谁就会倒霉。

在这文武两手之下，大家不但真的都老实了，还逐渐习以为常，以致对一些历史问题已没有人敢于去考虑真假，知情者也跟着说违心话。例如西路军问题的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就对这一重大冤案半个世纪不敢置一词，还得说些违心话。

可以说明抢救运动中复杂政治内容的事实确乎不少，所以才要设为禁区，严加保密。例如，每次肃反都会怀疑到被捕、被俘和坐过牢的人。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态度。在延安和各地抢救中也基本按此照办。但也有奇特的例外，就是华北局属下没有被捕坐牢的柯庆施遭到抢救；而“六十一人案”中却未听说有什么人被抢救，反而多成为抢救别人的积极分子。所以“文革”的“二月逆流”中，陈毅就发牢骚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dcclxxix]当然，这绝不是说对“六十一人”也应该抢救。抢救运动本身就完全错误，何况他们的出狱还是党中央批准营救的。问题只是在于多少有些蹊跷。而且作为“六十一人案”中一员的薄一波在整风后的七大上还以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顺利当选。连对于把薄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人选都提意见反对的陈赓，却只当选为名次靠后的候补中委。而那个营救“六十一人”出狱、在彭真之前任华北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大概根本就没能上候选名单，还遭到抢救。[dcclxxx]另外，1930年前因托派问题受到党内劝告处分的陈伯达，[dcclxxxi]竟以高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还有江青在上海的被捕自首问题，从1938年起就有不断揭发，但她同陈伯达一样，都在抢救运动中得到保护。所以从这些也可看出，抢救运动的操作中还有复杂的政治上的奥妙。确定批斗和抢救对象要看山头，即除本山头外，还要对决定争取和团结的山头加以照顾。至于对决心打掉和削弱的山头及其领导人，则尽量罗致罪名。例如竟会把大后方十多个省的党组织打成“红旗党”，而且真的使许多省的领导人遭到长期迫害或作为当选代表不能参加七大。为此还制造一些“秘密武器”，如胡乔木所说的“九篇文章”，必要时祭起，使被批者丧胆。“文革”中就拿出过三次，最后一次大约是为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

看山头，主要是对中上层领导干部。至于一般知识分子新干部，凡是组织上认为可疑或被“咬”（有人“供”出）的，那就碰到谁是谁了。但也要看具体的对象。某些受到信任和重用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有关系的人，即使明知有历史问题，也不会遭到抢救，大多会设法保护起来，如上述的江青（属自首变节），叶群（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一些活动）等。（在“文革”中也是如此。1973年4月9日，周恩来就对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dcclxxxii]）而且在独断专行和长期威慑的情况下，就是高级干部也是有意见不敢提的。据我所知，像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当时就明白抢救运动是

胡闹，但既不敢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更不敢直接找毛泽东、刘少奇谈，事后一辈子也不敢再揭发和像毛泽东对别人那样算老帐。连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一些老同志，也不信他手下那么多青年是特务，甚至有时还洒点同情之泪，但没听说进行过廷谏和站出来反对。一般干部，真正相信的也许只有一些积极分子，多数是半信半疑或不信而只得应付的。哪儿有多少人敢提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反对运动的了（蒋南翔的《意见书》写于抢救基本结束之后，但确也难得）。总之，通过抢救运动，无论是抢救者还是被抢救者，都不是主动就是被动地变成了“驯服工具”。可见抢救运动威慑作用之大。这也可能正是发动抢救运动的原因之一。

（三）其它因素

造成抢救运动的原因也还有一些，例如前面提到的用群众运动（其实都是上面发动起来的）搞肃反，势必会犯“左”的严重错误。此外，还有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等因素，有些下面还会提到，这里就不加细谈了。

三，抢救运动的后果和影响

大约国内出版的所有党史著作，对延安整风都持肯定和颂扬态度，但大多数不能不承认抢救运动的错误。当然也有例外，前面引证过的刘白羽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这也决非个别人的认识，从运动中和运动后的许多事实可以看出，不少人认为抢救虽有错误，但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从毛泽东到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并没有把抢救运动看成多么大的错误，因此用不着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反而认为可以坏事变好事。[dcclxxxiii]他们还对“九条方针”颂扬备至。这就为后来的肃反不断犯“左”的错误种下了祸根。

确实，如果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考虑，抢救运动的威慑作用确实有助于整风取得完全胜利，实现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目标。首先是在上层摧毁了“两个宗派”，完全降服了被列为“两个宗派”的领导干部，从而使党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其次是使全体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党的纪律进一步加强，[dcclxxxiv]领导更集中，步调更一致。客观地讲，这都有助于在领导与指挥正确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如解放战争）。但如领导错误，却也无法纠正，只有全党跟着犯错误了。

但是整个说来，抢救运动确是抗战期间党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决不是党史书上轻描淡写地说成肃反扩大化（或不通的“审干扩大化”），而是涉及广泛、影响深远的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薄一波就表示了这个意思）。从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来说，不应继续简化和淡化、掩盖和造假，而应重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真正实事求是的叙述和结论。但这只能寄希望于整个党史研究界，像我等进入耄耋之年才开始学习党史的人，大约只能提供点滴素材和某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参考和讨论。下面就抢救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谈几点个人意见。

（一）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抢救运动没有抓到什么特务，而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这是所有党史著作都不能不承认的，所以无须多讲。问题只在于对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一直估计不足，致使冤假错案得到持续、重复和越来越多的制造，给党和人民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毛泽东和一些人总是认为，每次运动出现一些偏差、整错一些人，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没多大关系，甚至本来就是要杀一杀他们的威风，起威慑作用，何况运动后还有个甄别阶段，弄错了的人给他平反不就没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正式的党史著作和许多抢救的积极分子，至今仍对那场灾难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原因。有时还说得很轻巧：在毛主席赔礼道歉后，被抢救者“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dcclxxxv]这样极端的个人崇拜者当然有，但不会很多，也不会是那些受过牢狱之灾和严刑拷打以及长期戴特嫌帽子受控制使用的人，更不用说那些抱恨终身的冤魂了。[dcclxxxvi]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给被整者造成的精神创伤，对许多人都是终身难忘的事，决非一些局外人所能体会到的。直到最近，我同一些老同志谈起抢救事，发现他们仍然很动感情。但是有些积极分子，却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同志属于思想狭隘、斤斤计较。其实，最斤斤计较的倒是毛泽东和某些积极

分子自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虽受打击，却仍然担负全苏主席的工作，既未被隔离审查，更未被逮捕法办，但他还是讲了一辈子（次数之多，恐怕权威机关也很难统计出来），而且不分内外场合到处发牢骚（不厌其烦地向外宾讲，还向斯大林告状）。对所有这些，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和任何党史书上说过不同意的话。可彭德怀、陈毅等对整风抢救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抓住不放了。可见在党史研究上，存在着多重标准，无公平可言，封建皇权主义仍占主要地位。以被大讲特讲的“左”倾中央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罗明路线”和批邓毛谢古为例，如果同延安整风抢救及其后的党内斗争如“高饶事件”（高在囚禁中自杀，饶被非法关押和错误判刑[dcclxxxvii]）、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的批斗和处理相比较，就太轻了。因此建议今后写党史，最好对问题做些具体分析比较，而不要只讲些无法使人分清什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什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空话。

（二）造成同志间的隔阂和结怨

和某些积极分子的说法相反，抢救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增强同志间的团结，而是造成了同志间的严重隔阂和长期结怨。试想，在抢者和被抢者、骂人者和被骂者、严刑逼供者和无辜受难者……之间，怎么可能因为敬了个礼就忘却前嫌，“实现了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毛泽东只因人家讥讽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竟记恨和痛斥了一辈子，批评者几乎先后都被整掉（杨尚昆一次同刘英谈话时说，讲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没挨整是因为死得早），而党史界也还继续宣扬毛泽东对犯错误的人如何宽大。其实，抢救运动对团结的危害，被官方党史界一直视而不见的蒋南翔当时写给中央的《意见书》中就已明确指出，如说：“是不是有隔阂存在于‘抢’与‘被抢’的同志之间呢？有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个别的现象呢？不是。无论机关或学校，这种现象毋宁说是普遍地存在着”。[dcclxxxviii]可惜毛泽东、刘少奇（他是先找刘少奇面谈，然后将意见书交刘转中央的）等人听不进蒋南翔既实事求是又极为温和的意见，反而给他戴上一顶“反对中央九条方针”的政治帽子，装进他的档案袋。当时提意见的不只蒋南翔一个，还有其它领导干部。例如王世英就给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写过《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也曾招来不小麻烦。[dcclxxxix]至于被抢救者，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进行申辩和控诉的，可能不下万件（我自己就写了三次）。有些可能因系关系特殊的人所写，毛泽东事后说他看到了（但也没起什么作用），如曾志；[dccxc]其它绝大部分恐怕都是石沉大海。慢说毛泽东，本单位领导大概都没看过。

因为抢救而产生隔阂和记怨的人和事，实在多不胜举，只是一般都能做到既往不咎、不去算老帐就是了。我就亲自看到在一些抢和被抢救的同学之间长期没什么往来，体现不出一起学习、劳动四五年的情谊。还有些人一辈子也互相不大理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学校有三五十人编队前往东北，行军路过张家口。先到此的校领导[dccxci]已出任晋察冀军区一高职。他很热情地来看望大家，并每人送白糖一斤，然而一些同学竟躲而不见。有的同学后来分配到他领导下工作，也是一直显得冷淡。我同张策（去北满任省委书记）夫妇一路从沈阳到哈尔滨，就曾听到张策夫人哭诉遭抢救的情况。

张策从旁劝解说，“那是夜间战斗，没分清敌我。”夫人反驳道，“什么夜间战斗！对敌人还优待俘虏呢，对自己同志就那么狠。”又如我校俄文教员李洁民，因是东北人，抢救中被定为日特，关进保安处备受折磨，后来查不出什么问题，就于抗战胜利后带着留有尾巴的结论被派回东北工作。到北满分局分配工作时，谈话的是陈云的政治秘书，姓刘，又提起结论上并未取消的特嫌问题，两人因而吵了起来。李洁民坚决提出退党，说要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经分局书记陈云劝说无效，遂放他回到老家黑龙江省双城县。正好我不久前分配来双城，一时干部奇缺，县委商量无论如何要动员他出来，他就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和我们一起工作了。据说此人后来还是死于肃反或反右派运动中。

老实说，一般干部间的隔阂和结怨到底无关大局，抗战胜利后四处分配、各奔前程就是了。但高级领导干部因抢救造成的结怨，影响可就大了。言之凿凿较为可信的，兹举以下几件。

1，关于刘少奇和柯庆施的关系

对此，得先谈点历史背景。1930年8月刘少奇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大，因发言反“左”，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刘对此一直不服。1936年春刘奉派任北方局书记（原为高文华），除政策纠偏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外，组织上也进行了调整，由彭真取代柯庆施（是他向刘少奇建议并设法营救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和王若飞出狱的）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这些都引起了原北方局一些干部的不满，特别是高文华、柯庆施等。所以在1937年4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就遭到华北代表团多数的反对，柯庆施在发言中竟指着鼻子骂刘少奇为“老机”（即老机会主义）。[dccxcii]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遭抢救，大约是高干中的第一名。如前所述，毛泽东、刘少奇对此肯定知道。有人说这也可能是毛对刘的一点照顾，不知确否。1948年成立华北局，刘少奇任命薄一波为书记（经薄再三恳求，刘同意挂名）。薄建议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进中央局任委员，“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我仍坚持。少奇同志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dccxciii]建国后，柯庆施采取吴法宪“文革”中概括的为官之道：“紧跟，高举，拼命干”（紧跟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拼命干工作——实为竭力搞极左），结果很快升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且一篇《乘风破浪》的文章几乎当上了总理。[dccxciv]在紧接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于是柯庆施（还有陶铸）就在会议中号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dccxcv]由于“紧跟、高举”和在大跃进中冲锋陷阵的结果，柯庆施迅速红了起来。毛泽东决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把他和同样在大跃进中立了大功的李井泉、谭震林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但刘少奇表示不同意，说柯在抗战前北方局时期反对宣传毛泽东，而且从不检讨。于是毛让柯找刘谈，作了检讨，问题遂得以解决。[dccxcvi]但“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到延安审干，有这样一番话：‘有些在延安曾戴过特务帽子的人，以后取消了，我们就说他是好同志，现在已经做了重要的工作，又叫他去审干，他给别人戴帽子可是也很厉害。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是有的，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在笔者看来，这番话几乎就是冲着柯庆施来的。”[dccxcvii]以后的情况已是尽人皆知：

上海变成了极左路线的大本营、指挥中心和"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柯庆施在1965年病逝前又一次充当了急先锋。他去世一年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倒。

2，林彪同贺龙的结怨

林彪同贺龙分属一、二方面军，几乎未共过事，不会有什么历史恩怨，可为什么"文革"一开始就先对贺龙下毒手？（连毛泽东后来也说是受了林彪的骗，因而为贺龙补办了骨灰安放仪式。）据刘英等人说，根子也出在抢救运动。抢救期间，林彪在重庆，其妻叶群在中央党校受审查实即抢救。同上党校的贺龙夫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抗战初期参加国民党的一些活动，如CC派搞的"演讲比赛"等，并硬拉叶群到中组部科长王鹤寿处。林彪回延安后遇到贺龙。贺直言相告："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还叫林"要提高警惕"。[dccxcviii]从此林贺两家就结下了冤仇，据说连孩子们都互不来往。"文革"一起，林彪、叶群就利用手中权力一举害死了贺龙。

3，林彪同陆定一的冤仇

在抢救运动期间，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得知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就进行了揭发。后来两人又同住医院生孩子，更加深了相互成见。1961年严慰冰恰遇林彪前妻之女，了解到叶群对她也不好，于是就开始给林彪全家写揭批怒骂的匿名信，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许多信署名王光x。到1966年五年间共写了五十多封。查出后，中央常委决定停止了陆定一的工作，并开政治局扩大会批判。一次会上与会者每人得到一份林彪1966年5月14日署名的手书，"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没和王实味谈过恋爱；两个子女是他和叶群亲生；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云云。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林彪大骂陆定一是野心家，是假革命，现在就在用种种办法杀人，并且吼道，"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最后处理结果是，陆定一夫妇被监禁十三年，在林彪叛逃后也未得到赦免。因为经毛泽东一再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针对陆定一等人提出的。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四个几乎不大沾边的人却被安上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名。[dccxcix]

4，陶铸和古大存的例子

延安整风期间，古大存任集中高干和七大代表学习的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一部也是党校六个部中审查、抢救、刑讯逼供最厉害的单位（但也区别对待，凡来自井冈山、参加过长征的、以及"一二·九"后在北方局工作过的，一般不定为抢救对象），上面列举薄一波、曾志等人所述各种对人的折磨和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长征女战士（原叶剑英夫人）危拱之被迫自杀等也都出在一部。曾志经过两三年的抢救，结论上仍有特嫌的帽子，并决定问题挂起来。曾志不服，去找古大存，"但他不表态"。而且在运动期间，"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后任军委秘书长兼总政宣传部长）"。[dccc]加之陶铸被捕坐过牢，也一度被隔离审查，说他是叛徒。当社会部的李逸民去看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dccci]抢救运动显然在陶铸和古大存的关系中投下了阴影。例如对于曾志的结论被"挂起

来”，陶铸就当面批评过古大存，说没有证据就凭主观主义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古大存还在七大的发言中批评被抢救的人不该有怨气，说他们应去怨恨日本、国民党。不过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古大存已发言检讨他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伤害了一些同志。[dcccii]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广东解放后，陶古又同到广东工作。1952年，毛泽东批评广东工作落后，决定由陶铸取代叶剑英、方方抓总。反右派运动中，陶铸在毛泽东支持下发起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火力对准古大存。后来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的处理意见，撤去古的省委书记，保留副省长职务。古写信给陶，接受处分，但有些事实不确，解释了一下。陶铸看后不满，报经中央批准，撤消了古的副省长等其余职务，使他实际上退出了政治舞台（1997年含冤去世）。广东反地方主义跟冯古一同受害的干部有两万多人，直到1979年才平反。中央批准的通知上说“不存在冯、古反党和其它反党小集团”，这笔帐才算是清了。[dccciii]

以上例证说明，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对党的团结曾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影响多么深远，但是以往的官方党史却对此一概不提。

（三）严重摧残新革命知识分子并影响对他们的使用

有关“三八式”和知识分子问题，前面几篇笔记中多已提到，这里只谈两点。1，抢救运动是对新革命知识分子的一次严重摧残对于这一点，明眼人早已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妨再引证蒋南翔当时写的一段话。“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虽然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伤痕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抢救运动后，我在延安和陇东曾接触了不少抗战前平津知识分子和抗战后的大后方知识分子同志，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dccciv]他还说，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参加革命后，大都有“吃苦耐劳，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决心和思想准备，而且近十年他们也确实作出了艰苦工作和英勇奋斗的成绩。把这样的同志打成敌人，进行摧残身心的抢救，其精神受到打击和创伤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肯定，作为一个身历其境的基层抢救运动的领导者，蒋南翔的反映恐怕要比官方党史的描写真实得多。毛泽东、刘少奇和党中央后来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承认逼供信的普遍和抢救运动的为害，特发指示提出：“如果不彻底纠正，便会冤枉同志，孤立自己，不仅不能有效的反对特务，反会在党内造成混乱现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使党遭受重大损失。”“一个人如不是特务而戴上一个特务帽子，对他精神上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长期不能恢复，个别还有可能走上仇恨党的道路。”[dcccv]此外，抢救运动给被抢救者造成的精神创伤还表现在，不但有些人精神失常，而且更多人的思想和性格也变了，喜欢说话的变得沉默，爱提意见的人不再多提，等等。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好事，因为本来就是要把大家变成驯服工具的，磨掉棱角、减少“刺头”有什么不好？但是应该说，抢救运动对革命知识分子也是

一次大考验。它证明大家找共产党确实是为了革命，虽然遭受误会和侮辱，但还是相忍为革命、意志没动摇。例如由于抗战胜利来得快于我们的运动，不少人还没来得及做出甄别结论。于是毛泽东就说，现在东北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作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怕什么呀！[dcccvi]结果据说没有一个叛逃。这既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本来面目，也证明发动抢救运动纯属主观主义的判断和决策，决不是什么“审干是必要的”，只是“错在扩大化”。

2，抢救运动影响革命队伍的正常交接

由于抢救运动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就尽量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层外，而使长征后的一代人没能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这主要指“一二·九”前后到抗日战争这两个时期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原因大概有三：最主要的当然是延安整风固定下来的终身制体制和权力结构；再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新干部不够信任的传统；第三，这批人大多被抢救过恐怕也有关系。按照一般规律，凡在运动中挨过整的，不管是否整错，都会影响到日后的使用。因为整错人者始终处于正统地位（真正忏悔的几乎从来没有），即使被整者不记怨，对这些人也总还有些顾忌。因此，抢救运动就增加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程度。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还是长征一代老干部靠得住，文化高低和懂不懂业务倒可以不计。

（四）妨碍充分利用大发展的良好机会

1942年到1945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大发展机遇期，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在外部.苏德战起，苏联和共产国际己无暇干涉中国党的事务，反而有求于我。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华的总兵力自然减弱。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作为一支反法西斯力量能够第一次在国际关系中崭露头角。美英需要国共合作抗日，对国民党的反共是极大牵制。国内形势也不是毛泽东此前估计的蒋介石定然投降和准备国共分裂。1942年国共关系反而趋向缓和，并有蒋毛西安会谈的计划（后派林彪为代表见蒋）。而且全国人民抗日情绪始终高涨，对国民党的不满日增，民心更加向我。主观条件也是建党以来最好的。全党团结一致，党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力量发展神速，单是八路军抗战头一年就从不到3万多人扩大到25万。[dcccvii]特别重要的是成十万革命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与工农兵结合，成为中下层骨干，使党政军的素质和水平空前提高，不少人只要给机会就可以独当一面，打开局面。1942年已有党员80万，军队57万。[dcccviii]总的形势很明显越来越有利于我。当然，日本为巩固占领区可能一时加强扫荡和推行“三光政策”，但它无力长期坚持。国民党也总找机会反共，但已不敢全面破裂和再制造皖南事件。这是国内外形势决定的。

但是毛泽东却一方面对形势作过分悲观的估计和安排（是否有意为整风制造气氛？），认为“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dcccix]所以提出大量精简脱产的党政军人员，如中央和军委从二万四千人减为五六千人；[dcccx]而且指示各地，“军队

在抗战时期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从五十万缩小到二十余万”。[dcccxi]（以上各点因脱离客观形势而未能落实。）另一方面却是集中领导干部，全力以赴搞整风审干（后变为抢救）。大部高干调到延安，部分高干和中下级干部分别集中各地。前后方都把整风摆在第一位，不但没能抓紧大好形势下的发展机遇，还贻误和影响了日常工作，甚至严重打乱正常工作秩序。以延安和边区为例，中央和军委一千多名工作人员的通讯部门，因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就挖出170个特务），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致使延安和各根据地的联系一时中断。陕甘宁边区各县在农忙时也只留一两个人值班。即以我们学校而论，在校四年多，但完全学外语的时间不到一半，实在可惜。毛泽东自己就说，“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dcccxii] 1943年搞肃反抢救，耽误工作自然更厉害。

但由于形势大好，所以在集中搞整风审干的两三年里，革命力量的发展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估计和安排，到1945年5月开七大时，正规军已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党员120万。[dcccxiii]这就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进一步设想，让被集中的大小干部利用有利形势，按照总的政策，放手大干，各显其能，革命力量必定发展得更快，对解放战争更有利。抗战头一年并没经过整风审干，力量发展得那么快，就是证明。又如山东（罗荣桓）和苏北（黄克诚）抵制了抢救运动，整风也没像延安等地那样大张旗鼓地搞，但内部整顿和力量的发展壮大（包括抗战后进军东北），恐怕要胜过整风抢救搞得特别厉害的一些地区如晋绥边区。有人说，不经过延安整风抢救这文武两手，思想不易统一。这也不一定。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证明，整风运动还影响了团结统一。事实上，不但像罗荣桓、黄克诚不存在思想统一不统一的问题，就是对整风抢救有意见的许多领导人（说出来的有彭德怀、陈毅等人）同样在重要政策上也是一心一德、坚决执行。何况延安整风后的重大决策也有失误之处，如王震南下，挺进大别山等。总之，权衡利弊，抢救运动，确如蒋南翔当时痛心之言，“在这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dcccxiv]

（五）开创了运动模式，加剧了不正之风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肃反（抢救），这确实是一个创举，并成为后来许多运动的模式。对此，主流党史学不肯明讲，但实际上早已是中外史学界的共识。美国的费正清在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对延安整风就得出结论说，“这种运动方式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dcccxv]在国内，类似说法更多。如：“整风运动开创了一种形式，即以大规模的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按，当然也包括审干肃反）……延安整风成为后来中国各种思想运动的源头。”[dcccxvi]有的书在以《延安整风树立的党内斗争模式》为标题的一节中，除大力歌颂“突出两条路线”、“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以外，也不能不承认在树立的这个“模式”中包括抢救运动，说“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延安整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密切相关的”。[dcccxvii]总之抢救运动影响深远，决不是某些人说的在历史上只存在十多二十天就完全过去了。

至于这个模式的特点，凡是经过建国后各种运动的人大都明白，无须多讲。这里只提个线索。先是自上而下发动，进行内部排队，号召鸣放（答应“言者无罪”）。第二阶段是组织积极分子开展大批判。第三阶段为放手发动群众斗争，批评或斗争对象只能检讨或坦白，不容申辩。在积极分子带动下，群情愤激（有真有假），从劝说到刑讯，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直至上面叫停。由于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只得进行甄别平反。在时间紧迫，仓促作出的平反结论中总还要留点尾巴，表明“事出有因”。还要将运动中的真假材料连同结论一起装进各人的档案袋。作总结，照例是两点论。一是肯定成就，如同毛泽东所说，审干取得了重大胜利；二是也有缺点，就是把许多好人当成“特务”抢救了。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即以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安排，这在七大选举和后来的工作分配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大凡领导和主持抢救积极的，多得到显着提升和重用，也是一些人进入中央的原因之一；被抢救者有不少人因未作出结论，七大代表资格尚被褫夺，更遑论其它。

抢救运动对党风（当然也包括学风、文风和一切作风）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影响不可轻视，有些不但成为主流，而且至今仍在起作用。下面只举数例，稍作说明。

1，所反对的“三风”反而得到发展

这是蒋南翔当时在指出抢救运动“根本失败”的几种表现中提到的，“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进而是更其发扬”。[dcccxviii]延安整风所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恰巧在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里得到了可说是全面的、更高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原来在整风中就是一面大讲反对主观主义，一面大干主观主义的抢救。当时提出“特务的群众性、世界性”[dccccxix]就毫无根据。各种对特务数目的估计，证明都是纯粹的主观主义。对此，现在大概已没有什么争论了。对发动一场群众运动，能够事先估计到具体数目（如党校的特务数），并定出各种百分比，这本身就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一种典型。可惜抢救运动中这一创造，一直适用了几十年，不知先后有多少无辜的人们被卷进了这个百分比内。

又如抢救运动中有无宗派主义，这也得看事实。为什么柯庆施被抢救？为什么有些被捕过的受到怀疑以至抢救，有些被捕过的反而得到重用？为什么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大多受到怀疑？是否因为他们不够驯服？为什么陈伯达的托派问题就没事，王实味却因托派问题被枪毙了？为什么明摆着有问题的江青得到保护，而一些著名的优秀青年如蔺克义、杨学诚等却被打成特务？如果再从更大的系统或山头看，问题也许更多，这就需要另作仔细研究了。总之，抢救运动中的一些宗派表现和报复情绪，当时人们就有明显的感觉，并在互相信得过的朋友间有所议论。

至于说到反对党八股，抢救运动的两三年大概是新党八股（所谓“延安文风”）日臻完备和成熟的时期。其专横武断、不要证据、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空话套话、永远正确等，决不在旧八股之下，只是引证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证毛泽东就是了。这只要翻阅一下1943年《解放日报》有关抢救运动的报道和评论，就会知道。人们可将当时关于抢救运动中争相坦白的报道和大跃进时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等的许多报道对比一下，看看它们的继承性。

2，抢救运动在发挥威慑手段上的作用

在革命队伍里，对于改造人、加强集中和确立领袖崇拜上，事实证明，单靠学文件讲道理是不够的，同时要使用威慑手段，不但收效快，还有助于巩固。例如对于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整风学习本来是要启发和提高你的原罪感，但由于他们大都有自由思想，还往往“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时就显出威慑手段的作用了。以延安整风中第一个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为例，和风细雨的整风进行了两三个月，被认为“错误”的思想仍占绝对优势。1942年3月18日表决院务会议通过的室以上领导为当然检查委员的决议，赞成的只有1／4，而王实味等提出的全部委员由选举产生，竟得到3／4的支持。[dcccxx]在毛泽东的密切注视下，5月27日研究院召开关于“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dcccxxi]会前，院党委调查大家对王实味言论（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和整风后历次会上的发言）的态度，统计结果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的达到89%”。[dcccxxii]座谈会上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李宇超提出的王实味的错误同大家的偏向有无根本的不同。对此，头两天会议同意和不同意的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第三天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论部分后，大家意见立即趋于高度一致。对李维汉提出王实味的错误不但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没争论了。[dcccxxiii]会议第四天（6月1日），已经完全变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并开始揭发他同托派的关系。经过一个礼拜的揭发批斗，李维汉在总结中已说明王实味是个托派分子，大家一致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不但研究院大小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得这么快（其它机关学校一样），文化人变得也一点不慢（大约除萧军外）。6月15日起四十多位作家开座谈会（主席团由丁玲、周扬、塞克组成），“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dcccxxiv]艾青在发言中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的时候，就像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的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这同他不到两月前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dcccxxv]有关王实味的问题，人们都比较了解，这里又一次谈得这么多，是为了说明：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态度变化得极快，但这必须在强大的威慑之下。我就有此亲身感受，若不是上面组织批判，我们学校大多数人还会继续对王实味代表的观点同情下去，对《轻骑队》继续支持下去。

3，抢救运动加强了党管一切和个人独断之风

列宁创立的一党制本来就是一党专政，但它管理国家和人民还要通过许多环节，如政府、苏维埃等。我们在抢救运动期间却是以党的名义直接管理一切。例如党组织和领导人可宣布一个地区或单位的戒严，广泛限制人身自由，任意拘捕、审讯、刑逼和没收私人东西。按道理（或党史书上说的），边区政府系统停止正常工作、搞抢救运动、逮捕重要干部，起码应该通过实行“三三制”的政府，报经主席副主席批准。但运动一来，至今还有史书在讲的这套民主形式就露了馅，再没人提起“三三制”了。不但名义上“有职有权”的民主人士副主席李鼎铭不能也不敢过问抢救的事，连共产党员的林伯渠主席也只能冷眼旁观（由自己从大后方介绍来的许多人都不能保。他还为钱来苏案多次呈文毛泽东，毛却不表态，给他碰了软钉子）。抢救和坦白大会均由负责整风审干的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主持。

抢救运动使党外民主连形式也看不到了。那么党内民主呢？恐怕谁也说不清。下层已是党内外不分，许多党员成了抢救对象，一些非党员变成积极分子。支部大会长期不开，书记由上级指定。积极分子倒是常开会，以传达上级指示，研究抢救策略。各级党委活动不大清楚。以我们学校而论，委员本来也不是选举的，开会内容除按上级指示布置工作外，也还有批评和检讨。例如教我班俄文的大队长常乾坤（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被多次批为右倾，说他对抢救工作持消极态度，同情“特务”云。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如果以1943年主要搞整风抢救为主的一年为例，倒还可以从当时的耳闻目睹和事后看到的一些资料中得出一个笼统印象，就是：张闻天任总书记时期（1935-1938）坚持的集体领导和会议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包括平等与会、畅所欲言、进行争论、必要时表决等，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政治局除整风学习的扩大会议外，正常的例会已大为减少，作用也明显下降（主要是通过一些决议和宣言，听取书记处的通报和毛泽东的讲话等），有些职能为总学委取代，更多的事情由改组后的书记处处理了，并非胡乔木和党史学上说的只是“日常工作”。[dcccxxvi]请问，1944年5月19日书记处会议决定5月21日召集六届七中全会、确定会议议程、参加名单和全会主席团组成，这能说是日常工作？而成为全党一个相当时期的主要工作抢救运动，基本上也都是书记处决定和处理的，许多重要指示就是以书记处或其成员的名义发出的。造成这种情况也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七大以前的政治局组成，如果按各成员的真实意向，大多数是反对抢救运动的，即使整风中那种对所谓两个宗派的无限上纲和过火批斗，也不一定能得到多数拥护。如果真按党规党章办事，作为党中央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在政治局连表决权都没有（因他系候补委员）。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仅毛泽东一言九鼎，在政治局及其它一切会上的讲话没人敢批判反驳，就是刘少奇的意见，恐怕也没有人能站出来反对。多数委员不是被打成教条宗派或经验宗派，就是多少沾点边，他们只有接受批判进行检讨的份，求得过关和宽大处理就知足了。不少人亲眼看到，抢救期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陈伯达，不但实际上在中央的权力和作用比一批政治局委员如博古、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和有的被戴上经验宗派帽子的人大得多，而且见面谈话时态度也要高傲一点。从几个领导人不太准确的《年谱》统计中也可多少看出一点中央的“集体领导”情况。[dcccxxvii]从1943年开始到1944年5月21日政治局、书记处职能停止，几个人参加（包括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次数，政治局（整风学习的扩大会未计在内）：毛泽东17次，刘少奇17次，任弼时16次，周恩来（从7月起）4次，陈云8次，张闻天4次，彭真17次；书记处：毛23次，刘26次，任22次，周4次，陈[l]次，彭26次。[dcccxxviii]这就是说，彭真列席是每会必到（发言权无限制，大概也没进行过表决），而陈云只参加过8次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只4次（书记处更无一次列席），周恩来也是4次，另列席书记处会议4次。抢救期间开创的这种开会模式，后来不但在运动中，平时也经常用起来了。

根据抢救运动这一年半的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央的集体领导已大为减弱和缩小，并开始走向个人独断体制；毛泽东的意见只有得到拥护，而很难听到不同意见；个人崇拜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此处似乎缺句）。

4，助长和养成说假话、顺着来占便宜，说真话、提意见吃亏等不良风气

在抢救运动中，假坦白的可以立即得到解放甚至被吸收为积极分子，事后也决不追究，有些还得到重用。坚持真理、说真话的，眼前就会吃亏。认为问题严重或进行对抗的，还可能遭到逮捕、监禁，甚至受残酷的刑罚，甄别平反后既得不到表扬，反而会落个态度不好的评语。同时，那种善于观测风向、揣摩领导意图、并且顺着来的，再加上有一定能力或某种特长，那就不但在运动中会成为积极分子，错整了人甚至违法乱纪也不会受到责备；而且此后发展也往往“前程似锦”、一帆风顺。这样的人我们看到的实在不少。相反，那些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指出抢救运动为“左”倾和主观主义，指名批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会受到指责甚至处分。由于个人崇拜和威慑力量，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人和事一句没听说过，也许本来就不曾发生。

抢救运动不但不许人们说真话，而且还剥夺了人们不说话的自由。被抢救者固然要坦白交代、回答问题、进行解释，其它人也必须参加抢救和表明态度，而且许多人为了自保，还主动上阵，假装积极。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天还赞同王实味观点的人，哗啦一下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表态和他划清界限，而且积极参加口诛笔伐。据说文人知识分子中只有萧军态度不改，愤而下乡当了两年自食其力的老百姓。但这个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萧军是个名人，对他无可如何。要是机关学校一个小知识分子，那结局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连胡乔木事后也承认，不但王实味，“对其它人的斗争也很不合适。对萧军，搞得不让他吃公粮。”[dcccxxix]其实萧军如果没有当地农民帮助吃住，恐怕一家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何况老婆还要生孩子。[dcccxxx]

在运动中，紧跟领导，顺着来，善于奉迎和打小报告的，肯定占便宜。这使一些人发展或学会了两面作风。有些人为了讨好上级、表现积极，可以出卖亲人朋友，揭发以至编造相互间的谈话，弄得事后反目成仇。有个假坦白后又积极参加抢救我和别人的同学，两年后甄别平反了，又来对我说，他当时就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的小鬼会是特务。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只按党史教科书的说法，整风是要在革命队伍中树立好作风，而肃反和清除坏人是为了有助于作风的纯洁。可是实际情况却正相反。在抢救运动中，旧社会的许多庸俗作风反而大为泛滥。当然，有些问题，如鼓吹个人崇拜、自封一贯正确、篡改党的历史等风气，不光是抢救中的创举，可能还是整个延安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抢救也许正是为此而采取的威慑手段。如认为这种估计完全错误，但经过抢救运动，不少好作风为坏作风取代，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特别是说假话、顺着来的吃得开，坚持说真话和爱提不同意见的倒霉，这种恶劣作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愈演愈烈，至今不衰。至于历史一再证明，人们也习以为常的“假大空”现象，就不必多讲了。可见抢救运动影响之大和为害之深。因此在党史研究中，应很好探究其前因后果，汲取教训，消除影响，改善作风。长期以来之所以没有也做不到这点，原因之一就在于，掌管和讲授党史的人们不愿也不能违背延安整风创立的原则和精神，对抢救运动尽量掩饰、含糊其事。这已是教训中的教训了。

（六）结束了党史上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

延安整风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抢救运动，如同一道鸿沟，把延安和全党的政治生活和风气截然分成了两个时期。前者确实称得上生动活泼，后者只能以万马齐喑为喻。在我的计划里，还想根据个人亲身体会并参阅有关材料，再写一篇延安生活在整风前和整风后的对比的笔记。所以这里不拟展开，只稍提一下。[dcccxxxi]

1，整风前的延安生活

我是1938年从西安跑到延安的。在延安生活的头几年，感受特别深的有以下儿点。

（1）积极向上的精神，如饥似渴的学习

去延安，本来就是追求进步参加革命的，所以从精神面貌到实际行动，各方面都表现非常积极，同志间一天到晚的工作、学习、劳动，好像都在进行竞赛一般。以我这个中学生来说，1939年才过16岁，在生产运动的开荒中已被称为劳动英雄。[dcccxxxii] 1941年抗大5周年时又因以往学习和工作积极受到总校表彰。[dcccxxxiii]至于谈到学习，无论是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向老红军学习，我们这些知青们都有一种拼命精神，可以少睡觉不休息，尽量想多学点东西。这种学习总的说来是健康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提高政治觉悟，增加各方面知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并非整风后被一些领导者和学舌者所说只是抠书本的教条主义学习。道理很简单，因为多数甚至全部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都是为了学些革命道理很快到抗日前线上去用，所以不但对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等理论如饥似渴，而且对准备马上就要用的游击战术、步兵操典，以至地形学（利用地形地物）、筑城学（挖战壕、修掩体）等也抓得很紧。那时需要动员的不是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工作。所以毛泽东才有“你们要下决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凉山”的话[dcccxxxiv]（毛好说极端的话）。

（2）团结友爱，亲如家人

一到延安，如同回到家里，大家那种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的精神令人感受至深。在这种氛围里，一个人很快就被卷进去同化了。平时谈的除国家大事、学习内容等外，还经常“交换意见”（相互提点注意事项）。有不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并不影响同志关系。在相处中，不分年龄大小、文化高低、天南海北，都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就从一些大学生老大哥那里学到不少知识。那种同志友好感情还可从这样一件事看出来，和我们有两三个月吃住在一起的班长要调到同院另一个班去当班长，在欢送会上竟有好几个同学哭了。当然这些大小知识分子也确有不少缺点，给我印象深的是虚荣心强，常有伪造学历等事。但现在看到许多党史资料，为了衬托整风的必要和伟大，把当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热血青年描写得如何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等，说轻点也是过分夸大，有些干脆是在瞎编基础上的以讹传讹。延安的男女关系总的说来也是自然又严肃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描述的什么“杯水主义”、“打游击”等，恐怕也只是片面的道听途说。[dcccxxxv]这不但当时（以至事后）没有听说过，而且在延安干部和学员男女比例为18：1的条件下，那种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在这方面，反

而是先后到过延安的江文汉和赵超构描述得真实一些。dcccxxxvi

（3）文化生活丰富活跃

在延安虽然生活艰苦（这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精神愉快，总是欢声笑语，正如《延安颂》唱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我们一个礼拜一定要学一个新歌，早饭前和晚点名后必唱。当时的集会游行和联欢晚会也特别多。小到班排、大到机关学校，只要集合到一起，总要以拉拉队形式互相欢迎唱歌或提名某人唱歌，包括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我记得一次朱总司令就在不断的喊声下站起来唱了一个“打倒列强除军阀”。文化活动多种多样，我在延安看的戏就不少。

（4）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和空气

这也许是最重要的感受。因为大家去延安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所以到延安后便会立即得到同国民党地区那种精神压抑大不一样的感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已有大量书籍文章介绍。这里只简单讲一下我经历过的两次大选。一次是第一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我们军事学院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为一个选区，合选一名参议员，共提了两名候选人。只记得我们提的是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郭化若那天因参加军委的会而告假缺席，委托俄文队长曹慕岳（后改名曹慕尧）代为竞选。周扬是亲自上台作竞选演说，其中曾批评到郭化若缺席证明他对参议会不够重视，当选后能否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就值得怀疑。鲁艺的助选拉拉队名堂也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领呼人（记得是刘炽）喊：“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是谁？”鲁艺人齐声回应：“周扬！”但终因军事学院人多，最后还是郭化若当选了。自然科学院的徐特立老人也在竞选大会上讲了话，说这是为将来参加同国民党、青年党等在民主政治中进行竞选的练习。后来边区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在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传达汇报时还回敬了周扬对他的批评。另一次是党的七大代表的选举。在延安是采取直接差额选举的办法。抗大三分校自己是个独立选举单位，候选人有分校校长许光达等，只记得差额是二或三与一之比。先把候选人的详细情况以小字报形式贴在墙上，经过全体正式党员阅览和议论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由于选出后再无动静，且过了五六年才开七大，所以后来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但这总算我入党六十多年中参加的一次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

关于延安头一个时期的情况，原说只拟举例提一下，不想已写得太长，而且有些重要内容还没写到，理论的繁荣、对外的开放等。还应该说明的是，史学上和许多书上所讲述的“延安精神”、“延安时期”，多半是指这个时期。如1986年胡耀邦说的，“从我党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dcccxxxvii抢救运动一起，社会科学已无人再谈，哪来的大繁荣？胡耀邦显然指的前期。又如《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所描绘的理论繁荣时期、生气勃勃时代、相对开放的大环境、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等，也只能指前期。它为说明对外开放列举的美国人访问延安的日程表，1941年到1944年7月就完全是空白。整风抢救以后“民主宽松的气氛”更根本无从谈起了。dcccxxxviii

2，抢救运动发起后的延安气氛

对抢救运动开始（1942年）后的延安生活和气氛，我们前面已谈到不少，这里也再简单归纳几条。

（1）抢救运动期间实行全面戒严，延安处在一片萧索气氛中

人们不得自由出入，不得会见亲友和熟人，连处在不同机关的夫妻也不能团聚。单位之间的来往和聚会（如过去经常举行的讨论会、联欢会、各种学习和文体活动）完全停止，路上行人也大为减少（有趣的是，曾有几次看到平剧院以唱青衣和小生著名的托德康一个人从山下走过，嘴里唱着戏或念锣鼓经，后听说他是假装疯癫。解放后在上海工作）。集中了“三万党政军”的延安，被弄得空气紧张，人人自危，[dcccxxxix]失去昔日的欢乐和光辉，几乎变成一座死城。当年的积极分子和官方学派的史学家们，如果不同意这种说法，那就请开放这一禁区，允许讨论和争鸣，改变那种只有空洞和武断的结论，而避开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学风。何况这方面不但已有大量文件资料，而且参加过抢救运动的老同志健在的还不少（许多被抢救者不大愿意写这段回忆，多半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延安整风伟大正确的结论）。

（2）同志关系变得冷漠，甚至到了互不理睬，互相提防的程度

自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一再追查各种小道消息和错误言论、经过互相揭发等以后，一则产生或加深了相互隔阂，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二则抢救的范围和声势不断扩大提高，人们的思想已被搞乱，哪有心思跟人闲聊；三则言多必有失，各人从被揭发、被打小报告中得到沉痛教训，逐渐变得谨小慎微、少说为佳，甚至被迫去学旧社会的为人之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和“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四则，抢救者和被抢救者之间有什么话好说？等等。所以连真诚拥护抢救运动的作家刘白羽也说，抢救大会的第二天，“平时活跃的（党校）三部，整个落入沉闷之中，人们走着路，谁也不看谁，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了封条”。但他说的一到晚饭后又“欢乐”起来，整人者和被整者打起了扑克的话，恐怕连没经过抢救运动的人也是不会相信的。想想看，会有这种吃顿饭竟忘了白天被打成特务的人？[dcccxl]我们学校大概这两年也是“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了封条”。由于抢救也不能误农时，我校1943年春全部男同志开进距延安有几十里路的杜甫川（据说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曾逃难至此，故名。有“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等诗为证）开荒播种，从早起吃饭、排队上山、劳动休息（午饭送上山），到晚上回来吃饭睡觉，几乎一整天都是鸦雀无声。一些人走路和休息时宁可低着头看小说，也不愿和人搭腔。如果听到说话声，多是有人在发脾气或吵架（当时人们的火气都特别大）。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甄别后虽逐渐有些变化，但始终没能恢复整风抢救前的精神面貌。幸亏日本很快投降，大家分配去各地工作，才同这种冷漠的局面告别。记得我们第一批学外语的三四十人编成一队，1945年9月2日出发去东北，全校教职学员列队相送，走的许多人并未表现出惜别之意，对离开母校离开延安也并不留恋，反而听到一些牢骚话。

（3）学习发生根本变化

马列主义被说成“教条”，课程被取消，有关书籍（那时翻译出版的还真不少）也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会去读了。一切书本知识被挖苦得狗

粪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对现代化和面向世界的知识，除关心东西两大战场的战况外，当然没人再去“言必称希腊”了。至于什么是实际知识，怎么去学，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两三年抢救运动期间学习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关文件，还有某些中央决定、临时指定的什么文章如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康生的《抢救“先足者”》、《解放日报》某篇社论等，联系实际就是思想斗争和反特抢救。学习真正有用的东西，反而受到轻视，时间被挤掉。例如我们那所办了四五年的外语学校，似乎并没培养出几个真能胜任翻译的人来，还不说一些人进校前就已有一定的外文基础。而且这种长时间翻来覆去学一个或几个文件的做法，还容易使人对这种学习养成一定厌烦心理，一听指定某一时期集中学某一文件就产生反感。但是延安整风创建的这种学习方法却一直适用到现在。根据我个人六十年多的观察和体会，以这种办法学习，收效历来不大。

（4）建立起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森严的等级制度

经过抢救运动，一方面从组织制度上加强了保密，党内外许多事情不让一般党员知道。另一方面，党员们也从学习和教训中获得不该知道的事不打听等驯服工具的修养。例如延安整风，大家都参加，但上面究竟搞了些什么，下面一概不知，顶多听到点小道消息，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看到少数材料。因此，整风抢救的历史就可做到任凭打扮，保证舆论一律（即垄断）和与时俱进（随时改）。例如“文革”前，抢救运动好象不曾发生过，学党史的大多不知道有这回事。后来改说成有过一个短暂的抢救运动，是康生发起和领导，被毛泽东很快发觉纠正了。而且不只历史，各方面都需要保密。抢救运动前，党员还可看点党内文件和《共产党人》期刊；抢救后，党内外变成一样了。（解放后改行“先党内后党外”，如粮油涨价，党内早一夜传达；发表重要文件，早一天传达等。）与此有关的是，抢救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等级制度。因此不是所有党员都“不可使知之”，而是严格按等级规定行事。整风学习的编组，依据的原则就是实施政治上的等级制，高级组还把绝对保密定为一条重要的纪律。至于生活待遇以至警卫上的等级制，1941年任弼时出任中央秘书长后，就以苏联为榜样，逐步固定和不断完善起来。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使政治上和生活待遇上的等级制更加具体。那里集中了四五千名干部，其中有大批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后来分配到各地，遂使等级制影响到全国并一直传下来，建国后更得到不断发展。延安头几年那种上下级界限不怎么严格，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同大家一起参加联欢、各种文体活动，星期日街头散步，一些人遇见首长掏出笔记本请题字等延安特有的现象，抢救后已不复再见，我只见到几次领导人和大家一同看秧歌或看戏。

总之，整风前可称作“延安时期”的那种生动活泼局面在抢救运动开始后就完全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全国解放后，那些经过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知青，在新的环境下，由于胜利的喜悦兴奋和群众热情的鼓舞，似乎又恢复了青春，同新解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一起迎来了一阵生动活泼的局面。但随着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一些人翻身落马，更多的人则接受教训，变得老练以至世故了；特别是反胡风和反右派后，全国也逐渐变得和后期延安的情况差不多了。

抢救运动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大约是不会有争论的。至于对这些影响如

何估计，那就有很大或根本的区别了，有正视与掩盖之别，有过头与不足之分。这就应当允许以至鼓励讨论，但必须依据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不能只用空泛议论和扣大帽子的办法。无论如何，总不能把抢救运动作为禁区永远保持下去。

（2003年9月25日完稿）

第十四篇 从“博古路线”到所谓“王明路线”

一，延安整风突出路线问题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正当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在延安进入最高潮时，上层整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批判的第三次“左”倾从“博古路线”变成了“王明路线”。下面就谈一下这一变化。

延安整风一直被视为党内斗争的“楷模”，为党内斗争树立了一个“模式”。有的党史学家归纳这个“模式”的特点，提到的第一条就是“突出两条路线”。[1]这当然指的是上层整风，也就是中央领导层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清算。至于一般干部的普遍整风，并没有也用不着突出什么路线问题。所以整风开始的标志，不是1942年发动普遍整风的《四三决定》，而是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会议”。因为会上“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从此“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2]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明：整风要清算的是多年前历史上的而不是抗战时期的路线问题，当时说因为抗战尚未结束。实际上遵义会议已经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路线，这是整风期间和直到现在都得到公认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那么长的时间去清算一个早已被纠正、实际上已不存在的路线呢？传统的说法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肃清“左”倾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等的影响。这或许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一分为二地看，总还有些问题，不但当时，现在也仍然说不清楚。例如，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要有那么强的选择性，只着重七八年前那一段？遵义会议后的历史帐也不是完全不算，例如就办挑选了长江局和皖南事变那两件，对于此前的西路军惨败却又视而不见了。又如，延安整风的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那为什么会正好在整风期间发生最典型的主观主义错误，即无中生有地发动一场“抢救运动”？

更重要的是，建国后为什么不从延安整风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致使类似错误此后一再重犯？出现这些说不清的自相矛盾问题，根本原因是不愿揭示出整风的真正目的，即毛泽东说的要整掉两个宗派。于是说什么彻底批判“左”倾路线，并着重思想根源的分析（一切都来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为了汲取教训，增强犯错误的免疫力。但事实却是，只过了短短五六年，到建国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就日益严重起来。[3]而且所犯错误也是越来越“左”，还同样打着反右的旗号。历史如此重复，致使延安整风时参与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后参加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竟喟然叹曰，“人是很难牢记历史的教训的”，当年批评的“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不就是后来的斗争哲学吗？”他还在重述一段当年批判的宗派主义表现后说，“这些历史经验大家都忘记了”。[4]对于延安整风时一再强调，直到1951年他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时仍在强调的“思想根源”，建国后毛泽东也给改了。“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上已将‘小资产阶级’的‘小’字全部删去”。[5]从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胡乔木也改口说，“我特别反对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个概念用得太滥了……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6]其实，无论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思想都并非要害，延安整风中的过火斗争和抢救才是促使后来犯越来越“左”的错误

的根源。

延安整风之所以要算多年前的路线的老帐，从后来的结果和多年的对比看，有以下相互有关的几个原因。一是要使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后来还加上抗战初期的右倾）犯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彻底认输，完全缴械。遵义会议以后，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例如张闻天，不但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而且还多次检讨，甚至在六中全会上请求过处分，但他却不承认路线错误，因而仍被看作没有彻底缴械。毛泽东历来主张“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以前的老帐必须算，影响必须消除。他在整风后期就明确指出，“党书（即《六大以来》）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7]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说，“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一摆出，解除武装。”[8]第二，是为了“改造中央”。毛泽东1943年10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其实，刘为中央审查委员，并非中央委员）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它（按，这里只能是指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是拥护王明、博古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所以他明确提出，“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9]就是说，要通过整风，或者换人，或者换思想，把旧中央改造成新中央。第三，为了最终确立毛泽东作为领袖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两条路线，实际上就是以人划线。这在第三次“左”倾时期比较明显，除苏区的毛泽东和白区的刘少奇外，其它原领导人多是参与制定或基本执行“左”倾中央路线的，人头容易分清。如果回到抗日战争的现实中来，那就很难找出多少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了。所以只能算历史帐。而且既然以人划线，那就势必会产生功劳归一人和为尊者讳的现象。例如张闻天检讨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0]代替博古总书记的张闻天尚且如此说，别人还能说什么，于是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助手的毛泽东就变成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又如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反“围剿”以来的最大胜利，但这也要设法归功于毛泽东。于是创造了这样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取得了胜利。”[11]（也许由于这一说法显得太牵强，现在已不大提了。）至于为尊者讳，最明显的例子是，不算打AB团和富田事变的帐（或者含糊地把责任推给“左”倾中央，毛泽东在起草的《历史草案》中就说，他们“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12]），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之于张国焘。应该说，通过延安整风，这些目的都完全达到了。

其实，突出路线问题也并非毛泽东和延安整风的创造，而是从苏联和从“左”倾中央继承下来的。有人说，“毛泽东本人一贯十分重视路线和路线斗争问题”。[13]这是事实，但说“一贯”却并不准确。在共产国际提出立三路线前，中国党包括毛泽东，还是很少讲，也是不懂路线和路线斗争的。此后虽然很重视，但仍然一直没弄得太清楚，所以用错的时候更多些。在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针对过去对“路线”的“大量滥用”，胡乔木说了

这样一段话：“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它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任何严重意义。斯大林在1929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地步。”[14]“就按路线的严重意义说，至多也不过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罢了。过去用了若干年是事实，但那样用法的害处也是事实……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14]

对毛泽东所提的，“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15]邓小平就给推翻了一大半，并且明确说，“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16]所以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就主张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了。但是，这种作法只免除了毛泽东和一些党的领导人犯路线错误和戴“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帽子，却搞乱了历史，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说不通。例如，硬要说1959年庐山会议那一次不算路线斗争，恐怕就说不过去。实施了四五年、维护了二十年的“三面红旗”，造成那么严重的生产倒退和生态破坏，饿死三四千万人，还不是路线错误，那什么才算路线错误呢？庐山的一场斗争，不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难道还真是“一场阶级斗争”？它的特点只不过是一场纠“左”的正确路线才一露头，就给错误路线压了下去，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但结局并不能改变这是一场路线斗争的性质。至于搞得十年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那更是一次严重的极左蛮干主义路线错误。连胡乔木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开始时都主张讲。他说，“叶帅三十周年讲了极左路线，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再讲，除了‘文化大革命’，其它都不讲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不讲有点麻烦。暂时讲一次，以后就下不为例了……如果单讲两个反革命集团，历史不容易解释。”[17]但后来连胡乔木这样“暂时讲一次”的意见也终于被两位元老给否决了。这当然有利于维护领袖的历史地位和其它跟着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的威信，但却确实弄得“历史不容易解释”了。又如说刘邓这一次不能算，那是否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和大家都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者毛泽东的问题也同“四人帮”属于同一性质？

还有，如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解释建国后毛泽东提议对1945年《历史决议》作重要修改之二时所说，“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是因为“犯路线错误，陈独秀、瞿秋白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18]那么建国后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左”倾错误，其严重程度，造成损失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却既算“主义”，也不算“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只不过是“一次严重失误”，“文化大革命”中全党执行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能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极左路线，而只可说是“全面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19]这种说法，难道就可以在历史上“摆平”？还有一种解释，说毛泽东是好人犯错误，是好心作了坏事。那么，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更不能说是坏人、坏心，何况上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他们的责任还相对轻一些。

历史是一门科学，世世代代都会研究下去的。我们作的有利于我们这一代的结论，不一定就能长期保持，也许在第三代第四代就会重新修订，或被彻底推翻，因为学术上的控制与垄断只可能行于一时，不会永远生效。弗·培

根有言：“人们说得好，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20]

二，从提出路线问题到定名“博古路线”

前面已经讲过，第一个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提到路线高度的是刘少奇（这也是后来毛泽东能和他联合起来的原因）。但他的所指只限于白区工作，认为“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但“不能说中央在苏区的工作在总的方面是错了”。[21]所以胡乔木说，“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样。”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才提出。：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提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但是，有些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毛主席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1941年4月为《农村调查》所写的“跋”。正式提出路线问题是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所做主题报告。[22]在这之前，为了给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实际上可能是为了整风），毛泽东已着手编《六大以来》。“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多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问题。”“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23]1941年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路线问题，即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原来不同意的张闻天首先发言检讨，更明确表示，“在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泽东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24]博古检讨说，“1932年至1933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25]李维汉、王稼祥、任弼时等也作了检讨。其它与会者全都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这样，“九月会议”就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错误正式定了性，明确为路线错误。大约是为了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区别，也为了简便，当时普遍称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简称第三次“左”倾，但还没有冠上什么人的名字。

冠名，自然是毛泽东的事了。根据编《六大以来》时对有关文件的研究和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毛泽东写了两部重要文稿。一是为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他在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字，遂成为简称。一是对第三次“左”倾中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九份文件的批评，按理只是属于个人笔记性质，后被胡乔木介绍于世，并命名为“九篇文章”，因而也成了党史上的著名文献。它们虽为一些人赞为“有着相当高的理论价值”，[26]但却至今未予全文公布。据胡乔木介绍，“九篇文章”“初始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也作了一些较大的修改。”[27]这样，在“九月会议”后，第三次“左”倾错误被上层一致定为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他的《九篇文章》（原准备和《历史草案》一起发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讨论）中又明确定名为博古路线。《历史草案》标题虽然无博古名字，但据胡乔木介绍，内容许多处都提到博古路线，并在分析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时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苏维埃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28]由此可见，上层整风批判第三期“左”倾不久，即定名为博古路线，实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连博古

也是承认的。大约直到1943年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第三次“左”倾路线还没有和王明连起来。后来，一直到现在，许多党史著作，包括胡乔木、胡绳、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正式党史谈到上层整风（甚至整个整风），一开始就提到清算王明“左”倾路线，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至于还有些党史著作特别是许多《回忆录》，在整风前以至遵义会议前后就谈起了“王明路线”，就更是有意的编造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介绍“九篇文章”时，到处是“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揭露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等；介绍《历史草案》时，又是接二连三地“王明、博古路线”多达十来次之多。这都像他在谈话中说的，“我的这些话是事后诸葛亮”。[29]不过，细心一看，虽然文字显得前后矛盾，但他总还算是作了交代的。例如逐项批判《历史草案》所列错误之前即注明：“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30]缺点是没有说清是什么时候修改的。还有那“九篇文章”，只考证出写于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并说“前后作了好几次修改”，直到1965年还在修改，1974年6月仔细阅读时又将“其中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31]但就是没有讲各次修改的具体时间和内容，而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所编《毛泽东文集》时又故意不加说明地把它定为“一九四一年”，这就容易使一些人以为是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撰写和修改定稿的。例如《延安整风实录》就似有重大发现地说，“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过去并没有特别指出王明是‘左’的路线创始人，但在这篇文章（按，指“九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32]并以杨松奎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中引用的话为证。可能作者没有查杨松奎成书后的注释，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五章的第58条注释。杨认为，“九篇文章”的第三次改定题目既不包括对四中全会的批判，而毛泽东直到1943年才全面批判王明，并将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故可判断“九篇文章”从形成到改定经过一个过程。又鉴于文章在延安整风时只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而刘少奇1943年初才回到延安，刘、任做毛的助手也是1943年3月后的事，因此“肯定目前看到的这篇文章应当是在1943年写成的”。[33]而且写成后还改过多次。所以，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后多次修改过的“九月文章”证明博古路线是什么时候变成王明路线的。

三，整风开始只提博古路线没提王明路线的原因

从1941年“九月会议”到1943年“九月会议”，提到第三次“左”倾，一般只称博古路线，还无王明路线之说。这一历史事实前面已多次提及，并引证了王明自己的说法，即他在1944年3月7日通过苏联驻延人员给季米特洛夫密电中的反应。[34]就是说，延安整风不但开头，而且整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以王明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但是建国后修改的《历史决议》、一些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以及各种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党史著作的提法，就都冠上了王明的名字，如“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35]“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36]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37]“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38]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胆是这些廉洁的流传，却在党史上造成这样一种定论，即延安整风一开始就是以王明为主要对象的。这种把事后的认识和说法当成早先的结论，在党史上实在不少，因此对这个路线的提出和改变也有多说几句的必要。

对于整风开始只提博古路线而未提王明路线，还可再举以下几件事例加以证明。

一是上面提到过的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写的“九篇文章”初始稿题目为“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内容中加上王明的名字，则是1943年“九月会议”后的修改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介绍“九篇文章”时，了把“前后作了好几次修改”的稿件搅在一起，开头就不实事求是地说成是毛“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后面更一再提到“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集中揭露了以王明为赌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性质及危害等”，“‘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批判，”等等，这就和他介绍“九篇文章”的初稿题目相矛盾。可见介绍的内容只能是1943年修改后的稿件。[39]

二是毛为政治局起草的“历史草案”，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始于“九一八事变”，这正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上台之后。“历史草案”开宗明义还指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40]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博古为代表而不是王明，因王明这时已出国。毛泽东1942年2月21日同王稼祥覆电周恩来，仍坚持对过去路线这种分期的看法。电文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41]直到1943年1月，“任弼时在大会（指西北局高干会）的讲话中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党内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42]

三是从1941年“九月会议”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的头一阶段，对王明的批判基本上还限于抗战初期的右倾问题，并没有同第三次“左”倾相联系。而

且，不单是从博古路线变成王明路线有一个过程，就是王明抗战初期的几个非路线的原则的错误，升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升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到"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敌人的危险"，也都是经过了好长的时间。

整风开始，毛泽东把第三次"左"倾路线命名为博古路线，其实这一定性倒是比较准确和切题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时候，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王明等已离开上海，由他们二人指定并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执行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博古这时只有二十四岁，既未做过多少实际工作，又未担负过什么实际领导（此时还不是中央委员，只做了几个月的团中央书记），其水平可想而知。[43]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还批评说，此人比较刚愎，又比较懒（不大看材料），但却分工起草对下的指示文件，因此毛泽东批的"九篇文章"中就以他的为最多。其次，博古临时中央对毛泽东采取了压制和排挤态度，如批准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先后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剥夺毛的党权和军权，只让他去后方作没有太大权力的苏维埃工作（后来他干脆请假养病）。第三，博古一进苏区就掀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让李维汉查组织、追后台，目的在于把毛泽东给套进来。而且后来还想送毛泽东去苏联养病和在五中全会上去掉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因国际不同意而未果。第四，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极左政策、加上打仗又全靠李德的瞎指挥，因而导致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仓皇长征。而且直到遵义会议，博古还不承认错误。第五，组织上违背集体领导、搞家长制，后来更"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44]

当然博古标明的是执行国际政策，但实际上他在有些地方比共产国际还"左"。当1932年后法西斯威胁增长，国际政策已开始调整时，中国党的政策还是继续向"左"倾。所有这些，就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来博古也是完全承担责任。他在七大的发言中检讨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45]毛泽东直接受博古压制，受气数年，对他的意见也最大。所以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斗争矛头已主要移向王明时，毛泽东也并未放松博古。1943年9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46]而且直到最后也还把博古放在同志圈外。1943年12月28日以政治局名义发给各地党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47]这时不但参加高级班学习的不少人提出王明、博古是党外问题，而且中央文件也不以同志相称了。能否保住党籍已成问题。《博古传》中也说，"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48]如果说，王明是由于态度不好引起公愤，而且还有个国际背景和历史问题（被捕过），那么博古恐怕就完全是由于博古路线了。毛泽东对那几年受他的气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四，清算第三次“左”倾为什么迟迟未针对王明

现在几乎一切党史著作，在讲到延安整风时，都说是为了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或者简称“王明路线”），肃清它的影响。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不但全党普遍整风中始终没有提到过王明，就是政治局整风也是最后才提到他的“左”倾错误问题，而且提得比较笼统。这大概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不能排除有共产国际的因素。这点下面再说。现在先谈直接有关的几点。

（一）对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路线的估计

1941年“九月会议”认定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看法大约一直保持到1943年的第二次“九月会议”开始。既然如此，也就不用特意去清算王明在四中全会前后的帐了。及至“九一八事变”后犯了路线错误，这时他已离开中央去当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了。对四中全会看法的根本改变，是第二次“九月会议”蹭。在康生作批判《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而作的煽动发言后，毛泽东才提到，“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49]直到1945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才正式通过决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50]至于毛泽东在1943年“九月会议”讲“两个宗派”的发言中，把四中全会说成是“篡党”、“夺权”，则明显带有偏激情绪，前后也有点矛盾。如前面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了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接着又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51]既然四中全会后才有这个“宗派”，而且头子是博古，那王明怎么能成为“最主要的”？还有刘少奇批判四中全会的发言中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52]也显得“左”得过火。本来，我们在前面对四中全会已经谈过一些看法，但鉴于有关的偏激之说至今在党史界仍占统治地位，例如胡乔木就坚持“四中全会是夺权”，[53]所以这里还得再谈两点。一是四中全会从召开到定调都是米夫一手操纵的。米夫既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而来，从政策路线到重要人事安排，恐怕他不但需要秉承国际意志，还得照顾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意见。例如他是奉命冲着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来召开四中全会和改组中央的。但情况却是，“大会对‘周恩来应退出政治局’的提案单独交付表决。18人不同意，6人同意，提案被否决，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也不能不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54]另一方面，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员必须“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55]所以李维汉说，米夫来到中国，说王明等人是正确的，“政治局同志的态度就都转变了”。[56]既执行国际指示又服从多数意见的四中全会，怎么能说成是“篡党”、“夺权”，夺谁的权？二是上文已讲过，四中全会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完全抹煞，因为毛泽东在“历史草案”中指出的那些“主要的根本的方面”依然存在。即以组织而论，在选出的九个政治局委员和七个候补委员中，至今明确说成“教条宗

派”的好像也只有王明一人。而且国际远东局提出选他为候补常委，还因周恩来的建议而没弄成，仍然让他只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央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和候补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六人中，连一个“教条宗派”中的人也没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王明这么一个角色，只进了政治局和代替刘少奇任江苏省委书记，竟单枪匹马地一下子篡了党，迅速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宗派”中央，不知其它十多个人是否和为什么会那样盲目地跟他走。而且控制了中央码头的这个宗派也没有将该派的积极分子博古、王稼祥等补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反而除王明外补选了刘少奇等四个不属于该派的人为中央委员，刘少奇还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也继续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57]这样一个中央组成，怎么能说成是“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毛泽东语）？这是否过分夸大了王明的能量而抹煞了其它中央领导成员的作用？如果没有四中全会，刘少奇怎么能当成中央委员，还和毛泽东一起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又怎么能算成“罪恶”？

（二）内战后期毛泽东受排挤不是王明之过

在内战后期，毛泽东曾直接受博古的压制和排挤，同王明并没有什么历史纠葛，而且还得到过王明一定的支持和保护。毛泽东记怨也记恩，既容易感情用事，也善于藏而不露，所以对王明回国后一年的某些作为，他也能照顾到当时的形势和王明的身份，采取温和态度。现在许多党史著作上说，内战时期毛泽东如何受到王明路线甚至王明的打击，其实都只是空洞的言词而列举不出什么事实。王明经过四中全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那几个月的工作重点还在江苏省委（曾有一阵称江南省委），特别是在上海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和进行人事改组。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又过了两个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已无法在上海工作。王明就乘机要求也获准去共产国际当中共代表团长。他和毛泽东从没见过面，互相并不了解，在这一短时间里也无工作上的联系（四中全会后苏区工作分工由周恩来管）。王明到莫斯科后虽然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也就是国际的路线），但没有见到他反对毛泽东的事例和言行。李维汉几十年后还特别提到他在莫斯科期间没听王明说过毛泽东搞右倾机会主义。[58]在工作上，王明上有国际的节制，对国内也只能通过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怎么可能远在莫斯科搞出一条“王明路线”？而且事实上，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一般都知道总书记博古，却很少人知道还有个王明。我们在前文中就曾举例说，连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的罗瑞卿都没听说过王明。更应强调的是，王明同博古的关系和对毛泽东的态度后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起初他支持博古中央及其对毛泽东的批评。但从1933年国际开始调整政策起，他因近水楼台，又感觉敏锐，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则既闭塞，又刚愎，反而落到后面。所以此后两人就开始出现政策上的分歧。王明不但在同康生发给国内的电报或信函中，而且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批评博古中央在土地、富农、工商、劳动等政策上的过左倾向。

另一方面，王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下，从1934年起改而对毛泽东采取了某种支持和保护的态度。例如1934年4月20日王康（王明和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的“严重弱点”，实际上促使反“罗明

路线”停了下来；以及同年8月2日王康致函中央，批评五中全会的某些问题等。[59]共产国际反对把毛泽东排挤出军事领导和送他到苏联养病，以及对五中全会撤掉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不满等，都是王明传递的。[60]而且王明还在一些场合突出宣传毛泽东，如在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的发言中，赞扬毛泽东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在他列举的中共领导人名单中也把毛泽东排名第一，博古反倒排为第十二。在党的战略转变中，王明更是中共领导层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人。所以毛泽东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猛批“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中提到王明时也说“八一宣言还能考虑”。[61]这些都说明，第三次“左”倾亦即博古路线时期，功过相抵，王明没有太大辫子可抓。他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1937年回国以后，即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那人所共知的右倾和对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但还是对他采取了温和甚至保护的态度。例如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王明作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作结论时仍然说，“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62]就是1941年“九月会议”上层整风开始，集中清算第三次“左”倾（后来党史上通称王明路线）时，受批判和作检查的主要还是博古、张闻天、李维汉等人。王明不但未受到多大冲击，他在发言中反而以正确自居。毛泽东这时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是检查抗战初期的右倾问题。在王明倒打一耙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只算抗战初期的账，宣布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在准备的《讲话大纲》中，“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63]此后就没有再多谈王明的问题，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可见，整风头两年，不但没有人提出王明“左”倾路线，而且批判第三次“左”倾也都没有针对他。应该说，这绝不是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疏忽。

五，王明路线的出现和定型

在延安整风中，提到王明路线，只是1943年后且限于上层的路线斗争。至于中层以下，在整个整风过程中也没听说过王明路线这个词。向全党和公开提到，更是建国以后的事了。而且就是上层，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大批王明的时候，开始提的王明路线也并非后来党史著作中讲的王明“左”倾路线，还限于抗战初期的右倾，只是把1941年还说的“不是路线的错误”给他升级为路线错误就是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就对王明路线的批评来说，事实上早在7月中旬就已开始了。”这是指194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但也还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64]过了两天，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极为严厉地指名批判了王明，说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并提出警告，“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65]此后的发言，包括林伯渠、叶剑英、朱德、周恩来等，都按毛泽东定的基调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时，才“第一次在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右倾投降）路线”，并概括其特点为四条。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66]

这些情况都说明，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开始，对王明的批判虽已由“原则性的错误”升为“路线错误”，但都是指的抗战初期。而且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赌注中央正确路线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恐怕也不象后来分得那么清楚，否则为什么至今不能公开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的报告和毛泽东等人的发言，以及任弼时1938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大纲》（4月14日）和《补充说明》（5月17日）。至于苏维埃后期“左”倾的路线错误，名称从博古路线变为王明路线，又是稍后的事了。

根据现已公布和可以看到的文献，首先把王明推向犯第三次“左”倾路线前列的是康生。如前所述，第二次“九月会议”头三天，集中批判的还是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9月13日会议继续举行，康生第一个发言并提出新的问题。他说，“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6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评论这一发言，说它“显然含有严重错误”（如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并说“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68]前者姑置不论，“发生了较大影响”大概是事实，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有两点。一是他的发言实质上提出了王明“左”倾路线问题，纲领就是那本小册子。二是四中全会是错误的，第三次“左”倾不能从“九一八”算起，而应该从四中全会算起。几天后才是毛泽东着重谈“两个宗派”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中就提到我们上面认为不好理解的“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王明”，以及“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

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等。他在10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中更明确提出，“过去，王明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69]在此期间，周恩来、刘少奇等在发言中也都狠批王明的小册子，并彻底否定四中全会。及至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已正式提出“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同日以政治局名义发的指示，还特别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将“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等。[70]

从这些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短时期内，对党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评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次“左”倾从博古路线正式变成王明、博古路线，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从博古变成了王明（博古作第二遍检查时已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71]），四中全会从“基本正确”变为“只有罪恶”。这些变化起因于康生，所以毛泽东在事后很久还说，“四中全会的错误是康生同志发现的，不是我的功劳，四中全会决议归根到底是反右，不是反‘左’，是错误的。”[72]但是康生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恐怕绝不是他个人一时所想。有些延安时期的同志早就议论，根据康生的为人、他当时的地位与职务、他同毛泽东的工作与私人关系，以及休会几天和他发言完毛泽东接着讲等情况看，大概可以认为，他们两人事先进行过商议和讨论，康生的意见是先摸准后表达毛泽东的想法。这就使这位王明当年的追随者和得力助手变成了反王明的英雄。

六，博古路线为什么和怎样变成王明路线的

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受委托起草“历史草案”和他所写《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都对这条路线定名为“博古路线”，并有比较详细和具体的叙述。1943年“九月会议”后改名为“王明、博古路线”，但大体上还是原来的框架，时间也还是从博古上台后的1931年9月算起。毛泽东不但在早时起草的“历史草案”上说，“左”倾路线的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且1943年9月13日讲话也还是说，“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73]就都是指“九一八”以后。而这个时期，王明已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许多问题实际上和他沾不上边。1933年后他还在不少问题上批评博古的“左”。他宣传毛泽东，但却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王明换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就得有个说法，而这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共党内斗争中倒是很容易解决的。于是，就有了“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74]的定性，并强调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作用。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甚至说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在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那本小册子。[75]胡乔木也说，“历史问题决议对四中全会的说法，是同王明的那本小册子联在一起的。可以看决议，决议对四中全会本身并没有说什么，但它说这个会议批准了王明的那个代表党内‘左’倾思想的小册子。”[76]

改称王明路线就是因为那本小册子，问题也实在太简单化了。王明的小册子既未经中央会议通过，也没在作为正式文件下达，怎么就能起那样大的作用。难道王明路线的定名就只是因为那本并不出名的小册子？根据我自己在延安整风前后的所闻所见，那本小册子的名声和地位完全是同命名王明路线一起被人为地抬高的。现在一些党史著作还把延安整风、编印《六大以来》等问题或多或少地和那本小册子在延安的再版联系起来，大概也是从有意制造变成人云亦云，后学者只好信以为真了。即以四中全会的决议而论，那完全是米夫起草的。从时间上看，1930年9月举行三中全会，10月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指责立三错误是路线问题，批评三中全会搞“调和主义”。有人提前将来信内容透露给了王明。王明即根据国际来信的精神，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赶写出那本原题《两条路线》的小册子。[77]而且从整风前后的情况看，就是中央许多领导人阅读这本小册子也都是在1943年批判王明时的事（这是出自许多人发言时自己的表白），还没有看到哪个人说四中全会前看了这本书及所受的影响如何。也很难说米夫看过王明的小册子。即使看过，专为贯彻国际精神而来的代表，竟撇开国际十月来信，而批准一个据此赶写出的小册子，也实在说不大过去。所以连王明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叫“王明路线”。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奉命找王明谈话劝他检讨。第二天王明致信周恩来提到，即使假定四中全会决议为路线错误，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78]至于“王明路线”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文件上正式定名，因未作调查（只是近年来一些当年在延安的老同志谈起，都说整风时以至建国前都从未听说过“王明路线”这个名词），无法判断，但胡乔木讲的博古上台后仍称王明的三条理由，却并不足以服人。[79]

“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

小宗派。”[80]这里并未讲出王明是怎样把博古搞上台的。而毛泽东后来的提法却是，“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81]胡乔木自己的说法也是，“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组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82]实际情况大概只能是，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是由周恩来、王明同国际远东局一起商定提出名单，并报经国际批准的；或者本来就是国际（这时米夫主管东方部）的主张，国内领导人不能不服从，正像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拱手把苏区的领导权交给赤手空拳的博古一样。而且按胡乔木的说法，四中全会既为“王明一派人”所把持，米夫又是后台，那为什么没有把博古补选成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83]即使改变原来所说第三次“左”倾路线始于博古上台后，而按后来说的始于四中全会那会前写信反对三中全会也是博古和王明联名的，“一脉相承”又从何说起？“承”的是什么？另外，米夫在四中全会前即已来华，会后又留住几个月，前后都在直接指挥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执行的路线是继承国际代表米夫还是王明，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这更是源流颠倒、本末倒置。四中全会搞的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一套，王明正是根据这一套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写了那本小册子的，现在到了共产国际反而不执行国际的一套却在搞四中全会的一套，这能说得通吗？如果说两套本来就是一套，那这条理由就更站不住也毫无意思了，而且并不完全合乎实际。因为1933年后，博古在不少方面还受到王明的批评和指责。党史书上虽然通常对此不提，但总不能否认这是事实。

由此可见，胡乔木所提命名王明路线的三条理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有的党史著作，为了证明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的说法，还强调整风前王明作为理论家在延安名噪一时，受到一般干部的崇拜；还说理论是王明等留苏学生的“专业领地”，连毛泽东也“尽可能不去涉足”。其实，这些说法大多是以讹传讹或传抄中的夸张和臆造。事实上那几年正是毛泽东理论创作的高峰时期，写出的理论著作最多。当时党校及其它机关学校（例如我们抗大）的干部学员们普遍欢迎来作报告而且作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至于王明，既无什么理论著作，也没多少文章，六中全会前又很少留在延安，六中全会上已受到批判，怎么可能在延安名噪一时呢？他在1940年再版的那本小册子也并没引起多大注意。引起注意（也只是上层领导）还是1943年“九月会议”受到批判后的事。起码当时最大的学校抗大，在我们这些训练部从事理论教学的同事们中，并没有什么人把王明当作理论家崇拜。也许正是这些情况，加上是共产国际回来的人，使批判教条主义没有拿王明开刀，张闻天反倒首当其冲，王明竟还能落井下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王明列为错误路线的头子是因为他有野心，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连胡乔木也说，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84]这点也许有一定道理，但那只是一时的事，而且属于人们的猜测。因为王明一回来在十二月会议上提的名单就把毛泽东列为第一，并且针对毛的不安，还极力表明他“决无‘夺帅印’的意思”。照张国焘的观察，“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注：总书记）而代之的意

向”。[85]张闻天后来也感到王明“暗中打击他”。[86] 1937年回国后，王明确乎表现得不可一世，总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在“十二月会议”上唬住了大家，连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并作检讨，如说，“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87]会议不仅一致通过王明的报告，委托他起草“决议”，而且还决定王明作七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只作工作报告（六中全会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1940年，根据季米特洛夫意见，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1943年中央决定改为刘少奇）。[88]但斯大林和国际实际上并不支持王明（可能是一则看出王明不是当领袖的料，二则他在中国毫无基础），大约在他回国前的谈话中还作了交代。所以他虽然显得目空一切、派头很大，但终究未敢自封领袖，还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一定尊重和照顾（如“十二月会议”上的批评未点毛的名）。但是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特别是武汉时期的表现，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担心，以致说出这一时期“中央已名存实亡”这样偏激的话。不过这种担心到六中全会前夕就已基本解除，因为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领导要以毛泽东为首的谈话，从而使王明完全抢劫了竞争的资本，再加上他近一年的表现还引起领导层的普遍不满。王明倒也乖巧，随之迅速改变态度，不担拥护毛泽东为领袖，还成为中央领导层中称毛为“伟大的理论家”和号召学习毛泽东的第一人。从此，毛泽东就基本上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是博古、张闻天也不是整风的主要目标，首先拿他们开刀和狠批他们的教条主义只不过是为了造成声势以扫清统一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之下）的障碍和实现统一组织（领袖的绝对权威）、统一行动（领袖的令行禁止）。所以有的研究延安整风的书上直截了当地说，“可见，就整风运动的最初目标而言，毛泽东既不是针对已经躺倒的王明去的，也不是针对一般党员群众的，他的基本目标是那些手足有权的领导干部。”[89]

王明作为整风对象在1943年的迅速升级，即不仅抗战初期的右倾被上纲为路线错误，而且还被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衔者，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第一，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贪功诿过，已引起大家的不满，紧接着还自己跳出来公然反对中央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这年10月初，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针对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和皖南事变后准备和蒋介石破裂的倾向，提了15个措词严厉的问题。王明得知后，以为国际要和毛泽东摊牌，他可以乘机捞一把，于是在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中和第二天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都发表了全面反对中央现行路线的意见，批评党的方针过“左”，提新民主主义不妥，并决心与中央急诊到底，到共产国际打官司。后来由于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人员的揭露下，王明即称病不起，他的问题也就旆了。但他这一闹，却撕掉了拥护毛泽东的伪装，还把自己置于毛泽东和中央的对立面，特别是反对到毛泽东思想的要害新民主主义论，这在整风以后领导人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显然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问题只在于时机。

第二，他的态度不好，还搞小动作。从延安整风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者的表现和态度都是个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王明在这方面可说是表现最差，不仅对自己错误拒不检讨，倒打一耙；还私下串连，挑拨离间（这点最使毛泽东恼火）；以及向共产国际告洋状、求干

预等。其实毛对他本来还是相当宽容的，在很长时间，都是只要求他检查和交代抗战初期的错误。但他大概总以自己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且国际一定会为他撑腰（所以一见季米特洛夫上述电报，就反攻倒算）。殊不知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拥有政权、军队的大党，国际不能再像当年对波兰、朝鲜等小党那样，可以宣布解散，或任意更换领导。何况这时苏德战起，国际以反法西斯为么一要务，对中国党的事务也很难过多干涉。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对国际表示尊重，尽可能接受某些意见；另一方面在党内问题上，包括对王明，先还有所照顾，后来就不大客气了。结果就形成了顶牛局面。王明的态度越是转不过弯来，这边的批评就越厉害，上纲越高，王明也就越过不了关。不但整风后期是如此，就是整风结束后几乎每次中央会议他都要挨批。建国后好久，他的问题也没有结束，一直被揪住不放。可见中国党对检讨反省、认错“缴械”是多么地重视。所以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还做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同年10月26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又提出王明同志尚未按照中央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不久他也就籍口治病去了苏联。

第三，由于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顾虑大为减轻。毛泽东常说（有许多人还为之渲染），他长期和国际对抗。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毛对国际是一直很尊重的，如有意见分歧，多是他自觉或被迫放弃原来主张（如西安事变时的审蒋除蒋、皖南事变后的准备国共“根本决裂”和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等），转而执行国际（实为苏共）意见。[90]因此，整风期间处理一些问题，包括对四中全会和王明的看法，连胡乔木也说，“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91]这就是为什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年多以后才见报（并非胡乔木和一些党史学家所说是由于管宣传的人不重视）、以批教条主义开始的整风运动在苏德战争后才启动，等等。因此对于王明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因为王明不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国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是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运。对于这样一个来自国际的人，进行公开批判恐怕总得十分慎重，特别是批判内容还与国际有关。所以对1941年10月8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王稼祥等批评王明时引证几位国际领导人的话，毛泽东都特意叮嘱大家不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92]王明生病后一年多也没有再提他的问题。可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缅宣布解散了。此后毛泽东虽然还保有强烈的国际主义传统观念，也需要照顾和苏联的关系，但总有点像苏方联络员报告王明的估计，“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公了一口气。”某些“国际派”的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93]不管怎么说，国际解散后，在处理王明的问题上是可以比较放手得多了。毛泽东自己后来就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94]了。再加上皖南事变以后，毛泽东对国际的干涉和掣肘有所不满，这当然影响到以国际为后台的王明，更要把第三次“左”倾路线同他联系起来。事实证明，王明的担心和估计并非杞人忧天。如果不是后来情况有变，包括整风中的过火斗争和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已引起广大干群的不满，特别是季米特洛夫1943年底以“个人”名义来信，明确提到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等，王明到底会怎样处理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毛泽东第一次复电还说，“在我看来，王明是靠不住

的。”并提到他被捕过以及同米夫的可疑关系等。但第二次复电已改为党内团结的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95]此后，“毛泽东没有再提王明‘反党’问题。不久，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党内的问题。”[96]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特意让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排名在博古之前。

第四，是当时的气氛，即肃反和路线斗争、以及上下左右的互相影响。胡乔木说，“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当然这里康生起了关键的作用（引者按，这是党史界后来的普遍说法，事实上康生再坏也不可能起“关键的作用”。对此前面已作评论），但是，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97]胡乔木讲的“紧张”不知是什么意思，但根据我们下面干部的体会，就是整风中的过火斗争、无限上纲，进行围攻、强制检讨，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矛盾性质的转化。可以想象，一方面是从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敌特（这是普遍现象），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搞逼供信，大轰大嗡地进行“抢救”；另一方面怎么可能做到和风细雨，在民主的空气下清算路线错误。所以胡乔木也不能不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整风运动“很民主”；[98]一方面又说对毛泽东“很不恰当”的批评，“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99]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许多人提出了王明和博古是党外问题，而且王明还被捕过，他的恩师米夫已被苏联处决。上述各种因素，就使第二次“九月会议”对他的批判急剧升温，定性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第五，还有王明博古两人的不同表现和最后结局问题。本来毛泽东在苏区是直接受博古压制，所以对博古的气最大，但后来由于王明和博古表现极不相同，所以一大半气也就转到了王明身上。例如在整风期间，正像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时所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100]而博古呢，一方面对所犯错误（无论过去的路线错误，还是来自对当前工作的批评）进行虚心检讨，主动承担责任；一方面对分配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有些人说，整风后博古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长，连对当毛泽东秘书才一年多的胡乔木的领导（1942年凯丰生病，胡乔木奉命替代中宣部长[101]），也都能很适应。他对工作不讲价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因飞机失事牺牲，成为一位著名的“四八烈士”。正是由于后来的态度，人们对他多表谅解和同情。王明则不然，建国不久即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对他还比较照顾，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他却远托异乡，不思回国。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还参与反华活动，并于最后出版了一本反党的《中共五十年》，使他的面目彻底暴露。这样，一个成烈士，一个变叛徒，于是党史上的“王明、博古路线”就完全变成“王明路线”了，一般已很少再提博古的名字。由此可见，王明之成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衔者，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整风后的态度。如果他能进行深刻检讨，真诚拥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但历史不能假设，所以，结果王明路线还是成了个符号，许多与王明无关甚至王明不同意的事，也归之于王明路线并成了铁案。

七，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有没有个王明路线和什么是王明路线

讨论从博古路线到王明路线的问题，原是想探索什么是王明路线、为什么叫王明路线、王明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推行中究竟起了哪些足以和他名字联在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王明教条主义的具体内容，等等。但是说老实话，这些问题实在不容易弄清楚，结果仍然是以前的老印象，就是王明路线多半是个模糊概念，只能人云亦云。上面已经讲到，连胡乔木滑自相矛盾，一般党史工作者就更难说清了。因此，我以为把1931年到1934年的“左”倾路线定名为王明路线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总不能把一本既非正式文件，又没有多大影响和没有多少人看过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整风中在康生未提出前并无人提起，而且还肯定四中全会基本正确，都可证明）称作一条路线。何况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归之为王明路线显得实在牵强。如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02]其实，对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的态度，在苏区的许多过左政策，五中全会以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是很难挂在王明的名下的。

而且王明驻国际期间的作为也委复杂，除执行国际先“左”后有些右的错误政策外，也贯彻了1933年后经过不断调整的许多正确方针，如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起草了《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征得宋庆龄、马相伯、鲁迅等千余著名人士的签名）以及《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由于苏维埃后期的“左”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极大，所以称为博古路线或王明路线都不合理，最好还是恢复“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提法。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条路线并不是他们哪位的发明创造，挂上他们不管谁的名字都没有道理。毛泽东自己就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赤的。”[103]原来胡乔木说由于博古路线是从王明那里（主要是那本小册子）来的，所以改称王明路线。现在又说王明的两套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那是否又应改称“斯大林路线”了？当然，毛泽东也经常说，外国人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自己要照搬，又怨得谁人。可是不能忘记，中国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对国际必须绝对服从。否则，毛泽东为什么也要服从博古、李德，交出党权、军权，跟着长征呢？

（二）党内斗争和党史研究都应该讲科学

延安整风以来直到现在，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党内斗争不大讲科学，随意性很大，致使党史这门学科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违背事实、不讲原则、以人划线、因人而异、改来改去、前后矛盾。无怪乎一些人反映：党史教员觉得难讲，学生则是不愿意听。即以我们现在讨论的路线这个问题而论，就不像一个科学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倒像一个可以随意用来

惩办持不同意见者（有些是错误的，有些还是正确的）的工具，说不好听点就是用来整人的棍子或帽子。例如原来肯定四中全会基本正确时，曾逐条摆出几个“成功方面”；后来认为四中全会“只有罪恶”时，既没提出什么新的论据（只有一本王明小册子），也未否定那些“成功方面”，正确路线就一下变成了错误路线。对此，胡乔木还有所解释，说因为：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经过编《六大以来》，认识才有所提高，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等。[104]就算说得通，那第二次王明路线就很难解释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完全清楚，中间并无重大发现，怎么1941年说的几个原则性错误，还特别注明不是路线错误，到了1943年就一下子变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次变化，连胡乔木也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毛泽东不仅讲武汉时期王明是路线错误，而且还提到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又一次篡权。[105]现在恐怕很难找出有几个党史学家敢于和能讲出武汉时期参与王明宗派版权和犯路线错误的都有些什么人。我曾听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一次路线错误，但这是个人崇拜和以人划线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大恰当的。这是一桩冤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已基本上给平了反。正是由于延安整风以来特别强调路线斗争，又搞乱了路线斗争，所以就使此后的党内斗争经常是非混淆，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给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不应在党史中继续制造个人崇拜

现在继续在党史中加深和制造个人崇拜，对国家对科学发展都是很不利的。延安整风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制造个人崇拜，而且把这变成一个原则问题，党史叙述只能以此为准，至于是否合乎事实倒在其次。以我们这里讨论的同王明的斗争为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基于王明的恶劣态度，为了对他进行帮助，（1941年）10月7日，毛主席偕同稼祥、弼时，找王明谈话。”[106]照抄的就更多了，如：“为了对王明进行帮助，10月7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找王明谈话。”[107]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严厉责问的电报后，10月4日毛将电报交王明请他考虑如何答复。“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委米特洛夫复电时，他向毛泽东提出一连串责难。”[108]另一本书上的说法是，“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和王明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109]究竟毛泽东等去找王明，是为了“帮助他”，还是为“商量回电”，人们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其它许多党史著作为什么要那样写？是作者真从研究史实中得出的结论，还是有意要改变史实，了解情况者大概也是心里明白的。又如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明明是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一再电中央书记处建议召开的；会议两项议程（抗战问题和准备七大）的建议，也是王、周、博电书记处同时商其它政治局委员提出的；为了不拖延时日能开成会，他们三人又向书记处提议会期为两天。[110]但是正式的党史上却是这样写的：“王明（按：其余二人不知是作者们奉命还是自作主张地删去了）不但在内颐指气使，而且也不尊重在延安的党中央，例如他以通知性的口吻致电延安，单独决定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二天。”[111]这种叙述总不能说是实事求

是的吧，这样编写出来的党史恐怕不能说是信史。然而这类事例在党史著作中可说不胜枚举。大约可以说，党史书上之所以那样写，为的是进一步拔高崇拜对象和矮化批判对象。

（四）对党史教科书应进行实事求是的修正

最后，历史问题能不能根据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实事求是的修正，还是只能如陈云说的“一锤子敲定”，[112]后人不能再动了？这从学术上讲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否则要历史研究干什么。然而在实际中却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结论与评价，大约只能重复已有的论断和提法，有所修正就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党史的著作，大多是抄来抄去或作点通俗化的工作，很少看到有新的发掘和突破。长此以往，党史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是繁荣不起来的。以我们现在讨论的路线斗争问题来说，就很值得重新进行研究和修正，突破那些出于一时的利害得失考虑而设置的条条框框。例如为了要整倒所谓“教条宗派”，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已事过十多年，也还要提倡进行彻底揭发和批判；但对于涉及领袖和与我们切身有关的大问题，才过去不久（如“文化大革命”），就主张“宜粗不宜细”，从逐渐淡化到停止讨论。这就前后太不一致了。而且这种“一锤子敲定”和“宜粗不宜细”等原则，是适用于一时（说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还是应贯穿整个党史？是只适用于毛泽东，还是同样适用于其它人？这能不能作点明确的规定，使党史研究者心里有个准头。另外，对历史研究是否也得实行“人治”，即领导人一句话就可把多年的史实推翻。例如，博古、张闻天当过总书记，全国上下（书上、报上、课堂上）讲了几十年，但到1982年陈云一句话，从此总书记又在全国上下变成了“负总责”。把中共党史上的路线斗争夸张成十多次固然显得太滥，但说建国后一次路线斗争都没发生过，能说得过去吗？又如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共产国际或它的代表，那么能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重新定性和必要平反？总之，延安整风强调路线斗争，也正是从此以后路线斗争搞得越来越乱。整风期间，毛泽东讥笑“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老爷们”，说“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113]可惜，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和全党仍然没有弄懂路线斗争，吃了“乱斗法”的更大的亏。所以说，党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很需要进行研究并加以清理，真正弄懂什么是路线和路线斗争，也还历史以真面目。

注释

[1]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42页。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8，193页。
[3]参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61，162，163页。
[5]见王元化：《九十年代笔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40页。

[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页。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版，第232页。
[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10]《遵义会议文献》，第79-80页。
[1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7页。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13]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43页。
[14]《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第153-154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第24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
[17]《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59页。
[1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001年版，第129，158页。另参阅《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弗·培根：《新工具》第一卷，关琪桐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9页。
[21]《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张闻天）的一封信》，见《六大以来》，第806，805页。
[22]以上分别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190-191，193页。
[2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2-163页。
[24]《张闻天文集》（二），第163页。
[25]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26]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102页。此书对《九篇文章》内容介绍较多。
[2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3页。
[2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3页。
[2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8页。
[3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6页。
[3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3，214页。
[32]见该书第100页。
[33]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5页。
[34]见前引《〈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3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2，963页。如前所述，《决议》中点名是建国后出版《毛选》时修改加上的。
[36]毛泽东在1943年“九月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3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8页。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001年版，第70页。
[39]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2-232页。
[40]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页。
[4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5页。
[42]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10页。
[43]参阅《博古传》。
[44]毛泽东语，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45]《遵义会议文献》，第104页。
[46]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整风五十周年》，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47]转引自《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82页。
[48]《博古传》，第453页。
[4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70页。
[5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3页。
[5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7页。
[52]《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65页。
[5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9页。
[54]《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21页。
[55]《六大以来》（下），第1页。
[5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23页。

[57]有关四中全会的情况，参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00-201页；《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19-421页；《周恩来传》（一），第275-285页。
[58]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35页。
[59]分别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226-227页。
[60]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9-20页。
[6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62] 1938年11月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520页。
[63]《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633-63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2页。另见《延安整风实录》，第86页；《任弼时年谱》，第410-411页。
[64]见该书第282-283页。
[65]《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56-257页。
[6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75页。
[6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5页。
[68]见该书第286页。
[69]《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60-261页。
[70]《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62-282页。
[7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5页。
[72] 1965年毛泽东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谈话。
[7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287页。
[7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7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2，394页。
[7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4-75页。
[77]《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第138页；李维汉：《王明其人其事》，《炎黄春秋》2004年第11期。
[78]《王明评传》，第407-408页。
[7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8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8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8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
[83]这里引证的三条理由均出自胡乔木的同一次谈话，故不再另注。
[8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8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5页。
[86]见前引张闻天《反省笔记》。
[87]《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507页。
[8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89]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页。
[90]参阅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文献88-110页。
[9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
[92]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7页。
[93]转引自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6页。
[94] 1956年9月29日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参阅《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21页。
[95]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2页。
[96]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18页。
[9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
[9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8页。
[9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8页。
[10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101]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21页。
[10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页。
[103]《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10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215-217页。

[10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287，294页。
[106]见该书么199页。
[107]《延安整风实录》，第83页。
[108]李东朝：《王明到达延安之后》，载《百年潮》2001年第11期。另见《任弼时年谱》，第409页。“10月4日”为王明《中共五十年》第37页所记。《任弼时年谱》上写为，“日前，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交给王明看，征求他对如何复电的意见。”
[109]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1页。
[11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3，404页；王玉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991年版，第519页。
[11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5页。
[11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45页。

[（2002年3月15日完稿）

第十五篇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

一，什么是个人崇拜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什么是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已谈论了整五十年，几乎早已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现在还来谈它似乎有点多余。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来就有分歧，认识并没统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却并未吸取教训，以致至今造神造假运动还盛行不衰，因此仍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

什么是个人崇拜？1999年版《辞海》的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应该说，这一定义并没有错，只是后面的释文不尽完善。如说"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它作为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dcccxli]就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被剥削阶级也在利用，如农民起义。而且如果以过去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那么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反倒表明，这些无产阶级国家吃个人崇拜的亏要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这既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对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包括各国内部的个人崇拜，即推出一个崇拜对象，由他实行专制独裁和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崇拜，既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还更多地体现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在党史研究中被实际上列为禁区的原因。

（二）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是个外来语，一个时期也被译成个人迷信。因为这里的崇拜（cult），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崇拜，如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而是指对崇拜对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此外还有巫术治病、会道门、邪教等含义，所以译成个人迷信也许更确切些。[dcccxlii]但是个人崇拜已被长期普遍使用，这里也就只好从众了。只是要指出，在中文上，个人崇拜似乎轻一些，个人迷信则严重得多，于是就可随政治上的需要而选用。例如在讨论和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领袖形象，胡乔木就特别提出，"决议稿中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dcccxliii]含义有什么不同，他没有说。至于"马克思的原话"，则是个翻译问题，如果最初翻译成个人迷信，个人迷信也就是马克思的原话了。因为马克思不懂汉语，而在英、德、俄等外文中并没有汉语中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这样两个平行的可以互换的词组，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有时用这个，有时用那个，有的是由于不大经心，有的则是出于政治需要，但译成外文却总是一个。

据我所知，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的提法盛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由苏联传到中国的。1951-1955年我在驻苏联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对当

时的情况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同年7月后即已公开批判和反对在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了。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及时注意到这一动向，随即由萧扬执笔写了一篇《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被中宣部摘登于翌年的《宣教动态》第三、四期上。此后研究室又连续就苏联舆论大反个人崇拜的问题向国内写了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有几份还由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署名报送党中央。这就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毛泽东也在1954年4月28日就《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一文作了批示。[dcccxliv]刘少奇还据此批定，以中央文件或中办文件的形式印发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从此，中国的报刊也就开始谈论起个人崇拜的问题了。应当说明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将俄文的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译作个人崇拜。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用的也是个人崇拜。[dcccxlv]但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公开的同年，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再论》系胡乔木起草[dcccxlvi]），直到1963年9月写的《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时，却都用的是个人迷信。由此可见，对斯大林就用个人迷信，对毛泽东只能改用个人崇拜。虽然显得亲疏不同，在中文里变换用法，但实际上两者的含义并没有胡乔木说的有什么不同。这也反映了即使在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也还保留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

（三）个人崇拜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为了给个人崇拜辩护，也就是维护对自己的崇拜，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理论”，并把谈“个人崇拜”时只有贬义的“崇拜”和该词另一方面的含义——尊敬、信仰、服从等混淆在一起，[dcccxlvii]还公开声称：“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dcccxlviii]这一提法的完全错误，现在已经无须多说了，因为当年的宣传和实践就已得到充分证明。其实从延安整风以后，个人崇拜就既已先在党的领导层，建国后更在全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只是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才进一步公开为个人崇拜“正名”。例如个人崇拜积极制造者之一的陈伯达，在听了毛的插话后立即说，“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dcccxlix]而作为封疆大吏的柯庆施和陶铸等，在发言中对毛泽东竟提出当年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口号，只是把“蒋总裁”换成了“毛主席”，说成“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胡乔木说，“这是成都会议上正式提的口号，当时就没人敢反对，提出者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李锐对这一提法不以为然，去向毛泽东反映，但毛却以“他们是有所指的”推开了去。[dcccl]正是在这个口号（迷信和盲从）下掀起的大跃进和反右倾，使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三四千万人这样的空前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也证明了个人崇拜是正确的这一“理论”的荒谬。现在虽然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还颇盛行，但敢于说个人崇拜完全正确的人却已经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了。

（四）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个人崇拜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毛泽东曾经推行个人崇拜，这在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已是铁板上钉钉子，没人能否认的了。但是有关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为害程度和起于何时，却存在巨大争论。而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又是一回事，说时间短些，无非是要将它的为害程度减轻一些。所以关键还是个时间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最权威的当属中央决议上的说法了，正式的党史教科书自然不会越雷池一步。

关于个人崇拜开始的时间，中央决议上的提法虽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后。它在讲到“文革”前十年的党史时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dcccli]既然“这个时期”才“逐步发展”，可见以前是没有的。于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并且是逐渐地开始）于1956或1957年就在党史界占据主流地位。全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和多数民间的党史著述，都持此说。其中不少还断然否定在这之前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相反，至今有些书籍和文章还在大讲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和民主作风。[dccclii]根据无非是毛泽东的一些言论和一时还允许其它领导人提不同意见。或者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表面，而不知就里，即不了解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些，下边我们还要专门讨论，这里先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关于所谓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dcccliii]对此，这方面的权威胡乔木却说，“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dcccliv]其实不只苏联如此，整个国际共运都是追随苏联的，而且早已发生开除和批判南斯拉夫铁托的先例。自认是中国的斯大林和想在国际共运中占据显赫地位的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情况及其后果，所以才使他产生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用语的想法。他在1950年8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二卷时，就正式建议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这些“修改”中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的用语一律删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分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dccclv]（这也间接证明，那种说延安整风是整斯大林的风，毛泽东和斯大林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是并不真实的。）可见，“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出于毛泽东本人的“顾虑”，他并未“力排”实际上不曾存在的“众议”。

至于毛泽东建国后是否“谦虚谨慎”、“率先垂范”，[dccclvi]这方面从主要以个人意志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改变态度表示支持）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支持朝鲜战争、放弃《共同纲领》、实行“穷过渡”（从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事例看，回答都是基本上否定的，下面再说。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即可见一斑。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毛泽东自己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一条[dccclvii]（正式发布时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dccclviii]）。二是1953年9月，毛泽东以党和国家主席之尊，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对民主人士梁漱溟批评革命胜利后“忘掉”了农村、不重视提高农民地位和改善农民生活的意见，多次进行近乎破口大骂的所谓批判，并对梁的意见正式表

示，“我声明，确是‘拒谏’。”dccclix这是人所尽知的事。从实际情况看，正是靠农民运动起家，并在同梁漱溟的论战中自称“代表农民”的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特别是户口制的办法，把农民定死在土地上，变成不能进城的二等国民，制造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阻碍现代文明重要条件之一的城市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等社会目标。这一切所造成的恶果早已越来越明显。从三十年后梁漱溟带有自责性的话——“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看来，他的“雅量”倒要比毛泽东高得多。单就这两件事而言，能说毛泽东建国初期如何“谦虚谨慎、率先垂范”吗？

还有些人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的甚至说只是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闹的。这本身已属个人崇拜，所以就不一定要专门提出来讨论了。

那么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呢？寻根溯源，查证找据，还只能定在延安整风。

（五）个人崇拜的标志和条件

关于个人崇拜起始时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个如何界定个人崇拜的标准问题。

由于个人崇拜的研究属于禁区，所以看到国内这方面的材料不多，有些谈及这个问题的著述，也大多说不清楚。例如有所谓《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dccclx但并未回答何时“走向”、“走下”和怎样才算“走向”、“走下”的问题。新近故去的党史专家冯建辉写了一本《走出个人崇拜》的书（河南人民出版社），认为在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是到六十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后来牧惠就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如何“走出“？》的文章，dccclxi不同意这一说法，但却承认这是“头一本探讨这类问题的书”。这既说明国内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说明至今还未明确个人崇拜的标志问题。

至于国外有关个人崇拜的研究，倒很活跃，说法也很多。最近墨西哥一个刊物发表了一篇《领袖的真实与神话》的文章，说他们“研究了学术与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领袖的350种理论……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有关领袖的一些最普遍的神话。”dccclxii实际上这也多是谈个人崇拜的。我们既无可能看那么多的外国材料，即使看到的一些谈论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材料，也觉得不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因为国际共运和中国当代的个人崇拜，固然同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或至今还存在的个人崇拜有许多共同点，但又有它们自己的特征，这同它信奉或宣布信奉马、恩、列、斯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对这些理论不大了解、又缺少档案可查且无实践体会的人，是不大容易研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中的某些奥妙的。这也是一些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研究者总是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虽然从小就开始作一点理论方面的工作，但多属一知半解，而且对党史又远非内行，所以下面试图归纳的几条个人崇拜的标志或突出特点，只能是管窥蠡测之见，提出来供批判和讨论而已。在我看来，这些标志主要有或必须具备如下几条。

一是对领袖的神化、迷信、盲从和狂热追随。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

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就要把崇拜对象宣传得一贯正确、无比英明和伟大，还要为他隐恶扬善、伪造历史、贪人之功、诿他之过、拔高领袖、矮化他人，等等。

二是崇拜对象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实际上所谓个人崇拜就是个人权力的崇拜。权力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基础，小权可造成小崇拜，大权能造成大的崇拜，没权就都闹不成，如同汉朝的刘盆子和伪满的溥仪，只能充当傀儡。共产党里的崇拜对象，必须拥有最高的党、政、军权，特别是人事权，对一切人（主要是干部）可以任免奖惩以至生杀予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礼记》上说的“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使臣民把信服和畏惧结合成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定式。否则，光有天大的本领也是难以成为崇拜对象的。

三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个人崇拜不仅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只能限于口头。因为个人崇拜归根结底表现为体制问题，实即政治上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朕即党、朕即国家。作为党国领袖，可以独断专行，让整个社会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转。他的想法和行为不讲法度，无规矩可循，使其它领导干部以揣摩他的意图为第一要务，群众则无论志愿还是随大溜，都只能盲目跟着走。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禁止言论自由、取消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规章制度如党章、宪法，以及有关决定、指示以至领袖讲话，必须学习和执行，不准自由讨论和提不同意见。建立个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至制造群众的愚昧，因而不重视发展教育，不普及科学，轻视知识分子和提倡少读书以至不读书，遍设禁区和各方面特别是领导活动的严格保密。很明显，如果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素质得到提高，民主意识（当家作主的要求）增强，了解领导的活动和国家大事，个人崇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试想，在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当人们知道领导人一面在大造豪华别墅等奢侈情况和弄虚作假，一面则宣传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他们会有何感想？如果群众洞悉领导者的政治活动以至家庭、亲属的生活情况，他们会心悦诚服吗？回到本题上来说，如果延安整风的一切档案都公之于世，允许自由讨论，那对这一运动的许多传统说法就会立即动摇，人们的神圣感就会大为减弱以至失落。可见，个人崇拜是建筑在多数群众的愚昧无知和当权者实行愚民政策、不按列宁强调的公开性（即现在流行说的透明度）办事等制度上的。

五是允许和鼓励各种迷信言行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宣传和仪式。例如喊“万岁”、“万寿无疆”、“人民大救星”等口号；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宣传没有大救星，“中国人民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云；或者学了领袖思想甚至只是语录，人们立刻就可创造出奇迹，实现各种发明创造等；进行一些宗教式的活动，如广修庙宇（名曰纪念馆之类）、圣地朝拜，更不用说早请示晚汇报及其它弄神弄鬼的事了。

六是还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结合，包括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政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各级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传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严格的等级制和法定及非法定的特权制，等等。

关于个人崇拜的标准和条件，还可举出一些。上面所列几点，也不一定完备，甚至还相互重叠，但这都不妨碍我们对个人崇拜的定性和研究。关于上引墨西哥刊物对领袖神话的概括中有：领袖是天生的天才人物、领袖有常

人没有的超凡本领和魅力、领袖可控制和操作一切等等，在中国也是并不例外的。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延安整风不但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正式开始，而且为中国党的个人崇拜体制奠定了牢固基础。

二，延安整风中个人崇拜的重要表现

（一）打破了中国党不突出个人的优良传统

前面说过，中国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所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从1940年起就开始被打破了，后经整风即被彻底抛弃。例如关于谁是党的领袖，经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已经确定，但并不巩固，也未公开，在延安讲演或见报，和其它书记处成员一样，一律称为党的领袖之一。所以连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1942年听陈云报告时说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还觉得"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dccclxiii]但实际上，从1940年起情况就在逐渐发生变化。这一年不但成立了以陈云为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规定了"泽东日"，更重要的是从此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且不断升温。首先开篇的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演《学习毛泽东》，经毛看过发表在几天后的《新中华报》上。文中除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外，还第一次给毛加上了"伟大的理论家"的头衔。[dccclxiv]此后，宣传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和新闻就日渐增多。在这方面较活跃的是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已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一个月后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dccclxv]。此后即被调为毛泽东的个人秘书。1942年2月18和19日的《解放日报》，又连载了他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一步谈到"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同年7月1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着文论及"毛泽东主义"。总之，从1940年打破不突出个人的传统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已日益普遍起来。在这些宣传中，后来人们常用的领袖、导师、舵手等称呼和一贯正确及其它夸功掩过的阿谀之辞已不断出现，使个人崇拜的趋势开始形成潮流。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既然在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皇权主义传统和国际影响下制造起个人崇拜。这有很大的必然性。

（二）独断专行、以人划线得到党内上下的认同并走向合法化

如果按照建党原则和党章规定，延安整风是不合法的，只是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中国党的独断专行、以人划线和个人说了算奠定了基础。

第一，发动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个人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没听说这一报告事先经过什么形式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三四年的大事，理应由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一次）讨论决定，起码也应通过中央全会，何况按当时情况（大多数七大代表和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都集中延安），举行这样两个会议可说易如反掌。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不管有无这个权力，有些重大问题没经过它们（如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没说是代表政治局或书记处，而是"我主张"），有些

即使经过也是限于形式，仅用其名义而已（整风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实际上均陷于瘫痪，于是指定了个如同“文革小组”式的总学委）。所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一再说“毛主席认为”（而不是党中央“认为”），进行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等等。[dccclxvi]整个整风运动的部署、变化，如学文件、写笔记、查历史、搞抢救等，无一不是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因此应该肯定，整风和抢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具体领导的。

第二，党的七大一拖再拖，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三到五年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不但违背党章党规、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论过去十年内战的问题”的指示，[dccclxvii]也违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有关决定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原因只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dccclxviii]这就是说，七大的开不开、何时开，不决定于中央全会或大会筹委会，而是个人说了算，他认为要什么时候开就只能什么时候开。

第三，违背党规和党纪的不正常组织设置和以对毛泽东态度为标准的人事安排。这方面事实太多，真可谓不胜枚举。例如设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总学委会，并下设垂直系统，由延安派向各地的“钦差大臣满天飞”。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彭真，主管作为全党高干整风重点的中央党校，取代政治局委员陈云做了中组部长，还负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列席政治局、书记处等所有中央会议。原在中央无任何地位的高岗一下成了西北局书记，和彭真一样成为总学委成员和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列席各种中央会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专门从苏北调回延安的刘少奇，在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dccclxix]这就是说，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也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另一方面，政治局委员、原组织部长陈云，却只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和王稼祥，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dccclxx]张闻天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说一直未曾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历史、进行检查，也未担任整风中的任何重要职务。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七大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著名将领陈赓提出，薄一波是从监狱办手续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建议从候选人名单中去掉。反映给毛泽东。毛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此说向各代表团作了传达，薄一波反而改为正式中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dccclxxi]这都说明，延安整风和从此以后，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是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排队的，紧跟的就正确，意见不同的就错误。

第四，在组织上除有一元化的决定外，还做出授予毛泽东有独断专行特权的安排。这就是1943年3月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说是大政方针在政治局，这里的最后决定权只涉及日常工作，实际上此后哪些大事不都是毛泽东干纲独断？刘少奇这一

旨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建议，不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直接违反四年多前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dccclxxii]为党内的独断专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全党服从于一人，正式开创了个人崇拜即个人独断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是平等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如果遇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在某一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时，总是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跟着毛泽东走。这就是为什么建国后当毛泽东对大家有所不满，带着党章和宪法来参加会，说是要维护他的发言权，把大家训了一顿，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顶撞；而当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拿着宪法，声称他是国家主席，以此对抗造反派的批斗，却丝毫未起作用，终于作了他参与创建的个人崇拜体制下的牺牲品。所以陈云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意为敢于提不同意见），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仍然不可能。“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dccclxxiii]

至于刘少奇在生命的最后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从来的历史都是统治集团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老早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dccclxxiv]例如现在，国史、党史、领导人的传记，都是党和国家设的专门机构在写，连减少以至取消禁区、进行不同意见的争鸣，具体到设一个“文革展览馆”让人民参观，都不允许，哪儿还谈得上人民写历史？

（三）整风中的蒙昧主义

王若水在一篇题为《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提到，“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dccclxxv]其实这一流传极广的论断是并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以讹传讹。延安整风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前面的笔记中已多有说明，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一再申明自己忠于国际和执行国际的指示。因为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共和斯大林，而《整风文献》中除中国党的材料外，主要就是斯大林（还有季米特洛夫）的材料，整风学习主要的也是斯大林的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代表）。你总不能说整风是在用斯大林的理论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吧？至于王明成为教条主义的代表，大约是建国后的党史编纂学才提出来的。参加普遍整风的人，不但在延安，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也没听说过有个王明路线。公开提出十年内战中的王明路线和王明为教条主义的代表，只是在编《毛选》时修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而且是逐渐定型的（1943年底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在极小范围提出的也是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dccclxxvi]）。整风开始后，在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还是向共产国际及时请示汇报的。而且看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际指示都是大多或基本上正确，特别是在纠正毛泽东某些“左”的错误和冒险倾向如制止国共破裂、缓和整风斗争、刹住抢救等上都起了积极作用。王若水以及其它许多人类似的看法，显然是受长期以来党史编纂学关于延安整风是清算王明路线、是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一多年以后才有、但并不确实的说法的影响。

关于延安整风并非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说不上启蒙，前面笔记中已作了专门说明。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延安整风实际上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这也许是《整风文献》根本不收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整风学习中不强调学马、恩著作，而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的原因之一。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马克思在回答他女儿的问题时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dccclxxvii]但整风学习中却强调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毛泽东说的，"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dccclxxviii]等，就都是绝对化的说法，只能信守不准怀疑。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事实上，如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就改为以《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延安的学校，也大多从1940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

整风还远离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书本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只要集中和纪律，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思想自由。因为知识多了，思想就会变得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思想简单些，容易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后来干脆说"书读的愈多愈蠢"、"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根子。从整风学习的文件内容和当时的实际作法以及事后的发展来看，整风就是要把革命队伍中的一切人培养成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这就是李维汉说的，"整风的主要收获是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dccclxxix]（指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老干部和此后参加革命的新干部）。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巩固地建立起来了。新老干部，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崇拜毛泽东和"听毛主席的话"的驯服工具。这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来。整风前我们在生活会上批评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就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下来就数他了。但整风后已改成"老子天下第六"，即斯下面还有毛。事实上，整风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已经稳定建立起来，而毛又极端重视权力和善于运用权力。包括刘少奇等书记处成员在内，凡有不同意见，倒还允许提出来，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数的意见，也只好放弃。建国后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驯服工具。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封建皇帝和其它最高统治者。

（四）建立起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

个人崇拜所要求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不但领袖和领导集团的活动以至日常生活都处于神秘状态，而且党国大事、国内外形势等的报道和评论都要层层把关。社会新闻则实际上被取消，如1942年4月10日《解放日报》二版登了一条"党校一学生失恋自杀"的消息，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dccclxxx]其实，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开始还不太严格，人们从中可以知道不少信息，还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国际消息也比较多。我就是每天风雨无阻地到报社门口看报上有关苏德战争进展

的报道的。可是延安整风后情况大变。由于在报上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泽东曾拍案大怒，“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深刻检查。”[dccclxxxi]于是决定《解放日报》改版。从此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主要的已不再是为大众提供各方面信息的传媒了。报上连篇累牍地是：关于整风的报道，对王实味等人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些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检讨。再往后，就是肃反与抢救运动的报道充斥报端。例如在官方党史学一再重复毛泽东已下令停止抢救运动[dccclxxxii]后的一个多月，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报》还连续刊登了《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没听说毛泽东看了诸如此类的消息后发脾气和拍桌子，反倒是绥德地委组织的宣讲团被邀请来延安给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我就在中央大礼堂前排听过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一些小孩们的“坦白、控诉”，并且看到台上坐着中央首长。

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其它报刊基本上都已停刊，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墙报自然也没有了。因为先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实际上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起码是挨批的自由主义或“小广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党和政府接受舆论监督，而是由党中央直接掌管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一切新闻报道。同时规定，通讯员由党委设置，有关各地的消息报道原则上也须通过各地党委。[dccclxxxiii]与加紧控制报纸（当时无广播，一切新闻均靠报纸）的同时，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仅不再印行各种期刊和一般书籍，而且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和材料。还须在此一提的是，整风开始不久，特别是开展审干肃反（抢救运动）后，前几年很活跃的各种学习和学术活动及其组织如讨论会、上大课、研究会等即完全停止。从此，延安的生动活泼时期宣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坚持强调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被“舆论一律”所代替了。

控制舆论须有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也是现代个人崇拜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个人崇拜后面隐藏着许多虚假的甚至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崇拜也就坍塌了。例如斯大林当年在苏联被崇拜得胜过神仙，在他去世时，莫斯科简直是哭声震天，为向他的遗体告别而拥挤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他不下于历史上任何独裁者的专制暴虐、杀人如麻的真相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急转直下，等赫鲁晓夫把他尸体搬出列宁墓移葬别处时，在人民间竟没引起任何波动。同样，如果中国党的许多档案没有销毁，能公诸于世，恐怕中共党史就只能重写。以延安整风而论，一开始就搞得很神秘。上层整风当时就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194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就明确规定，“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否则就不能编入学习组。[dccclxxxiv]所以像我们这些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中下级一般干部，不但当时，就是现在也不大了解上层整风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有些问题还是弄不清楚，更不用说没参加过整风和后世的人们了。大家对延安整风的了解，只能相信党史教科书上所说。甚至有些过来人，包括审干肃反中被长期关押和受刑的人，也都误信抢救运动是康生发动和执行的，毛泽东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可见，现代的个人崇拜，特别是过去和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搞个人崇拜，必须对许多问题严格保密、设置禁区。延安整风中叫得最响的是实事求是，但是对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对长征结束后西路军的被歼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伪造历史。而且这种口头大讲实事求是，实践中并不实事求是的传统，倒是一直继承了下来。不但在延安整风中就搞一些并不实事求是（如无限上纲）的批判和检讨，特别是开展无中生有的抢救运动，而且建国后哪些重大举措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瞒天过海？例如至今仍说造成惨绝人寰的三年困难，原因有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等，以减轻"人为"的罪责，而不提饿死了多少人，更不讲出现过人相食的惨状。为什么不敢设"文革博物馆"，就因为它有碍个人崇拜下的领导体制。

（五）喊万岁和唱《东方红》

延安整风中形成个人崇拜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神化，进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属于封建蒙昧主义的欢呼歌颂，如喊万岁，唱《东方红》之类，而且还不断升温，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

在封建专制时代，万岁是皇帝的专称，任何人都是不能乱喊的。到了近代，特别是推翻封建王朝以后，万岁也可用于对拥护的党派与事业的欢呼，如"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个人用万岁的，我只知道毛泽东初期崇拜陈独秀时写过"我祝陈君万岁"，[dccclxxxv]也有人对崇拜或谄媚对象用过万岁，但属个别现象，并未普遍化。整风前，我在延安的五、六年，也没听过开会时对某个领导人喊万岁。只是1943年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一个喊的。[dccclxxxvi]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当时延安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只要彭真振臂一呼，各机关学校必然群起仿效。也就是从此以后，像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万岁就属于毛泽东一人了。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在一些地区也被"万岁"了一阵，但很快就纠正了。还有个别地方领导人出现被喊万岁的事故，一旦发现，就会受到批评和处分（调离）。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意见的，我知道就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这大概是招来毛泽东特别痛恨的原因之一。不但绝对不能反对喊万岁，连不喊或喊的少了也是罪过。"文革"初期，我去农垦部看王震和陈漫远打大字报战，王震揭批陈漫远的罪过之一就是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万岁，而他则是经常喊。

与喊万岁同时兴起的，是对毛泽东的各种封号。人们多以为"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所提，还被毛泽东斥之为"讨嫌"。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提出的"伟大"还要多些。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dccclxxxvii]"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dccclxxxviii]"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dccclxxxix]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dcccxc]等等。对所有这些极端过火和明显个人崇拜的颂扬和称谓，毛泽东不但没表示过任何"讨嫌"，而且还完

全接受。因为这都是经过他一再审阅和定稿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自谦的表示。由此也可明白，“文革”中他对斯诺说“讨嫌”的并非官方党史学渲染为表现毛泽东谦虚的不赞成喊“四个伟大”，而是要消除喊“四个伟大”的林彪的影响。

《东方红》大约也是整风期间由农民唱起的，被发现后，经文人修词定谱才很快传播开了。农民对领袖有神化和感恩思想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dcccxci问题在于这样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歌词，不但未得到制止，反而由党组织广为传播，直到定为一些会议和广播必须具有的开始曲。我在国外工作时，就常遇到出国文工团的节目安排，开始有《东方红》，最后唱《国际歌》。才唱罢毛泽东是红太阳，“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这种自相矛盾，实在显得有点滑稽。然而从延安整风起，却在中华大地盛行了几十年，无人敢随便改变。例如1954年四、五月间，总政文化部长陈沂率文工团访问苏联，节目单开头就是《斯大林颂》和《东方红》。由于苏联当时已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对方提出不能再唱《斯大林颂》。我们向张闻天大使反映，既然不唱《斯大林颂》，最好也不唱《东方红》，否则有点不够礼貌，显得在和苏联闹别扭。张闻天完全同意并向陈沂提出。但陈沂坚持要唱，说演出节目是经周总理审定的。张闻天只好请示国内，最后得到中宣部和总政联名复电（据说请示过中央），同意使馆意见。这就是说一个文工团演出时唱不唱《东方红》，不但一位中国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员说了不算，而且连外交部也无权决定，可见问题之大。

其它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宗教仪式也是越来越多，不可胜数。我对有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就是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摸过的一株棉花，后来被系上红绸飘带，成为来徐水参观的人必须先看的景观。毛泽东确也做到了一语定乾坤：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就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一句“人民公社好”，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全国农村的公社化。这还都是在林彪出山前。等林彪出来念起多种符咒，那就一切都“立竿见影”了，中国一下子回到了现代野蛮和迷信的时代。

（六）个人崇拜在中共七大的表现

七大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前者是指七大期间已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全体代表俱已团结在领袖毛泽东的周围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后者则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已战胜过去的一切不同意见，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又将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提法（适用后来的每次大会）本身就有问题，下面还将谈到，而且隐含着明显的个人崇拜之意。这从大会开法特别是代表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七大是经过三年多的整风和开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之后，思想认识已完全统一，所有政治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举行的。大会又有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操持，大会的任务只是从组织上和法律上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因此，会议的发言内容（都是事

先写好并经过审定的），主要就是对毛泽东的歌颂和多数人的检讨。[dccccxcii]而这些歌颂和检讨，大部分是很不实事求是的，有极大的夸张和作假，不少说法已超出尊敬爱戴的范围，明显的是宣扬个人崇拜以至带有奉承讨好之意。而对这些，毛泽东均一概接受，同意把一切好事都挂在他的帐上。我们前面在评论张闻天的《反省笔记》时，已经有所说明。他在七大的发言中，许多地方说的都是过头话。如说自己，“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么残酷性、复杂性、长期性。”这就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论和实践。说到毛泽东，就是：“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dccccxciii]这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根本讲不通的。又如上面所提任弼时说的毛泽东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恐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多少个东方民族会承认，这完全是自封。又如周恩来的发言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dccccxciv]这就完全违背史实，因为毛泽东并没有领导三个历史时期，周恩来本人在整风前就没有接受他的领导，这是周自己后来经常检讨的。朱德在会上说，“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究越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dccccxcv]这都是明显的夸大。难道领导打“AB团”、指挥西路军、发动群众性的肃反抢救运动也是“完全正确的”？连彭德怀在七大发言中也用了不少个人崇拜的语言，如说，“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dccccxcvi]除会上这些颂扬崇拜的言词外，七大前后还刮起了一阵向毛泽东敬献锦旗之风，在中央大礼堂挂得密密麻麻。据说，会后两个月，国民参政会代表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访问延安。毛泽东陪他们参观七大会场，傅斯年看见这些锦旗，脱口说了句“唐哉皇哉!”使毛当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看来，七大实在是一次检讨的大会、颂扬的大会、搞个人崇拜的大会和为后来开类似会议立下范式的大会。既没有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发表与争论，各种报告和所有发言又都是早准备好并经过统一审查，开会前就已发到各人手中，开会时只是台上念、台下看。（七大时倒还有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和一些临时发言，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少甚至没有了。）大概连毛泽东也觉得这种会议有点形式主义走过场，所以过了十一年才召开八大。至于九大和十大的召开，看来只是为了树林彪和去林彪，并没有其它什么实质意义，但也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由此看来，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被无限地夸大了，其消极影响至今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自然也不会引起重视了。

七大的这种开法，是否有意搬运苏联的作法，不得而知，但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受其影响则是无疑的。为了进行对照，这里对以“胜利者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联共（布）十七大[dccccxcvii]作一简介。

联共第十七大举行于1934年1月。这也是一个歌颂的大会，许多人检讨的大会，大搞个人崇拜的大会和斯大林走向权力顶峰的大会。它之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已战胜了所有党内反对派，完全定于一尊，而且这时苏联也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建设上的一些胜利。所以这次大会的基调就是庆祝胜利，大力歌颂斯大林和一些

反对派头面人物作检讨。于是对斯大林的赞词和封号就倾盆而来，什么“伟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钢铁般的”，不一而足。这些赞誉不仅来自斯大林的拥护者，也来自他以前的反对者。前者如：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首先称他为“天才的领袖”。基洛夫说，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一批参加大会的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等，也都宣称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等等。至于被安排在大会发言的一些原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则是拼命检讨自己和歌颂斯大林。布哈林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彻底批评了首先是我……提出来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李可夫说，“他（指斯大林）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托姆斯基说，“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攻击。”季诺维也夫第一个把斯大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排在一起。加米涅夫提出了“斯大林时代”，最后高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dcccxcviii

从这些引证中，人们可以看到，我们七大的一些发言和联共十七大的这些发言是多么相似。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与旧党章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增加了一个说明党的定义、作用和地位的“导言”。dcccxcix我党七大通过的党章与过去党章显着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一个很长的“总纲”。这种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这两次会，虽然都是个人崇拜的开始，但其为害和发展也还有些不同。联共十七大后三四年，这些“胜利者”代表，1916名中就已有1108人被捕被杀。他们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就有98名被逮捕或处决。而中国党虽在建国后已有几次清洗，但直到“文革”后才大量拘捕和“监护”中央委员，致使八届十二中全会能出席的委员已不足半数。

三、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

（一）以活人命名思想或主义开创了国际共运的先例

对活人冠以主义或思想之名，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不曾有过，只是中国的党开了一个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坚决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对那些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cm]因为正像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他讨厌声望，追求声望的行径更使他愤怒。”“群众的赞美和声望，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走上邪路的证据。”[cmi]马克思在回答一位德国党员的问题时明确表示，“由于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因此在国际存在的期间，我从来不允许发表那些来自各国的许多令我厌烦的、表彰我的功绩的文电；我甚至从来也不答复它们，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cmii]列宁在世时也不称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称为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就说过，“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cmiii]斯大林是国际共运中大搞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但他并不让人提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总以列宁的学生自居。他说过，“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cmiv]朝鲜的金日成是竭力想留点思想遗产和声望的，但也没有搞金日成主义或思想，而是发明了个“主体思想”。其它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等这些大搞个人崇拜的人，也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义或思想连在一起。除中国外，现在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后。根据胡志明的为人，在世时他是不会允许人们有此称谓的。所以，延安整风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超越国际共运传统和接受水平的空前之举，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这也是建国后决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要提和为什么不提，胡乔木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但他又说，“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cmv]这些说法显得自相矛盾。人们弄不清，提和不提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是因为苏联的关系。不过可以从此看出，提和不提，关系都不大，主要不在中国的需要，而是苏联的因素。提，“是对着苏共的”，不提，是由于苏联“拒绝承认”。这就推翻了胡乔木同一段话里面说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cmvi]事实上，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特别是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以后，全党思想已经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方针之下，长江局取消后已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而且在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前的七、八年间，革命力量还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无论是党员还是军队的人数都是成十倍地增长，更不用说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了。建国后有六、七年不提毛泽东思

想，天也没有塌下来。那些年党内在方针政策上无疑有不同意见，但仍然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统一行动。由此可见，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显然被夸大了，有重新做一点讨论的必要。

（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命运

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最早提毛泽东思想的上述张如心的文章，虽然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含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无两样。1943年"七一"前后掀起宣传毛泽东的高潮，刘少奇在7月6日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cmvii]只是两天后发表的由毛泽东布置并经他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才减去三个前缀次用"毛泽东思想"。[cmviii]此后，虽无统一规定，但全党已普遍用起了"毛泽东思想"，直到1945年七大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进党章。虽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说明，下了不少定义，但在长时间里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怎么回事的人并不多见。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全党确实做到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这倒不一定是由于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主要的还是由于明确和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地无分南北，都接受毛泽东的指示，按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办，即使有政策上的不同意见，也会自动或被动放弃而服从毛泽东。这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例如建国后，刘少奇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三个月内就遭到毛泽东的三次点名和不点名的批评。[cmix]于是刘少奇就完全放弃了原来的设想，转而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刘少奇起初的想法并不见得错，后来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反倒越来越多。杨尚昆就是其中一个。他曾公开说，"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值得好好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没到两年就完成了，太快了。"[cmx]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恐怕不是刘少奇违背了由他在不久前党的七大上作了全面概括和阐述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他没能跟上毛泽东思想的变化，在他受到批评后又能立即放弃自己的原有意见，完全跟着毛泽东的新思想走。这类例子真可谓不胜枚举。这都说明，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后，做到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的关键是"紧跟毛主席"，倒不一定是胡乔木说的由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延安整风已经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提出后，由于得不到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国际共运的承认，毛泽东经过几年的观察和考虑后就建议少提以至不提。1948年起他已一再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cmxi]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cmxii] 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从《历史决议》中一律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直到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还正式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所以在第三年党的八大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有人说这是由于毛泽东的谦虚，[cmxiii]我们前面已经作过澄清，这里只要再指出一点，就是为什么延安整风和筹备七大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点也不谦虚，过了四五年却突然谦虚起来了？这是没人能自圆其说的。还有人说八大没提毛泽东思想，是因为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在他所作

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没提。这大概是出于对七大后的中共太不了解。实际上，在党章草稿修改过程中，没有几个中央领导人提出过应保留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主张提的话，恐怕也没有任何人敢于不提。不然的话，为什么八大二次会议后（特别是中苏论战后）就又更多更高地提起来了？这里还要着重说明的是，在八大前和八大后一个长时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影响全党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而且不只全党，全国人民都是紧跟毛泽东走的。这从建国后各种席卷中华大地的运动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连续激烈的变革中就可得到充分证明。而这些，也与七大时定义的毛泽东思想并无多大关系。

斯大林逝世后，通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和实践，毛泽东就更加骄傲了，不再把苏联放在眼里，不但要中国争取比它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想在全球反帝和世界革命中起带头作用。许多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人也立即紧跟，因而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进一步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潮，几年不提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大谈起来了。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不只恢复在党章的总纲中将毛泽东思想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不再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作为中国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cmxiv]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就在对毛泽东思想重新提和提得越来越高的年代里，中国发生了一连串严重事件，如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难和“文化大革命”。这就自然引出这样一些问题，即究竟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起了什么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中，在确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为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的总路线的同时，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认为需要趁他们健在时就赶快敲定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主要是确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原因是很清楚的，下面还会专门讲到。问题是这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是不太清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的邓力群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贯彻执行的，用概括的语言写出来。”[cmxv]这次是否写清楚了，也很难说。当时就有许多人不主张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的许多严重错误在毛泽东思想中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但是由于主要领导人的坚持，按照中国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决议》还是做出来了。不过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及市场经济，实际上在主要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已经代替了毛泽东思想，重提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更多的是为照顾其同代领导人和对后世的影响。

根据以上所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命运大体上经过了四个阶段。一是从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到七大后几年。这一时期虽叫得很响（大家都要提），但缺乏系统研究和对全部内容的阐述，所以除部分内容和个别词句（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外，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恐怕不多，连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陈伯达后来也被说成原来是个骗子。二是建国前后十来年决定不提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国事运转还是人们的感觉，可以说并没什么影响，不研究党史的人大约也不会知道毛泽东几次不让再提。三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思想被叫得更响、提得更高，成为辨别

国际共运中是否“变修”的标志，甚至被说成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正是这个时期，中国人民遭受到一个接一个的大灾难。四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后。照说，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阐述得更全面了，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了，但事实却是知道毛泽东思想内容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指导中国前进的已经是邓小平的主张和指示（后来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还真被架空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后，毛泽东思想是否真的被解释得更全面、更确切，使得人们更明白了，其实远非如此，只是闭门造车而已。为了不扯得太多太远，这里只提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1，毛泽东思想是否能和毛泽东本人分开？

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只能是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政策。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集体贡献和集体创作，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个集体的范围就无法确定。例如民主人士李鼎铭的“精兵简政”主张被毛泽东思想所吸取，梁漱溟提的要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当时虽遭批判，现在又很强调），那他们是否也属于这个集体？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主要是陈独秀在党的二大上明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王明首先提出的，那他们是否也算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创建？如果这样算下去，那会把无数古（例如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就出自《汉书》）今中外的人都算进去，岂不乱了套？把毛泽东思想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是为了做到“祸福同当”，因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cmxvi]那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责，同样也得人人有份，包括彭德怀、张闻天等。这显然既不合理，也违背科学。毛泽东在主张不用毛泽东思想时，就特别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cmxvii]这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他本人的著作，而没提及别人。斯大林也说，“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cmxviii]可见，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或思想，只能属于他本人，而不应由许多人分享，否则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大堆主义、思想以至责任就都分不清了。应当指出，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外国人倒是没有把本人和他的思想机械地分开。

2，谈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能不能只算正确部分而将错误部分去掉？

答案也只能是否定的。这是个中国特有的、也根本说不通的、硬要强加于世人的问题。不然的话，各种主义和思想大都可以成为完美无缺的了。例如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论成分去掉，把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机械唯物论因素去掉，就自然更接近真理，但那也不成其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这也是毛泽东本人所反对的。例如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cmxix]照胡绳的诠释，这第二件事就是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cmxx]这当然是为了维护毛泽东而违背毛本人意思的一种奇想。但即使只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全盘否定掉，那毛泽东思想也就去了一半。所以胡乔木有时就把毛泽东思想分成两个。他的说法是，“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有两种形象：一种是长期的中国革命，一直到1957年……另外一

种，主要是从60年代以后或者晚一点……我们现在继承第一种形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cmxxi]不过这种两分法也不解决问题。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如一贯的“左”倾肃反路线（而且这种事还早于斯大林六七年之多），既不属于“晚年错误”，又在毛泽东思想中占什么地位呢？特别不可理解的是，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还制造出这样一个理论，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弄出两张皮，于是毛泽东因犯严重错误而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反而是其它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晚年错误”指的是“文化大革命”，那大跃进、反右倾等算不算呢？是否也要说成毛泽东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全国党组织都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把毛泽东思想越说越糊涂，更谈不上科学性。

3、关于胡乔木所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胡乔木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也终其一生认为自己是中国党的理论权威。他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对毛泽东思想作过多次阐述。一方面指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cmxxii]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根本没有，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除“文革”外，“当然，毛主席的思想里面也还有一些其它不完全正确的方面”。如“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cmxxiii]等。只从这些简短引证中即可看出，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并列，更不能说成全面发展（还指出哲学特别是经济学）；同时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并“不完全正确”，甚至还有极其错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上述违背科学的“发明”，提出“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在把思想和行动上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后（“他的错误是违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于完全正确和纯洁的毛泽东思想，胡乔木归纳出三项“基本原则”或“根本精神”，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cmxxiv]后来写进《历史决议》时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胡乔木的这一归纳倒是很值得加以讨论。

第一，关于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一条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并不是毛泽东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中只是属于他的特别的新贡献。现在许多政治教科书还把实事求是说成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因此，把实事求是定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很难讲得通。那么从实践上看，如果说民主革命中不够实事求是之处如打“AB团”、指挥西路军、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等还可以算成支流，那么，建国后的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工农业的一公二纯，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反右派、反右倾，从《论十大关系》到大跃进和大饥荒，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到“文化大革命”，等等，恐怕必须看作主流，从理论到政策都不能再说成实事求是了。

第二，关于群众路线。我在前面的一两篇笔记和其它有关文章[cmxxv]中曾经提到，群众路线是作为领导者的一种工作方法，不宜在理论上提得过高。

这一方法始终贯穿着党是领导者和群众是被领导者的思想。它的全部内涵都是以党及其领袖和各级干部为主体的。通俗点说，就是你们应做的一切都是我们要你们干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但）也靠你们，所有方针政策都是把你们的意见集中起来，经我们制定成政策，再由你们去执行。这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也违背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而且这里的形式和内容也大有讲究。因为作为主体的领导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说成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至于集中起来又要坚持下去的是否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无具体衡量标准。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主观上以为是为了群众，但实际结果却完全是害了群众。干这两件大事，是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意见还是出于领导人纯粹主观空想下的决策，恐怕是不必深究就会得出肯定结论的。

第三，关于独立自主。如果主要指外交政策，应当说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做到了的，而我们却在建国后的相当时期严格实行“一边倒”。如果主要指社会主义建设所走道路，那么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走俄国人的路”，不但一切照搬苏联模式，而且斯大林在世时还就一些重大问题向他请示汇报。例如作为我们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如果不是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也许全国解放后我们会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把所有民主党派都给解散了。[cmxxvi]要知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一边倒”列为国策，锁定的主要是苏联模式，而不仅仅是对外关系。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毛泽东直到晚年还承认的。而且多年的实践也正是如此，至今还留下不少阴影。许多党史著作把“一边倒”只限于对外政策，那属于明目张胆的断章取义。与独立自主相连，《历史决议》还加上了“自力更生”。其实，毛泽东建国后一直强调的“自力更生”，实际上是闭关锁国，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和各国革命需要联合行动。[cmxxvii]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任何国家不实行对外开放就只能落后于时代发展，落后于世界潮流。毛泽东思想中的“自力更生”，包括去掉张闻天所提六种经济中的“秋林经济”（指外资），变为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新中国经济构成只有五种，[cmxxviii]表明拒绝引进外资；从“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到“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cmxxix]以及多次讲的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交，美国封锁的时间愈久对我们愈有利等等，实际上就是闭关自守，导致了建国后二三十年的落后。邓小平就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cmxxx]由此可见，归纳为毛泽东思想中三大原则之一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好反映了它的一个消极面。

综上所述，胡乔木归纳毛泽东思想的三项原则，比起刘少奇四十年前在党的七大上作修改党章报告中所下的定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等八项“理论与政策”，[cmxxxi]反而是理论上的倒退，刘少奇的解释倒还比较确切些。

（三）对个人在毛泽东思想认识上的一点修正

我个人对毛泽东思想没有研究，但对于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是长期服膺的。只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对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逐渐产生了一些怀疑。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思想，我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cmxxxii]一文中曾有如下提法：“毛泽东思想就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等。现在看来，这类提法是不准确的，是受长期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夸大宣传的影响所致。原来第一句话只是为说明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背景，即只适用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而不适用于和平与发展时代，却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这点上倒是胡乔木讲得对，即对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既“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大概是由于深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并不多（连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没读过），还有些误解（如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等），特别是简单化偏向（如在延安讲的，对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以及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等）。不过正像胡乔木在许多问题上往往自相矛盾一样，他一方面提出“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cmxxxiii]人们实在看不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原则差别。与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倒不如像我们前面说的，毛泽东思想是斯大林理论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也许更确切些。至今，一些人还过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是在同胡乔木唱反调，而且还属于并不合乎实际的拔高。[cmxxxiv]这是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上的继续倒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个人崇拜影响的表现。

根据以上所述，对毛泽东思想似可表述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这里第一句话包括了共产党的领导，使毛泽东思想同历史上的一切农民起义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区别开来，也说明它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革命，而不涵盖建设；第二句话显示出农民为革命基本力量的特点，使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完全依靠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和走城市暴动道路的列宁主义不尽相同。

第十六篇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中）

四，个人崇拜的形成与发展

（一）造成个人崇拜的根源和条件

从延安整风起形成长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并不奇怪的，也可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追根溯源，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1、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主义传统

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在中国可说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应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在西周，虽然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但实际上周天子的统治还是比较薄弱松散的；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更出现了至今都没有过的百家争鸣局面。只是从秦始皇起，中国开始形成持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而且是长盛不衰。十五世纪前后，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和接踵而来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中国却是在蒙古人的残暴统治结束后建立了世界上罕见的极端专制的明朝，接着又是对外闭关自守、对内严厉镇压特别是文化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清朝。后来，封建王朝被推翻了，还一度兴起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但是封建的皇权专制主义并未被根本触动。直到我们党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三十年，1980年6月李维汉还向邓小平提出，“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根本性的问题”，“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cmxxxv]现在，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看来大概没人敢说这一课已经补上了。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在言论自由和百家争鸣方面恐怕完全是两种局面。

封建的皇权专制主义体制和传统，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天然土壤。一些人总是希望并想方设法以取得人们的崇拜（历史上想当皇帝者不知凡几）。有些人则是选定追随的目标制造个人崇拜，然后就为这个人大造舆论。还有些人则出于愚忠，在崇拜对象的威慑下，甘愿跟着伟人的指挥棒转，甚至助纣为虐。至于广大工农群众，则在世代传统影响下，自认低人一等，对皇帝、长官和一切强人都存有崇拜和畏惧之心。所以马克思说，“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cmxxxvi]

2，中国的社会结构以至近现代中国的重大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都是以农民为主

中国的农民也和上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讲的法国农民（小农）一样[cmxxxvii]（甚至还要落后、愚昧得多，因为那时法国已经过大革命，而中国农村则一直是死水一潭），历史传统也在中国农民中造成了一种迷信，不是相信自己，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清官或者领导起义的头领身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经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但充其量也只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取得胜利以后，有的统治同样残酷，如明朝；有的很快就走向腐败，如只取得部分胜利的太平天国。虽然太平天国那样腐败，可广大太平军对天王洪秀全也还是崇拜的。这也是农民成为个人崇拜重要基础的一个证明。

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只能是依靠农民。所以毛泽东说，“中

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cmxxxviii]如果加以延伸，也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实质上就是农民队伍，即使有其它阶级或阶层的人如知识分子参加，很快也会“农民化”。在这支队伍中制造个人崇拜，实在是一拍即合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延安整风能以短短的几年就会在全党很快确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3，国际影响

崇拜英雄人物、崇拜群体首领等这类个人崇拜，本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随着民主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崇拜就已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在民主和法治社会，崇拜只意味着尊重、敬仰、爱慕、怀念之类的意思，已经失去了盲从和迷信成分。例如毛泽东几次谈到个人崇拜时提及的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是在总统的位置上依法行政，并不越权；不当总统了，就和普遍公民一样，而不是变相的终身制和垂帘听政。这和我们上面列举的个人崇拜的标志，有根本的不同。用人们对华盛顿的纪念为个人崇拜辩解，是有意混淆事实。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国际影响，虽然并不排除其它有关因素，但主要是指国际共运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的影响。

延安整风是在斯大林已经完全稳固地建立起个人崇拜之后。此前一些先进的左派人士如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等都有了深切的感受。但中国还是一切要学习苏联，特别是学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以更快的速度树立起中国的斯大林。不但“毛主席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cmxxxix]而且其它主要领导人也很快转变思想，要拥立毛泽东为中国的斯大林。例如刘少奇，几年前还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cmxl]可是到延安整风时就完全变了，似乎把毛泽东说成只是中国的斯大林还有点不够了。[cmxli]所以苏联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忙（指定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也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延安整风中得以迅速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4、形势的发展也需要党推出自己的领袖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突出党的领袖并不十分紧迫。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就很需要推出自己的领袖、让他走向公开的政治舞台。因为合作的对手国民党，有一个总裁蒋介石，可以对一切问题拍板定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有一个相应的人物，使对方以及各界了解谁代表共产党，谁说话算数。从党内来说，在党摆脱秘密状态后，领袖的公开出现，也有利于全党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加强党的凝聚力，使分散的根据地和各地党组织能听到一个声音说话。所以在前面对延安整风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时，就已经指出，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增进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成为迅速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推而广之，经受百年外敌欺凌的中华民族，也亟须一位能够团结全民、洗雪国耻的民族英雄。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会使志士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时代需要英雄，毛泽东就应运而出。

但这里必须说明，一个政党或国家需要一个领袖、一个核心、一个英雄

人物，并不等于一定要搞个人崇拜。领袖或代表人物和个人崇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和政党，也必须有它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但他们没有得到公众的盲从和迷信，既由选举产生，又可以按期改选或随时撤换。而个人崇拜却是和民主绝对不兼容的。例如被称为二战英雄的前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战争胜利后的大选中竟然落选，变成普通公民，只能去写他的回忆录。在他退位时，议会拟通过提案，塑一尊他的铜像，置于公园，令众人景仰。他却一笑回绝："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喜欢在我的铜像上拉屎，还是请免了吧。"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就全然不同，不管选举不选举，苏共和苏联领袖都是他，直到逝世。而且不用最高苏维埃通过什么决议，已经是塑像遍全国，敢说一句不满话的人，当会被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在作战中，没听说过有英国士兵喊"为邱吉尔而战"；但红军冲锋时却普遍高呼"为祖国，为斯大林，乌啦！"从这些细节中也可以看出个人崇拜和非个人崇拜的区别。

5、皇权专制传统压倒了"五四"传统

既然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中国党的个人崇拜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为什么在这之前的二十年却没有搞对什么人的崇拜呢？这说明除历史传统、社会根源等客观因素外，人的作用也是重要的，而那些客观因素也需要一分为二。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但也受近代西风东渐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党的广大知识分子干部还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五四"传统。例如瞿秋白、张闻天等人，无论在政策上会犯什么错误，但在他们主持党中央工作时还是讲民主的，没有也不会搞个人崇拜。在他们身上，"五四"传统的影响超过了皇权专制的影响。毛泽东等人则相反，主要继承了中国的旧有传统。这从他们的学问范围和阅读兴趣这样一类事情中也可以看出来。由此可见，个人崇拜在中国党内的形成说明了两点，一是皇权专制主义旧传统体现出来的力量、作用和影响，绝对大于"五四"新传统；二是事在人为，个人崇拜终究是由人创造起来的，不能完全归之于客观。而在对待个人崇拜上，党的面前，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这也是两种力量的较量。

（二）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

1，在树立个人崇拜中毛泽东本人的作用

毛泽东的抱负和追求

毛泽东从小就胸怀壮志，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受老师杨昌济倾向于宋明理学陆王学派的影响，比较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具有一定英雄史观的色彩。[cmxlii]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道路》一文中也说，毛青年时"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以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他对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毛泽东还有如下评语："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服输；他意志坚强，吃苦耐劳，具有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cmxliii]

实际上，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影响和所具有的特性，大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了一辈子。而且由于他始终钟情于中国古籍，所以还不断加深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使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以至终其一生，他也很少读马克思而大量读中国古籍。在被称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延安整风的紧张岁月，他所读的书也主要是古书。当时管理图书馆的人员回忆说，单是1943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就派通讯员借过四、五次书，“主要是宋元明清的短篇话本、笔记小说等线装书。每次借四、五函或五、六函，每函8-12册。”[cmxliv]毛泽东可以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读上好几遍，却没有一次读过《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后译《剩余价值理论》）。所以李锐说，“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证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cmxlv]中国传统和小农社会对毛泽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说带有决定性，因此在他思想上对个人崇拜的认同和追求就是很自然的了。

毛泽东一走上社会，特别是参加革命、创建红军和苏区之后，就立即显示出他卓尔不群，顽强奋斗的英雄本色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个性特点。“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曾建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表示愿去艰苦的农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而到农村创立根据地后，1929年即有“农民党”[cmxlvi]和“书记独裁”[cmxlvii]之说，已露出个人崇拜的端倪。后来朱毛的分歧（朱德反对“党管一切”、“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和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在红四军七大落选，都与不少人反对毛泽东“书记专政”和“大权独揽”有关。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也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cmxlviii]被毛泽东和党史界一直批为剥夺毛泽东党权军权的赣南会议（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会），在政治决议中不指名地批评毛的四条“罪状”中，有些固然是错误的，如“富农路线”、“狭隘经验”等；但也有并不错的内容，如“肃反扩大化”和“以党治国”。

遵义会议后，得到总书记张闻天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就已取代周恩来成为红军统帅（张认为毛的军事指挥比周强[cmxlix]）。而在战争时期，军事领袖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加上张闻天不愿出头和不争权的素质，对毛泽东又特别尊重，所以在许多场合都把作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央革军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推到前面。毛也感到他的地位和在苏区时大不相同了，连对贺子珍都说，“我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再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cml]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在实际上逐渐形成，因此，他在指挥党政军的同时，也更加注意领袖地位的巩固和领袖形象的塑造。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对毛泽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内圣外王”，就是以自己的思想去改造别人，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cmli]现在，在毛泽东看来，“立功”、“立德”的问题似已不大，而作为党的领袖，尤应重视的是“立言”的问题了。在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就利用机会如饥似渴地读起马列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并写出了大量著作，创造出他一生中的理论高峰。而且他还是有意识地把这和当领袖相联系的。例如他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

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cmlii]这就是说，他认为要做党的领袖，必须“有些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过等到自以为这些目的已经达到，并得到公认（有了毛泽东思想）后，他就很少再去读枯燥的马恩著作，而又大读其感兴趣的中国古籍了。

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工作

毛泽东对于树立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实际上也就是培养个人崇拜），向来就很注意，长征结束后已从多方面加紧进行。这里首要的就是打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节，提高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等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1937年王稼祥（化名张烈）去莫斯科治病，就负有“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cmliii]的使命。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又决定派任弼时（化名陈林）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书面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是在国内准备的。虽然这个报告大纲至今不能公开，但他们两人苏联之行的作用很快就显示了出来。除共产国际主席团通过两个支持中共路线的文件外，苏共《真理报》1938年7月6日还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王稼祥回国后在9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包括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等内容的《国际指示报告》。[cmliv]不仅从这两位大员的赴苏成就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工作，而且毛泽东对其它机会也不轻易放过。例如刘亚楼1938年4月下旬要被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毛泽东就让他将中国党“左”倾路线的危害直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并要他多带几本《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面交季米特洛夫，请其转交斯大林。“刘亚楼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cmlv]

发挥舆论的作用

当然，真正重要的还是动员舆论。中国党历来就重视宣传，而在这方面毛泽东更是行家里手。1940年后先是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参考消息）合并为《解放日报》，停止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和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等的出版。要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负责向全国宣传党的一切政策，内容上减少国际国内新闻（我在抗大工作时每天看《今日新闻》，觉得国际消息很多，后来《解放日报》一出，这方面的信息量就大减），增加我党我军及根据地的消息和资料。毛泽东还对报纸抓得很紧，曾向总编辑杨松提出，要厚今薄古，多宣传遵义会议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cmlvi]意在要求多宣传他和他的政策。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更进一步成了党的喉舌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陆定一也代替了杨松。虽然毛泽东1943年4月22日复信凯丰，其中提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cmlvii]似乎显得很谦虚。但与此同时，却在布置“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重量级文章。此前一个多月，中央机构调整时成立了宣传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副书记王稼祥。同年6月下旬，毛泽东亲到王稼祥住处，布置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文章，并指点要旨为：从总结二十二年来

的历史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cmlviii]“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写好后又“反复修改，直到7月5日才最后定稿”，当即派人“呈主席亲阅“（所署日期可能是草稿拟成的6月26日）。毛“没有多加修改”就送《解放日报》发表在7月8日头版上。[cmlix]这就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那篇文章。其实，在这之前的7月6日，刘少奇已发表了号召全党“应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cmlx]总之，以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生日为契机，几乎党的所有领导人和报刊都撰文谈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以及其它主要负责人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事前都必须经过毛泽东审定。这就是说，两个月前还不成熟和不宜当作体系宣传的毛泽东思想，竟然一下遍地开花地成熟而且可以“作为体系鼓吹”了。正统的党史学著作，为了宣扬毛泽东的谦虚，总喜欢引证那封致凯丰的信，但却回避不了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怪问题。

要掌握舆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得有一批秀才，而毛泽东一直就很注意网罗人才。条件是，第一忠心拥护他；第二，有文才，能为所用。办法是找到合适人才就调来身边做秘书或安以其它名义，有些也可以不调来而作通讯秘书，或分配其它可直接指挥的工作。合适的长期使用，不合适的随时调换，另行分配。初到陕北，选才余地不多，连李一氓也被调去做了一阵毛泽东的秘书。另外，李六如、周小舟、郭化若等也在毛身边工作过。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到达陕北，挑选的余地就大得多了。此后毛泽东选用的一批秀才，在协助毛泽东“立言”和制造个人崇拜上起了巨大作用。这些人包括张如心、和培元、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他们，以及其它一些文化人如何干之、艾思奇、何思敬、周扬，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起了极为重要的教育作用，也增强了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服和皈依。例如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在整风中学了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关于十年内战》[cmlxi]等文章，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与政策的崇敬和信仰就会油然而生，一些人也会把整风和抢救中受到的委屈以至摧残和毛泽东分开，归罪于那些直接抓整风和抢救的人。而且不但在宣传上（即毛泽东说的“鼓吹”），甚至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体系化）上，这批秀才也都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的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从延安时期起，就以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掌管中国党的意识形态，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来胡乔木还重新崛起，再管到他逝世前。因此应该说，建国后中国在思想战线和整个文教工作上的一贯“左”，是和他们以及这方面的其它负责人如陆定一、吴冷西等分不开的。

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

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对个人崇拜也起着极大作用。毛泽东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比较注意山头，二是“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黄克诚自述》）。毛泽东常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话确有道理，他也确实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在实践中却总是对自己的山头照顾得多一点，要缩小和消灭的却首先是别的山头。1938年我进抗大学习后就发现一个情况，即从支队（相当于加强营）长、队（相当于连）长到区队（排）长、司务长、伙夫班长以至一些伙夫，几乎全是原四方面军的官

兵，例如原总后部长洪学智那时就只任我们的支队长。后来的解放军十大元帅，就有八个是一方面军的，“照顾”到二、四方面军各一个，贺龙和徐向前。实际上在长征结束时，一方面军的人数反而是最少的。至于政治上，被扩大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和七大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更绝大多数都是中央苏区（一方面军），后加部分华北局系统的。三个方面军中最大的一支红军四方面军，除照顾到徐向前、李先念等几个人外，其它高干都没能在七大选举中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总不能说他们是张国焘的人吧？甚至连老井冈山、当过军团长和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而对反“AB团”有意见的萧克，也都无缘。人们会说，这是考虑到了战功和政绩。但能不能出成绩，除本人条件外，领导上给不给机会更是重要因素，所以古人很讲究知遇之恩。这也是许多四方面军干部被留在抗大工作的一个原因。又如十大元帅中的贺龙和徐向前，就给的创业建功机会不多。抗战初起，贺龙率部进入山西，打了几个漂亮仗，后即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徐向前进军山东一年，也算打开了局面，同样很快被调回充当贺龙副手，实际上是担任抗大总校校长，参加整风。这类事例极多，其中奥妙不言自明。

这一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从延安整风起就一直延续下来。例如建国后的八大选举，竟以“三八式”人数太多为由，将“一二·九”以后的所有新生力量（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使领导建设的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正好缺乏懂建设的专门人才。毛泽东自己当时就承认，“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cmlxii]只要老干部的八届中委，绝大多数成分为农民出身的职业军人，这是推行个人崇拜的天然土壤。因为“军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服从权威和迷信上级，”他们信任和服从毛泽东，“有时候到了迷信和盲从的地步”。[cmlxiii]这正是后来毛泽东一系列越来越“左”的理论和政策，能够通行无阻、得到全面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因，大概也是毛泽东作出如此安排的初衷。

至于毛泽东一贯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政见者迟早总要加以打击，更是人所共见。要不然，像康生这样的佞臣怎么能被信赖一生，最后竟官居中央副主席，得以“善终”；而对他“扶上马、送一程”的张闻天、多次保卫和救过他命的彭德怀、公开制造对他崇拜的刘少奇等，却都落了个悲惨下场。事实表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凡是绝对顺从的，就必有升偿；凡是有过违抗的，迟早会倒霉。先稍有违抗，后一贯顺从的，还可以用；先一直顺从，后竟怀疑者，多无好下场。在延安整风和抢救中，凡按毛泽东部署和指示办的，不管搞得多么过火或犯什么错误，不但不会追究，而且还往往得到提升。有些在抢救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甚至有严重人命案件的（逼死了高干的、处决了好人的等等）不但连检讨都不用，还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些还被安排为政治局委员。康生、高岗就不用说了，其它还有：把中央党校搞成“抢救重灾区”的负责人，“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叫杨述赶快坦白、把绥师一大批十几岁的小孩打成“特务”还组团去延安到处作报告的绥德地委书记，[cmlxiv]一二九师、太行军区和晋西北等地的领导人，[cmlxv]等等。另一方面，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蒋南翔，却因对抢救运动提了正确的反对意见，竟给作了个反对中央九条方针的结论，七大选举，他自然没份，抗战后被派赴哈尔滨作基层工作，1985年11月27日，中组部才予彻底平反。[cmlxvi]这就是说，对干部的看法和安排，主要不在工作好坏和意见对错，关键还在于

是否紧跟领导。所以陈伯达早就认识到，“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cmlxvii]这样的干部政策大约只能培养出崇拜个人的驯服工具（其实，有的是真崇拜，也有的是假崇拜，只是以此作进身阶）。

搞个人崇拜也跟斯大林学

后来被人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cmlxviii]翻译出版后十多年，毛泽东一直赞不绝口。还在延安时就一次在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cmlxix]他不但熟读，而且照搬。奠定中共党史编纂学基础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基本上就是按《联共党史》照猫画虎的。《联共党史》认为党史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cmlxx]在《历史决议》中，连胡乔木也承认，“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cmlxxi]《联共党史》用一些不真实以至伪造的手法，着意突出斯大林，使之与列宁并列；全书提到列宁、斯大林名字有650余次，引证二人著作上百页，占1/4左右的篇幅；最后三章70多页，引斯大林语录60余条。[cmlxxii]对《历史决议》，胡乔木也说，“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cmlxxiii]一个只有两万八千多字的文件，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有47次。有一页还两次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详细分析过的”；“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cmlxxiv]有一点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两者都在著作权上做手脚，先说审定后称执笔，并要分别收进各自的文集中去。《联共党史》，先说是由斯大林领导和积极参加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着，后干脆改为斯大林撰写，并准备编为《斯大林全集》中的一卷。[cmlxxv]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定的《斯大林传略》早已明确写道，“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cmlxxvi]《历史决议》，也先说是由任弼时、张闻天、胡乔木等起草了几个月，毛泽东前后修改了上十次；可胡乔木直到1991年11月7日又说，“写这篇文章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否则，考证了半天，不一定能使人信服。这样把材料摆出来才能使人信服。”[cmlxxvii]其实在这之前四十年，毛泽东就已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了他的《选集》。

突出个人的一些作法

毛泽东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作法涉及各个方面，这里再谈几点，或可收到以此类他，他可知矣之效。例如对自己和拥护者采取隐恶扬善的办法，对批判对象则予以彻底揭发以至实行夸张和捏造。前者如编《六大以来》，胡乔木“客气”地加了个“稍”字，说：“当时也稍有取舍，还是有一个界限的。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刘少奇的自我批评（……）。我问毛主席，这篇文章用不用，他说不用。可见《六大以来》并不是有闻必录。”[cmlxxviii]对拥护他的刘少奇尚且如此，对自己更是可想而知。他多次说，“党书”一出，任弼时、张闻天就都缴械。这里可以补充一句，如果把毛泽东亲拟的对富田事变的《讨逆布告》、《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及其它有关肃“AB团”的文献，把指挥西路军的来往电报，把1936年12月13日讨论西安事变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1937

年“十二月会议”的发言记录，以及许多重要会议文献等，编进“党书”，毛泽东虽不一定有“缴械”问题，但起码不会那样“理直气壮”了，在《历史决议》中也很难以一贯正确自居。后者如1943年“九月会议”上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cmlxxix] 1941年六七月在约康生等人批判张闻天时，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张戴了“狭、高、空、怯、私”五个字的帽子，[cmlxxx] 1958年5月在给张闻天的信上重提五个字，还批评张一直有“大少爷气”，[cmlxxxi]多是无限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有些还正好同公认的实际情况相反，如说张闻天“私”，谁会相信？张既非大少爷，更无大少爷气。记恨和批评了几乎一辈子的关于张闻天、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唆使”林彪、刘少奇等反对他，早已澄清并无此事，但他仍继续坚持到底。至于捏造被打倒的许多人（如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的“罪状”，那就多不胜举了。

再就是自我表彰与掠人之美。例如经过毛泽东增删十次、后来干脆说成主要是他起草的《历史决议》，连胡乔木也说，“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cmlxxxii]还说，对1945年3月26日的铅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其中“重大改动”的一项为：“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关于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路线和方向是正确的，……从而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第七部分的主要内容。”[cmlxxxiii]这就是说，自己要“过分突出”自己，把“一切归功于”自己，还要说成历史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决议》把1933年春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空前大胜利，归功于“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cmlxxxiv]的缘故，是明显的掠人之美。这不是制造个人崇拜是什么？而且后来还多次在审阅文件时加上自己的名字，以至提出喊自己“万岁”的口号和加写“伟大领袖”字样。例如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就加写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cmlxxxv]这是后话。

对这些制造个人崇拜的作法美其名曰为了党的利益。开始时毛泽东本人还稍有点谦虚精神，但对此也是承认的。例如1945年4月20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就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缺点错误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cmlxxxvi]这样一来，一个“为了党的利益”，对毛就只能讲功不能讲过，逐渐变成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的了。毛泽东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谁反对他或不同意他的意见，那就可以上纲为反党反人民。毛泽东也经常利用这一点，在党内外推行以他划线的政策，动不动提出党有可能分裂，不跟他就是走反党反人民的分裂道路。不少领导人也是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照顾大局的思想指导下，违心地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转而支持和执行毛的主张。久而久之，盲目服从（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变成了习惯和纪律。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参加了扩大的军委会和外事会议联席会，听了毛泽东9月13日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讲话，其中就谈到反对他就是反党。大意是说，为什么说反对党的领袖就是反党呢？比方说一个人，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个人还能活吗？[cmlxxxvii]刘少奇也讲了类似的话，并公开声称，他就是搞个人崇拜的。其实，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威信和主张，就是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照顾大局，这种个人崇拜的逻辑，正是经过延安整风奠定下基础的。

人们也许会说，1957年前毛泽东还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在1949年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就制定了一些具体规定，如禁止祝寿、禁止送礼、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企业名字等。确实，这几点后来也真都得到遵守、完全做到了。这也从侧面说明，毛泽东如果要真心实意反对个人崇拜，对他的个人崇拜是肯定闹不起来的。其实，那几条规定多属于形式，大概同那时不让再提毛泽东思想一样，有它的特殊的国际背景。而且由于不涉及个人崇拜的实质问题（歌颂、逢迎、盲从、迷信等），结果还都保持下来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述大量事实表明在延安整风时已开始大造个人崇拜，二中全会时怎么又在少数表现形式上不准闹了？如属于认识到是个人崇拜不应该闹，那为什么后来又闹得更厉害了？可见，现象和本质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要是对闹个人崇拜的人不是重用和提升，而是批评和处分，个人崇拜就绝对闹不起来。就像后来各地争相建造别墅行宫一样，说是下面抬轿子，责任不在上面。但是如果对抬轿子的，发现一个就批判和处分一个，恐怕绝不会再有什么人愿意来抬轿子了。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受到赏识和重用的，正是抬轿子、搞个人崇拜最卖力的。在延安整风时是如此，建国后更是如此。胡乔木就说，在地方上，"他愿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其中宣传对毛泽东要迷信和盲从的，后来还得到提升。[cmlxxxviii]这就是说，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和他主持下的党中央，一直执行一种闹个人崇拜者奖（如林彪、康生、陈伯达），反对者（如彭德怀、张闻天）罚的干部政策。这也是个人崇拜之风在他生前愈演愈烈、后世也长盛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

2，参与制造个人崇拜的人们

毛泽东常说，"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cmlxxxix]要建立个人崇拜，光靠自己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得到许多人的追随和扶持，并有群众的信任。如同在封建社会的乱世中，要当上皇帝，除本人较有本领外，还得有一批文臣武将的辅佐，用"仁政"和迷信等办法吸引群众，否则是争不到龙位，成不了天子的。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就是看到时机已经成熟。这除了出现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苏德战争使共产国际无暇东顾；太平洋战起，日本兵力分散，败局已定；国民党再无投降妥协和全面反共的危险；我党力量壮大，形势相对稳定等）和内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几年的学习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反对"两个宗派"初战告捷等）以外，还具备了以下几个条件：毛本人在干部群众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拥护他的力量处于绝对优势；被认定需要消灭的山头（即所谓"两个宗派"）完全分解或失势。在这些主客观条件下，通过整风，就出现了全党要求（起码已无人反对）树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局面，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就从此开始了。

以山头而论，四方面军已完全被分解，二方面军和其它北方红军也都分别编入八路军的三个师和留守兵团，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也八路军化了，因而全军俱已聚集到了井冈山的红旗下。[cmxc]至于整风中受批判的两个"宗派"，本来就不存在，何况所谓教条宗派的博古、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等只是几个光杆司令，一批就倒；而所谓经验宗派，其内涵和外延又很模糊，且早已分化，因其重要人物多有实力和影响，所以在批判后还分别得到不同的重用，如任弼时得到提升，周恩来、朱德保住了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彭德怀、陈毅稍经曲折仍可带兵，其它沾边的检讨后也就没事了，只是影响不大的李维

汉、邓发没能进入中央。

就思想认识来说，经过整风，党内干部绝大多数是真心实意地拥戴毛泽东为领袖，并且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个人崇拜的制造。正是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不高和受中国传统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人们也并未明确分清拥护领袖和制造个人崇拜的区别。因此，许多人在主观上是为树领袖，客观上却参与了制造个人崇拜。但要说他们对自己的过头检讨和对毛泽东的过头颂扬，都是出于本人的真实认识和真实感情，恐怕也未必，特别是对多数了解情况的上层人士是要打折扣的。对他们来说，参与制造个人崇拜，除了主要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景仰、钦佩、尊崇外，也还掺杂有其它因素，如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至于掺杂的多少和具体内容，则因人而异，纯粹出于理性认识的人当然也有，但估计为数不多。下面就举几个人的例子加以说明。

在延安整风中制造个人崇拜出力最多影响最大的首推刘少奇。他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是他提出主席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组织原则；是他不但大力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且建议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在一篇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竟有105次之多；是他为维护个人崇拜奋斗了后半辈子，不惜牺牲许多原则，直到最后献出生命。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做的呢？分析起来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基于共同的认识和类似的经历，都反对过十年内战时期的三次“左”倾，并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挤和打击，可谓志同道合。二是都笃信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读马恩著作不多，又受中国传统影响较深，因而思想上具有个人崇拜倾向。三是无论对敌斗争还是党内斗争，都需要他们两人及其所代表的两大力量联合作战。对毛泽东来说，要牢固确立“中国的斯大林”的地位，必须借助原北方局系统的力量和刘少奇在华北和华中的影响；而对刘少奇来说，要维护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特别是争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cmxci]就只能依靠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几年前才说过谁也不要妄想做中国的斯大林，而且直到延安整风后所写《论党内斗争》也不引证毛泽东，[cmxcii] 1942年底回到延安后就一下来了个大转变，大肆宣传和抬高毛泽东，讲了许多过头话，如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cmxciii] 都是些无限的夸张。四是延安整风后刘少奇还一直为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斗争，既有思想认识上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形势所迫而不能再走回头路。这个问题带有极大的普遍性，也是个人崇拜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需要多说几句，并仍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为例。

个人崇拜是崇拜者和崇拜对象合力的结果，最后形成为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崇拜者情感寄托和权利让渡的过程，使崇拜对象越来越具有绝对权威，崇拜者越来越只能服从。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中提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就是让出了自己在领导集体成员中的平等权利，退居幕僚地位，把党组织中的同志关系引向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此后二十多年的毛刘关系，也就是循着这个线索逐步发展下来的。例如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作了长篇发言，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和基本矛盾等问题，并特别强调：“最后还要严格的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cmxciv]可是建国

后不久，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就遭到严厉批判，他也只能放弃己见，紧跟毛泽东“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刘少奇传》上所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和依赖的，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即使他的想法和毛泽东发生分歧，他也总是放弃自己的意见，转而支持毛泽东。”[cmxcv]这等于说，为了维护个人崇拜，可以牺牲原则。八大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和宣布他要退居“二线”，1959年还让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cmxcvi]实际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并没有去研究什么理论，党和国家的事情反而管得更多更具体。处于“一线”的刘少奇也加强了请示汇报和揣摩意图，跟得更紧了。在同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最后的长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泽东”，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也许比马克思、列宁还要好些；并一再表白，“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这场颠倒是非、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内大斗争，竟然“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新的贡献”，而刘少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cmxcvii]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还大批彭德怀，硬是给彭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这样做，不能说没有表示效忠的成分。

个人崇拜要求崇拜者对崇拜对象忠贞不贰，永远顺从。但刘少奇终究是个政治家，而不是康生式的佞臣。例如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做不出深得毛泽东赏识的林彪那种发言。所以他虽然一直设法紧跟，还是引起了崇拜对象的猜忌。七千人大会后他的处境就大为不妙了，因为毛泽东已决定要除掉他，还把这说成是树立个人崇拜的理由。毛后来曾对斯诺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cmxcviii]毛泽东本来就尊崇法家，此后对刘就更藏而不露，使你无从摸到他的意图。作为党中央第二把手又处于“一线”的刘少奇，遇事不但没有事前商量，而且还经常被招之即来，只让你表态支持和事后去贯彻执行。“天意从来高难问”，弄得刘少奇经常蒙头转向，疲于奔命。例如1965年12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刘少奇飞往上海出席打倒罗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到后才向别人打听开会内容。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访问亚洲三国后回到昆明，刚服下安眠药准备休息，又接到立即去杭州开会的电话，到后才知道要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通知》和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组织处理。这就是个人崇拜所要求的“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例证。

在个人崇拜体制下，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和周围工作人员都把揣摩领袖意图当作一件重要的事，在这方面真是各显神通。有些人摸得较准，并顺着来，结果办事顺利，地位稳当，甚至还得到重用和提升，如康生之流。摸得不准，就很难工作，甚至经常挨批，直到撤职调离。这就使许多干部往往不是以工作为重，而是看着领袖（下级又看着上级）的眼色和爱好行事，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大跃进中的假大空和其它各种运动的根子就都在此。不过揣摩领袖意图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否则韩非子的学说也太简单了。例如陈毅1958年前后曾在外交部党委会上（我当时任党委秘书）一再说过，领会毛主席的意图不能只从表面上去理解，他说要反右实际上可能是反“左”，他说要反“左”倒可能反右。当时还以为陈老总得了毛主席的真谛，但后来证明还是大多摸不准，特别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了陈伯达“天才论”的当。[cmxcix]又如陈云有一著名口号叫“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m]这是他在

延安时就讲的，“文革”后还给人题字、写条幅。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做不到，在重要时刻还是首先“惟上”而不“惟实”。典型的例子是，1959年初，陈云仔细摸了一下计划，算了一下账，认为当年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说，“那就拉倒，甚至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陈云不摸底，误以为毛是对他的意见不满，于是就赶紧作检讨。“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些话的影响。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mi]这是薄一波的回忆。薄自己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也承认，“会议‘一呼百应’，对主席发动批判彭德怀同志这一不正常、不正确的行动，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或从中缓解一下。为什么这样？”“在他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发表自己的意见。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一道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过头的话。”[mii]如果说这时候是迫于形势，有“不得已”处，可为什么散会不久却“有胆量”主动地不如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这就是庐山会议后不到两个月，“反右倾运动”正在全国走向高潮时，薄一波于10月9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miii]这时在不少农村中已有人饿死，他却在这节骨眼上谎报军情，这又是为什么？由此可见，在制造个人崇拜上或为之推波助澜上，个人得失和邀功请赏的考虑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上层领导多数人能坚持原则，“只惟实”，不随风摆，个人崇拜是兴不起来的。

当然，提倡和制造个人崇拜的人不一定都是遇事随风摆、不坚持原则。只是他那个“原则”不合乎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为了党的利益。“文革”中和刘少奇一同被打倒的邓小平，在延安整风期间和随后，也同样积极参与了制造个人崇拜，不管他当时主观上怎么想。这不但表现在他领导的反奸运动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miv]特别是反映在他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上。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在思想上，我们要提倡两个‘主观主义’——这是形容词，加重语。”“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因此，遇到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思想相抵触的时候，首先承认自己错了，这是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觉悟及学习毛主席思想的起点。”“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mv]他提出的这“两个凡是”竟如此绝对化，错误也如此明显，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自己也绝不会再把这种文章拿出来公开。这样赤裸裸地提倡和制造个人崇拜，还十分明确地表明个人崇拜并非1957年后才逐渐发展起来。“文革”后，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新的“两个凡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他说的，“‘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

题。“[mvi]这说明，邓小平是先提倡（更加绝对）“两个凡是”，后来又反对（并不彻底）“两个凡是”，除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外，也与个人考虑和设身处地有很大关系。

在提倡个人崇拜上，彭真所起作用大大超过邓小平。这不只因为他第一个喊“万岁”，而是由于他工作在中央，特别是主持包括多数七大代表和大批高干的党校整风。由于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立了大功，彭真的地位也提升得特别快，而且犯了错误也可以得到谅解和宽恕。如在整风中把党校整成“重灾区”[mvii]既未受到批评，更未影响到对他的重用。在任东北局书记时，他同陈云、高岗、张闻天、林彪、李富春等发生严重的政策分歧，官司打到中央，陈云一方坚持彭真犯了路线错误，但毛泽东作了保护，将彭真调离东北局，改由林彪任书记。[mviii]建国后彭真的工作仍一路顺风，他也仍然宣扬个人崇拜。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在怀仁堂批判彭德怀、张闻天大会的发言中，我对其中有一点印象特别深刻，大意是说，我劝同志们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少动点脑子，因为一切毛主席都给我们想好了，我们照着办就行，再胡思乱想就会犯错误。但是个人崇拜所要求遵守的一个原则是，对领袖除颂扬外，还不能批评、不能揭短，要为之掩过。而彭真又不完全是一个只爱吾师不爱真理的人。所以在因领袖的唯意志论使全国人民遭受三年严重灾难的时候，他就不完全不动脑子只是照办了。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竟在大会小会上公然指名道姓地批评起毛泽东来了。刘少奇只不过含蓄地提了个“七分人祸”就已不得了（毛泽东认为，“人”者即他也）。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mix]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先刘少奇被打倒，陷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事属必然了。

在延安整风期间掀起个人崇拜浪潮的当然不只刘少奇等少数人，争相推动和随波逐流的可说人人有份，起码在领导层是如此，包括受批判的两大“宗派”。例如最早“缴械”的张闻天，不但过头地颂扬毛泽东和鞭笞自己，把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的为首地位拱手让给周恩来军事上的助手毛泽东，而且在起草《历史决议》中对抬高毛泽东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就说，他改写的那份稿子“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思”，“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还一再强调他在评价毛泽东时加写的“有分量的话”和“重要的结语”。[mx]可见，对于连胡乔木自己都批评有“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和“把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的决议的“缺点”，[mxi]张闻天也是有相当责任的。再如被安上“经验宗派”领军人物头衔的周恩来，对制造和维护个人崇拜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延安整风可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就以忠于毛泽东、“为毛主席分忧”作为终生奋斗目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为好恶，最后做到了鞠躬尽瘁，“保持晚节”。他本人也是把整风作为政治生涯的分界线，并经常检讨的。1958年成都会议上，秘书范若愚为他起草的检讨稿上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

共，但是政治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竟严厉批评范缺乏党史知识，说自己和毛的关系，“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mxii]确实，延安整风后，他对毛泽东只有尽力揣摩意图、亦步亦趋。头一阵有时还提点不同意见，批判“反冒进”后就更加谦恭谨慎，几乎不再直接提不同意见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我曾长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事例。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和作法，不但保护了自己及大批干部和各界人士，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也牺牲了原则，助长了个人崇拜，中国经济文化发展遭到二十多年的“停滞”[mxiii]和人民由各种运动而受到的苦难，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

对于制造和发展个人崇拜，虽然所有党政干部特别是上层领导几乎人人有份，但却不能一概而论，各人的区别和变化还是很大的，这里就无须多举了。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关于宣传的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又几乎所有文化工作都属于宣传，并为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严格控制。这就是林彪说的，“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在这种体制下，只允许和提倡并奖励推进个人崇拜的文化产品，禁止和惩罚不利于个人崇拜的产品。于是，伟人被修饰得越来越伟大，逐渐变成了神，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尊神。造神必造假。造神者竞相加工，广大群众跟着朝拜，假的也就变成了真的。例如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一位朋友说他列席了一次上层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会上提到某省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重新评价布哈林的文章，有为布平反之意。与会的一位老大姐即插话说，布哈林不是刺杀列宁的吗，怎么能给他翻案？当时大家就议论说，这是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留下的印象。近来有人写了一篇题为《斯大林是怎样“伟大”起来的？——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的文章，[mxiv]就谈了不少用文艺手段装饰斯大林的事例。而且不只在形象上修饰，就连重大历史事件也可改写。十月革命的起义负责人原为托洛斯基，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已经是斯大林为首了。[mxv]正史尚且如此，其它文艺作品只会更加夸张。

这是苏联当年的情况，我们中国何曾不是这样，从延安整风起就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且不说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和戴上一贯正确等桂冠，而且所有当事人（更不用说毛周围的那些“笔杆子”了）也都合作起来改写历史，包括重大事件。例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在整风中就已得到大家“公认”，并正式写入了后世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中。[mxvi]于是，六十年来，一切官方和非官方的党史著作、个人回忆录、各种各样文艺作品，就一直按这一口径讲了下来，以致成为无须证明的公理，连一些批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中外专家学者也照抄照搬。我在接触党史后对这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只任周恩来军事指挥助手的毛泽东[mxvii]却成了党的最高领导，那为什么不让周去做毛的助手（像后来那样）呢？苦于找不到任何证据，就去请教一些党史专家，多数人和我一样茫然，只有个别权威人士给做了如下解释：一是从此后三五年的会议记录看，常委中水平最高的是毛；二是在当时军事第一的情况下出主意的多是毛；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的领导。但这种回答不解决问题。因为毛泽东就说过，“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就开不成会”。“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mxviii]可遵义会议后并未以毛“为首”，而且那时还没有实际领袖隐身幕后（如邓小平）的先例。至于其它造神

造假的运动和事例还可举出许多，也都被视为常识。如所谓红军一到陕北的吴起镇毛泽东就已得知陕甘红军领导人刘志丹等人被捕的消息，遂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只凭王首道的“顺着来”的“回忆”），使谬种流传，误人子弟。[mxix]又如许多顺着来的文艺作品和崇拜者的回忆录，把毛泽东描写和形容得生活如何朴素，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这也就成为公众所了解的生活中的毛泽东。我自己虽然以前同中央领导多少有些接触，但在很长时期对这些也有点相信。只是“文革”后看了《毛主席中南海故居》的电影（片名可能记忆有误，但内容没错。此片放映了一个很短时间就收藏起来了，大约是考虑到会产生相反效果。因为后来开放让参观的故居，已作了与电影完全不同的改装，显得朴素多了），到外地参观过一些毛主席别墅，看到那种令人惊叹的豪华（称得上奢侈），还得知他拥有那么多的私人稿费（上世纪五十年代已达百万，当时在全国也是少有的），[mxx]这才改变了我的原有观念，但仍了解不多。例如原来只知道他住在中南海并有专用游泳池，此外还留有钓鱼台宾馆12号楼。直到最近看了他孙子写的《爷爷毛泽东》后，才知道玉泉山还有“他自己的住处”，在1953年就“发现新修了一个游泳池”，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扣除了修游泳池的费用”。[mxxi]（不知是毛新宇错把中南海的游泳池也移到了玉泉山，还是真有两个。）

总而言之，个人崇拜（亦即个人专制）说到底是权力的崇拜。当它成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时候，是必然会有大批人参与的，造神造假也就变成了群众性的运动。

3，个人崇拜的发展线路

延安整风中个人崇拜建立和盛行的证据如此确凿，不可能作其它解释。单一个唱《东方红》就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马克思、恩格斯能容许说他们是“人民大救星”吗？但毛泽东所宗，并非马、恩，而是斯大林。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还在斯大林造神初期，就一下看出了他的两面性，说“他在所有行为和言论中都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但他实际上却欣赏个人崇拜（如过分的颂扬，“无数像房屋般的画像”，偶像崇拜者的欢呼等）。“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崇拜。”[mxxii]自认为“中国的斯大林”在这方面可谓竭力模仿。即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唱《东方红》、喊“万岁”和“过分颂扬”之类个人崇拜的表现，也并没感到恼火，更不用说以后了。只可惜当时延安还没有条件印制“房屋般的画像”。事实既然如此明显，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的有关宣传和著述，不但不承认，而且一直否定从延安整风开始了个人崇拜？这大概除了思想认识上的崇拜情结和毛泽东那时也表现有两面外，还因为个人崇拜有个发展过程，走了一定的曲线，也迷惑了一些人。

事实上，延安整风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经过整风的干部就赶赴各地参加争夺胜利果实的斗争。他们在整风中所学，特别是对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的崇拜也就带往各地的实践中去了。上引邓小平早期“两个凡是”的讲话就是证明。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也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超群的预见和胆略，这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信，加强了权力的更加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吴思说的“元规则”—权力最大者说了算（恕我改了两个字）[mxxiii]的作用就很显着了。所以整风以后的十多年，个人崇拜不但没

有中断，而且得到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入实际的发展。例如这样的事实总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第一，经过延安整风的干部，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思想已得到彻底改造，无论是留下还是走出解放区，都是维护和扩展个人崇拜的基本力量。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这一类小干部）都继续喊万岁、唱《东方红》，都认为毛主席精通马列、一贯正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西安事变是毛主席主张和平解决的，延安整风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建国后又出来了个王明路线）和经验主义，并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肃反（抢救）运动虽出现偏差但成绩仍是基本的，因为抓出了王实味之类一大批托派、特务和取得了以群众运动进行肃反的宝贵经验，至于打“AB团”和西路军失败等问题，或者不知道，或者归罪于“左”倾中央和张国焘，等等、等等。这类事例还可举出一大堆，我们都是相信无疑的。但所有这些却都含有个人崇拜的成分和本来就是个人崇拜，都是突出个人和造神造假的结果，因而大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二，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个人崇拜也就不断向全国扩展开来，最后稳定地立足于除港台以外的全中国。对于新解放地区的广大群众来说，由于长期的封建皇权主义影响，喊万岁、贴画像、相信人民大救星等本来就是容易接受的，何况确实也得到了翻身解放的好处，所以参与和维护个人崇拜的情绪更高。就是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像陈寅恪那样的人恐怕为数不多），也都逐渐习惯和参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接受了他在文史哲上的“左”倾观点。例如主动参加革命的吴晗，在1956年前后写的《自传》中就说，“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mxxiv]至于冯友兰改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所谓“四十万言寄所思，欲将腐朽化神奇”），曹禺让《雷雨》里的鲁大海参加了革命，老舍修改《骆驼祥子》给它安了个光明尾巴等，就是较为普遍的事了。这都表现了思想改造的威力和个人崇拜的情愫，也说明了个人崇拜理念的普及和深入。

还应承认，在个人崇拜理念的普及和深入阶段，个人崇拜的实质和造神造假的活动（如党史教育）更是有增无减，只是并未出现后来那种狂热现象，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不明显，所以不为人们重视。而且紧接着还走了一段曲线，这就是建国前后十多年对个人崇拜的某些收敛。由于苏联和国际共运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某些突出个人的做法不以为然，还被怀疑为“东方铁托”，加之我们自己又正在迎接全国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对个人崇拜有所约束，注意表现出如同斯大林两面中谦虚谨慎的一面，决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不祝寿、不送礼、不以个人名字命名地名等规定。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至今人们还在怀念解放初期那种被诗人柳亚子称作“东征西怨”的光景。[mxxv]但是实质上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还在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因此好景不长，很快就被不断掀起的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所破坏。在这期间，苏联和全世界都在揭露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国党也跟着批判了一阵。[mxxvi]其实这只是一时的表面的现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要维护斯大林这把刀子和个人崇拜的理念。而且这时中国党的力量和声望在国内外都已得到巩固和提高，对苏联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在乎了，还进一步痛恨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的揭露，从而埋下了中苏两党从分歧到破裂的根子。

胡乔木说，“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mxxvii]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的大小赫鲁晓夫以后冒头，鞭他的尸，他决定先发制人、斩草除根，把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脑后长有反骨的”，反对过自己的，表现不够驯服的，以至认为会“功高压主”的和看来不顺眼的，不论地位高低，都当作“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准备分期分批消灭之。从反右派到反“反冒进”，从成都会议上提倡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到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张闻天和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日益显露出这一计划的实施，使个人崇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至官方党史也不能不承认开始了个人崇拜。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更登上了顶峰，从走资派到学术权威，从原有的一切“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到各种“现行反革命”，从人到物（包括各种文物古迹和被认为封资修的东西），全要踏碎。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崇拜发展的必然结果。胡乔木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mxxviii]这有一定道理。既然如此，除毛泽东本人应负主要的直接责任外，其它带头制造个人崇拜（胡乔木本人就是为此奋斗终生）的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历史责任。

延安整风开始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很大恶果，使中国在各方面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文革”后，特别是拨乱反正期间，这个问题曾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思，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的经济特别是政治基础并未消除，其思想和表现也没受到认真清算，所以就又以稍有变化的形式被维护下来了。

第十七篇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下）

五，“文革”后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仍长盛不衰

（一）为什么能长盛不衰

这里所说的长盛不衰及其根源，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况。

1，个人崇拜的社会政治基础依然存在

我们说过，个人崇拜说到底是一种封建专制性质的政治体制。因此，只要这个政治体制不变，作为意识形态的个人崇拜也是不会消失的，即使小有改变，也属于形式而不影响本质。在封建王朝时代，驾崩后的老王和新登基的皇帝都会受到崇拜，且有“不改先王定制”之说。斯大林去世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还在维护个人崇拜。当然，他们在斯大林被揭露后的一个时期，起初还犹豫了一阵并小有收敛，但很快就恢复原状，还痛恨起了反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坚持实行的是从苏联搬来的一党专政下的整套专制主义体制，党禁森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来一个釜底抽薪，弃专制而行民主，改人治为法治，开放党禁，实践马克思特别强调的出版（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恩格斯直到晚年还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mxxix），个人崇拜也一定会“纸船明烛照天烧”了。但是只要这种体制还存在，个人崇拜的存在和延续（传宗接代）就成为必然的事。我们国家二十多年前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因此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使世人为之刮目。但必须承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在有些环节上还有所强化。个人崇拜赖以生存和生长的社会基础纹丝未动，这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2，个人崇拜没有得到认真清算

个人崇拜从延安整风起在中国盛行了几十年，可谓根深叶茂，无所不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不可能挥之即去。但是“文革”后我们只是进行了短时间和一定范围的拨乱反正，很快就刹了车。mxxx马克思主义自称和公认是批判的学说。“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mxxxi但是我们对个人崇拜并未进行认真的批判，更不用说深入和彻底的清算了。因此，什么是个人崇拜，长期以来恐怕人们大多是弄不清楚的。要不然，为什么八大明确反对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反而越来越凶；十二大更在党章上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mxxxii但实际上十二大本身就没有摆脱掉个人崇拜的阴影，如对毛泽东的继续过头歌颂，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推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十二大后维护和宣传个人崇拜反而比前一阵拨乱反正时期更加兴旺起来，党史上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造神造假活动迄未停止。而支持和进行这些活动的，正是党的前后领导人和掌管宣传及党史研究的部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们下面还要分别论及。

既然作为政治体制的个人崇拜实为个人专制或个人独裁，因此维护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也就是争取民主和维护专制两种力量和两大倾向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的性质可以是敌我斗争，也可以是人民内部斗争，但总是势不

两立。当年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口号就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取得政权后，事情随即翻了过来，我们变成压制民主和限制自由（事实上而非口头上），主张专制独裁，[mxxxiii]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个人崇拜形成之日的延安整风起，维护和反对的两种倾向就一直存在，建国后更是越来越明显。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场党内斗争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斗争的结果人皆尽知，是毛泽东威权的进一步提高和个人崇拜的走向顶峰，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

3，个人崇拜一直得到维护

“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又规定了“严禁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实际并未解决维护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因为这是民主和专制的斗争，不可能说停就停。当然，某些表现形式会有点变化，如喊万岁、到处挂像之类，但斗争仍在继续，有时甚至比以前更为激烈。在“文革”末期，毛泽东健在的时候，反对个人崇拜和要求民主的斗争就已导致了以悼念周总理为由的群众运动——天安门事件。维护个人崇拜的人把这说成是反对“四人帮”，恐怕并不尽然。那时群众还不知道有个“四人帮”，实际上是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总指挥毛泽东。这只要把周毛二人逝世后的群众反应作一个对比就会明白。尽人皆知，周恩来逝世后有十里长街送别和天安门事件，而毛泽东逝世后却是比较冷清的（某些单位和少数农村也许例外）。北京除上层争权显得气氛紧张外，在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几乎是若无其事。因我当时就住在东交民巷，那天直到晚上还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只见成堆的人在乘凉，聊天嬉戏如常，只有很少几个人走上金水桥向毛泽东遗像鞠躬悼念。与“文革”初期那种狂热，真是形同天壤。后来，毛泽东扶持起来的妻子和亲信被逮捕法办，全国城乡反而是欢呼庆祝。经过三年困难和十年浩劫，人心向背已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能清算个人崇拜，进行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与马克思主义所不容的封建专制体制，如党管一切、一元化、委任制、等级制、特权制等，那中国就必然会更迅速、全面地走向现代文明，社会也会长期保持真正的稳定。可惜我们没有抓这方面的工作，像建国后几十年耽误了一场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一样，“文革”后又耽误了一次政体改革的难得机会，不但恢复了上述旧体制，而且还不断朝更差的方向发展，如扩张官僚机构、强化控制镇压、拉帮结派、亲缘政治、腐败成风等等（把不良风气说成开放引起的外来影响，纯属借口），使今后的政治改革只能越来越困难。“俟河之清，人生几何？”清明政治，我们这老一代人是根本看不到了。

其实“文革”后，新领导班子执政，为了改弦更张，跳出“文革”的泥坑，大力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毛泽东作过一定程度的反思，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改变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政策，使中国面貌为之一新，人民生活得到显着和不断的改善。但就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言，无论是原先在位的还是重新当权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坚持个人崇拜的，因而使维护个人崇拜的潮流虽有波动，但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反对个人崇拜和要求民主的运动固然不时兴起，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只要稍为回顾一下二三十年来的情况就可了然。“两个凡是”的时期自不必说。而反对“两个凡是”的力量也是复杂的，起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真正反对个人崇拜的，

包括相当多的中下级干部、广大的知识界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例如在1979年的务虚会议上，有的中央领导干部就曾对毛泽东进行了尖锐的指责。但在上层中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却主张维护个人崇拜，只是由于要解放领导干部和改变毛的政策而反对“两个凡是”。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形成的这种力量对比，就使中国党不可能进行清算个人崇拜，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政治民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反思，曾经出现过一个思想稍为解放、言论稍有自由的宽松环境，也产生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一些档案的解禁、政治和历史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鸣、“伤痕文学”的兴起等效应。但时间不是很长，更未真正着手政治改革。而且总的说来，要求民主、反对专制（亦即个人崇拜）的运动还是屡战屡败。经过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批判异化等，直到镇压1989年天安门的“反革命暴乱”，中国社会就进一步陷入近于万马齐喑和管制得越来越严的状态。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多少国家的群众在用集会结社等各种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和要求，但中国却始终表面上平静如水，哪怕是涉及本国和群众自身利害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最安全”。

（二）“文革”后个人崇拜的主要表现

1，维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十种做法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党的领导人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着重点，不是清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是竭力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的必须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因此反对“两个凡是”，也不可能是认真和彻底的。例如研究党史必须遵守两个《历史决议》，就是维护在党史领域的“两个凡是”。而第一个《决议》连胡乔木都说，它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mxxxiv]但对党史研究和广大公众却仍是不可逾越的雷池。急于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为了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敲定”下来，把迫害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九个指头中一个指头[mxxxv]的“晚年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掉。所以邓小平还在复出前就已上书中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mxxxvi]复出后更是一再强调：“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mxxxvii]还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mxxxviii]虽然为了取得公众舆论的认同，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及有关文献和领导讲话中，也指出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还专门发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合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渐减少到必要限度。”[mxxxix]但是中央主要领导人重视的还是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反映到体制上的特点正是领导说了算和第一把手拍板。因此才使“文革”后的个人崇拜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固然有所节制和减少，而实质上却继续受到尊重并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毛泽东的持续宣传和歌颂。“文革”后即使在拨乱反正（当时的正式解释就是拨“四人帮”的乱和返回毛泽东思想的正）期间，官方舆论和传媒主要的也还是正面宣传毛泽东。当时的平反，不能说某人是坚持真理，反对个人崇拜，或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得对，而是首先为他摘掉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我自己受命为张闻天起草有关平反文件和为人代笔或自撰纪念文章，都是要一再说明张闻天是衷心拥护而不是反对毛泽东的。许多领导干部和老干部找人写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也是表彰毛在各方面和各时期的功绩，还夹杂大量夸张、拔高和编造，如我在前几篇笔记中提到的一些人的回忆录。而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实际上已停止了对毛泽东的反思和逐渐禁止讨论毛泽东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灾难，使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事实上的禁区或变相禁区，如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以至“文革”。另一方面却大大加强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和歌颂，有关书籍至今已出版上千种，文艺作品如电视剧也连绵不断。

二是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移花接木、改写历史。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前面已多次提到。对此，连胡乔木也是承认的。他说，中共中央领导编写党史的工作，“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mxl]关于为毛泽东隐恶、开脱和圆谎，还可以再看以下几个例子。为什么《毛泽东文集》八卷，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多是两三年或三四年就编一本，而1959年起的十六年才编了一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十三卷，1966年以前都是一年或两年编一本，而1968年以后竟长达八年才编一本？这显然是因为后来的许多言论实在不便公开，因此就不顾历史真实而为尊者“讳”掉了。官方党史著作和传记年谱还有意隐瞒许多重要史实，如准备主动分裂国共合作抗日的所谓十五万精兵计划、毛泽东向斯大林的一些重要请示汇报、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致毛的一封关系重大的密信等。再如毛泽东倡导党的三大作风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自己却并不执行，还说什么他是不作自我批评、不下罪己诏的。他对同僚有了意见，也从不当面交换，多是选好时机算总帐，一旦提出，对方就有被打倒的危险。对于这些，官修党史和传记是并不反映的。延安整风初期，对张闻天就来了个突然袭击。“文革”初期，对刘少奇则是一举打倒。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林彪，建议设国家主席，于理于法并无不妥。如果怀疑或肯定他是阴谋篡权，那完全可以面谈或开会揭发批判、以至通过决议撤职查办、打倒关押，而不该采取毛泽东自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写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态度。[mxli]至于移花接木，就是党的领导和党史界把别人的功绩放到毛泽东的名下，把毛泽东的过错放到别人的箩筐里。例如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时，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一开头就说刘少奇受林彪、“四人帮”迫害。[mxlii]这就有点太离谱了。又如说张闻天“完全拥护”毛泽东等“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mxliii]张闻天主持制定并写成《瓦窑堡会议决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连毛泽东当时也一字不改地表示“完全同意”。[mxliv]可到了被称为中共党史学开拓者胡乔木的手里，却变成不是会议决议而是毛泽东的传达报告，“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甚至“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mxlv]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创建了十多个根据地、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建树，都一律被挂到了毛泽东的帐上。甚至连个释放刘志丹这点好事，也都要归功于毛泽东，并杜撰了一个“刀下留人”的传说。上述这些显然都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而改写历史。

三是对毛泽东继续进行美化和拔高。这在“文革”后的党史研究、各种回忆录以及各种文艺创作中从来就没停止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更加大了美化和歌颂的力度。直到最近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些党史著作还无视历史事实而只凭某些言词宣传毛泽东的伟大。例如有的文章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时就计划废除“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这可能吗？）；还说一个时期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是胡乔木说的“因为苏联的关系”等原因，而是我们党已“有了高度的自信”（那1959年后的大提特提是否又失去了自信？还说“这是历史的辩证法”）。[mxlvi]有的文章说，中共党内没有人出来“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毛泽东“来倡导”。[mxlvii]前面已经谈过这是不合乎史实的。何况深谙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都说，“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xlviii]许多更重要的不合乎实际的说法竟被定为正式结论。如说，延安整风中康生掀起抢救运动，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为党为人民而防修反修，只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mxlix]还有些美化的作法，如提出从1958年起直到庐山会议，毛泽东都在进行“纠‘左’的努力”；庐山会议后一年多，毛泽东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人们不清楚“四人帮”是怎样上台并取得显赫地位的，却只见毛泽东总是“批评‘四人帮’”；[ml]同伟大领袖毛泽东结婚相处40年、自称为“毛主席一条狗”的江青，竟然早已是反革命。其它如最后改编只剩下七百余人的秋收起义，被肯定为胜利；而开往井冈山时还有一万二千人（其中二千主力，一万农军）的南昌起义，却被说成失败。[mli]由于毛泽东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系一般会员，不出名，受到党史界的冷落；“新民学会”为毛泽东创建，就被大讲特讲。

四是对推行个人崇拜的放行、奖励，对不利于个人崇拜的查禁、处罚。二十年来，有许多美化和拔高领袖、宣传个人崇拜的作品得到了各种表彰奖励。而揭露真相、涉足禁区、有碍个人崇拜的作品，轻则查禁，重则处罚（作者被列入不得在报上发表文章的“黑名单”或找别的理由加以处罚；编辑出版部门有关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警告、调离、甚至判刑处分）。我们看到，在转折时期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甚至二十年担任党中央第二把手后兼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很少有电视剧，更不准提他们被批斗和管制关押的悲惨遭遇。周恩来的电视剧倒不少，但不利于个人崇拜的，如癌变扩散前不准开刀，病入膏肓还要接受无端的严酷批判，身瘦仅剩六七十斤时还要躺在床上写检查等，就不能在作品中反映。连《潘汉年》的电视剧也历经磨难，最后还被砍掉不少。[mlii]有些作品还长期被扣押，包括一些著名人物的回忆录、以及已拍好却遭禁映的有关名人的电视剧等。因反映实际、被认为不利于个人崇拜（直接或间接有损于毛泽东形象）的作品遭到扼杀、枪毙和胎死腹中的数量之多，恐怕是无人能统计出来的。在这种舆论导向和环境所迫下，人们就自觉（可以名利双收）或不自觉（认为应该如此）地竞相创作起个人崇拜的东西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毛泽东的而且有许多是不实事求是的论着和作品那么多、还越来越多的原因。

五是为维护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威信）使历史上不少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例如当年苏区在肃清根本不存在的“AB团”等中，错杀了十万左右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优秀儿女（有名有姓的“AB团”七万多，外加“改组派”两万多，“社民党”六千二百多，[mliii]还有许多未查出名姓的冤死者未包括在内），而毛泽

东却始终认为杀得对。建国后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还是说，“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mliv]“文革”后，经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正准备平反，只因总书记胡耀邦下台，遂使问题长期搁了下来，直到现在仍未得到正式平反，有些冤死者家属曾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拨乱反正后也享受不到烈士家属待遇。又如我们一再提到的西路军遭歼却被毛泽东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mlv]这一重大冤案和根本违背事实的结论持续了四十五年，许多当事人如一直强调“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陈云以及徐向前、李先念等始终都不敢提，直到毛泽东去世八年后的1981年才谈起，由李先念主持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批：“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mlvi]后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专门作了说明。但这能算正式平反吗？为了维护个人崇拜，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冤沉海底！还可举蒙冤二十六载至死未得到平反的粟裕大将的例子。粟裕是著名的常胜将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做出过卓越贡献。他曾三次提出不同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的建议，包括反对渡过长江的南进战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mlvii]历史证明，这些建议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均为中央所采纳。但是在1958年5—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受到无端的残酷斗争，毛泽东甚至在不久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点名说他是军内的“坏人”，遂即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传达到军队团级和地方地委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粟裕一再提出平反的强烈要求，但直到他含冤去世，中央的讣告中仍无一句提到对他的平反，只是后来军队领导人在署名的纪念文章中才说，1958年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mlviii]不知这算不算正式的平反。

六是不敢正视历史错误，不愿接受经验教训。民主革命阶段在毛泽东当权后，虽然也有不少失误，但总路线基本正确，因而取得革命胜利。建国后不久却执行了一套“左”倾错误路线，而且愈陷愈深，使中国走了一大段弯路。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隐匿大家紧跟的责任，硬是要歪曲历史，造成不少自相矛盾，即许多原来的错误，拨乱反正后已经改了，但还要说原来正确。如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完全正确”，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与手工业合作化又“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mlix]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走回头路，改变“完全正确”的东西，如鼓励私营工商业和农业包产到户？而且也无法回答：中国经济头二十多年的停滞和改革后的加速发展，原因是什么？把摧残知识分子和践踏科学、破坏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饿死数千万人和制造阶级斗争，称作“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mlx]这合适吗？把这说成“开始”，是否表示继之而来的就只能是“文化大革命”了！至于外交上的重大失误自然也不少，邓小平指出的闭关自守和关起门来搞建设总不能否认吧。对内搞“文化大革命”，竟“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mlxi]这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不通的。用“两个凡是”和“九评”[mlxii]的观点写的新中国外交史和有关问题的专着如《十年论战》，[mlxiii]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七是保留个人崇拜的文物和遗迹。建设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既是个人崇拜的产物，又完全违背毛泽东本人的意愿（他曾带头签名提倡火化）。邓小平也说，“建是不妥当的。”既如此，理应知过必改，但为什么不改，还要用来继续制造个人崇拜呢？说是怕“人民就要议论纷纷”（其实，只

能是少数领导人的议论）。那原来说天安门前的斯大林像“要保留”，[mlxiv]后来不保留了，就不怕“人们议论纷纷”？看来还是要尽可能坚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约出于同一原因，各地的毛泽东纪念馆和故居还在不断扩大和修饰。韶山、西柏坡等都不断扩建，成了学习瞻仰圣地和旅游参观景点。天安门城楼的画像永远要保留下去。[mlxv]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还把毛泽东的像印在百元钞票上（许多国家的纸币上都有人头像，但不是只突出一个人，既有皇帝和领袖，也有其它历史名人）。以前印的毛周刘朱，还有点集体领导之意，后来就只突出毛一个人了。还有引起学界不满的一件事是，大力提倡具有明显个人崇拜思想和江青“三突出”手法的某些样板戏，大肆花钱恢复歌颂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文艺作品和其它文物。

八是放纵和误导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某些回潮。例如产生于1986年前后的一种被称为“寻找毛泽东”的社会现象，[mlxvi]其实多半是体现了部分青年对某些现实问题的迷惑与不满，如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波动，领导干部的特权等，因而怀念毛泽东时代表面上的“公平和稳定”。一些人试图通过理性的思考，从毛泽东那里寻找到一种理论来解释现实；一些人则借唱已往的革命歌曲包括毛泽东的语录歌以抒发激情。有些“左”派人士，对此不是向前引导，而是拉向后退，误以为这是人们希望恢复毛泽东体制的表现，因而乘机大反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事实的发展表明，并没有出现一个他们希望的“毛泽东热”。“寻找毛泽东”既未导致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还很快无结果而终，甚至有不少人走上了反腐败要民主的道路。至于大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也是流行一时声渐歇。而工农群众中对毛泽东的怀念还表现为神化和迷信的行为，如为避免交通事故在汽车上挂领袖纪念章，为保四季平安在家中供奉领袖像，甚至传说和相信毛泽东生日韶山冲曾发生“龙光射斗牛之墟”的现象，等等。这既反映了群众的怀旧感情，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说明个人崇拜的阴影还严重存在。我们的宣传部门，虽然遵奉无神论和科学观，但因这些社会现象涉及的是毛泽东，自然不容讨论和解释，客观上是对个人崇拜的鼓励。

九是继续保持和增设有利于维护个人崇拜的禁区。不准批评领袖就是其中之一。对领袖以至所有领导人，一切党员和公民都可进行监督和批评，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因此就是斯大林、毛泽东也从没说过他们不能批评，相反，说可以批评和欢迎批评的话倒是更多些。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在世时，谁批评就会以反党甚至反革命论处。现在对斯大林可以自由批评了，对毛泽东有一阵也允许以建国后的《历史决议》为限进行半自由的批评，只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限制越来越严。更重要的是，这一不许批评领袖的个人崇拜标志还传了下来，即后来的领袖更不容许批评。例如现在中国的传媒，似乎对毛泽东还可稍作批评，因有《历史决议》可循，但对其继承者，就不准批评了。这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也违背党章规定，而且不合乎邓小平的言论。他就不只一次说过，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他也有份，中央过去做错了的事，他有责任，对他能作“六四开”他就满意了，等等。他还说过，周恩来也做过违心的事，说过违心的话（这也应分清真伪，还历史本来面目）。那为什么对这“四成”错误就不能进行公开讨论和分析批评呢？这种做法，必然妨碍接受经验教训，使一些错误得不到改正。如果当初毛泽东的错误一出现，就会受到批评和监督，中国也许不致吃大跃

进、“文革”等那样的大亏了。不准批评党的领袖和一些领导人，正是个人崇拜得到维护的一个重要表现。

十是把有助于维护个人崇拜的规定写进党章、宪法及其它法定文件，只让党员和公民学习与遵守，不得讨论和提不同意见。党章规定党员必须遵守党纲党章，但不是说不能对党纲党章进行讨论和提不同意见。否则党章（宪法也一样）就只能是一次完成、永远不能变更的了。这样一来，以后的每次修改就都失去了法理根据。总不能说，与时俱进地修改党章、宪法和某些文件，只能是少数领导者的事，广大党员和公民只能接受和遵守而不得发表点不同意见。不允许讨论党章、宪法、某些文件以至“重要讲话”，这是既不合理（马克思主义和普遍的民主原则），又不合法（剥夺党员和公民应有权利），因而不应列为禁区的。

2，邓小平在“文革”后维护个人崇拜中的作用

（1）邓小平是拨正中国发展方向的历史巨人

邓小平自称是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因此他在处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上也起了主要作用，并带有明显的两重性。他以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纠正毛泽东的一系列严重错误，破除毛泽东许多违背潮流和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思想；但他又坚定不移地以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名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保持毛泽东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都是中国的伟人。毛泽东实现了中国的独立统一，使“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则扭转了中国千年来停滞和落后的局面，使中国开始走上振兴和崛起的道路。举世公认，自汉唐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就一直在世界上领先，但封建专制制度却使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在西方产业革命后，中国经济所占世界比重更迅速下降。新中国成立后，下降的速度反而大为加快，就是我们在前面一再说过的，从1955年经济恢复时的4.7%降到1980年的2.5%。由于国力不强，无论当年我们怎样自夸，国际影响终究有限。例如我们对美侵犯我领海领空曾警告过三千余次，不但没人理会，还变成了国际笑话。由此可见，单是“站立起来”，如果吃不饱饭，就直不起腰，甚至有摔倒危险（也确曾处于崩溃边缘）。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时代特征，执政后立即决定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摆脱了两千年的经济停滞和大饥荒的周期轮回，也使我们告别了长达三十年购物靠票证和排长队的短缺经济，像我这类干部也起码不必如同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再为下放劳动时会成为饿殍而担心了。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仍然有限，经济总量的世界比重还没有恢复到1955年前的水平，但世界上已谈论起“中国威胁”，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应该说，邓小平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确乎前无古人，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毛泽东。

邓小平的伟大倒不在于创造了被一些人归结为完整体系的新理论，主要的还是能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而不受教条主义束缚的实践。他不管马克思列宁怎么说（这方面的著作，他也确实读的不多），不管“两个凡是”，不管“鸟笼经济”，不管姓资姓社，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可借鉴，就可试行，从而抛弃了由斯大林创建、为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给中国找到了人类文明必由之路的经济市场化。这也

是中国志士仁人二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道路。单是作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足以名垂千古。但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和不允许党和非党群众批评的。

（2）邓小平又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主要维护者

邓小平推倒了毛泽东时代的僵化经济体制和各项有关的清规戒律，使中国经济得到空前大发展。但他又坚守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主要维护者，使中国失去了一个解决个人崇拜问题的好机会。

前面一再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体制问题。所以解决个人崇拜问题也就是进行政体改革，实行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应该说，“文革”后，不但对经济改革，而且对政治改革，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经过十年浩劫，广大干部群众对个人崇拜体制可说已深恶痛绝，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明显下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群众运动就是证明。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同“两个凡是”势力的斗争中，邓小平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对他寄予巨大希望，要求他出来工作，祝愿“小平，你好！”那时他也和人民站在一起，提倡解放思想，强调实现民主，[mlxvii]反对特权和特殊化，反对以党代政和第一把手说了算[mlxviii]等等。他不但为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平反，而且开始时还支持西单民主墙，说是“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mlxix]叶剑英甚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mlxx]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原有的特权和等级制尚未恢复，新获“解放”的干部要求还不太高，全国上下都在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地拨乱反正、重整乾坤。这时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中央领导，如能顺应民意、开放党禁、进行政改，不但不会影响稳定，而且可以实现大乱后的大治。在人心思定、群众怕乱的情况下，既是进行政改的好机会，也容易恢复旧的政治秩序。可惜当时采取的是后一种方针，即维护毛泽东的政治体制和思想管理，当然也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是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就一直强调的，并为此作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二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文革”后百废待举的情况下，要急于作出一个《历史决议》，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个人崇拜，而维护个人崇拜又是为了恢复“文革”前的政治制度，包括以党治国、领袖专政和接班人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变相终身制、干部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等级制和特权制，以及由此滋生的特权阶层。[mlxxi]邓小平一再明确指出，作这个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mlxxii]“阐述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mlxxiii]陈云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急于作决议的原因：“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mlxxiv]这个决议虽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但还是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行规矩——领导说了算，起主要作用的也就是邓小平、陈云等少数几个人。邓小平不同意，即使多数人的意见

也会被推倒。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当时就不少。还在起草过程中，就得一切按他们的意见办。例如邓小平一次就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mlxxv]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就只能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mlxxvi]这当然不是站在几百万含冤受屈者和几千万因人祸而饿死，以及因经济落后和灾荒而受苦受难的全国城乡广大群众一边，而是要竭力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历史决议》为个人崇拜的长盛不衰打下了基础，定下了准绳。

其次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恢复和巩固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政治体制。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mlxxvii]可胡乔木却说，“实事求是来说，毛主席在八大以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怎么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党内有时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mlxxviii]这就出了一个问题，“肯定”“文革”前的十年，是肯定毛泽东的思想呢，还是肯定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就一再说明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为此还把对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称作“自由化”，而加以坚决镇压。[mlxxix]原先所提四项原则中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显然已经过时，没人再谈了。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党的领导”，[mlxxx]问题就复杂到谁也说不清。在当代中国，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无法界定，还谈什么专政？而且根据过去和现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正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哈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已断言的，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和党的领袖的专政，是党的领导者专无产阶级的政。普列哈诺夫还进一步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他们又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而“工人就其教育、文化程度和世界观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水平……时，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mlxxxi]现在历史又前进了八十多年，世界变化之快和之大，也是普列哈诺夫无法想象的。难道马克思主义还只能限于百多年前的水平，而不应也不会再发展了？至于“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历来都是不清楚的。延安整风确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直实行的都是一党专政和党管一切。而且“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就是要全体公民都得遵守，都得坚持。[mlxxxii]因为坚持就是服从，这样一来，于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实际上就都没有了。宗教信徒也都得“坚持”无神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四个坚持”实质上就是坚持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正是抓这么两件事，一是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一是毫不松懈地抓反对“自由化”，[mlxxxiii]而且两手都要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方面获得经济大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政治改革（即民主化）的严重滞后，导致腐败成风和特权阶层迅速发展。但是经济和政治不协调发展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邓小平自己就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mlxxxiv]而且岂只难以贯彻，还为转型期的权钱交易和掠夺国家资产提供了机会。

所以总起来看，邓小平对中国历史留下了两份遗产：坚持改革开放，集

中发展生产，实现经济市场化；维护个人崇拜，禁止言论自由，扼杀政治民主化。

3，维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表面理由和真正原因

这里所说的维护个人崇拜，一直都是指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在名义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人崇拜就遭到批判，十二大以来的党章更加以明文禁止。但实际上，个人崇拜却至今不衰，主要表现为对个人崇拜不许认真批判和清算，对毛泽东只能隐恶扬善和尽情歌颂，以至继续造神造假。一言蔽之，就是大力保全前面谈过的那些标志和表现，只是名之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既然二十多年来的历次党章都明文禁止，那么要在实际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得讲出道理来。归纳起来，表面上所提理由大概有以下几条。

一是因为毛泽东的功大于过，所以要坚决维护。邓小平就一再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mlxxxv]对此绝对不能动摇。起草《历史决议》应遵守诸如"宜粗不宜细"、"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建国后十七年……基本方面还是对的"[mlxxxvi]等这样一些原则。这当然谈不上实事求是。因为建国后的总路线和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事实证明根本错误的。再如写建国后的《历史决议》，为什么陈云却要建议加写此前的二十八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1958年起更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合乎马克思主义吗？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响应号召"帮助整党"肯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错误只在扩大化），合乎历史事实吗？列宁说，"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mlxxxvii]以此衡量，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的行动，就是反右派运动，以及不断的阶级斗争；在《论十大关系》（还是经过胡乔木等人的多次修改，[mlxxxviii]直到毛去世后才公开发表）报告后则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全面比例失调，这能算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论贡献和重要思想吗？至于功过三七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量化或形象说法，在多数场合下，其实只是为掩盖错误和罪责的一种遁词，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和汲取不到什么教训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其目的都是要尽量肯定和拔高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以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二是对毛泽东的错误（有些对人民的摧残已不能以错误论）不能揭发更不能清算，否则就是否定毛主席。由于毛是我们党的领袖，所以否定毛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就是给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抹黑。[mlxxxix]这种说法正好把毛泽东摆到了"朕即国家"的地位上。不然为什么否定一个人就是否定历史，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难道一个人就等于历史、等于党和国家？秦始皇被批判（否定）了两千多年，不但秦汉历史没有被否定，中国也没有从此变"黑"。陈独秀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并连任五届总书记（称呼也还有主席、委员长等），后来被否定了，但却既没有否定历史，也没给党抹多少黑。何况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毛泽东都并不存在"否定"的问题。鉴于过去长期的个人崇拜及其留下的有害影响，对毛泽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极为必要的，特别是一贯的为尊者讳、隐恶扬善和造神造假，已经搞乱了历史。为人民负责，为历史负责，便于汲取教训，以利教育后人，对历史问题应该还其本来面目。该肯定

的，坚决肯定，该否定的也不必怕揭疮疤。既然讲实事求是、光明正大，就完全不必隐瞒历史（包括依法解密档案）和暗设禁区。提出“否定”“抹黑”这样的大帽子，实际上就是使人们不敢离开规定好的统一口径，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评论。

三是“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在讲的。对于这个提法的妥当与否，这里不拟讨论，而只是谈一下，允许研究和评估包括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等在内的历史问题，是否就会破坏稳定、影响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大局。从中外历史和长期效应看，情况倒是往往相反，在经过争鸣弄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后，局面可能会更加稳定，人民也会更加团结。远的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就是鲜明例证。当时并没有怕“否定”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而是大胆地陆续否定了毛泽东一生中所干两件大事（推倒“三座大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和毛泽东思想两大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人将这部分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既违背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也不合乎有关的理论原则），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建国后推行的路线（名义上的肯定是不真实的），包括穷过渡和一公二纯的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右派（保留几个以示正确，完全是人为的）和知识分子改造、反右倾和“四清”以及反修防修等等。所有这些不能说事情不大，但其结果却是摆脱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和“内战”，实现了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的大团结。

为了以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名、实际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提出的理由还有一些，也不能说都完全没有道理。有些问题的讨论，从表面上和短时间看，是会影响一定范围的安定团结，但从实质和长远看，结果却并非如此。例如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争论就很激烈，有些发言也很尖锐，但影响所及也并未动摇全国抓经济建设的大局。所以上面列举的三条或其它类似的理由，都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且势必要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说，“1966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mxc]这合乎历史事实吗？没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们能“闹”得起来吗？没有毛泽东，又哪能出现什么林副统帅和“四人帮”？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坏事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毛泽东只负发动之责且有诸多纠偏之功，恐怕是当代中国最不实事求是的一个流行公式，根子就是一切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既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际上破除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极左路线，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是那样大得人心，进行顺利，为什么不去趁势稳步但彻底地清算个人崇拜，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上完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而一定要百般设法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这个问题，兹根据个人现在的认识，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是为了维护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就是维护党的领导和听党的话。对此，除了上引邓小平解释拨乱反正的说法外，胡乔木也讲得非常明确。他说，“在讲到现在的时候，稿子着重地讲，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毛主席确定的。”[mxci]邓小平在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也提醒说，“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mxcii]其实，不论叫做体制、路线，还

是四项基本原则，关键的关键就在于维护党的领导。保证了党的领导，其它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党的专政。这是斯大林老早就已作了明确说明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它政党分掌领导。"[mxciii]如果进一步看问题的实质，那么党的领导、党的专政，实际上也就是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领导和专政，并且从上一直贯彻到基层。例如车间、商店和村庄，就是支部书记对本单位党员和广大非党群众的领导或曰专政。所以，党的领导就是掌权，而权又是哪个阶层、哪些人（例外只能是个别）愿意自动放弃的呢？

第二，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个集团行为。既然维护个人崇拜就是维护党的领导，而维护党的领导已不是个别人的意愿，而是名为全党、实为有一定权力的干部们的要求。所以邓小平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mxciv]其实，前面两个通不过，是说不清楚的。例如说老工人通不过，有何根据？那是否说新工人就可通过？至于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我倒有亲身体会。我曾在不同地区做过三四年土改工作，看到在分得土地后，贫下中农确实高兴、积极参军支前的情况。但等毛泽东掀起"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搞全面合作化时，多数农民就只是服从，劳动积极性明显下降。到人民公社化，那已属于强迫命令了。1960年我下放安徽六安县苏家埠劳动改造，每天每人的原粮供应只有老秤（16两一斤）三两，饿死人自然是普遍现象。当地的主要作物玉米已长到两三尺高时，由于行距不合规定的"密植"（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一项）标准，上级勒令一律铲掉，重新播种。虽然那年风调雨顺，施肥充足，却因贻误农时而颗粒无收。有些淳朴的贫下中农就暗地里问我："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心狠，就是不让我们吃饱饭？"（问这类话的有当时就是党员的贫农子弟，至今还和我有联系。）应当说，农村合作化后全体农民都已被折腾得够呛了。废除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包产到户，得到农民热烈欢迎，就足以说明一切。连新老工人、新老农民的真实情况和意见的反映都遭到查禁，可见说他们"通不过"只是想当然而已。只有"一大批干部通不过"，可能是实情。因为革命胜利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获得或大或小的特权，而且上下相依，官官相护，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特权群体。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自由化"，维护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和思想，应当看作是自然的事情。在这方面能够集中反映他们意见、代表他们要求的领导人，就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和颂扬。而有所违背他们的利益，例如主张限制特权、搞点民主改革和舆论监督等的领导人，就会被他们设法推翻以至打倒。他们反对政治改革，但一般还支持经济改革，使权力进入市场，可让家属接班或下海。所以他们及其代表，维护个人崇拜的专制体制是必然的。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

第三，当个人崇拜成为政治制度的时候，就"改也难"了。邓小平就几次提到这点。例如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mxcv]邓小平在这里没有说明这个"制度"的含义，使人弄不清怎么连毛泽东也被不好的制度推向了反面。但在另一地方，他暗示所说的制度

就是个人崇拜制度。他说，“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mxcvi]很明显，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和以胡乔木、胡绳为代表的官方党史编纂学派都有难言之隐，因此只能点到为止，不能深究，致使许多党史专家至今没有谈清楚这个“制度问题”。看来主要就是延安整风开始形成的一套成文和不成文的体制和规矩。例如延安整风培植了一种说真话吃亏和说假话占便宜的规矩和风气，建国后随着个人崇拜（亦即独断专行）的迅速发展，这股风气也就愈刮愈烈，从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说假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已变成主流作风。所以在大跃进宣告破产、饥荒开始来临的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一再呼吁、指示，以至以个人名义给从省委到小队长级干部写信，提出要使“下情上达”，“要讲真话”，承认“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mxcvii]这些大概都算“好话”吧，但结果不仅丝毫没有见效，而且到下半年的庐山会议已发展到整个中央委员会都说假话了。原因确是制度不容说真话，而执行这个制度最坚决的就是毛泽东本人。说了不多几句真话的一大批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先说了几句真话，后来一看大事不好，很快改为说假话的许多人，也都转祸为福。始终说假话的人，更是弹冠相庆，地位上升。不知邓小平讲的“制度”问题是否包括这一内容，但上面提到的党领导一切（即全面专政）、一元化（简化为党的第一把手说了算）、终身制、接班制、委任制、保密制、舆论一律等等，当属制度问题无疑。个人崇拜正是建立在诸如此类的制度的基础上的。要保持和巩固这些制度，就必须在实际上维护个人崇拜。

第四，有个责任分担和荣损与共的问题。邓小平、陈云等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是把他们和毛泽东连在一起的。他们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作。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mxcviii]这就是说，过去的“贡献”除毛泽东外，也有他的战友的份。那么责任也自然一定共同承担。他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接着又自相矛盾地说，“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mxcix]但不管是自觉或被迫，对过去的错误总是逃脱不了一定的责任。所以他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惟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mc]这已经说得很明显，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所以必须评论从宽，例如说反右派是正确的，只是错误在扩大化；大跃进，大家都头脑发热，因此在写历史时对这些就一定轻轻带过，“宜粗不宜细”。至于“文化大革命”，由于后来的领导集体多是受过迫害和压制的，所以可以全盘否定，责任都推给林彪、“四人帮”。殊不知大跃进、反右倾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态破坏、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这都说明，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实际上也就是保护自己。这同样表现在关心对个人的历史评价上。毛泽东晚年最担心的就是怕出“赫鲁晓夫”，如同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他。上引陈云的话也说得明显，否定了毛泽东，也会连我们这些人都给否定。所以说，还是领导人子弟接班比较好，起码他们不会“挖祖坟”。可见，人们多是不愿承担错误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和放弃既得利益的。例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除不畏高压拒绝了投票的陈少敏一

人外，与会者全都举手同意。事后对此有所检讨的，似乎又只有胡耀邦一人，至今尚未见到其它与会者本“只惟实”的精神表示过悔过。

第五，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维持政权的正统和体制合法性的需要。毛泽东长期担任党的“一元化”领袖，又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不算先后给他加的其它桂冠，如党的创始人、从建党起即为一条正确路线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等，单是头两项就足以说明，他是中国党和国家正统的合法的代表。根据封建礼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被他认为是反对和背叛他，那也就成了反对和背叛党和国家；维护他的地位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永远忠于他就是尽忠党国，甚至是保持晚节的基本条件。在这种传统信念和不断加强的宣传下，对所有部属的要求就只能是“从一而终”。mci所以对毛泽东的态度涉及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晚节忠与不忠的问题。谁肯落个不忠之名？一些老的领导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但后来一得到“解放”或恢复工作，就提出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表明他们是不记个人恩怨、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的。照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倒是个值得很好反思和细加讨论的问题。忠于人主是封建社会为臣之道的第一条，难道现在也应该这样做吗？似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主要是过去追随领袖东征西讨的患难情谊和知遇之恩以及后来的地位和待遇，而不包括全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生态资源的破坏、几百万人的被错整以至无数人的被错杀、几千万人的被饿死等问题。那不是把代表人类理性、良知、美德等的共产党看成旧社会的帮派了吗？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革”后的新领导不能不推行双重政策。一方面，为了集中搞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以及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不能不抛弃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与之相关的各项具体政策，对毛泽东的错误也必须作适当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得借助钟馗，用经过新解释的毛泽东思想改正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同时反对任何被认为有损于毛泽东政治体制的所谓“自由化”。所以即使完全改变了毛泽东的做法，如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大锅饭）已完全放弃，但历史上还要坚持原来做法的正确、伟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维护毛泽东和反思毛泽东同时进行，既有歌颂，也有批判。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主要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但又不得不对建国以来的工作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所谓“晚年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作一定的交代和批判，并指出毛泽东的责任。进入九十年代，这种情况又发生重大变化，实际上成为：对毛泽东只能肯定和颂扬，而不许反思和批判了；建国后的重大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讨论，实际上被划为禁区；主流宣传工具经过长期工作逐渐建立起毛泽东一贯伟大正确的史论体系（如大学原来开设的稍为开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已为《毛泽东思想概论》所代替）；舆论控制越来越严；造神造假更加风行，等等。发生这一转折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虽然带来客观上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一面，但也对现行体制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影响到局势的稳定。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和两种情况的分界线。此后的发展，问题更是越来越多，如三农问题、下岗就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政治改革落后、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和腐败成风引起更多不满，以及担心全球化和“西化”的冲击等。对待这些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只能紧急收缩，加强控制，对历史问题也只可正面

宣传而不许谈论错误和总结教训了。二是为了显示现有政权和领导的正统与合法，必须强调道统和法统的继承性。如果说，“文革”后的第一代领导及其核心还是开国元勋和功臣，因而有一定的“资格”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本人作些反思和评论的话，那么，后来的领导就没这个“本钱”了，只能更加依靠权力的交接，因此就得对毛泽东多作正面宣传。但对毛的宣传和研究，肯定他的伟大和正确，重点主要放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则尽量淡化。因为这个时期实在没有太多可宣传的。例如在提倡继承毛泽东的伟大传统时，一阵曾强调“两个务必”（指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和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建国后破坏“两个务必”影响最大的正是毛泽东。骄傲自满、独断专行，这是上了《历史决议》的；别墅遍全国，归个人支配的稿费收入“文革”前已超过百万（单是《毛选》，“文革”前印行二百多万册。“文革”十年印行三亿多册）。生活并不俭朴，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4月制定的西餐菜谱就有鱼虾十七种之多。[mcii]

最后，个人崇拜在中国可说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涉及社会各方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并非只有上层领导人，而是包括了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实践，我们自己把毛泽东送上了神坛，而“请神容易送神难”，要使毛泽东离开神坛，没有巨大的决心和坚决的措施是不行的。上列各条正是说明，领导不但缺乏这种决心和措施，而且还在设法维护。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不只上层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因长期受蒙蔽而产生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热爱即使历经磨难，也不容易改变。这就使维护个人崇拜容易，而禁止个人崇拜较难。何况在政治和思想界始终存在一个影响极大的“左派”，不仅坚持维护旧的政治体制，还极力阻挠经济体制的改革。主流派既要在扩大开放和摒弃“鸟笼经济”或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改革开放问题上同他们斗争，又要在反对所谓“自由化”等问题上不能不借助他们的力量。这都说明，维护个人崇拜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力量大大超过要求政体改革和言论自由的力量。这也是个人崇拜长盛不衰和造神造假继续通行的根本原因。

4，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1）从一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谈起

2003年9月2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的文章，[mciii]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其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对毛泽东一些已有定论的缺点错误进行翻案，不顾史实地为个人崇拜加码。例如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毛泽东只重视生产关系的改变，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而认为“毛泽东是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他更重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就把发展生产、实行工业化作为整个工作的中心，这就是常说的‘一化三改’。”还强调“毛泽东始终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实质上是批驳和推翻邓小平的以下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mciv]而且作为过来人，历史上并没有见到把发展生产力定为根本任务这回事，否则建国后我国经济占世界比重怎么会一直大幅度下降，如同邓小平所说，被周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大大超过了。[mcv]还有，既然毛泽东早就把“发展生产

力、实行工业化作为整个工作的中心”，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谈得上“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mcvi]吗？文中其它有些论断也是颇令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感到吃惊的。例如：“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他提出过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事实上，1956年后正是从“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急速向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转变，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哪来的什么“新经济政策”？不过文中指出，“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该文没有说明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照毛的理论去做？如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的林彪讲话中所说，“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mcvii]

提出这篇文章和引证这么多，是因为觉得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作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府的一个研究理论的课题组（不是个人发表意见），提出这样的研究报告，究竟意味着什么？要把中国的理论研究引向何方？对国家人民有何益处？是理论研究的进步还是大倒退？都是发人深思的。而且这篇文章还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确实长盛不衰，造神造假运动还在向高层次发展。二是现在提倡的正是搞个人崇拜和造神造假研究，否则不会被批准为课题、领到课题费和得到公开发表权。因此我们决不能怀疑参与课题的许多学者的理论水平和史学良知，重要的恐怕是只能在规定的框架内研究和写作。见一叶而知秋，从这篇高级科研成果中就可窥视到当前理论研究甚至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是怎么会事了。当然也会有些例外，如考古学等。

（**2**）个人崇拜种种

上面所谈个人崇拜长盛不衰的原因，着重的是指当权者的需要和引导。这也确是很重要的，因为正如我们曾经引证过马克思的名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mcviii]但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那就意味着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个人崇拜之在中国，不但毛泽东在世时得到普遍的追随，保持清醒的智者是极少数；就是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到现在，仍然还得到相当多干部和群众的崇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人参与个人崇拜，都是既有共同根源，如历史传统、宣传教育、纪律约束、习以为常等等；又有特殊情况和不同的动因，如有人纯属思想认识，有人是随大溜成为习惯，有人为了保官，有人为了升迁，有人为报知遇之恩，有人则因已无退路，有人出于自愿，有人带有勉强，有人真有感情，有人虚与委蛇，等等。当然，对每个人来说，往往各种因素混为一体，并不完全单纯。所有这一切，就汇合出一种“热爱领袖”的个人崇拜氛围，和政治体制紧密结合，并且进入法制化。例如开会喊毛主席万岁，属人人必须遵守的礼仪；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过去即可法办以至处决，现在也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在这种近似“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即使内心不赞成个人崇拜，也很难公开反对。这种情况大

约无人不晓，只是各有各的看法。下面随便举几个例子，稍为说明一下问题的复杂性。

先从中央领导人说起。是否中央领导同志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真心诚意崇拜（迷信）毛泽东，我看不见得。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经验，会认为毛泽东一切都正确，应当亦步亦趋，大概这是谁都不会相信的。“文革”中，诬刘少奇是内奸，连许多普通党员都不以为然，作为民主人士的宋庆龄、章士钊还上书毛泽东为刘少奇辨诬说情，而中共的高层人士像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等竟然相信无疑、投票赞成，这能是真的吗？大约毛泽东和林彪也是佯装相信。邓小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mcix]我看决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恐怕从延安整风后就已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特别是从1956年反“反冒进”以后，对毛泽东就只有服从和检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过，已看到许多当时不大理解的现象。例如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对宴请某些外国元首的国宴应请哪些人作陪和上些什么菜，都要“请主席批示”。“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到这种程度还要经常挨批评。现在才知道这是个人崇拜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许多开国元勋和久经征战的统帅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一些（不是一切）问题上说违心话和做违心事呢？这就是延安整风开始创立的一种不成文法：不但说真话吃亏，而且不说假话不行。例如张闻天和彭德怀是以反对个人崇拜闻名的，但是如前所述，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制造个人崇拜，也跟着说过不少假话。庐山会议后的多次检讨就可肯定不是真心实话。推广开来看，大约中央领导同志没有一个不说假话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以我本人亲自参加和听到的而言，我就不信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呼的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说江青与鲁迅同为三十年代文艺界在上海的两面红旗，这些会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恐怕连在座的毛泽东和江青也是不会相信的。被许多人认为豪爽率直的陈毅，1968年2月28日以亲笔书写的大字报，批判外交部耿飚、黄镇等联名保他的“91人大字报”，说这“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我改正错误毫无帮助……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云，能是真话吗？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明明是由于在所谓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怀疑和反对林彪的，但又不明讲，表面上还装作同林彪一致，背地里却指名和不指名地向高级干部和外国人大讲林彪有篡党夺权的野心与活动。[mcx]又如所谓“1966年7月8日在滴水洞”给江青写的著名长信（内容有表示不满林彪的许多言行，林彪叛逃后才在党内传达），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意思，一直是个谜，连杨尚昆到死也弄不清楚。[mcxi]后来官方和党史编纂学还说，此信当时就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还委托周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mcxii]这是否说毛对周的信任超过林彪？那为什么还选定林做接班人，却不断地整周？而极为精明的林彪此后怎么竟敢对抗最高指示，反而进一步大搞其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恐怕是制造出来的千古之谜。

这里还可再举叶剑英的例子。1967年初他在群众大会上几次提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说林副统帅除因枪伤使神经稍受损伤外，身体也非常健康。还说，毛林作为马恩、列斯后的国际共运中第三代搭配，是最合适的，水平也达到最高峰。这都是在全

国传达了的。但这是真心话吗？谁会相信毛主席能活150岁？在“文革”前他的诗中就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后来整理叶的诗稿时问他刘亭长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曰：毛主席。熟悉中国典籍的叶帅，当然知道中国文人历来看不起刘邦，晋人阮籍就说过，“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mcxiii]把毛泽东比做刘邦，大概不是出于崇拜。叶剑英第一个称呼华国锋为“英明领袖”，同样不会是出于崇拜。至于他传达1966年批判罗瑞卿的三月军委扩大会议时套用辛弃疾的《贺新郎》：“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恐怕也不是罗瑞卿女儿点点不指名地骂他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愉悦”和“纵欲后的满足”，[mcxiv]其实，除两人关系原有点疙瘩[mcxv]外，看来主要还是为了划清界限和表白自己而“诗意大发”地说假话。行文至此，使我想起1943年在军委驻地延安王家坪桃林开抢救运动大会（因我的所在单位编译局属军委系统），叶剑英主持会议时的讲话和呼口号，现在看来也是虚应故事，因为这时连他自己也被怀疑有问题。[mcxvi]可见延安整风创建和普及起来的这种说假话之风多么严重，以致发展到带有全国性。特别是“文革”期间，虽然不能说全国上下都不说真话，但假话确实极为普遍，连邓小平“永不翻案”的检讨也完全是假的。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个人崇拜体制造成的某种上下都说谎，恐怕也是国之大害。

这种不说真话的风气，并不是人们愿意这样，而是邓小平说的制度问题，对许多人讲是出于不得已。在大跃进期间谎报产量、“放卫星”就不能完全归之于各级干部的品质和简单说成头脑发热，主要是当时形势逼出来的。例如党内多数干部并不同意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但还得跟着走。[mcxvii]不但党的领导人，就是许多同情和支持党的著名民主人士，在个人崇拜的体制下，也不得不继续跟着党（也就是毛泽东）走。例如宋庆龄，从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她都有不同意见，但除了内部慎重提点意见外，既不能公开反对，更不能出走。另如柳亚子，原来可说抱负非凡，在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时竟唱出，“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建国后认为对他安排不当，开始还发点牢骚，后来连诗文都懒得写了，但也只能和党同舟共进，沉默以终。

延安整风造成的假话成风，绝不是说它掀起的个人崇拜也是假的，没有得到领导层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响应和追随。恰恰相反，要真是这样，个人崇拜也搞不起来。对多数人来说，对毛泽东的崇拜确是真实的。我自己和像我这样的所谓“三八式”干部，在延安整风后多已把“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当成了天经地义，把毛泽东的指示奉为圭臬，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后头几年。八大以后一些人思想上虽有变化，但由于全国造神运动的不断高涨，所以就整体而言，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变成神。有些高级领导人，不管受到多大委屈，但对毛泽东的崇拜却至死不变。为了说明个人崇拜思想的根深蒂固，下面还可举文武各一的两位名人为例。

一位是被他女儿称为“共和国元勋”[mcxviii]的罗瑞卿，1938和39年在延安时曾是我们抗大总校的副校长。在我看来，那时他对毛泽东并没有个人崇拜。例如每次会上（那时的晚会、纪念会、报告会特多），他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称呼都一视同仁，如果要请毛泽东讲话，就介绍说，“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讲话。”对其它几位书记也一律如此。所以恐怕还不能说罗瑞卿在参加长征“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朋友”。[mcxix]但延安整

风时他已跟得很紧。在1945年二三月批判彭德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他是表现特别积极的一个。他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八大当选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任兵团政委，建国后出任公安部部长，并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他紧跟和坚决执行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的“左”倾路线，曾秉承毛的旨意，亲手处理潘汉年和胡风两案。对潘案，周恩来（未直接出面）、李克农、罗青长等都认为是冤案，并由李、罗等具名提出五条“反证”。但罗瑞卿还是积极按毛的意志办，而且连累了不少人。至于株连2100多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更是个人崇拜体制下一个“惟上”的典型。毛泽东以言定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后，惟有公安部和中宣部坚决紧跟。例如1956年下半年开过一次三长（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后两个单位的领导认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法律根据不足。经中宣部文教处副处长王康反映，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已同意开次领导小组会再谈谈，时间定了，通知也发了，可周扬说，“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结果会就没开成。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展后，公安部领导又一次召开“三长”会议，讨论如何审判问题。时任中央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罗瑞卿在会上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些，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因此最后说，“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mcxx]在建国后的肃反运动中，罗瑞卿紧跟毛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恐怕要以百万计。他在八大发言中就承认，1951年肃反“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也发生了缺点和错误”，如某些单位斗争面过宽，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mcxxi]有人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有关数字推算，这次肃反肃错的达130余万人。[mcxxii]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为对毛的至死不变的无限忠诚。他为随时随地保卫毛，50岁学会了游泳。对毛的亲属在安排工作和照顾生活上也作到无微不至。毛也完全把他当家臣看待。例如1960年12月25日，毛曾对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mcxxiii]但是这位不大讲情面的毛泽东，却为了笼络林彪，在1965年把他打倒了，后来制造出了一个“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罗瑞卿不管怎样受批斗遭关押，对毛的忠心毫发不变。就在那次自杀未遂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还郑重叮嘱：“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在坐牢五年后，当得知彭德怀和他住在同一排病房时，竟颇不以为然地对探视他的女儿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mcxxiv]1973年底，罗瑞卿获得释放。毛泽东去世后，他从外地“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在向遗体告别时“泣不成声”，在天安门举行的葬礼上又“伤心欲绝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他女儿评论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罗瑞卿复出后，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的同时，“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mcxxv]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崇拜，实在可以称得上“从一而终”。至于对潘汉年、胡风等案以及肃反中肃错的成千上万的人民，倒没听到过他有什么反思。

另一位是在领导岗位上影响中国文艺以至文化整半个世纪的周扬。周扬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是最早将毛泽东文艺思想解说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人，因此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重用，逐渐走上文艺的领导岗位。延安整风中，他可算得领导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在鲁艺抢救的"特务"据说超过教员学生的半数。1944年春节闹秧歌中有不少人是戴着"特务"帽子参加演出的，其中就包括演《兄妹开荒》的王大化。抗战胜利后在去东北的行军路上他曾同我一起打过"前站"。

建国后，周扬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具体领导人，一直推行毛泽东的歧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以文艺为党的宣传手段的"左"倾政策，影响文艺界出大师级的人物和原有大师级人物没写出大师级的作品，再加上他的派性，不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整过好多人，还造成文艺界长期的不团结。文坛宿将李一氓，[mcxxvi]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到，中国文艺界的不团结，周扬、夏衍一帮人有重大责任。他们把派性从三十年代的上海带到抗战时的延安（分为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艾青、萧军等为代表的文抗派）、重庆。建国后他们又处于全国文艺和文化界的领导地位，就使这种派系斗争一直延续下来。例如冯雪峰被错打成右派，就只是因为夏衍提出上海滩三十年代的老帐。周扬自称在文艺领导岗位上经过五十年，"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比我长"。[mcxxvii]

他深得毛泽东器重，对毛也极有感情。建国初期我在驻苏使馆工作，他出国访问期间曾来使馆做过一次报告，其中提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记不清是在《武训传》还是什么问题上）。他检讨说自己没站稳立场。毛说，我看你的资产阶级立场站得很稳。对这一连我当时也认为是很重的批评，他却讲得轻松愉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感到他同毛的关系非比寻常。后在十年浩劫中受了九年多批判、审讯与关押的残酷折磨，也未动摇他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1975年5月林默涵解除监护分配江西丰城县钢铁厂，6月24日写感谢信给毛泽东。几近失明的毛于7月2日听秘书读后，即摸索着写道，"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久关不是办法。"[mcxxviii]最高指示一下，"文艺黑线"上的主要人物都获得释放。同狱的夏衍和周扬同时得到通知。夏衍后来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周扬这个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我接到通知，当天就办手续出狱。我问周扬，他说，我等几天，给毛主席写封信。"周扬经过此劫，在整人等问题上确有点大彻大悟，出狱后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为冯雪峰恢复党籍，后来又亲自去探视冯，真诚道歉，以致两人抱头痛苦（但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仍耿耿于冯雪峰奉中央指示从陕北到上海迟迟不见他们）。他不但见到一些被整的文艺工作者当面道歉，而且在大会上也明确地说，"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因此，人们"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mcxxix]（其实也不尽然，丁玲就没有谅解。）而周扬虽然对于执行"左"的文艺政策和伤害过很多好人感到内疚和忏悔，但他对毛泽东无意见，"还多次对人谈起，不能事事推给毛主席，自己是文艺战线的一个指挥员，有自己的过错与应负的责任。"[mcxxx] 1981年1月一次谈话中还说，"现在有种倾向，忏悔，他上了当了，都推到毛主席身上算了。"[mcxxxi]在1980年编《周扬文集》的一次谈话中，他"还深情地回顾说，自己的相当一些文章都是毛主席看过的，他看过的，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要特别尊重他。"[mcxxxii]

周扬还真有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1983年纪念马克思百年诞

辰时，他竟涉足理论这个“雷区”，侵入胡乔木自认是他的领地，结果被打下马来。（据李锐说，夏衍曾亲口对他讲，周扬那篇谈异化的报告，如果署上胡乔木的名字，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在制造和维护个人崇拜上，胡乔木的作用更大，但对毛主席的忠诚即内心崇拜，却远不如周扬。据我个人和一些友人同胡的接触，以及他发表的谈话（特别是收集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二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的一些谈话，更不用说许多私下谈话了），他对毛存在明显的两面性，内心并不真诚崇拜，但由于始终以维护毛泽东个人崇拜安身立命，所以还取得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之名，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多数人更是以他为宗。

现在周胡两人都已作古，但却分别应验了中国一句老话：“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1980年周扬应大家要求找了几个人编《文集》。1983年的异化问题风波后，《文集》的编辑出版就“波诡云谲，命运多戾”。“中宣部有关领导指令出版社必须从书中撤下（那份谈到异化的报告），方可出版”。结果，编好压了十年的《文集》第五卷，总还是在周扬逝世近六年后的1994年8月出版了，印数只300册！[mcxxxiii]至于有关他的其它文史资料以后还会不会有单位搜集整理，就不得而知了。但胡乔木逝世后却是另一番光景。中央批示成立了专门的“《胡乔木文集》编辑组”和“《胡乔木传》编写组”，长驻玉泉山，除三卷文集外，已编辑出版《乔木文丛》六种和《回忆胡乔木》等书。周扬、胡乔木都是至死致力于个人崇拜的人，死后待遇迥然不同，正好说明了个人崇拜体制的规矩和威力。

以上所举罗瑞卿和周扬的例子，决不是说至死忠于毛泽东的就他们两人。实际上这种典型可说成千上万，有的是。例如著名诗人萧三，1967年在狱中《敬呈毛主席》的三首绝笔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以一死谢主席，九泉盼得红太阳。”“毛主席万岁，狱中唤千遍。”[mcxxxiv]这都是说明个人崇拜作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顽强以及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

（三）结束语

关于个人崇拜的笔记，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因此原先计划写的“六，禁止个人崇拜任重道远”，就不准备写下去了，但有些话还想再着重一提，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如何看待个人崇拜的长盛不衰

个人崇拜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法的。因为自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但是如同我们上面所讲，十二大以后直到现在，单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仍然长盛不衰。至于新的个人崇拜，不属本文所谈范围，因而不拟论列。只是可以肯定，它还会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着，并且作为体制还将得到不断的加强与巩固。

对于十二大至今是否还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人们的看法也有根本的分歧。党的领导和宣教部门以及正统的史学界，大概认为并不存在，因为上述对毛泽东的隐恶扬善、弄虚作假，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或者直接由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些有关毛泽东的影视片和书籍，只能由他们策划和审定，否

则根本出不来。例如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摄制放映的电视剧《延安颂》，肯定是经过中央批准和由有关部门（如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还有专设的“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小组”）策划并审定的，因此其中许多违背史实的造神造假情节自然是故意那么做的。这不是宣传个人崇拜又是什么呢？[mcxxxv]这样做会受到批评还是表扬，就无须深究了。如果把我们前面列举的个人崇拜现象，解释为属于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因而不算个人崇拜，那“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广大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更是出自对领袖的热爱，而且要比现在搞个人崇拜的一些文人虔诚得多。这样一来，世界上也就没有个人崇拜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批评和党章的明文禁止，岂不都成了无的放矢？其实，分清是不是个人崇拜并不难，只要同中央的批评和我们上面列举的标准一对照就可一目了然。在实践中宣传个人崇拜却不认为是个人崇拜，不但说明个人崇拜思想意识的根深蒂固，而且也证明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已被改造成个人崇拜体制下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

2，关于判断一些史实的是非问题

毛泽东生前所做的许多事，即使把至今还不愿解密和有意只公开对个人崇拜有利部分而讳去不利部分的大批事件除外，就是真相已经基本弄清的历史事实，也还有个是非判断问题，即评估当时的政策和做法是对还是错。对这些问题，持个人崇拜观点的人也会和其它人有根本的不同，并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穷过渡”，历史事实证明，不但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始终不同意的，就是许多中央领导也有不同看法，如上面引证过的刘少奇、张闻天、彭真、杨尚昆等。从实际效果看，“穷过渡”（大锅饭）阻碍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二十多年，影响还应以百年计。因此，这是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应当无庸置疑。但是中央决议和正统史学的结论却完全相反，肯定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mcxxxvi]这样一来，毛泽东主观主义搞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消灭个体经营（包括小摊小贩），就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应用，或曰“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mcxxxvii]但三十年后，邓小平却说，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现在才解决”。[mcxxxviii]这不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吗？这种历史证明错了的事，后来多已得到改正（如取消了农业合作化，鼓励个体经营，私营工商业也获得合法等等），但为了维护个人崇拜，就只能把错误说成正确。为此，毛泽东还发明了一个理论，即不能以现在的政策反对我们过去的政策。换句话说，现在看来是错的也要承认当时是对的。这样一来，当然就一贯正确了。而且由于这妨碍汲取教训，遂使同样的错误以同样的形式不断重犯（如肃反）。这种明明历史和实践已证明是错了的，还要想办法把它们说成是对的甚至是伟大的创造和贡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建国后，可以说俯拾皆是。不但对内政策如此，对外关系也并无两样。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指导下，使我国实行闭关锁国二十余年，丧失了世界经济科技大发展的好机会（邓小平多次谈到）。但这一原则至今仍被抬得很高，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全党和全国人民还得认真学习和运用。[mcxxxix]许多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事，在这一原则下都可以变成正确的。毛泽东对内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豪。其实，在国际关系中又

何尝不是这样，许多做法和说法都是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特别表现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并成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例如1958年炮击金门，不但事先没同军事盟国苏联协商，而且连招呼也不打（没通知），但又要借重人家的影响，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似乎炮击金门是中苏协商结果的印象，事后在就此事进行的中苏会谈中又一再辩解，还故意把事情说混。[mcxl]这当然不合乎受军事同盟条约约束的国际关系，更不用说当时中苏还是所谓“兄弟国家”。可以肯定，斯大林在世时这类事情是绝对不敢做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不但不被认为是在盟国关系中不受信义，反而被加以肯定、强调为毛泽东“独立自主”方针的体现。

3，关于党章规定和实际执行问题

既然党章上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那么，每个党员不管思想言论上是否同意，行动上对这一规定都必须加以遵守了。然而实际上却正如我们上面所列举，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仍然长盛不衰。按道理，违反就要追究，就要依情节轻重进行处理。但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有谁见到和听到过这种事情？有什么人因为过头地歌颂、拔高毛泽东或吹捧其它领导和上司而受到批评，更不用说处分了？实际情况难道不是恰巧相反？凡是“过于突出个人”的理论文章、文艺作品及其它形式的崇拜，大多得到表彰奖赏，起码发表出来是通行无阻的；而实事求是地研究领袖的优缺点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产品，不说挨整，连发表的机会也很难得。事实告诉人们，绝对不要以为党章有规定，就会在实际上得到执行。而应该估计到，在个人崇拜的体制下，除了有关纪律约束和专政镇压的典章外，不但党章，连宪法许多条文都不过是一纸具文。例如党章规定的选举制度，得到认真执行的有多少？有时还走点形式，更多场合连形式也不顾。过去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任命某人任某职。现在改为“中央决定”某人不再任某省（市）委书记，改由某人担任。有时在开会选举前，一些领导人已奉调上任了，哪里管什么党章。又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谁能享受到？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执政党宣传部却可以随时规定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以至履行司法职务，查封报刊、处理从业人员等，这又是根据什么法制？

4，破除个人崇拜的主要障碍是一元化的人治

我们一再重复，个人崇拜主要是个体制问题，也就是邓小平说的“制度问题”。

所谓个人崇拜体制，就是一党专政下一元化的人治，谁或哪些人权力最大，他或他们就说了算，所订党章、宪法及其它规章制度主要是为了对付下面的，最高领导人和领导层可以不遵守，即毛泽东说的“和尚打伞”。有什么法律在什么时候能限制毛泽东呢？延安整风和召开七大，没有遵守党章，那么七大和八大以后的党章是否得到遵守了呢？没有任何人敢于做出肯定的答复。而且直到现在，党章许多规定仍等同具文。请问，谁能享受十六大党章上规定的党员的权利，譬如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mcxli]对中央某项政策有不同意见并提出改正建议（更不用说批评了）的文章，在党报《人民日报》和党刊《求是》上能得到发表吗？（列宁时期的

《真理报》不但允许而且提倡）。连反映真实情况的《中国农民调查》都遭禁，[mcxlii]遑论对党的政策提不同意见！不但党章（也有宪法）如此，在个人崇拜体制下，许多对领导有限制的规章制度和重要讲话，都是没有甚至不准备兑现的。例如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经政治局同月31日讨论通过）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mcxliii]其中所提"着手"解决的问题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和"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少宣传个人"，"搞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等等，有哪些着手解决和认真落实了？事实是大多数问题此后倒是越来越严重。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mcxliv]结果又如何？后来吃"皇粮"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许多农村多到农民实在养活不起的程度。有些部的兼职领导人还利用职权设法不断大量制造可以享受终身待遇的副部长，使官多成灾。至于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看来也是基本上没有执行的。如果党章党规得到遵守，怎么可能发生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总书记，会被一些退休老人参加的生活会或通过几个政治局常委就给撤掉？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实现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也就是邓小平批评的第一把手说了算。个人崇拜的盛行不衰，就是以这一制度为基础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本身正是人治的必然产物和表现之一。人治不但要治现实，而且要治历史。党史不可能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例如七大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直明确定为第二把手和领袖的接班人，名次也一直排在周恩来之前，但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却不知经过什么手续和出于什么原因，在一切正式文件和讲话，以至印钞票中，都把刘少奇排在了周恩来之后，并成了不知出自哪个部门但却必须遵守的规定。这也是人治大于法治的表现，是主要领导人可以以感情代政策、以个人恩怨处理历史的又一证明。

5，解决个人崇拜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民主和法治

前面一再说过，个人崇拜是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解决。否则只是在党章上写一句"禁止"，不但是缘木求鱼，而且党章本身实际上还是在提倡和鼓励。例如在写有"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党章，却坚持联共过去搞个人崇拜的一种做法，在党章前加写名曰"总纲"的序言（起始于延安整风后的七大。刘少奇当时就说，这也是"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mcxlv]）。把《序言》的权威放在正式条文之上，就是为了便于实行人治。由于这个《序言》并非条文的东西，因此可以任意发挥，讲一些同党章相抵触的内容也可以。例如其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描述就不够实事求是，含有明显的个人崇拜因素。如说它是中国"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它的指引下，"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等。此外还增加了新的个人崇拜内容。根据现行党章，党员只有服从（个人服从组织等），而无任何自由可言。但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我们党从列宁那里搬来了党处于秘密状态下特别强调集中的民主集中制。连胡乔木也承认，那样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集权制，秘密状态下和执政后党的活动原则，"这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原则的不同"。[mcxlvi]何况中国党在延安整风中又作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mcxlvii]的发挥。实际上"在集中指导下"，也就没有民主了。所以在提倡

解放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期间召开的十二大，曾认真慎重地取消了这句话。[mcxlviii]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才又恢复了这一提法。[mcxlix]这不只是一点文字变动，而是意味着本来就不多的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升降和泯灭。没有民主，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即胡乔木所谓的特殊阶层），是维护集权制和个人崇拜的主要力量。他们掌握党和国家的实权，上下一体，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组成一个严密和稳固的统治网络。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他们对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统治。而他们的利益则是同民主与法制相抵触的。例如他们就不允许有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新闻自由，不愿意制定公开官员及其家属财产的立法。当初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曾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流血牺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争取自由和民主。但是奋斗的结果，在取得胜利的一切地方，最后都变成了取消自由民主的斯大林模式，培育出了一个维护这一模式的特殊阶层。这就使社会主义运动从蓬勃兴起到走向衰落、从高潮进入低潮，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重大特点。没人能否认得了，中国是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大概也没人能否认得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至今并无重大突破，不少方面反而比过去更严重了，致使一些工农群众顿生怀旧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要禁止和消除个人崇拜（包括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其困难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诚可谓任重道远。起码我们这一代不可能看到问题的解决。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历史总是在前进，中国也总不能老是用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一条腿走路，政治体制改革不论是迟是早、是快是慢，总是势在必行。而且政治民主化已成时代潮流，和经济市场化一样，都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的主要内容与必由之路。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文明大国，就必须破除以高度集权制为主要特征的个人崇拜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至于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失去的将只是它所占的统治地位，作为一种信仰还会和宗教一样一直存在下去。例如对待斯大林，总还有人认为这把“刀子”不能丢，要为他辩护和“平反”，以及对他保持怀念和个人崇拜。这类现象大约一百年以后也不可能完全除掉。但是可以肯定，无论苏联解体后的变化多么诡异，在俄罗斯决不会再恢复斯大林模式，也不会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产生于二十世纪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在二十世纪就已基本结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再唤回了。

中国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内或迟或早地赶上时代潮流，成为具有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被马克思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民主大国。开始于延安整风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也必将在国家现代化的长期过程中得到解决，只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所以解决的时间也会拖得更长一些。

第十八篇 延安整风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

一，什么是一元化领导

从延安整风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实行着一元化领导。除台港澳外的全国人民，也已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下简称一元化）下生活了五六十年，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还要更早一些。我们几代人在一元化下度过，但不一定了解一元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得失利弊，所以有简单一谈的必要。我个人不能说对一元化有研究，但可以根据六十多年来的经历和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对什么是一元化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一元化是“党的领导”的具体化

在中国，实行党对各方面的全面领导，这是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写进了宪法的，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毛泽东早就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mcl]党的领导，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指一党执政或曰一党专政。这是一元化体制存在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通常意义下的党的领导并不就是一元化。一元化是党的领导的具体化，是在高度集中形式下的具体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都一律由党领导。名义上我们实行的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mcli]实际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只不过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具体管理下的吃大锅饭的（他们的经费也和共产党一样，仰之税收拨款）附属单位，因此我们严禁使用“多党制”的名称。它们提建议和参加政府工作只能称“参政”，而不得用执政。就是这样，也还是斯大林干预的结果。这是我们在前一篇笔记中说过了的，即1947年毛泽东在向斯大林请示汇报时曾提出取消一切民主党派，斯大林没有同意。[mclii]在这点上，我国各民主党派倒是应该感谢斯大林。

但是，一党专政也不一定采取一元化的方式。一元化的真谛就是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最后变成了书记或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说了算。连邓小平也批评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mcliii]应当补充的是，特别要犯独断专行的错误、瞎指挥和盲目决策的错误，以至走向腐败堕落。正像适用于人类多数的下述规律一样：无权或权小时向别人（掌权者）要民主，一旦大权在握后却不愿给别人民主。可惜邓小平在后来的实践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强化了一元化领导。据李锐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mcliv]他自封全党核心，以实际上第一把手的身份，一连扳倒了三个总书记——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和他的上级，一次就指定了两代接班人。其“拍板”之重，单就此而论，大大超过了斯大林和毛泽东。

遗憾的是，官方党史学和一些党史研究者，谈人论事，既不看言论和实践的区别，也不看人和事的历史发展变化，而只知摘章引句，只听言不观

行，还以早先的言论来说明此后的事实。例如有一篇署名辛岩的文章，[mclv]批评别人说《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理由是，毛泽东以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1939年12月13日）提过新文化的口号中就包括有民主化。按照作者的意思，以前提过的，以后就不用再提了。那为什么那次会上所提口号中也包括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后来《新民主主义论》还重复提呢？如果不看实践，不管历史，那斯大林也是很讲民主的了。他接见德国作家艾·路德维希时，后者问苏联的一切事情是由集体还是由个人决定的，他明确回答，“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mclvi]说斯大林独裁、独断专行，不是冤枉人了吗？

（二）一元化是个人崇拜在政治体制上的体现

我们在前几篇笔记[mclvii]中已证明，个人崇拜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含义外，主要是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上面是个人说了算，下面是紧跟和服从。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崇拜不只限于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继承人，而且还广泛适用于党的各级领导，直到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毛泽东就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mclviii]对毛泽东的崇拜，世所公认，可以不论，只是应提一下，就是现在还在对他作进一步的美化和拔高，例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到的“晚年错误”，现在实际上已“不准”再多讲了。各级领导也常被神化，不仅受到下级的歌颂和奉承，本人也常以一贯正确和党的化身自诩。在过去许多政治运动中，对领导有意见就可被定为反党，受到惩罚。1957年反右派时，有许多人就因为在“鸣放”期间对支书以上的某级领导提了点较尖锐的意见，而被划成了右派。特别是一些小学教员，因得罪支书或校长竟断送一生前程，被长期专政。不要以为这是基层干部，由于政策水平低。其实不然，一些身居中央领导地位的高级干部也并不例外，不仅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还常以党的化身自居。被称为大理论家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的胡乔木，大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里只举一例。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纪念会上，周扬作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涉及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发表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宣部见报后，当即向书记处呈报了一份处理意见，对《人民日报》和周扬都作了严厉批评，并逼周扬公开检讨。在后来举行的核对事实的会议上，只见周扬看了处理意见的报告怒不可遏，据与会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描述，“突然，他举起那份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对面的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还“声色俱厉地喝斥道：‘你是反中央！’我从来没有见过乔木这样失态。只听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mclix]后来的结果人所尽知，周扬不久变成了植物人，又过了两年即告别人世。

较早认识个人崇拜（也称个人迷信）严重危害的胡耀邦，1978年12月28日在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就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

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伟大呀！同志们，这样搞下去，就不得了呀!”[mclx]单是这一小段，已经可以看到胡耀邦讲得多么深刻、多么透彻！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精神没能得到贯彻。后来，而且直到现在，新老个人迷信（崇拜）不但没有减弱，搞特权、制造迷信、突出宣传个人，反而愈演愈烈，早已到了胡耀邦说的“不得了”的程度。

（三）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的实施和表现

我们党和我们党执政的国家政权都执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是中国党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呢？最近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仍坚持当年的一贯提法：“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mclxi]鉴于集中指导下实际上没有了民主，所以在胡耀邦主持下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删去了“集中指导下”的提法。[mclxii]十四大恢复十二大以前的提法，表明了对集中的强调。其实，后来恢复的这一提法，还是延安整风的创造，是一种强调集中但却显得模糊的用语。因为至今我还没有看到过对这一问题能够作出理论的而又实际的说明的材料，虽然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整风之前的提法，也是至今仍在适用的，就是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的四大服从，说这是“我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mclxiii]此前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已提出，“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mclxiv]延安整风中改为上述提法，可能是感到“四大服从”显得太不民主，才想了个“民主基础”“集中指导”这种不大容易搞清楚的提法，并且实际上改变了六大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则的规定。因此，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就显得空而不实，很难弄懂，更难执行。例如，“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mclxv]是怎么个授予法？后来的实践不是证明正好相反，从穷过渡、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发动“文革”（更不用说日常的重要决策、人事任免等项了），这些权力有哪些是党员群众授予的？又是通过什么组织手续授予的？不都是党的领袖及其支持者强加于党员群众和全国人民的吗？刘少奇解释的真谛，只是在贯彻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民主是手段”的观点。在运用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就变成了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刘少奇说，“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mclxvi]积极性发扬起来干什么呢？大概只是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就是积极发表意见，也是为了“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在这样的民主集中制下，党的主体自然不是党员群众，而是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党员只能是盲目跟着领袖走的驯服工具。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期间（1943年3月）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中央领导机构调整中，提出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在书记处讨论的一切问题上拥有最后的决定之权，就使他关于党内民主的解释只能空洞化，特别是使“四大服从”中唯一讲点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正式失效，最后成为全党服从一个领袖，一切权力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

板。”从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就一直实行着这种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作为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和领导的多数（更不用说其它党员了）一般本应拥有的权利，也被一元化给化掉了，只剩下紧跟和服从领袖的一条路。例如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就特别提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黑体字系原有）[mclxvii]在这里，四大服从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又一次被废除了（上引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规定是：“凡用书记处名义发出的训令、电文、文件，须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同意后，方得发出。”[mclxviii]）其实，在一元化体制下即使是多数同意以至全体一致通过，也多是表面的和形式的，甚至是虚假的，例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等。所以，中国党执行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党内的独裁专制体制，而且往往是并不掩饰的，像许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任免包括总理等在内的政府主要官员等。

民主集中制本来是列宁创立的建党学说和组织原则，在1904年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有详细叙述。这一原理当时就被普列哈诺夫等人批评为领袖独裁，要在党内建立“农奴制”等。对于根据这一原理建立的共产国际，连胡乔木也批评说，“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就是国际范围里面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国际范围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mclxix]他认为这是列宁犯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mclxx]但是，他却为中国党的民主集中制辩护，表现了他在理论上和性格上一贯的两重性和自相矛盾。实际上，一元化的集中程度要比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高得多，两者有许多重大的甚至原则的区别，下面我们还会作进一步的讨论。说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的实施和表现，只是按一般的表面的理解而言，论其实质，一元化已经没有了民主，只剩下了集中，而且是高度集中。

（四）一元化是织成严密治理党和国家的一张网

一元化既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自然从上到下都要实行，而且以自下而上逐级绝对服从（“下级服从上级”）的铁的纪律为保证。加之由于推行的是事实上的各级干部委派制或变相委派制（即使选举，也多流于形式，既没有竞选制度，还受上级指定和审定选举人、提名候选人、采取等额或极小的差额方式、选后须经上级批准等规定和做法的限制），上级对下级又拥有任免、升降、奖惩等巨大权力，这就造成了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以揣摩上面意图为第一要务。即使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和不愿奉承的干部，往往也使不上劲和站不住脚。不过，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下级惟上级的马首是瞻，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总体（不是个别）而言，上级对下级也存在巨大依赖，不只上面的号令和任务靠下面执行和完成，而且上级领导者的名、位、权、利，除须得到更上一级的保护外，还离不开下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干部的支持和拥戴。至于同级领导干部的互相保护就更不用说了。这就使官官相护在无形中制度化，形成一个事实上相互依存的特殊阶层或利益集团，也是一张笼罩在广大群众头上的严密的网，使他们无其它路可走，只能听从上面摆布。于是“纲举目张”，只要最高领导者一声号令，全党和全国就会迅速行动起来。例如一句“人民公社好”，三两个月内就全国公社化了。

而且一元化领导还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只允许上下存在一条线。有时也讲“条条块块”，但都必须贯串在各级党委领导和第一书记挂帅这条垄断一切的主线上。上面靠这条线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和了解下情、俯察全局；下面则按这条线接受任务和反映情况。由于只准有一条线，所以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一竿子插到底。但因为它有垄断性和不透明，也必然会经常发生中间梗阻，对上应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虚报隐瞒，造假成风，使上面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也喜欢听顺着来的话），而靠虚假情况决策（想想以前大跃进的故事和几年前的粮棉流通改革）。特别是阻塞言路，使下情无法上达。正像邓小平开始恢复工作后所说，加强一元化领导导致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mclxxi这两个“必然”，在他生前就未能改变且有所发展，现在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更严重到了危险的程度。因为一元化本身排除了有效的监督机制，遂使两个“必然”愈演愈烈。既然党的各级纪委和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均受同级党委领导，它们对下就会受到节制和干扰，更不能对上。一元化还使舆论监督很难实施。因为这种体制本身缺乏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报刊等传媒又受各级宣传部门的严格控制，不许真正实事求是，如有冒犯，不管有理无理都是三扁担，总会找个借口加以惩处。所谓群众监督，更是一句空话。连上访陈情、求人伸冤和仗义执言、揭露真相，都阻力重重，经常遭到禁止和打击，哪还谈得上监督？而权力不受监督又必然导致腐败。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权和特殊化，到经济转轨时期就变成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公行、真正的“上下交征利”了。这就是腐败迅速泛滥，并成为不治之症的主要原因。

二，一元化探源

（一）一元化源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影响

邓小平在谈及一元化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时就已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mclxxii]邓小平此时之所以提出封建专制主义问题，据说是由于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李维汉在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期间曾表现为铁面无私和冷酷无情，在中央苏区又成为博古“一言堂”的主要支持者，对不让瞿秋白、何叔衡随军长征负有一定责任，[mclxxiii]但“文革”后已大为觉醒，临终前还建议邓小平狠抓反封建。他认为，发生“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崇拜的结果，而个人崇拜则是由于有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和社会基础。他说，“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教条主义其深度和广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mclxxiv]其实，毛泽东岂止是认识不足，而是明确要继承封建专制主义传统，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理解的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就是证明。至于邓小平对反封建的建议，事后看来，也只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次，实际上并没怎么反，无论是反特权和特殊化，还是个人说了算和指定接班人。这就使封建专制遗毒在这方面至今丝毫未减。

说一元化是受封建影响和继承封建传统，是因为封建社会实行的正是一元化。从君权神授、君为臣纲，到孙中山建党时规定的摁手印和绝对服从，再到陶铸给黄克诚信上所提“从一而终”和周恩来等多数领导人强调的顾全大局、保持晚节，这些都说明虽然社会性质在发生变化，但一元化的精神和体制几乎是一脉相承。区别只在于过去全国是皇帝说了算，地方是诸侯和钦差大臣说了算；现在是党的实际最高领袖说了算，地方是各级第一把手和上级派来的领导人说了算。中国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时间长，又没经过彻底的反封建和启蒙运动，所以正像李维汉所说，封建的遗毒和影响特别深广。苏联的封建传统和影响也很大，所以才能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和个人崇拜（这在西方民主国家就行不通），但同中国比仍相差甚远。例如斯大林死后就没有几个“大臣”保护他（倒是中国领导人竭力维护他），而且首先提出揭发和批判他的竟是他培养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中国就大为不同。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况的毛泽东，在他死后，不仅他的亲信，如曾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等人，始终忠于他，而且一些被他打翻在地的领导干部，如邓小平、彭真、黄克诚等，一站出来也首先以保护他为己任。邓小平就处处为毛评功摆好和开脱罪责，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和“一切向前看”等必须遵守的原则，而不顾口头上常谈的实事求是了。例如谈到打AB团，他说的毛泽东“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mclxxv]就完全违背史实。打AB团是毛推广起来的，而且一直不认错（七大前后为了给抢救运动辩护也曾提过，但无像样的自我批评），直到1965年9月23日动员彭德怀去三线“工作”时还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mclxxvi]可见不是觉悟早晚的问题，而是始终未觉悟。十多年后的抢救运

动正是打AB团的翻版，不能以提“一个不杀”为之开脱。至于所谓毛泽东觉悟比别人早中的“别人”，如先后对打AB团进行纠偏的项英、周恩来等多数人，反倒早有觉悟。有些人还以此为训，抵制了毛泽东后来发动的抢救运动，如罗荣桓。

正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顽强存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不但至今保持不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还在不断加强。为了与此相适应，也就需要在党史上特别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继续推进造神造假运动，对群众继续实行愚昧主义和压制言论的政策。

（二）一元化也源于共产国际高度集权的传统

这也是邓小平说的。有人追根溯源，一直追到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

不过，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固然带有巨大的时代局限性，但同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对此的解释和实践仍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区别。例如：第一，他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那时英国工人已占人口的大多数）对极少数剥削者的专政，而不是像后来俄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极少数工人名义实施专政。第二，他认为民主是工人革命的两大目的之一（另一目的为取得统治权），[mclxxvii]而不是毛泽东说的民主“只是一种手段”。[mclxxviii]第三，他主张共产党人在各国以至全世界都应同其它工人政党和民主政党团结与合作，[mclxxix]而不是列宁、斯大林后来所实行的一党专政。[mclxxx]第四，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争取和维护自由平等，坚决反对专制独裁，主张党的领导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mclxxxi]而不是列宁、斯大林所主张并实行的党的领袖专政，以至于连胡乔木都批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说“这段话确实是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mclxxxii]

列宁在建党学说中强调集权和纪律，也同党处于沙皇恐怖统治下的客观条件有关。但后来他就不分各国的具体情况，把它运用到全世界了。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时强调的自由民主和宽容并蓄被彻底改造了。所以胡乔木在一篇《共产国际犯了两大错误》的谈话中，一开头就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其结果一方面是“全世界都要建立苏维埃”，“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对各国来说，就是党的“领袖专政”。[mclxxxiii]后来共产国际确实按照列宁建党学说执行，帮助各国建立起俄国式的共产党，并由共产国际直接指挥这些党，不听指挥即予解散（如原波兰和朝鲜共产党）或开除（如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党）。对此，中国党不仅绝对服从，而且实际做的还大大超过列宁。胡乔木为制造和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紧接着批评列宁之后竟然毫无根据地说，“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一个否定，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mclxxxiv]关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几乎百依百顺，我在上面已列举了许多例子，下面为了反驳党史界把延安整风说成是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编造，还会专门再谈一下。这里只想说明的是，毛泽东不但严格执行列宁提出的集中制（前后有数十次提倡和规定学习《“左”派幼稚病》的有关章节就是证明），而且作了更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列宁实行的民主集中制还有相当程度的民主，毛泽东的一元化实际上却取消了党内外的几乎一切民主。为了作点对比，下面试举几例（列宁为十月革命后到逝世的六年半时间，毛泽东则为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后的几十年）。

第一，列宁完全遵守党章规定按期开会（即使在残酷的内战时期），六年共开全国代表大会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五次，中央全会四十五次。中国党（整风后的会基本由毛决定，包括相对安定与完全和平时期也可不开）从1928年到1956年二十八年，共开代表大会两次（按党章规定应开二十次），代表会议（算上苏区代表会议）两次，中央全会十四次。

第二，列宁时期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代表可以递条子、插话、质询和批评领袖，党也允许和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并向全党甚至全民公开，大会上还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并予公布。中国党从延安整风后开的会，都是没有（实为不许）争论的团结的大会，歌颂和拥护领袖的大会，实际上常流为形式。

第三，列宁时期，党员及其代表，可以在党的会议和“争论俱乐部”（俄共设的一种机构）以及《争论专页》等党的报刊上，批评党的领袖，反对他的意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就是在党的会议上，列宁的提议也曾多次被否决，如列宁因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起义和泄密，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党，但遭到中央委员会否决。中国党在延安整风后，已无人敢公开批评毛泽东，连党外人士梁漱溟都因提不同意见倒了霉。受批判的人更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一切均以领袖的意志为转移。

第四，俄共（布）十大《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规定监委与党委“平等地行使职权”，互不隶属，而且监委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不得取消”。十一大又赋予监委以检查权和质询权。mclxxxv中国党长期不重视党内的检查和监督，后来在不同时期设立的监委或纪委，都是同级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它怎么可能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后来干脆把党的纪委和政府监察部门合并，这样就更便于党委领导和第一书记挂帅、实行党政一元化了。

关于一元化同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差异，还可举出一些，不过上述几条已经可以略窥一斑，证明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向极权化的发展。当然，斯大林专权后，就已从很多方面改变了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但是同我们党的一元化相比，还仍然有点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曾在苏联工作，对此略有体会。例如党政分开就比中国明确一些，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工作党委一般不管；不像我们一切由党委决定、第一书记一把抓。最高苏维埃开会或在党的报刊上，可以公开批评部长会议、点名批评一些部长（我的印象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经常挨批，但他的部长也一直未动）；不像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公开批评，或者一批就要打倒。那时苏联党政干部的待遇也有别，党的领导人写文件和文章稿费较低，党机关比政府工资低。如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由政府文化部长调任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来参加使馆宴会时改乘汽车为坐地铁，我问缘故，他说改做党的工作工资照减一半。我们则是地位越高稿酬越高，党机关工资并不比政府低，有些部门还要高一些，“文革”前中央调查部的待遇就高于外交部。由此可见，如果不算斯大林的残暴手段，单就权力集中和特殊化而言，从各级党委直到支部书记，我党的一元化不仅大大超过列宁时期，也超过斯大林时期。

（三）一元化是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民主集中制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前面一再说过，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都是按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这一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和《“左”派幼稚病》中，后来被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归纳为五条。毛泽东提出的一元化就来源于此，特别是其中的第三条“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联共（布）党史》上讲得更明确，说党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它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其使命是要领导工人阶级其它一切组织”。[mclxxxvi]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一元化的决定）[mclxxxvii]也标明是据此作出的。而毛泽东按其性格、抱负和所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也正好最容易接受建党中集权的一面，最不容易接受（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接受）实行党内民主的一面。这是他入党后的整个历史所证明了的。

正如我们在以上几篇笔记中一再说过的，毛泽东追求的就是权力集中于他一身。所以，“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表示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愿继续他所谓的“担任土匪工作”，做“农民运动的王”（瞿秋白语）。[mclxxxviii]在秋收暴动后上井冈山路上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创议，后来又相继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群众工作是红军一项重要任务，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可以造党、甚至造一切的一系列理论。这就使上面的一元化领导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为一元化体制从基层起打好基础，使一元化从上到下结成了一张严密的网；更使这种体制分别得到武装保护，可以用军事手段对付一切敢于反对或不同意一元化领导意志、甚至只是被怀疑对领导怀有贰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军事问题在中国被赋予特殊意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几乎是“枪”指挥一切；毛泽东及其后继者可以让出其它一切职务，甚至在党内也可处于“二线”和幕后，但对军队的控制权（如军委主席之职）却是不会轻易放松的。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际上就是把党的和军队的领导合二为一，使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武装保障。所以不但在战争时期，就是在和平时期，掌握对军队的控制，都是领导党和政府的最重要条件。事实上，毛泽东从创建根据地起，也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又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于是出现了杨开明向上级报告中所说的，“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mclxxxix]而且，当时的党中央也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要毛泽东“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mcxc]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因一些人批评他“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在这些问题上他又同朱德、陈毅等发生矛盾，于是前委书记被选掉了，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mcxci]这次会议虽有缺点错误，但也说明毛泽东主张“党管一切”和军党合一的一贯性。直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还批评他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发号施令，不管红军各部队、地方党、苏维埃政府、各群众团体都可指挥调动，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mcxcii]如果说，这次会上批评他“狭隘经验论”和“富农路线”是错误的，

可是批评他“肃反扩大化”却完全正确，就是批评这条“以党治国”论也有一定道理。但不管经受多少挫折和批评，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管一切的思想、以及干纲独断的作风，既无丝毫改变，还不断有所发展。深受中国封建专制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对于列宁、斯大林强调集权和“领袖专政”（胡乔木语）的民主集中制，可说一拍即合，贯穿终生。即使行封建之实，也可冠以马列之名。这是可以举出许多人所尽知的事例来的。因此，当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一经确定并趋于巩固时，提出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事属必然的了。

三，一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实践

（一）中国党内两种传统的较量

中共诞生于封建和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深受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响。它又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强调“厉行中央集权制”。[mcxciii]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规定，党内要进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mcxciv]但是，中共终究是宣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的产物，它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总书记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建党初期的活动分子和党员也多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不能不带进科学民主的精神。陈独秀固然有个性倔强（李达就是由于和他合不来而退党的）、有家长制作风，但还是竭力发扬民主、尽量控制自己，而且在他号召和领导下，开创了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mcxcv]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从一开始党内就存在强调集权与强调民主两种倾向，往往一个人同时具有两者，区别只在于哪种倾向多些，还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陈独秀在总书记任内有家长制作风，“八七会议”失掉权力后却表现出某种极端民主化偏向。[mcxcvi]这也就是前面说的潜规则：无权或权小时要民主，独揽权柄时搞专制。但从建党到延安整风的二十年里，大致可以看出，更多保留五四精神和更多倾向民主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继承中国传统和国际精神而力主专权的，除毛泽东外还可算上刘少奇等人。前者颇具书生气，社会基础也薄弱。后者注重实践、长于谋略，又有雄厚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民主倾向和专制倾向在党内权力较量中的结局：民主倾向可能一时略占上风，但终究成不了气候；专制倾向也会遇到某种挫折，但从长远看总是占据统治地位。在延安整风后，我们党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个人崇拜和不讲民主的传统，“文革”后拨乱反正曾一度有所松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原状。足见专制传统在中国的顽强，也说明一元化领导体制为什么会在中国经久不衰。

（二）一元化体制的逐步形成

一元化体制的酝酿和露出苗头，大约应该从1938年的六中全会算起。因为在这之前，虽然在党的建设中一直强调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但由于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党组织既分散又不稳定，很难实行集中领导，更谈不上一元化。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层还有不少具有民主意识的人，例如“八七会议”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瞿秋白，在他主持发布的中央通告中就特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生活问题：“在秘密条件下，党内要尽可能的实行民主主义，其意义是：1，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　2，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mcxcvii]他起草的六大文件中，还正式规定，党必须“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mcxcviii]六大通过的党章也专门增加如下内

容："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mcxcix]张闻天虽然一度主要在宣传工作方面犯过"左"的错误，但他主张民主，在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就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独断专行和家长制作风，说他们"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mcc]而且他们都能以身作则，在他们主持工作期间，都尽可能地发扬了民主。当然，有民主倾向的领导同志决不只他们两位。正是由于客观上各地组织和各根据地的分散局面，主观上有许多同志主张民主，倾向于集权和独断的同志还没有在中央拥有稳定的绝对权力，因此以个人决断和第一把手拍板为主要特征的一元化体制在全党一时还行不通。

但是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反对分散主义时过分强调了集中和纪律，实际上削弱了党内民主；另一方面，从1937年12月会议到这次会议，由于上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得到一批领导干部的拥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成事实，强调集中和加强纪律的力量迅速占据绝对优势。建立一元化体制的条件趋于成熟，以后的问题就是逐步落实并使其制度化。六中全会关于组织和纪律问题的决定，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主要精神显然就是中央集权。事实上，六中全会后，中央对各地和各方面问题的具体指示，比以前有显着增加。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mcci]

在走向一元化的道路上，有两个中央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是在皖南事变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仓促作出的（成文也许在这以前），无论当时还是事后，都看不出事情本身的紧迫性，可见是另有原因。现在许多当事人和史学工作者已指出《决定》对项英的指责不但过火，而且不公正，把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失误和前后指示不一的责任一股脑推在项英身上，指责项英和张国焘一样是"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还怀疑可能有"内奸阴谋存在"。这显然都是为了"杀鸡儆猴"和给即将开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作铺垫，当然是很难服人的。因此不但中央一直没像《决定》上说的，"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而且还在党史编纂学上搞点小动作。例如，1941年12月以书记处名义在延安编印的《六大以来》中收有这一《决定》，时间却含糊地只写"一月"，而不像其它文件那样写明具体日期。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收了这一《决定》，注明是"根据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也没注明日期，还故意放在皖南事变的一组文件的最后（即使1941年原版如此，也应据实改过来），以掩盖《决定》系仓促作出。[mccii]这一《决定》的中心用意就是警告各路"封疆大吏"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实现中央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是在毛泽东发出整风号召、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因带有试探性质，当时没发表）之后一个多月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政治局通过）。目的是进一步强调服从中央与上级领导和严格纪律。批判那种在政治上"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组织上"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等现象，提出"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以及"要在全党加

强纪律的教育”等“必须采取的办法”。在文件的编纂和发布上也出现了一点怪现象，就是《决定》正文第二段在“叛徒张国焘的结局”后面紧接着是“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但作为普遍学习的《整风文献》中这后半句却未作说明地被删掉了，致使一个决定至今还存在两种版本。[mcciii]这既说明对项英的处理大概由于把握不大所以规定不普遍传达和要提交七大议处，也说明中共党史编纂学存在的任意性。

经过一年的延安整风，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时机和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1942年9月1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mcciv]其基本原则和精神直到现在还执行着，有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因此值得稍作介绍。

（三）一元化体制的规定和实践

一元化的要点可归纳为：1，“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其它一切组织”。由于党是执政党，所以党委就成了各级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决定和指示，同级一切组织的党员（领导人自然是执政党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党委凌驾于同级其它一切组织之上。2，规定各级党委书记人选由上一级党委提名，经再上一级的党委（或中央指定的代表机关）批准。这就必然导致书记在党委中居于特殊地位、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最后拍板和个人说了算。3，“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的严格之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规定从上到下的一条线领导，例如党的领袖不但横向领导中央级党政军所有机构，还垂直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这样，党的领袖专政和各级第一把手拍板，就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因而也就一直坚持和巩固下来了。

至于延安整风后几十年来对一元化领导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我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表现在党对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更加强更直接了。作决定的时候，党对政权的政策还是“三三制”，即“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它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mccv]因此还强调，“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而且“万一”党委的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mccvi]但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建国后，我们党已成为惟一的执政党，还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中就已放弃了“三三制”政策。许多跟我们合作过的地方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纷纷遭到斗争，哪还有什么“三三制”，于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就事属必然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为了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直接管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在中央成立了财经等若干小组，实际上也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架空国务院。对此，毛泽东于6月8日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mccvii]可见，这时的一元化就是党政不分，就是党要包揽一切。所

以“文革”后，我们喊党政分开喊了几十年，可就总是分不开，根子就在一元化。既然党领导一切，主要不管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等这些政府应管的重中之重的事，还管什么？有关重要一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问题，以至司法案件，还不都得党委书记拍板？而且直到现在还经常以党政联署发号施令，有些机构干脆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这样，怎么可能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呢？所以近一个时期已干脆不再多提党政分开的问题了。

二是一元化深入到了基层。延安整风时关于一元化的决定还只管到地委一级，但后来，一直到现在，却已发展和深入到了基层，特别是农村。一个村子，不管有几个党员，占居民比例多大，支部都是这个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和管理机构。支书不管是真选的，还是指定的、委派的和传承的，都是这个村的第一把手，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得服从他的领导。书记如果是好人并且能干，全村人都会受惠。可惜许多书记表现平庸，而且不少是坏人，欺压群众，称霸一方。我当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曾随“视察团”去过陕、甘、宁、内蒙、云、贵等地，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各村住房最好的多为支书家。而且书记确实在指挥一切，在人群中显得很威风。最近看到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书，[mccviii]描写了一些农村干部特别是区、乡、村的书记，如何称王称霸、贪赃枉法、残害群众，也印证了我看到和所了解的一些农村情况。如此村乡干部，确实比我小时见过的国民党保甲长还厉害得多。对于这些，即使严格管制下的报纸和广播也经常有所揭发，看来谁都无法否认。但是过去和现任的某些官员，不但不思己过，不愿面对事实，还把这种揭露称之为“以偏概全”，连这本书都不能再公开发售了。他们也不想一下，为什么当年提出“三农”问题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后来竟工作不下去了？真是“人以群分”，官官相护！当然，一元化深入基层并不限于农村。工矿企业，也在中心（业务以厂长为中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核心（政治上党的书记是核心）。甚至一些科研机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原本就是在以党组形式领导），都派来了专职党委书记。其实，这只是有利于安插和提升干部，扩大编制，对实际工作并无多大好处，反而增加了不少矛盾。例如中心和核心之争，就吵了好些年，谁也说不清。

三是一元化使军队干部长期当权，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元化决定是在战时作出的，规定“‘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所以第一把手即书记一般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传统，不但出任各部门和各地区主要领导的多是军队干部特别是一方面军出来的老战士，而且新解放区（占全国大部分）的地、县、区也基本是军队转业干部。他们长于打仗，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于和平建设中的问题却大多并不内行，其中许多人还轻视科学和知识分子，喜欢蛮干，这就不能不对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再加上毛泽东多数情况下唯意志论的领导和指挥，各级领导按军事惯例紧跟，并层层加码，使中国人民吃了不少苦头，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落后了一个时代。例如井冈山老战士谭震林，建国后长期主管农业，在农业大跃进、虚报浮夸、大放卫星，以及后来的反右倾和推动“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mccix]上，都是冲锋在前，对造成三年困难和饿死数千万人负有一定责任。（只是由于中国党的一元化体制，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得到升迁，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主要依靠这样一些老干部管理中国二十多年，中国怎么能赶上时代潮流？

当然，一元化的发展和深入并不限于这些。它是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mccx]这一基本精神是决不会变的。事实上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解放初期还有一批民主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副总理、部长等，后来就一个也没有了。

四，关于一元化的几点评价

在谈了一元化的来龙去脉之后，对实行了六十年、今后还会继续坚持的这一领导体制也可以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由于这个问题太大，而且现在还在执行着，所以讨论起来就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反而更值得研究，并且极为迫切。这是适应时代潮流、改进党的领导、“加强执政能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下面提出的几点看法也许完全错误，但只要能引起批评，展开讨论，我就很满意了。

（一）一元化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元化是在战争时期提出并开始实行的，而为了进行战争和取得胜利，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那时军事第一，地方工作也主要是为战争服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亲自体验过的。由于统一思想、统一指挥，使我们在这两场战争中力量得到迅速壮大，最后胜利的到来竟超出我们自己的预期。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

其次，在战争时期，我们实行的是战时经济，全国解放后又完全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战时经济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计划经济虽然毛病百出，在总体上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但在一定时期和需要集中力量办几件事上，还是会起很大作用的。例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是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军事化办法，而且也归之于军事编制。不到十个月建起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也是令世人吃惊的。无论是战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主要特点都是要求高度集中，这都适宜于领导上的一元化。

但是，这不是说战争和计划经济都必须实行一元化，而是说一元化比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更简单更省事，但有时造成的损失也会更大。例如列宁遇到布雷斯特和约，费了很大劲说服中央委员会，才取得了7：4票的多数，还要在一周后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争取到党和政权机构的支持。[mccxi]中国在决定抗美援朝时就比这简单多了，只要毛泽东决定，即使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数人不同意，最后还是通过和照办了。[mccxii]这种过度集中和一个人说了算，即使在军事问题上也会造成严重损失。例如对朝鲜战争，1951年1月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和否定彭德怀停止进攻的正确意见，就使中国失掉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和受到很大损失。[mccxiii]又如苏联在卫星发射与原子能发电方面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中国在短时期制成两弹一星，看来是大胜利。但由于把主要科技力量和紧缺的资金用在了这些上面，实行“单打一”（更不用说困难时期北京的人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特别是各地大造别墅的浪费了），就使整个生产和管理技术落后了。而这正是国家强盛和发展的基础，一个时期的耽误，会使国家多用半个世纪也赶不上世界水平。

（二）一元化有助于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

前面已经说过，一元化就是从中央到基层，“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

学”，一律纳入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它的第一把手领导和管理之下。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国家和人民的一切活动都在这个网下而不能出圈，因此显得平静而有序。只要这个网张开着，也就是说保持着从上到下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么，无论国内发生什么严重问题，不管多大的天灾和人祸，都不会影响到政权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就是发生局部动荡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五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经过那么多的重大事件，例如强迫命令下的大跃进、人为的三年困难、领导人一手制造的十年浩劫等，都没能从根本上动摇党领导下的政权，也没能使整个社会秩序完全失控。就是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游行示威、各种集会和冲突，但实行一元化领导的中国，却可以顶住这种浪潮，表现得安静和平稳。

当然这不是说一元化缓解或消除了社会矛盾，而是说由于这张“笼罩四野”的网可以把冲突控制在最小范围或消灭在萌芽状态，把矛盾掩盖住而不能暴露和激化。由于一元化是从上一直“化”到基层的，而毛泽东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原理就起了巨大作用。它使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而发挥下面一元化领导的支部书记就有责任保证所管那一方土的稳定。即使某个基层没有管好，出了问题，但由于层层负责，上一级或更上一级还是会控制住的。至于对这种体制的评价，那倒是见仁见智，意见不一。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保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所有机构照常运转，各级领导也都做到了安然无恙。

（三）一元化是和民主化不兼容的

一元化虽然可以一时或在一定问题上发挥点积极作用，但总的看来它却是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这也是邓小平说的，“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mccxiv]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都要走向文明，其必经之路则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两者如同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只用市场化一个轮子是无法持久的。何况民主化已成世界潮流，可以躲过一时，但迟早会被卷进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长期说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民主，高出资产阶级民主千百倍。其实这只是不顾事实的一句空话。因为如前所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和党的领袖的专政。他们以无产阶级以至全体人民的代表自居，并无实施程序和客观标准衡量。连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不是也都说他们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吗？无论当时还是事后，谁也举不出充足理由来说明列宁实行一党专政、取缔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多数人的要求。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就更不用说了。以中国而论，无论是农业合作化、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反右派和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人能说这是得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授权？作为过来人，我们可以肯定这都是领袖个人的号召，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只是被迫响应。[mccxv]而且据了解内情的胡乔木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逐渐形成的思想，在党内，甚至在领导层，“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mccxvi]可以说，凡是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是领袖（个人或少数人）以党的领导为名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专政。一元化只是使这种专政变得更加明显，更谈不上什么民主！

不但从党的领袖到支部书记的个人一元化专政，完全违背民主原则，于理于法毫无根据，就是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也是民主政治所讲不通的。关于民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指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的意思是'人民当权的'。"[mccxvii]如果没有人民的真正选举和监督（恩格斯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mccxviii]），那么，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如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以至人民币等等，都只是假人民之名以行，而并未由人民经过一定程序的授权。就算我们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是完全和真正民主的，那他们选的最高领导也只是省长、县长、村长等，怎么在他们上头又凭空来了一个管他们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这不等于民主又被剥夺了？我们在延安整风前学《党的建设》，还说党的领导靠它的政纲和具体政策、靠党员的宣传工作和模范作用。后来一元化了，党的领导似乎变成天经地义，无须人民授权。有些代表一元化的各级第一把手，也只靠关系而不必管群众是否拥护。否则，胡作非为的程维高怎么能在京畿咫尺之近的河北称霸十年之久？

因此，在一元化的体制下，实现党的领导可以不通过民主程序取得人民支持，主要依靠掌握干部的任免权就行。你不服从领导，就撤消职务或调动工作，换上听话的和顺从的。如属党外，要通过一定形式，那就先"代"后"选"。党内更好办些，或以上级党委名义决定任免，或会前先调来再实行等额选举。有人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就表现在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又主要体现在控制干部的任免和使用上。这也许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但不管怎么讲，我们把人事机密列为国家重大机密却是事实，而这恰好是违反列宁所提公开性原则的。

这里附带谈一下公开性问题。人们有个误会，以为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提的，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列宁提的，而且他首先指的就是干部问题上的公开性，即干部的工作和品德等都应向群众公开。例如他在《做什么》中说，"大家大概都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很可笑的，而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又说，"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mccxix]所以列宁认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在秘密条件下，不能完全实行民主而强调集中，就是因为公开性受到限制。有人统计，《列宁全集》上使用公开性一词多达46次。可见这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发明。更重要的是，讲社会主义民主而排斥公开性（即透明度或群众的知情权），那确实是"很可笑的"。

（四）一元化和实行法治相冲突

一元化既然源于"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其使命是要领导工人阶级其它一切组织"，这就在实际上使党居于国家政权、军队及其它所有组织之上，从理论上说有权领导和指挥它们，往往也就使口头上说的法治变成了党治。宪法上虽然规定一切政党和社团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但是既然制宪和立法的机构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

导），那党也就实际上凌驾于宪法之上，更不用说其它法律了。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一元化既然使“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把手”，因此法治不但变成了党治，而且实际上变成了领导者个人的人治，领导者的话往往重于法律。由于一元化是从上到下，人治也就同样从上到下。毛泽东在世时自不用说，就是“文革”后，许多重要决策也不是先在什么会议上提出，经过讨论通过再定下了来。而往往是最高领导人先有个谈话，其中不少还是先同外宾谈，就自然成为国家的政策。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任务只是在组织上贯彻并使之法制化，成为国家的制度、计划或法规。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同样可以在管辖的范围内实行人治，一切又是他说了算。品质差的更是欺上瞒下、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连一些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也可以自定政策、任意摊派、私设公堂、侵犯人权。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至今还把希望寄托在“清官”的身上。事实上，一个地区，从省市到村镇，出一个好的领导（第一把手），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都会很快上去；如果派来的是坏的领导，大家都会跟着倒霉。这已成为各地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元化导致的人治，也是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mccxx]在实际上行不通的根本原因。法院既然归党委领导，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干预定案就是正常的事。于是人们看到，刑法实施和量刑标准在各地，甚至同一地方的前后，都有很大差别，同罪不同刑、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甚至无罪也判等情况不一而足。

党的一元化领导超越法治并压倒法治，这表现在各个方面。宪法规定的一些条款在实际上并未兑现，似乎也没准备兑现，如“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里最后连限词都没设（当年国民党还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类的话），从字面上看，所有公民都可无条件地享受这些权利。但实际情况如何，人们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一些通行无阻的现象，却于法无据。例如我们党的宣传部门，可以管理和控制全国舆论，有权规定新闻出版业哪些必须讲和哪些不准讲，具体到各种历史问题、司法案件、一本书、一个戏等等，以致越是群众关心的问题越是不准讲。而且不事声张，一个电话，全国照办。这已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但我却没能查到法律根据。宪法上没有这个授权的规定。中国目前还没有政党法。那么我们党分工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可以一言九鼎，党内党外都得服从，而且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这能说是法治吗？

（五）一元化排斥监督

一元化本身就是不允许有监督的，这是个制度问题。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只规定了党委对同级一切组织和下级的领导，以及它们对党委领导的服从，并没有规定对党委领导如何监督，对党委权力如何约束。这就自然形成上面引述过的邓小平说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mccxxi]建国前夕召开了新政协，制定了被称为“国家临时性的根本大法”或“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为政府的施政方针”。[mccxxii]但是过了不到三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mccxxiii]既没有经过制定《共同纲领》的原机构人民政协，也没有通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甚至

中央全会（倒是没有忽略向斯大林请示），《共同纲领》就被“过渡时期总路线”代替了，原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一下子变成社会主义；有些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想对这类问题提意见，进行监督，结果被打成右派。反右后，来自民主党派等党外的监督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了。口头上常讲的群众监督，其实多半是句空话，大概谁也说不清是怎么个监督法。我们这里举个上下都是一元化领导的例子，看看下面能不能“监督”上面。安徽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对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恶贯满盈实在看不下去，就偷跑到河南上蔡县，用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化名给江泽民总书记发了一封长电报告状，后又从上层层批转到张西德手里，结果竟是一些无辜者几被打死，还大整了大批上访上告的群众。欲知详情，请看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农民调查》，第106-108页。

至于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前面已经讲过，连监察机构都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报刊等传媒也由党的宣传部直接控制，它们怎么个监督法？例如，中央纪委如何监督政治局常委？实际上，任何传媒都不敢和不能谈论与某一常委有关的任何问题。省、地、县各级的情况同例。因此，对许多领导同志，就只能靠“自律”和“慎独”了。他要不自律怎么办？所以说，一元化必然导致特权和特殊化，没有监督机制则必然产生腐败。光靠上面查出几个贪污犯（后台硬的还不准讲）加以严惩，是不解决问题的。事实上反而越抓越多，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六）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改变一元化领导

根据以上所述，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基本上是没有起过积极作用的。现在要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元化。这是中国党要保持政权，更不用说提高执政水平了，不能不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党自己没解决，客观形势的发展也终究会使它得到解决，问题只在迟早和方式的不同。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进入二十一世纪必然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决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它是同时代的发展不相容的。

改变和解决一元化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和经历什么过程，以下几点恐怕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1，真正实行党政分开，采取有效措施取消一元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提出并经政治局通过，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mccxxiv]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因为“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明确取消基层组织企业的“一元化”领导。[mccxxv]这是邓小平一再声明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上所说的。可是在不久发生的“八九风波”（也称“天安门事件”）后，党政反而更加不分，企业又加强了一元化领导，增派了“核心”。现在情

况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全国上下都没有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还是全面实行着一元化领导，还是权力集中在党委特别是常委，还是第一把手说了算。只要保持一元化领导，“党政分开”无论喊得多么响亮，都只能是空话。三番五次提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弊端太明显了，太不得人心了。但为什么又五次三番地行不通，空喊几十年始终得不到解决？道理很简单，就是党委第一把手不愿放权，因而没有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绝大多数当权者来说，大概都是愿意扩权，不愿放权。在这个潜规则的作用下，长时以来，党内就从上到下、在思想认识和政治活动上，形成了一个护权的群体。他们依靠一元化领导体制保持和进一步扩充权力，党也依靠他们得以实现领导。这就是老讲党政分开却老是分不开的原因。

因此，要真正和彻底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问题，就要下决心公开放弃一元化领导体制。从理论上讲，不能认为党天然有权领导其它一切组织。“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违背马克思主义政党平等的民主精神，[mccxxvi]更是完全过时的了。而且既然说是无产阶级的领导，那么谁来代表他们实现领导，也应该由无产阶级选择和决定。如果即使有一部分无产阶级不支持党来代表，那也不能对他们以反党反革命的罪行进行镇压。同理，人民也有权选择自己信任和拥护的领导，而不能往他们头上强加。这些都应当视为政治民主的起码原则，而不能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总不能说，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民主，必须服从共产党（从中央到各级党委）的领导才是无产阶级民主。即使党犯了路线错误，比如大跃进、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之类，人民都得无条件地跟着党走，否则就是反革命，就要遭到镇压。这恐怕就根本谈不上民主了。在实际上，要改变一元化领导体制，就必须公开宣布废除党委书记当然是第一把手的规定，明令禁止党委及其下属部门直接插手行政、司法等工作，还应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使其落实。总之，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一最根本的老大难问题，就必须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完全取消一元化。

2，实行民主选举，坚决取消干部的终身制和变相终身制、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行了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的终身制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重大进步。但现行制度并不完善，所以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而不能说完全解决终身制问题。因为第一，仍然允许少数人不依法退休，为其制造各种理由留任掌权。另外是名义上退休了，实际上继续把持着重大问题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权。这就容易造成干部问题上的任人唯亲和世袭继承等返古（封建）现象。第二，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封建等级和官民界限。干部离退休后继续保留原有待遇和不同等级的发言权，使干部晋升和扩编加快，增加群众负担。而且退休后也并未离开干部这个特殊群体，在老百姓看来，官民界限依然明显。第三，现行制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铁饭碗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当了干部就一辈子是干部，起码可以干到退休年龄，中途淘汰和自行转业的是极少数。这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终身制。

至于干部的委派制和变相委派制，这是体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手段，因而

得到一贯坚持和不断加强。例如，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代表大会，其民主性和透明度（公开性）就越来越薄弱了；上级对下级干部的任免和调动也更加直接和更少顾及党章或宪法的规定了。即使通过选举的形式，各级代表及当选人员也是事先由同级组织部门提出、经同级或上级党委批准。这一适用于党内外的作法，就是变相的委派制。这一制度的危害是无须多说的。我们以前曾引证过，连宋庆龄也早已认为，不改变干部委派制，现代化就会失败。mccxxvii

要解决终身制和委派制问题，只能靠政治民主化，即列宁说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声称为人民服务的党，却不愿和不敢实行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的真正民主的普选制，实在使人难以理解。

3，增加透明度，还给人民知情权

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所提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观点。何况中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已经过五、六十年，按理应该是有高度觉悟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对人民不实行列宁所提公开性（即所谓透明度）呢？总不能老是"叶公好龙"吧！实际上，从我们党执政时起，人民的知情权就越来越少了。而且岂止人民，连党员对党的活动也越来越感到神秘。例如十六大就比八大神秘得多。会是怎么开的，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都属于最高党国机密。人们不妨反躬自问，为什么连许多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无论大的和小的，发达的和不发达的），都敢实行普选和直选；而实行比它们更加民主百倍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管经过多长时间的治理和教育（训政），实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普选制的条件就是成熟不了？大概谁也不知道政治民主化何时才能实现，"军政"和"训政"还要延长多少年。社会主义国家总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怕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以人为本的起码诉求吧？

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公开性是民主化的前提。而且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论，人民群众是主人，各级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袖，都是人民的公仆。哪有仆人可以瞒着主人包办代替、操纵一切的道理？所以实行公开性、增加透明度、让人们拥有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知情权，应该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辩的事。为此，应该争取尽快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政务公开。所有国家事务，除国防、安全、外交等国际上通行的保密范围外，都应公开。例如纳税人就有权知道他们交的税都花到了什么地方。如果每年的预算收支只讲框架，不谈细目，那就无异于向主人隐瞒了一多半。我们提倡党政分开，但在现在的财政预算中党政经费却混在一起，人们怎么才能了解到国家干部中有多少是专业党务工作者和拨给党多少活动经费？

二是党务公开。这里主要指改变以至取消一些党务部门的暗箱作业，特别是组织部门在党内外选举和干部安排上的包揽；宣传部门在舆论管理上代行立法（规定不准讲什么等）、司法（处分编辑、作者和单位）和行政（审批新闻出版和干部任免等）职能的内部操持。

三是人事公开。这既指选举制度的公开化，也指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和亲属情况（个人隐私除外）的公开化。所有党员和干部，既已许身为人民服务，不惜一切牺牲，还有什么不敢对人民公开的？而人民又怎么能选举和

拥护根本不了解的人来领导自己？

四是舆论公开。既然我们一贯提倡实事求是、言行一致，那起码也应使自己制定的宪法落到实处，如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新闻等自由，允许公民有权公开发表意见，进行舆论监督。这里也包括开放历史和现实研究中的各种禁区，根据政治民主原则和世界各国通例实行档案的分期解密等。

实行公开性和增加透明度的内容很多，上列几条只是举例而言。

4，结束人治，以法治国

延安整风造成的深远影响之一就是“无法无天”（以前苏区虽然也如此，但那时地盘小、知识干部少、对全国和后世影响有限）。经过整风和抢救，几乎全体干部的人性、人权以至人格俱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独立思考、只知服从的党性。问题还在于，这种“无法无天”竟成为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也许同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mccxxviii]的思想有关，特别是同列宁一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mccxxix]等论断有关。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还在于，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制定宪法和某些法律本来就是做样子。例如宪法上规定的人民的自由权利，从开始到后来都是没打算执行的。1941年5月1日，党中央曾经批准和发布了适用于全国各根据地的著名《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mccxxx]规定实行“三三制”（第五条），“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等，可是过了不久，整风运动一来，这一切就作废了。抢救运动不只是以言定罪，而且无言（缘）无故也可被任何单位抢救关押、刑讯逼供。慢说地主、资本家，其实遭难的多是共产党员。建国后，我们党在全国执了政，但仍然执行的是“无法无天”政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他自己称之为国家临时性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擅自废弃《共同纲领》和带头破坏宪法的正是毛泽东自己。他从来不把法放在眼里，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办，直到最后和林彪一起制造了个“国家主席”事件，就来自他要擅自取消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现在报刊上经常批评老百姓是法盲，我看主要原因就在于法不兑现，上面首先不守法，了解法的用处不大。实际上，我们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是人治高于法治，而且不只上层，一些基层干部都可以无视法律和自行立法、自设公堂。所以我们不仅谈不上法治，而且也谈不上法制。

有鉴于此，我以为要谈法治，谈依法治国，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彻底清算延安整风以来提倡和推行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精神。不可死守“为尊者讳”的封建原则，为毛泽东破坏法纪开脱、掩盖和设禁区。第二，完善立法。从宪法到各项具体法规，已有的该修改的修改，使之真正体现民主、更臻完善。凡是所缺的法，如政党法、新闻法等，应当尽快制定。党、政府和各级干部，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应害怕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例如宣传部门就不应由于害怕“新闻自由”四字而阻挠新闻法的讨论和出台。总不能说社会主义实现人民享受自由权利的条件反而成熟无期。第三，立法执法都应公开，取消暗箱作业。关系人民自己的宪法修改和各项重要立法，人民反而不准谈论，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大倒退，因为第一部宪法制定时还允许人民讨论、广泛征

求意见。第四，严格遵纪守法，使法制不能流于形式和空谈。越是高层领导越应以身作则，并要严防把领导人的个人意志通过某种操作变成国家或政府的立法。

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现在谈论很多，无须在此多讲外行话。以上所提，只是从延安整风联想到的一点个人看法，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

一，上层整风就是研究和清算党的历史

（一）关于整风前的中共党史研究

现在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一般都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当时毛泽东就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却没哪个人去考虑过”。[mccxxxi]其实，还在1926年，早期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蔡和森，就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mccxxxii]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共党史学的开山之作。一年多以后，蔡和森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mccxxxiii]此外，还有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作于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作于1929年的一个报告提纲），以及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作于1930年2月），等等。这些都是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以其亲身经历所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可视为稗官野史，更不能说他们没有去考虑整个党的历史。

上述这些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献和其它一些相关论述，颇具百家争鸣的性质。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认识，直抒己见，自成体系，自行分期，既无师承，更无抄袭，个性鲜明，极少雷同，批评公开进行，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虽然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记述不确，但基本上都还是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的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录的优良传统。我个人由于改行学习党史不久，党史文献，特别是早期的材料看得极少，多数还是得之于间接转述，但仍然感慨良多。把大革命时期同延安整风后的党史研究及其著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整风前不但有党史研究，甚至可以说还相当兴旺，只是大多数放在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没能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例如张闻天编着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ccxxxiv]就曾广泛流传。所以著名史学家胡华说，“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mccxxxv]另外还有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曾作为附录编入1942年出版的《六大以前》。更重要的是，整风前延安各种学校如抗大、陕公等，就都设有《中国问题》的课程，内容也包括党史。我在抗大三分校当助教时就曾辅导过这门课，后来在训练部还参加过集体研究。像毛泽东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党史分为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三个阶段，[mccxxxvi] 1938年抗大就已普遍讲授了。

（二）整风为什么要从研究党史着手

前面一再说过，整风的目的就是要牢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此，就必须仿照《联共党史》对斯大林那样，肯定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以毛划线，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见及其代表人物，这就不能不从研究

党史着手。而党史上的头几任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早已受到严厉批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都作了结论和处理，他们在党内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此后的党史却没有总结过，而且认识还不一致。所以上层整风，开始时就集中清算内战时期的第三次“左”倾，先是从1931年九一八算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故称博古路线。[mccxxxvii]但由于王明既无检讨，反倒批评中央的抗战政策，所以毛泽东决定也要清算王明在武汉长江局时期“许多原则性错误”（还说明不是路线错误）。[mccxxxviii]后来随着整风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长一短两段党史的评估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始终采取的都是研究党史的方式。

在抗日战争紧张和困难的岁月，集中那么多领导干部，用那么长的时间作历史总结，中外人士都有些难以理解。共产国际就曾一再告诫，“不应花很长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mccxxxix]“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mccxl]就是因为整风的目的是以“打碎两个宗派”为名，一举扫清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所有障碍。如此庞大的工程，非在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中进行长时间的工作不可。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胡乔木说的由于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我们处于困难时期，这一理由恐怕很难成立。

（三）从编“党书”到作《决议》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收集资料编辑《六大以来》起，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ccxli]特别是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在表现形态上确实都一直贯穿着研究党史。但它也说明，整风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而不是流传的一些说法，诸如：开始时还是为了肃清教条主义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风气，后来由于王明的干扰才不断升级；或说，起初是想利用群众运动烧一烧高中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闹独立性的山头主义，王实味事件改变了运动的性质，使普遍整风中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还有的说，是由于1940年秋冬在对付蒋介石的态度上中苏发生分歧，[mccxlii]整风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等。应该说，这些看法也许多少有点道理，但基本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整风的部署在进行过程中确在不断调整，对批判对象的定性和处理也一再发生变化。但“打碎两个宗派”、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这从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却是贯彻始终并未改变的。这从《六大以来》的编辑上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什么时候开始编《六大以来》，按胡乔木的说法是，“我去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mccxliii]这已是1941年2月。[mccxliv]他又说，“《六大以来》的资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mccxlv]这就是说，编《六大以来》应始于1940年，而这时，既未发生中苏两党在维护还是准备破裂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也还没发生王实味事件，[mccxlvi]整风尚未开始，更谈不上王明的干扰。可见上述流传说法的不确。

至于为什么编《六大以来》，也是众说纷纭。连胡乔木都先后说法不一。他先说，“编《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mccxlvii]看来这一说法恐怕站不住。确实，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有关七大的决定，议程建议中是

有一项“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所以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中就已不再提总结了。[mccxlviii]此后，政治局和书记处曾多次决定尽快召开七大，都没有见到要搜集材料准备总结的事。1940年4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4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mccxlix]这时仍没有开始搜集材料，准备编《六大以来》。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小委员会，开到1941年2月14日第19次会后再没开，[mccl]因为不久毛泽东就以《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开始动员整风了。同年七、八月，毛泽东建议并经中央同意出版《六大以来》。9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并将该书中的政治部分加印一千份，发给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进行研究。[mccli]从这些情况中就可看出，说编《六大以来》是为七大作准备，实在说不过去。

胡乔木的另一种说法是，编《六大以来》是为了反击王明的挑战。他说，“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mcclii]《毛泽东传》上也说，“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mccliii]这些说法（照抄照搬的更多），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是假设延安整风从一开始就为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其后台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前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我在以前的笔记中曾论证过，高层整风是张闻天首当其冲。这从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整风会议，在当时就已看得很清楚。直到1943年上半年也还没有以王明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对他的批判以及先提的王明路线，都只限于武汉时期的右倾。第二，王明的小册子1940年在延安再版后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不但像我这类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的干部没把它当作一回事，而且根据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中央领导人似乎在1943年九月会议中间康生发言前都没看过这本小册子。连康生也只是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可见他以前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其它人如刘少奇等提到这本书，又都是在康生发言之后。[mccliv]第三，更重要的是，迹象表明，毛泽东本人此前没看过这本书。否则他不会在康生发言前的两年多整风中只批王明武汉时期的右倾。而且他还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mcclv]胡乔木证实，“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mcclvi]到1945年3月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毛泽东才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mcclvii]所以他还把发现四中全会的错误归功于康生。由此可见，说毛泽东编《六大以来》是由于王明在1940年再版了他的小册子，实在太牵强。而且，许多老延安在整风中及此后相当时间，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说法。这显然是为了把延安整风说成从开始就是以清算王明路线为目标而在多年后想出来的。

谁也不能否认，编《六大以来》是为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服务的。因此

《六大以来》的编辑方针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尽量收有利于整风目的的文献，否则不收。具体说来，就是按照斯大林编写《联共党史》的办法，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另有一条错误路线。选材就要选证明毛泽东正确的材料，并尽量选证明另一条路线错误的材料。如果有证明毛泽东错误的材料，则舍弃。所以胡乔木说，“可见编辑《六大以来》也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mcclviii]正是根据这种精神，1943年又干脆选编了一本《两条路线》。

我在以前的笔记中曾经提到，如果说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mcclix]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那是很明显的；但是说党内在政治上也存在两条路线，就很难分清了。查阅六大以来的文件，可以容易地看出博古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但要找到与之对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文献证据，却就大不易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编《六大以来》在筛选文献时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时间跨度不限于第三次“左”倾的三年零四个月，而是一直选到整风前的1941年。这是为了说明，即使在那三年多时间内找不出代表正确路线的重要文献，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文件却已代表正确路线了，而且还认定这时已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因此用不着对两条路线作同一时期的横向比较，而只要作前后的纵向对比就解决问题了。对这一办法，连胡乔木也是承认的。他说，“毛主席怎样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黑体系我所加）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mcclx]

二是不收六大以来毛泽东（也包括刘少奇）有错误的文献，例如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4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等。收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却不收讨伐红二十军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1930年12月），并用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的办法转移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一概不收因中央军委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错误导致占红军三大主力五分之二兵力的西路军遭到覆灭的有关文电，如执行为打通苏联通道的宁夏战役计划的《十月份作战纲领》（1936年10月10日），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1936年11月8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一些重要指示电等。[mcclxi]在为清算历史而编的《六大以来》中竟抹掉了这段重要历史，后来还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张国焘。[mcclxii]没有编入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因其在《战略方针》中“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置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之上，事后曾受到总书记张闻天的批评[mcclxiii]），建国后的再版本却补收了不知何时整理的瓦窑堡会议传达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三是在材料取舍上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双重标准，即与尽量不收自己方面有错误的文献的同时，尽量少收以至不收对方正确的文件而多收一些证明对方错误的细小材料。如果将反AB团和富田事变同博古、罗迈、洛甫的反邓、

毛、谢、古江西的罗明路线相比，前者的性质和影响都要比后者严重得多。前者被定性为敌我矛盾，错杀了成千上万的忠贞干部和革命战士，一度造成苏区的危机，也使毛泽东的威望下降。连陆定一直到1988年4月30日还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说，“毛泽东在革命时期，除了‘富田事变’李文林一件事以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mcclxiv]而邓、毛、谢、古的罗明路线却一直被定性为党内斗争，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并未被开除党籍，只是受到撤职与处分，调走做了别的工作。例如邓小平就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不久被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直到遵义会议。[mcclxv]但是反映在《六大以来》上，前者已如上述，全付阙如；后者则尽量多收，单是反对邓、毛、谢、古就收了四篇，包括与《六大以来》内容和体例（只选中央文件和主要领导人文章）相去甚远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1933年3月31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1933年5月4日），以及所收惟一的一篇罗迈的文章，但却不收第一次提出北上方针的张闻天所写《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1935年6月24日）等文件。仅从这一对比中就可看出《六大以来》筛选文献的不同标准，也可看出长年宣传的“左”倾中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算上以后四十年历次运动中的消灭异己，那对比就更明显），原来如此！

既然党书的倾向性这样明显，为什么被批判的两大宗派成员竟会纷纷缴械呢？首先因为这有个前提，就是党书的多数文件证实，“左”倾中央及其支持者执行的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他们看到这些文件后，就只能作自我批评而不会去批评别人。毛泽东虽无代表正确路线的纲领性文献，但他确实一直处于“左”倾中央的对立面；虽然对他并未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党内地位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升为正式委员，可以参加按规定应参加的一切会议，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像后来他对一些中央领导人那样一撸到底、立案审查、限制自由），但却被夺去了实际上的党权和军权；既然整他的人证明犯了路线错误，那么被整者也自然会被看作是正确的。所以整风中缴械的人张闻天、博古等，检讨自己错误和承认毛泽东正确，也是出于真心实意。他们当然也知道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比“左”倾中央更“左”，但他们都支持和参加过，所以没什么可说的。另外，有些事情，甚至一些高层领导也不十分清楚。例如西路军问题，来往电报恐怕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又是参与者，很难出来主持公道，更不会为张国焘辩诬。还由于长期来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既有中国传统，又受苏共影响）和延安整风时的严峻气氛（加上抢救运动这一持久激烈的敌我斗争环境，矛盾在随时转化），就无形中形成了这样几个潜在规矩和传统：第一，凡属被列为犯错误者，就只有检讨交代和挨批的份，不得进行辩解（态度不好）和反驳（对抗），更不容许对批评者作反批评，特别是不能找正确领导的碴。而在延安的中央整风中，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多数人主要是检查自己和批评那些犯有更严重错误的人。所以延安整风以来，还没听说过除王明外有人当时曾批评过毛泽东。第二，随大溜以自保，何必为辨明是非去捋虎须。这就是为什么西路军问题的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宁可沉默四十五年，直到已再无风险的1982年，才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李维汉和温济泽也是在四十年后才为王实味平反起来尽力的。第三是为了过关，尽量上

纲上线，直到被迫说违心的话甚至瞎编乱造。

这里附带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六大以来》1941年版和1952年版所收毛泽东文章的差别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1941年版收毛文少，“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当时的谨慎与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了。”[mcclxvi]这种为毛泽东说的好话显得实在勉强。第一，“当时”谨慎和要求严格，是否表明到1952年就完全变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好话反而变成贬语了吗？第二，事实也并非如此。按我的理解，毛的许多文章没收入1941年版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六大以来》印数极少，只供高干学习，且严格保密，而毛有些文章不但公开发表过，且已先后发给个人，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即使当时未公开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也都人手一册，再印纯属重复，反而会使大家不理解。二是当时许多文章还未整理修改好，甚至很不成熟。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强调的《矛盾论》、《实践论》来说，1937年的讲稿就同斯大林派尤金来参与修改过的定稿有不少重大差别。我现在手头还保存有一本延安时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的《矛盾论》只是原提纲中第三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第一个问题，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其中第二节《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错误地把形式逻辑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批评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有三条根本规律”，“全部形式论理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修改结果是，从原文的二万五千字中删去近七千字，增加约六千字。这样一篇受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严重影响、很不成熟的文章，在修改前怎么能拿出来给中央整风小组学习？那不是要弄出笑话来吗？《实践论》也有较大的补充、删节和修改。[mcclxvii]又如《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3月27日才在《解放日报》加按语“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1941年编《六大以来》时还没整理出来，怎么可能收入？其它如瓦窑堡会议的传达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一直怀疑是编《毛选》时才整理成文的，因为此前从未讲过原来在何处发表过或成文根据。总之，对这个问题要说这么多，是想表明，胡乔木等人即使在谈《六大以来》版本这样不大的问题时，也会流露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情结。

整风中，人们在学习了这种精神指导下编写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以后，对中共二十多年的党史，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这段历史的了解，就有了一个鲜明的轮廓。何况早在1941年，为准备政治局九月整风会议，毛泽东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问题结论草案》，其中就涵盖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后来由于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毛泽东想法的变化，这一《草案》才被长期搁置下来。通过1943年政治局九月会议对历史问题的检讨，毛泽东认为他的那个《草案》已经不够，需要重新起草一份历史决议。于是就决定从1944年5月21日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专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讨论历史决议草案。这次会开了11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mcclxviii]在全会期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对《历史决议》曾七易其稿，每次都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由全会“原则通过”。此后又经过三次修改，终于在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后通过”。但建国后毛泽东又对《历史决议》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经多数政治局委员圈阅同

意，最后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三卷。

二，《历史决议》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奠定了基础

（一）《历史决议》为党史学确定了原则和规范

《历史决议》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而且也为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了基本框架，使党史研究有所遵循和制约，成为官方党史学的经典。《决议》虽然重点是总结第三次“左”倾时期的问题，但实际上已对建党二十四年来的历史作了概括，只是抗日战争阶段涉及不多。所以，《决议》的出现也就标志着建立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开始。此前的党史已经有了定论，以后的党史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

当然，《历史决议》并不是单为了开创一门学科而作。它主要的还是给三年多的延安整风作总结，体现出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由于苏联的关系，《决议》发表时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实质上并没有变，所以在中苏分歧加剧时反而提得更高了。总之，应该说，六届七中全会和它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它们的重要历史任务，实现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紧接着举行的七大，只是将全会及其决议的精神以法定的形式和程序加以体现并在组织上固定下来，因此象征意义更大些。

延安整风所取得的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当然也适用于对党史的认识和研究。因此，有了《历史决议》，作为一门正式的亦即官方的党史学就已呼之欲出了。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还顾不上党史学科这一领域。建国后，胡乔木完全根据《决议》精神写出、并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了，这就标志着中共党史学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并规定“编印党史资料”。随着高等院校的调整，都先后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课程，其中就包括有党史的内容。所有这些，就把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推上了一个高潮，使以《历史决议》为基础建立起的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正式出台了。[mcclxix]

（二）《历史决议》的三大缺陷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曾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作为整风总结的《历史决议》，按照《联共党史》的路数写，当是很自然的了。因此，《联共党史》的毛病（那时并不认为有毛病，还被毛泽东说成是全世界惟一的典范），必然会反映到《决议》中来。《联共党史》的根本毛病是为突出斯大林而编造和歪曲历史。这也影响到延安整风和所作《历史决议》。所以连胡乔木都说，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党史，“这个工作，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mcclxx]综合他的说法，《决议》不够实事求是的缺点，可以归纳为三大问题。

1，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用我们前面引证过的胡乔木的说法就是，“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

的。

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mcclxxi]“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mcclxxii]《联共党史》已被苏联和俄国一些学者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决议》也完全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中心内容。下面兹简单举例作点说明。

过度颂扬《决议》全文约28，800字，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有四十七次，出现的频率超过了《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而且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单枪匹马打天下，除称赞刘少奇的白区工作外，其它领导人不但无功可提，还大多受到不指名的批评，不是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而对毛泽东的许多颂扬，也属于“不够实事求是”的拔高。例如《决议》的第一句话说，从党诞生时起毛泽东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似乎成了天生的圣人，这不正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周恩来就说过，对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他在给恽代英的回信中还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后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mcclxxiii]胡乔木也说，“好象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不过他接着又说，“当然，七中全会时要换一个写法也不可能，我的这些话是事后诸葛亮。”[mcclxxiv]可见当时争先恐后制造个人崇拜的气氛。

掠人之美《决议》把别人的成绩用各种直接间接的办法挂在毛泽东的帐上。例如把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归功于“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遵义会议明明建立了以当选总书记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决议上却改写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这也有悖于他对“为首”即召集和主持会议的解释。[mcclxxv]张闻天、周恩来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决议》中含糊地归之于毛。

诿己之过把毛泽东犯的许多错误用有时明确有时含糊的办法推给对立面或别人。如“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是毛执行了一辈子的，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归反革命阵营（收入《毛选》时作了删改），在反AB团中怀疑和捕杀了不少知识分子，但《决议》中却被算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条罪状。把对“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被诬告，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的“错误的肃反政策”，也推给“左”倾路线。

为尊者讳不但对毛泽东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一律讳掉，而且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被讳掉了，使党史在不少时期和不少问题上的真实情况逐渐消失或被篡改了。这不但使党史与科学渐行渐远，而且对总的政策和实际工作遗患无穷，后来长期犯严重的“左”倾错误都可从这里找到根子。

2，党史只是路线斗争史

又是胡乔木所说，“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决议开端。”[mcclxxvi]这也是从斯大林关于“党的历史是党内斗争的历史”那里搬来的，[mcclxxvii]使人在路线斗争中看出毛泽东是一贯和惟一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决议》发表后确实也没停地进行着党内斗争。无怪乎连胡乔木也哀叹，“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

多少同志。”[mcclxxviii]不过到了邓小平，不但把十次路线斗争给砍掉了一大半，还干脆不再提路线斗争了，连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行径都不算路线错误，而从轻定为失误或悲剧。[mcclxxix]

把党史变为路线斗争史还出于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观决定论。根据《决议》的说法，过去的几次失败，如大革命、放弃中央苏区等，主要都是由于领导上犯了路线错误。这实在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客观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决议》说，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它同志的正确意见”，遂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这种论断是根本站不住的。陈独秀即使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也接受毛泽东等的意见，甚至换成毛泽东当总书记，大革命大约仍然胜利不了。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完全看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同样值得考虑。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恐怕已很难奏效，保持根据地原貌的可能性也不大。二、四方面军被迫长征就是证明。遵义会议后，路线和指挥不是都已正确了吗？怎么就在云贵川陕等地驻不下来，建立不了新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红军也许不得不实行毛泽东的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最后很可能是留一部分人坚持陕北等地的分散游击战，主要干部和机关暂时撤到蒙古以至苏联（如同东北抗联）。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后来一再在内部和对外宾表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可见，为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在客观上起了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作用。这也是周恩来至死和我们党始终不忘记张学良将军的原因。

3，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决议》明确指出，“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在这之前，刘少奇就一再强调“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更是经常讲右倾机会主义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或应声虫。[mcclxxx]不过《决议》上倒是说，“‘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都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和以后很长时期，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干部在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时，都要主动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想到建国后不久，小资产阶级就被升格为资产阶级，反右派与反右倾受批斗的人，就不敢再检讨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承认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参与起草《决议》的胡乔木也很快改变思想，后来提到《决议》时还气愤地说，“我特别反对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个概念用得太滥了……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和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mcclxxxi]胡乔木的这些话是在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的，因为这时要谈的是建国以来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再说路线错误、什么主义（但却并未忘记写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反映”，那帽子不是就戴到毛泽东及其一些战友的头上了？大约因此才决定不再用。可见，这些名词和提法不是能不能用，而是看什么时候和对什么人用。

当然，《历史决议》的缺陷决不只这三项，其它如把陈独秀说成“堕落为反革命”，把瞿秋白主张的发扬民主说成是“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主义状态”，以及对许多被列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领导人的无限上纲和过头批判等，这里就不多列举了。

（三）略谈第二个《历史决议》

1，为什么要谈一下第二个《决议》

在谈延安整风结果产生的第一个《决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需要提一下将近四十年后又制订的第二个《决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因为两者紧密联系，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为了表明这点，第二个《决议》还特意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急于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当时就把原因说得很清楚，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为了恢复“文革”前的政治和领导体制。这就使中国错过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政治改革机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了一条腿。如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能够抓住机会，像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样，稳步推行政治改革，应该说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干部退休制的实现就是证明。可惜邓小平只是开始时说说，实际上并不想看到政治民主化，所以既未采取重大落实步骤，到后来干脆连提都不大提了。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说，“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mcclxxxii]

其实，事后看来，邓小平并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他重新执政后，总结过去经验，面对世界潮流特别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认识到原来的一套已不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了，必须稳中求变，首先是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这虽遭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左”派干扰，但因他们太不得人心和违背潮流，只能落得个节节败退。加之实行改革开放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不伤害既得利益者，所以阻力较小，成果显着，得到全国拥护和世界赞扬。政治改革可就大不同了，实行民主定会伤筋动骨，不但削弱各级干部的权和利，而且也约束最高领导的说了算，连党的整个领导体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批评权利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封建遗毒、搞特权和特殊化等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强调“四个坚持”，以便保证一元化政治体制。[mcclxxxiii]在既要进行拨乱反正和稳定领导格局，又不得不面对时代潮流和人民诉求的情况下，就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前半期，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舆论稍有开放，人文社会科学呈现一定繁荣，一些政治问题允许讨论，还先后公布了一批党史材料。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气氛下，舆论界要求民主的呼声渐高，并涉及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和对建国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为了防止发展下去影响到政治体制

（集中表现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初衷，[mcclxxxiv]要急于作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mcclxxxv]陈云说得更干脆，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mcclxxxvi]可见，赶紧做出这个《决议》，就是要及早给党史划个圈子，做出定论，然后禁止出圈或“不搞争论”，这样来维护毛泽东，也保护自己，归根结底是保持一元化领导体制。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和实施，也标志着政治改革酝酿的终结。由于不搞政治改革，缺乏监督机制，就自然产生了两个孪生的恶果，一个是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增长水平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程度很快处于世界前列。这就孕育着很大的风险。所以连邓小平也承认，“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mcclxxxvii]但可惜他一直到病逝也没能付诸实施，结果积重难返，使政治改革以后更难启动，也更不容易刹住日益严重的腐败之风。

2，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些看法

作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虽然文字上还在批判个人崇拜，但从它的中心思想和客观效果看，实际上还是要维护个人崇拜。这只要看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就会清楚。

（1）主持和领导制定《决议》的邓小平开宗明义就说，“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mcclxxxviii]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mcclxxxix]的一条。在起草过程中，胡耀邦曾提出，“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做法。”据此改定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对邓力群说，“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mccxc]一句话就给否定了。这说明，作《决议》的重点并不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所以经过八个多月反复修改仍然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问题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mccxci]从胡乔木的话中也可看出当时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情绪：“毛主席的错误非常严重，引起大家的愤懑，这是不奇怪的。”[mccxcii]但是不管大家有多少意见，按照延安整风确立下来的领导体制，还是领导上说了算，第二个《决议》终于这样定了下来，其间的四千人讨论看来并没起太大作用。

（2）《决议》本身以及有关《决议》指导思想的一些谈话，反映了不少个人崇拜的做法，如为尊者讳、隐恶扬善、揽功诿过等。例如在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中有“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左右”，[mccxciii]可就是没提西路军的两万多人和肃反中被错杀的少说也有七八万人。既然“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mccxciv]那为什么对过去的错误继续写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对毛泽东，既不算路线错误，也不提什么主义？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不合乎事实。连胡乔木也承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恶果也很厉害”。[mccxcv]当时我曾在讨论中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和史学家李新（他说《决议》五十年后还得重做）一

起在小范围内被通报了。《决议》中还有一些其它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如说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民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那后来的改革不是在开倒车吗？[mccxcvi]说个体农业向高级社发展“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说大跃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这合乎历史真实吗？说1956年后，“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说1960年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能相信吗？对成绩列了那么多数字，为什么就偏讳掉了大跃进对经济和生态造成的损失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等等。

（3）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要“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而且还要夸大成绩。在“建国三十二年的基本估计”中罗列了一大堆数字，其实即使这些数字经过审计、核实，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只要“面向世界”（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稍作比较，就不能不承认，我国是这三十年世界发展的最大掉队落伍者。不说政治文明和科教发展，单以经济而论，我们也从1955年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4.7%，降到1980年的2.5%。如果和日本比，那就落后得更为惊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人均，1957年我国分别为日本的140.85%和20.13%，1965年已分别降到78.32%和10.83%。[mccxcvii]由此可见，正是在《决议》所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我们却大踏步地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拉大了距离。因为日本，还有“四小龙”，都是这个时期先后实现经济起飞的，我们则由于个人崇拜的体制而不受任何约束地在瞎折腾。因此，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就只能理解为没有体验到这十年中普通老百姓的受苦挨饿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受批挨整，只考虑到为毛泽东和参与其事的其它领导人开脱。

（4）《决议》及其指导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个人崇拜的思维和逻辑。

例如说，“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或者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mccxcviii]这就有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味道。那是否也可作相反的假设？即没有毛泽东，很可能就没有大跃进和反右倾，就不会有人为的三年困难，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反而在经济上一直把日本甩在我们的老后面。又如说，只能承认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否则，就是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不管怎样说，把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划等号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实在世人眼里，真正给党和国家抹黑的，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过去的大跃进、饿死人、“文化大革命”等，以及至今在制度上的封建专制、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长盛不衰的偷渡外逃等等。这些才是真正丢中国人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其实，这也属于夸张。在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前，难道我们党就没有光辉的历史？从建国前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包括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这段历史就不光辉了？“文革”十年举得更高，那段历史就特别光辉？按写到《决议》上的话讲，毛泽东思想只“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实践同样也证明，将它用到现代化建设上，就使中国遭到一系列失败，延缓经济社会发展几十年。（按邓小平设计，中国要用一百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战后日本虽然起点不同却用了二三十年就已成为发达国家。“四小龙”也大致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参加讨论的许多

人不赞成再提毛泽东思想，主张只提马克思主义就行了。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敢于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即胡乔木所说多数同志不赞成的思想），大力抓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老百姓中流行着许多颂扬和感谢邓小平的话："邓小平让我们吃上了饭"，"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都是托邓大人的福"，等等。具有如此胆略和气派的一代伟人，为什么到拨乱反正时就是冲不破个人崇拜的阴影，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作一个仍然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历史决议》？分析起来，大约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信守列宁关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它政党分掌领导"[mccxcix]（黑体字是原有的）的信条，进而坚持一元化领导体制。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维护这一根本问题。二是要借助钟馗。邓小平复出时并不具备毛泽东的权威，因此就要依靠高层老干部的支持和借助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两者实际又是一回事。长期养成的个人崇拜，确实有点根深蒂固，像陈云所说，"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mccc]所以邓小平在实际上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时，还得打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三是怕乱求稳。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维护党领导的政权，就必须改变总路线和许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对此，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已经发出了警告。邓小平正是顺应人民要求，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实行改革开放。但在政治改革上，他对形势和干部群众水平有点估计不足，以为对毛泽东缺点错误的清算会影响稳定、搞乱大局。因此不如把问题包起来，赶快作出《决议》，就天下太平了。这就妨碍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专制体制问题，并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其实情况和这种估计并不相同。当时干部群众都是人心思定。只要实事求是、讲清道理、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群众需要，即使有些干部由于思想不通或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叫嚷，但也如同一些反对改革开放、坚持计划经济的"左"派掀不起大浪一样，中国当时是决不会被搞乱的。所以问题还在第四，即为了保护自己。"文革"前的许多事都是大家紧跟毛泽东一起干的，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也就等于批判自己。而且如果真的改变了个人崇拜体制（也就是一元化），那就会直接影响到领导人本身的权和利。这不但是上层，而且也是许多中下层干部都不容易做到的。正是由于上面这些，第二个《历史决议》才要求尽快做出来。

三，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乔木胡绳学派

（一）胡乔木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它的创建还是发展，可以说都是和胡乔木分不开的。中共党史学创建于延安整风。而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入了中共党史领域，不但参与了党史资料的编辑和《历史决议》的起草，还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列席了高层有关党史的清算，为史料的积累和对毛泽东观点的领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六年以后，胡乔木奉命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署名发表。[mccci]“从此，胡乔木的名字同中共党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对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mcccii]这也标志着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中共党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前，党和国家还没有设专门的研究和管理机构，高等院校也是到1959年4月才提出开设单独的中共党史课。196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规定，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要设置中共党史课。[mccciii]但未及展开就开始了“文革”。在十年“文革”中，虽然毛泽东不断讲党史，还提出十次路线斗争之说，不过在那个动乱时期是谈不上什么研究的。后来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行，党史工作才受到党中央的空前重视。这时，胡乔木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在事隔三十年后重新担负起党史工作的重任，直到生命的结束。

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胡乔木在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的党史编纂学体系更臻成熟，还在他生前就已形成胡乔木学派。他不仅为中央主持起草了包括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内的许多重要文件，写出了在其门生中着称的所谓“党史三会”（《党的“八大”的基本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十二大的重要成就》）和《党史三论》（《中国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组织上和行政上领导全国的党史工作，出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为杨尚昆兼），主管几个中央一级的专业党史部门如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存在过几年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别是最后几年，他更抱病指导、主持和修改出版了两部教科书式的正式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还指导编写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有这些，就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开拓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胡乔木成为中共党史学史上可以超越却不能绕开的人物。

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胡乔木学派，也不能不提到胡绳。这是因为他们在学术思想上保持着传承关系。胡绳也自觉接受乔木的指导，自称是乔木的学生。[mccciv]他还长期参与党史工作的领导，出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后来又被提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为乔木的接班人。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就曾称赞说，“这一本书是党史工作的空前独一无二的成就”，并主动提出为之写《题记》。所以郑惠说，“胡绳和乔木在这

件事情上真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mccccv]两人不但是党史研究界公认的权威，也是受到重视的著名学者。胡绳称胡乔木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mccccvi]胡绳也被他的学生称为“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在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等方面，胡绳的研究是出类拔萃的，其成就即使与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现实和理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mccccvii]不管对他们别的方面如何评价，两人都是中共党史主流学派的一代宗师和领袖，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

（二）对作为党史学家胡乔木的一些看法

我和胡乔木很少接触，[mccccviii]又没研究，所以谈不上对他的什么评论。但是由于要谈党史，就不能绕开他，所以我在前面笔记中已多次引证他和对他有所议论。下面再谈一下学习过程中对他几点比较突出的感受。

1，胡乔木是创建中共党史主流学派的主要参与者

在我们国家和我们党领导的现行体制下，意识形态是由党直接和统一管理的，政治性特别强的党史研究就更是如此。所以严格地讲，党史研究在国内也就只有一个学派，即胡乔木学派。它有专业的行政单位，有从上到下的业务指导系统，不仅这些单位自己从事党史的研究编纂，也还配合党的宣教部门，管理和审查全国的党史研究和涉及党史事件与人物的其它文化、文艺创作，规定全国必须遵守的原则和不得逾越的范围，如坚持两个《历史决议》、垄断重要史料、设置一些禁区等。当然，属于这个学派，自认是乔木、胡绳学生的人，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各自的见解，但是既属官方学派、又系公职人员，所以在大的方面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而所谓同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同中央领导保持一致，毛泽东在世同毛泽东保持一致，毛泽东之后同邓小平保持一致。连学派领袖胡乔木也只能如此。下面我们就举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例。

胡乔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本来就是“为了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和“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意图”。[mccccix]但从现已公布的邓小平、胡乔木二人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记录看（更不用说没有公布的了，我在当时就曾看到过一些），两人的看法开始时还有些不同。主要原因和表现可能在两方面。一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的了解要远比邓小平深得多，理论上的评价也没有邓小平高。例如他说，“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也“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主席也好，中国党也好，实践的范围，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很有限的。那样说是妄自尊大。”[mccccx]对此，邓小平也只能说，“这些都对”。[mccccxi]至于胡乔木提到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说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mccccxii]经济学，毛泽东没有研究更是公认的事实。对这些，邓小平当然无法涉及，只是在谈到经济改革时说过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mccccxiii]
二是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胡乔木起初还多少受当时的氛围特别是思想界的影

响，因而提得比较重些。像邓小平把“文革”前十年说成“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胡乔木的认识就一时跟不上。连邓力群也曾批评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mcccxiv]另外，两人在民主、法制、国家体制等问题上，提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胡乔木主张“国家只能搞代议制”，反对“党领导一切”的论断，[mcccxv]邓小平恐怕就不一定同意。但是不管胡乔木如何认识，他都严守承上启下的原则，所以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还是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

这样看来，说胡乔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不确切，所以这里称他为“主要参与者”。因为真正给现行中共党史开拓和奠基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被称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学术上可以说谈不上有多少独立创见，是完全按第一个《历史决议》写的，而这个决议又是经过毛泽东增删修改十余次，“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所以收进了《毛选》。[mcccxvi]至于建国后的党史，又是主要按邓小平的意见。不过应特别指出，这里提到的所谓胡乔木学派，只是想说明有此客观存在，并不是也不可能评论这个学派，更不会谈论它的专家学者，否则就是太不自量力了。

2，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的重大贡献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已经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述，这里只想根据个人学习中的体会，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胡乔木使中共党史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虽然中共党史主要由两个《决议》（特别是第一个）奠定基础，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其次是邓小平。但使党史系统化，解决两个《决议》未涉及的大量史实和理论问题，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原有论述作必要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都是在胡乔木的指导和领导下进行的。单就此而论，也可以把胡乔木称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第二，胡乔木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由于党史档案的严格保密（拨乱反正时期稍为宽松了些，后来就更严了）和为尊者讳等原则的严格执行，党史中许多问题都是若明若暗或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一般人学习党史就只能读有权看一定范围资料的人的复述，而后者又受到许多规定的限制。胡乔木由于他的特殊处境和经历，对党史的熟悉程度超过了毛泽东（后段）和邓小平（前段）。所以他有关党史的随便谈话都是很珍贵的资料。例如我是从头至尾参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但在这次改行学党史后，对延安整风还是一片茫然。因为整风的重点是上层，而对上层整风如果不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材料，许多情况还是弄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这本书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成为我写学习笔记时引证频率最高的两部著作。

第三，胡乔木在不少党史问题上揭开了盖子，这就比提供资料的意义更为重大。对此，前面已经作过多次引证。例如他对1945年的历史决议就作了严厉的批评，说它的缺陷“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而且“对历史事实说得很少……台上只有路线斗争”，等等。

[mcccxvii]又如评论延安整风时说，“要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mcccxviii]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他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还揭开了盖子。但是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他起的作用可以说很小，不但没有动摇原有定论，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讨论。以第一个历史决议而言，既然有那么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要被定为研究党史不可逾越的雷池，连提出质问和讨论都不行？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胡乔木的揭盖子极不彻底，何况他的主要倾向还不是揭，而是捂；第二，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领导集体需要的是保持延安整风以来的道统和法统，不容对历史决议有所动摇，而官方学派的专家学者又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作为中共党史学官方学派的领袖，在胡乔木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党史专业队伍，成立了遍布全国的党史工作机构，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发掘和积累了大量史料，还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把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由于它系官方学派，有统一的领导，遵循统一的口径，要求基本观点完全一致，还有权对史料实行全面垄断和对研究进行严格管理，所以使中共党史研究只此一家，别无流派，实际上不允许自由研究和百家争鸣。

3，胡乔木治学和作风上的两重性

胡乔木无论是在党史（也包括其它领域）研究还是思想作风以至性格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有人把这称之为士和仕的矛盾。一方面他还多少保存着知识分子的本性，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礼贤下士和团结爱护文化人的善意。另一方面，长期的经历和所处地位又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护人，甚至在政治路线、思想作风上被中外部分舆论称为“左”倾的主要代表。其实，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在某些问题上也敢于和毛泽东、邓小平争论。遇到适当气候，他还会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勇气。例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毛泽东的许多错误论断，包括民主只是手段、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就是他首先站出来批判和推翻的。他也敢于指出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曾批评列宁建立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和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只能导致领袖专政。他尊重知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他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以他为领军的这个学派内至今尚无出其右者。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占主要地位的一面。

另一方面，连对他第一个立传的叶永烈都说，“他毕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他。即在毛泽东去世后，‘左’的影子也不时困扰着他。”[mcccxix]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左”并不始于1957年，而是早得多（连胡乔木也说，“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说毛主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mcccxx]）。从1940年出任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起，胡乔木就对毛泽东亦步亦趋地全面学习，从思想到作风可说都学得相当到家。例如毛泽东声言不下“罪己诏”，胡乔木也从来不作自我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他先反“左”，后又反戈一击，发言痛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诬蔑》，说：“斯大林晚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mcccxxi]后来还写了一篇《剥开皮来看——彭德怀

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内部文章，我在当时接受批斗时也曾学过。对这些他从无检讨，但后来却特意声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没有参加。"[mcccxxii]又如他在肯定第一个决议时就说，"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mcccxxiii]但当批决议时，又无端申明："毛主席对决议没有做很多的修改。"[mcccxxiv]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叫人相信哪一种？再如1977年他根据邓小平的命题和要求，主持撰写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82年在起草"十二大"文件期间又对李慎之说，"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mcccxxv]他在1980年5月28日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讲话时，曾大为赞扬托派理论家比利时人曼德尔写的《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将十五至十七章印成大字本分送中央负责同志参考。但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却于2月20日和3月6日严厉批评人民出版社，说："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mcccxxvi]他把周扬批成了植物人，却写出深情怀念友谊的诗。还有一件怪事是胡耀邦说的，"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mcccxxvii]现在恐怕也很少人能解其故。

类似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如果说这都只是些"小事"，那么下面再就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影响比较大的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三）参与制造和积极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胡乔木的毛泽东情结

胡乔木任毛泽东秘书二十五年，朝夕相处十年，思想相通，感情融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产生和保持"毛泽东情结"是很自然的。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七一抒情》一诗中就曾写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直到1982年6月1日他七十岁生日所写《有所思》中，仍感念于"红墙有幸亲风雨"。1992年他决定出三卷本《胡乔木文集》，在第一卷的《序言》中还特别交代，书中绝大多数评论都经过毛泽东修改，现在"编辑成书，既有助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文章和工作作风，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接着深情地写道，"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所进步。"[mcccxxviii]其实，毛泽东对胡乔木的恩惠岂止指导作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还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才做毛泽东的秘书两年，就已被毛派去代替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所担任的中宣部长，建国后更成为掌管全党和全国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保持党的一贯文统（文件起草和把关）、把舆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著名的一枝笔，[mcccxxix]胡乔木更进一步得到重用。不但全面掌管意识形态，在党国大事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使在逝世后，他的影响依然很大，例如专门设有整理他文稿的班子，这在政治局委员一级领导人中就很少见。所有这些，自然都与毛泽东有关。所以，只要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大树毛泽东，胡乔木的地位和影响也就必然会持续下去。

胡乔木把宣传和维护毛泽东当作了他的终身任务，确实也做到了鞠躬尽

瘁。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出于中国传统的报知遇之恩。由于他对毛泽东了解深，有时也有所议论，但绝不允许别人对毛泽东表现不敬和尖锐批评。遇见这种情况，他会大动肝火，坚决起而捍卫。他崇拜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二人的思想一致。现在想来，从他到延安直至去世，概括对他的印象，主要还是一个“左”字，而且是越来越“左”。所以在他主管下的党史研究，也就只能在延安整风时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实际上仍然离不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胡乔木治党史更多地是在为个人崇拜服务

像胡乔木这样的理论家，说他搞个人崇拜（迷信），人们也许不容易理解。其实个人崇拜倒真的往往是理论家们鼓吹起来的。积极搞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日丹诺夫，理论水平大概要比胡乔木高的多。一再说自己就是要搞个人崇拜的刘少奇，水平也不见得比胡乔木低。是否搞个人崇拜，也不能只看表面，主要还是看他的实际言行是否合乎我们在上一篇笔记《延安整风开始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列举的那几条标志。而且要掂量其主要倾向，因为谁也不可能同每一条都完全相合。胡乔木有时批评毛泽东就很厉害，在某些问题上还有点看不大起。但他的主要倾向是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的。对此，上述笔记中已经有多处提到，下面再举几个较明显的例子加以说明。

（1）《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宣传个人崇拜的标本

至今仍被称作“公认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mccccxxx]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基本上甚至完全是仿照被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还真有点“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篇四五万字的文章，提毛泽东的名字竟有124次，其频率和比例大大超过《联共党史》（约33万字）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共提列宁斯大林650余次，还以列宁为多）。《联共党史》还不同次数地提到十余名其它中央领导人如莫洛托夫、基洛夫、加里宁等。而《三十年》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除作为反面人物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外，其它人基本不提。对于长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和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的张闻天，还一再进行不指名的批评。如暗示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抗战时期又“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它个人崇拜的表现，包括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夸张（如说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已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说1930年前，毛泽东不仅制定了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总路线，还对各项具体政策都做出了重要创造等）；窃功诿过（如说反四次“围剿”的胜利是根据毛的战略，说瓦窑堡会议后毛一次传达报告就“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和“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却只字不提富田事变和西路军问题，把红军人数的减少完全归于“党内的错误的领导”等），各种过分颂扬可说举不胜举。另外，《三十年》也没有忽略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恩与歌颂（文中提到斯大林15次，仅次于毛泽东，说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强调必须“学习苏联的榜样”）。

这里应当稍作说明的是，胡乔木以《联共党史》为样本写《三十年》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mccccxxxi]所以胡乔木也就按

《联共党史》写斯大林的办法写毛泽东。在学习《联共党史》和学苏联上，胡乔木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主张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胡乔木就提出报纸也要像《联共党史》那样办成人民的教科书。他说，“一本好的教科书，就像《联共党史》一样，应该是章章都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mccccxxxii]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mccccxxxiii]提倡全面学习苏联，胡乔木就要把“学苏联”定为中宣部的工作重点，并同主张重点“抓思想”的陆定一发生争论。[mccccxxxiv]他在苏联养病时，找我谈话也多是有关学苏联，一次只是专门了解一下五一和十月革命节莫斯科参加集会和狂欢的群众是如何解决上厕所问题的。回国后还写信，要我和使馆研究室多给《人民日报》写介绍苏联建设经验的文稿。（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延安整风并没有反对“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

（2）胡乔木在“文革”后仍积极维护个人崇拜

“文革”结束不久，胡乔木即处于党史界的统帅地位，他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宣传和维护。

胡乔木在“文革”中也曾一度遭到“四人帮”半点名地批判，但他同毛泽东的思想感情还是相通的。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在积极提倡阶级斗争和夺回“失掉了的政权”的时候，胡乔木就填词呼应：“领袖语，牢记起，百年大计争基础……”（1965年3月，《梅花引·夺印》）。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也显得与众不同，更多地以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己任。当他“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曾愤愤然地说：这是‘分裂党中央’”。“他也是较早地公开提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异议的人。”“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后，他谈到一段个人的想法时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否则就会“犯很大的错误”。[mccccxxxv]他在此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mccccxxxvi]

胡乔木为了维护毛泽东，对他主管的宣传抓得非常紧，做到了有“偏”必纠。例如1980年11月5日写给胡绩伟的信说，“近来常看到这样一种反映，即毛主席的论点在报纸上一点一点地批判否定掉了。”他列举了三种原因，一是批判稍显频繁；二是批判多用否定式，只讲不正确的一面，“如从正面论述，说得较为周到，印象就可能不一样”；三是“没有或很少正面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现在仍应宣传的正确观点，无论这些观点后来是否被他本人的言行所推翻”。他认为，“这是我们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深思熟虑。”[mccccxxxvii]这就是要正面宣传毛泽东，连那些已被推翻的观点。如第二个《历史决议》虽明确指出，毛“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还是要多宣传他如何谦虚谨慎、关心群众、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等。连毛泽东最明显的错误，胡乔木也为之辩护。例如把造成1959年庐山会议不幸的责任想方设法推给彭德怀，说：“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mccccxxxviii]又如毛泽东1953年9月对梁漱溟从内容（毛的农村政策是造成

现在称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批判，胡乔木也“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mcccxxxix]诸如此类的辩护实在显得太过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日益兴起的新一轮个人崇拜宣传和造神造假运动，党史研究的禁区越设越多，控制越来越严，都是同胡乔木及其学派分不开的。这里再谈一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小事。1985年，为纪念张闻天八十五诞辰，“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经请示批准，筹备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为此，张闻天夫人刘英特约同在庐山受难的李锐写篇文章。李在初稿中除肯定张闻天发言的内容和精神外，还批评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无情打击和挖苦讽刺。[mcccxl]文章送给胡乔木审阅，胡看后找编辑组同志谈话，声泪俱下地大批李锐的文章是“攻击毛主席”。说他“一看之后，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一直做噩梦，颈椎麻木”。说李锐和王若水、黎澍是一伙的，“李锐比王若水还要王若水。”还批评编辑组的同志：“你们不能成为张闻天的信徒、张闻天派。不要把张闻天神化了，把他捧那么高，他是犯过错误的。”[mcccxli]这里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同打压和迫害张闻天三十多年的毛泽东可说是完全相通的。

总之，由于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受胡乔木的领导和影响，竭力适应领导上的政治需要，所以至今仍未走出个人崇拜的阴影。在乔木胡绳学派的主持和控制下，中共党史学要进一步成为一门科学，将是很困难的。

3，胡乔木治党史主要还在为当前政治服务和紧跟领导

（1）关于党史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问题

以党史学这样政治性强的学科，为当前政治服务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不只是胡乔木所承认的：“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杀”，[mcccxlii]而且还会把党史变成一块面团，捏来捏去和翻烧饼，一些历史人物，也是今天捧上天，明天踩入地。胡乔木在一篇题为《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这段历史》的谈话中强调“要好好写一写人物”，提到：“李大钊在党内有特殊地位，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写。”“周恩来对党的历史关系太重要了，要写。毛泽东也可在大革命失败后写。他在前边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mcccxliii]那为什么作为中共党史“奠基作”的《三十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只顾写毛泽东，连李大钊一次也不提。如果说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超出第一个《历史决议》，那么“文革”后思想提高了，认识改变了，为什么不能对先前这种不正常的作法进行点检讨和修改呢？还要把充满个人崇拜精神的《决议》定为研究党史的“准绳”，把《三十年》封为“奠基作”？胡乔木在另一个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mcccxliv]这就是说，实事求是和顾全大局不完全是一回事，有时为了顾全大局就不能实事求是了。因此，明知隐瞒事实、为尊者讳、设置禁区、伪造历史等制造和维护个人崇拜的做法违背实事求是，但为了顾全大局（也就是保持党领导体制的道统和法统），还得那么做。

更重要的是，“当前政治”又经常在变化，那么为其服务的党史也就不能不跟着变，写好的党史著作和作过的报告也只有不断增删修订，结果就使党史这门学科真的成了胡适说的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得过一阵换装一次。例如斯大林在世时，我们错误地跟着苏联反托派，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反对汉奸、托派、特务，就成为那时的重要政治。延安整风开始，王实味被

当作托派、国民党探子揪了出来，引发出一场遍及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不知造成多少托派冤案。解放后的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生日），曾一举逮捕约五百名大小托派，不少人冤死狱中，幸存者也坐牢近三十年才在苏联为托派平反后得到释放。但是我们党在对托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却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和明确表态，弄得很被动，对有关的问题和人物大多含糊其词，实在不行，就偷偷摸摸作点修改。例如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作《论鲁迅》的讲演，其中谈到，“托派为汉奸组织，直接拿日本特务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mcccxlv]此句因过于荒谬，重新发表时竟被后人不加说明地擅自删掉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建国后大的政治变化就更多了。单是毛泽东当政的二十六年就有：先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很快变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然后是反胡风、反右派、反“反冒进”、大跃进和公社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四清”整“走资派”、反修防修和备战，直到“文化大革命”。党史为这些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怎么个服务法？跟着这种政治跑怎能成为信史？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中的一项——“顶住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的提法能站得住吗？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不是已被胡乔木自己否定了？另外，把“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算作产生“文革”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太牵强了，照此写党史也只能是胡乔木说的“实事求是不够”。

（2）关于“惟上”还是“惟实”的问题

惟上和惟实不一定矛盾。领导意见不见得都不实事求是。所以“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提法并不十分准确。问题是，“上”和“实”之间发生矛盾时，党史学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党的规矩和胡乔木及其学派的以往做法，都是以唯上为主。延安整风时就是党史跟着毛泽东的思想走。他的想法变了，党史也就跟着变了。例如毛泽东一直是肯定四中全会的。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中间，他听了康生的发言后才一改过去的说法，认定四中全会起“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mcccxlvi]于是大家就随即跟上。刘少奇也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mcccxlvii]（但刘少奇、任弼时正是在这次会上被新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从此以后，胡乔木及其学派就一直按毛泽东的定调写党史，而且越走越远。对四中全会，毛泽东的结论只是说，由于“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mcccxlviii]而胡乔木却直到1990年还说，“四中全会是夺权。”[mcccxlix]这不等于说国际和中央在夺下级和自己的权。毛泽东发明和提出了“两大宗派”（但为留有余地还未将“宗派”写进《历史决议》），因此胡乔木在谈那段党史时就总是讲“两大宗派”、“王明中央”、“王明小组织”、“王明一派人”等。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党史（包括领导人传记和回忆录等）也就照猫画虎一路写了下来。

胡乔木及其学派的“只惟上”、“不惟实”，还可以举一个修改党史的有名案例，就是我在前边一篇笔记中所谈过的关于张闻天的总书记问题。胡乔木参加过延安上层整风，对1931年后的党史了如指掌，所以张闻天的悼词送审时他亲自加了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此后他在答复夏衍的信中引证《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费侃如的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mcccl]但是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从1955年苏联交来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部分档案中翻出一份陈云认为是他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里面提

到会后常委分工确定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对这一前后矛盾、改写党史的问题，[mcccli]胡乔木很快就改变态度，紧跟上去，还特意写信给陈云，表示经过他“考证”，明确了陈云传达的时间。[mccclii]从此，在乔木胡绳学派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史著作中张闻天的总书记就一律变成了“总负责”，否则难免受到严厉指责。例如上引胡乔木斥责李锐的谈话中就提到，“还说张闻天是总书记。中央文件都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总书记嘛！这不是混淆视听吗？”虽然不知道胡乔木说的中央文件何所指，肯定张闻天是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的《悼词》和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等算不算中央文件，反正李锐文章发表时已不得不将总书记改成了“负总责”。这也是“舆论一律”的一例。

修史上的“惟上”，也是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表现。延安整风以后的毛泽东，不但可以为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定性，而且可以进行修改和增删，使一些事件和人物或者变了样，或者消失了。不但毛泽东时代，党史只能按他的指示精神编撰，就是在毛泽东后，由于仍然要维护个人崇拜，所以从前的精神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一个转折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党史上就消失了，即使在平反昭雪后也还是受到轻视。有关事例很多，除前引胡乔木的指责外，自称“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的胡绳，也竟在纪念遵义会议的长文中，只字不提作“反报告”、起草决议、当选总书记的张闻天。无怪乎也是老延安的曾彦修批评说，“有学者型的大人物胡绳写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论文，全文未见张闻天三字，这叫什么实事求是呢？”[mcccliii]不但党史，而且个人崇拜的威力也影响到古代史。被批判了两千多年的秦始皇，自毛泽东为之翻案后，已不只是“千古一帝”，还被捧为“英雄”。

4，胡乔木与党史中的延安文风

延安整风中批判了党八股，却形成了一种延安文风，影响深远，至今不衰。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参与了这种文风的创建，自然也就把这种文风带到了党史中来。这里不准备也无能力谈论整个延安文风，只想就反映在党史材料中较突出的现象列举几件事例，中心意思仍如胡乔木所说，“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mcccliv]（其实岂止不够）。

一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这种事，前面已提过不少。例如学习党史时最令我困惑的是，遵义会议后怎么一个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硬是被说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三人军事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却要说是“毛泽东为首”？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有毛泽东出场，他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所有这些，我始终未看到根据，而且我相信永远也提不出什么根据。在继续维护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这种缺乏根据的史实论断还会不断制造出来。上述胡乔木所引费侃如1980年的文章就已批判过的毛泽东提议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之说，2002年经中央批准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又原封不动地加以重复。[mccclv]又如胡乔木断言“四中全会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mccclvi]其实，当时王明只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另为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连个候补常委都没捞到（被周恩来阻止，只让他做江苏省委书记）。官修党史一直肯定他控制中央领导达四年之久，却就是不讲事实，不提根据。

二是模糊史实，隐蔽真像。这类事例更多。如近几年要恢复北京古城墙，动员大家献旧砖，但绝口不提城墙是谁决定拆的。人们长期错怪彭真。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一个材料，得知原来是毛泽东。理由倒不是为便利交通，而是由于它系统治阶级为对付农民起义而修。在这种“革命精神”下，全国的大小城墙很快就所余无几了。又如1938年政治局的“三月会议”明明是长江局的集体建议，却被写成王明“以通知性的口吻，单独决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两天。”[mccclvii]没有专门研究党史和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只能信以为真。特别是我们多次提到的篡改党史的最大冤案之一的西路军问题，至今仍是隐瞒真象、故意搅混，曾引起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愤怒和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无情揭露和严厉批评。此事颇有代表性，不能不多说几句。

1937年3月，与两万多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同时，延安正在开会批判张国焘并连及许世友等一批四方面军将官。同年12月，毛泽东接见原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谈到，“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都一直不敢申辩，直到1982年才提出澄清，证明西路军始终都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但1991年7月在乔木、胡绳直接指导下写出的党史，仍有意含糊其词，因此激起李先念的愤怒，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为什么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命令西渡黄河的’……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将士吗？”在指出党研室既存有澄清问题的档案又可看到有关的公开材料后质问道，“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说，“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mccclviii]在李先念严正批评后，该书只好改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但总还要在后面一段加上一句不大连气的话：“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mccclix] 2002年新修订的党史第一卷仍沿此写法。这当然会使后人弄不清楚导致两万多红军被歼的主要责任，是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的“张国焘路线的破产”，还是徐向前等人后来描述的由于中央军委给的任务“飘忽不定”，战略指导和战术指挥失误。[mccclx]这还会使西路军问题成为党史上长期解不开的一个谜。

按上述精神和文风写出的党史，许多事都只能是真像不明、真假难分。

三是与时俱进，修改旧作。胡乔木被誉为中共一枝笔，起草和修改文件尤为特长。他也以此自诩。胡耀邦任总书记后，他就对耀邦说，“你是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mccclxi]无论这些话说得是深是浅，延安整风后许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文稿不少系他起草和整理修改确是事实。他起草的文件，自然得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领导意图，但也具有一定的个人因素。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前面谈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上。又如他起草的处理华国锋的决议就过分严峻，经胡耀邦改后才缓和了些。决定耀邦下台的1987年“第19号文件”，耀邦就认为对他是“羞辱”，

说，“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还说，“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李锐认为，这个要求带有遗嘱的性质，因此在1989年4月19日的中顾会支部会上正式提出要求转告中央。[mccclxii]由此可见，在中央文件中也是可以弄虚作假的。

毛泽东的文稿，不少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整理修改。他们的作法是，对毛的旧稿、发言提纲、谈话记录等，按毛的现在思想认识加以修改或铺叙成文，再送毛审定。有的文章还会发表一次改一次。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还未提及“特务文艺”和“日本党、汪精卫党……”之类，抢救运动后变成《整风文献》就加了这两段。等编《毛选》时大概觉得不雅，又删掉了。其它文字意思上的修改也还很多。胡乔木自己就说，“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改过。”[mccclxiii]只是有的改得多，有的改得少，有的干脆从新整理、近乎新作，目的都是要显示一贯正确。所以有些党史专家着文讲述“编毛”或“编邓”，这个“编字就用得非常恰当。而胡乔木等人确也能妙笔生花，不仅可以把一个只有简单提纲的谈话整理成一篇正规文章，既完全表达出毛泽东的意思，又保留毛的一定文风。但也难免体现他自己的因素，减弱毛的风格。例如《毛选》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有删改，但基本保持了原貌；放在前面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经过大砍大改重新整理，就有点面目半非。正如有的领导同志所说，乔木的短处是没做过实际工作，不懂经济（加上毛泽东也正好不懂经济），所以他整理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就不大内行了。例如一直被评价极高的《论十大关系》，前后整理过好多遍，历时二十多年，却既未起到实际作用（此后并未重视农轻和沿海，反而演变为反“反冒进”和大跃进），而且文章本身也缺乏定性定量分析和可行性措施。《毛选》第五卷本来也由胡乔木主持编辑，并且“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mccclxiv]但因中途出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李鑫夺了权，还批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结果歪打正着，李鑫主持编的《毛选》五卷倒还保存和公布了一批宝贵资料。如果仍由胡乔木主持，那么像批梁漱溟的那篇文章，就会或者不收，或者改得面目全非。现在的官方党史和《毛泽东传》等对此事采取“讳”的办法，就是证明。其它还有些材料如批刘少奇、杨尚昆，定胡风为反革命，甚至某些反右派文件，都可能被弃置。这也是后来对第五卷造成既不愿意承认（已绝版），又不敢否认的尴尬局面的原因。

胡乔木后，这种风气丝毫未减。他的门生们整理编辑《邓小平文选》就是依样画葫芦，而且删改得更快，见报不久的谈话，收进《文选》时就作了修改，使原来写文章引证过的人必须跟着改，才算合法（因国家规定引文根据新版）。这还不算，更不应该的是，不加说明地擅自删改已去世者的文稿。例如编辑出版毛泽东的文集，不仅按维护个人崇拜的原则，大加弃舍，还对一些收进的文稿进行删改。[mccclxv]而且不只对毛泽东，对其它人就更放手了。例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杨尚昆去世后三年用他的名义编出来的《回忆录》，不少事就和他生前说的不同，甚至相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修改发表过的文献极不以为然。至于删改已去世者的文章，更可能是世界少有。

四是永远正确，不留余地。延安整风创建了一条必须遵守的不成文规矩，就是批评者掌握着真理，不容被批评者辩解和反驳。胡乔木当时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教条和裤子》，就有这种味道。由于先使大家产生原罪

感，所以对来自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批评就只有检讨而无由答辩了。例如决定对某人进行批评或斗争时，先就预设了前提和结论，而且相信大家只会跟上来，不会有不同意见，更不会有反驳，否则他们必定犯“众怒”，遭围攻，还可能加重处分，甚至丢掉饭碗。萧军就曾因主张王实味有答辩权和持有一些不同意见而下乡种地当了老百姓，两年没吃公粮。另外，延安整风还开创了一个传统，就是把事后的想法说成是先前的认识，还理直气壮，使之成为定论。例如毛泽东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分化两个“宗派”，就属于这类。后来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论断越编越多，而且不断宣讲，不容深究，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突出的事例，也许要算多年后提出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这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开始讲，后来不断重复和强调的。胡乔木也就闻风而动，一改从前一切学苏联的主张，强调中国党和毛主席同共产国际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mcccclxvi]“文革”后正式出版的党史，又都据此给延安整风追加上了一条新的内容，即“破除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mcccclxvii]

五是权威自居，专横武断。乔木胡绳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论述、资料管理等的垄断，是在党中央决定和领导下进行的。单就此而论，以权威自居既是事实，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这样一来，就等于真理受到垄断，学术完全变成政治。我自学习党史以来，感触最深的可能就是这种垄断和武断。这在上述各篇笔记都曾谈到，例子也举过不少。因为这种权威的面孔和武断的定论，实在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所以这里还要举几个小例子。胡乔木说的，王明中央“跑到中央苏区，把原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统统拿下来”，[mcccclxviii]就属于极端的夸大和武断，因为他举不出拿下了哪些人，更不用说“统统”了。又如他还对白修德拍着胸脯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指毛泽东和江青）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毛江结婚近四十年，据我研究（头二十年多少有所了解，后头不到二十年有诸多材料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即相对而言，只有短时间不在一起，长时间反倒在一起。他又说，“总之，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非常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mcccclxix]照他这样说，江青怎么能进政治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始终没有像陈伯达、王关戚之流被拉下马来，还几乎当上了党的主席？胡乔木还断言，彭德怀住在医院里和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受摧残，藏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都不知道，甚至“周恩来也不知道”。[mcccclxx]这又是极端的武断。有些连毛泽东自己也是公开承认的。例如对贺龙，他就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mcccclxxi]周恩来也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因感内疚（是他把贺从西花厅送去西山的），连向贺龙遗骨鞠了七个躬。[mcccclxxii]胡乔木肯定毛泽东不知道，就不禁令人想起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类武断的例子确实俯拾可得。例如前一阵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是一般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针对有些传言“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写的”，于是断然下结论说：“这全属无稽之谈。”[mcccclxxiii]我虽初学党史，知之甚少，但我就知道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八大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还看到胡乔木说，“当时以毛主席名义发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不能说成全是毛主席的著作。大部分稿子是李富春写的。”[mcccclxxiv]我在

延安也还知道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个起草和讨论的班子，其中就有张闻天。这些大约起码不“全属无稽之谈”。另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收的许多外交礼仪性的文书，特别是宴会致词和贺电之类，多系外交部起草，毛极少修改，大多圈阅同意、采用原件。这类文书，我就经手不少。可见毛泽东署名的文稿不一定“他总是自己写”。

六是绝对化和箩筐主义。所谓绝对化，就是对人和事的看法和定论只凭一时一事，太不客观，被认为好的人就一切都好，错误隐掉或变成好的；被列为坏的人就生来坏，没做过好事，即使做过也属用心不良搞投机。林彪以前，曾经桂冠满头，到处奉承；出逃后，历史一下变黑，连打仗也不行了。还有些人，不算坏人，但又不宜宣传，就设法把他从历史上抹掉，以免影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胡耀邦在干群中威望极高，但就是不准编辑出版他的文集和别人写的纪念集。赵紫阳就更是谁提谁犯错误，弄得似乎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党史上的所谓箩筐主义，就是机械分类、各有箩筐、好坏分明。好人的箩筐，尽给放好的东西；坏人的箩筐，有坏的东西都往里面装，两者都是多多益善。例如康生，以前总还做过些好事，还颇有才华，但定为坏人后就一件好事都没做过了，即使不是他做的坏事也都扔到他的箩筐里。这类事例太多，人们也见过不少。只是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还在进一步发展。

以上列举体现在党史学中的延安文风，描述的不一定准确，也不能说主要内容就只有这些。其它如有些人提到延安文风的表现：自设逻辑，把话说死，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等，在党史研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最后必须强调说明的是，乔木胡绳学派的学者，并不都是如此。对党史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就不在少数，多数党史工作者也是在埋头苦干、做出了成绩。但总的说来，作为这个学派，始终没有跳出个人崇拜的羁绊，也不能不遵守历来规定的许多清规戒律，因此不会身由自主地采取历史主义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能在那个固定的圈子里转，这就必然要或多或少具有延安整风的精神和文风。

第二十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下）

四，党史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以上各篇笔记表明，延安整风创建的中共党史编纂学（简称党史）确实存在问题不少，最根本的正如胡乔木所说“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只是他说得轻巧了点，实际上就是违背“求真”这一史学根本原则。“文革”后，党史在乔木胡绳学派的主持下仍然保持了这种精神。根据个人体会，比较突出的问题，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一）个人崇拜精神贯彻始终

党史从延安整风起就一直贯穿着个人崇拜精神，至今不衰。这既是整风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树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神圣地位），也是后来保持党的领导的需要（维护政权的道统和法统，即意识形态的垄断和行使权力的合法性）。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个人崇拜自然会出现起伏和表现形态的不同，但本质不会改变，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过后，会出现表面上的隐蔽和形式上的收敛，但继之而来的又是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高潮。这几乎成了党史发展的一条规律。如前所述，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掀起个人崇拜的高潮，出现言必称毛，集会必喊万岁、唱《东方红》，请示报告必将主席与中央并列，并以主席为先等。此后由于遭到苏联的抵制和虑及夺取政权的需要，曾主动降调，如十年不提毛泽东思想，规定不祝寿、不以个人名字命名城市、企业等。及至斯大林逝世，特别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个人崇拜就掀起了更大的高潮，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斯大林。例如据统计，被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前后十六年用各种文字也只出了三百多版，印行4300余万册。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册，单是最后十年（1966-1976）就出了一千多版，印数37581万余册；《毛泽东语录》三千余版，印101060余万册。至于对毛泽东评价之高、崇拜的宗教化程度，更是斯大林所望尘莫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低潮，可以对毛泽东进行一些求真的研究和严肃的评论了，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得到坚决维护。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涌现出一个新形式下的新高潮，并在不断发展，看来还会持续相当时期。历史不会重复，这次高潮也有它的显着特点，就是形式和作法变了，但个人崇拜的实质不仅没有变，还做得更坚决、更深入和更普及了。这表现在：第一，舆论管制趋于严紧，对党史和毛泽东的研究受到更多限制，连《历史决议》中的有限批评，如被彻底否定的十年浩劫，实际上已不允许多说了，这意味着还在不断增设事实上的新禁区。第二，利用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大量编写和发行歌颂与拔高毛泽东的书籍、材料、文艺作品。而且作法翻新，增强了人情味和生活化，使群众更容易接受。像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友谊啦，毛如何关心爱护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啦，毛的生活是怎样地俭朴啦等等。电视连续剧《长征》和《延安颂》可算得个人崇拜的经典作。我同有些老延安议论，《延安颂》真可同歌颂斯大林的电影《攻克柏林》之类相媲美。第三，用更加隐晦、含糊的手法为毛泽东开脱罪责和增添光辉。不但上述李先念干预后改写的党史文稿仍然让人看不出毛泽东的错误，而且在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

还将开创共运史上（在斯大林的大清洗前）大规模自己人杀自己人先例的反“AB团”，隐约地归罪于“左”倾中央。先说起因是根据中央的多次指示，后归结为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指导有关。只点纠偏的项英、周恩来之名，却绝口不提当事人毛泽东及其所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等有关文献。[mccclxxv]其“为尊者讳”的用意，再明显不过。

个人崇拜阴影笼罩下的党史学，不可能“求真”，不会成为“实录”，也很难称为科学。

（二）重“实用”而轻“求真”

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强调史学求真实录的原则和经世致用的功能。古希腊的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求真。”（《论撰史》）当代中国的周谷城也说，“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mccclxxvi]求真是史学的生命和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挥它的实际效用和社会功能。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对史实进行掩盖和造假，那就会使史学丧失生命，给实践带来危害。我们的党史学却在这方面由于受到限制而有意（多数情况）无意（对少数人来说）地犯“曲笔”、“失真”的毛病，从而妨碍正确吸取经验教训，使不少错误（如历次肃反中的极左）一再重演。而且我们特别重视的“实用”和社会功能，除考虑到当前的实际利益，更多地还是为了维护党的伟大光荣及其领导人一贯正确的形象。采取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捂盖子，凡是不利的史实、资料就加以掩盖、保密甚至销毁，使你无法“求真”。例如，为了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并同抗战后的王明右倾投降路线进行斗争和划清界线，就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王明提的，毛表态虽委婉但不同意，因此对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和统一收缴与会者的笔记本就得加以绝密保藏，连笔记本主人都不得查阅。[mccclxxvii]与此有关，如1938年政治局三月会议记录、任弼时随后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书面报告和补充说明、中央和长江局的来往电报等，都长期保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因当时即公开印行，无法收回，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均未收，更未再出单行本）。有趣的是毛泽东后来召开的许多小范围重要会议，竟不让作记录，更不得录音（“文革”前杨尚昆即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被打成特务[mccclxxviii]），使得有关大事无法查清，可以由他事后作各种解释。“文革”十年，他留下的书面指示和谈话就不多。

在党史研究上遍设实际上的禁区，更是公开禁止“求真”，这是人们已习以为常了的。其它注重实用（所谓照顾影响，大局为重、保持稳定等）所采取的办法和涉及的方面还很多，前面也提到一些例证，无须再多讲。这都说明，不同程度且多为有意地违背“求真”原则，不够实事求是，本是中共党史学创建以来所具有的特色，而且还会和个人崇拜一起继续保持下去。

（三）党史研究中的“人治”

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党一直实行的是人治，也就是领导说了算的一元化

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治会渗透到各个方面，特别是“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mccclxxix]党史更不例外。延安整风中对一些重大党史问题的定性和重要人物的臧否，最后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写《历史决议》和后来写党史，也只能以此为准，不得超越。例如他说，“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mccclxxx]主要根据就是王明写了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于是一切党史读本一直到现在也还得遵循这一论断。[mccclxxxi]

毛泽东的看法如果发生变化，党史界也就跟着变化。如从延安整风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毛泽东主张一切“以俄为师”，而且重大问题随时向斯大林请示汇报，谁要说苏联、斯大林的怪话就可能以反苏反共反革命论处。后来斯大林受到揭发批判，中苏关系闹翻了，毛泽东随即改口说他对斯大林一直有气，连有的纪念文章都是“违心”之作，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一切党史书自然紧跟，如说毛泽东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胡乔木语），说延安整风破除了“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各种新版党史教本）等。毛泽东之后，党史仍然实行人治。毛曾把党史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党史书也就照此写去，我现在还保存有好几本。后来邓小平说不要滥用路线斗争，于是由中央指导编写出版的大型和简要的党史教科书上，路线和路线斗争就被一笔勾销了（只是共产国际定的“立三路线”名词还有时出现）。全党上下讲了几十年的毛泽东之前有六朝领袖，邓小平的三代核心说一出，又都不算了。至于历史人物的臧否褒贬，更得领袖说了算或拍板认可。如七大以来的所谓第一代领导集体排名，除开始一阵有所变化外，后来一直固定为毛刘周朱。但在刘少奇平反后，不知从何时起和根据什么，排名顺序一律变成了毛周刘朱，还印上了钞票。这一周升刘降的排名法，必然是最高领导意见，非党史工作者所敢随意变动，更不能号令全国执行。

对党史研究的人治，就使研究者不是先去求真（了解实际情况），而是先查说了算的领导言论；不是从史实研究得出结论，而是先有结论，然后找材料编理由进行说明和阐释。所以我们的党史研究总是先出了个什么“论”（论断、论点、理论），然后就是大批论述、发挥这个“论”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而不许有研究这个“论”能否站住和合不合乎实际的课题。这不但是所谓史从论出，而且势必导致党史研究的僵化，变成八股。

（四）关于三代核心说

既然提到了三代核心之论，这里就适当展开作点说明。因为这一说法，不但在党史研究上被奉为圭臬，而且遍及政治理论以至整个社会舆论。于是有关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二和第三代核心的研究和谈论，一直长盛不衰。不仅被当作建党理论、党史准绳，而且还是政治与组织原则。其实这一说法是很难成立的。第一，我们党在毛泽东以前，既无正确政治路线，又无组织领导核心，岂不成了乌合之众，那一段党史算什么？实际上即以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而论，其思想、学识与人格魅力，在党内外均享有崇高威望，即使公开批评他的瞿秋白对他也一直非常尊重。一贯连任五届的总书记（称呼前后不同，实际完全一样），在其任内怎么竟能不算核心？第二，如果说只有执行

正确路线的领袖才算核心，那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下半期直到“文革”，毛泽东已不能算，中共岂不是又长期无核心了？第三，核心的传宗接代从在实践中形成变为实际指定，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变成封建时代秦始皇设想的那样世代相传，事实上取消了党内民主，使选举变成形式了吗？总之，这种核心说，既不是建党理论，也并非组织原则，提出来只是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为使瞬息间产生的领袖有法统依据，要使大家特别是领导层认可和拥护，实行顺利的过渡和领导体制的长期稳定。因此，对于这一适应一时政治需要的说法，不宜作为党史中的一个原则大肆宣传，更不可把核心的代代相传制度化。

其次，对每代核心也不必都搞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和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说，当然会不断发展，但说全面发展和新阶段并安个新的名词却要慎重。因为马克思主义包罗范围较广，一些人涉猎有限（读的很少），怎么可能全面发展，还提高到新阶段！那只能靠许多人帮助编织、发挥、勉强系统化。连胡乔木也只得说，“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那样是妄自尊大。”[mcccclxxxii] 毛基本上没读过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更不用说魁奈、斯密、李嘉图了），怎么能谈得上对他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哲学也是如此。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勉强凑起来的体系，其实说不清楚，人们也不容易理解。而且一代领导要有一套学说，长此下去，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不也得搞一大串吗？

（五）党史中的公式化和片面性

关于党史研究中的绝对化和箩筐主义，前面已有说明和评论，这里就不再多说，而只谈以下几点。

一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创造和长期使用此公式的用意，就是不管定量、不谈实际，都要肯定成绩是主要，政策是正确的（也许执行上有缺点）。其实套用这一公式的，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更多的恐怕还是随大溜，做应付。例如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遭到惨重失败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信中先肯定路线正确、成绩伟大，张闻天在发言中更直接套用了缺点和成绩的关系，说“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mcccclxxxiii]结果还是引来灭顶之灾。后来干脆把说缺点称为刮“黑暗风”，致使用担架抬的饥饿病人还要对人说“吃得饱，吃得好”。这可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文革”后不大讲九个指头了，但实质未变，仍然是夸大成绩、掩盖错误。例如一本正式党史小册子，[mcccclxxxiv]也要大讲“文革”前的“十年建设成就”，写上十年修铁路八千公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但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生产和生态的大破坏、饿死几千万人，就不提了（可见刘少奇对毛泽东说的“人相食，要上书的！”[mcccclxxxv]并不准确，大小党史书就都不上），因为这也只是“一个指头”。而且在谈到原因时还两次不忘提到“苏联撕毁合同”（我亲自听过传达的周恩来说，三年困难与苏联撕毁合同关系不大）。正是这种片面性和公式化，使我们在官方党史著作中看到的不是中国人民经受过并将遗祸百年的十年灾难，而是（以标题为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纠‘左’的努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mcccclxxxvi]

二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的公式。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用形象量化的说法，是不科学也毫无道理的，对某些人用此公式，目的就是企图以功掩过，逃避历史批判。各人应功过分明，功是功，过是过，但不应功过相抵，因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从没听说有人提过托洛茨基的功大还是过大，林彪的功大还是过大。提的只是斯大林、毛泽东这些要保护的人。至于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的比喻，实际上只是数字游戏，并非科学计算。例如一个人歼灭了成十上百的敌人，挽救了自己的部队，立了许多功劳，但却错杀了自己一个同志，如在延安时的黄克功，你说他功大还是过大，应该怎么开，结果还不是经过审判被枪毙了，什么功劳也不算。[mccclxxxvii]因为任何功劳都不能说明杀人也可以功抵罪。同样，认为立有盖世功勋的人，用各种方法迫害大量无辜、整死无数好人，做了不少贻害子孙后代的事，仍然无损于他的光辉与正确，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

三是人皆“完人”。前面已经谈过党史对人物的处理就是“好人全面好，一辈子好；坏人完全坏，生来就坏”。这已成为多年的八股，其片面性和不够实事求是，人们已习以为常。这里要特别一谈的是现在盛行的为领导人立传和写回忆录的问题，写到谁，谁就是完人。连胡乔木也说，“现在写回忆文章，好像回忆谁，谁就都是正确的，形象非常高大。”[mccclxxxviii]但是这已成为必须遵守和越拔越高的潜在法则。比如胡乔木本人，将来必定会被写成极为高大的完人，至于人们都知道的缺点（更不用说一些人不大知道的，如他在儿子成为中央所抓大案要案中的责任等），只能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组织班子给领导人写的《回忆录》，也大多是以现在的观点编织过去的故事，夸张的成分多，检讨的成分少，遇到党和领袖的一些阴暗面也往往设法绕过，以维护党和领袖的伟大正确，以保持回忆者的“晚节”。而这种《回忆录》又被大量用于领导人传记，使虚假因素相互影响。胡绳提的“两头真”，[mccclxxxix]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他晚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距“求真”甚远。有些同志晚年思想已经很解放，谈了许多以往的真实情况，但要整理成文，他们仍顾虑多端，涉及对领导人某些缺陷的议论，则坚决要求删去。

（六）关于如何对待党史文献和资料的问题

有关研究整风资料问题，在前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一）》中已作过专门说明。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如何对待党史文献特别是两个《历史决议》的问题。

至今把两个决议定为研究党史不得逾越的准绳和规范，实际上就是对党史研究的禁锢，使之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原地踏步，不得有重大发展和突破，研究也就变成了复述原则和补充点零星细节，谈不上科学研究了。这当然不能说是合理的。因为作决议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需要和认识水平，不可能一锤定音，穷尽真理。必须根据历史和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及时更新观念，改变违背历史事实的过时看法。这应是唯物史观的起码要求。我们既然早已放弃把《联共党史》看作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等论断，按道理也不应再坚持以《联共党史》为榜样作出的《历史决议》。而且事实上，后来的官方党史也并没完全按这个路子写，许多提法也改变了。那为什么对民间研究却要强调必须以此为基础而不

得超越呢？这就使《历史决议》成了限制党史研究的工具，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给你戴上违反决议的帽子。

至于党章上规定的“执行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还可保留），那是指实现当前任务的决议，决不是指几十年前的决议，更不是指建党以来的历次决议。否则我们党就只能一直向后看和开倒车。这同样适用于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认识的提高，对于原来不实事求是的判断和结论必须推翻，还历史本来面目，并进行应有的检讨和批判，而且光明正大，不护短不掩过，也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修改。

其次，关于档案解密问题，前面也曾多次提到，这里还要作点补充。1987年9月5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就已规定要开放1949年以前的中共档案。八十年代也确实公布了一部分，可惜实在太少。根据1990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国家档案局1991年第28号文件对开放档案作了具体限定，即从档案形成之日起已满五十年但仍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可继续延期开放。这就为不按期解密设下了前提条件，可以由当权者自由决定。另外，对继续保密的还有些具体规定，包括对各级领导人的政治评价，“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做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以及其它共有数十项。这些限制虽然规定得很严，但也不一定能做到。例如经过延安整风，对王明等人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问题是应该算有结论了。那么有关的档案，如当时提到的洛川会议、1937年十二月会议、1938年三月会议和六中全会，以及长江局，任弼时、王稼祥、陈云等人向共产国际的汇报等档案为什么还不解密呢？难道为了领导人的形象和声誉，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就要永远密藏下去？那历史怎么研究？教训怎么吸取？设一门党史学科只是为了宣传党和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还有个问题值得在此稍为一提的，就是档案的保管和处理也体现了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而且这种体制大概还要长期保持下去。无怪乎中国的国史和党史分不清，一部党史可以涵盖近现代史的一切主要方面，国史变成了党史的一张皮。在党管一切和一元化体制下，国史有无存在的必要也都成问题了。

最后，连带再谈一点，就是关于在思想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对此，虽然党章中党员一章并无明确规定，但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曾多次提到并一再强调，当成重要的党内纪律。如果这是指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包括政改）开放、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在当前的情况下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指在一切思想和政治问题上都必须和中央以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径保持一致，那就很不合理，是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长时期同中央在思想政治上不保持一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没和中央保持一致，但都是作为典范载入史册的。在那时和中央保持一致反而是犯了错误。至于对中央领导人个人的言行更不能有此要求。例如“文革”后同副主席汪东兴保持一致，那就只能遵守“两个凡是”。因此，在思想政治问题上，共产党员应首先服从真理，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此不合的其它要求和限制，都可能成为压制民主自由和欲加之罪的借口。

五，高华、王若水在延安整风研究中的误区

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除主流党史学外，独立的研究成果我看到的很少，只读过高华、王若水、杨奎松等人的著作以及其它一些散篇文章。他们都能另辟蹊径，提出独到见解，给人以启迪。特别是高华和杨奎松，搜集和提供了大量材料，我就从中得益不小，也作了不少引证。我关于延安整风的学习笔记，主要是对主流学说提些不同意见。但最后也想对高、王两位的整风研究代表作提点个人看法，其实是班门弄斧。而且有些意见前面第七篇笔记中已经谈过。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来，主要是为了说明，多年来的宣传教育，连一些有独到见解的著名学者都难免受其影响，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依我的管见，他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出发，即认为延安整风主要是针对王明及其后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且取得了胜利，扫清了苏联影响，实现了独立自主。这说明他们不但没能完全从几十年来关于延安整风的主流宣传和相关资料中“独立”出来，而且带有相当成分的主观臆测。

而有关延安整风有意无意设的误区也着实不少，在谈过高、王二位的著作后还要谈其中两个主要的误区。

（一）关于高华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mcccxc

《红太阳》是在这样一个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命题下展开的：“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扫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mcccxci从这一结论出发，再加上情绪化，就使该书对延安整风的脉络描述难免差之毫厘。这里只举数例。

其一，《红太阳》主要讨论的是毛在党内斗争中“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大量资料都是用来为这一主题服务，使得许多标题也变成了臆测。谈论颇为详细的《从毛张联盟到毛刘联盟》，不少描述就是出于作者的想象。把1937年的12月会议，说成毛的“让步与等待”，把毛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说成毛的“两面策略”等，同样远离了当年的事实。至于《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与王明的公开交锋》以及什么“处境尴尬的军方”、“进退失据的周恩来”等标题，也多是虚张声势。延安整风是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包括多数高级干部在内的共同襄举，不能只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炉火纯青”的“政治谋略”。我认为，对延安整风也适用“一分为二”，mcccxcii其所以在行文中对积极方面着墨很少，是因为主流党史对此不但已经讲得过多，而且有许多掩盖和夸张不实之词，需要加以澄清，不是说延安整风就一无是处。

其二，把党的领导人大多看成了缺乏崇高信仰和广阔胸怀的争权夺利之徒。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就是勾心斗角；这个人是那个人的“班底”，那个人是这个人的对头；几乎看不到什么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同志情谊。书中说的：“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只有“愤恨”与“嫉恨”，对张闻

天“是出于本能的排斥”，“鄙夷”和“反感”；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都是毛的“内管家”；项英则是王明的唯一支持者，等等，[mcccxciii]都是些没有根据的主观判断。其实，那时的延安人，总的说来，从上到下都是抱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历史乐观精神的，即使受到委屈，也并无动摇。这是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了的。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曾陪同和接触过一批领导人如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看到他们确实是亲密合作、团结对敌，相处也很融洽。而那时正是才经过延安整风。

其三，没有完全根据事实臧否历史人物。以对张闻天的评论为例，多次强调张的地位观念，说他怕王明回国夺取他的总书记，“本能地”将路线错误和“自己的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还说张闻天在六中全会后“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mcccxciv]对张闻天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作者的评说。特别是发生在张闻天平反昭雪后，已有大量史料披露和对他已有公正评价的今天，这些论述着实令人吃惊。至于把任弼时说成是配合毛“借洋师助剿”王明的“高级说客”，[mcccxcv]同样是没什么根据的。须知，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中并不是随便紧跟毛泽东跑的人。胡耀邦就说，“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在延安时毛为劝说他参加清算“左”倾路线“写有十封信”，任也“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mcccxcvi]单从这两个例子已可看到一斑。

（二）王若水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

王若水是我崇敬的哲学家。他对延安整风的论着我只看到两篇，一是前面评论过的《整风代替了启蒙》，二是《新发现的毛泽东》的头两章。单就这两篇而言，对延安整风，作者在许多问题上还限于人云亦云（主要是长期以来的官方宣传）加上个人感想的水平。这里只就新出的这本遗作举几个例子。

对王明的估计大多不合乎史实。如说他在四中全会爬上了中共的“最高宝座”；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共，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宠儿”；说彭德怀和项英都听命于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说毛泽东编《六大以来》是针对王明的小册子[mcccxcvii]等等，都并非什么“新发现”，主要还是抄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cccxcviii]除高华、王若水两位外，对王明的作用和影响作过高估计的颇为普遍，下面还须专门一谈。

王若水其它违背史实的判断还很多。如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已不太管事”，就恰恰弄颠倒了。事实是，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已被博古架空，没什么事可管，所以才有可能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的“三人团”，而当选总书记后反而真管起全党的事了。这是我在第一篇笔记中就已谈过的。又如说，“抢救运动的刹车，应当归功于周恩来。”[mcccxcix]这表明，王若水太不了解延安抢救运动了。如果只凭温济泽和师哲等人的“回忆”，那抢救就完全是康生搞起来，经毛泽东发现并制止的。实际上，抢救期间周恩来处境已很困难，对运动只能旁观，他对干部所写的证明都被置之不理（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穆欣）。在抢救中处于旁观地位、实际上失去发言权的还有张闻天。他一

开始就向康生反映，碰了钉子，后来实在看不下去才找任弼时谈。对延安抢救真正起刹车作用的首推前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给毛泽东的信，其次应归功于任弼时，再次是刘少奇。实际情况是，运动也搞不下去了，只好转入内部甄别，停止群众运动。

由于许多事实没弄清，王若水所做出的一些判断也不可能准确。例如他说，“毛的主要策略，就是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同时尽可能把周恩来牵涉进去。”这也缺乏根据。因为直到1943年上半年，整风都并未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对周恩来更不是尽可能牵涉进去，他本来就是整风的一个重要目标。说毛泽东在七大讲儿子胜过老子，“后来居上”“这句话的时候，恐怕想的是斯大林”。[mcd]也纯属主观臆测，实际上当时正处在对斯大林崇拜的高潮中。其它例证就不用多举了。

（三）在王明问题上的误区

中共党史上人为制造的误区很多，长期的公开宣传和真情保密，使许多假说已得到人们普遍承认。例如包括高华、王若水在内，都相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等。有些问题前面已作了些辨析，这里只就高、王二位在延安整风研究中陷入的两大误区：对王明的看法和中共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谈点个人意见。先谈王明。

主流党史学为了强调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所以就要把王明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无限的拔高和夸张。高、王两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也跟着进入误区。例如《红太阳》中说王明“四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天才”，“公认为活马列主义”，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等等，就多属虚构。1938年，王明在延安的时间不多，不可能到处报告和写文章。六中全会后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他的活动已比其它一些领导人要少，更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我当时作为抗大的学员和随后的理论教学人员，就从无《红太阳》描述的这种感觉。近年同几十位老延安一再谈起，都认为王明是建国后硬被作为反面教员吹起来的。但影响所及，连舒芜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说，“老实说，在这（指《论持久战》出版）之前，王明（陈绍禹）对知识界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mcdi]这更是天方夜谭了。延安的知识界绝不会把王明放在毛泽东之上，多数人还是1938年后才知道王明这个名字的。就是国统区的知识界，从郭沫若、茅盾等著名文人到多数救亡知青，也不会对两人的情况有如舒芜这样的了解。例如柳亚子早在1929年就已把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为中国两列宁。[mcdii]

关于王明，还可再连带谈两个问题。

一是不能说王明1931年后一直执行“左”倾冒险路线，抗战初期又完全执行右倾投降路线。实际上，随着共产国际策略的逐渐改变，王明在批评博古的某些“左”倾政策，后来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等问题上，都走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前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十二月会议专门通过一项肯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决定是真诚的，决非虚应故事。因此，国际派王明、康生、陈云等回来，确实是为了帮助中共，而不是要改换领导。王明等人回来传达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共同领导”等策略口号，也是国际精神，并为全党接受。我们当时唱的歌子中就不但

有："国共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分裂中国就灭亡"，而且还有："同志们，请记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仍然是这个精神。至于说"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当然不对，但那是假设问题。同样，反过来说成是经过我们党，恐怕也不行。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论新阶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所以要"号召全国，全体一致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mcdiii]其它与此相反的事后说法，恐怕不能算数。如果闭着眼睛讲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但不策略，也不合乎事实。否则抗日战争就不是起于卢沟桥事变，而应始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了。

二是关于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并非一些人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乌眼鸡。两人在延安之前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个人恩怨。《红太阳》中说的"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那是把任弼时三十年代初的话安到了1928年王明的头上。[mcdiv]李维汉就说，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没听王明说过毛主席搞右倾机会主义。[mcdv]相反，正像《红太阳》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描述的，[mcdvi]王明对毛泽东倒是大力宣传和尽量支持的。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他对王明回国的热烈欢迎，据当时在场并和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的一些老同志讲，确实是真诚的。后来两人在政策和组织上（王明和长江局不尊重中央）发生分歧，毛泽东当然生气，但对王明仍持争取和谅解态度。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不少人批评王明，毛泽东还为他讲了情，要大家"原谅之"。政策上的分歧也不是王明一个人的事，在他回国前的洛川会议上就已发生。王明后来只是更加深了这些分歧。在和长江局的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可能甚于对王明。何况六中全会上王明即已明确表态尊毛泽东为领袖，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第一个出来号召"学习毛泽东"和封毛为"伟大的理论家"。作为整风讯号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人当时就都知道是针对张闻天的，并不是王若水说的，当着面"剥夺王明的最后资本即'言必称希腊'"。[mcdvii]直到1943年政治局九月会议第一阶段，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都没有以王明为主要对象，只着重批他抗战初期的右倾。导致王明问题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是他不但不检讨，反而乘机（季米特洛夫1941年10月初对中共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反攻倒算，批判毛泽东的政策太左，还进行一些私下活动。这就惹怒了毛泽东，也招致大家的公愤，于是王明就终于升为整风的主要对象。后来他虽然也作点检讨，希图蒙混过去，无奈毛泽东、刘少奇等却抓住不放，直到建国后的三中全会还做出要他检讨交代的专门决定。他可能觉得实在不好混，就以治病为由去苏联常住了。

（四）在延安整风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系上的误区

毛泽东说的延安整风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是批判他们的教条主义和乱干涉的错误。其实这如同他常说的遵义会议上不提政治问题是他的三打祝家庄之计、有关斯大林的两篇文章是违心之作、长期不提王明路线是等待大家觉悟等一样，也是事后的话，并不是当时实际情况。乔木胡绳学派按

此路数写党史，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高华、王若水两位由于不知实情，比他们走得更远。高华说，延安整风是为肃清斯大林的代理人，也的确扫清了对苏联多年崇拜的情结。[mcdviii]王若水也竟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通过王明及其小宗派控制中共，国际解散后王明的后台只剩下了斯大林。[mcdix]这实在都是些不合事实的话。关于延安整风中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和反对，而且还被用作整风的主要武器，这是前面已多次讲过的。事实和高华说的正好相反。经过整风，熟读了《联共党史》，人们大为增加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和对苏联的景仰，把学苏联定为奋斗目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绝非普遍喊的空话。至于王若水所说，就更加离谱了。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历来就直接受其控制。连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也是国际指定的（王稼祥的传达报告等于任命书）。这是毛泽东也承认的。他一再说六中全会是个关键，没有六中全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指此而言。说王明的后台有两个，更加不通。怎么能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分开呢？而且也很难说斯大林和国际是王明的后台。因为他们支持的是毛泽东，且对王明的印象不好，认为王明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斯大林早先还怀疑他是个“挑衅者”[mcdx]）、缺乏工作经验等，并告诫他不要争权。这是整风开始时任弼时、王稼祥就在会上揭发了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即从后来对王明的批判看，毛也没有完全投鼠忌器，像一些人说的那样顾虑王明和国际的关系。当年的实际情况和主观认识，同人们多年后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把整风说成是整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摆脱他们的束缚（党史书上定义为破除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也被列为形成毛泽东思想重点之一的独立自主的表现），不但与整风的实际不相符合，而且也无法解释整风后十多年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仍坚持经常向斯大林和苏共作详细的汇报与具体的请示。这只要看一下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就会明白。[mcdxi]不仅如此，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1947年和1948年，毛泽东曾一再要求秘密访苏，单1948年4—9月，就有五次电报恳求访苏，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当面汇报请示，但均被斯大林婉拒。直到1948年9月还提出，“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共中央和大老板（斯大林）亲自汇报……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mcdxii]最后导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不仅中国党要向苏共和斯大林请示，而且斯大林的指示（对方称“建议”）我们也一定执行。例如成立政府、抗美援朝、制定宪法、出版《毛选》等，就都是在斯大林建议下实现的，其中建国和制宪还经过再三督催。1949年6月刘少奇率团访苏，7月4日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一份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mcdxiii]“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mcdxiv]

　　在这之前几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后人把这只归结为新中国的一项外交政策，恐怕多出于误会。从深层次看，“一边倒”实际上锁定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只要读完全文，特别是联系此后

多年的实践，就会理解。文章提的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倒向苏联。后面还特别点出，“他们（指苏联共产党人）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mcdxv]建国后，从经济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经请示并得到斯大林同意后实行的，开始的五年计划制订就更典型了）、政治体制（人民代表会制实为苏维埃的中国化，更不用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了）到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特别是宣传教育，如院系调整等），几乎完全是照搬苏联模式。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并且很快实现了“全盘苏化”。在那种情况下，谁敢说不满和反对苏联、斯大林的话，就可能被打成反苏反共反革命。我在解放战争中的警卫员赵守先（现为辽阳县离休干部），因为说日本投降后苏联在东北表现的“坏话”，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不仅政治上如此，教育科研也得以苏为师。1955年胡先骕由于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李森科（斯大林欣赏的“生物学家”），结果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未卖出的著作全部销毁。[mcdxvi]外交上就更不用说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国际共运中率先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骂英国首相张伯伦是全世界的反动头子；后来又支持苏日中立条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不解与不满。建国后在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上，仍跟着苏联翻烧饼。（但在二战期间，我们却是非常赞扬铁托的。据友人也是老延安的曾彦修考证，“解放区”、“解放军”就是从南斯拉夫学来的。[mcdxvii]）苏联先说南变修了，我们不但跟着猛烈批判，还对它的承认新中国长期不予置理。后来赫鲁晓夫说南共没变修，于是中南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成为中国的兄弟国家。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一度恶化，我们则走得更远，直到1963年9月26日还发表了“九评”中的“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大骂铁托叛徒集团。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南关系又言归于好。这已是后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主流党史学，说延安整风是摆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批判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王明的，经过整风中共已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显然是个误区。而高华和王若水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也显然陷进了这个误区，由此出发观察问题和做出判断，只能误入歧途。他们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也确实存在着不足，这里只是随便点到，深谈太费篇幅。我的这些议论也是一家言，还求作者和读者指正。

六，漫谈“信史”和“良史”

一个对史学完全外行的人，也竟然谈起信史和良史，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滑稽。其实只是想借这个题目对我的“党史学习笔记”做个小结。本来，我在学习过程中也还发现其它许多问题并有个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但由于自己不善于写作，讨论问题太罗嗦，一提起就收不住，回头一看，字数已太多，所以决定就此打住。如果天假以年，以后还可继续写。

以“信史”与“良史”为题告一段落，倒不是故意冒充内行，实因深有所感，总想一吐为快、表而出之。

（一）现行主流党史很难算得上信史

信史，顾名思义，就是可信的史书。《词源》上称之为“纪事翔实的史籍”，并举《春秋》为例。总之，只有不虚美、不隐恶、不编造和追求实录的史传，才称得上信史。这些，也就是成为我们六十多年口头禅的实事求是。以此为标准，衡量延安整风创立的党史学和按此精神的所有著述，恐怕都不能贸然称为信史。我的《学习笔记》，就是为此而发，所举例证也已不少。为了进一步揭示现行党史与信史的差距，再列举以下几项。

1，很多历史事件稀里糊涂，得不到澄清。例如：第一，睡在伟大领袖身边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江青竟然是个反革命，这个蜕变过程就说不清。既然知道她曾叛变，为什么还大为重用，为她创造篡党条件？滴水洞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党史也不为之解惑。第二，关于新四军“项袁错误”的决定，既然至今还坚持是对的，[mcdxviii]那为什么不公布来往电报等有关文件？第三，1946年东北局一场严重争论，双方谁对谁错以及毛泽东的责任，似乎只能和稀泥。第四，讲了六十年的“王明路线”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路线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却只有大帽子，始终不能具体化。究竟何时何地“无情打击”了谁，总应列举几个著名人物出来。延安整风以来又“治病救人”救了哪些？总不能说指的是大批被抢救成“特务”的知青吧！如果是中央领导人，那也只“救”下了一个周恩来。现在还继续讲这些空话有何意义？

2，隐、讳了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毛泽东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内部交往几乎全被从史书中抹去，包括大量重要来往电报（如我方的请示汇报和对方的批评指示）、多次接见苏方代表弗拉季米洛夫等的长谈等。事实证明，抗战期间，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党内建设等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倒多半正确，纠正和制止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估计（如蒋必降）和冒险方针（如皖南事变前后的准备国共分裂，打到国统区去，延安整风的偏激过火和抢救运动等）。对这些，现在不但不提，却要归功于己。[mcdxix]又如，我们历来对被俘和失散的革命军人（西路军、援朝志愿军等）的歧视和虐待，不作自我批评（更不能追究责任），反而长期隐瞒，以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蒙冤。第三，特别是对自己制造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几千万人，一直隐瞒不讲。

3，大量冤假错案在党史上没有得到平反和公正对待。远的先不提，“文革”中，在毛泽东、林彪支持下由周恩来发动和领导的抓“五一六”运动，涉及数千万人，逼死致残的成千上万，后来竟不了了之。不少被抓因不承认而倒

霉者至今受影响，乱说一气的反而没事甚至成为积极分子。这一大案，一直没有得到平反。再如，正式党史认为，反右派“要肯定”，说当时确有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这恐怕属于例行的说法：“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个别人讲了些反共的话，甚至有某种串联，那也是常有的事，何用发动一次制造大量冤案且影响很坏的群众运动。如果说，“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联盟’。”[mcdxx]那实际上就更不存在什么“高饶联盟”，由于太缺乏证据，当时周恩来传达时就用了“合而谋也罢，不合而谋也罢”的话。我那时有条件对此案有较多的了解，一直认为饶漱石充其量只是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问题。即使邓小平、陈毅的审查报告都准确无误，对他从软禁到坐牢也是没道理、更不合法的。邓小平后来说“高饶问题没有错”，也只谈了高岗，未涉及饶漱石。[mcdxxi]以现在处理干部的标准看，饶可能连开除党籍的处分都不够。这个案件难道不应重新审查？还有，建国后公安部门领导人在毛泽东指示和支持下，历次肃反中肃错的人当以百万计，恐怕也都只能冤沉海底。党史对诸如此类的事也是一概不提。

4，违背史实，是非不明。建国后有三次大冒险，妨碍和破坏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从基本的农业社会紧急向社会主义过渡，竟被党史称之为取得历史性的辉煌胜利。[mcdxxii]对因毛泽东坚持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公社化、总路线“三面红旗”，被说成“纠‘左’的努力”。“纠”出的三年困难，被赞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mcdxxiii]至于“文化大革命”，虽不能不提到毛泽东的责任，但重点在维护他的地位和强调他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和对他们的批判。其它这类混淆是非、推卸责任的事还不少，也表现在对外关系上。

（二）为什么党史在许多问题上做不到实事求是

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崇拜的体制（表现为专制和蒙昧并存），妨碍和禁止史学“求真”。其表现试列举以下几点。

1，“为尊者讳”。这是不言自明的，上面已举过不少例子。这个“讳”，不只是对领导者的缺陷和短处要隐瞒、保密，而且还要造假。口说“人无完人”，还是要从上到下塑造大批“完人”。

2，反对和禁止公开性与透明度。不但实行从上到下的人事保密，而且对形势和工作也必须隐恶扬善，宣传太平盛世、莺歌燕舞。我们历来就把天灾人祸和群众苦难作为国家机密，不允许统一发布新闻外的据实报道。因为在延安整风中就提倡主要歌颂光明，批判暴露黑暗的主张，认为缺点错误讲多了就会亡党亡国。所以还主张“内外有别”，外面来了代表团考察或访问，就得用一定的弄虚作假来应付。这个传统就一直传了下来并得到“发扬光大”。结果只能是群众不了解真情，长期受蒙蔽，而且形成内外两套。这既妨碍启蒙，也无法实行民主（前引列宁的话，“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

3，言行不一，做的和说的两样。我们在延安整风时就一直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mcdxxiv]也强调“奖励自由研究”（《解放日报》标题）和“科学无禁区”。然而不仅当时，六十年来什么时候实现过？从延安时的王实味、丁玲和我等犯“自由主义”错误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建国后的胡风、右派、右倾、“文革”中众多被打倒者、近年来的“自由化”分子等，以言获罪者决不下数千万，为之献身者也当以百万计。被定为

毛泽东思想重要原则的“实事求是”，一提出来就被自己发动的抢救运动给破坏了。建国后的一贯“左”倾，也很难和实事求是挂上钩。至于作为我们思想路线另一句的“解放思想”，恐怕也同样很难做到。以党史研究来说，怎么可能从两个《历史决议》、“和领导保持一致”中“解放”出来？说“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有一家，即便在这一家里能争鸣得起来吗？还不是家长说了算。

4，党史中既然实行“人治”，就只能领导意见第一，求真务实其次。中国有个隔代修史的传统，本是为了逃脱当代政治的干扰，但仍避免不了新王朝的干预。例如清朝修明史，就只能贯彻康熙宣扬纲常名教、巩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皇帝还亲自过问。这自然难以做到客观真实。党史中的政治干预和人治，更加明显。一会儿说六届四中全会是篡权，一会儿又说是合法的，致使中共党史至今两种说法并存，表现自相矛盾。有些问题大家讲了许多年或经史学家皓首穷究，但领导者只要“一锤敲定”（陈云语），就给全盘推翻了。这类例子可说不胜枚举。只有人治对党史研究松绑，才能谈得上求真和实录。现在盛行的各种党史“实录”（取名不知是否受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的影响），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有些干脆是拼凑和抄录，实在不足为训。

（三）也谈“良史”

1，中国有良史传统。良史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至于何谓良史，说法很多。写《史通》的刘知几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可见良史就是能写出信史的学者。唐诗说，“莫负美名书信史，清风扫地更无遗。”对于我们研究和编纂党史的学者来说，当然应该继承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把中共党史写成信史。这不但要求研究工作者有齐太史和晋董狐的精神，做到毛主席说的“五不怕”，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比较宽松的环境。例如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为良史，汉武帝审查不严也有很大关系。否则设一个审读小组，送审一章（一大堆竹板）给推倒和焚毁一章，甚至来个秦始皇的“以古讽今者族”，哪里还有《史记》？还谈什么“藏之名山”？古之不少皇帝，要看有关他日常活动言谈的记载如《起居注》，遭史官拒绝，他们也就算了。这在连一些重要会议记录都不准做的毛泽东时代，有可能吗？

2，在现行体制下很难成为良史。中国的党史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机关干部（史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有关决议和坚决执行领导上过去和现在的指示，这就失去独立思考的条件，哪儿还谈得上秉笔直书？而且所有重要档案资料都由专门机关垄断，想独立研究又只能更多依靠专业机关和专业人员写出的成果，以及许多用现代认识组织人编写当年故事的各种领导人《传记》和《回忆录》，这又怎么能轻易做到求真务实？前面谈到的高华、王若水陷入延安整风研究的误区，没有逃出这批第二手材料的影响当是个重要原因。求真务实和秉笔直书的条件既然受到最严格的限制，良史的传统在党史研究中就很难得到继承了。因此就整体而言，乔木胡绳学派是不能称为良史的。在这个学派中，确有一些具有渊博知识和才华出众的学者。他们有“史才”、“史学”，但不能发扬“史识”，做不到“实录直书”。至今我看到的可称“实录直书”的党史著作，实在寥若晨星。有的作者本意在澄清一些事实，批驳那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但也得稍为用点“曲笔”，说成“实际情况远比后来的解

释要复杂得多”。连古代史都要舆论一律，和领导保持一致（著名史学家尚钺因在封建社会的起点上持魏晋说，不同于毛泽东的“自周秦以来”，就被批斗了二十年），在党史上更容不得有不同的声音了。

3，对党史工作者不能一概而论。党史工作者不能成为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良史，有不同的情况。一些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也不够“实事求是”，但不完全错，因认为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个人崇拜或维持专制统治。例如我们初到东北就有这种经历。1945年离开延安到东北工作，亲眼看到苏联搬走机器和红军的纪律败坏，但我们还是真心实意地做中苏友好工作，想出各种理由给群众作解释。然而情况不同的是，有些写史传的人，他们并不是着眼于革命的需要和还历史本来面目，也不是不了解历史真相和传主的阴暗面，而只是为了维护所写领导者的形象和威信，仍自觉地隐恶扬善，甚至弄虚作假。也许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合乎党的利益，其实效果往往相反。例如我们看到许多领导人的传记，基本上都是政治化或学术化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只有工作，没有生活，个个都堪称全面模范。也看不到他们的家庭，非常僵化，不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子弟，如为烈士或普通劳动者，还会大书特书；如果是靠传主的扶持和影响而当了大官或大款，甚至成了罪犯，传记上肯定避而不提。这样的史传作者，怎么能称得上良史？对大部分史学工作者来说，只是随大溜，按时上班，照章办事，从事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对于事情的真相，有些清楚，有些也许不清楚，但并不深究，不想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这是做工作，有别于做学问。还有不少人，确有自己的看法，也明知历史的真假，但是在官不由己，不能不按官定的路数编撰史传，而保留自己的看法，准备一旦有条件时再说。不过也有些人到后来已近乎大彻大悟，谈了许多历史真相和新的认识，却不愿意落笔成文，即使别人帮他整理出来，他也会删掉不发，原因就是爱惜羽毛，要保护他一生完整的形象。情况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决不可一概而论。何况我了解的情况不多，还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使自认良史者扼腕。

（四）为党史进一步成为信史而努力

要使党史有可能成为信史，有两个客观条件是需要的。一是实现列宁提出的公开性，让党的活动和各级领导人的情况为党内外群众所了解，党的历史档案也在事过后就公布，使研究党史的人有条件去求真务实。本来重要的国防、外交、经济、科技等机密是属于国家的。在民主制度、党政分开的情况下，政党也不会拥有多少机密。除非党于秘密环境，那时入党宣誓“保守党的秘密”，也还不是国家机密。像我们这样，红军时代和延安时期的党史资料，都一直作为绝密材料保存，恐怕不能说是正常的。二是做到马克思强调的为一切自由基础的言论自由，解除对党史研究和解释权的垄断，以便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中接近和求得真理。而这两个前提条件，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必然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要出信史，单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因素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建专制时代也会出良史和写出信史。可见，史学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学术操守，也是极为重要的。当代的许多学者也常讲到，要对得住自己的

良心或者要有史学良知，即使不能说真话，但也决不说假话。这些看来简单，但完全做到也很不容易。我自己在过去的两次政治运动（延安抢救和1959年反右倾）中，就没能守住这道防线，成为终生之耻。

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进步，无论经过多少困难和曲折，我们的党史终能成为信史，许多问题也终会大白于天下。至于迄今的党史工作者有无良史，哪些人算得上良史，哪些人不能算，哪些人属于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哪些人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让以后的研究工作者去评说吧！相信是一定会有历史结论的。

作为一个初学党史的耄耋老人，这一切是看不到了，但我有这个信心，而且还要继续学习，按周恩来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只是暂告一段落，先奉献一批笔记，向方家和读者请教。

*原发表于《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注释

i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ii《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ii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iv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面》，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v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页。
vi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71页。
vii《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viii《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ix《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长征大事典》（上卷）：《长征史概述》和《第一方面军长征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x《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9，24页。
x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9，24页。
xii《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xiii《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xiv《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xv此系原件标题，日期署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义会议文献》摘录发表时改称《延安整风笔记》，此后即被通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xvi关于总书记问题拟另外讨论。这里先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第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恐无问题，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张自己在《反省笔记》中也多次提到让出总书记的问题，连刘英1937年去苏联治病也是用总书记夫人身份；第二，张任总书记系遵义会议上大家的推举，因他一再谦辞，才拖延到后来行军路上交接，这与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助手不同；第三，六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当系事实，因为会后不久就不断以书记处名义发指示和向国际报告，长征中和到陕北后仍然如此。因此，陈云多年后说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中央都没设书记处或常委显然是记忆的错误。
xvii转引自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92页。
xviii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xix赵蔚：《共产国际与遵义会议》，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xx《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xx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页。其中讲到“为首”问题时说，“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就开不成会……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xxii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邓力群纪念张闻天文章上的批语。

xxiii《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xxiv《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xxv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均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几次访问刘英的谈话录音和1999年3月2日访问郭洪涛的谈话。
xxv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81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8-539页。
xxvii《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0-12页。
xxviii《周恩来传》（一），第315页。
xxix《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45，46，50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3—494页。
xx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xxx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5页；《张闻天文集》（一）。
xxxi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5页，《张闻天文集》（一）。
xxxii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31页，《张闻天文集》（一）。
xxxiv《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会议详情可参阅：《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6-290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3-494，499页；张兆宪：《张闻天对瓦窑堡会议的贡献》，程中原：《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分别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三，第二集。
xxxv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
xxxvi以上有关处理西安事变的情况，分别见《毛泽东传》和《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有关章节，以及《张闻天研究文集》中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等。
xxxvii转引自《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170页。
xxxviii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xxxix《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96—97页。
xl《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36—138页。
xli《刘少奇传》（上），第229页。
xlii几次访问刘英的谈话记录，如1999年3月4日，2000年5月16日、18日等。
xlii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37—50，58，73—74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79，383页。
xliv《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81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上）（见第383—384页）的写法是：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向中共中央提出……决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又说，“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
xlv《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19，125页。
xlvi《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xlvii张培森1998年3月9日给何方的信。
xlviii《遵义会议文献》，第119页。
xlix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l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l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44页。
l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4页。
li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4页。
liv《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
lv 1999年3月2日访问郭洪涛的谈话。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见372页）也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详见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
lvi《周恩来传》（一），第370页。
lvi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47页。
lvi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8页。
lix《张闻天在1938—1938（年谱）》，第61页。

lx《毛泽东的人际世界》（上），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lxi 1999—2000年多次访问刘英的谈话。
lxii 1999—2000年多次访问刘英的谈话。
lxiii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lxiv以上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lxv《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lxvi《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94年第2版，第24页。
lxvii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lxviii转引自《党史博览》，1999年第2期，第7页。
lxix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lxx孙彦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载《〈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页。
lxxi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lxxii钱江：《张闻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纵横》2001年第2期。本文作者同刘英就此曾有多次谈话。
lxxiii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一文件是否为陈云向红军的“传达提纲”，疑点很多，还很值得讨论。
lxxiv《张闻天选集》，第37页。
lxxv《遵义会议文献》，第119页。
lxxv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lxxvii《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lxx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lxxix《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41页。
lxxx《遵义会议文献》，第43页。
lxxxi《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lxxxii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lxxxiii《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
lxxxiv《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lxxxv陈云1977年8月23日的谈话，见《遵义会议文献》，第130页。
lxxxvi例如《长征大事典》的综述，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9页。
lxxxvii《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lxxxviii张培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13页。
lxxxix《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载本文的题解，1991年版，第621页。本文注明写作时间为1939年12月，而1938和1939年（以前情况不了解）在抗大学习时听讲的课程如《中国问题》或《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就已包括了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另见《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24页。
xc《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xci《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4页。在编《陈云文选》时，我们（张闻天文集编辑组）曾依据档案提过意见，结果仍决定收入，只是加了个“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注。
xcii见2000年5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李铁映在《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xciii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2-169页。
xciv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6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36页。
xcv　1941年2月23日为该文的铅印出版写的著者识，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585页。
xcvi见该书第67—68页。
xcvii载《胡乔木文集》第三卷，382—388页。
xcviii《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称《遵义会议决议》），见《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xcix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风会上的发言。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c 1943年12月16日《反省笔记》。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ci《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cii《遵义会议文献》，第120页。
c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页。
c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6页。
c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页。
c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3页。
c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
cviii《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198页。
cix《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cx《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cx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4页。
cxii详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初拟稿”（十一），《党的历史决议》。
cxiii详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初拟稿”（十一），《党的历史决议》，第47-48页。
cxiv《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13-3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cxv《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cxvi《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按：富田事变系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古柏去红20军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的事变。毛泽东和总前委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并由毛亲拟讨逆通告；项英和中央局认为“是由党内无原则纠纷演进而成”，因此采取开会解决的办法。但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及其派赴中央苏区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却支持总前委，责备中央局，并以毛泽东取代了项英的中央局书记职务。富田事变的处理结果是，20军副排以上干部和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委负责干部几乎全被处决，其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AB团，20军也不再存在。
cx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
cxviii《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89-96页。
cx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4页。
cxx以上材料见：陈铁健：《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禁区—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北京日报》2002年12月2日（2003年1月6日《报刊文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四章《血战河西走廊》，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93页；《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13页；李樵：《徐以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版1990年版，第222-240页。
cxxi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和2002年的修订本；《毛泽东传》等。
cxxii《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198页。
cxxiii《历史的回顾》，第372页。
cxxiv《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版，第240页。
cxxv《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241页。
cxxvi《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里的引证，以及此后简称的《文献》均指此书。
cxx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cxxviii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cxxix见《胡乔木书信集》，第495页“注4”。
cxxx《遵义会议文献》，第73-75页。
cxxxi见《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cxxxii周恩来1967年7月12日接见外交系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cxxxiii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60页。
cxxxiv《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129，162页。
cxxxv《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版，第295页。
cxxxvi《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cxxxvii《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cxxxviii《刘少奇传》（上），第229页。
cxxxix《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一次发言。
cxl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60页。
cxli杨尚昆：《纪念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90年8月30日。
cxlii《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cxliii《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cxliv《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cxlv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29页；另见《长征大事典》（下册），第2577页。
cxlvi斯诺1957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中，专辟有《洛甫论党的问题》一节。
cxlvii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cxlviii《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cxlix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cl《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cli访问刘英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如1999年1月18日，3月4日，6月10日，9月7日，12月30日，2000年2月7日，5月16日，18日，6月27日，8月16日等，大多有录音。
clii《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cliii如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等。
cliv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章，特别是5、6两节。
cl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cl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5页。
*原文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clvii张闻天1919年12月在南京参加该会，此后又常在该会办的《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于1920年入会。
clviii《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61页。
clix《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81页。
clx参阅《任弼时传》，第201页；凌步机：《六十年前的一次开国大典》，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4期。
clxi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clxii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clxiii如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见该书第40页和封底等数处）。书中与此类似的一些误解还有一些，如第118-119页提到，康生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就是如果不搞整风，“毛泽东几乎不敢来党校做报告”。这倒真使我等当时的“一般党员干部”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是“千真万确”不可能的。即使毛泽东喜欢讲极而言之的话，也是“不敢去作整风报告”（就是“不敢”发动整风），而不是什么报告都“不敢做”。这类误解常被一些人抄来抄去，所以特为在此一提。
clxiv以上均见张闻天：《反省笔记》。
clxv《中华儿女》1999年第9期。
clxvi如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9页。
clxvii《遵义会议文献》1985年版，第78页。
clxviii《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00101页。
clxix《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6页。
clxx《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年版，第231页。
clxxi　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会见刘英（陪见的有程中原、张培森等）时的谈话，见《百年尚昆在世时审改过发表的。
《杨尚昆回忆录》系他去世三年多后别人整理，故说法不同。按理当以他的原话（而非别人所编）为准。
clxxii《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clxxiii《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clxxiv例如1935年8月19日的沙窝会议上，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引自《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60页。
clxxv杨尚昆：为刘英着《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所写的《序》，见该书1997年版，第3

页。
clxxvi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clxxvii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93年版，第467，473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60，364页；《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60，266页。
clxxvi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页；《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90页。
clxxix钱江、范伟国：《是非功过张闻天》，载《中华儿女》（国内版）2000年第8期。
clxxx程中原：《张闻天传》2000年版，第318页。
clxxxi《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59，162-163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646页；另见《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clxxxii程慎元：《日本学者评价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三集，第595-598页。
clxxxiii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程中原：《张闻天传》，第330-332页；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52页；《彭德怀自述》，第211页；《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90页，296-297页，《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3页。
clxxxiv《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clxxxv如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回忆张闻天》、《张闻天研究文集》等书。
clxxxvi杨尚昆：《纪念张闻天同志》，载《纪念张闻天》，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clxxxvii据《张闻天年谱》。
clxxxviii《张闻天年谱》上卷，第555页。
clxxxix薛暮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cxc《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24页。
cxci参阅程中原：《张闻天传》第十三章《洛川会议前后》第一节。
cxci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75页。
cxciii《邓力群谈张闻天与刘英同志》，载《世纪风采》2000年第8期。
cxciv《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79页。
cxcv见《张闻天在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cxcvi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2页，但某些情节和时间有误。张给毛由东北局转的三份电报是1949年5月写的（见《张闻天选集》第447—454页；程中原：《张闻天传》增订版第635—640页）。1950年2月他已调来北京。至于张刘争论和毛当面表态的时间，则不知其详。
cxcvii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8页。
cxcvii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第242页；《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00-901页。
cxcix《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07页。
cc《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51页。
cci《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40页。
ccii见《张闻天文集》（四），第216-242页。
cciii因稿件系我起草，所以他要我跟他一起送呈总理，以便有指示时回来修改。总理未看就说不用了。可见是早已商定的。另见蒋洪斌：《陈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1页；《陈毅年谱》下卷，第712页。
cciv《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147页。
ccv说张闻天有“大少爷气”，可谓毫无根据地信手拈来。
ccv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212页；《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90页。
ccvii叶·格·利别尔曼（1897—1983），乌克兰人，经济学家，1962年9月着文提倡在苏联搞点经济改革，如扩大企业权限，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刺激等，被我国当时舆论视为经济学界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
ccviii张闻天1968年8月28日所写材料。
ccix 2001年10月28日张培森查告何方。
ccx《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第461页。
ccxi《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167-1168页。
ccxii《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182-1183页。
ccx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5页，《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8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6页。
ccxiv《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268页。

ccxv《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287，1290页。
ccxvi《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312，1316页。
ccxvii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一般不再提路线斗争，只是对以前的路线错误还用机会主义、冒险主义之类的称呼。建国后的党史已没有这些帽子了，但像“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不算路线错误算什么？也可以“宜粗”掉了？
ccxviii 1959年8月9日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检讨发言。
ccxix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ccxx 1962年8月17日在十中全会西南小组会上的发言。
ccxxi《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01页。
ccxxii《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01页。
ccxxiii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998年版，第372页。
ccxxiv《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ccxxv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第487，492页。
ccxxvi潘心源；《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7年7月2日），见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17页。
ccxxvi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第451页。
ccxxviii杨尚昆：《纪念张闻天同志》，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ccxxix如《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四节标题及其它有关资料。
ccxxx《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ccxxxi张闻天在留苏学习和教学期间就读过几遍。在延安主持《资本论》学习小组，逐章逐段讨论，我还旁听过。被打倒后在经济所又一再精读，还留下大量批注和读书笔记，如《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见《张闻天文集》四）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ccxxxii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有关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的说法，长期以来流传就较为广泛。不久前（2002年11月22日）的一次会上，曾彦修还提到，田家英告诉他毛主席没读过《资本论》。于光远在旁加以证实说，他可算“权威”，因为他在延安时是图书馆主任。除人们传说外，毛在文章中也确未直接引证过《资本论》。《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提到“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似乎不足信。因为插图的《资本论》只是写了个出版年代，难以证明读过。毛读书有作批注的习惯，更何况读《资本论》，但人们没见到过批注。和插图中的版本极相似的一本（可能就是这本）曾在毛中南海故居展览过，我参观时翻了翻，未找到批注。现在公开出售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极多，大部系古籍，但也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内部出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如果《资本论》读了几遍（1954年是“又一次阅读”），那一定会有大量批注可供整理出版。而且像《资本论》这样大部头的书（加上《剩余价值理论》共六大本），毛恐怕不但没兴趣（“没味道”），而且也没时间读。在延安整风前学理论高潮期间，他钻研的是哲学，没参加《资本论》学习小组。此后大概更不容易抽出阅读的时间了。另据莫洛托夫回忆，毛向他承认，自己没读过《资本论》。见（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ccxxxiii《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还有“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这样不讲理的言论！
ccxxxiv《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215页。
ccxxxv有关张毛两人的观点和主张，这里的论述只涉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张从事外交工作时期。材料来源可参阅《张闻天文集》（四）和《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二、三、四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9）中的有关文章或段落。除较为重要者，不一一加注。
ccxxxvi　　1950年我跟张闻天进外交部，先后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或综合组）主任，主要从事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实际上（没名义）还是张闻天的兼职政治秘书，直到1959年。
ccxxxvii《张闻天文集》（四）中的《论和平共处》、《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倪立羽等：《张闻天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ccxxxviii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的有关章节。
ccxxxix见《对亚洲形势中若干问题的看法》等，载《张闻天文集》（四）。
ccxl《新民主主义论》注（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0页。
ccxli“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基本建设方针的提纲”《张闻天文集》（四），第27页。
ccxlii《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98页。

ccxlii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另参阅第90页。
ccxliv《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页。
ccxlv《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8页。
ccxlvi《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ccxlvii参阅《张闻天年谱》，下卷。因部党组书记是周恩来，他以副书记身份不便召开党组会，故名之曰部领导碰头会。
ccxlviii此件整理好经他审改，以省委宣传部名义在《辽东大众》日报上连载，后来还出了单行本，《张闻天文集》（四）选用了一部分，见第123—128页。
ccxlix《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第394页。
ccl见《百年潮》2001年第8期，第76页。
ccli转引自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
cclii《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6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8页。
ccl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281页。
ccliv《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页。
cclv廖盖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7页。
cclvi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25页。
cclvii见《百年潮》，2001年第9期。
cclviii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cclix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cclx《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496—499页。
cclxi茅盾：《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回忆张闻天》，第72页。
cclxii以上所引资料均见胡长明：《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断想》，《书屋》，2001年7—8期。
cclxiii参阅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14-115页。
cclxiv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cclxv见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cclxvi 1958年，刘少奇曾以此诗为例，说唐时高官上任也不带家眷。毛专为此查书，说明作者贺知章出外做官是带了家眷的，不但写了材料，在中央会议上讲，还在党内作了传达。
cclxvii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307页。
cclxviii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页。
cclxix以上情况除多年跟他工作时的体察外，还从1999年起同刘英有过几十次谈话。另可参阅《张闻天年谱》有关条目，如下卷第914、965、980、1218等页；以及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张闻天》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四卷《张闻天研究文集》中的有关篇章。
cclxx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第56页。
cclxxi参阅《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9页。
cclxxii俄国《真理报》2003年3月9日载文：《克里姆林宫主人收入揭密》。
cclxxiii关于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大观》（第1030页）上说，“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就达人民币100万元。”“毛泽东的稿费，他自己动用的每年不到一万元。”另据韶山纪念馆所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1960年前后，毛泽东稿费收入每年为二十几万，利息月1.5万元。该书第511页也提到，毛泽东稿费存款“50年代即达100万元”。
cclxxiv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702页。
cclxxv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7页。
cclxxvi《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25页。
（2001年7月完稿）
cclxxvii 1942年7月4日致聂荣臻电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1页。
cclxxviii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页。
cclxxix见《整风文献》中《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摘引自《列宁全集》第七卷《进一步、退两步》第十三章。
cclxxx《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第256页。
cclxxxi（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中译本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cclxxxii《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1页。

cclxxxiii《刘少奇选集》，第179页。
cclxxxiv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伯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cclxxxv瞿独伊：《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纵横》2001年第一期。文内称，1963年毛泽东看了《多余的话》，就认为秋白叛变了。刘少奇随即向安子文等传达说，“中央传达最高意见，适当时候将宣布。”“文革”后王任重还对独伊说，不能给你父亲平反，因为十二号文件所谈秋白自首叛变是毛主席定的。直到1980年才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
cclxxxvi《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0页。
cclxxxvii《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4页。
cclxxxviii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6页，第332页。
cclxxxix《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页。
ccxc《胡乔木文集》第一卷，载《教条和裤子》（第47-50页）等篇。
ccxc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9页。
ccxcii《论青年的任务》（第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七卷，第324页。
ccxciii《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2页。
ccxciv《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7页。
ccxcv《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75页。
ccxcv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3页。
ccxcvii 1943年3月《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ccxcvi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3页。
ccxcix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ccc参阅《北京外国语学院简史》《延安建校艰苦创业》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ccci如《延安整风实录》的章节标题和190页。
cccii如《延安整风实录》的章节标题和190页。
ccci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7页。
ccciv毛泽东对这项学习极为重视，曾要求各根据地：“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8—459页。
cccv《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48页。
cccvi他在1980年11月12日说，“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说资产阶级思想，说封建思想残余，确实还可以举出来，但说小资产阶级思想，说不出来。”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页。
cccvii《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
cccviii 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的整风报告，见《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21-222页。
cccix在中央学习组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6页。
cccx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例如1940年12月25日马列学院干部科在一份《马列学院审查干部中的一些经验》的材料中说的，“从1940年6月马列学院291个抗战后入党的党员测验中，前后表册填写一致的仅103人，占全数测验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其实，根据多年的见闻和经历，有些填表前后一致的，往往是由于个人保留有底稿，到时照抄，其中一些人隐瞒问题的可能反倒大；前后不一致的，许多人则是由于问题不大因而马虎所致。所以后来在审干中，对前后表册填得一模一样的，反而有所怀疑，因为人们记忆不可能那么准确。
cccxi《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365页。
cccxii　　1942年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的第三项决定。见《延安整风五十年》，第231页。
cccx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9页。
cccxiv转引自《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cccxv以上见《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王实味传》，第190-220页。
cccxvi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16页；毛泽东1943年6月致彭

德怀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7-208页。
cccxv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1页。
cccxviii 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对上海党政干部的讲话。
cccxix这两句话到处在引用，如《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9页，都说是康生所说。
cccxx可参阅《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
cccxx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49页。
cccxxii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见《整风文献》（订正本）新华书店1949年版。
cccxxiii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整顿党的作风》。
cccxxiv《北京外国语学院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0页。
cccxxv《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第171页。
cccxx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1页。
cccxxv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cccxxviii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转引自《随笔》2002年第4期，第19页。
cccxxix《陆定一传》，第587页。
cccxxx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9页。
cccxxxi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2—453页。
cccxxxii《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4，405页。
cccxxx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1页。
cccxxxiv转引自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随笔》2002年第4期。
cccxxxv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cccxxxvi《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93页。
cccxxxvii《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2页。
cccxxxviii《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8页。
cccxxxix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cccxl《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报告》，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cccxli王幼平：《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选派情况追忆》，《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cccxlii《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载《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cccxli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
cccxliv于光远：《纪念耀邦的六篇文章》，《怀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cccxlv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302，377页。
cccxlvi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8期，第25页。
cccxlvii《毛泽东大观》，第610，611页。
cccxlviii参阅《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90，116，137，266，383页等。
cccxlix《邓小平文集》，第116页。
cccl见《人民日报》，1988年4月6日；《经济日报》，1993年7月20日。
cccli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634页。
cccl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cccliii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96页。
cccliv 1979年7月11日在中宣部例会上的插话，见《怀念耀邦》第四集，载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纪略》。
ccclv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集，第48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98页。
ccclvi《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615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87—788页，《中国共产党简史》，2001年版，第70页。

ccclvii均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5页。
ccclviii如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延安整风运动纪实》，见《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47页。
ccclix见该书第205页。
ccclx《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第261页。
ccclxi如另一篇笔记《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另见作者：《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载《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ccclxii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对这些，他是作为教条主义错误检讨的。
ccclxiii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引自《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56页。此文在1953年编入《毛选》第三卷时，删去了"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的话，联共党史书名也用了全称。
ccclxiv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文献》，第51—52页。这句虽在建国后编入《毛选》时删去，但整风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ccclxv见《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ccclxvi《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9，180-181页。
ccclxv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774-776页。
ccclxviii鲁振祥、杨茂荣、王朝祥：《关于总路线的提出文献发表情况简述》；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以上均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四期。另参阅《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所收给斯大林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第262、258页等的有关篇章。
ccclxix《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页。
ccclx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238页。
ccclxxi"著者第一卷序言"，《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
ccclxxii见毛泽东、张闻天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8-659，709页。
ccclxxiii《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ccclxxiv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回忆与研究》，第391页。
ccclxxv参阅《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页（《怎么办》一书中"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一节）。
ccclxxv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756-757页。
ccclxxvii《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ccclxxviii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6月）。
ccclxxix参阅《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ccclxxx《张闻天年谱》下册，第678页。
ccclxxxi以上所引均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ccclxxxii这是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会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谈话。他的原话是："从我党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见《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60页。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ccclxxxiii《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497-498页。
ccclxxxiv见张闻天1943年的《反省笔记》。
ccclxxxv如1980年写的《张闻天同志和研究工作》，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回忆张闻天》；1994年写的《我在辽东同张闻天同志的接触》，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的《张闻天在辽东》，等等。
ccclxxxvi参阅《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22页以下。
ccclxxxvii见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载：《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
ccclxxxviii 1999年2月26日刘英的谈话。
ccclxxxix《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页。
cccxc宋金寿：《纠正反教条主义中不译不读马列的偏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cccxc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42页。
cccxcii《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cccxciii《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9页。
cccxciv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见《整风文献》，解放社1949年版，第16页。
cccxcv例如王惠德在《忆往昔》一文中就谈到，没说"箭"是怎样拿到手的，怎么就连声赞曰好箭

好箭。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
cccxc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cccxcvi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cccxc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08页。
cccxci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第21页。
cd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清样本上册，第87页。
cdi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见《毛泽东大观》，第633页。
cdii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清样本上册，第77-78页。
cdiii《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1页。
cdiv毛泽东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时的谈话。
cdv《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447页。
cdvi《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
cdvii这是周恩来在整风检查中的提法，是既不能否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估计和指示有错误，又不能批判和反对共产国际，于是发明了这种“真假”两个箩筐，错误的就可装到米夫之流的“假国际”箩筐里，仍然保住了“拥护国际”的立场。这当然谈不上批判国际的教条主义。
cdvi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111-135页。
cdix《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143页。
cdx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5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3页。
cdxi《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cdx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cdx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7页。
cdxiv以上见沈建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cdxv转引自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78页。
cdxvi陈独秀：《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1927年3月6日）。
cdxvii《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
cdxviii《六大以来》（上），第12页；（下），第7页。
cdxix恩格斯1889年12月28日给格尔桑·特利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第471页。.
cdxx《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
cdxx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72页。
cdxxii转引自沈建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cdxxi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86页。
cdxxiv《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61-66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100-102页。
cdxxv转引自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76页。
cdxxv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82页。
cdxxvii转引自沈建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cdxxvi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第335页。
cdxxix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50页。
cdxx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71页。
cdxxxii反“AB团”可分两个阶段。头一段为1930年至1931年初四中全会后，由毛泽东主持。第二段1931年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此后即由中央代表团领导，毛泽东配合。
cdxxxiii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1页。
cdxxxiv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页中写道，“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审干是每个干部都应审查，并且经常进行的，因而谈不上什么扩大化。
cdxxxv转引自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cdxxxvi吴学昭（蒋南翔夫人）：《韦君宜在“群花”中远行》，《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cdxxxvii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2-203页。
cdxxxviii此书在以前的笔记中曾多次引用，在此不再详述。

cdxxxix仲侃：《康生评传》，第210页；《陈毅年谱》，第1184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66页；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载《历史在这里沉思》（2），华夏出版社1986年。
cdxl《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8页。
cdxl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3页。
cdxlii萧岛泉：《杨献珍的自责与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
cdxlii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9页。
cdxliv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cdxlv《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
cdxlvi见韦君宜着《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cdxlvii《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cdxlviii《延安整风实录》，第363页。
cdxlix《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6，890页。
cdl《王实味传》，第264页。
cdli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39，654，666页。
cdlii李剑主编：《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册）《前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cdliii见《遵义会议文献》，第93-102页。
cdliv《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9期。
cdlv《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cdlvi《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
cdlvii李铁映在《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2年5月22日。
cdlvii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7页。
cdlix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1985年）。
cdlx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6页。
cdlxi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
cdlxii转引自黄昌勇：《王实味传》，第237页。
cdlxiii参阅《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1989年）；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9-162页；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588-591页；以及《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外交文选》等。
cdlxiv 1942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载《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
cdlxv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
cdlxvi《杨尚昆回忆录》，第216页。
cdlxvii 1998年以来曾和延安整风时任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学委会副主任的刘英谈到几次（如1999年1月18日，21日，28日），一些谈话有录音或记录，并有别的同志参加。最近还同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院和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曾彦修几次谈及此事。2002年8月6日曾又特别来电话提到，《杨尚昆回忆录》关于抢救柯庆施的描写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从头到尾参加会议，至今记忆犹新。
cdlxviii以下情况，除曾经与会的刘英、曾彦修等所谈外，还可参阅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1996年6月）。
cdlxix《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但内收文章多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写作之前。
cdlxx《刘少奇传》（上），第495页。
cdlxx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6页。
cdlxxi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5页；《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2页。
cdlxxii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59页。
cdlxxiv《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16页。
cdlxxv《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56页。
cdlxxvi《任弼时年谱》，第442页。
cdlxxvii以上分别见《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237，258，270页。
cdlxxvii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83页。
cdlxxix《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60页。
cdlxxx《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8-10页。
cdlxxxi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

cdlxxxii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2页；《徐向前传》，第399页。
cdlxxxiii《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5页。
cdlxxxiv《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3-244页。
cdlxxxv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后又收入《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三卷。
cdlxxxvi《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5页。
cdlxxxvii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cdlxxxviii《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66页。
cdlxxxix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2年6月8日）；《解放日报》1942年6月5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其中就叫“整顿三风运动”。
cdxc《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cdxc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3页。
cdxcii还可参阅毛泽东给康生的信（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8页。
cdxciii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74-78页。
cdxciv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正确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85页。
cdxcv《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
cdxcv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3页。
cdxcv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3页。
cdxcviii《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55页。
cdxcix《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3页。
d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6页。
di《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19页。
dii《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
d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1页。
d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
dv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52-53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82-84页。
dvi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dvii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1页。
dviii转引自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dix《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7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5页。
dx中央书记处关于《关于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给华中局的电报（1943年11月15日）。
dxi《百年潮》，2002年第9期。
dx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96-497页。
dxiii《彭真年谱》上卷，第216页。
dxiv《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75页。
dxv如上引王素园、贺晋等人的文章。
dxvi江英：“姓名惹的祸”，《众说纷纷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4页。
dxvii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333页。
dxviii刘白羽：《平地风雷—我经历的整风抢救运动》，《心灵的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5月版。
dxix夏宏根作，载《争鸣》1986年第3期，“党史通讯”同年第9期摘发。
dxx《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dxxi《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3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dxxii《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9期。
dxxiii《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28-33页。
dxxiv刘少奇：《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7月），《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29页。
dxxv《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
dxxvi梅剑主编：《延安秘事》（第十三章《延安‘抢救运动’写真》）（下册），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545，540页。
dxx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281页。

dxx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
dxxix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2页。
dxxx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13页。
dxxxi萧岛泉：《杨献珍的自责与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
dxxxii《北京外国语学院简史1941-1985》，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6，16页。
dxxxiii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61-363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334，340-341页；任仲夷回忆见2000年8月17日《南方周末》。
dxxxiv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它》（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60-361页。
dxxxv毛泽东1943年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见《延安整风实录》，第379-380页。
dxxxvi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dxxxvii李锐：《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书屋》2001年第3期。后收入《直言》（见第438页）时删去“发起”。但说抢救运动由康生“执行”也不确切，因为根据中央规定，是由各单位各地区领导“自己动手”执行的，所以才出现大不相同的情况，有的地方厉害，有的地方甚至没“执行”。这点，后面还要谈到。
dxxx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5页。
dxxxix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等。
dxl薛鹏、孔繁玲：《彭德怀晚年岁月实录（之五）》，《中华儿女》2002年6月。
dxli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53页。
dxlii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63，291-292页。
dxl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2页。
dxl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1页。
dxl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2页。
dxlvi例如直到2002年《百年潮》第5期发表李东朗的一篇《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仍持此论。
dxlvii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155和181页。
dxlviii《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9页。其它地方引证的也很多。
dxlix例如1942年3月19日《解放日报》社论《发扬民主作风》，就公开号召党员干部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
dl《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就明确写道，“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批评领导，批评工作，……绝不加以抑制。”“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30—31页）。这已说得够清楚了。
dli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376页。
dlii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2页。
dliii包括当时参与此事的某些领导和积极分子如李维汉、温济泽等。后辈的党史研究者就更不用说了。直到2002年第5期《百年潮》载文《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还将制造“王实味案”列为“制造一连串错案影响中央决策”、“将运动引上了歧途”的第一桩。
dl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7页。
dlv以上材料来源见：《王实味传》，《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温济泽自述》，《延安整风实录》，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
dlvi《温济泽自述》，第149页。
dlvii《温济泽自述》，第147页。
dl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页。
dlix《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316页，编入《毛选》已删掉。
dlx《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dlxi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3页。
dlxii引证毛泽东这两次讲话（一为10月19日的开幕词，一为11月21日和23日《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中有关反特斗争的材料很多，有详有简，但多系个人著作，如《延安整风实录》，第368—369页，《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所载《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等等。正式的文献和著作，如《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以及其它党史论着，都一概不公布、不叙述。这也是党史编纂学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为尊者讳”的表现。
dlxiii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
dlxiv对以上情况，《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华世俊和胡育民的《延安整风始末》等均有介绍。这里主要参考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九到第十二章。
dlxv《革命史资料》第3集，1981年版。
dlxvi有关张克勤案，党史著作多有叙述，特别是各种民间的编着。谈得较详细的，除上述《李逸民回忆录》外还有：高新民、张树军着《延安整风实录》；曾繁正主编红旗出版社1988年版的《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郝景泉编着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的《党史风云实录》（下）；文聿着《中国“左”祸》，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等。
dlxvii《延安整风实录》，第369页。
dlxviii《任弼时年谱》，第442页；《延安整风实录》，第372-373页。
dlxix《延安整风实录》，第373页。
dlxx如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和后人编写的《杨尚昆回忆录》中的叙述。
dlxxi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章。
dlxxii《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20—221页。
dlxxi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514页。
dlxxiv《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7页。
dlxxv《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4页。这是由于敌后情况与延安不同，整风、审干各推迟一年。
dlxxvi《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页。按，这时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但仍在苏共中央任职，因此他用的是个人名义，代表的却是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不能不重视。对抢救运动，苏联驻延和驻渝人员当然知道是毛泽东直接领导，季氏只指摘康生，也是由于不便于直接批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而康生及其机构在抢救运动中也确已恶贯满盈。
dlxxvii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页。
dlxxviii《康生年谱》，见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dlxxix见该书第276-277页。
dlxxx见该书第277-278页。
dlxxx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7，278页。
dlxxx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7，278页。
dlxxxiii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21—1949中国共产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页。
dlxxxiv《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6-487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2-43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279页。
dlxxxv《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陈永清：《纪念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见《怀念林伯渠同志》，第136页。
dlxxxvi刘英曾多次谈到这一情况，如1999年1月28日，6月1日，6月10日等。
dlxxxvii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593页。
dlxxxviii以上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任弼时年谱》、《陈云年谱》等有关部分。《彭真年谱》总学委中有高岗，《任弼时年谱》和《陈云年谱》则无，且指明为五人。不知孰是。也可能是因高岗为坏人，故有意抹掉。
dlxxx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页。
dxc《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0页；其它日期也均据该《年谱》。
dxci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577页。
dxcii分别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80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8—219页。
dxciii载《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9期。
dxciv以上情况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3—277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15—420页；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dxcv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刘少奇年谱》将此电列为6月29日，但《陈毅年谱》同日却无此记载。无论时间如何，这一电报总是有的。

dxcvi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复陈饶27日电）。
dxcvii《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29页。这一报告的全文未能看到。
dxcviii《陈云年谱》上卷，第375、381页。参阅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严格要求真心爱护”一段；叶永烈：《陈云之路》中“当上红色掌柜”一节。据时任陈云秘书的刘家栋在书中说，陈云被调离中组部是因为他在组织工作上“右”（吸收了大批“特务”），又不赞成抢救运动，还反对过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所以反特斗争和抢救运动开始后，他就离开中组部闲居枣园“养病”，1944年才当上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贺龙的副手——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dxcix《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19页。
dc《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29页。
dci《刘少奇传》上卷，第495页。
dcii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任弼时年谱》、《彭真年谱》等。
dciii以上情况，有些是在延安时的了解；有些则是近年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访问当时在杨家岭工作的老同志所谈。如康生、李富春等要刘英兼刘少奇政治秘书和那位医生被抢救的事，就是刘英多次所谈（1999年1月18日，21日，28日，6月10日等）。据刘英说，兼政治秘书事因她不同意也就算了。她的理由是忙不过来，一则她在行政处虽为学委会副主任，但主任邓洁因被敌人捕过，已靠边，实际上一切都她管，且已因抢救不力受到批评，压力很大；二则她还是张闻天的政治秘书（由于张靠边，实际上工作不多，但名分还在）。她说，当时没讲的重要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觉得刘少奇太严肃，有点怕；二是刘晚上办公，她熬不起夜。民委特别是妇委的抢救情况，刘英、曾彦修都谈到不少。另，蒋南翔在《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也提到妇委的抢救和他找刘少奇反映情况等问题。
dc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
dcv《刘少奇传》（下），第754-755页。
dcvi见《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47-148页。
dcvii《彭真年谱》上卷，第191，198-199页。
dcviii《彭真年谱》上卷，第191页。
dcix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59页；《彭真年谱》上卷，第192页及其它有关条目。
dcx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4期。据他回忆，1966年5月11日彭真向他交接工作时，听后面有人念材料，“彭一听就火，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他是先喊主席万岁的。”
dcxi李永昌：《周恩来赴苏治病始末》，《百年潮》2001年第7期。
dcxii《任弼时年谱》，第438页；《彭真年谱》上卷，第213页。
dcxiii《任弼时年谱》，第438页；《彭真年谱》上卷，第213页。
dcxiv《彭真年谱》（上卷217页）称“延安中央文联”，别处均称“文协”或“文抗”（系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会延安分会之简称），不知是否一回事。
dcxv延安当时的总人口为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94页。
dcxvi彭真作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向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到会的代表大多数经过1940年、1941年中央指定的小委员会做过初步审查，以后在党校一部、西北局组织部、联政组织部又做过一些审查。”见《彭真年谱》上卷，第264页。在这之前毛泽东就说，“在党校的七大代表是在学习中进行审查的。实际上将来也要根据党校审查结果作为结论。”同前，第233页。
dcxvii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dcxviii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363页。
dcx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页。
dcxx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44页。
dcxxi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3页；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6页；经过十年磨一剑修订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90页甚至说，在康生报告之前，“中共中央曾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试图予以纠正。”但后来却搞出了个“抢救失足者运动”。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dcxxii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第333，340-341，343页。
dcxxiii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转摘自《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9页。
dcxxiv江英：《姓名惹的祸》，《众说纷纭话延安》，第174页。
dcxxv《彭真年谱》上卷，第244页。
dcxxvi《彭真年谱》上卷，第231页。
dcxxvii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1998年版，第12页。
dcxxviii吴江：《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
dcxxix《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38页。
dcxxx《彭真年谱》上卷，第236页。
dcxxxi 1999年3月20日和张培森、叶晖南一起访问郭洪涛的谈话。
dcxxxii最先提出“首长负责，自己动手”，概为1943年5月21日政治局会议关于防奸工作应遵照六项原则的决定。7月1日毛泽东致康生信谈“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时又重申，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最后形成为著名的“九条方针”中的第一条。以上均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刘少奇年谱》等的有关条目。
dcxxxiii《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
dcxxxiv刘英1999年1月28日谈话（录音）。她讲得具体生动，还一再说，“延安肃反，可以写篇东西，非常生动的。”
dcxxxv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胡耀邦》，见《怀念耀邦》第二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dcxxxvi见上引杨奎松：《莫斯科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第153页。
dcxxxvii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
dcxxxviii陈永清：《纪念林伯渠同志诞生一百周年》，载《怀念林伯渠同志》，第136页。参阅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传》，第286页。
dcxxxix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
dcxl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详细报道登在1943年9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
dcxli韦君宜：《思痛录》，7-14页。
dcxlii韦君宜：《思痛录》，7-14页。
dcxliii张稼夫：《庚申忆逝》（之二），《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
dcxliv这两件事，前面均已提到。按，穆欣（“文革”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于1943年9月托韩钧给晋绥分局和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分局未理周的证明，对穆仍予批斗。见穆欣：《劫后长忆》香港1997年版，第132页。
dcxlv罗贵波时任八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和地委书记。见罗贵波：《革命回忆录》，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235页。
dcxlvi《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dcxlvii《黄克诚自述》，第177-179页。
dcxlviii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312，313页。参阅王力：《王力反思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351页。
dcxlix新华社2002年11月26日电。
dcl《邓小平文集》第二卷，第293页。
dcli《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43页。
dcli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第242-250页。
dcliii《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日。
dcliv《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2日，康生追悼会上叶剑英致《悼词》。
dcl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49页。
dclvi对此，我们在前面的笔记《张闻天与所谓教条宗派》中已有所讨论。
dclvii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91页。
dclviii《王力反思录》（下），第709页：《（四）书记处和政治局名存实亡了》，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dclix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83-186页。
dclx《“文化大革命”简史》，第97页。
dclxi以上材料见：《“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12，97页；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王力反思录》第376，617，957页；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页，369-377页。

dclxii《王力反思录》，第983页。
dclxiii《康生评传》，第284页。
dclxiv《康生评传》，第307，437页。
dclxv张佐良：《在情感与原则漩涡中的周恩来》，载2001年《中华儿女》精装本.上集。
dclxvi仅凭记忆，没查谢老的文章。记得谢老抗战期间曾在延安报纸上先后设过两次专栏，先是仿美国总统罗斯福，名曰《炉边闲话》，整风后改为《一得书》。另据延安同学马列阅后告，他所记康诗的最后一句是："误把康云作康生"。
dclxvii《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
dclxviii《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社论。
dclxix《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395页，原载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
dclxx以上全凭记忆，如康生的《小令》就可能有错。按，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时期，由于曾参与起草有关国际与外交问题的文件，曾和一些秀才如乔冠华、熊复、王力、姚溱等多有接触。有关康生的这类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听来。而且从闲谈中也感觉到，人们对康生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这也许是由于正当"王莽谦恭未篡时"。有关康生这方面的情况，还可参看《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三联书店2002年版），《王力与文物》（《王力反思录》的《附录》）。
dclxxi毛泽东：《历史草案》，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25页；毛泽东和王稼祥1942年2月21日复周恩来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06页。
dclxxii见该书第286页。
dclxxiii除前已注明的毛同印度尼西亚客人的谈话外，还可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5-299页；《王力反思录》，第712-713页。
dclxxiv《王力反思录》，第712-713，1271页。
dclxxv该书为长城出版社2000年版，以上引自《文汇报》2001年2月14日的《新书摘》摘录，题为《毛岸英识别康生》。
dclxxvi《王力反思录》（下册），第713页。高华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475页也曾引用，还说除江组织关系在社会部外，连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也参加社会部工作。但叶的妻子蒋家英却被送中央党校抢救。
dclxxvii以上分别见：前引《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摘录；《王力反思录》，第596，1271-1275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dclxxviii如上面提到后人编写的《杨尚昆回忆录》，第220页。持这类说法的书籍文章可说不胜枚举，因此有必要作点澄清。
dclxxix转引自《国外近代史资料》第十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dclxxx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页。
dclxxxi《王力与文艺》，《王力反思录》（《附录》），第1275页。
dclxxxii《彭真年谱》上卷，第224页。
dclxxxiii《任弼时年谱》，第442页。
dclxxx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278页。
dclxxxv例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3页；中共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6页；《毛泽东传1893-1949》，第652—653页；《周恩来传》，第682—683页；《陈云年谱》上卷，第378页；《任弼时年谱》，第347页；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第363页；《陆定一传》，第280页；还有一些传记和回忆录，不再一一列举。
dclxxxvi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63页。
dclxxxvii《彭真年谱》上卷，第222—225页。作报告的时间为：2日，14日，19日，23，31日。其中2日为传达毛泽东报告，除23日为二部和四部外，其余均为全校。
dclxxxviii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6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90页。
dclxxxix《彭真年谱》上卷，第227页。
dcxc《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53页。
dcxc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75页。
dcxcii以前多次引证过，如：党校2500人中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行政学院除一个人外，教职员全部是特务，等。对这些，正式党史、年谱、传记照例都给"讳"掉了。
dcxciii见《延安整风实录》，第373页。

dcxciv《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57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延安整风实录》，第373页。但有关讨论抢救运动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年谱》均未提，只有《任弼时年谱》提到“审查干部”。这可能属于党史学上应遵守的原则之一，即一般不提领导人参加抢救的言行。
dcxcv《彭真年谱》（上卷），第222页。
dcxcvi《彭真年谱》（上卷），第223，224，225页。
dcxcvii以上材料来源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dcxcviii《抢救失足者——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的报告》（1943年7月15日）。
dcxcix参阅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黄克诚自述》。
dcc《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
dcci转引自《康生评传》，第87页。
dccii 1999年1月28日访问刘英的谈话；另见张闻天1959年8月13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dcciii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
dcciv段建国、贾岷岫：《王世英传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2页。
dccv仲侃：《康生年谱》，《康生评传》（附录），第352-353页。
dccvi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62页。
dcc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80页。
dcc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页。
dccix仲侃：《康生评传》，第353页。
dccx《刘少奇传》（下），第754-755页。
dccxi如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版，第790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616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7-280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53页；以及其它等等。
63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见上引《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dccxiii《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53页。
dccxiv《任弼时年谱》，第443页。参阅《彭真年谱》，第215-216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3—435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19-421页。
dccxv《任弼时年谱》，第444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21页；《彭真年谱》，第217页。
dccxv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7页。
dccxvii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74页。
dccxviii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dccxix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
dccxx《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89页。
dccxx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90-91页。
dccxx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91页。
dccxxi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93页。
dccxxiv转引自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蒋批康生的报告过高估计成绩对错误估计不足，说“成绩大于缺点”的估计是“自欺欺人”、和客观事实不符。另见《康生评传》，第351页。
dccxxv《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中称，“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此后一切党史著作均以此为准。
dccxxvi《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这一文件。
dccxxvii《中央关于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dccxxviii《中央关于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dccxxix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91页。
dccxxx中央书记处给华东局关于《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的电报（1943年11月15日）。
dccxxxi见《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dccxxxii见《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dccxxxiii《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
dccxxxiv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2-203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281页；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216页；修订后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88-790页。
dccxxxv例如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88页）就把抢救运动标题为《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在入题前先讲了1939年和1940年涉及审干的两次决定。用意很明显，但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那两次审干并没有变成抢救运动，等等。
dccxxxvi如李锐多次引证唐纵（抗战时期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务工作的组长）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见《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2期。
dccxxxvii《延安整风实录》，第366页。
dccxxxviii《陆定一传》，第279页。
dccxxxix当时在中宣部和中央政研院工作、住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周边的曾彦修和齐速同志还来信证明，他们在礼堂建成不久即搬去住，住了五六年不等，但“从未听说有这件事”。写信日期，曾为2003年4月7日，齐为5月25日。原信存我处。
dccxl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89页。
dccxli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3页。
dccxlii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册下卷，第390页。
dccxliii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79-380页。
dccxliv见《项英的辉煌与失落》，《炎黄春秋》1998年第4期。
dccxlv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见《直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dccxlvi 1943年10月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谈到反特斗争时说，“反特务是今年我们一个很大进步。去年共产党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共产党六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六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共产党的妙计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兵，这些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79-380页。
dccxlvii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00-402页。
dccxlviii公刘：《董狐之笔》，《随笔》1999年第一期。
dccxlix参阅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29-232页。
dccl《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dccli《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4页。
dcclii恩格斯：《共产主义同盟者的历史》，《马恩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196页。
dccliii参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4—595页。
dccliv《“左”派幼稚病》中论述的领袖、政党、阶级的关系，把领袖专政等同于群众专政，为领袖专政制造了理论根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就曾反对苏俄实行的独裁和恐怖。过去一直对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意见持否定态度，现在看来，历史已证明了卢森堡的正确。
dcclv见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54-1455页。
dcclv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58，481页。
dcclvii《苏联与中国革命》，第299页，转引自《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41页。
dcclviii《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2页。
dcclix《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35，642页。
dcclx《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页。根据李维汉的建议，建国后正式出《毛选》时删去了其中一些话。李认为这些都属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01-102页。
dcclx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627-629页。
dcclxii《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dcclxi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dcclx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62页。
dcclxv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dcclxvi原来毛泽东还只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也是

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因此对于苏共怀疑他是铁托非常在意。但在苏共二十大后，毛已有做世界斯大林之意。特别是大跃进的失败，促使他更集中于搞政治斗争和准备打仗，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以至报刊舆论一时不提"和平"与"和平共处"字样。
dcclxvii《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廖盖隆1980年12月10日的发言）。
dcclxviii《彭德怀年谱》，第790页。
dcclxix毛泽东：1958年10月复赫鲁晓夫信。
dcclxx《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第636页。
dcclxxi按西路军的失败为1937年3月，而毛泽东1936年秋就已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585，609页。
dcclxxii关于人为的三年困难饿死的人数，由于始终视为绝密，至今未敢公布数据，因此说法颇多，相差也大。廖盖隆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上着文估算为4000万人。李成瑞（原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中说，经研究计算得出结论是，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200万，其中大都系饿死。本文说的4040万，是根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合刊号所载的调查。但不管怎么说，大跃进造成两三千万人饿死大概是没人敢否认的。就算是2200万，那也不但超过中国的八年抗战，还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死亡的两千万。
dcclxxiii参阅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14、139页。转引自《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
dcclxxiv见乔培华：《信阳事件》，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李锐写的《序》发表于《同舟共进》2002年第3期。
dcclxx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dcclxxvi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是颠倒是非、拍马溜须、鼓吹个人迷信的标本，但却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而刘少奇的讲话虽然没涉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没敢追究上面的责任，但他借湖南农民之口，说造成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已感到不悦。特别是他的老部下彭真在小组会发言中竟点名批评毛泽东，就更种下祸根。事实上，在毛泽东去世前，三面红旗还一直被高举着，直到1981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正式砍倒了。
dcclxxvii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0页。
dcclxxviii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二部分第十章"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
dcclxxix中共中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dcclxxx柯庆施被抢救可能由于太说不过去，中央于1944年4月即已专门发文为其平反。
dcclxxxi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6页。
dcclxxxii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75页。
dcclxxx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dcclxxxiv中国党的所谓纪律，实际上就是绝对服从，且只有对上服从。因为在缺乏民主、极少按党章开会和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几乎不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还不说后来提出的违背建党原则与党章规定（如保护少数、党员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等）的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dcclxxx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
dcclxxxvi"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的就有五六十人"（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这都是些干部和知识分子。
dcclxxxvii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内称，"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泽东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
dcclxxxviii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1945年3月）。
dcclxxxix段建国、贾岷岫：《王世英传奇》，第191-192页。
dccxc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第344页。
dccxci因为他是乘刘善本起义驾来的国民党飞机，我们则是一路步行。
dccxcii按华北代表团除团长彭真外，还有高文华、柯庆施、吴德、李雪峰、黎玉、乌兰夫、孔原等。会上一些人特别不同意刘少奇说的"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以及"一二·九运动有立三路线残

余”等提法。从事后情况看，刘柯关系一直不和。参阅《刘少奇传》和《刘少奇年谱》；《怀念刘少奇同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张闻天：《反省笔记》；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革命回忆录》增刊[1]1981年）等。
dccxciii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463页。
dccxciv 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狠批了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1月14日会上毛当众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传》，第1367页）周估计到毛已有意以柯代己，遂在检讨“反冒进”问题时提出担任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
dccxcv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00，216，259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5页。
dccxcvi《王力反思录》，第1070页。王力所说如属实，也是刘少奇的借口，因为他本人在北方局期间也不大可能宣传毛泽东。他当时的正式报告可为佐证：“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817页。
dccxcvii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随笔》2002年第4期。
dccxcviii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安熠辉：《“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文史精华》2003年第8期。此外，我还就此访问过刘英等一些老同志。
dccxcix《陆定一传》，第485页到541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0 l—202页；《王力反思录》，第593-594页。
67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第336页。
68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革命史资料》第3辑，1981年版。
dccccii杨立：《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省委研究室1997年），第51页。
dcccciii陈模：《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炎黄春秋》200 I年第12期；杨立：《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dcccciv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
dccccv《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dccccvi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83-384页。
74《彭德怀自述》，第220页，229页。
dccccviii毛泽东致刘少奇、彭德怀电，l 942年2月20日。
dcccix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7页。
dccccx毛泽东1942年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6页。
dccccxi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6页。
dccccxii毛泽东1943年3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dccccxiii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的讲话（1945年2月21日）；《朱德选集》，第149页。
dccccxiv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
dccccxv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好评如潮”，见扉页。
dccccxvi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48页。
dccccxvii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42，453页。
dccccxviii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
dccccxix《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所谓“九条方针”。
dccccxx《延安整风实录》，第346页。
dccccxxi《温济泽自述》144页、《王实味传》195页引证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以及其它有关材料都写为27日，惟《延安整风实录》第350页写为17日，恐有误。
dccccxxii《温济泽自述》，第144页。
dccccxxiii《王实味传》，第196-198页。
dccccxxiv《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痛斥托派王实味反动思想.建议文抗开除其会籍》，《解放日报》1942年6月19日。
dccccxxv艾青的发言以《现实不容歪曲》为题发表在1942年6月24日《解放日报》上，经毛泽东审阅过。转引自《王实味传》，第213页。
dccccxx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3页。

dccccxxvii最好是将各种类型历次会议的内容和与会者的发言情况作些分析比较，才能了解问题的实质，但这样作一则不太可能，二则勉强作起来（如政治局和书记处各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还是有踪可寻的）也会占篇幅太多。单讲次数，虽不知内容，但也总可看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例如有的正式成员反而比非正式成员出席会议的次数少。
dccccxxviii均根据各人年谱统计。
dccccxx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
dccccxxx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dccccxxxi这只是原来的设想，现在看来也许很难实现了。
dccccxxxii见《生产战线上的抗大》一书。当时尚未流行劳动模范称号。
dccccxxxiii见《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dccccxxxiv为了稳定留后方工作的军心，1938年有一次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来给抗大干部做工作，说你们都想到前方去，这种精神可嘉，但是抗大还办不办？并说了上引的话。凡在延安抗大工作过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次讲话及其内容。另参阅曹慕尧：《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dccccxxxv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322，358页（注15）。
dccccxxxvi江文汉系由基督教青年会派遣，于1939年由美国来延安考察，回美后在以英文写的报告中曾讲到："男女之间显得很融洽，十分坦率和自然"等。黄天霞翻译题为《参拜延安圣地》，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四期。赵超构关于延安女同志的描写，见他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重印。
dccccxxxvii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会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时的谈话。我参加了这次会见。参阅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260页。
dccccxxxviii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二篇第三章：《延安时期理论繁荣的历史思考》。
dccccxxxix这是一些官方党史论着和教科书都不能不承认的，如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790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至于有的书，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把1938和39年延安的所谓"肃托"，描写成："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延安的干部和党员都犯上了'托派恐惧症'……个个谈'托'色变"云云，则是无限夸大的道听途说（见该书，第448页）。
dccccxl见刘白羽：《心灵的历程》，199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dccccxli《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78页。
dccccxlii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编的《汉英词典》（1997年版）就只设"个人迷信"条目，意为无须再列"个人崇拜"。还可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新英汉词典》、刘泽荣主编的《俄汉新辞典》（时代出版社1956年）对cult、КУЛЬТ的中文释义，等。
dccccxl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7页。
dccccxliv《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第484-485页。
dccccxlv《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页。
dccccxlvi见《胡乔木文集》第三卷。
dccccxlvii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4页。
dccccxlviii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00页。
dccccxlix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00页。
dccccl《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5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16页。
dcccl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22页。
dccclii例如我手头就有2002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作者为余广人、于保红）。
dcccliii《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一文中的第二个小标题。
dcccl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1页。
dcccl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330页。
dccclvi《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
dccclvii据2003年12月李锐为哈佛大学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发言。2004年1月25日在新华社黄亭子食堂有三、四十人包括我、方实、郭先逑、田绿平、汪丁丁、残雪等参加的春节聚餐会上，李锐在宣读了他的这篇发言稿后，曾谈到毛加写口号一事是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朱德秘书的发言中所讲，他现在还保存着这份《会议简报》。
dccclviii见《新华月报》，1950年五月号。
dccclix《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7-115页；戴晴：《梁漱溟与毛泽东》，见《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dccclx两书分别署名为李银桥、权延赤，但实际上都是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一个人所述。
dccclxi《随笔》，2001年第3期。
dccclxii《参考消息》，2004年2月2日，第9页。
dccclxiii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dccclxiv见1984年《党史通讯》第7期载《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文。其中指出王明文章经毛泽东看过，除按王明《中共五十年》的记载外，还根据任弼时1945年4月1日《日记》。
dccclxv分别发表在同年的《共产党人》第16期和《解放》周刊第127期上。
dccclx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4-205页，以及其它有关章节。
dccclxvii王稼祥（1938年）和周恩来（1940年）都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而且按党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和执行国际的指示和决定。何况中共中央从1937年12会议后就一再决定尽快召开。
dccclx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页。
dccclx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5页。
dccclxx《张闻天年谱》，第707页；《邓力群谈张闻天与刘英》，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dccclxxi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75页。
dccclxxii《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dccclxxiii《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页。
dccclxxiv《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dccclxxv王若水2000年12月提交给“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21世纪的挑战”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
dccclxxvi《延安整风实录》，第41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9页。
dccclxxvii《自白》，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05页。
dccclxxviii《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第三卷，第803页。
dccclxxix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95页。
dccclxx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3-454页。
dccclxxx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9页。
dccclxxxii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90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53页。
dccclxxxiii 1942年8月29日政治局会议关于《解放日报》问题的决定；同年9月9日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
dccclxxxiv《延安整风运动纪实》，《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95页。
dccclxxxv祝彦：《走近真实的陈独秀》，《百年潮》，2003年第1期。
dccclxxxvi参见《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页。
dccclxxxvii陈毅：《新四军抗战始末》，1945年5月1日在七大的发言。
dccclxxxviii《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dccclxxxix 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dcccxc《任弼时选集》，第383页。
dcccxci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dcccxcii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6页。
dcccxciii见《张闻天文集》第三卷，第246-263页。
dcccxciv 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的发言。
dcccxcv见1945年5月1日《解放日报》。
dcccxcvi 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的发言。
dcccxcvii《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社1949年初版，第407页。
dcccxcviii以上均见（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69-374页（各人发言均据《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dcccxcix《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503页。
cm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cmi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cmii见弗·默林：《马克思传》中译本（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4页。据原注，这段话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26卷，第487、488页。
cmiii《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87页。
cmiv《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页。
cm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
cm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
cmvii《刘少奇选集》，第300页。
cmviii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cmix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81、99页。
cmx《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1997年3月22日），先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后收入《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cmxi 1948年11月21日审阅共青团文件时给刘少奇等人的信。
cmxii 1949年3月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cmxiii如上引《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所载《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一文。
cmxiv分别见刘少奇的《论党》和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过的党章。
cmxv邓力群：《中央起草历史问题的指导思想》（1981年7月21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cmxvi《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cmxvii毛泽东1953年5月24日对军训部部长萧克报送的内务条令等三个草案的批示。
cmxviii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第一卷，第186页。
cmxix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
cmxx胡绳：《毛泽东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cmxx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2-83页。
cmxx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页（1980年7月24日的谈话）。
cmxx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18、123页。
cmxx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6-101页。
cmxxv如《张闻天的民主追求和实践》，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cmxxvi《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页。
cmxxvii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cmxxviii《张闻天文集》（四）《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原稿和中央修改稿，第46页的《选编说明》。
cmxxix见《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98页，陈毅传达毛泽东的讲话。
cmxxx《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cmxxxi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cmxxxii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cmxxxiii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页。
cmxxxiv例如2003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就属于这类。文中说的，"为什么别人没有出来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由他来倡导呢？"就不合乎事实。即使不算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意思相同的言论和实践，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体提法，也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同时提出的。至于文中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违背历史的拔高。
cmxxxv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三期载王焕春：《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cmxxxvi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
cmxxxv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第692-694页。
cmxxxviii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2页。
cmxxxi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cmxl《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817页。
cmxli如《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论党》，均载《刘少奇选集》上卷。
cmxlii参阅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一第三节，内蒙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cmxliii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0页。
cmxliv徐亮、杨莹：《我们的图书馆》，《毛主席派人来借书》，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

录》，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cmxlv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7-28页。
cmxlvi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1929年2月25日给省委的报告，提到“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
cmxlvii一度担任过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杨开慧的堂兄）也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病。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的荷包里……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认得党的组织。”杨克敏报告，同上注。
cmxlviii《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cmxlix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5月）。
cml李敏：《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转引自《书摘》2004年第3期，第33页。
cmli毛泽东从小就有“君子救小人”和“圣人教育小人”的观点。1917年他曾给黎锦熙写信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从事后发展看，毛终其一生都没完全改变这些影响，如认定民主是手段等。
cmlii《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cmliii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cmliv《任弼时年谱》，第370-372页；《王稼祥年谱》，第182、184、189、196页；《王稼祥传》，第296页。
cmlv杨万青、齐春元：《刘亚楼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页。
cmlvi杜青（杨松夫人）：《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cmlvii《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5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页。
cmlviii《王稼祥年谱》，第334-335页；徐则浩：《王稼祥传》，第374-375页。
cmlix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3页。
cmlx《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27页。
cmlxi两书均在建国后重印过，第一版由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cmlxii《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2页。
cmlxiii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其它有关八大的情况也参阅此文。
cmlxiv参阅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61-363页；韦君宜：《思痛录》第一章。
cmlxv《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cmlxvi 2002年8月11日蒋南翔夫人吴学昭回答李慎之提问（系我所托）。另见吴学昭：《韦君宜在“鲜花”中远行》，《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cmlxvii叶永烈：《陈伯达传》，第135页。
cmlxviii（苏联）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11期；马贵凡译，中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cmlxix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88页。
cmlxx（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59页；下册，第1337页。
cmlxx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cmlxxii（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59页；下册，第1337页。
cmlxx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页。
cmlxxiv《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1页。
cmlxxv《斯大林全集》后因反对个人崇拜再未继续出。
cmlxxvi《斯大林传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第135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册，第460页。
cmlxx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初拟稿十一》。
cmlxx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1-52页。
cmlxx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cmlxxx《张闻天年谱》，第658页；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539页。
cmlxxxi《张闻天年谱》，第109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212页。

cmlxxx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页。
cmlxxx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5-316页。
cmlxxxiv《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7页。
cmlxxxv《毛泽东大观》，第688页。
cmlxxxvi《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72页。
cmlxxxvii我在当时记有详细笔记，“文革”中被外交部党委没收未再发还，这里仅凭记忆。对这次震动全军和外交部的大会和毛的讲话，新出的《毛泽东传1949-1976》只字未提。也查不到其它资料。
cmlxxx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8、155页。
cmlxxxix如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30页。
cmxc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除一二〇师的贺龙、徐向前外，其余师以上首长均为原一方面军干部。
cmxci《刘少奇传》上卷，第二十节的小标题。
cmxcii在这之前写就的长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无一处引证毛泽东，只是在1962年修订时才增加了多处引证。
cmxciii《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6页。
cmxciv见《刘少奇传》下卷，第613-614页。
cmxcv《刘少奇传》下卷，第916页。
cmxcvi黄峥：《刘少奇十大功德》，《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cmxcvii以上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99年修订版），第352-353页。
cmxcviii　1970年11月16日接见斯诺时的谈话。转引自冯建辉：《关于个人崇拜的反思》，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cmxcix参阅《陈毅年谱》下卷，第1216-1217页。
m《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mi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谈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另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10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28页。
mii薄一波：《若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81，869页。
miii《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12页。
miv 1944年5月13日《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几次点了太行军区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晋冀豫、冀南等的名。邓小平一直主持一二九师和太行地区的整风审干工作。1943年9月后，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人去延安，邓于10月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直接领导辖区的整风抢救运动，直到1945年6月回延安（参阅薄一波任总顾向的《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附录：《邓小平传略》和《邓小平生平纪事》，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mv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0册，第394-395页。另见李继华：《邓小平最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根源》一文。
mv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页。
mvii这不只薄一波说，彭真自己也承认。他的秘书就说，“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见李海文、王燕玲：《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中华儿女》，2001年第9期）。
mviii我当时在东北工作，只感到东北局改组后东北局面大变，迅速走向胜利。后来听七届二中全会的传达，说毛主席讲，不要给彭真算成路线错误，可以算工作方针上的错误。“文革”后，这段历史又翻腾出来。彭真认为他在东北执行的完全是毛主席的路线，并有一系列电报指示为证。陈云则认为，应维持当年的结论。至于下面干部，也存在争论。官司打到邓小平处，邓说，毛主席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怎么能解决。于是陈云倡议编辑的《辽沈决战》就压下来了。后经妥协，东北局1948年11月23日通过后上报中央，中央批示“完全同意”、含有批评彭真错误的《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就从《辽沈决战》一书中抽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张闻天文集》编辑组）1995年编辑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也没能编入这份张闻天所起草的重要文件。1995年编辑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4卷，虽然收进了这一《决议》，但还是删去了批评彭真的内容。
mix李海文、王燕玲：《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中华儿女》，2001年第9期。
m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312页。
mx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137页。

mxii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转引自《周恩来传》（三），第1393页。
mxiii邓小平说过，我们犯了持续二十年的“左”的错误，“这20年中，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会见门格斯图时的谈话，见198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mxiv见《书屋》，2003年第7期。
mxv章世鸿：《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mxvi《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mxvii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见《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mxviii《在莫斯科共产党和人工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第625页。
mxix如最近上映的电视剧《延安颂》；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所著《爷爷毛泽东》书中一节的标题就叫《刀下留人》，（见该书第270页）。而时任陕晋（实为陕北）省委副书记、参与处理刘志丹一案的郭洪涛却在我们（我和张培森、叶晖南）访问时说，“刀下留人”和“挖好了活埋人的坑”是最大的两个谎言。另见他所写《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见《回忆张闻天》。
mxx见前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内称，毛泽东存款“在50年代即达100万元”。
mxxi见该书第439-440页。
mxxii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7页。
mxxiii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mxxiv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转引自《随笔》，2002年第4期第19页。
mxxv柳亚子诗：“伫看篝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典出《孟子》引《商书》，说商汤征伐，各族人民希望早日解放自己，抱怨被放到后面。
mxxvi如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等。
mxxv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mxx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7页。
mxxix 1889年12月18日致格·特利尔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第471页。
mxxx几位主要领导人1982年6月匆忙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研究和讨论建党以来的历史问题、党的领导和毛泽东的功过问题就只能以此为准（后来连决议中提到毛的过也不能讲了），对个人崇拜的讨论和清算也就嘎然而止。
mxxxi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版，第23页。
mxxxii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过党章第2章，《党的组织制度》第十条第6款。
mxxxiii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中就把专政等同于独裁，虽然指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却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说的“个人专断”。
mxxx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85-86页。
mxxxv邓小平在1978年11月25日一次会上说，“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能不能像对斯大林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见于光远：《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mxxxvi《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页。
mxxxvii引自于光远：《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02页。
mxxxviii《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页。
mxxxix《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9页。
mxl《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mxli《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9，361页。
mxlii 199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mxliii《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mxliv《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4页。
mxlv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35页。
mxlvi见《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10页。
mxlvii《解放日报》，2003年12月22日载文：《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mxl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页。

mxlix以上两项，几乎所有官修党史和得到官方支持（起码许可）的论着、回忆录都持此说。
ml以上引号内的话均为新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分章标题。
mli李维民：《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炎黄春秋》，2002年第8期。
mlii据该剧发起人曾彦修和潘多年的熟人刘英讲，由于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或为求得送审时通过，已经删改了大量史实，如潘的冤案形成，毛泽东不按法律程序的定性、逮捕和关押等，还对二十年的迫害、无端的牵连等，也有意回避掉了，并多少编造了一些不大合乎事实的情节（如潘回延安请示汇报是向张闻天被改为向毛泽东），弄得本来就不够真实，但后面几集还是被完全删去了。
mliii景玉川：《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0年第1期。文中说的富田事变得到平反是没有根据的，只能说酝酿平反和在党史研究中得到平反。文中所说，“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红二十军处置后，‘左’倾领导者”如何如何，显系为毛泽东开脱。实际上，毛是屠杀“AB团”的始作俑者（起于1930年5月，而“左”倾中央上台于1931年1月）和富田事变的制造者。
mliv《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34（第242页）。另见正文第210，217，218页。
mlv《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8页。
mlvi陈铁健：《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禁区—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北京日报》，2002年12月2日，《报刊文摘》，2003年1月6日。
mlvii朱楹、熊铮彦：《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mlviii梁丞：《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
mlix《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它官修党史和领袖传记。
mlx《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lx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连胡乔木当时也承认并非如此。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对外关系的恶果也很厉害。”（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4页）。
mlxii中苏两党论战中，我党批判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文章。
mlxiii吴冷西着，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1999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四号字印行。
mlxiv以上所引均见《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0-351页。
mlx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页。
mlxvi以一批青年作者撰写的《寻找毛泽东》一书（吴方泽等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代表，再加上一时盛行的吟唱老的革命歌曲和群众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某些怀念，曾被一些“左”派人士和宣传部门喻为“毛泽东热”。
mlxvii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146页。
mlxviii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1，329，332页。
mlxix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145页。
mlxx引自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2004年2月23日）。文内称，“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mlxxi“文革”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特权阶层，这是连胡乔木也承认的。他说，“如果承认那些（指我们长期以来对苏联变修的批判）对苏联特殊阶层的分析，那就要承认我们中国也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4页）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邓小平还指示成立一个以胡乔木为组长、宦乡为副组长，由有关机构借调二三十人组建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任务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编写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书名未定）。我也奉调参加了这一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一任务无法完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如果断定苏联变修是出了一个特权阶层（许多同志认为确实存在），那就得承认中国也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苏联。这样写出来的书等于变相批判自己。二是谈苏联变修就必须算斯大林的帐，这又违背我们维护斯大林这把“刀子”的方针。所以最后只好写报告建议解散这个小组。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mlxx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
mlxxi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mlxxiv转引自《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5页。
mlxx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
mlxxv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mlxxv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mlxx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4页。
mlxxix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
mlxxx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171页。
mlxxxi《普列哈诺夫的政治遗嘱》，俄《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中文译载于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辑。编者按指出，此《遗嘱》的真实性“尚有争论”。
mlxxxii党的原则按道理只能要求党员遵守，写进宪法，说明党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
mlxxxiii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有的老领导同志（据说是陆定一）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难道还有无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反自由化”。他没有点那位老同志的名，但后来却对外国人说，“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81-182，211页）。
mlxxxi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
mlxxxv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
mlxxxv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295，297，296页。
mlxxxvii列宁：《论俄国各政党》（1912年5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mlxxxviii本书出版后才看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录》（陈晓农编纂）第130页上说，“《论十大关系》一文是我主动整理的。”并讲了整理过程。
mlxxxix《邓小平文选》，第二册第301-302，306，308页。
mxc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1页。
mxci胡乔木：《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25页。
mxc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
mxciii分别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43页；第八卷，第27页。
mxci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mxc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
mxcv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309页。
mxcvii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29日），《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第167，237页。
mxcvi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
mxcix《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309页。
mc《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mci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8月5日陶铸以老战友的身份致书黄克诚，里面提到，“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转引自冯建辉：《走出个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
mcii由汪东兴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载有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和厨师为毛制订的西餐菜谱，内有铁扒桂鱼、莫斯科红烤鱼、烤虾圭……（共17种）。内无猪肉，系保健医生建议，因猪肉含胆固醇高。另见2003年8月1日《湘声报》载李隆汉：《历史切诫失真》，批李尔重着文说毛主席困难时期“拒绝吃猪肉”；还可参阅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着：《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694-702页。
mciii系马列所课题组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篇）》栏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mciv《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mcv他说，“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直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超过日本，但到1979年前，中国经济就已不到日本的1/4。“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1957年中国分别为日本的140.85%和20.13%。到1965年中国仅分别为日本的78.32%和10.83%。在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比日本低7.3%，人均收入的增长比日本低50%。”（见王柄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73页。）
mcv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5页。

mcvii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7页。
mcviii《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mcix《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mcx参阅《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三十章“林彪事件”。
mcxi见《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1997年3月22日）》，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后收入《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mcxii《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9页。
mcxiii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中就引过这句话。不过毛本人倒是赏识刘邦、朱元璋这类游民出身的皇帝的。
mcxiv见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15-216页。我也亲自听过叶剑英作批斗罗瑞卿传达报告时引用这句词。按辛词原句为“将军百战身名裂”（指汉李陵）。叶改“百战”为“一跳”，指罗瑞卿在挨斗期间跳楼自杀未遂。当时说这是“自绝于党”，故曰“身名裂”。
mcxv例如据《党史文苑》2004年3月载文称，叶剑英主政广州时，公安部逮捕了省市公安局千余人，叶向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罗答：“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后经周恩来说明，也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更为震怒。”此事自然会对叶留下不大好的印象。可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
mcxvi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8页。
mcxvii胡乔木也承认，八大以后毛泽东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只是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4页。
mcxviii见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封底的“简介”。不知罗能否用此称号。
mcxix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19页。按毛泽东在世时，朋友、战友称号只能用于林彪，连周恩来都绝对不能用。
mcxx夏永安：《胡风事件留下的思考》，《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该文据李辉所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另见冯东书：《“犯正确”与“紧跟错”》，《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
mcxxi《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3页。
mcxxii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9页。
mcxxiii黄瑶：《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纵横》，2003年第10期。
mcxxiv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203页。
mcxxv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314页。
mcxxvi李一氓，1925年入党，曾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和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入党。上世纪20和30年代受党派遣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为创造社成员，1930年同潘汉年等组成文委，曾负责同鲁迅联系。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中工作。去世前为中顾委常委、古籍整理小组组长。为夏衍好友，夏的《懒寻旧梦录》（1985年三联书店）即由他题签。
mcxxvii郝怀明：《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百年潮》，2004年第4期第22页。
mcxxvii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第441页。
mcxxix韦君宜：《思痛录》《十六、记周扬》。
mcxxx荣天玙：《周扬与郭沫若的交往》，《百年潮》第2002年第11期。
mcxxxi郝怀明：《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百年潮》2004年第4期。
mcxxxii郝怀明：《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
mcxxxiii郝怀明：《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
mcxxxiv蒋力：《噩梦中的萧三》，《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
mcxxxv早在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就已指出，“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纪念文章多了一些”等。并批评说，“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见《三中全会以来》（上），第507页。）而电视剧《延安颂》以及此前的《长征》等，恰巧同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背道而驰，不但刻意突出毛主席，而且在一些众所周知的著名史实问题上有意弄虚作假（我曾在《同舟共进》2004年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释放刘志丹与痛说三门峡》，对这种现象有所批评）。《延安颂》之类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述（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显然是在对抗中央上述指示，继续宣传个人崇拜和“封建主义遗毒”。
mcxxxv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3页。
mcxxxvi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3页。

mcxxxvii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261页。
mcxxxix《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7，49-51页。
mcxl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5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第二节《四方的盘算》。
mcxli《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二）。
mcxlii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曾在《大河报》上连载，不料中途（2004年2月25日）该报声明："接上级通知此书连载不再继续。"2004年1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即遭查禁（而且既不公开，也不讲道理）。据说起因于某离职大员批评该书"以偏概全"，有些事与事实不符云。
mcxlii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
mcxli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6-401页。
mcxlv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2页。
mcxlvi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mcxlvii见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
mcxlviii见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总纲"。
mcxlix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1月12日）。
（2004年5月完稿）
mcl毛泽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年9月15日）。
mcli《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通过），"序言"。
mclii《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页。
mcliii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mcliv王永治专访李锐，见《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第21版。
mclv见《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
mclvi《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95页。
mclvii见前面三篇《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mclviii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73-174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113页谈到个人崇拜分正确和不正确两种，因系提纲，没这句话，但意思是有的。
mclix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胡耀邦》，见张黎群等主编：《怀念耀邦》第一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mclx沈宝祥：《直面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学习时报》，总第239期，2004年6月14日。
mclxi《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5页。
mclxii《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2页。
mclxi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769页。
mclxiv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1页。
mclxv见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
mclxvi《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5页。参阅毛泽东：《论新阶段》第7章第10节"党的民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2-653页。
mclxvii《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mclxviii《六大以来》（下），第208页。
mclxi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mclx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1页。
mclxxi《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集》第二卷，第329页。
mclxxii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集》第二卷，第329页。
mclxxiii据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政府系统人员在长征时的去留由李维汉拟定名单。张曾建议带瞿秋白走，遭博古否决。李维汉附和说，带上是累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没说话。（1999年1月28日采访刘英的谈话）。
mclxxiv参见余焕春：《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mclxxv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
mclxxvi见《彭德怀年谱》，第790页。

mclxxvii《共产党宣言》的原话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
mclxxviii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61页。
mclxxix《共产党宣言》中就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政党。"又说，"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4页和第285页。
mclxxx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取缔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政党，只留下布尔什维克执政。斯大林更在理论上提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7页）。
mclxxxi像巴黎公社那样。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5页。
mclxxx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mclxxx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1，82，84页。
mclxxx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1页。
mclxxxv以上有关俄共的情况，参阅尹彦：《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书摘》2004年4月号曾予摘要发表。
mclxxxvi分别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5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第83页。
mclxxxvi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426页。
mclxxxviii见《八七会议记录》和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一）》序言。转引自叶永烈《毛泽东之初》，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和74页。
mclxxxix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7页。
mcxc《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
mcxci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201-202页。
mcxcii辛子陵：《毛泽东全传》（新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61-362页。
mcxciii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3页。
mcxciv《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91页。
mcxcv毛泽东1941年10月13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32页。
mcxcvi见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共中央信》有关党内民主生活部分。参阅汤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53页。
mcxcvii《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问题》（1928年1月30日）。
mcxcviii《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瞿秋白选集》，第436页。
mcxcix《六大以来》（下），第7页。
mcc《张闻天选集》，第54-55页。
mcci《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158页。
mccii以上情况见《六大以来》1980年版的"出版说明"和目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31-34页，"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另见有关皖南事变的各种研究资料和回忆录，如李一氓：《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人物》1992年第4、5、6期）；房列曙：《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等。
mcciii《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六大以来》（下），第241-24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144-147页；《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1950年版，第131-134页。
mcciv《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426-436页；《整风文献》，第135-144页。以下引语，未注明的，均出自该决定。
mccv《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1页；另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经政治局批准），《六大以来》（上），第1169页。
mccvi《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整风文献》，第140页。
mccvi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268-269页；《周恩来传》（三），第1396页。
mccviii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mccix这是薄一波的分法。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09页。同书第719页上承认，"'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并在第688-689页中讲了谭震林的浮夸。
mccx《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mccxi（苏）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中译本第一卷，第87页。
mccxii《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7-119页。
mccxiii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85页。
mccxi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mccxv曾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田纪云就说，农业合作化，“实际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这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中国的合作化“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只是我们的办法“比苏联把农民挖得更苦”。见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mccx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4页。
mccxv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9页。
mccxviii《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9页。
mccxix《做什么》“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列宁选集》第一卷，1972年第2版，第347，348页。
mccxx《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mccxx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mccxxii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79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66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944页。
mccxxiii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mccxxi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21页。
mccxxv《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第34-57页。
mccxxvi例如《共产党宣言》中就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政党。”“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1888年英文版为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64页。
mccxxvii宋庆龄1979年2月写给美国友人的信。转引自《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童怀明：《也谈宋庆龄为何不葬中山陵》。
mccxxviii见《法兰西内战》和《共产党宣言》。
mccxxix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43页）等书。
mccxxx《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90-96页。
（2004年7月完稿）
mccxxxi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9页。
mccxxxii这是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在中山大学所作的报告，经向警予整理成册，油印出版。
mccxxxiii这一报告作于1927年9月，后来刊登在北方局办的《顺直通讯》上。
mccxxxiv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张闻天1936年在红军大学的讲义，是受中央委托编写的，第二年即铅印出版。曾经是建国前各解放区各类学校通用的重要教材，为好几代革命干部所学。
mccxxxv胡华：《读张闻天编着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419页，附介绍文章二。
mccxxxvi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0页。
mccxxxvii毛泽东为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和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3，223-232页。
mccxxxviii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0-13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1页。
mccxxxix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26页。
mccxl《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
mccxli当时说明是“原则通过”；七届一中全会1945年6月19日讨论决定继续修改，8月9日一致通过，但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又作了重要修改。
mccxlii指1940年10月前后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有“日蒋联合夹击我军”的危险，因此计划先发制人，抽调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的后方河南、甘肃等地去。经请示，莫斯科不同

意。随后的皖南事变更加深了这一分歧。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章《政策分歧的由来》；郭德宏主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第223，225-226，237页；（德）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版，第54-56页。
mccxl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页。
mccxliv叶永烈：《胡乔木》，第39页，记谷羽的回忆。
mccxl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5页。这虽属别人的代拟稿，但经他本人审过。
mccxlvi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于1942年3月，4月被毛泽东指为“托派”后，才遭到围攻批斗。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mccxlv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175页。
mccxlviii分别见《六大以来》（下），第147和210页。
mccxlix《任弼时年谱》，第380页。
mccl见《任弼时年谱》和《陈云年谱》（上）。
mccli《任弼时年谱》，第406-407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页。
mccl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页。
mccliii《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26页。
mccliv康生在1943年9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4页。刘少奇9月21日才阅读王明小册子并写阅后感。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1页。
mcclv毛泽东：《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1941年九月会议前），另见1942年2月21日致周恩来电；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32页。
mccl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6页。
mcclvii《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大以来》第1183-1184页。
mccl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2、49、48页。
mcclix这是1965年5月毛泽东为他“九篇文章”定稿时确定的时限，标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4页。
mccl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
mcclxi有关文电，参阅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章《血战河西走廊》。
mcclxii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197页和240页“注19”，1991年版，第198页。
mcclxiii《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97页。
mcclxiv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53页。所提李文林，原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后被当作AB团遭捕杀。
mcclxv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15，323页。
mcclx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1-182页。
mcclxvii参阅许全兴：《为毛泽东辩护》，第186-19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mcclx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6页。
mcclxix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也把建国后称做中共党史学的“成型期”。不过它把这个时期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就不免太长了些。所提“主要标志”也显得散乱，特别是对被视为“新中国第一本开创性的党史简明读本”（《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编后记》）和“公认的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重视不够。
mcclx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mcclxx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mcclxx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页。
mcclxxiii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mcclxx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8页。
mcclxxv《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第625页。
mcclxx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mcclxxvii参阅（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第1336-1338页。
mcclxx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0页。
mcclxxix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cclxxx例如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页；毛泽东1943年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
mcclxxx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146页。
mcclxxxii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同舟共进》，2004年8期。
mcclxxxiii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和158-184页。
mcclxxxiv邓小平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还说，“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
mcclxxxv《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5-306页。
mcclxxxvi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5页。
mcclxxxvi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mcclxxxviii《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页，同邓力群、吴冷西的谈话。
mcclxxxix《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mccxc《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8页。
mccxci《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9，751页。
mccxc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3页。
mccxciii凡出自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引语，均不作注。
mccxciv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
mccxc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4页。
mccxcvi邓小平就把农业单干称之为“飞跃”。他说，“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mccxcvii转引自王柄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原注出处为“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
mccxcviii《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页。
mccxcix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页。
mccc《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85页。
mccci原为刘少奇“七一”报告起草，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以胡乔木本人名义发表。
mcccii《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与拓展》，《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5日；另见李铁映：《在〈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年5月22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后记》。
mccciii见张静如、廖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
mccciv胡绳：《纪念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载《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mcccv以上见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54页。
mcccvi胡绳：《纪念胡乔木同志》。
mcccvii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89，208页。
mcccviii我同胡乔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些接触。一是他在莫斯科养病时常找我这个使馆研究室主任谈点国际问题和苏联情况，后来还通过信。二是我回外交部工作后曾有几次被找去起草有关外交的文件。另外，1979年我还是他所领导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的成员。
mcccix《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与拓展》。
mccc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79页。
mcccx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mcccx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7页。
mcccxiii《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mcccxiv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回忆胡乔木》，第3页。
mcccx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5，109页。
mcccx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
mcccxvii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85-86页。
mcccxviii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mcccxix叶永烈：《胡乔木》，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mcccx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2页。

mccccxxi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287页；叶永烈：《胡乔木》，第141页。后来他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又批评毛泽东1957年后，“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风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68页。）
mccccxx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页。
mccccxxiii 1991年11月7日的谈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
mccccxxiv 1980年7月18日的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mccccxxv分别见程中原：《邓小平一锤定音胡乔木再度复出》，《中华儿女》2004年第7期；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mccccxxvi吴江：《十年的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97页。
mccccxxvii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
mccccxxviii《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1页。
mccccxxix据李锐转述胡耀邦的话说，他在中组部工作任上时，中央要撤换张平化的中宣部长，让他推荐人，他就提了胡乔木。“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枝笔。”（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但后来有些人把胡乔木说成“中共第一枝笔”，恐怕讲不通，因为还有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
mccccxxx 1999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载《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
mccccxxxi《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
mccccxxxii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1943年1月26日《解放日报》，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三卷时标题改为《报纸是教科书》。
mccccxxxiii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64页。
mccccxxxiv见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10页。按，当时陆定一任部长，胡乔木任常务副部长。但据于光远说，常常是乔木主持会议，定一参加。
mccccxxxv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01，235-237页。
mccccxxxvi于光远：《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见《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mccccxxxvii《胡乔木通信集》，第293页。
mccccxxxviii《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3-214页。
mccccxxxix《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页。
mccccxl李锐的文章题为《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登在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回忆张闻天》一书中，发表时作者照顾到胡乔木的意见不能不略有修改。
mccccxli胡乔木1985年5月6日在南长街家中接见“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培森、施松寒的谈话。原有录音，他看到后发了脾气才关掉录音机。
mccccxl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mccccxl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48页。
mccccxl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5页。
mccccxlv原载1938年《七月》第十期。1981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时竟将此句删掉。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时也只说“根据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印”，隐瞒了作者去世后擅自删改他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的作法。
mccccxl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25，294页。
mccccxlvii《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1页。
mccccxlviii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21页。
mccccxli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9页。
mccccl《胡乔木书信集》第311页。按费文不但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为“历史本来面目”，而且批驳了张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还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的说法。
mccccli详见本书第二篇。另见《遵义会议文件》，第73-74页。
mcccclii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第608-609页。乔木紧跟陈云，事例很多，如陈云1989年提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我看，没有过时”（《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0页）。胡乔木随即响应说，《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和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的基本论断，至今仍然适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670页）。
mccccliii严秀：《依然是“论中出史”还是“史中出论”的老问题》，见《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mcccliv《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mccclv《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2002年版，第491页。有的书上说是根据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但是若相信这种个人崇拜高潮时期的说法，那也应承认江青是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和鲁迅相提并论的两大旗手之一了。
mccclv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页。
mccclvii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519页。
mccclviii马长虹：《李先念关于西路军的一封信》，《北京日报》，2004年8月23日。
mccclix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19页。
mccclx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
mccclxi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
mccclxii《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78，303，274页。
mccclx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8页。
mccclxiv此处及以下情况，参阅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82-184页。
mccclxv对此，上引于光远书中也说，胡乔木整理时"加工可能多了些"。再举一个小例子，《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指示》。《党史资料》原先所载，有对齐白石、陈半丁、徐悲鸿、刘海粟的评语（说齐陈"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而且"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只有徐悲鸿、刘海粟"学过西洋画法"。见《毛泽东大观》，第666页）。在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5页，还注明"根据手稿刊印"）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19页）时却把这些给删掉了，弄成了两个版本，一看就会感到后者可能是造假。
mccclxv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7页。
mccclxvii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5页。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第70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88页。
mccclxviii《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页。
mccclxix以上见《胡乔木谈中央党史》，第217-218页。
mccclxx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4-215页。
mccclxxi《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6页。
mccclxxii《周恩来传》（四），第2139-2140页。
mccclxxiii见《百年潮》2003年第12期，第4页。
mccclxxiv《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页。
mccclxxv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2002年版，第402-403页。
mccclxxvi转引自瞿东林：《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载2003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mccclxxvii笔记本一事，《王明评传》等材料均有披露。因为对王明，中央一直不予放过。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要他写一个历史错误的声明书，他拖着没写。1950年三中全会又作出专门决定，批评他的态度和重申要他写声明书。8月17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笔记本，未果，10月即去苏联治病。
mccclxxviii据说，实因毛讲话声音小，为使大家听清，中办给开会处安了个小扩音器。
mccclxxix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见1967年第九期《红旗》社论的引证。
mccclxxx《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mccclxxxi如《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31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08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95页；《中国共产党简史》，第38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92页；等等。
mccclxxx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9页。
mccclxxxiii《张闻天选集》，第509页。
mccclxxxiv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简史》。
mccclxxxv《王光美谈话记录》，1994年，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31页。
mccclxxxvi以上分章标题分别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以及《毛泽东传1949-1976》。
mccclxxxvii毛泽东：《致雷经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0-111页。
mccclxxxviii《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43-244页。
mccclxxxix见张劲夫：《我也是个"两头真"》（《炎黄春秋》2004年第11期）；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中之一节，《从"惑而不解"到"粗知天命"》。
mccccxc全名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为省事，文中一律简称《红太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mccccxci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百年》总第4期，1999年七月号。

mccccxcii见本书第七篇《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再思考》。
mccccxciii见《红太阳》第135，91，229，146页。
mccccxciv对张闻天上述评论，见《红太阳》，第91，92，143，194等页。
mccccxcv见《红太阳》，第164，167页。
mccccxcvi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4页。
mccccxcvii分别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三版，第36，35，39，56页。
mccccxcviii参阅该书的《谈话录》部分，第46，47，49，75，27，45页等。
mccccxcix上述引文分别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第43，77，97页。
mcd见王若水同书，第42，112-113页。
mcdi《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mcdii 1929年柳亚子在《存殁口号》一诗中写的“并世支那两列宁”，原注：“为孙中山、毛润芝”。1932年得知反“围剿”胜利后，他又写《怀人四截》一诗，内“登坛旗鼓看毛郎”，自注也是“毛润芝”。
mcdiii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21，595，606页。
mcdiv见《红太阳》，第104页。有关这个问题，延安整风就已搞清楚了，任弼时也为此作了检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还特别对此作了交代（该书第70页）。
mcdv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35页。
mcdvi见《红太阳》，第105-108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2-25页。
mcdvii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第55页。
mcdviii见上引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mcdix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第35，66页。
mcdx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日记。见《〈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时间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mcdxi中文译文见《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mcdxii毛泽东1948年9月28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见《环球》杂志2002年第24期姜长斌文。
mcdxiii《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报告》。原为苏共档案，中译文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mcdxiv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mcdxv《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1页。
mcdxvi有关胡先骕事件，见《同舟共进》2002年第7期。
mcdxvii严秀《半杯水集》，第6页。
mcdxviii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9页。
mcdxix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新版）说，“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见该书第一卷下册，第729页）其实，我们当时在延安已作了打出去的动员。
mcdxx《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11页。
mcdxxi《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
mcdxxi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cdxxiii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的分章标题，另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mcdxxiv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2页。文中还说，“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2004年12月6日完稿）

“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

何方

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已谈论了50年，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几乎早已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现在还来谈它似乎有点多余。其实不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来就有分歧，认识并没统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并未吸取教训，以致于到现在造神造假运动还盛行不衰，因此仍有必要将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始于“延安整风”时期。笔者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本文的讨论既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结果，也结合了当年对“整风”运动观察的体会。

一、如何理解个人崇拜？

中国1999年版的《辞海》对个人崇拜的定义是："神化个别人物并加以盲目崇拜的现象。"应该说，这一定义并没有错，只是定义后面的释文不尽完善。比如释文说，"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它作为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1]"，这一说法违反史实，因为"被剥削阶级"也经常利用个人崇拜，农民起义领袖就是如此。如果以过去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那么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反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吃个人崇拜的亏要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这既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对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包括各国内部的专制独裁及个人崇拜。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崇拜，更多地属于国家体制问题，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实际上列为禁区的原因。

个人崇拜是个外来语，有时也被译成个人迷信。这里所说的崇拜（cult），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崇拜祖先、崇拜名人等含义，而是指对崇拜对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此外还有巫术治病、会道门、邪教等含义[2]。但在中文里，似乎个人崇拜一词负面的含义弱一些，而个人迷信一词的负面含义则严重得多，为政者往往依据政治上的需要而选用不同的词。例如在讨论和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领袖形象，胡乔木就特别提出，"决议稿中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3]"至于究竟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含义有什么不同，他没有说。其实，胡乔木声称"马克思的原话"是"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不过是一种故意曲解。马克思并不懂汉语，如果最早将马克思使用的这一德文或英文词翻译成中文的译者选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汇，那么"个人迷信"不就成了马克思的"原话"了吗？虽然现代汉语里出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两个平行的可以互换的词组，为政者有时出于政治需要在不同的场合时而用这个，时而用那个，但这两个中文词在英、德、俄等外文里对应的是同一个词，从中文译成外文时，中文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只能译成外文中的同一个名词。

据我所知，在中国个人崇拜（或译为"个人迷信"）的提法盛行于上一世纪的50年代，是由苏联传到中国的。1951年至1955年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对当时的情况稍知道一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同年7月起开始公开批判和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当时中国驻苏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及时注意到这一动向，随即由萧扬执笔写了一篇"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被中宣部摘登于翌年的《宣教动态》第3、4期上。此后研究室又连续就苏联舆论大反个人崇拜的动向给国内写了"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有几份还由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署名报送党中央。这就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毛泽东于1954年4月28日就"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一文作了批示[4]，刘少奇将此文以中央文件或中办文件的形式发给县团

级以上干部阅读。从此，中国的报刊也开始谈论起个人崇拜的问题了。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将俄文中的这个词译作个人崇拜。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用的也是个人崇拜这个中文词[5]。然而，当中共中央开始就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发表意见时却改用了“个人迷信”这个中文词。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公开后，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其中后者系胡乔木起草[6]），文中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时用的就是“个人迷信”这一表述，此后直到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时，仍然是用这个词。中国官方对斯大林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用不同的词，对斯大林用“个人迷信”，对毛泽东则改用“个人崇拜”，虽然显得亲疏不同，实际上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这也说明，中国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继续保留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说法”，并把崇拜和尊敬、信仰、服从等混淆在一起[7]，他公开声称：“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8]”毛泽东为个人崇拜辩护，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对他本人的崇拜。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已为此后直到“文革”时期的宣传和实践所证明。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一言既出，个人崇拜就先在党的领导层后在全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就在“成都会议”上，个人崇拜的积极制造者之一陈伯达听了毛的插话后立即说，“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9]”而作为“封疆大吏”的柯庆施和陶铸等在发言中竟提出这样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胡乔木后来回忆，“这是成都会议上正式提的口号，当时就没人敢反对，提出者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时李锐对这一提法不以为然，去向毛泽东反映，但毛却用“他们是有所指的”之托词搪塞了过去[10]。正是在这个口号（迷信和盲从）所体现的政治环境里，毛泽东掀起了“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使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数千万人这样的空前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这种惨剧也证明了“个人崇拜是正确的”这一“说法”的荒谬。

现在，虽然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还颇盛行，但敢于说个人崇拜完全正确的人却已经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了。然而，个人崇拜的研究在中国仍属禁区，所以国内这方面的材料不多，有些谈及这个问题的着述，也大多说不清楚。例如涉及这一问题的书有《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1]，但它们并未回答毛泽东究竟是何时“走向”、“走下”“神坛”的，更未解释怎样才算“走向”或者“走下”……新近故去的党史专家冯建辉写了《走出个人崇拜》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在建国初期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是到60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后来牧惠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如何'走出'？”一文，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承认这是国内“头一本探讨这类问题的书”[12]。这既说明国内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说明至今还未明确什么是个人崇拜的特征和标志。

国外有关个人崇拜的研究很活跃。最近墨西哥的一家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领袖的真实与神话”的文章，作者自称“研究了学术与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领袖的350种理论……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有关领袖的一些最普遍的神话”[13]，他们认为，领袖神话往往把领袖说成是天生的天才人物，有常人没有的超凡本

领和魅力，可控制和操作一切等等。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外国的相关研究，即便是分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能也未必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因为国际共运和中国当代的个人崇拜，固然与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或至今还存在的个人崇拜有许多共同点，但又有它们自己的特征，这与它信奉或宣布信奉马、恩、列、斯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对这些理论不太了解、又缺少档案可查且无实践体会的人，是不大容易研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中的某些奥妙的。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包括中国人在内）总是说不清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起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虽然很早就开始作一点理论方面的工作，但多属一知半解，而且对党史又远非内行，所以下面试图归纳的几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标志或突出特点，只能是管窥蠡测之见，抛砖引玉而已。在我看来，这些特征或标志主要有或必须具备如下几条：

一是对领袖的神化、迷信、盲从和狂热追随。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就要把崇拜对象宣传得一贯正确、无比英明和伟大，还要为他隐恶扬善、伪造历史、贪人之功、诿他之过、拔高“伟人”、矮化别人等等。

二是被崇拜对象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实际上所谓的个人崇拜就是对个人权力的崇拜。权力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基础，小权可造成小崇拜，大权能造成大的崇拜，没权则闹不成，象汉朝的刘盆子和伪满的溥仪就只能充当傀儡。共产党里的被崇拜对象必须拥有最高的党、政、军权，特别是人权，对一切人（主要是干部）可以任免奖惩以至生杀予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礼记》上说的“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使臣民把信服和畏惧结合成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定式。否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成为被崇拜的对象。

三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个人崇拜不仅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口头上的虚词。因为个人崇拜归根结底是个体制问题，它在政治方面实际上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朕即党、朕即国家。作为党国领袖，他可以独断专行，让整个社会生活跟着他的意志转；他的想法和行为不讲法度，无规矩可循，使其他领导人及各级干部以揣摸他的意图为第一要务，民众则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随大流，都只能盲目跟着走。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禁止言论自由、取消干部民众的知情权。建立个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致于制造群众的愚昧，因而不重视发展教育，不普及科学，轻视知识分子，提倡少读书以致于不读书，遍设禁区，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领导人的活动严格保密。很明显，如果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又能了解领导人的活动和国家大事，个人崇拜就很难建立起来了。试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若民众知道领导者一方面大造豪华别墅等奢侈情况，一方面又弄虚作假，宣传领导者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民众会有何感想？如果民众洞悉领导者的政治活动以及家庭和生活情况，他们会心悦诚服吗？

五是允许和鼓励各种迷信言行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宣传和仪式。例如喊“万岁”、“万寿无疆”、“人民大救星”等口号；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宣传没有“大救星”的拯救，“中国人民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云云；或者学了领袖的观点甚至只是语录，人们立刻就能创造出奇迹、实现各种发明创

造等；此外还推行宗教式的活动，如广修庙宇（名曰“纪念馆”之类）、对“革命圣地”的“朝拜”“瞻仰”等，更不用说“早请示、晚汇报”及其他弄神弄鬼的事了。

六是还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结合，包括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各级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传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严格的等级制和法定、非法定的特权制等等。

关于个人崇拜的特征，还可举出一些。上面所列几点也不一定准确，甚至还相互重叠，但这都不妨碍我们对个人崇拜的定性和研究。

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于何时？

毛泽东曾经推行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这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已是铁板上钉钉，没人能否认的了。然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其为害程度有多大，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却仍然存在着重大争论，实质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期说得短一些，无非是要淡化它的为害程度。所以也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底延续了多久，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内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政治上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央决议上的说法了，正式的党史教科书自然不会越雷池一步。

关于个人崇拜开始的时间，中央决议上的提法虽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指1956年以后。它在讲到"文革"前10年的党史时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14]"。按照这层意思来理解，既然在"这个时期"（50年代上半期）个人崇拜才刚刚开始"逐步发展"，可见以前是没有个人崇拜的。于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并且是逐渐地开始）于1956或1957年的说法，就在党史界占据主流地位了。全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和多数民间的党史著述都持此说，其中不少还断然否定此前存在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如此，有些书籍和文章甚至还大讲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谦虚谨慎和民主作风[15]，其根据无非是毛泽东的个别言论以及毛曾一度允许其他领导人提不同意见。还有些人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定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有的甚至说只是产生于"文革"时期，而且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所为。

强调建国初期毛泽东十分谦虚谨慎的人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50年代曾"力排众议，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16]"。"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确系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但他并未"力排"实际上不曾存在的"众议"。至于毛泽东那时为何有如此"想法"，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有非常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17]"当时，不只是苏联对中共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采取如此态度，整个国际共运阵营都是追随苏联的；何况，国际共运阵营内已经发生过批判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将南斯拉夫排除在国际共运之外的先例，毛泽东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才产生了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念头。他在1950年8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二卷时就正式建议作若干修改，"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这些"修改"中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的用语一律删去；二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18]"

毛泽东建国后是否确实"谦虚谨慎"、"率先垂范"[19]呢？要了解这一点，应根据以他个人意志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改变态度表示支持）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判断。这样的事例包括支持朝鲜战争、放弃《共同纲领》、实行"穷过渡"（从尚未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事例基本上都否定了所谓毛泽东建国后"谦虚谨慎"的说法。再从下面的

两个小例子来看，毛曾“谦虚谨慎”的说法也不攻自破。其一是在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毛泽东自己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一条[20]（正式发布时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21]）。其二是在1953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民主人士梁漱溟批评中共革命胜利后“忘掉”了农村、不重视提高农民地位和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以党和国家主席之尊多次用近乎破口大骂的方式批判梁漱溟，并正式表示，“我声明，确是‘拒谏’”[22]。事实上，正是靠农民运动起家、在同梁漱溟的论战中自称“代表农民”的毛泽东，用“统购统销”特别是“户口制”的办法，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变成不能进城的“二等国民”，制造了城乡隔离的制度壁垒，人为地阻碍了现代文明重要条件之一的城市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等社会目标。这一切所造成的恶果十分明显。从30年后梁漱溟带有自责性的话——“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看来，在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当面争论一事上，梁漱溟的“雅量”显然比毛泽东高得多。单就这两件事而言，能说毛泽东建国初期是“谦虚谨慎、率先垂范”吗？

那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起于何时呢？寻根溯源，查证找据，还只能定在“延安整风”时期。若以上面提到的有关个人崇拜的种种特征来衡量，“延安整风”不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正式开始，而且为中共的个人崇拜体制奠定了牢固基础。

中共建党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曾保持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政治传统。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已经确定，但并不巩固，也未公开，在延安讲演或见报时，毛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一律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所以一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1942年听陈云报告时说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时，还觉得“特别新鲜，因为在此之前邓力群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23]”。

然而，从1940年起，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共以往的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被打破了；而“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就把这个传统彻底抛弃了。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担任校长，该校规定了“泽东日”，从此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而且不断升温。最早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吹捧毛泽东的讲演，题为“学习毛泽东”。此稿经毛看过后刊登在《新中华报》上，文中除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外，还第一次给毛加上了“伟大的理论家”的头衔[24]。此后，在延安地区宣传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和新闻就日渐增多，在这方面比较活跃的是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25]，此后张如心就被调任毛泽东的个人秘书。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又连载了张如心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一步谈到“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同年7月1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著文论及“毛泽东主义”。

总之，自从1940年中共党内打破了不突出领导者个人的传统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就日益普遍。在这些宣传中，以后人们常用的“领袖”、“导师”、“舵手”等称呼和“一贯正确”以及其他夸功掩过的阿谀之词不断

出现，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蔚然成风。中共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因此这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皇权主义传统和国际影响下制造出个人崇拜。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出现有很大的必然性。

三、个人崇拜是如何营造起来的？

1.“延安整风”政治上的准备

“延安整风”之初，延安的政治气氛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党原则和党章来看，“延安整风”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整风运动”之发动起于毛泽东个人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而这一报告似乎事先并未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3至4年的大事，理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一次）讨论决定，起码也应经中央全会通过；何况当时大多数六届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举行党代会或中央全会批准“整风”运动之实施，可谓易如反掌，然而当时的党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不管它们是否有权过问，与“整风”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显然未经过它们讨论（例如，毛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没说是代表政治局或书记处，而是“我主张”）；有些事即使经过了政治局或书记处，也只是走个形式，仅用其名义而已（实际上“整风”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均陷于瘫痪状态，于是指定了个如同“文革小组”式的“总学委”来负责“整风”事务）。所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上一再说，“毛主席认为”（而不是党中央“认为”），进行“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云云[26]。显然，整个“整风运动”的部署、变化，如学文件、写笔记、查历史、搞“抢救”等，无一不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可以说，“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具体领导的，它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毛的独断专行、以人划线和个人说了算奠定了基础。

其次，原先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的会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长达3到5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代表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党章党规，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论过去10年内战的问题”之指示[27]，也违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有关决定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当时中共中央的解释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28]”也就是说，中共“七大”何时开、如何开、谁能参加，不决定于中央全会或大会筹委会，而是毛个人说了算，他认为要什么时候开就只能什么时候开；若代表们的“认识”未“统一”到毛泽东满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开“成功”。

再次，党内高层出现了一系列违背党规和党纪的不正常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设立了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总学委会”，并在其下设立垂直系统，于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例如，彭真当时连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都不具备，却被任命为全党高干“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主管，他还取代政治局委员陈云而成了中组部长，甚至负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并列席政治局、书记处等所有中央会议。原先在中央无任何地位的高岗，则突然成了西北局书记，与彭真一样成为“总学委”成员和“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列席各种中央会议，人称“西北王”。

2.“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和培养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并非“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当时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而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延安“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1940年前后就改变了讲授内容，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而是以讲《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延安的学校也大多从1940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马克思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29]。而“延安整风”学习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30]等，这种把经典理论视为只能信守不能怀疑的看法，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王若水生前在一篇题为“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的文章中提到：“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31]”这种看法其实是并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以讹传讹。王若水以及其他许多人类似的看法，显然是受长期以来党史编纂学关于“延安整风”是清算王明路线、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一后来才有但并不正确的说法的影响。

事实上，“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一再申明自己忠于“共产国际”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并非虚应故事。“延安整风”开始后，在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一直是及时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多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纠正毛泽东某些“左”的错误和冒险倾向，如制止国共关系破裂、缓和“整风”斗争、刹住“抢救”运动等问题上，“共产国际”都起了积极作用。“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整风文献》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份就是斯大林的理论（以《联共党史》为代表），还有“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实际上代表着苏共和斯大林的意志，中共既然在“延安整风”中组织大规模的学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当然不可能以“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为目的。

至于说“延安整风”是为了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大约也是解放后的党史编纂学才提出来的。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但在延安，就是在这次“整风”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没听说过有个所谓的“王明路线”。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王明路线”这个概念；直到“延安整风”之后的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32]，但这一说法并未传达给延安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至于所谓的10年内战中的“王明路线”和“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样的提法，是50年代编辑《毛选》时修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之后才逐渐定型的。

“延安整风”远离“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继承和发展了红军时期轻视书本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党内只要集中和纪律，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思想自由。按照中共领导层当时的看法，知识多了，思想就会变得复杂，不如工农干部那样思想简单，容易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后来干脆说“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根子。

从“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内容和当时的实际作法以及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整风”其实就是要把延安以及党内的一切党员干部培养成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恰如李维汉所说：“整风的主要收获是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33]（指红军到达陕北前的老干部和此后参加革命的新干部）。”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新老干部中，不说全部，起码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崇拜毛泽东和“听毛主席的话”的驯服工具。这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得出来：“延安整风”前我们在生活会上批评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往往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下来就数他了；但“延安整风”后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大林下面还有个毛泽东。

3.“延安整风”的结果：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

“延安整风”后，党内建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原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帮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34]”换言之，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成了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员、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却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则于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35]。张闻天倒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说一直未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他们的历史旧账，让他们检查，这两人从未在“整风”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诸如此类的人事安排，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

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中共“七大”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著名将领陈赓提出：薄一波是从监狱办“自新”手续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建议从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毛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的这个意见被传达给参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团，结果薄一波反而改为正式中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36]。

以上事例说明，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排队，紧跟毛的就是正确的，与毛意见不同就算犯了错误。“延安整风”刚结束时，包括刘少奇等书记处成员在内，凡有不同意见，

倒还允许提出来，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数人有不同意见，也只好放弃。但建国以后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毛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

“延安整风”除了在组织上作出“一元化”的决定外，还做出授予毛泽东有独断专行特权的安排。1943年3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党中央在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说大政方针由政治局讨论，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权”只涉及日常工作，实际上此后大事不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吗？刘少奇这一旨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建议不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直接违反不久前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字号（3）{37}，为党的领袖在党内的独断专行披上了组织制度上合法的外衣，从而使全党服从于一人，正式开创了个人崇拜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再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跟着毛泽东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毛泽东对大家有所不满时，就带着党章和宪法来参加会，说是要维护他的发言权，把大家训了一顿，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顶撞；而当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拿着宪法、声称他是国家主席，以此对抗“造反派”的批斗，却丝毫未起作用，他终于作了个人崇拜体制下的殉道者。陈云曾经设问：“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笔者注：意为敢于提不同意见），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他解释说：“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38]”

4.“延安整风”后建立起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

个人崇拜所要求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不但领袖和领导集团的活动以至日常生活都处于神秘状态，而且有关党国大事、国内外形势的报导和评论都要层层把关，社会新闻则实际上被取消。例如，1942年4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曾刊登一条“党校一学生失恋自杀”的消息，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39]。其实，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刚在延安创办时还保留了普通媒体的一些特点，人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信息，而且还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国际消息也比较多。我就是每天风雨无阻地到报社门口看报上有关苏德战争进展的报导的。可是“延安整风”后情况大变。毛泽东在报上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后拍案大怒，“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深刻检查。[40]”于是决定让《解放日报》改版，从此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主要功能不再是为大众提供各方面信息的传媒。那时报上连篇累牍的刊登关于“整风”的报导，还有对王实味等人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再就是一些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检讨。再往后就是“肃反”与“抢救”运动的报道充斥报端。例如，在官方党史学一再重复毛泽东下令停止“抢救”运动[41]后的一个多月，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报》还连续刊登了“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

机关万恶罪行”的报导。当时并没听说毛泽东看了诸如此类的消息后发脾气或拍桌子，反倒是绥德地委组织的宣讲团被邀请到延安给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我就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听过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来的一些小孩们的“坦白、控诉”，并且看到台上坐着中央首长。

“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延安地区的其他报刊基本上都停刊了，连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墙报也都消失了。因为先前党中央发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实际上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随意发言起码是属于挨批的“自由主义”或“小广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党和政府接受舆论监督，相反却是由党中央直接掌管和监督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一切新闻报道。按当时的规定，报纸的通讯员由党委设置，有关各地的消息报道原则上也必须经当地党委同意[42]。在加紧控制报纸（当时无广播，一切新闻均靠报纸）的同时，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仅不再印行各种期刊和一般书籍，而且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和材料。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整风”开始不久，特别是开展“审干肃反”（“抢救”运动）后，前几年很活跃的各种学习和学术活动及其组织形式如讨论会、上大课、研究会等即完全停止了。从此，延安的生动活泼时期宣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坚持强调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被“舆论一律”所替代。

舆论控制必须辅之以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也是现代个人崇拜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在个人崇拜的后面必然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信息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个人崇拜也就坍塌了。斯大林当年在苏联被崇拜得胜过神仙，他死的时候莫斯科简直是哭声震天，为向他的遗体告别而拥挤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他不下于历史上任何独裁者的专制暴虐、杀人如麻的真相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急转直下，等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列宁墓埋葬别处时，在人民当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动。同样，如果中共的许多档案未被销毁，能公诸于世，恐怕中共党史就只能重写了。

以“延安整风”而论，一开始就弄得很神秘。上层“整风”当时就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1941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就明确规定：“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否则就不能编入学习组[43]。所以象我这样的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中下级一般干部，不但在当时、就是到了现在也不大了解上层“整风”的情况，即使作专门研究，有些问题也还是弄不清楚，更不用说当时未参加过“整风”的人和后世的人们了。大家对“延安整风”的了解只能参照党史教科书上所言。甚至有些过来人，包括“审干”、“肃反”中被长期关押和受刑的人，也都误信“抢救”运动是所谓“康生发动和执行的，毛泽东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可见，现代的个人崇拜，特别是过去和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必须对许多问题严格保密、设置禁区。“延安整风”中叫得最响的是”实事求是”，但那时却对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对长征结束后西路军的被歼等历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伪造历史。这种口头大讲“实事求是”、实践中并不实事求是的传统，倒是一直继承了下来。不但在“延安整风”中就搞一些并不实事求是（如“无限上纲”）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开

展“抢救”运动），而且建国后哪些重大举措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瞒天过海？例如至今仍说造成惨绝人寰的“三年困难”的原因有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等，就是不提饿死了多少人和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为什么不敢设“文革博物馆”，无非是因为它有碍个人崇拜。

5.“延安整风”：通过神化毛泽东而形成个人崇拜

“延安整风”中形成个人崇拜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神化，进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属于封建蒙昧主义的欢呼歌颂，如喊万岁、唱《东方红》之类，而且还不断升温，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

在封建专制时代，“万岁”是皇帝的专称，任何人都不能乱喊。到了近代，特别是推翻封建王朝以后，“万岁”也可用于对被拥护的党派与事业的欢呼，如“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个人用“万岁”的，我只知道毛泽东早年崇拜陈独秀时写过“我祝陈君万岁[44]”，也有人对崇拜或谄媚对象用过“万岁”（如康生对王明），但均属个别现象，并未普遍化。“整风”前，我在延安的5、6年里并未听过开会时对某个领导人喊万岁。只是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一个喊的[45]。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时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延安地区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彭真振臂一呼“万岁”，各机关学校自然群起仿效。从此，在中共领导的地方，“万岁”一词就只能属于毛泽东一人了，情形与称呼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在一些地区也被“万岁”了一阵，但很快就纠正了。在个别地方还有地方领导人也偶然被喊了“万岁”，一旦发现，就被视为“事故”，当事人会受到批评和处分（调离）。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认为这是封建主义。我知道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建国后仍然坚持这一意见，这或许是毛泽东特别痛恨他们的原因之一。到了后来，在中国不但绝对不能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连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过。“文革”初期，我去农垦部看王震和陈漫远打大字报战，王震揭批陈漫远的罪过之一就是陈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万岁”，而王震则是经常喊这一口号。

与“喊万岁”同时兴起的，是对毛泽东的各种“封号”。现在人们多以为关于毛泽东的“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的，而毛泽东则斥之为“讨嫌”。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46]”，“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47]”，“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48]”，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49]”等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所有这些极端过火和明显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颂扬和称谓，不但没表示过任何“讨嫌”，而且还完全接受。这些“封号”其实都是经过他一再审阅和定稿的，从来没听说过他对此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自谦的表示。由此也可明白，“文革”中毛泽东对斯

诺说喊"四个伟大""讨嫌"，并不象官方党史学所渲染的那样，是毛泽东谦虚地不赞成这样的称呼，而是毛要消除喊"四个伟大"的林彪的影响。

《东方红》大约也是"延安整风"期间由农民唱出来的，被发现后经文人修词定谱才很快传播开来。农民对领袖有神化和感恩的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50]"问题在于，如此明显地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歌词，不但未被制止，反而由党组织广为传播，直到定为一些会议和广播必须有的开始曲。我在国外工作时常遇到出国文工团，他们的节目安排往往以《东方红》开场，最后以《国际歌》终场，先唱毛泽东是红太阳、"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种自相矛盾实在滑稽。然而，这样的歌曲从"延安整风"起在中华大地上却盛行了几十年，竟无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更动分毫。例如，1954年4、5月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率文工团访问苏联，节目单开头是《斯大林颂》和《东方红》。由于苏联当时已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苏方提出不能再唱《斯大林颂》。于是我们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便向张闻天大使反映，既然总政文工团不再唱《斯大林颂》，最好也不唱《东方红》，否则就有点不够礼貌，显得在和苏联闹别扭。张闻天大使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向陈沂提出不唱《东方红》的建议，然而陈沂却坚持要唱，声称演出节目单是经周总理审定的。结果张闻天大使只好直接请示国内，最后得到中宣部和总政的联名复电（据说请示过中央）：同意使馆意见。由此可见，文工团出国演出时唱不唱《东方红》，不但一位中国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员说了不算，而且连外交部也无权决定，可见问题之大。

到了50年代后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宗教仪式变得越来越多。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农村时摸过一株棉花，结果这株棉花就被系上红绸飘带，成为来徐水参观的人必须先看的景观。中国仿佛回到了现代野蛮和迷信的时代。

6.个人崇拜在中共"七大"上的表现

中共"七大"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所谓"团结"，是指"七大"期间党内已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全体代表都"团结"在领袖毛泽东的周围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所谓"胜利"，则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已"战胜"过去的一切不同意见，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从此将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提法（适用于后来党的每次大会）本身就有问题，而且隐含着明显的个人崇拜之意。这从大会安排、特别是代表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经过3年多的"整风"和开了近1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已完全统一，所有政治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才召开了"七大"。大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具体操持，会议的任务只是在组织上和党章里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因此，会议的发言内容（都是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的）主要就是对毛泽东的歌颂，此外则是许多人的检讨[51]。这些歌颂和检讨大部分有极大的夸张和作假，不少

说法已超出尊敬爱戴的范围，明显地是宣扬个人崇拜以至于带有奉承讨好之意。而毛泽东对这些却欣然接受，让大家把一切好事都挂在他的帐上。

例如，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中许多地方说的都是过头话，如“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么残酷性、复杂性、长期性”，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论和实践。张闻天提到毛泽东时说：“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52]”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根本讲不通的。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提出，毛泽东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完全是中共自封的说法。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之外从来就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承认过这一点。又如，周恩来的发言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3个历史时期……。[53]”此话完全违背了史实，因为在周恩来讲的这3个时期里，多数时间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延安整风”之前，周恩来本人就未接受毛的领导，为此周后来反复检讨过。朱德也在会上说：“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究越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24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54]”这都是明显的夸大之词。难道毛泽东领导打“AB团”、指挥西路军、发动群众性的“肃反”“抢救”运动也是“完全正确的”？彭德怀在“七大”发言中也用了不少个人崇拜的语言。他说：“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55]”

除了会上这些颂扬崇拜的言词外，“七大”前后还刮起了一阵向毛泽东敬献锦旗之风，这些锦旗把中央大礼堂挂得密密麻麻。据说，会后两个月，国民参政会代表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访问延安。毛泽东陪他们参观“七大”会场时，傅斯年看见这些锦旗，脱口说了句“堂哉皇哉!”使毛当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看来，“七大”实在是一次检讨的大会、颂扬的大会、推行个人崇拜的大会和为后来开类似会议立下范式的大会。会上既没有也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或争论，各种报告和所有发言都是早准备好并经过统一审查的，会前就已发到与会者手中，开会时只是台上念、台下看（“七大”时倒还有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和一些临时发言，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少甚至没有了）。大概连毛泽东也觉得这种会议有点形式主义走过场，所以过了11年才召开中共“八大”。至于中共的“九大”和“十大”的召开，看来只是为了树立林彪和去除林彪，并没有其他什么实质意义，但也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由此看来，“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被无限夸大了，其消极影响至今未得到认真对待，自然也不会引起重视了。

“七大”的这种范式是否有意搬用苏联的作法，不得而知，但“延安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受苏联的影响则是无疑的。为了对照，这里对以“胜利者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联共（布）“十七大”[56]作一简介。联共“第十七大”于1934年1月举行。这也是一个歌颂的大会，许多人检讨的大会，大搞个人崇拜的大会和斯大林走向权力顶峰的大会。它之所以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已战胜了所有的党内反对派，完全定于一尊，而且这时苏联也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一些建设上的成就。这次大会的基调是庆祝胜利，大力歌颂斯大林，再就

是让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作检讨。

这次会上对斯大林的赞词和“封号”就倾盆而来，什么“伟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钢铁般的”，不一而足。这些赞誉不仅来自斯大林的拥护者，也来自他以前的反对者。前者如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他们首先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基洛夫说，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一批参加大会的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等，也都宣称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等等。至于被安排在大会发言的一些原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则拼命检讨自己并歌颂斯大林。例如布哈林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论法，彻底批评了首先是我……提出来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而李可夫则说：“他（指斯大林）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托姆斯基说：“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攻击。”季诺维也夫率先把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排在一起。加米涅夫提出了“斯大林时代”这一提法，最后还高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57]

这些发言与我们“七大”上的一些发言多么相似。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与旧党章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增加了一个说明党的定义、作用和地位的“导言”

。我党“七大”通过的党章与过去党章显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一个很长的“总纲”。这种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苏、中两党这两次会虽然都是个人崇拜的开始，但各自的为害和发展还是有所区别。联共“十七大”之后的3、4年内，1，916名参加这次“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就有1，108人被捕被杀，而这些代表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里有98名被逮捕或处决。中共虽然在建国后有过几次清洗，但直到“文革”时期才大量拘捕和“监护”中央委员，致使“八届十二中全会”能出席的委员已不足半数。

四、“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

1.“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紧跟毛主席”的产物

在我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张如心的上述文章，虽然他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含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无两样。1943年“七一”前后中共掀起了宣传毛泽东的高潮，刘少奇在7月6日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59]这个提法；两天后又发表了由毛泽东布置并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把这个提法改成了“毛泽东思想”[60]。此后，虽无统一规定，但全党已普遍用起了“毛泽东思想”，直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把它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进党章。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说明，下了不少定义，但此后在长时间里知道“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的人其实并不多见。

“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后，全党确实做到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这倒不一定是由于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主要的还是由于明确和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各地干部都“紧跟毛主席”，接受毛泽东的指示，按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办，即使有政策上的不同意见，也会自动或被动地放弃而服从毛泽东。这为解放战争和中共建国后的历史所一再证明。

例如，建国后刘少奇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结果3个月内遭到毛泽东3次点名和不点名的批评[61]，于是刘少奇就完全放弃原来的设想，转而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刘少奇起初的想法并不见得错，后来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反倒越来越多，杨尚昆就是其中一个。杨尚昆曾公开说：“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值得好好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没到两年就完成了，太快了。[62]”从此事可以看出，恐怕不是刘少奇违背了他自己不久前在“七大”上全面概括和阐述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他没能跟上毛泽东想法的变化，但他受到毛的批评后就立即放弃自己的原有意见，完全跟着毛泽东的新想法走。这类例子真可谓不胜枚举。

后来中共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做法解释成“统一全党思想的需要”。例如，胡乔木就说过：“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可是他又说：“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64]”这些说法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用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究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是另有别的目的？从胡乔木后面的话可以看出，中共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确实“是对着苏共的”，也就是说，要用这一提法来挑战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地位；而中共的“八大”之所以最后并未使用这个提法，无非是由于苏联“拒绝承认”。既然如此，那就表明，提还是不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内其实关系并不大，对中国而言也并不是非这样提不

可，如果苏联反对，那么中国也可以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由此可见，胡乔木关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64]”的说法，并未反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后，特别是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以后，全党思想已经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方针之下，中共中央“长江局”取消后已没有大的分歧，此后直到1945年，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军队的人数都成十倍地增长，显然，是否采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非中共发展壮大的前提。

2.国际共运阵营不接受中共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对活人冠以“主义”或“思想”之名，在10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不曾有过，是中共开了这个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在世时坚决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对那些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5]”正象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他讨厌声望，追求声望的行径更使他愤怒。”“群众的赞美和声望，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走上邪路的证据。”[66]

马克思在回答一位德国党员的问题时也曾明确表示：“我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对各国所发来的颂扬，我觉得烦恼，绝不回答，纵有回答，也许只是斥责。[67]”同样，列宁在世时也未自称“列宁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称为“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就说过：“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68]”斯大林是国际共运中大搞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但他并不让人提“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而是以列宁的学生自居。他说过：“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69]”朝鲜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点思想遗产和声望的，但也没有提出“金日成主义”或思想，而是发明了一个“主体思想”。其他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等这些大搞个人崇拜的人，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义或思想连在一起。除中国外，现在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之后。根据胡志明的为人，在世时他是不会允许人们有此称谓的。所以，“延安整风”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背离国际共运传统、又超越国际共运阵营各国接受水平的空前之举，结果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由于中共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后，根本得不到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国际共运的承认，毛泽东很快察觉到这一点，只得建议少提以至不提“毛泽东思想”。1948年起毛泽东就一再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70]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71]。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从《历史决议》中一律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还正式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所以在1955年党的“八大”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中，再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有人说这是由于毛泽东的谦虚[72]，上文已澄清了真相。其实，“延安整风”和筹备“七大”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点也

不谦虚，为什么1945年以后他却突然谦虚起来了？“谦虚”一说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3.“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命运大体上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延安整风”中提出“毛泽东思想”到“七大”后的那几年，这一时期在党内虽然“毛泽东思想”喊得很响，但中共对“毛泽东思想”既未作系统的研究，也未对其内容作充分的阐述。所以那时人们除了知道毛泽东的部份讲话、文章和词句（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外，能够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其实不多，连“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陈伯达也不过如此。第二个阶段是中共建国前后的10来年，在这一时期中共决定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从政治话语中消失了，这对国事并没有什么影响。第三个阶段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共重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而且比以前喊得更响，还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第三个里程碑，似乎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成了辨别国际共运各党各派是否“变修”的标志。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灾难。第四个阶段是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但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事实上被架空了，邓小平的主张和指示（后来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成了全党工作真正的指导方针，而了解“毛泽东思想”内容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本文对第一、第二个阶段已经作了说明，下面对第三、第四个阶段再简要解释一下。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苏共及其新领导人赫鲁晓夫观察了一段时间，又打了一些交道，就不再把苏联放在眼里，觉得可以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与苏共和赫鲁晓夫一争高下。为此，毛泽东不但想让中国超越苏联，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想在“世界革命”和反帝活动中起带头作用，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于是中共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闻风而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掀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此过去几年中消失了的“毛泽东思想”重新问世，并且被越捧越高。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不仅在“党章”的总纲中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认为它不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73]，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正是在重提“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越捧越高的年代里，中国发生了一连串严重事件，如“大跃进”、“反右倾”、3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由此自然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倒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上述严重事件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死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后的“拨乱反正”中，执政党把毛泽东确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改变为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认为，要趁自己在世时抓紧评价一些

重要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要确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其目的十分明显：即便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党也从未明确界定过“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过了“文革”，在党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把毛在“文革”时期发表的种种言论仍然列入“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就更不清楚了。所以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邓力群说过：“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贯彻执行的，用概括的语言写出来。[74]”

然而，1981年的这个决议是否就写清楚了，恐怕也很难说。其实，当时就有许多人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的许多严重错误在“毛泽东思想”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剔除的。事实上，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及市场经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已经代替了“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还是坚持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更多的是为了照顾与毛泽东同代的领导人的威信并维持党的意识形态法统。

五、“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

1.“毛泽东思想”是如何被剪裁的？

毛泽东在主张不用“毛泽东思想”的年代里曾有如下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75]”可见毛泽东本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只能出自他本人的著作，并不包含别人的言论观点。斯大林也说过：“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76]”如此看来，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或思想只能属于他本人，而不应分属许多人，否则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大堆主义、思想以至责任就都分不清了。1981年中共中央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77]”。可是，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外国人倒是从未把毛本人和他的思想区分开。

究竟“毛泽东思想”是否能与毛泽东本人区别开来？毫无疑问这是不行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只能是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观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集体贡献和集体创作，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个“集体”的外延根本就无法确定。例如，在延安时期当地的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这一观点，此后“精兵简政”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份，那么是否可以因此把民主人士李鼎铭也纳入“创作”过“毛泽东思想”的那个“集体”？又如，作为“毛泽东思想”中重要观点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主要是陈独秀在党的“二大”上明确提出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则是王明首先提出的，那么是否要承认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王明因首倡这些重要观点而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创建？如此考证下去，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对“毛泽东思想”有过贡献，比如，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一词就出自《汉书》，并非毛泽东首创，这样来认识“毛泽东思想”岂不乱了套？

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党是否准备与毛泽东“祸福与共”？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责党的领导集体人人有份？为了避免这一尴尬，中共又发明了中国特有的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方法，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界定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能不能只保留正确的部份而将错误的部份去掉？显然，这样做既不合理，也违背科学。倘若如此，世界上的各种主义和思想大都可以被“界定”得完美无缺了。例如，若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论成份去掉，把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机械唯物论因素去掉，这样的“黑格尔思想”和“费尔巴哈思想”自然比较完美，但那也不成其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

其实，这种手法也是毛泽东本人所反对的。他晚年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78]。胡绳把毛泽东说的“第二件事”诠释成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79]，这种说法想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却违背了毛本人的意思。体现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的相关理论观点，就是“以阶级

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把这些“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掉，那么“毛泽东思想”也就去掉了一半；如果尊重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把这些“晚年错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份，那么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成了一个讽刺。

中共的前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也意识过这个矛盾。他的说法是：“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有两种形象：一种是长期的中国革命，一直到1957年……另外一种，主要是从60年代以后或者晚一点……我们现在继承第一种形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80]”其实，这种说法仍然是漏洞百出的。例如，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推行了以打击“AB团”为名的“左”倾肃反路线（其作法比斯大林实行的大迫害还早好几年），在“延安整风”时期又再次推行过“肃反”扩大化，这些错误并非毛泽东“晚年”所犯。如果严肃认真地评价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观点，那么就必须承认，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中不仅晚期有严重错误，早期和中期也同样存在很多错误。

然而，目前在中国，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居然把它剪裁得与毛泽东成了两张皮；按照这种官方诠释，毛泽东晚年因犯严重错误而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反而是党内其他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或通过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这里讲的“晚年错误”在中国通常是指“文化大革命”，其实在“文革”以前毛泽东还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如“大跃进”、“反右倾”等，这些60年代以前的错误算不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份呢？如果不算，那么是不是要把它们归结为毛泽东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全国党组织一起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呢？显然，上述诠释只能把“毛泽东思想”越解释越混乱，更谈不上科学性。

2.胡乔木是如何诠释“毛泽东思想”的？

胡乔木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党的理论权威。他在起草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对“毛泽东思想”作过多次阐述。一方面，胡乔木指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1]。他认为，在“文革”时期，“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根本没有，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除“文革”外，“当然，毛主席的思想里面也还有一些其他不完全正确的方面。”如“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82]等。由此可见，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并列，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并“不完全正确”，甚至还有极其错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胡乔木又表示，“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

胡乔木把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后（胡的说法是，“他的错误是违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完全正确和纯洁的毛泽东思想”中归纳出3项“基本原则”或“根本精神”，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83]。他的这一看法后来在“历史决议”中表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胡乔木的这一归纳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并不是毛泽东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中只属于他的特别的新贡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把“实事求是”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很难讲得通。而从毛泽东的活动实践来看，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打“AB团”、葬送西路军、“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等，还是建国后的“一大二公”、“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乃至“文化大革命”，恐怕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贡献，都是不适当的。

其次，关于“群众路线”，我曾在文章[84]中提到过，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贡献。何况，这种工作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干部凌驾于群众之上。它一方面说，领导干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群众），所有方针政策都是把你们的意见集中起来，经我们制定成政策，再由你们去执行；另一方面又强调，你们应做的一切都是我们要你们干的。这样的工作方法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也违背“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而且领导干部推行的政策究竟是否体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无具体衡量标准。所以，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实行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的。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充分动员了群众，其实际结果却是带给群众巨大的苦难。象这样的运动到底是集中了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是出于领导人纯粹主观空想下的决策，恐怕不必深究就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第三，关于“独立自主”，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如此，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的独创。事实上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把对苏联的“一边倒”列为国策，建国后并未在外交上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内政方面则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走俄国人的路”，一切照搬苏联模式，斯大林在世时中共所有的重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汇报。例如，“统一战线”被称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实建国后若不是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也许中共会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做法把所有民主党派都给解散[85]。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毛泽东直到晚年还承认的，多年的这种实践至今还留下不少阴影。与“独立自主”的说法相关连，“历史决议”还加上了“自力更生”一词。其实，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后一直强调的“自力更生”不过是闭关锁国的代名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和各国革命需要联合行动[86]。何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任何国家不对外开放就必然落后。而毛泽东所强调的却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87]；他还多次讲过，不与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交，美国封锁的时间愈久对我们愈有利等等。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闭关自守，导致中共建国后30年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原来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后来邓小平承认：“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8]

由此可见，所谓“毛泽东思想”中三大原则之一的“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恰恰是一个消极面。

3.对个人关于“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一点修正

我个人对“毛泽东思想”没有研究，但因为它一直是党的指导思想，所以过去很长时期还是服膺的。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我对“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逐渐产生了一些怀疑。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我对“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89]一文中作了如下表述：“毛泽东思想就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这段话里的第一句当初的意思是想说明“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背景，即它只适用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不适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现在看来，这句话中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在这点上倒是胡乔木讲得对，他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既“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按即新阶段）”。这大概是由于胡乔木深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但不精通（连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没读过），而且还有些误解（如对“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简单化的偏向（例如，毛泽东在延安讲过，对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也常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胡乔木虽然提出了“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就象他在许多问题上往往自相矛盾一样，他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90]这一说法。人们实在看不出这两种说法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差别。或许，说“毛泽东思想”是斯大林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之结合，可能更确切一些。有一些人过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在同胡乔木唱反调，而且也属于不符合实际的拔高[91]。这是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上的继续倒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个人崇拜影响的表现。

综上所述，笔者现在以为，似乎可以这样来定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这个定义的第一句话把“毛泽东思想”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区别开来了，也说明它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革命而不涵盖建设；第二句话显示出农民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之特点，使“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完全依靠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和走城市暴动道路的列宁主义不尽相同。

注释

[1]《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78页。

[2]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编的《汉英词典》（1997年版）就只设“个人迷信”条目，意为无须再列“个人崇拜”。还可见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新英汉词典》、刘泽荣主编的《俄汉新辞典》

（时代出版社1956年）对cult、КУЛЬТ的中文释义等。
[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84至485页。
[5]《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
[6]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
[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至174页。
[8]出处同上，第200页。
[9]出处同注[7]，第200页。
[1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5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16页。
[11]两书作者分别署名为李银桥、权延赤，但实际上都是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一个人所述。
[12]《随笔》，2001年第3期。
[13]《参考消息》，2004年2月2日第9页。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至22页。
[15]例如，我手头就有2002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作者为余广人、于保红）。
[16]出处同上，系该文的第二个小标题。
[1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1页。
[18]出处同上，第328至330页。
[19]出处同注[15]。
[20]据2003年12月李锐为哈佛大学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发言。2004年1月25日在新华社黄亭子食堂有30到40人（包括我、方实、郭先俅、田绿平、汪丁丁、残雪等）参加的春节聚餐会上，李锐宣读他的这篇发言稿之后曾谈到，毛加写口号一事是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朱德秘书的发言中所讲，他现在还保存着这份“会议简报”。
[21]见《新华月报》，1950年5月号。
[2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至115页；戴晴，“梁漱溟与毛泽东”，见《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3]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4]见1984年《党史通讯》第7期载“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文，其中指出王明文章经毛泽东看过。除按王明《中共五十年》的记载外，还根据任弼时1945年4月1日的《日记》。
[25]分别发表在1941年的《共产党人》第16期和《解放》周刊第127期上。
[2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4至205页及其他有关章节。
[27]王稼祥于1938年、周恩来于1940年曾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按党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和执行国际的指示和决定。中共中央1940年5月13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也已经答应“七大”在1940年9月召开，并表示“这次大会不应该再推迟”，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626页。
[2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页。
[29]“自白”，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05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和第3卷第803页。
[31]见王若水2000年12月提交给“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21世纪的挑战”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此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
[32]《延安整风实录》，第41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9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95页。
[3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5页。
[35]《张闻天年谱》，第707页；“邓力群谈张闻天与刘英”，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
[3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375页。
[37]“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3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至138页，“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3至454页。
[4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9页。
[41]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790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653页。
[42]见1942年8月29日政治局会议关于《解放日报》问题的决定以及同年9月9日西北局“关于

《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
[43]“延安整风运动纪实”，《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95页。
[44]祝彦，“走近真实的陈独秀”，《百年潮》，2003年第1期。
[45]参见《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18页。
[46]陈毅，《新四军抗战始末》，1945年5月1日在“七大”的发言。
[47]《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48]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49]《任弼时选集》，第383页。
[50]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51]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6页。
[52]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246至263页。
[53]1945年4月23日在“七大”的发言。
[54]见1945年5月1日的《解放日报》。
[55]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的发言。
[5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社1949年初版第407页。
[57]以上均见（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译文版，第369至374页（各人发言均据《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5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503页。
[59]《刘少奇选集》，第300页。
[60]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61]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81、99页。
[62]“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1997年3月22日），先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后收入《张闻天研究文集》第4集。
[6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
[64]出处同上。
[65]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1890年8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66]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67]见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罗稷南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59页。
[68]《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7页。
[69]“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页。
[70]1948年11月21日审阅共青团文件时给刘少奇等人的信。
[71]1949年3月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72]如上引《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所载“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一文。不过持此说的人很少。
[73]分别见刘少奇的《论党》和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
[74]邓力群，“中央起草历史问题的指导思想”（1981年7月21日），载《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75]毛泽东1953年5月24日对军训部部长萧克报送的内务条令等3个草案的批示。
[76]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第1卷第186页。
[7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78]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
[79]胡绳，“毛泽东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8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2至83页。
[81]出处同上，第97页（1980年7月24日的谈话）。
[82]出处同注[80]，第118、123页。
[83]出处同注[80]，第96至101页。
[84]如“张闻天的民主追求和实践”，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85]“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3-264页。
[8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87]见《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98页，“陈毅传达毛泽东的讲话”。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89]分别发表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和《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
[9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页。
[91]例如2003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就属这类。该文提到，"为什么别人没有出来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由他来倡导呢？"这话不合乎事实。即使不算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意思相同的言论和实践，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体提法，也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同时提出的。至于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违背历史的拔高，除非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这种进一步发展，而人们早已饱尝了这种"发展"的苦果。

（作者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作者亲身参加当年的整风，引述材料也较丰富，是笔者的个人感受，又因为他是张闻天的秘书，和李锐一样，有这些看法是当然的。当年参加延安整风的人还很多，所写文章也不少，内容也不相同，某些情况还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虑。）

对党史伪造学派的清算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

阮铭

党无信史，原因何在？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就在对统治党六十余年的党史伪造学派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认真清算。何方指出，制造伪史的源头，是延安整风和产生于延安整风的“党史编纂学”。何方称之为“党史编纂学”的“胡乔木学派”，包括后来加入的胡绳等人。我看称之为党史伪造学派更为真切。决定伪史“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人。胡乔木不过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们的“一枝笔”，从替毛泽东伪造第一个历史决议始，到替陈云、邓小平伪造第二个历史决议止。今天毛泽东、陈云、邓小平、胡乔木虽已去世，这个历史伪造学派仍以这两个历史决议统治中共党史研究，不准越雷池一步。

一、塑造毛泽东神话的两个历史决议

何方的《党史笔记》，着重清算了中共党史伪造学派制造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这个历史决议伪造的遵义会议神话。

对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有许多流行的说法，譬如说是批判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之类。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以“研究与清算党的历史”为手段，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为论证毛泽东的正确和其它领导人的错误制造的假想敌。

事实是：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整风前，七大代表已从各地选出。一九四○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毛泽东曾于一九四○年四月二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即任弼时）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

但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改变了想法，认为“为确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统一全党认识”；并亲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准备编《六大以来》文献集，作为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思想的“基本武器”。

效法斯大林编党史

一九四一年二月，毛泽东任命胡乔木为自己的政治秘书，参与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何方指出：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为了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为延安整风的基本武器。”

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制造的第一个神话，就是遵义会议，即所谓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何方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这个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历史转折”纯属伪造。

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

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

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是制造遵义会议神话的高峰。为了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后再度拔高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领导的神话，中共党史伪造学派根据陈云的一个所谓《传达提纲》和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以及一些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便按照陈云的指示“一锤敲定后不许动”，把遵义神话敲定为“不许动”的党史。何方指出这部《遵义会议文献》充斥荒唐可笑与自相矛盾。如：

《遵义会议文献》自相矛盾

——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重要发言，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张闻天批判“三人团”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不“重要”了。）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洛甫（张闻天）说，现在要更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这是典型的“今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拥毛的文革语言和八十年代邓小平“让胡耀邦做做看”的办法用来制造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神话。

还有陈云那份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在“考证”后说：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可疑的是从未发现有人听过陈云按这份“提纲”的“传达”。而这份“传达提纲”，也未在中国发现，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接收来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陈云确认。这一“文献”的标题，也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方认为，陈云此件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可能是“传达提纲”。他判断可能是陈云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陈潭秋、扬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

其实此事前人早有发现。因为陈云给共产国际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国的党史专家司马璐早在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做过引证，并注明“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义会议上，毛批评博、周路上不愿多打仗，行军像搬家似的，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遵义会议后，毛指挥军队大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

陈云早年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真本，比他半个世纪后“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伪本，恐怕更接近事实。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或发牢骚，均表达不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哪里有

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真正的历史转折，一锤敲定

真正的“历史转折”，真正的“一锤敲定”，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从此在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上被抹掉了。这是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第一枝笔”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

>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
>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

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纂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纂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纂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纂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纂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不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相对于对毛泽东错误的掩盖，对所谓“反毛”的“左”倾中央的错误则予以夸大。如“左”倾中央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维峻）、古（柏）”的文献，《六大以来》收进四篇之多。事实上对“邓、毛、谢、古”的党内斗争，受错误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职处分，调走做别的工作。如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不久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而毛的反AB团富田事变，错杀成千上万红军指挥员和革命战士。

一部以毛泽东划线精心取舍、形塑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三年延安整风和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完成了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纂学或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绝对统治，同时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

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学派曾一度遇到危机。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以毛泽东划线作为判别历史是非的标准。随着胡耀邦对中共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检讨中共历史问题，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见。

邓：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一九八○年三月，邓小平提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陈云讲得更露骨：“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

至于普遍关心对历史问题的重新检讨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邓小平说：“对过去事情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仍由胡乔木负责。

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乔木、邓力群在邓小平、陈云直接领导下，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了一年零三个月（胡耀邦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之一，他的意见被邓力群传出邓小平的一句话，“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何方指出：“两个决议一脉相承，前者（第一个决议）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第二个决议）是前者的延续。第二个决议还特意（根据陈云意见）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何方正确地指出，胡乔木由于“长期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護人。”但他又肯定“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我以为这是何方以己之真诚与正直，错度了胡乔木虚伪与阴险之心。

历史学家黎澍，对胡乔木的人格品质曾有一针见血的揭露。黎澍说：“胡乔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制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赞他‘灵魂最美’、‘改造最好’，胡乔木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最美最好的伪君子。”

胡乔木猎杀“自由化”对象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篡改伪造历史。树立毛思想、邓理论绝对权威，靠的就是胡乔木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伪君子。我曾亲见胡乔木怎样出谋划策，不但构陷陆定一、周扬等与他同辈的党内知识分子，就连他的后辈青年都不放过。

文革时胡乔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时接待来访者谈陆定一。胡乔木揭发陆定一的大字报就贴在中央宣传部大院。胡乔木揭发毛泽东同陆定一在陕北行军时曾遭敌机轰炸扫射，而向敌方通情报的可疑者是陆定一。描述过程离奇如间谍小说。我曾为此问过陶铸，陶铸说他从未听说，也不可信。那时陶铸任中宣部长，同时担任审查陆定一的项目组长，他对胡乔木的构陷不予理会。后来陶铸被打倒，专案组被另一名伪君子陈伯达接管，陆定一竟被定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胡乔木在邓小平手下的十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不但扩建了他的中共伪史学派的庞大队伍，而且专为邓小平、陈云寻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猎杀对象。胡乔木的战略，是全面、彻底、干净的歼灭战，年老的不放过，年少的也不放过。不但他自称的“老战友”，如陆定一、周扬、于光远，一个个被他以邓小平的名义，扫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从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苏绍智的新闻与理论，到刘晓庆的电影，李谷一的歌声，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听到过他那激昂慷慨、声色俱厉的讨伐，甚至宣布要同准备出版《胡适文存》的某出版社“决斗”。真是所向披靡，伟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着《史通》，指出中国有良史传统，也有伪史传统。

刘知几认为良史应具备三个条件：史学、史识、史才。后来章学诚加了一条史德。史学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别真伪。史识指驾驭与分析历史事实的洞察力。史才指写作才能。史德，就是为写出信史、拒绝作伪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难以产生信史的人为因素是，史料被伪史学派垄断。敢于写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垄断史料的只有胡乔木的伪史学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忆录”，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忆的记录，而是伪史学派强加于死者的伪作。如何方指出：杨尚昆生前与刘英谈党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义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得到大家的拥护。”这篇谈话经杨尚昆本人审定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于《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这段历史变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伪史学派垄断封闭史料

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决议中根本没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杨尚昆也无此“回忆”，这是伪史学派从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抄来的。我还要指出，“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这是众望所归”这些话，是从《邓小平年谱》变造的。《邓小平年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这是众望所归”。时隔四十五年，用语竟一模一样，这叫“今为古用”。

何方《党史笔记》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会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开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前档案，但有保留。后来一九九○年十月的《实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号文件》，作出详细限制，如：“档案形成之日已满五十年，但仍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延期开放”；“开放会影响各级领导人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做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等数十项。

谁来决定这些禁令适用的范围呢？唯有垄断历史文献资料的胡乔木伪史学派。凡不利于两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伪史制造的神话的，均禁止对民间开放。

求真之难，就在伪史学派对史料的垄断封闭，致使有志修信史者无法接触史料，垄断史料者蓄意制作伪史。于是在史料被垄断封闭的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非信史亦非伪史的愤史。

“愤怒出诗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泽东的党史著作，属于这一类。凭一些人物访问和零星历史档案作出的分析判断，难以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

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写过一本《邓小平帝国》，只是写出个人亲历的一段历史和自己当时笔录的史实。原来我还想写一本《毛泽东帝国》，已写了部份章节的草稿，后来放弃了。因为在毛泽东时期，自己离帝国的核心太远，视野所及之内，缺乏对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开放当年历史档案之前，要写出“历史的实录”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中共历史档案解禁之日来临，那也将是伪史学派隐退，信史诞生之时。

二○○五年中秋节，于台湾淡水红树林